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第四章（上）

2020年9月

目录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2020年9月

==

。。。。。。。。。。。。。。。。。。。。。。。。。。。。。。。。

。。。。。。。。。。。。。。。。。。。。。。。。。。。。。。。。

。。。。。。。。。。。。。。。。。。。。。。。。。。。。。。。。

。。。。。。。。。。。。。。。。。。。。。。。。。。。。。。。。

。。。。。。。。。。。。。。。。。。。。。。。。。。。。。。。。

。。。。。。。。。。。。。。。。。。。。。。。。。。。。。。。。

。。。。。。。。。。。。。。。。。。。。。。。。。。。。。。。。

。。。。。。。。。。。。。。。。。。。。。。。。。。。。。。。。

。。。。。。。。。。。。。。。。。。。。。。。。。。。。。。。。

。。。。。。。。。。。。。。。。。。。。。。。。。。。。。。。。

。。。。。。。。。。。。。。。。。。。。。。。。。

第四章

1911年-1937年

____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经过、后果、深层次原因

【引述 《美国故事》】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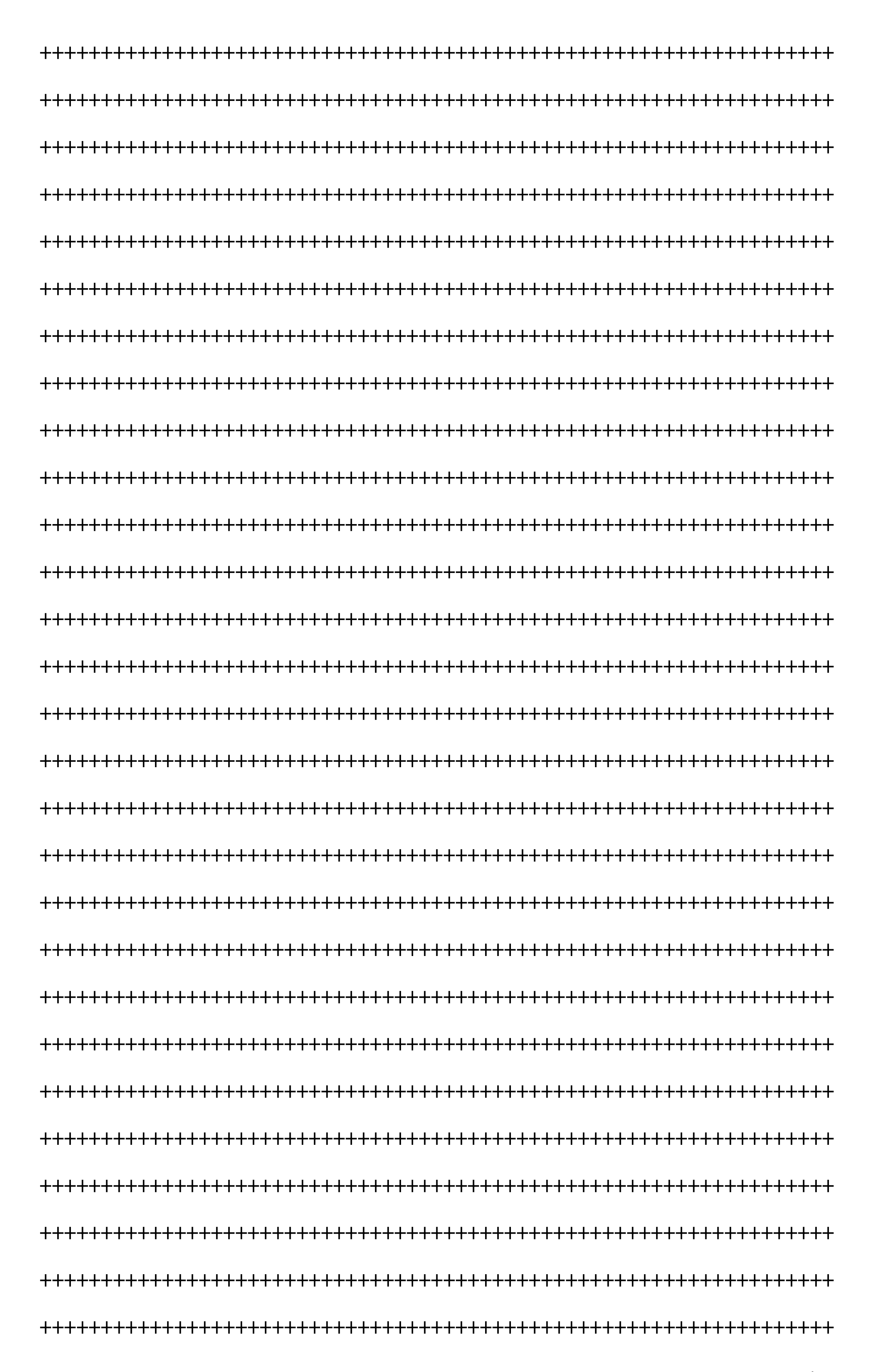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 《美国故事》】

中世纪简史

+++
+++
++

【引述 《从金刚经说起》 基督教信仰的简史】

（1.D）基督教信仰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的冲击

然而，近代两三百年以来，随着中国与西方文明的交互、冲突、摩擦、交往等等影响，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以圣经为核心与根基的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思想的冲击。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冲击，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尽管儒家思想所提倡的文化信仰，在许多方面有非常良好积极的内容与效果，但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缺陷或漏洞，就是，它丝毫无法涉及到任何关于超自然的信仰的内容。

换言之，儒家思想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关于"生"的问题，但是，却无法回答关于"死"的问题，即，人在死后的去向的问题，以及人生是否真的有超越生死的价值与真实性的问题。这些关乎生死的问题、关乎人生的终极价值意义的问题，一直在中国上千年古代历史中，由佛教与道教思想的回答作为对于儒家教义的、非主流的补充。

这里请注意，当说到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的时候，我们并不一定是在谈论基督教信仰本身的、或是圣经本身的内容。事实上，所谓的西方文明，既不是铁板一块，也绝非等同于基督教信仰本身。

的确，在过去两千年的历史中，基督教信仰在西方文明中早已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在今天整个西方文化中，圣经的原则、基督教信仰的精神、以及耶稣基督之救恩对于世人生命的救赎与深刻改变，等等这些根深蒂固而广泛的影响，在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医疗体系、公共教育、婚姻制度、甚至科学技术领域、文化艺术领域、哲学领域、历史学领域等等范畴中，早已随处可见。

不但如此，西方文明在近代五百年以来的大发展，在科技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等，对于整个人类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以至于，基督教信仰今天已经遍及全世界，无论是非洲、南美洲、北美洲还是亚洲等地区，都有至少数以亿计的基督徒。今天，世上总共有约三分之一的人类总人口、约23亿的名义上的基督徒，是相信以圣经为根基与核心的基督教信仰，并声称以耶稣基督为自己生命的救主。

———————————————

（1.E）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文明之间无法划等号

不过，虽然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影响如此广泛，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简单地当成了基督教信仰本身，或者，如果我们简单地仅仅把西方文明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划等号，那么，我们就犯下了严重的、望文生义、不认真负责、偏离事实的错误。

事实上，我们只要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近三百年来，虽然有很多好的事情，比如现代科技革命的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民主自由制度、法治、自由经济、平等贸易、社会大分工协作、医疗、教育等等，还有无数的、具体的科学技术发明，都是来自西方；但是，也有很多坏的事情，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神论主义、进化论哲学、性解放、放荡主义、离婚泛滥、家庭破碎、甚至同性恋等等，也都是来自西方。

显然，如果我们刨根问底、认真查考、追本溯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明白，西方世界绝不是铁板一块，西方人也绝非全都是纯洁无辜的、敬虔谦卑的圣徒。

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化的优异成分；看不到西方文明给人类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看不到现代人要在何等广泛而深刻的程度上，感谢——培根、波义耳、牛顿、等等无数科学家、哲学家，以及源自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现代医院体系、现代教育体系、现代经济法律制度等等；看不到在西方的无数的、大批的、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们，在科学、文化、政治、法律、医疗、教育、服务、信仰领域，为社会、为人类所作出的可歌可泣的杰出贡献；看不到在西方各国有那么多、数量巨大的信仰敬虔、谦卑诚实、热忱真挚、敬老爱幼、爱人如己、勤奋工作、热心服务于大众和全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真诚基督徒们；——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是没有良知、没有诚实态度的人。

另一方面，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明中的错误、缺憾、谬误成分，比如，在诸如法国为首的、遍及西方各国的、打着人文主义旗号、放荡不羁的淫乱主义、性解放主义；在诸如德国为首的、遍及许多国家的民族自大主义、好战主义；在诸如俄国为典型代表的信仰虚伪主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起源于英国等国学术领域的达尔文进化主义，和盛行于德国的唯物主义、泛神主义、自然神主义、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不是仔细思考与观察、真诚寻求真理的人，而仅仅是盲目崇拜西方的武力与物质繁荣，而在心中没有正义、没有饥渴慕义之心的人。

事实上，即使我们撇开这些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历史、哲学史等历史领域的角度不谈，单单从宗教信仰、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与现状来看，西方文明体系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甚至分裂的、内部景况；——这也从侧面再次证明了，西方文明体系绝非简单地、直接地等于基督教信仰本身。

====================

（1.F）基督教会的简史

在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与教会历史中，在大约公元15世纪以前，基督教会一直分为东西两大部分。

———————————

（1.F.1）天主教与东正教的由来

东方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是从大约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归依基督教信仰以后，把罗马帝国从罗马迁都至当时的拜占庭市开始的。拜占庭市位于欧洲与亚洲陆路交通的重要枢纽节点。它后来被改名为君士坦丁堡。这个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以基督教信仰为国教的东罗马帝国，被后世的历史学家称为拜占庭帝国；她从公元四世纪一直延续到公元十五世纪，存在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没有改朝换代的重要国度之一。公元八世纪左右，这个以希腊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基督教国家，开始不断地把信仰传播到后来称为俄罗斯等、以斯拉夫民族为主体的各个国家。俄罗斯这些国家曾经在很长时期一直处于农奴制度状态（俄罗斯的农奴制度一直到后来十七世纪彼得大帝改革、效法西方工业革命等等的时候，才开始被完全消除）；然而从公元八世纪开始，基督教信仰已经逐渐把社会文明和人道关怀制度带给俄罗斯等的广袤土地。

西方教会以罗马为中心，在君士坦丁大帝迁都君士坦丁堡以后，延续和保持了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注：耶稣基督于大约公元元年左右降生，于公元三十三年左右被钉十字架）、使徒彼得时代以后建立的教宗制度。在从

公元四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的上千年历史中，以罗马教宗制度为核心、以拉丁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西方众教会，与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以拜占庭帝王为政权中心、以希腊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东方众教会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在公元一千年以前，东西方教会基本上是兄弟般的关系。他们——都以圣经新旧约全书为共同的信仰根基与中心教义的基础；都相信和承认，圣经、也只有圣经，是上帝的全备话语、是上帝亲自的、超自然的启示与默示；都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都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

但是，在公元一千年之前，在东西方教会之间，也一直存在着既合作、又有纷争的状态。两者在各自教会权威、教义细节等等方面都有很多争议、互相对对方不服气。这种状态持续到公元一千年，终于矛盾完全爆发，互相之间彻底决裂，互相否认对方的信仰合法性。

——————————

（1.F.2）中世纪

公元十五世纪，君士坦丁堡被后来称为土耳其人的突厥民族攻陷。君士坦丁堡被改名为伊斯坦布尔；这个名字是源于突厥人的伊斯兰信仰。从此，拜占庭帝国正式覆灭。然而，东方教会，此时已经自称为东正教，逐渐开始向莫斯科方向迁移、直至后来以莫斯科为其中心，继续与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天主教会体系分庭抗礼。大约在同时，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体系（自称为天主教系统），于公元十五世纪开始了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的一种近现代文化革命运动。

值得指出的是，从大约公元四世纪至十五世纪的一千年，被后世称为的所谓“中世纪”，其实并非人们所常常误以为的、专制主义压迫的黑暗时代。事实上，任何诚实的历史学家都会承认，尽管在这期间发生了几次针对中东的十字军东征、回击伊斯兰的进攻和劫掠，但是，总体而言，在这大约一千年的漫长历史年代中，整个欧洲，包括西方教会影响下的西欧，和东方教会影响下的东欧，在政治与军事上，基本上是处于和平时期，几乎很少有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很少有兵荒马乱、生灵涂炭、改朝换代的时期。在许多乡间、市镇、经贸中心，人民安居乐业，许多地方治安良好、常常夜不闭户。

在中世纪的长达一千年中，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教会与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各有特色、短长、优缺点。

东方教会所处的拜占庭帝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帝王及其家族笃信基督教信仰。东方教会分成各个教区，众教区的各级牧者、长老等等围绕着拜占庭帝王，彼此和谐，处于互相和平、长达几乎一千年的安稳状态中。事实上，拜占庭帝国这个名称，是后世的历史学家给起的；当时的人们从未曾这样称呼。他们这个国家，一直自称为“基督之国”、或“东罗马帝国”。

而在西方教会，随着罗马帝国时代在公元四世纪、公元五世纪的解体与破败，罗马教宗体系饱经风霜、生死存亡、无数的患难、危机。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一本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著名的基督教圣徒、奥古斯丁，以及他的《上帝之城》。这本书讲述了，根据圣经、耶稣基督的教导，所谓上帝的国度、上帝之城，究竟是什么意思。在长达上千年的中世纪历史中，西欧从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但是，却有一个统一的教会体系，就是以罗马教宗为首的天主教教会体系。

我们会在其他文字中，继续深入讨论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历史之间的比

较，以及他们两者之间的短长、利弊、得失；并从中反思，基督教信仰的教义，以及，基督教信仰与世上国度、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文明体系之间的深刻关系，应当是怎样的。

（1.F.3）中世纪与近现代之间的分水岭

公元十五世纪是西方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正式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近现代历史的开始。此时，一方面，君士坦丁堡被伊斯兰的突厥人攻陷，因而，整个欧洲大陆与东方地区之间的贸易枢纽、中枢节点被强行隔断。从此，西欧各国开始大兴海上贸易，从而使得曾经位于西欧文明边缘地带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成为海上强国，纷纷在经济政治上依次崛起。

另一方面，从公元十五世纪，以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城邦为中心，因着一个开始于美第奇家族的长达约两百年左右的统治，开始了——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的艺术文化运动，以及，与此同时的、罗马天主教体系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和影响。美第奇家族供养了许多后来极为著名的艺术家，包括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人。这些艺术家回归基督教信仰临到欧洲之前的时期的希腊艺术风格，以绘画和雕塑人体为美、为荣。美第奇家族积极地涉足政治与宗教领域，甚至有的家族成员自己成为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教皇。美第奇家族的奢靡与腐败之风，加重了罗马天主教本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的弊病。

（1.F.4）天主教与东正教的谬误

自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当圣经新旧约全书被从原文（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翻译成罗马的官方语言、拉丁语以后，罗马教宗系统就开始逐渐把圣经束之高阁，使普通人无法轻易接触到、阅读到圣经。在公元十六世纪以前的长达一千年中，西欧各国绝大多数人民，都只能从教会的神职人员那里聆听基督教信仰的教义，而没有机会自己去阅读圣经、上帝的话语。

在教义方面，天主教系统添加了许多圣经本身没有、甚至是圣经明文反对的内容，例如，不恰当地高举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地位，甚至称之为圣母、上帝之母，以及，把历世历代的许多基督教使徒们、圣徒们当作偶像崇拜、向他们顶礼膜拜、祈祷、祈求庇佑（在这些方面，东正教与天主教存在着同样的谬误，即，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圣经本身的教义和教导，而在后世添加了一些违背、偏离圣经内容的教导、信条）。而且，天主教还在后世自行添加了一些伪经、次经，以及向所谓圣母玛利亚祈祷、敬拜的玫瑰经，等等。

好在，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纷争与分裂状态，虽然是一件很不好、极其令人伤心的事情，但是，这种状态却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可信地保证了，圣经新旧约全书本身，一直被精心地、忠实地保存着，直至后世，因为天主教与东正教双方之间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互相监督、有力督责的效果。

并且，尽管天主教与东正教中存在许多谬误和偏差，但是，我们仍然要说，他们的主流信仰、主干教义、主要信条，例如“使徒信经”等对于基督教信仰教义的总结，是正确的。所以，在天主教与东正教里面的信众，如果真心地、真诚地、热忱地寻求和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的以耶稣基督为自己生命的救主，那么，我们仍然可以说，他们是良善的、真诚的基督

徒——尽管，我们应当诚实指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

____

（1.F.5）圣经的广泛翻译传播，以及近现代时代的开始

公元十五、十六世纪，随着君士坦丁堡被突厥人攻占、拜占庭帝国灭亡，东方教会保存的希腊文的圣经原典以及许多其他希腊文写成的著名基督教历史文献和著作，被教会人士抢救、传播到西方教会体系。这些希腊文的文献以及圣经原典，开始让西欧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罗马教会的圣经拉丁语译本，在一些重要教义方面的词汇概念上，存在着一些翻译上的失误或偏差。

几乎与此同时，欧洲发生了许多历史意义影响深远的事情。我们仅举以下三件极其重要而著名的事情为例。

第一件事情是，金属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大规模、迅速地、廉价地印刷、传播纸质书籍在技术上成为可能。

第二件事情是，罗马教宗的教义上的谬误，以及财物方面的奢侈腐败作风，终于激起了教会各级神职人员以及普通基督徒们的反抗。以德国的马丁路德为代表，一大批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反抗教廷、传播圣经、传播真正纯正的福音与基督教信仰教义。马丁路德把圣经翻译为德语，极大地推动了圣经在社会中的普及化、广泛传播。

第三件事情是，英国的丁道尔开始把圣经翻译成英语。这些圣经翻译运动本身，直接导致了现代德语书面语、现代英语书面语等等的诞生，因为在那之前，西欧的书面语言只有一种，就是拉丁语。

圣经的广泛传播，使得欧洲的无数普通人开始真正地、详尽地明白基督教信仰的真正主旨、原则、精髓；这些基督教宗教改革运动，深刻地革新、更正了欧洲各国人民在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方面的许多认识与观念。这样的革新与更正，直接地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开启；以及，现代民主自由政治运动、法律、经济等等许多方面的变革，如火如荼地在各地展开。（关于这些有关方面的内容，我们会在其他书籍中专门展开阐述）。

这些事情，推动了、构成了过去五百年来的欧洲近现代史，并进而，对于全世界的文明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影响作用。今天，每一个出门坐火车汽车飞机、早上吃牛奶面包、上班穿西服革履、住在高楼大厦或四季温暖如春之庭院别墅里的人，都要感谢培根、牛顿、波义耳等现代科学的开启者们，更要感谢那些舍生忘死地传播圣经、传播基督福音的敬虔基督徒们。

———————————

（1.F.6）基督教会简史的总结与反思

从上面的简史中我们可以看见，在耶稣基督降生以来两千年的历史中，每当人们贴近圣经、寻求圣经、明白圣经话语的时候，他们就展现出热忱、敬虔、谦卑、真挚、积极的信仰，他们的生命就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社会与国家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也发生极其巨大的改变；上帝的祝福就极大地、温暖地、令人震撼地临到他们。

反之，当人们沉浸在自己的罪性与私欲中，沉浸在彼此的纷争中，当人们没有真诚地、认真地、热忱地寻求上帝的话语、信仰的真理的时候，那

么，他们的生命就显出冷漠、消极、惰怠的样式，他们的道德就不断滑坡，他们整个社会与国家就充满了许多动荡、败坏之事。

从基督教会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反思。

第一，上帝的国度，虽然表现在地上的教会中，但是，从终极的意义与层面而言，基督的国度不属于这地上的任何地方，而是属灵的、属乎天上、那永远的国度与家乡。

第二，然而，这并不是说，基督教信仰在这个地上就没有：——确定的、明晰的、任何人都无可否认的见证。事实上，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人道主义、人的生命与自由被极其重视，到艺术文化、经济与科学的大发展等等，——在无数的层面上，现代人类文明都被深深地刻下了基督教信仰的烙印。（读者可以阅读《基督教的果实》《基督教信仰之大众证据》《基督教信仰之证据的反思》《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论民主》《论婚姻家庭》等系列书籍，进一步查考这些方面的事实与信息。）

第三，但是，在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文明之间，是无法划等号的。前者固然在极大程度上深刻影响了后者，但是，后者中包含着许多其他方面的成分与因素，甚至包含了无数的糟泊、不义、败坏、奢侈、贪婪、淫乱，等等。

那些感叹“为什么基督教信仰没有全部改变欧洲人、使全体西方人都成为基督教圣徒，或是为什么没有彻底消灭那些罪恶的恶人”的人们，并不明白：——上帝是公义、圣洁、慈爱与恩典的，他的终极道德审判必将来到，他的终极惩罚是永远的；然而，他以恩典与慈爱，给世人悔改已罪的时间与机会，使他们真心地、真诚地、而不是被强迫地，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上帝的无限公义与权柄，到那终极的审判日，必将

昭然地显明在一切世人的眼前。

第四，那么，为什么有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对于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明不太了解、不求甚解的人，常常把这两者看为同等呢？

这一方面是由于，许多世人并不了解基督教信仰的真正主旨、福音的真正涵义：——"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人在世上应当勤勉而敬虔地生活、工作，但是却不应当把心系于这个世界，以这个世界、或其中任何被造之物为心灵的归依"；尤其是不了解基督教信仰、与世上之国关系的教义：——"基督的国度属乎天上，而不属乎地上；真诚、谦卑的基督徒应当在这个世上作盐、作光，把基督的爱带给世人，见证福音的真实，见证耶稣基督伟大、圣洁的爱；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温柔的福音，是圣洁的福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烛火他不吹灭。"

另一方面是由于，世人因着自己生命中的罪性，因着自己的心系于这世上的国度与荣华，所以，常常误以为，神的作为和果效，是要终极地显示在这个地上的世界中。他们把世上的荣华璀璨、建筑物的宏伟绚丽、人群的华盖云集，错误地当成了天国里的永远荣耀。他们总是以为，非得要通过外在的、表面光鲜的"荣光"，来看待那些属灵的、属天的、属乎道德的事情。

第五，基督教信仰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影响最大，特点也最独特的宗教信仰。它虽然指出，我们不应当以这个被造的世界或是其中任何被造之物、被造之人为我们心灵的依归，而是要单单地敬拜那位创造宇宙天地、创造我们生命的主；但是，它不是像佛教那样抱着虚无、万事皆空、不垢不净、不生不灭、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诸相皆虚妄的态度，以否定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一切世事。它告诉我们，应当积极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以谦卑、温柔、真诚、和平的心，以勤勉、专诚的工

作，去面对一切事情、一切世人。

它虽然指出，只有上帝才是我们的造物主、生命之主、永生之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上帝是我们道德律法的颁布者、是圣洁公义而全能的终极道德审判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道成肉身，耶稣基督谦卑地降身为人，生在马槽里，生在律法下，取了奴仆的样式，甚至谦卑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恩，使一切相信他、接受他救恩的人，得到永生，得以进入那永远的天国、得享那永远的幸福与美好。

它不是像伊斯兰教那样用火与剑传教、荼毒劫掠，而是用谦卑、慈爱、怜恤与和平的方式，把福音向世界分享。它不是像伊斯兰教那样推行、奉行政教合一的教义与制度，更不是要在地上建立起什么伟大的、属世的国家；它不是要以严刑峻法来统治臣民，更不是要让整个社会万马齐喑、丧失活力与创造力。在圣经福音书中，耶稣基督清楚地说道：“我的国属乎天上，而不是属乎地上”。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基督教信仰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良善影响是最大的，也是有目共睹的。

+++
+++
++++++++++++++++++++++++++++++++++

十六世纪，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一大批敬虔基督徒们，在德国等欧洲国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基督教改革运动与文艺复

兴运动一起，给欧洲各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也将要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给全世界的整个人类发展进步局面带来深刻的、甚至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直接地导致了一大批基督徒思想家们，例如弗兰西斯·培根、牛顿、波义耳等人，开启了现代科学思想体系的爆炸性发展，导致了英国皇家科学院的建立【详情请见《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也直接地导致了约翰洛克、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政治经济领域思想家们为现代民主自由政治制度以及现代经济制度所奠定的思想基础。

但是，从十六世纪开始，随着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逐渐发展，因着贯穿于人类整个历史中的、世人在生命本质中的罪性，因着人类自古以来历史中的【而不仅仅是十六世纪以后；更是在中世纪、在公元前、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许许多多世人在很多世事中充满罪性的言语行为，在欧洲各国中，开始相继出现了很多大国主义、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的思想。十六世纪以前，在中世纪的主要时期内，在欧洲的很多地区，例如德国等地，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紧密连接的国家体系，而是由很多城市、邦国所组成的松散联盟体系。然而，十六世纪以后，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因海上贸易的发达而相继崛起，在欧洲内陆，在德国、法国、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地，也开始不断地发展出许多以各样重组整合的国家为基础的大国沙文主义、爱国主义思潮。

这种民族主义、所谓爱国主义，成为了十六世纪以后数百年中，欧洲大陆中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彼此纷争、甚至不断地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并不是在这里说，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本身就一定是错误的。而是，

欧洲的惨痛历史教训，无可置疑地告诉了我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绝非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之上，必须有公平、正义、圣洁、恩慈、公义的道德法则，必须建基于敬虔、真挚、谦卑的、对于那宇宙天地之主、道德律法颁布者的信仰。否则，所谓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就一定会成为欺谎、不义、专制、暴戾、杀人、战争、生灵涂炭、罪恶的借口，并必将给整个人类带来巨大的痛苦、磨难和灾祸。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很大程度上，给人类带来巨大灾祸、生灵涂炭的一战与二战，都与德国日耳曼民族的傲慢自大、民族主义、欺谎不义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其他参战方，例如俄罗斯、法国、等就是无可指责的；但相对而言，德国民族的骄傲与自大，正是最直接的导火索与火药库】。而德国民族的这种骄傲自大，也与——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德国学术界的各种泛神主义、自然神主义、甚至无神主义思想、等背离基督教信仰的谬误，——与他们高举所谓人性的光辉与伟大，等等这些思潮【正如尼采所说：上帝死了】，——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世人在心中背离了那创造宇宙天地之主、创造世人生命之主的时候，他们就会在自己的心中为自己塑造出很多超人，来顶礼膜拜；对于二战中的德国人来说，这个人就是希特勒；对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人来说，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

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欧美简史

十六世纪上半叶，马丁路德开启了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之后，加尔文更成为一位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的集大成者，出版了很多重要的关于基督教信仰的著作，例如《基督教要义》等书籍系统性地总结了以

圣经为根基的基督教信仰主旨和内容。同时，英国的丁道尔也完成了英语圣经的翻译。之后英王亨利八世正式脱离天主教，英国正式开始了基督教改革运动。英语圣经得以在英国合法地广泛出版和传播，并被人们广泛地诵读。十六世纪下半叶，英国清教徒运动开始兴起，同时，在圣经的启发和激励下，弗兰西斯·培根等思想家们开始思索人类究竟应当怎样去努力地认识和发现自然世界的规律【并因而开始深刻认识到，在整个中世纪中，天主教所秉持的亚里斯多德、托勒密宇宙世界观是错误的，以及为什么是错误的；那些错误的观念，其实不但与圣经毫无关系，而且从根本上，从方法论哲学而言，是与圣经相违背的。为此，培根等人提出，正如圣经中所说，人若不悔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就不能进入天国；同样，人若没有小孩子的心思和样式，就也不能认识这个世界】。

十七世纪上半叶，尤其是1620年，发生了两件开启了后世的民主与科学的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

第一个事件是，1620年，培根出版了《大变革与大复兴》之《新方法论》；这本书对于十七世纪的英国基督徒思想家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大约70年后的牛顿与波义耳著作的出版，开启了现代物理科学与现代化学科学；培根的思想后来也对法国等欧洲基督徒思想家们、科学家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培根被称为现代科学之父之一【详情请见《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培根就是那位说“知识就是力量”的人】。这也直接导致了十七世纪下半叶的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成立。英国皇家科学院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成立的、政府支持的机构、专门致力于科学技

术的发现、发明与进步。在过去数百年中，尤其是二十世纪以前，英国皇家科学院对于人类现代科学技术的开启、启动、爆炸性发展做出了伟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很多成员，都是现代很多科学分支的创始人、现代科学分支之父，例如生物学、遗传学、气象学、电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等等数不胜数的领域。像英国皇家科学院这样的机构，正是培根毕生的梦想。

第二个事件是，1620年，五月花号清教徒们（共102人；登陆第一年冬季以后还剩下50人）来到北美。事实上，在1620年以前，在大约十多年前，在培根的大力推动下，英国政府官方就派了一些人（共几百人）来到北美弗吉尼亚，在那里种植庄稼。五月花号船的目的地本来是弗吉尼亚，但被海上风暴吹到了北方、今天麻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即今天波士顿以南很近的一个地方。1620年的时候，弗吉尼亚与五月花号的这两批人，成为了后来美国南方与北方不同文化之间的分水岭。在南方，很多人来到北美仅仅是为了寻找经济利益；他们在宗教信仰上属于英国国教教会【即，仍然是采取神职人员金字塔式的多层级权力结构】；他们在信仰的实际景况中，其实往往并不热忱真挚。而在北方，五月花号清教徒以及后来几十年中、源源不断地来到麻萨诸塞加入他们的大批英国清教徒中间，则信仰非常真挚、热忱、纯洁。正是在这些美国北方、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们中间，建立起了所谓会众主义教会。会众主义教会【现代世界中的大多数基督教会，例如浸信会、卫理公会等改革宗教会，都是脱胎于十七世纪的会众主义教会的模式】对于现代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起源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因为，在会众主义教会中，教会管理人员不是来自于一个什么金字塔式权力结构中、由上至下的任命，而是来自于从下至上的选举。在教会中，牧者与执事等等职事，都是由教会全体基督徒会众，在平等、自由的条件下，选举所产生的。从某种意义而言，这正是现代民主制度的雏形。这种会众主义教会的模式，就一般性而言，在新英格兰地区，从1620年起，到

1776年美国正式建国之前的大约150年间，基本上就已经在广泛实施了。换言之，在美国正式建国之前，民主制度就已经成为一代又一代新英格兰地区等地的居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了。正是这种教会中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文化土壤，孕育了美国的成功的、成熟的民主制度。美国建国以后，法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来到美国观察和记录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运行，并写作了著名的经典书籍《美国的民主》。这本书在过去数百年间，被多次再版，成为今天西方各个大学中的政治学系所普遍使用的、给大学生的重要经典教材或参考书。在该书原著版本中的重要一章，就是记述了托克维尔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教会中所看到的，基督徒们敬虔、热忱、谦卑、纯洁的敬拜活动。【关于基督教信仰与现代民主主义制度之间的深刻关系，详情请见本书作者所著《论民主》】。

____

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年间，在美国南方与北方各地区逐渐发展的同时，英国国内在不断地进一步实行基督教改革，以及议会民主政治的变革【期间，英国有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件是通过了著名的《威斯敏斯特信条》，清楚系统地、简明地阐述了基督教信仰要义；另一件事情是英国光荣革命完成了君主专制制度向君主立宪议会民主制度的和平转变；总体而言，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来说，在这两百年间，英国的发展是迅速、平稳、和平的】。

然而同时，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的发展却并不顺利。十六世纪的时候，当马丁路德掀起的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波及到法国的时候【法国毗邻意大利，历史上有很多敬虔的、主流天主教人士们的影响】，由于法国基

督教改革人士的一些急躁冒进、不谦卑的态度，导致法国的基督教改革运动与天主教之间发生了一些武力冲突和人员伤亡。这进一步导致了法国国内长达数十年的宗教战争，数百万人在战争中丧生；使得最终————法国的基督教改革人士被赶逐出法国；法国归回到天主教的势力影响之下。从此，普通法国人仍然无法接触到圣经、无法容易方便地习读圣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上半叶。

十八世纪下半叶，大约在同一个时代，美国发生了独立战争，不久之后法国发生了推翻法国君主的大革命。但是，历史事实毋庸置疑地告诉了我们，——前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后者却引致了巨大的失败，甚至为后来的欧洲大陆内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深刻而复杂冲突留下了深深的伏笔【法国大革命直接导致了法国的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而这直接催生了拿破仑专制主义政权上台；拿破仑所掀起的侵略战争，直接导致或激化了欧洲各国之间、尤其是德国体系以及沙俄帝国等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剧烈冲突】。

____

在西方近现代历史上，尤其是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国家中【英国处于外岛上，不在欧洲大陆之内，相对而言比较超脱、中立；但也会在很多方面、相当程度上受到欧洲大陆影响，并与欧洲大陆互动、相互作用】，在重要思想政治文化领域中，一直有着本质迥异的两条发展线索。第一条线索就是，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一大批敬虔基督徒们所掀起的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第二条线索就是，发源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起源于、兴起于十五世纪】以及后来的所谓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两条发展线索

中，在其内部、深层次内涵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甚至本质性的矛盾之处。

在上述两条发展线索中，前者【即，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所强调的，是回归到圣经之中，以上帝的话语、旨意、启示，以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为唯一的根基、归依、盼望和主旨【即所谓，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上帝的荣耀】；谦卑、真挚地，承认己罪、悔改己罪、单单地倚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以基督的义为义；真诚而纯洁地承认，在我们世人自己的里面，一无所是，一无所夸；人生命的职分与价值意义，就应当是按照圣经所教导的那样，第一，就是要尽心、尽力、尽性、尽意地爱主我们的上帝；第二，就是要爱人如己。在这两条圣经律法的总纲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根基、前提条件；后者是前者的表现和必然反映。只有当我们心中有对于上帝的敬畏和热忱之爱，我们才可能会有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的饶恕之爱。人与人之间的爱，固然包括物质性、属世利益的方面，但更是指向那心灵与灵魂的层面；因为人生命的本质，正是在于心灵与灵魂。若没有人心中对于上帝的敬畏、信仰、信靠，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爱也必然不会真挚、长久。

请注意，在这种信仰敬虔的生命品格中，一个谦卑热忱的基督徒，不应当是整日坐在那里慵懒懈怠、好逸恶劳，更不应当是整日坐在那里盲目迷信、闭着眼睛不去儆醒而勤奋地面对一切世事。恰恰相反，应当是积极地、谨慎地、认真细致地、竭尽全力、殚精竭虑地去努力做好一切所当行的良善之事；并且，在这一切事情的过程中，以谦卑、儆醒、祷告、祈求的心，去面对一切事情与局面。在属灵的争战中，跟随上帝的引领；以祷告祈求的心，俯伏在上帝的面前。

++
++
++

【引述 人应当怎样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敬虔热忱的信仰】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要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不是为了要用自己的斗争和努力，去为自己挣得所谓的公义、平等、正义，或是自以为替天行道、悬壶济世。这样的心态看似光辉伟大，但实际上，却是出于自高、自大、自傲、自以为义的心理，是出于“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狂傲之心。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为了要荣神益人，在一切事情中归荣耀于上帝，在一切事务上努力地做有益于世人之事。我们应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地爱主我们的上帝，并要爱人如己。我们应当以谦卑、诚实、勤勉、谨守的心，去面对一切世事与世人。我们应当在内心深处，紧紧地倚靠于上帝，以他自己为我们心灵、灵魂、生命的归依。

我们人生的价值与目的，就应当是跟随天父的旨意与呼召，尽职尽责地、殚精竭虑地、用尽一切努力地、去做好各样应当做好的事情。这样，我们才是上帝的忠心仆人，是他良善而忠实的管家；这样，才显明了，我们在内心深处对他的信靠与仰赖。

+++
+++
+++++++++++++++++++++

马太福音25章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她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她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阿，主阿，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儆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阿，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阿，你交给

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阿，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马太亨利圣经注释】

1-13节

I。这个比喻一般性地讲述了，天上的国度，福音的本质，基督国度的外在表现、治理、以及成功。基督的一些其他比喻（比如马太福音13章）讲述了福音怎样在当前的时候，进入人的心里。而这里的比喻，则告诉我们，当神的奥秘完全显明、神国度完全彰显的时候，是怎样的。在这个比喻中，记述了两种人——那些为最后审判以及基督再来而预备好的人、以及没有预备好的人；神的国度，已经为神国的臣民显明。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就像是这个比喻中的十个童女，在这里被区别开来。

II。这个比喻的背景，是一个婚礼。按着犹太人婚礼的习俗，新郎要在朋友们的陪伴下，在晚上来到新娘的家里；新娘以及陪伴的童女们要在家里等待新郎的到来；等新郎来的时候，她们要拿着手里的灯烛，到外面把新郎迎进屋来，一同庆祝婚礼的正式进程。在这个比喻中——

1.新郎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诗篇45篇，雅歌，以及新约的很多处，都明确地讲到了这一点。基督爱他的教会；基督的爱是卓越的、无与伦比的；基督与他百姓之间的恩典之约，是信实的、不可改变的、忠贞的。所有信从基督的人，都归入基督的恩典之约（何西阿书2章19节）。在那基督再来的日子，是神圣婚礼完成的日子；那时，新娘、羔羊的妻，将要是完美的、完全的（启示录19章7、9节）。

2.十个童女代表了一切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是教会的成员；不过这里称他们为陪伴的人（诗篇45篇14节），就像在其他地方被称为儿女（以赛亚书54章1节）、教会的装饰（以赛亚书49篇18节）一样。那跟从羔羊的，被称为童女（启示录14章4节）；这代表了他们的纯洁和美丽；他们在基督面前如同贞洁的童女（哥林多后书11章2节）。新郎是王；而这些童女是荣耀的女子，是不计其数的（雅歌6章8节）；不过这里被称为十个。

3.童女们的职分，就是要迎接新郎；这是一个极其幸福的职分。当新郎来到的时候，她们要前来事奉他；为此，她们要切切地等候、盼望他。这就是基督教的本质。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1）服事基督，把荣耀归给他、我们的荣耀新郎；我们要称颂他的名，尤其是当他要来把荣耀归给属他之圣徒的时候。我们必须跟随他，正如仆人跟随他们荣耀的主人一样。约翰福音12章6节。我们要高举基督的名，称颂基督的名；这就是我们

的职分。（2）我们要切切地等候主盼望基督的再来。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仅要相信基督的再来，并为之预备好；而且，我们更应当热爱、渴慕基督的再来；我们一切的行动、言谈、生命，都要聚焦在这一点上。基督之再来，是我们信仰中的各项教义的汇聚点；我们的生命，都应当以对此的盼望为核心。

4.她们最大关切的事情，应当是，时刻保持手上的灯烛是燃亮着的；只有这样，在她们等待前来事奉新郎的时候，才能归荣耀于他，才能真正地服事他。基督徒们应当是光明之子。福音是光；那接受福音之光的人，不仅要自己被光照亮，而且，要像光一样闪耀出来（腓立比书2章15、16节）。

关于这十个童女，我们看见——

（1）她们的品格非常不同，并各自相应地显出明显的证据。

【1】她们的品格是，其中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蠢的（2节）。智慧胜过愚蠢，正如光明胜过黑暗。传道书2章13节。在同样的外在信仰形式下、在同一个信仰组织内，人们的品格在神的眼中会非常不同。那些真诚的基督徒，是聪明的童女；虚伪的基督徒，则是愚蠢的童女；——正如基督在另一个地方用聪明的、以及愚蠢的、盖房子的人来比喻他们。一个人是否真正地聪明，或者，是否真正地愚蠢，——通过他如何对待自己的灵魂之事，可以清楚地显明出来。真正的、真诚的、热忱的、衷心的信仰，是真正的智慧。罪是愚蠢的；虚伪之罪尤其是最愚蠢的，因为虚伪之人总是用自己的聪明来自己欺骗自己。虚伪之人是最恶的罪人，因为他们把自

己伪装成正直的人。当我们评判自己的时候，要知道，天国的门是窄的，进去的人很少——因而我们要谨小慎微，谦卑谨守，不可自觉安稳；当我们评判别人的时候，要知道，我们救恩的元帅领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

【2】她们品格显出的证据，就是在她们职分的工作里面；她们也要按着内心的真实光景而受到审判。

（第一），愚蠢的童女手里拿着灯，却不预备灯油（3节）。她们的灯油仅仅够现在用一会儿的；仅仅是为了现在的表现；——显得她们看起来好像是要等候新郎、服事新郎似的；但是，她们却不预备多一些灯油，以防新郎耽延——从而显出她们虚伪的内心，即，心中并不是真地愿意迎接新郎。

——1.她们的生命里面，并没有真实的、根深蒂固的、坚实的原则。她们手上虽有表现出她们信仰外在形式的灯盏，但是，在她们的内心深处，并没有储藏着健全的知识、根深蒂固的摰情、决心、定意。只有那些内心深处、灵魂深处的东西，才能使人经历服事与试炼。她们行事是凭着外在的影响和诱惑，但里面却没有属灵的生命；就像一个商人，没有仓库；或像一个落在石头地里的种子，没有根。

——2.她们对未来没有打算、也不作预备。她们手上的灯只是为了现在好看，却没有灯油为以后做准备。这种对于未来的、缺乏预备的状态，毁了许多只有表面信仰的人。他们关切的事情，仅仅是在邻舍的身上；他们现在可以时时与邻舍交谈，但是，他们却并不在意要得到基督的悦纳；——

尽管，他们未来要面对基督自己。他们看一件事情是否有益处，完全取决于此事在当下是否有价值。如果对他们讲述未来的事情，那就像是罗得对女婿讲说今夜以后要发生的事情；—— 一定会被他们以为是戏言。他们不为以后着想，就像蚂蚁不为冬天预备一样。提摩太前书6章19节。

（第二），聪明的童女，手上拿着灯，器皿里面预备着灯油（4节）。她们在生命深处有着良善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对她们信仰的巨大支撑。——1. 心灵就是我们的器皿；我们要把智慧装在那里面；心里面有良善的宝藏，从那里发出良善的言语行为。根若腐烂了，花朵也会很快变成灰尘。——2. 神的恩典，是我们装在器皿里面的灯油；以色列的会幕中总是要常备着灯油（出埃及记35章14节）。我们的灯光必须要借着我们的良善行为在人的面前燃亮；但是，若我们的心中没有稳固、坚定、活泼的原则——没有在基督的里面坚定的信心，没有对神、对我们邻舍的爱；那么，我们的好行为就不能持久。我们所作的每一件事情，必须是出自我们坚定的信仰；我们的眼目，必须要注目于那将要来到的事情。——3. 聪明的童女在器皿里面预备了灯油——这意味着，她们设想，新郎有可能会耽延。我们应当为持久的等候盼望而做好打算。但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灯油必须是来自耶稣基督的金灯台，来自那伟大的、良善的橄榄树；这是撒迦利亚书4章2、3、12节所表明的异象；约翰福音1章16节也对此作出了解释。我们从基督的完全里得到一切，从基督的恩典里得到恩典。

（2）她们共同的错误；当新郎耽延的时候，她们都打盹睡着了（5节）。

【1】新郎耽延了；即，新郎没有像童女们所想象的那么早来到。当我们看一件确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那很快就会发生；在使徒时代，有

很多人以为基督很快就要再来，但事实并非如此。基督虽然在我们的眼中看似耽延，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耽延（哈巴谷书2章3节）。新郎没有像童女们所想象的那样很快就来到——这是有良善原因的；有许多心意和目的要成就；——选民要被呼召和招聚；神的忍耐要彰显出来；圣徒的坚忍品格要经受试炼；正如地上的收获，要等待庄稼成熟——同样，天国的收获也要等待禾稼的成熟。然而，虽然按着我们的时间，基督看似耽延；但是，他的再来一定不会晚于神所定的最佳时间。

【2】当新郎看似耽延的时候，那些等候他的童女们开始变得不专心，忘记了她们所应当事奉的事情；她们都打盹睡着了；——就像她们不再等候新郎了一样。因而，当人子来的时候，他没有找到忠信的人（路加福音18章8节）。那些认为事情很快就发生、心情急躁的人，当意识到事情没有很快发生的时候，当觉得事情耽延的时候，往往会失去信心。聪明的童女打盹了，愚蠢的童女睡着了；这之间有一点区别；不过，她们都犯了错误。聪明童女的灯还是亮着的，但她们自己却打盹了。许多良善的基督徒，当他们在信仰中很长时间以后，会渐渐冷淡了为基督再来而作的预备之心；他们的爱心变小了，热情变淡了，恩典不再那么突出地显明在他们的生命里；他们的工作，在神面前也不再那么好；虽然他们还没有失去全部的爱，但是，起初的爱心已经失去了很多。如果说，门徒们等候基督一个时辰都是很困难的事情，那么，等候一生就更为困难了。“我想睡一会儿，尽管我的心还是醒着的”。他们先是打盹，然后睡着了。轻忽、松懈的心态，会导致更大程度的疏忽。打盹的人，很难不继续睡着；因此，属灵之中的松懈，在一开始的时候要尤其小心。

（3）半夜有人声喊着说，新郎要来了（6节）。【1】虽然基督的再来看似耽延很长时间，但却最终一定会来到。虽然基督的再来看似缓慢，但却是

确定无疑的。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在以色列民、神百姓、属神之人的漫长的盼望、等待以后才来到的；虽然等待和盼望的时间是漫长的，但是，在所定的时间成就的时候，基督必定就来到。同样，在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也将会如此；虽然看似耽延很久，但主却一定不会忘记。基督的仇敌会发现，神的忍耐，并不等于免罪；基督的朋友会满心安慰地知道，神所定的时间，一定会成就，绝无虚谎。得赎的日子是确定的、不会改变，一定将要来到。【2】基督的来到，是在我们半夜的时间，是在我们最没有想到的时候，也是在我们最想休息睡觉的时候。对于神的百姓而言，基督的安慰与救赎是在那看似最不可能的时候来到的。对于基督的仇敌们而言，基督的到来、审判惩罚，是在他们最不以为然的时候来临的。当年，埃及头生长子被杀、以色列得赎的日子，也是在半夜的时候（出埃及记12章29节）。死亡，常常在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临到；路加福音12章20节记述了，那个半夜被神收取灵魂的人。神来到的时间，是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和意志，而不是按着人的意思；这显明了神的主权；神不告诉我们他来到的时间，这是要把我们的职分教导我们。【3】当基督来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出去迎接他。基督徒们必须要跟随基督的所有行动，在基督的事工中，与他相遇。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基督与我们在死亡中相遇；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的身体出去迎接他，从世界中出去迎接他；我们要以深挚的情感、灵魂中的作为去迎接他；这样，我们才能看见他的恩典与荣耀。【4】“你们要出去迎接他”——这是强有力的呼召，是对预备好之人的有效呼召。这个呼召，使人惊醒。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什么人太注意；那时，基督到世界来，世人却不认识他；然而，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一切世人都将看见、都将注意；每一双眼睛都将看见他。从天上将要有大喊的声音；他将在巨大的声音和荣耀中降临；死人也要从坟墓中起来，接受神终极的审判；地上也要有呼喊的声音，有对山和岩石呼喊的声音（启示录6章16节）。

（4）童女们对喊声的回应（7节）；那 些 童 女 就 都 起 来 收 拾 灯 。【1】聪明的童女为迎接新郎做好恰当的预备工作。那预备好离世见主的人，当最后时刻的时候，仍然有工作要做；他们要切实地预备好，这样，才会有平安（彼得后书3章14节），才会被主看见他们是在辛勤工作（马太福音24章46节），才不会显得赤身露体（哥林多后书5章3节）。那将是鉴察的日子；我们应当思想，在我们见主的日子里，我们想让主怎样鉴察我们；我们应当让主看见我们在做什么。当我们看见那日临近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以郑重的心来做好我们离世前最后的工作；我们要再次清理我们的心，悔改我们心中的罪；更新我们与主的约；向这个世界道别；我们的灵魂要恰当地交在主的面前。【2】愚蠢的童女，错误地以为自己也可以迎接主；她们的心里，是虚浮的、虚伪的信心；她们处于自欺欺人的状态，以为自己是良善的；她们以为自己已经为那另一个世界做好了准备。虚伪的信心，使人们装作是好像也得到了神的恩典；在他们离世的时候，也表现得好像可以见主似的；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生，都是活在这样的虚伪信仰之中。虚伪信仰之人的虚浮盼望，在他们面临死亡的时候，会燃烧得更加旺盛，就像死前的回光返照一般。

（5）愚蠢童女所面临的困境；她们没有灯油了（8、9节）。这说明了，【1】即使在死亡的这边一侧，虚伪信仰之人也会面临悲惨的困境；神会让他们看见自己的愚妄；他们将要在自己右手的谎言之中灭亡。【2】更重要的是，在死亡的那边一侧，在终极审判的日子，他们将要面临真正的悲惨困境。在那审判日的时候，他们的虚伪信仰——虽然在此世中看起来似乎不错，然而，却不能给他们在神的审判下带来任何真正的益处。

（第一），她们的灯要灭了。虚伪信仰之人，即使在此世中，灯也会常常熄灭；他们的信仰，开始于“认识”基督耶稣，然而却被世界的肉体血气缠

住，以至于在内心离开了真正的信仰（彼得后书2章20节）。他们的信仰枯萎了，他们的价值丢失了；他们的盼望淡去了；他们的安慰消失了；恶人的蜡烛，常常在这个世界上被熄灭（约伯记21章17节）。然而，还有许多信仰虚伪之人，就像这些愚蠢的童女一样，伪装到最后一刻；他们信仰中的盼望与安慰，似乎一直在伴随着他们；可是，当神要取去他们灵魂的日子，会怎么样呢？约伯记27章8节。虚伪之人的蜡烛，即使在他们去世前、一直没有熄灭，那么，也会在他们离世、死亡的时候，与他们一同灭亡（约伯记18章5、6节）。他们将要倒毙在无尽的痛苦之中（以赛亚书50章11节）。当面临终极审判的时候，虚伪之人的信仰，并不能对他们有任何帮助（马太福音7章22、23节）。"她们的灯要灭了"——这就是虚伪信仰之人的真实光景；他们的虚伪信仰，就像是蜘蛛的网（约伯记8章11节等），就像是恶人气绝（约伯记11章20节），就像是押沙龙的骡子把他留在橡树那里。

（第二），她们的灯要灭了，是因为她们没有灯油。那些生命中没有真正的神恩典的人，迟早会自己认识到这一点。外在的信仰形式，或许会使一个人伪装得很久，并能陪伴一个人走很远的路程；但是，却不能使人经过那最后的审判；虚伪的信仰，能够使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显得很光鲜耀眼，但是，当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他们的灯却要被熄灭。

（第三），愚蠢的童女，此刻迫切地想要从聪明童女的器皿那里分得一些灯油。"请给我们一些你们的灯油"。当审判日来临的时候，属肉体血气的信仰虚伪之人，会非常想要表现得与信仰真诚之人一模一样。那些在此生中憎恨信仰的严格要求的人，在死亡与审判的时候，会非常想要得到信仰的真实安慰。那些不想像义人一样生的人，却非常想要像义人一样死。那些在此生中藐视、轻看谦卑圣徒的人，在审判日的时候，却会非常想要和

他们拉近乎，想要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最好朋友、最好帮助者；——尽管，在此生中的时候，他们常常虐待这样的人。“请给我们一些你们的灯油”；可是，——1.她们的要求，是出于感官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内心真实的深处。许多人在末日、不得不哀求的时候，会想要得到神的恩典来救自己的肉体血气的生命；然而，他们在此生的时候，却不愿意因着那恩典而成圣、并接受福音的管辖。——2.她们的要求，已经太晚。如果虚伪信仰之人，在此生中及早悔改，在来得及的时候，接受救恩，那么，神愿意把恩典的膏油赐给他们；但是，当审判来临的时候，当末日的帷幕降下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再得到救恩了。

（第四），愚蠢童女们的要求，被聪明童女们拒绝了。良善之人对她们的拒绝，是一个令人悲哀的预兆，显明了，她们也将要被神自己拒绝。聪明童女没有武断地、不分青红皂白地拒绝说：“不可以”；而是，她们宁愿给出理由，表明她们为什么没有这个能力。“聪 明 的 回 答 说 ， 恐 怕 不 够 你 我 用 的 。 不 如 你 们 自 己 到 卖 油 的 那 里 去 买 吧”。——1.人若想要得救，必须要自己的生命里面有神的恩典。尽管，我们会在与圣徒的交通中得益，别人的祷告与信心会使我们得到极大的益处；但是，我们自己的成圣必须是出于我们自己灵魂中所得的神救恩。义人必要因信得生。每一个人都要交出自己的账；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显明自己的信心与工作；当审判日的时候，人不能请别人来给自己添加神的恩典。——2.那有最多神恩典的人，却一点也不能把这恩典分给别人。我们所有的一切，并不能足以使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站立；最良善的人，也必须要从基督那里得到白白的救恩；最良善的人，也无法把这恩典越俎代庖地分给别人。罗马教廷以为，可以通过额外的工作、以及归罪于圣徒的义，来使普通人得到救赎；但是他们却忘了，那些聪明童女都能够明白的事情——她们的灯油，只够自己用的，并没有办法分给别人。——3.不过我们注意这里，聪明童女并没有指责愚蠢童女说，“你们为什么把这么大的

事情都给疏忽、忘记了”；她们也没有夸口、说自己事先很有预备；或者，她们也没有告诉愚蠢童女，很可能将要临到的绝望状态。而是，她们把最好可能的建议告诉愚蠢童女：“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那在灵魂之事上愚蠢的人，应当值得我们的同情；但是，我们不可欺辱他们；因为，“是谁使你不同的呢？”牧师传道人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不真正认识神、也不在意自己灵魂的人；他们要到临死之前、在病榻上，才会想起要来忏悔、归主；传道人仍然应当引导他们悔改、祈求神的救恩——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在基督面前，只要人内心的悔改和祈求是真诚的，那么，真诚的悔改就不会太迟；不过，人在临死前的忏悔、悔改、归主，很少是出于真心诚意的相信；因而，传道人应当像这些聪明童女在这里所说的话一样，——把最好可能的建议告诉他们。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尝试着，努力得到最好的结果。倘若能行的话，假若不是太晚的话，牧师传道人就要把当行的事情告诉人：“到神自己那里，去得到神恩典的膏油”。但是，人若故意拖延、不去神那里寻求救恩；那么，人是否能够在天国之门关闭之前、在死亡之门打开之前、仍然抢在最后的时刻、得到基督救恩，那就是一件语言所无法表达的危险之事了。我们应当趁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趁还有时间的时候，到神自己那里去，得到圣灵的恩典与灯油。人若想要得到恩典，就必须自己到神的面前，得到那来自于神自己的救恩，并服事于那拯救的福音。见（以赛亚书55章1节）。

（6）新郎的到来，以及聪明童女和愚蠢童女的境遇。

【1】她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故意拖延信心与服事、想要把救恩推到最后一刻的人，最大的可能性是，他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得到恩典，是一件严肃的事、一件花费心神和时间的事；不能够草率忙慌地、轻轻忽忽地来完成。罪人在病榻上，通过忏悔和祷告，在慌忙迷乱之

中想要得到救恩的时候，很难说目的是什么、应当做什么；死亡迅即来临了，神的审判临到；罪人就这样面临永远的沉沦与惩罚。我们需要灯油的时候才去买、需要恩典的时候才去临时抱佛脚，是没有用处的。

新郎来到了。当那终极审判日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他的百姓这里来，就像是新郎一样；他来的时候，将要穿着圣洁华贵的衣服，被朋友们环绕着、事奉着；现在，新郎不在这里、我们当禁食（马太福音9章15节），但到那日的时候，我们将要有永远的筵席。那时，新郎将要把新妇带到家里，使她与他永远同在（约翰福音17章24节），并要永远悦纳她（以赛亚书52章5节）。

【2】那 预 备 好 了 的 ， 同 他 进 去 坐 席 。（第一），我们与基督进入那永远的荣耀，就是与他一同永远地坐席，与他亲密地在一起，与他在永远的安息中交通，并得到无限的、永远的喜乐与丰富。（第二），那些预备好了的人、也只有那些预备好了的人，才能够进去与他一同坐席；——就是那些有圣灵凭据的人（哥林多后书5章5节）。（第三），如果我们是预先准备好了的人，那么，死亡的突然临到，基督的出人意外的来到，并不会成为我们得到幸福的阻碍；反而，会使我们进入那永远的幸福。

【3】“门 就 关 了”。——正如：在婚礼上、当所有宾客都到齐以后，大门就关了一样。（第一），门关了，使里面的人安稳、安全；他们是神殿的柱子，再也不会出去（启示录3章12节）。亚当在乐园里的时候，门是开着的，因而他的灵魂离开了；然而，当荣耀的众圣徒进入天国的时候，他们会永远地在里面，幸福而安稳。（第二），门关了，使外面的人再也不

能进来。圣徒的性质、与罪人的性质，将要处于永远也不会改变的状态；那些被关在外面的人，将要被永远地关在外面。现在，天国的门虽然是窄的，但仍然是打开的；但是那时，天国的门将要关闭；在天国与地狱之间，是永远也不可跨越的鸿沟。这正如挪亚的日子，当挪亚方舟的门被关闭的时候，挪亚一家被保全在方舟之中，而外面的人则被永远地弃绝。

【4】愚蠢的童女来的时候，已经太晚（11节）；门关了以后，那些其余的童女才来。（第一），当时间已经太晚了的时候，将有许多人来到天国的门口，想要进去；正如亵渎的以扫，当他放弃了长子名分以后，才想起来要到父亲那里继承祝福。这些罪人们在时间太迟了的时候，才想起来乞求神；这固然更加彰显神的荣耀、显明了信仰的宝贵价值，然而，太迟了的乞求，并不能使这些罪人得救。那些现在藐视信仰、轻看祷告、不愿祈求的人，当时间已经太晚的时候，飞速地想要跑到神的面前来乞求，可是，却没有用处。（第二），虚伪信仰之人，有一种错误的乐观想法；他们以为自己能够得到幸福，能够进入天国。但是，当他们来到天国的门口、要求进去的时候，却被拒绝、被关在外面。在这地上，他们以自欺欺人的心态，仰望天国，以为自己将来会进去；但最后，他们却被投进地狱。

【5】他们被弃绝，正如以扫当年那样（12节）；“我不认识你们”。当我们还可以寻求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应当来寻求他，祈求他的恩典和救恩；因为时候将到，——等到太迟的时候，主就不能再被寻求得到了。现在的时间是，主仍然向我们敞开怀抱，并把应许赐给我们——“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然而，时候将到，当终极之日来临的时候，就不再有救恩的机会；对于这些在外面的童女们来说，已经太迟了。这个审判是庄严而严肃的；“我 实 在 告 诉 你 们 ， 我 不 认 识 你 们 。”对于在此生不悔改的刚硬罪人以及虚伪信仰之人来说，这就是神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得进

入神的安息。这里的经文，显明了神坚决的定意；一切的罪人，在神的审判面前都要哑口无言。

最后，在这个比喻的结尾，再次警告我们："所以你们要儆醒"（13节）。我们在前面的马太福音24章42章曾看见这个警告，这里，再次郑重地警告和劝诫我们。1.我们最大的一个职分，就应当是儆醒；我们要以最大的勤奋和谨慎，来对待关乎我们灵魂的事情。要醒起，要谨守。2.我们之所以要儆醒，是因为有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主来的日子，对我们而言，是不确定的；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日子，什么时辰。因此，我们在每一天、每一刻都应当儆醒、预备好；不可在任何时刻、任何日子松懈、忘乎所以。在每一天中、在年年日日中，都应当敬畏主。

=======================================

14-30节

这一段的比喻，讲到了三个仆人。上面的那个比喻讲述的是，我们必须要预期主的到来；而这个比喻讲述的则是，我们必须要处于工作和服事的状态中。我们要在工作和服事中，不断地勤奋和努力，这样才能预备好见主。所以，我们必须要激励起来，努力服事，这样才能有益于我们自己的灵魂；以此，我们更归荣耀于神，并对他人有所助益。

在这个比喻里面，1.主人就是基督；他是我们一切所有的主人和拥有者；

尤其是，他是教会一切所有的主人和拥有者。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他的手中。2.仆人是基督徒，是基督自己的仆人；他们生在基督的家中，被基督买来，被基督使用，并归颂赞于基督。

我们在这个比喻中可以看见三件事情。

I。仆人们所受到的信任和交托；他们的主人把一些恩赐分别赐给他们；基督差派他们作工（基督不会让他的仆人们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基督给他们一些资源和才能，使他们能够以此为基础来作工。1.基督的仆人们所拥有的、所得到的一切，都是来自于基督的赐予；他们本身一无是处、一无所值，除了他们自己的罪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他们自己的。2.我们从基督那里得到恩赐，是为了让我们来服事他，作服事的工作。我们所得到的一切惠利，都是为了要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为主做工。我们每一个人得到圣灵的恩赐，都是为了要服事主、荣耀主。3.不论我们得到了什么恩赐用来服事基督，我们所得到的这些恩赐，仍然是属于基督的；我们只是他地中的租户，是他百般恩赐的管家（彼得前书4章10节）。

（1）为什么要交托这些仆人：——主人要到遥远的外国去。以弗所书4章8节。当基督升到高天之上的时候，他把恩赐赐给众人。【1】当基督去天上的时候，就像是一个人到遥远的外国去；即，他要去很久，并有确定的目的和意义。【2】当他去的时候，他把很多恩赐交托给教会，使他们有充足的必需。他把真理、法则、应许、能力、权柄交托给教会；这是那伟大的托付（提摩太前书6章20节）（提摩太后书1章14节）；主把那良善之事托付给我们；他差遣圣灵，来使门徒们能够教导真理，谨守法则，经历应许，践行权柄，使用能力。

（2）所交托的不同数量的恩赐。【1】他把不同数量的银子交给三个仆人。基督的恩赐是宝贵而丰富的，价值珍贵；正如基督的救恩是他用宝血为我们所赎买来的。【2】他给一些人多一些，另一些人则少一些；有的人有五千银子，另一个人两千银子，还有一个人是一千银子。每个人按着各人的能力得到不同的恩赐。神的意旨安排在不同的人之间，使他们有不同的能力；在头脑上、身体上、产业上、亲族上、兴趣与利益上，每个人的能力都不同；同样，神的恩典把不同的属灵恩赐放在不同的人身上。无论是人的能力、还是属灵恩赐，都是来自于神自己的赐予。（第一），每一个人都至少有一千银子；卑微的仆人不应当为自己所得的恩赐多少而羞愧、或自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灵魂，这是神所交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的生活、生命、工作、言语行为、所思所想，都应当于我们的灵魂有益。人的职分，应当是对他周围的人有益；他应当有益于尽可能多的人；有益于世人的灵魂。（第二），每一个人得到的所有恩赐加在一起，是不一样的；正如每一个人的能力和机会也不都一样。神是完全的自由意志者，他按着自己的旨意和心意做事，把不同的恩赐分给各人。有的人擅长做这种服事的工作，有的人擅长做那种服事的工作；正如一个身体上的不同肢体。当家主安排好了这些事情以后，他就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吩咐的话语告诉使徒们以后，就升到了天上。

II。这三个人对待所托付之事的不同态度（16-18节）。

1.两个仆人做得很好。

（1）他们都很勤奋、信实；他们去做买卖；他们把那些所托付的银钱拿来使用（这就是银钱的本来用处和目的）；——用于买卖商品，获得回报。他们的主人一走，这两个仆人就开始工作。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很多的服事工作要做，因此，不要浪费时间，而是要抓紧光阴，努力勤奋地、信实地、诚实地工作。他们去做买卖。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一个属灵的商人。贸易商业是一件复杂的、极其需要心思和精力的事情；属灵的敬虔之事，也是如此。基督徒所从事的属灵商业，是一个生产、工作的商业；我们要全心全意地从事这项工作，为了他人的益处而努力辛勤。这是一个贸易的商业；我们要舍弃那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事物，而得到那些价值弥足珍贵的、对我们灵魂有极大益处的事情。这是一个智慧的商业；箴言3章15节；马太福音13章45节。一位诚实勤奋的商人，是把全部心思、时间、精力都专注于所要做之工作上的人；他努力地学习，严谨地做事，尽一切力量去上进，以事业为生活的中心，并从商业的利益中得到收获。这样，一位真诚的基督徒也是如此；他在信仰的服事工作上也是这样殚精竭虑、专心致志；我们仓库中所用于贸易的，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而全部都是来自于主。我们头脑中的能力——理性、学识、认知，必须要被使用、服务于我们的信仰；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惠利——产业、声誉、利益、权力、爱好，必须被用来服事于基督，归荣耀于他。福音与圣礼，我们在教会与福音中的服事，圣经，牧养的工作，安息日，圣餐、洗礼，等等，这些事情，必须要被用于其所应当用的目的；从中，我们与神交通；以此，圣灵的恩典与恩赐在我们的生命中实践出来、显明出来；这就是我们用主赐的银钱所应当作的买卖。

（2）这两个仆人的工作都很成功；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双倍的收获。那有五千银子的，很快就又赚了五千。勤奋之人的手，能够通过良善的工作，得到丰盛的果实；他们能够得到许多属灵的恩惠、安慰与财宝。在信仰中，有许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勤奋地去努力工作。

他们的收获与恩赐是成比例的。

【1】那有五千银子的，也收获了五千；那撒种丰富的地方，也结实丰富。人的恩赐越大，就越要辛勤努力地工作，并在工作中使用这些恩赐的能力和条件。【2】那有两千银子的，也收获了两千。一个人所作的良善之事，不在于他的外在表现和结果，而在于他是否尽力地使用了自己已有的才能、能力和机会；尽力的人，虽然他的工作果实可能没有别的人那么显著、那么效果巨大，然而他仍会得到神的悦纳。

2.第三个仆人做得不好（18节）；那得了一千银子的人，去把主的银子埋在地里。虽然这个比喻里面，不好的人只有三分之一，但在现实中，这个比例可能很大；路加福音17章17、18节讲述了，十个被医治好的大麻风病人中，只有一个回来献上感谢；其他九个人都把所得的恩赐“埋在地里”了。那个只有一千银子的仆人，是一个不信实的仆人；无疑，这世上一定有很多拥有五千银子的人，也是这样把银钱埋在地里，——荒废自己的丰富能力、优势、资源和机会；他们浪费神的恩赐，不做良善的事情。不过，这里基督在比喻中特别强调了这个一千银子的人，这告诉我们，（1）若这荒废仅仅一千银子的人，尚且要被弃绝、扔在外面彻底的黑暗之中；那么，那些荒废、践踏更多银钱的人，那些浪费更多能力、优势、资源、机会的人，将要受到怎样的惩罚呢？（2）那些看似能力最小、最没有机会资源来服事神的人，他们的愿意服事之心，往往也最小。他们以自己没有能力、没有资源为理由，来给自己的懒惰寻找借口。由于他们能做的事情不多，所以，他们就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因而，这更加显明了他们的懒惰之罪；——他们只需要去做一千银子的工作就可以；——可是，他们

连这点事情也不愿去做。

他去挖了一个坑，把这一千银子埋在地里，好像担心怕被偷似的；他没有去乱花、乱用这些钱，也没有侵吞、挥霍这些钱，而是把钱藏了起来。钱就像是粪一样（就如同我的老师、培根所说的），堆在一起的时候毫无用处，而必须要被分散开；可是，我们在日光之下常常看见的一个罪就是，钱财被堆聚在一起（雅各书5章3节）（传道书6章1、2节）；这些被堆聚的钱财，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属灵的恩赐也是如此；许多人拥有属灵的恩赐才能、机会和资源，但是，却不按着它们所应当使用的用途去使用它们。那有产业的人，没有把产业用于敬虔与慈善的事情；那有权力与利益的人，没有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去推动和促进敬虔的信仰；牧师传道人有能力和机会去做良善之事，然而，他们却不愿意激动心灵、努力做工；这些人，就是那慵懒的仆人；他们看重自己的事情，远远胜过他们看重基督的事情。

他把主人的钱埋藏了起来；如果这些钱是他自己的，那么，他可以随己意使用它们、或是不使用它们。但是，不论我们有什么能力、才能、优势、身体、健康、资源、机会、时间，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只是神所恩赐给我们这些东西的管家；而且，终有一日，我们都必须要为这些东西向我们的主人交账；——因为那些本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仆人的慵懒，在其他两个仆人的辛勤劳动的映衬之下，显得更加罪恶；他们的勤奋与热情，本应当使这第三个仆人也辛勤地劳动起来。别人辛劳，难道我就可以无所事事、懒惰吗？

III。交账与算账（19节）。1.过了许久的时间，主人才来算账。这并非是

由于主人疏忽、忘记了算账的事情，也不是由于神耽延了他的应许的成就（彼得后书3章9节）；神已经准备好、将要审判（彼得前书4章5节）；但万事各有其时。2.虽然过了许久的时间，但是，算账的时间终于来到了；仆人们的主人要来和仆人们算账。神百般恩赐的管家，要在主的面前交账；要汇报自己作为管家的工作，是否诚实、信实、辛勤。我们所有人都将要交账——我们为自己的灵魂做了哪些有益之事；我们为他人做了哪些有益之事；我们怎样使用了我们的恩赐、才能、能力、身体、健康、时间、机会、资源。见（罗马书14章10、11节）。

（1）信实仆人们的交账。

【1】这俩个仆人向主交账（20、22节）；“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你交给我两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我又赚了两千”。

（第一），基督的信实仆人，诚恳地、感恩地承认，自己的所有都是来自于神。——1.我们应当清楚地知道并承认，我们从神那里所得到的恩赐；我们应当记念这些所得的恩赐；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的职责是什么，主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这样，我们才能相应地做出有益的工作。——2.我们必须不可夸耀自己的工作，而是要深刻地明白神对我们的恩惠；神放在我们身上的荣耀，交托给我们的事情与恩赐，赐给我们的恩典，这些都是在我们生命里面一切良善之事的源泉。事实是，我们为主服事的越多，我们就越应当祈求主来更多地使用我们、赐给我们能力来更多地服事他。

（第二），他们提供了信实的证据，就是他们的收益。神的良善管家，应

当有证据显明他们的勤奋；“用你的行为，显明你的信心；一个良善的人，应当显明出他的良善”（雅各书3章13节）。如果我们在属灵的“商业”工作中勤奋认真努力，那么，工作的效果很快就会显明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工作的果效将一直跟随着我们（启示录14章13节）。并非是说，圣徒在审判日的时候会在神的面前夸耀自己的好行为；不，基督会为他们诉说（35节）；但这里表明了，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忠信的仆人将能够坦然来到基督的面前、神的面前（约翰一书2章28节至4章17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那只有两千银子的仆人，也和那五千银子的仆人一样，欢欣地报告自己所得到的收获果实；在那交账的日子，我们的安慰，在于我们的信实，而不在于我们的业绩；在于我们的真诚，而不在于我们的成功；在于我们心里的正直，而不在于机会的程度。

【2】主人对他们的悦纳和称赞（21、23节）。

（第一），主人称赞他们；“你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们做得好”。耶稣基督的忠心良善的仆人，他们的勤奋与正直，当主再来的时候，必会得到赞扬、荣耀、荣誉（彼得前书1章7节）。那现在归荣耀于神的人，必将会很快就得到神的荣耀；那现在归向神的人，必将会很快就得到神的悦纳。——1.神将接纳他们；神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忠心良善的仆人。主现在就知道他仆人在这个世界上的诚实，并将要在审判日的时候为他们作见证；那被主称为信实的，的的确确是信实的人。他们或许在这世上被很多人指责、挑剔，就像义人常受世人的逼迫一样；但基督自己会见证他们的正直品格，就是良善与信实。——2.他们的工作也得到主的悦纳；“你们做得好”。只有那些做得好的人，才会被主称为是良善的仆人；我们应当在良善的工作中，以坚持和忍耐，寻求属神的荣耀；若我们寻求，就必寻见；若我们行善，就必得主的称赞。这世上有的主人总是阴沉着脸，不愿意夸

奖手下的仆人们；不论仆人们的工作做得有多好，他们的嘴里都没有一句好话；但是，基督欢欣地称赞他的仆人们。若我们从主人那里得到了称赞，那么，别人怎么说我们其实并不重要；若主说我们做得好，那么，尽管别人会贬损我们、藐视我们，其实都没有关系。反之，人如果自夸，或是受到邻舍的夸奖，但却没有得到主的夸奖，那么，一切都是徒然。

（第二），主人奖赏仆人们。基督的信实仆人们不仅仅是得到夸奖和称赞而已；他们的劳苦与爱心将要得到极其丰厚的奖赏。

这个奖赏在这个比喻里面用两个方式来表达。

——1.“那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的，将要被主差派管理更多的事情”。在王宫里或是大家庭中，那些在低层级别上工作信实的人，会被提拔到更高级别、更加重要的工作上。基督喜悦谦卑的仆人们。那归荣耀于基督的人，将要得到来自基督的荣耀；——冠冕（提摩太后书4章8节）、宝座（启示录3章21节）、国度（马太福音25章34节）。他们在这里是乞丐，但在天国中他们是统管者。正直人必将执掌权柄；基督的仆人们，都必将作王。

看这里，仆人们所得的奖赏与其工作成就是不成比例的。他们仅仅是在不多的事情上良善忠心、归荣耀于神，然而，神却将要在许多的事情上，把荣耀赐给他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神给我们的职分，神交付给我们的工作，与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之事相比，都是很小很小的。我们所有的服事、患难、辛劳、良善、果实，统统加在一起，都仅仅是很少的事情，几乎是虚无的，不值得一提；与神所将要启示给我们的荣耀，都远远不能相

比。

——2.“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1）蒙福的状态，是喜乐的状态；不仅是因为我们的眼泪都将被擦干，而且更因为，我们一切安慰的泉源、喜乐的泉源，都将被打开。当我们与神同住、在神里面完美、圣洁的时候，当神所有蒙福的百姓都欢聚一堂的时候，那是无以言表的、完全喜乐。——（2）这是我们主人的快乐；这是主基督自己所赎买来的，并赐给一切赎民的；神的百姓，被救赎主从忧伤患难中赎买来，进入永远的欢乐。这是主人自己的快乐；是基督在忍受十字架患难、忍耐罪人的蔑视时，所瞩目的、所渴盼的快乐。希伯来书12章2节。基督是那喜乐的源泉，也是那喜乐的中心。这是我们主的快乐，也是我们在主里面的快乐，是极大的、无限的快乐。——（3）荣耀的圣徒们将要进入那快乐，将要得到那完全的、全部的快乐；正如那进入神的产业、进入那婚礼筵席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主的喜乐进入圣徒们的心中；圣徒们得到圣灵的激励、安慰、鼓舞、支撑；在那天国里面，圣徒们更要很快地进入永恒的喜乐幸福之中。

（2）慵懒仆人的交账。

【1】他向主人交账并自辩（24、25节）。虽然他仅仅有一千银子，但是，也同样要为此在主人面前交账。我们所拥有的条件、才能、能力、身体、生命、健康、资源、机会，虽然可能不多、只有很少，但是，我们仍然要为此交账。每一个人的交账，都不会超过他本身所应有的职分、所曾得到的恩赐、所应当做并能够做的事情。不管我们有什么，我们都要为我们所有的一切而向主交账。

（第一），他的自信。他来到主的面前交账，带着自信和把握的心情；他指望，自己的申辩能够使自己得到安稳的结局。“主啊，看这里是你曾交给我的东西；虽然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赚取更多，但是，我可以说，我也并没有损失什么”。他以为，这样的申辩，就算不能使自己得到什么奖赏，但是，至少会使自己得到安全。

许多人都是这样自信满满地走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审判；他们以为，自己的辩护是有效、合理的；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神并不会接受他们这些徒劳的、虚浮的自辩。慵懒的信仰者，不想为神做什么良善之事，但是，却希望自己能够和那些在信仰中付出一生巨大代价的、真正的信仰者一样，得到永生的归宿。因此箴言26章16节描述慵懒的人时，说到“懒 惰 人 看 自 己 ， 比 七 个 善 于 应 对 的 人 更 有 智 慧 。” 这个仆人觉得，自己能够通过主的算账和评断；因为他对主人说：“你的东西都还在这里”。他的意思是说：“主啊，我没有挥霍我的资产，没有消耗我的时间，没有亵渎安息日之礼，没有反对良善的牧师传道人，没有抵抗良善的讲道；主啊，我没有嘲笑圣经，没有嘲笑信仰，也没有用权力迫害任何良善人；我从来没有丢失什么东西，也没有浪费主的好资源，也没有醉酒荒淫，也不记得曾经去害过什么人”。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们，都是这样，把自己进入天国的盼望，建立在这些自辩的话语中；然而，这些话语，不过都是这里这句话的翻版：——“请 看 ， 你 的 原 银 子 在 这 里 。” 就好象，自己的生命中没有什么职分、没有任何可期待之事一样。

（第二），他所承认的事情。他承认，自己把那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了。他口中说这句话的时候，看起来似乎并不觉得，这是一件什么过错；甚

至，他可能还以为，主人说不定会夸奖他，因为他谨慎地把银子藏在安全的地方、一点也没有挥霍、或使之置于险地。世人对于审判日所将面临的审判，常常是一种轻飘飘、无所谓、“没什么大不了”的态度。又或者，这个慵懒的仆人自觉心虚，知道自己的慵懒会受到主人的严厉审判。——总之，不需要找寻给他们定罪的证据，因为他们自己的口就定了他们自己的罪。

（第三），他为自己寻找的借口。“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严厉的人，所以我害怕”。人若以良善的看法来看待神，就会产生爱；爱就会使人勤奋地、信实地来服事神。人若认为神是忍心的、严厉的，自己就会产生害怕、疏远的心情；这种害怕使人变得慵懒、懒惰、不信实。他的借口，说明了——

——1. 他的心里面，是一种敌人的情绪；“我知道你；你是一个忍心的人”。这就像是以西结书18章5节所记述的，以色列家中的恶人说，主的道是不公平的。因而，这个慵懒仆人的自辩，也是对神的反击。罪人愚妄地在罪恶的道路上刚硬顽梗；然而，好像他们以为自己可以摆脱罪责似的，反而在心里面埋怨神。他们或许以为，通过反责神，就能使自己逃罪。正如亚当在犯罪后企图掩饰自己，于是对神说，“你所给我造的那个女人，把我陷在了罪中”。罪人的属肉体血气的心，对神的看法是谬误的、罪恶的；而这样的谬误看法，反过来使他们在罪恶的道路上更加刚硬顽梗。看这个仆人说到主人的时候，口气是多么自信；“我知道你是这样的人”。他怎么知道主人是这样的呢？他从哪里知道主人是这样的呢？我们、或是我们的父辈先祖，在神的身上看见什么恶事了吗？耶利米书2章5节。神做什么事情使我们厌烦了吗？神欺骗我们的什么工价了吗？弥迦书6章3节：“我 的百姓阿， 我向你做了什么呢？ 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

烦？ 你可以对我证明。”神对我们而言，什么时候是旷野了呢？什么时候是黑暗之地了呢？神长久以来掌管这个世界，能够比撒母耳更加理直气壮地问：“我诈骗过谁呢？我欺压过谁呢？”难道，全地的人不是都知道吗：——神不仅不是一个忍心的人、严厉的人；恰恰相反，全地都充满了他的良善；神不仅不是一个没有播种、只顾收割的人；恰恰相反，即使在那颗粒无收的土地上，神也曾经播撒过许许多多的良种。神使阳光普照大地，使雨水如同甘霖一样滋润世界，使日头、雨露临到好人、也临到歹人；对于那些说“主啊，请离开我”的人，神使他们心里干旱化为春雨，得着饱足与喜乐。

这个恶仆的话语，代表了恶人对神常有的心态；他们似乎总想把自己的罪与毁灭，赖到神的身上；他们故意责怪神，说，神没有把恩典给他们；但是，任何信实地接受神普遍恩典、并以此为基础来努力地事奉神的人，都不会缺乏神的特别恩典，也不会灭亡在永远的刑罚里；也没有人能够显明，还有谁比神更加能够以忍耐恩慈的心，来对待那不结果子的葡萄园了。神并不挑三拣四；不，在神的约里，神所要求我们的事情，也恰恰是神所应许我们的事情；所以，若我们灭亡，那么，我们就无可辞咎。

——2.他的心里面，是奴隶的心态。人对神的这种错误态度，是来自于他对神的错误认识；没有什么，是比奴隶的害怕心态，更不配神的荣耀，也更加阻碍我们来向神尽职分的了。这是一种捆绑与折磨的心态，是与诫命中关于爱的内容完全相反的。人若对神有这样负面的想法，那么，就会疏远神，并会在服事神的工作中心情焦躁、心不甘情不愿。人若以为自己不可能得到神的喜悦，若以为自己服事他的工作都是徒劳的，那么，就不会热忱地在信仰中来服事他。

【2】主人对他的回答。他的申辩不但没有成功，而且，被他的主人推翻；他自己口中的话语，成为给他定罪的证据；他在主人的驳斥面前哑口无言。这里，我们看见他所受到的定罪与审判惩罚。

（第一），对他的定罪（26、27节）。他在两件事情上被定罪。

——1.慵懒和懒惰；“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懒惰的仆人，就是罪恶的仆人；在主人的眼中，这两样被看作是一类。那在工作中懒惰的人，忽略了神所吩咐的、应当去作的良善之事，“与浪费人为兄弟”（箴言18章9节）；这就等同于，他们在做神所禁止的恶事——浪费。在服事神的工作中粗心大意、慵懒、懒惰、满不在乎的人，就等同于，忙于从事撒旦的工作一样。不做良善之事，就是要招致严重的后果。疏忽、不做良善之事，是罪，必须要受到审判；懒惰之罪，引向更加邪恶的罪行。所有人都是污秽的，因为没有人行善（诗篇14篇3节）。当房子空了的时候，污鬼的灵会进来占据。那在灵魂之事上无所事事的人，不仅是在游手好闲，而且是在做更恶的事情（提摩太前书5章13节）。

——2.他的自相矛盾（26、27节）。你 既 知 道 我 没 有 种 的 地 方 要 收 割 ， 没 有 散 的 地 方 要 聚 敛 。就 当 把 我 的 银 子 放 给 兑 换 银 钱 的 人 ， 到 我 来 的 时 候 ， 可 以 连 本 带 利 收 回 。罪人对神的负面看法，虽然是错误的、是不义的，但是，这并不能因而成为罪人犯罪的借口，反而要更深地加重罪人的罪责。——（1）“就算我是一个忍心的、严厉的主人，难道你不就应该更加勤奋地、关切地工作，来得我的喜悦吗？就算你的工作不是出于爱，那么，即便是出于害

怕，难道你不更应该关心你的工作，更应该来尽力吗？”若神的公义如烈火，那么，我们应当仔细思想，怎样了努力地服事他。——（2）或者，“如果，你认为我是一个忍心的、严厉的主人，所以不想去努力工作赚钱，——因为你害怕亏本、害怕我让你承担损失；那么，你为什么不想把这钱放给兑换银子的，这样就可以收取红利呢？” 我们不能把我们没有能力做的事情，当作借口，来为自己的懒惰、不做任何事情之态度辩解；因为，这显明了我们不愿意去做那些我们本可以做之事的心态。如果说，我们的心里不愿意去做那些冒险、费力的事情；那么，难道我们就可以蜷缩在角落里，甚至不愿意去做那些安全而容易的事情吗？做事，总比不做事好；有胜于无；如果我们没有勇气去做那些勇敢的事情，那么，我们至少要显明愿意诚实服事的心；在审判日的时候，我们的主不会轻看那些卑微、微小的事情。——（3）或者，“就算我在没有播种的地方收割，然而，你却是我所曾播种的；你的银钱是我托付给你的，——不仅要你保管，而且要你从中得利”。在交账的日子，恶仆与懒惰仆人都无可辞咎；他们的辩解将要受到主的驳斥；他们将哑口无言；那些现在自以为义的人，将要在审判日的时候，无以言对。

（第二），这个懒惰恶仆人所受到的审判惩罚。

——1.懒惰仆人的银钱要被夺走（28、29节）。一开始的时候，这些银钱都是主人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和意愿分给各人的，因为他是有着完全权柄的主；然而现在，这位主人更是一个审判官；主人要把银钱从不信实的仆人那里拿走，惩罚恶仆，并把银钱交给信实的仆人。“因 为 凡 有 的 ， 还 要 加 给 他 ， 叫 他 有 余 。 没 有 的 ， 连 他 所 有 的 ， 也 要 夺 过 来 。” ——（1）这个话语，可以适用于此生之中的祝福：在世事上、在属世的财富上。神把属世的产业和财富交在我们手中，要让我们把

这些事情用于神的荣耀，用于他人的益处，归荣耀于神。这样去做的人，会得到神的祝福，并得到更加丰盛的财富与产业，更重要的是，会得到更加丰盛的安慰与美好；但是，那些没有这样去做的人，即，那些吝啬的、抠门的，不愿意周济人、帮助人的，不愿意行良善之事的的；——他们手中已有的也会被夺去。吝啬的人，他们手中有的，就和没有的是一样的。箴言11章24节："有 施 散 的 ， 却 更 增 添 。 有 吝 惜 过 度 的 ，反 致 穷 乏"。把我们所有的，分给穷人，我们就必得丰盛的回报；我们的粮仓会充满，油桶会满溢；但是，若我们吝啬、冷漠、小气、不慈善，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财富也都将败亡；（传道书5章13、14节）。有时，神的意旨安排会奇妙地把不愿行善之人的财富，转移到慈善之人的手中；货财，为那怜恤穷人的人而积聚（箴言28章8节）（箴言13章22节）（约伯记27章16、17节）（传道书2章26节）。——（2）这个原则，更可以适用于神赐下恩典的方式。人若勤奋地服事、抓紧所有的机会来做良善之事，那么，神就会使他们昌大，在他们面前开门（启示录3章8节）；但是，人若慵懒，那么，平安就会在他们的眼前隐藏。"去看神在示罗所作的事情"（耶利米书7章12节）。——（3）这个话语，适用于圣灵的普遍恩赐。那有圣灵恩赐、并愿意使用圣灵恩赐才能的人，会得到圣灵的更加丰富的恩赐。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些恩赐，必须要经常使用，才会愈来愈彰显。在真诚的信仰中，我们做得越多，得到的就越多，也就越有更大的能力做更多的事情。但是，那些懒惰、慵懒的人，那些不愿意使用才能、不愿意使用恩赐的人、不愿意发挥自己能力的人，他们的恩赐会生锈、衰残、逝去，就像是一个没有人在意的生命一样。那灵魂中没有神恩典原则的人，连他所有的普遍恩赐，也会失去；正如前面比喻中的那些愚蠢童女，由于没有灯油，所以她们的灯烛都熄灭了（本章8节）。一个慵懒的、无用的牧人，双手抱胸，眼睛微闭，无心工作；撒迦利亚书11章17节讲到，这样的无用牧人，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

——2.他要被扔到外面的黑暗中（30节）。

——（1）他的本质，就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懒惰的仆人，是一个无用的仆人；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本是要去做神所交付他们的良善之事；然而，他们的此生，既没有回应他们生命本来应有的价值与意义，也没有归荣耀于神、并有益于他人的生命与灵魂；他们更不在意他们自己灵魂的救赎之事。一个懒惰的仆人，就像是一个身体上枯萎的肢体，一个葡萄园里的枯树，一个蜂房里的懒惰蜜蜂，没有任何用处和益处。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都是在主面前无用的仆人（路加福音17章10节）；我们不能使神得利（约伯记22章2节）。但是，对于他人来说，对于我们自己的灵魂来说，我们必须要是有用的、有益的。否则，基督就不会接纳我们为他的仆人；我们不伤害人是不够的，必须要行良善之事，必须要结出果实；虽然神不会因我们工作得利，但是，他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得荣耀（约翰福音15章8节）。

——（2）他的结局是，被扔到外面的黑暗中。这里正如前面所讲到的、信实仆人的结局一样，主耶稣在这个比喻的结尾，画龙点睛地指出了整个事情的关键所在，就是这整个比喻的主旨。外面的黑暗，以及其中的哀哭切齿，在基督的讲道中，总是一致地指向了地狱的永远惩罚和刑罚。——【1】那里的状态是非常可怕的。那是外面的、彻底的黑暗。黑暗是让人恐惧、难受的：这是埃及所受的灾祸之一。在地狱里面，是捆索（彼得后书2章4节）。人在黑暗里面不能做任何工作；因而，黑暗是对那慵懒仆人的公义惩罚。这是那外面的黑暗，是与光明的天国相隔绝的，是与主的快乐相隔绝的，是与主的筵席相隔绝的。比较马太福音8章12节、马太福音22章13节。——【2】那里的状态也是非常可悲的。罪人要在那里永远地哀哭切齿。那里是永远的痛苦与恼恨。这就是懒惰仆人的分。

================================

+++
++++++++++++++++++++++++++++

我们在这里继续讲述，在西方近现代历史中的、两条发展线索中的、第二条线索。

【重述一下上文关于这两条西方近现代历史中的发展线索】：——在西方近现代历史上，尤其是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国家中【英国处于外岛上，不在欧洲大陆之内，相对而言比较超脱、中立；但也会在很多方面、相当程度上受到欧洲大陆影响，并与欧洲大陆互动、相互作用】，在重要思想政治文化领域中，一直有着本质迥异的两条发展线索。第一条线索就是，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一大批敬虔基督徒们所掀起的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第二条线索就是，发源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起源于、兴起于十五世纪】以及后来的所谓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两条发展线索中，在其内部、深层次内涵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甚至本质性的矛盾之处。

在上述第二条发展线索中【即，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其集大成者，就是以法国为中心的思想文化体系。几百年来，法国一直自诩为启蒙运动的旗手和大本营。但是，这种思想启蒙运动，或所谓人文主义，其核心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它与第一条发展线索之间有什么异同呢？

公道地说，这个第二条线索【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第一条线索【基督教改革与回归圣经的运动；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之间，其实有着相当程度的重合或共同之处。

第一，它们都是对于天主教在很多具体教义与信仰实践方面的反对【虽然，天主教是正确地持守着《圣经新旧约全书》的正典典籍，并且也持守着《使徒信经》等等正确的基督教信仰教义总结；但是，在天主教中，谬误地添加上了很多圣经里面所没有的、甚至是直接违背圣经教义的教导；例如，关于炼狱的教义，关于敬拜所谓圣母玛利亚的教导，关于对马利亚和历史上基督教圣徒祷告，以及，关于教皇的属灵权威与圣经的属灵权威同等；——等等，这些都是明显错误的、违背圣经的。在这些方面，东正教也有着同样类似的错误问题】。无论是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还是人文主义、启蒙运动，都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天主教的许多教导构成了反对。

第二，它们都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当彼此平等、互相相爱，并应当重视诚实的思考与理性等等。

但是，在这两个线索之间，却有着本质性的、甚至是天壤之别的差异。简言之，人文主义启蒙运动，就相当于是，把圣经律法中的两条总纲【即，第一，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你的上帝；第二，要爱人如己】，除去了第一条，而只保留了第二条。

事实上，上述特征【即，只有对人的爱，却没有对于上帝的爱；仅强调人道主义，但却故意无视、忽视、甚至蔑视——世人所应当有的、对于那宇宙天地之主、创造世人生命之主的敬畏和热忱敬拜】，不仅是西欧人文主义、启蒙主义的深刻弊病所在，而且也正是现代世界中的“白左”【即，白人左派】的深刻弊病和症结所在。

在过去数百年来，以法国、德国等地的文化土壤为中心，有许多人高举起所谓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启蒙主义、文艺复兴的大旗；但是，事实上，他们所作的，却是费尽心机地失去了上帝；并且，这些思想文化给他们所在的国家和文化土壤带来了巨大的混乱、甚至巨大的灾难。

关于这一点，我们仅仅从美国独立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迥然不同的结局与发展就能够清晰地看见端倪。美国自从1776年建国至今，在1788年首次宪法通过以后，历届政府【包括总统行政部门、以及参众两院的国会立法部门，和联邦法院体系】就一直沿袭着起初宪法所制定的政府框架，直到今天。期间，虽然宪法也有所更新和发展，但总是以补充条款的形式（即amendment，中文不是很恰当地翻译成“修正案”），以合法的、有序的、渐进的方式和平进行。相比之下，同一年代中相隔时间不长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至1799年】，虽然成功推翻、并彻底废除了法国的君主政体【法国暴民们以暴力、喧嚣的方式，屠杀了法国皇室；而不是像英国那样，和平地、谨守地保留了君主政体，并以君主立宪、渐进转让权力的方式、实行议会民主】，但是，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今天为止，法国的近现代史就充满了混乱、喧嚣、动荡、甚至生灵涂炭。从法国大革命至今，法国共经历了十五次大的革命或重大政治变化。每一次新的革命，就推翻了上一次的政府架构体系。每一次重大政治变动，就会导致社会上的巨大混乱甚

至灾祸。1799年，在十年法国大革命运动以后【实际上是十年极其混乱糟糕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期间充满了人性的丑恶、不义、争竞、武力、流血、骄傲、自义、自大、等等】，法国政坛终于被一个野心勃勃、心狠手辣的独裁者、拿破仑所掌控；法国因而从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又重新进入了专制主义的时代。

拿破仑在法国的上台，正显明了一个清晰的、无可置疑的事实：——所谓民主制度，其实并非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真理，更不是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万灵药【正是由于法国大革命中的所谓民主政府制度、实际上是喧嚣混乱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才导致了拿破仑的专制政府的上台；法国人以十年大革命的时间谋求民主制度，却无法彼此和平相处，而是彼此纷争不断、好勇斗狠、争风吃醋】【在一个国家社会中，只有当人们心中有敬虔的信仰、有圣洁而诚实的道德品格的时候，所谓民主，即人民的自我治理的政治组织形式才会取得成功；否则，一个国家社会就一定会在混乱的无政府主义与压制性的专制独裁主义两个极端之间摆来摆去。关于基督教信仰与现代民主主义制度之间的反思，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本书作者所著《论民主》】。

在拿破仑上台之前的十年中，法国许许多多故意忽视或轻看基督教信仰的、所谓人文主义者、文艺复兴者、启蒙主义者、理性主义者们，想要高举起人性光辉的伟大旗帜、人类理性主义万岁的伟大理想。因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很多人积极地想要废除、停止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基督教信仰活动，废除教堂、教会、等等。但是，法国大革命所导致的十年动乱让很多普通法国人看见，基督教信仰对于一个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即使后来通过武力上台、成为独裁者的拿破仑，在自己晚年、当自己身陷囹圄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

拿破仑上台以后，为了巩固自己在国内的专制独裁、政治统治地位、以及其他原因，悍然发动了针对欧洲诸国的战争行动。在这位军事天才、拿破仑的率领下，法国军队所向披靡，一度攻陷、统治了欧洲的很大部分领土，并于1812年与俄罗斯之间进行了极其惨烈的战争。不过，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法国军队最终失败于滑铁卢战役，1815年败于英、荷、普鲁士联军，从而导致了拿破仑时代的结束。

拿破仑的军事侵略与战争，以及国内的专制统治政权，进一步激发了整个欧洲大陆各国、各民族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为后世的德国体系以及俄罗斯体系等等的兴起、内部统一、壮大，起到了刺激和促进作用。

在十九世纪以前，德国地区还是由一些邦国所组成的松散邦联组织所构成。

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是德国体系中的思想学术界、尤其是哲学界的“黄金”时期。但是，这个“黄金”时期所结出的，却往往是苦涩的果实。以下是一些著名的德国哲学家（或思想家）及其生卒年代：

康德，1724-1804年

黑格尔，1770-1831年

叔本华，1788-1860年

费尔巴哈，1804-1872年

马克思，1818-1883年

尼采，1844-1900年

在上述著名哲学家中，康德是第一位有所重要建树的思想家。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或许康德最著名的名言就是：——有两样事情，让康德心中产生敬畏，就是浩瀚的星夜，以及人心中的道德律【宇宙的浩大，显明了上帝的全能；道德法则的存在性，显明了那位道德律法颁布者的公义圣洁与大能】。

然而，我们从上述德国哲学家、思想家的思想脉络与演变轨迹中，能够清晰地看见一件无可置疑的事实，那就是，敬畏上帝，是人智慧的开端【否则，人若不敬畏上帝，那么，不论他看起来多么地"聪明"，却仍然是没有真正的智慧】；————如果人离开对于上帝的信仰和敬畏，而是凭着自己的心思意念为根基去认识和思考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就会清晰地看见，这世上的世人不能凭自己的智慧认识神；他们所作的，只是费尽心力地失去了神。从康德、到黑格尔、叔本华、费尔巴哈、马克思，我们看见了一个清晰的思想脉络，即，从对于圣经中所启示之上帝的敬拜和敬虔思考，逐渐地变为自然神主义哲学【即，倾向于认为上帝在创造了这个宇宙世界以后就撒手不管了，而仅仅是凭着自然规律来掌管这个世界】、再变为泛神主义哲学【即，认为上帝是无位格的，或者说，这个宇宙世界本身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世界本身；上帝仅仅是一种泛化的律则、法则、能量、因果、"道"等等无位格的东西（即上帝不一定能听、能看、能言；例如上帝仅仅是无知无觉的因果律而已）】、直至最后变为无神主义哲学。等到了尼采的年代的时候，他已经绝望地喊出"上帝死了"。

上述德国哲学界的发展，与法国文化中的浪漫主义、人文主义、甚至放荡主义、享受主义的人生哲学，相辅相成，在很多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离开敬虔的基督教信仰越来越远。这些思潮的发展，对于欧洲许多其他国家，包括俄罗斯、东欧、南欧等很多国家的学术界、思想界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与上述德国哲学界发展的同时，更为令人震惊的是，在德国所谓“自由派神学界”中所兴起的所谓“圣经文本批判”以及“高等圣经批判”的、明显背离圣经、亵渎圣经、破坏圣经权威与无误性的，所谓自由派神学的学术研究活动。

以下段落引述自一些基督徒网络上的文字（文字有所编辑以增加可读性和清晰性）：——

+++

18世纪的中期至末期，欧美各地掀起了一个很大的浪潮 — 属灵复兴运动. 宣道团体纷纷建立，宣道运动或培灵聚会到处可见. 但这时期，仇敌撒但的工作也非常活跃. 马有藻写道：“… 因上时期理性主义的遗毒，在此时期像‘定时炸弹’般爆发起来；故这时期正统信仰，包括其权威 — 圣经 — 亦受极严苛的攻击和批判，在哲学方面、文学方面、科学方面、

社会学方面等皆加以白眼、或冷箭、或明枪，使正统信仰在此有时只有招架之力，有时才有还击之能．故史称这时亦是‘批判时期’(Age of Criticism).”抨击与破坏圣经权威的圣经批判学也由此而生.

根据达拉斯神学院博士邵叶尔(M. James Sawyer)，圣经批判学(Biblical Criticism)兴起于德国19世纪中叶至晚期，对更正教信仰“唯独圣经”的根基，以及‘后宗教改革时期’的圣经无误论，进行全面的攻击．经文鉴别学(textual criticism，另称“低等批判”，lower criticism)的兴起，动摇了许多人对于圣经准确传递和保存的信心．更甚的是，文体批判(literary criticism，另称“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将分析世俗文学的方法应用在圣经之上．由于批判学者存着先入为主的预设，所以他们拒绝任何超自然的可能性。 在新约研究方面，德国的包珥(Ferdinand C. Baur, 1792-1860)、施特劳斯(David F. Strauss, 1808-1874；注：施特劳斯是包珥的学生)等一大批学者著书立说。（引文结束）

+++

18、19世纪的这些德国所谓自由派神学家、思想家、圣经批判家们，从一些主观的角度，甚至是空想和臆想性质的角度出发，来对圣经的作者、起源等等进行一些、没有任何实质性根据的、妄加猜测【例如，他们仅仅根据圣经创世纪等书中对于上帝的不同称谓，或是新约圣经中的一些文字用法，就主观臆断地认为其作者是相同的人、不同的人、或是一个人还是多人，等等，虚妄地进行猜测和非议】【这些德国所谓神学家们，其实对于圣经的内容和真义，根本不了解、也根本不真正地明白】。而这些荒谬的说法，在本来的信仰景况就不是很敬虔的德国日耳曼民众中间，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许多普通德国人都逐渐地、堂而皇之地、振振有词地、自信满满地、放弃了对于圣经的敬虔尊重，放弃了敬虔的基督教信仰。

正是在这样的、一系列的不敬虔、自义、自大、愚妄的精神文化思潮的土壤中、背景下，欧洲进入了二十世纪，并很快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

接下来，我们继续介绍一战、二战以前的宏观历史背景。

================================

十九世纪的历史

十九世纪对于很多欧洲人来说，是一个充满了乐观情绪的世纪。英国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都是处于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之下。在这一百年中，英国因着科技与经济贸易等等的大发展，国力继续大幅度增强，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不但如此，英语世界中的各个国家也都取得了极其巨大的发展，对全世界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以下引述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B4%E5%A4%9A%E5%88%A9%E4%BA%9A_(%E8%8B%B1%E5%9B%BD%E5%A5%B3%E7%8E%8B)

维多利亚女王（英语：Queen Victoria；1819年5月24日－1901年1月22日），全名为亚历山德丽娜·维多利亚（Alexandrina Victoria），1837年6月20日即位为联合王国女王，1876年5月1日即位为印度女皇。

维多利亚是肯特与斯特拉森公爵爱德华亲王之女。爱德华与其父乔治三世皆于1820年去世，维多利亚在母亲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公主维多利亚的严格监督下成长。1837年，因为父亲三个长兄生前都未留下婚生子，年仅18岁的维多利亚继承王位。

1840年，维多利亚女王与表弟萨克森-科堡-哥达的阿尔伯特亲王结婚。他们的女儿因为多场政治婚姻，散布到欧洲王室，开枝散叶，使维多利亚得到了“欧洲祖母”的外号。阿尔伯特在1861年去世后，维多利亚开始了隐居。因此，共和主义暂时得势，但是维多利亚女王于在位后期重新出现在公众场合。维多利亚的登基五十周年、六十周年的大典都相当隆重。

维多利亚在位时间长达63年7个月，是在位第二长的英国君主，也是世界上在位第二长的女性君主，这一时期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这是英国一个工业、文化、政治、科学与军事都得到相当大发展的时期，亦伴随着大英帝国的大幅扩张。维多利亚也是英国汉诺威王朝末代君主，她的长子、继任英王爱德华七世属于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很多中国人所不知道的是，英国中所谓的各种王朝

（例如维多利亚的所谓英国汉诺威王朝），其实跟中国的王朝完全不同。在中国历史中，每一个王朝的改朝换代，都一定会伴随着血雨腥风、战争甚至生灵涂炭。但英国王室却实际上是所谓万世一系的。即，现今的英国王室，就是远古时代的英国王室的嫡系后代。只不过，由于英国历史上有很多女王，而这些女王的姓氏又都是随从丈夫，因而导致了在英国历届国王或王后的序列中，会有不同的姓氏变化；而每一个姓氏被称为是一个王朝。这样，所谓英国王室的王朝的变更，仅仅是女王的继位而已，期间基本上都是和平的继承过程，而并没有什么战争、更没有什么生灵涂炭。

=====================

整个十九世纪，对于英国历史而言，基本上是一个民主制度不断取得进步、国家不断取得大发展的世纪。但在欧洲大陆，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欧洲的人文主义等思潮，使得很多人更加一步地远离敬虔基督教信仰；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在不断地向专制主义、民族自大主义、国家主义的方向前进。在这其中，德国体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谓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是这样历史中的典型。

以下引述维基百科文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6%89%98%C2%B7%E5%86%AF%C2%B7%E4%BF%BE%E6%96%AF%E9%BA%A6

奥托·爱德华·利奥波德·冯·俾斯麦（德语：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年4月1日－1898年7月30日），俾斯麦-申豪森公爵（Graf von Bismarck-Schönhausen；1865年），俾斯麦亲王（Fürst von Bismarck；1871年），劳恩堡公爵（Herzog zu Lauenburg；1890年）。出生于德意志邦联申豪森，逝世于奥米勒弗里德里希斯鲁。于1867年至1871年出任北德意志邦联宰相。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时成为德意志帝国宰相，直至1890年辞职告终。

作为一名政治人物，他首先为普鲁士地区以容克阶级为主的保守派利益发声，并成为他们的代表，借此拓展自己的名声。随后在保守时代中成为一名外交官。1862年普鲁士宪政危机期间，他被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任命为首相。在与自由派的斗争中，俾斯麦无视议会的存在，在1864年到1866年间连续对丹麦、奥地利开战，让普鲁士为主的小德意志变成德国问题的解答。借由1870年到1871年的普法战争，他促使了德意志帝国成立。

作为宰相，俾斯麦为新生的德意志帝国制定了许多新颖的政策，尤其是其“铁血政策”，更因此被史学家和人们称作“铁血宰相”（德语：Eiserner Kanzler；“铁”指武器，“血”指军人的鲜血，可指战争）。于1862年至1890年（于1873年短暂中断）担任普鲁士首相，为德意志帝国贡献良多。对外他致力于欧洲的权力平衡。

俾斯麦在1861年掌权后，其国内政策可以粗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与温和派自由主义者结盟，并推行许多政治改革，包括引入民事婚姻等，以此与天主教会相对抗。1870年开始，俾斯麦开始与自由主义者划清界线，转向实施保护政策和经济干预政策，并建立社会保险系统。在1880年代时，更推动社会党人法压制社会主义者。俾斯麦与1888年登基的威廉二世，一直有着诸多不合，使得俾斯麦在1890年被后者解职下台。

——————————

1862年9月23日，威廉一世召回俾斯麦，并任命其为首相兼外交大臣。成为首相的俾斯麦在9月26日的下院首次演讲中坚定的对议会发表“铁血演说”：“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从此俾斯麦被冠上了“铁血宰相”的绰号。随后国王对俾斯麦说：“我很清楚结局，他们会在歌剧广场朕的窗前砍下你的头，过些时候再砍下朕的头。”而俾斯麦则回应道：“既然迟早要死，为何死得不体面一些？……无论是死在绞架上抑或死在战场上，这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必须抗争到底！”从此，国王和他的首相间形成了十分特别的牢固关系。

在俾斯麦就任首相后，并未能解决与议会的冲突，为此，他便欲以德国统一的大业来转移议员的视线，并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来抗衡资产阶级自由派。很快地，他便开始筹划三场统一战争。

1801：拿破仑·波拿巴开始入侵莱茵河以东的德意志国家。
1804：奥地利领导的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弗朗茨一世宣布建立奥地利帝国。
1806：拿破仑将德意志国家合并为法国附庸国莱茵邦联。
1815：拿破仑战败后，维也纳会议将日耳曼诸邦国团结为德意志邦联(Germanic Confederation)，由继承神圣罗马帝国帝位的奥地利帝国领导。
1819：卡尔斯巴德法令禁止一切形式的泛日耳曼民族的德意志活动以避免“德意志国”的出现；普鲁士王国则同其他邦联国家成立了关税同盟。
1834：普鲁士领导的关税同盟发展为德意志关税同盟，包括几乎所有德意志国家但不含奥地利。
1848：骚乱席卷德意志邦联（包括柏林、德累斯顿和法兰克福），迫使普

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立宪。同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召开，试图宣布德国统一，但腓特烈·威廉四世予以拒绝。关于统一德国应当采取“小德意志方案”（不包括奥地利）或是“大德意志方案”（包括奥地利）的争论浮现出来。

1861：威廉一世成为普鲁士国王，

1862：威廉一世任命奥托·冯·俾斯麦为宰相。俾斯麦倾向于通过“铁血政策”建立普鲁士领导的统一德意志。

1864：普鲁士反对丹麦王国吞并石勒苏益格，普丹战争爆发。俾斯麦有意将奥地利帝国拖入这场战争。奥地利-普鲁士的胜利使北部的石勒苏益格归于普鲁士管辖，南部的荷尔斯泰因归于奥地利管辖（《维也纳和约》）。

1866：俾斯麦宣称奥地利在石勒苏益格制造骚乱。普鲁士军队进入荷尔斯泰因，并占领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全部。奥地利对普鲁士宣战，普奥战争（七周战争）爆发。奥地利迅速战败，《布拉格条约》签订，德意志邦联正式解散，普鲁士建立北德意志邦联，包括所有德意志国家，但不包括支持法国的南部国家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

1870：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要求获得莱茵兰地区领土以作为他在普奥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报偿。俾斯麦利用西班牙王室继承问题及埃姆斯密电（1868年）试图将南部国家并入邦联。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宣战。

1871：普鲁士军队开进法兰西第二帝国首都巴黎，普法战争结束。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在《法兰克福条约》后加入北德意志邦联。俾斯麦拥戴国王威廉一世为统一德意志（德意志国）的领导人。德意志军队驻留在巴黎，拿破仑三世宣布法兰西帝国解体，阿道夫·梯也尔领导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

—————————————

德意志统一发生于1871年1月18日。拿破仑时代的今德国地区为法国的一个新行省，在经历了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后，普鲁士日益壮大。

在法国于普法战争中战败投降之后，德意志诸侯于此日来到法国凡尔赛宫镜厅，普鲁士国王威廉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德意志诸国正式在政治上和行政上统一为德意志帝国这一民族国家。事实上在很早之前德语人口即已通过贵族之间正式与非正式的联盟逐渐联合起来。自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和1804年—1815年拿破仑战争期间民族主义崛起，贵族之间便不断尝试进行联合，但由于各自利益关系不一致，这一联合过程频繁受阻。

日耳曼人民的神圣罗马帝国曾拥有超过500个诸侯国，而在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后，皇帝弗朗茨二世宣布退位（1806年8月6日）放弃了“罗马人皇帝”的封号，改称奥地利帝国皇帝，帝国事实上解体。帝国的解体导致了法律、行政和政治上的混乱，但旧帝国日耳曼语地区的人民仍然保有共同的文化和法律传统，而这一传统也通过参与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共同经历而得到了巩固加强。这些独立国家有各自的统治阶级、封建制度、传统以及地方法律。欧洲自由主义思潮挑战了王朝制度和专制制度下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为统一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础；这一思想的德意志版本强调了一个地区内的人民传统、教育和语言统一的重要性。经济上，普鲁士于1818年创立关税同盟，并于日后扩张至全日耳曼邦联(Germanic-Confederation)中，减少了各国间的竞争。新的交通运输方式为公务和娱乐提供了便利，在中欧推动了德语使用者之间的联系，但有时也带来一定的冲突。

在拿破仑战争之后，1814-15年的维也纳会议建立了外交上的势力范围体系，支持奥地利在中欧的霸权。然而维也纳的与会者却没有意识到普鲁士在德意志诸国中实力日益增强，因此也没有预料到日后普鲁士将会就德意志的领导权问题向奥地利发起挑战。加上因为奥地利皇帝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且奥地利同为日耳曼民族。普鲁士于是向奥地利这一“德意志二元”问题为统一提出了两个方案：“小德意志方案”，即没有奥地利的德意志；“大德意志方案”，即有奥地利的德意志。

对于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本人是计划将1866年北日耳曼邦联扩大并包含所有日耳曼邦国，从而建立一个统一体，还是仅仅希望扩张普鲁士王国的国际力量，史学界存在争议。史学家认为俾斯麦的“现实政治”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导致了一系列近代政治制度的建立，并推动了19世纪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关系的重组。对丹麦和法国民族主义的回应为德国统一提供了问题的聚焦点。在三场区域战争中的军事胜利（尤其是普鲁士的胜利）推动了统一的热情，增强了民族的自尊。这一经历与拿破仑战争中的共同成功遥相呼应（尤其是1813-14年的解放战争）。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整个十九世纪，欧洲既是处于一个在政治经济很多方面大发展的时代，也是处于一个埋藏了许多危机和政治经济“定时炸弹”的时代。其中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德国的统一以及法国在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思潮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然而，这两件事情都不是使人更加贴近敬虔的基督教信仰，而是恰恰相反，使人更加远离敬虔的、谦卑真挚的基督教信仰。

在德国，在本来就不是很敬虔真挚的、反而是常常傲慢自大、好勇斗狠的日耳曼民族中间，在国家统一的政治背景下，在战胜法国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进一步提升，并逐渐演变为所谓的爱国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在这些冠冕堂皇的口号与主义之下，人们更进一步地

失去寻求公义、寻求信仰的心灵，而是沉浸在属世的政治经济竞争、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争风吃醋上。人们不再那么关心公义、怜恤、敬虔、信仰，而是追求自义、骄傲之心。

在法国，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启蒙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即，把科学错误地当作成了人生与世界的终极真理；详情请见《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等等进一步发展；许许多多人进一步地远离敬虔的基督教信仰。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法国的很多主要思想人物都不是敬虔的基督徒，而是反对宗教信仰【在他们的眼中看见的所谓宗教信仰，就主要仅是天主教的很多谬误而已；他们往往并不真的明白圣经里面在说些什么，也并不真正地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与主旨是什么】的所谓"自由思想者"。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这些所谓自由思想者，或许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很多浪漫主义文学，但是，他们却既没有带给我们真正的理想、信念、盼望、幸福、信仰，更没有带给我们真正的生命。以下，我们仅仅简述伏尔泰与雨果。

以下引述关于伏尔泰与雨果的相关维基百科文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F%E7%88%BE%E6%B3%B0

伏尔泰（法语：Voltaire，发音：[vɔl.tɛːʁ]，1694年11月21日－1778年5月30日），原名弗朗索瓦-马里·阿鲁埃（法语：François-Marie Arouet，法语发音：[fʁɑ̃.swa ma.ʁi aʁ.wɛ]，法国启蒙时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启蒙运动公认的领袖和导师。被称为"法兰西思想之父"。他不仅在哲学上有卓越成就，也以捍卫公民自由，特别是信仰自由和司法公正而闻

名。尽管在他所处的时代审查制度十分严厉，伏尔泰仍然公开支持社会改革。他的论说以讽刺见长，常常抨击天主教教会的教条和当时的法国教育制度。伏尔泰的著作和思想与托马斯・霍布斯及约翰・洛克一道，对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思想家都有影响。

对于天主教，伏尔泰把天主教教宗比作"两足禽兽"，传教士是"文明恶棍"，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他号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与骇人听闻的宗教狂热作斗争，一些人咬住他的耳朵；另一些人踩住他的肚子，还有一些人从远处痛骂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B4%E5%85%8B%E5%A4%9A%C2%B7%E9%9B%A8%E6%9E%9C

维克多・马里・雨果（法语：Victor Marie Hugo，法语发音：[viktɔʁ maʁi ygo] 聆听，1802年2月26日－1885年5月22日），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和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作家。雨果几乎经历了19世纪法国的所有重大事变。一生创作了众多诗歌、小说、剧本、各种散文和文艺评论及政论文章。代表作有《钟楼怪人》、《九三年》、和《悲惨世界》等。在法国，雨果主要以诗集纪念，如《静观集》和《历代传说》。他创作了4000多幅画，积极参与许多社会运动，如废除死刑。

年轻时，雨果倾向保皇主义，但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成为共和主义的积极推动者；他的作品触及时政、社会和艺术潮流。雨果被葬于巴黎先贤

祠。他的遗产被各种方式纪念，包括法国钞票上的肖像。

雨果的宗教观点在他一生中改变巨大。年轻时，受母亲影响，他认同自己是天主教徒，承认教会制度和权威。尔后，他成为冷淡教友，越来越多地发表反天主教和反教权主义观点。在流放时，他常常研习唯灵论（他常参加Delphine de Girardin夫人主持的降神会），晚年，他转信伏尔泰的理智主义自然神论。1872年，人口普查问询雨果是否是天主教徒时，他回答："不是，是自由思想者"。

1872年，雨果还是反感天主教会。他认为天主教对工人阶级的苦难、对王朝压迫无动于衷。另一可能是他对教会禁书十分不满。就天主教会对《悲惨世界》的批判，雨果数了740出。当雨果的儿子夏尔和弗朗索瓦-维克多去世时，他坚持墓地不要十架苦像，不叫神甫。在遗嘱中，他也做出同样的要求。

不过，他相信来世，每天早晚都会祷告，在《笑面人》中，他写道："感恩有翼，飞向正地。祷告比你更加识途"。″

雨果的理智主义可以在《托尔克马达》（1869年，宗教狂热主义），《教皇》（1878年，反教权主义），《宗教和宗教》（1880年，反对教会实用性），以及后世出版的《撒旦末日》和《神》（1886年和1891年，其中他将基督教比喻为狮鹫、理智主义为天使）。文森特·梵高将名言"宗教将会消失，但是上帝仍然存在"归于雨果，其实是儒勒·米什莱所言。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

【【【【引述 基督教之大众证据 关于伏尔泰等近现代西方非基督徒思想家们与基督徒们的生命、思想、面对死亡、等等的对比】】】

基督教之大众证据

原著：DANIEL WILSON

原著出版日期：1829年

II。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思想和意见是自相矛盾的，是前后不一致的。

我们如果稍微仔细观察分析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之人的反对缘由，就会发现他们的意见中包含着许多自相矛盾、混淆、谬误之处。对于许多真实的事实，他们往往有很多深刻的误解。有时，在某些方面，他们承认基督教信仰的正确性、真理性；有时，在另外一方面，他们却又激烈地反对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各种反对基督教信仰的理由，在不同的时代常常变迁，而且互相针锋相对，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什么都不做，就让他们彼此之间驳倒对方好了。从那些臆想性质的各种不同意见中，我们也可以想到，基督教信仰真的是真实可信的，是真理；因为在数千年中，在历世历代中，尽管常常有针对基督教信仰的许多逼迫，但是，却从未曾有过什么针对基督教信仰的有效辩驳。

1. 我们如果仔细检查那些不信之人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就会看见其中充满了多少混淆、误解以及错误的缘由！在他们的反对意见中，没有什么内容是清晰、具体、公平思辨、论据恰当的。这些不信之人的反对意见，无视造物主在宇宙自然中、道德世界中的一般启示，否认历世历代人们的见证，扭曲道德原则的基本根基。他们的反对意见，与其说是出于理性和思考的结果，不如说是人生命中无知与堕落性质的表现。

他们忘记了，基督教信仰的证据是由很多方面的累积性证据所组成的，其中包含了很多种类，各自有独立的信息源，分别从各个角度和层面上阐证了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真理性。不仅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都能够足以使任何一位谦卑诚实的世人信服于基督教信仰，而且，它们彼此交叉联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极其强有力的证据网络。它们合在一起的力量，是那些孤立、支离破碎、零散的反对基督教信仰的意见所无法撼动的。

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往往是基于错误的信息，基于对基督教信仰的误解，或是根本不了解那些基督教信仰的证据。在他们的反对意见中，充满了许多谬误。

众所周知，在法庭的庭审和辩论过程中，如果有大量的证人、大量的证据、丰富详实的证据网络、交叉印证，那么，法庭的定案就是压倒性的、明确的、结论性的、毋庸置疑的。面对这样丰富的证据、证人网络，那些反对之人所针对其中某一个细枝末节的、空乏的言语争竞，怎么能会撼动整个定案的结论呢？对于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而言，即使他们能够否定本书中所阐述的一般证据，那么，本书中关于基督教信仰的另一半证

据，也足以使任何一个谦卑诚实的人毫无置疑地相信基督教信仰。或许，如果我们单单强调其中的一个要点——比如，主耶稣基督的完美品格——那么，我们也足以说服一个真诚的求问者，使他相信整个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真理性。

然而，在本书中所讲述的所有证据都是清楚明确、斩钉截铁、毋庸置疑的。没有人能够否定它们。而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之人臆想性的、针对零散细微末节的、孤立的、支离破碎的、没有事实根据的、没有历史证据的反对意见，就像是拍打着根基稳固的磐石的海水浪花一样，丝毫不能撼动那磐石的稳定性。

2. 更进一步说，在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之人的言辞中，他们的偏离真理、虚伪不诚的表现如此明显，以至于他们的反对意见中毫无理性和思考的力量。他们悍然否认那些证据详实、文献丰富的历史；谬解很多重要的真理与真相；虚构、歪曲或抹煞那些历世历代中辩护基督教信仰之人们的言辞与论证；谬引他们的论述；曲解很多重要的文字；修改很多重要的教会历史学家以及世俗历史学家的文字记述——那些怀疑主义者们的虚伪、欺谎性的文字著作，让每一个诚实、坦率、明白真相的人都感到震惊和厌烦。

难道，这种肆无忌惮的欺谎、歪曲、欺瞒、谬解，就是我们所谓理性时代的表现吗？可是，这就是在法国革命时期所广泛传播的、针对基督教信仰的反对意见的主流内容。请看一看吉本、休谟、伏尔泰（VOLTAIRE）、罗素等人的著作——在那些书籍中，针对基督教信仰的反对意见，都是臆想性的、猜测性的、假设性的、不诚实的，其中所讲到的关于基督教信仰的事情，很少不是歪曲的、误解的或凭空杜撰的。

在法国革命时期所流行的无神主义文化，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其文字著作中的普遍不诚实、欺谎、败坏。他们的几乎每一个出版物中，从光怪陆离的小说，到篇幅巨大的百科辞典，都充满了这样的道德上的不诚实。事实上，谎言与谬解，正是一切恶行的两个翅膀。在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著作书籍中，我不知道有哪一位作者，是基于诚实无欺的事实真相基础，而在进行公平、理性、诚实、前后一致的分析与思考。

3. 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对于基督教信仰的证据事实是部分地接受、部分地反对的，因此造成了许多自相矛盾、前后不一。

那些不信之人所接受的事实本身，其实就足以证明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他们无法否认福音的事实。福音在起初的三百年的传播历史也是无可否认的。圣经新约的朴实无华的记述、诚实无伪的文字是众所周知的。那些不信之人虽然泛泛地想要否认神迹，然而却无法推翻福音书中的基本内容和事实，因而也就实际上等于不得不承认了福音的神迹性。另外，关于整本圣经中的预言，今天的犹太人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圣经旧约的真实性，以及圣经预言的令人震惊的真实。

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真实性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耶稣基督的道德圣洁性，以及他的恩慈与纯洁的高尚品格。

所有的政治家、国家与社会的统治者们，都承认基督教信仰对于人生与社会幸福的重要意义。

吉本自己的著作也不得不承认，基督教信仰传播的过程包含着神迹一般的、令人震惊的事实。

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意见和著作，与其说是辩论，不如说是充满了谬误、误解、无知的喧嚣；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臆想；与其说是平静的思辨，不如说是人身攻击和情绪宣泄；与其说是慎思明辨，不如说是急躁、焦躁、鲁莽的盲目论断。这样的反对意见是不值一驳的。其本身的表现形式，就显明了其中的内容和立场的谬误。

4. 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和著作，没有稳定的内容和基础，而总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立场不断地变化、迁移。

每一个时代的观点和立场，都不一样。今天还在采取的反对立场，几年之后就被抛弃了。赫伯特（HERBERT）在十七世纪的反对观点，到了十八世纪就被佩恩给抛弃、拒绝了。霍布斯以及沙夫茨伯里伯爵（SHAFTESBURRY）所批判的，现在又被很多人奉为圭臬。很多时候，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士，常常披着各种新教义的虚伪外衣，表面是修正主义，实际上是在歪曲和反对。

相比之下，基督教信仰本身的正统教义，在近两千年中从来没有改变。它的真实性、属神性、权威性、内在卓越性始终如一。今天，人们在辩护基督教信仰的主旨内容与方式，与近两千年前的游士丁和拉克坦提乌斯

LACTANTIUS是一样的。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是始终不变的。圣经从近两千前一直到今天，是始终如一、无可增减的。

综上所述，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思想与意见是充满矛盾的，是没有事实与根据的，是臆想性的。因此，我们根本不应当受到它们的搅扰，被它们分心。亲爱的朋友，现在，你在本书这里已经全景式地看到了关于基督教信仰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角度的证据。你看见，这些互相独立、又密切相关的证据中，每一个都足以显明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真理性。你也充分地看见了基督教信仰的内在卓越性。对你来说，那些没有根据的臆想性反对意见是无足轻重、毫无力量的。在你的心思意念中，已经有了良好的信心基础。你的心里得到了平安和安宁，也不会受到那些鼓噪之人的搅扰。你的信心与盼望，就像是灵魂的锚，又稳当又坚固（希伯来书6章19节）。当你面对那些或许使人犹疑的诡辩的时候，你会坚定地回到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来，回到美好的信心中；你会在基督教信仰的美好果实与一切外在与内在的证据网络中，清楚地明白真理在哪里；你会沐浴在自由与平安的阳光里；你会始终如一地坚固信靠上帝的启示、圣经的话语。

=================================

2. 接下来让我们对比，不相信基督教信仰的人，与真诚的基督徒在家庭与社会事务上的区别。即，他们不同的道德原则如何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在那些不敬虔之人的生活中，能够看见各种的虚浮与骄傲、自私与情欲、恶意与冤冤相报、躁怒与悖逆、淫荡与不纯洁、背叛与缺乏诚实、不满与反叛、歧视与敌意、鄙陋与不忠诚等等数不胜数的恶劣现象。

我不是在说哪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般性的一整类人。我请读者们去看那些法庭的庭审记录，看我们的官员与掌权者，也请大家去看历史中的人心。

无疑，有一些例外的个别人，比如某些自然神主义者们，由于心中的自傲以及对于知识的追逐、文学的野心或是其他的原因，因而生命没有表现出很恶劣的样子。但是，即使在这些人的生命中，他们的道德原则中也充满了淫荡和情欲、自私与冷漠，等等。

相比之下，谦卑诚实的基督徒生命，与上述情况完全相反。他们的品格是温和的、恩慈良善的、纯洁的、忠诚的、舍己的，而不是喧嚣躁乱的。

在这里，我仅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说明这种鲜明的对比和趋势。一个反面的典型例子是托马斯佩恩。这里，我不必详述他众所周知的欺谎、作假、残忍、自私、诡诈、自傲、背叛、不敬虔、亵渎、淫荡和奸淫。我也不必去讲述他对自己国家的背叛，对于和平的憎恨，对于法律、秩序、道德、信仰等一切事情的憎恨，等等。我也不必详述他的醉酒、放荡不羁，甚至蔑视那些跟随他自己的人们，等等。

另一个反面的典型例子是法国的伏尔泰。在过去的六十年中，他引领了背离基督教信仰的风潮，吸引、败坏了许许多多跟随他的人。我承认伏尔泰有非凡的才能。他有着很丰富的想象力，能够把很多事情阐述得很有吸引力。他也非常勤奋，从不倦怠。他在文学上很有才干，对大众的观点很有影响力。但是，我想问的是，他的道德与信仰方面的品格是怎样的呢？在他反对基督教信仰的思想与著作中，有多少是出于他真诚的寻求真理的心志呢？才能如果与道德分离的话，就毫无真正的价值。没有道德的才干，往往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根据伏尔泰的传记记载，伏尔泰的一生充斥着各样的不敬虔、虚伪、嘲讽、虚假、背叛、亵渎的事情。当他步入老年的时候，他的对于基督教信仰的反对立场已经根深蒂固。他的不敬虔的态度已经变成了系统性的、侵犯性的。他的世界观中，充满着不可抑制的恶意和怒气。对他来说，任何与信仰作对的事情都是值得支持的。他毫不隐瞒自己攻击基督教信仰的动机。他多次地公开说，我要以一人之力推翻基督教信仰。他的私生活极其混乱，充满了奸淫和淫荡的事情，并且，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丝毫不加隐瞒。那些放荡不羁、黑暗、道德败坏的内容，构成了他作品的一个主要部分。

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真理根本就不重要。他对于基督教信仰的反对，与其说是他思辨的结果，不如说是他鼓噪、讽刺、嘲笑的形式。这样的人对于基督教信仰的反对，与其说是削弱了基督教信仰的说服力，不如说是客观上从反面更加有力地显明了基督教信仰的荣耀和真理性。

与上述两个例子相对，我们可以举出另外一个在欧洲同时期的著名人物，

就是现代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波义耳。我们很难讲，波义耳在哪一个方面更加著名，因为他既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又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自然哲学家。

波义耳的贡献是杰出的、有目共睹的。他心思宽阔，判断严谨，著作丰富，道德纯洁，秉性温和，对穷人恩慈良善，待人友好，做事诚实。他从早年起，就对基督教信仰有着坚固稳定的信心。他的一生都在见证着他诚实的信仰。他一生致力于寻求真理，尤其是自然世界中的定律，成为许多人仰慕倾佩的对象。他待人温柔，不重名利，对造物主有着极其崇高的敬意。

从像波义耳这样的人生中，我们能够看见一个人对于真理、真相的谦卑而诚实的执著追求。波义耳的著作包括《关于人的智慧以及对于上帝的最高敬意》以及《基督教信仰使人有真正的智慧》。这正如圣经中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9:10）

所有的真诚基督徒们的人生，虽然或许没有像波义耳那样有名、受万众瞩目，但在内容和实质上却都是一样的。无论在哪里，只要有真诚的基督徒的地方，我们就能够看见良善的父亲、恩慈的母亲、顺服的孩子、信实的家人、可以信赖的政府官员、有良心的公务人员、诚实的政治家、热爱自己国家与臣民的君王。

从基督教信仰刚开始传播的时代开始直到今天，在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这种基督徒们的生命与世人生命之间的鲜明对比，都是有目共睹的。一个

没有真诚信仰的人，或许有很多属世的聪明，但心里面却充满了虚伪、败坏、恶意、黑暗；这样的人，不认识真理，也不关心、不在乎真理。他们的这些品行与品性，在他们的人生中、日常生活中会清晰地显明出来。在这样的人所组成的人群、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会充满矛盾、争竞、不道德之事。这种冲突，甚至会激烈得导致整个社会解体。

是的，不敬虔的、没有真诚信仰的人生与人群，本身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他们给这个世界、各个社会、各国家民族，已经带来了罄竹难书的破坏作用。相比之下，基督教信仰不仅使社会更加清洁、人们彼此更加宽容和饶恕，也抑制、削弱了社会中许多矛盾、争竞、冲突的因素。

在一个真诚基督徒的言语行为中，你能够看见和平的纽带、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家庭的温暖，以及上帝放在我们人身上的所有道德职分。是的，基督教信仰是关于真理的宗教信仰；它的教导塑造和改变了那些真诚信仰之人的生命。每一个真诚基督徒的生命，都是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顺服的生命。

==

II。在那些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书作之间的比较。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写作出版了许多书籍。从他们的文字中，我们也能够

看出他们的心灵光景；可以比较他们的价值观念与世界观、人生观。

在那些非基督徒所写的书籍中，其主要特征是什么呢？他们对于基督教信仰，以及任何其他宗教信仰，都表现出深深的蔑视。然而，他们提出了什么理论体系呢？他们给人的心灵与灵魂带来了什么支柱、慰藉和盼望呢？他们去哪里寻找道德原则的基础呢？他们到哪里为世人寻找幸福呢？他们怎能让人勤奋、谨守、舍己，离弃愚昧、无知、不义、懒惰呢？当世人面临重重人生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他们从哪里给人提供源源不断的人生奋斗的动机和动力呢？他们怎能让人有坚毅忍耐、百折不挠的心志，为了那远大甚至遥远的目标，而奋斗终生呢？

的确，非基督徒的学者、作者、思想家们，建立起了许多理论体系。在社会与人生的事务上，他们也做出了许多影响巨大的努力。但是，他们的理论体系，不过是去除了世人心中的绝对道德原则和标准。他们的努力，不过是给世界带来了无休无止的革命、动乱、无政府主义、对权威的藐视、不满、埋怨、以及家庭与社会中的无数悲剧。他们有很多领袖。但是，他们的领袖的生命品格基本上都是没有高尚道德的、刚愎自用的、充满恶意的、叛逆的。他们的所谓榜样和模范，都是一些虚伪、虚假的人和事；是阿谀奉承、性格弯曲的人；是许多充满野心与苦毒的人生品格。

非基督徒的作品与思想，很少会去涉及那些关乎全人类的利益与福祉的事情。当然，有一些个人从自己的思考出发，在一定范围内，针对一些具体的事情试图做出一些有益影响的事情。但是，他们并没有系统性的、全方位的、稳固的道德原则体系。他们更不会去追寻上帝的荣耀，不会去寻求关乎一切世人生命与灵魂的永恒性的福祉。

有很多非基督徒的学者、思想家、作家，等等；他们很有聪明、才能、勤奋精神、优秀的写作风格。但是，他们的作品所反映出的，是怎样的道德原则与品格特征呢？他们的目标、目的、意义是什么呢？当他们提出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臆想性观点的时候，他们的动机中，有多少成分是出于追求真理的诚实之心呢？他们的道德与信仰的情感是什么呢？他们真的认识基督教信仰、了解基督教信仰的真谛吗？他们是坦诚、诚实、谦卑的，还是欺谎、充满偏见的？他们真的愿意得到真理，并在真理中得到自由吗？

就以我们国家中十七世纪末期那些风起云涌的许多出版物为例。请查考查布、廷德尔（TINDAL）、霍布斯、伍石顿（WOOLSTON）、博林布鲁克或是柯林斯（COLLINS）等人的著作。再请看一看伏尔泰作品中的主旨和目的内容。请观察狄德罗（DIDEROT）、戴勒姆波特（DALEMBERT）、罗素还有其他一些法国无神论者的书作。再请看一看我们本国的当代一些著名作者的书作，比如休谟、吉本、拜伦、夏普里（SHALLEY）、佩恩、卡莱尔（CARLILE）等人的作品。

他们的书作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自我中心和自大主义。他们都是很有抱负心的人，都有着一股气吞山河的派头。他们的视野很伟岸，志向很宏伟。他们所推崇的，就是他们自己的荣耀，以及世人的荣耀。他们总是轻看谦卑与贞德。

他们追逐的是虚浮的名声、炫耀的外表。他们的原则是败坏的。他们并不

真的渴求真理。对于任何忤逆他们喜好的事情，他们都以敌意视之。他们不喜欢别人的批评与指责。

对于基督教信仰，他们心中怀着深深的敌意和仇视。他们的心思意念，激进的做事方式、理念和主义，与基督教信仰的谦卑、温和与平静的特质完全相反。

他们罔顾事实的真相与真理，藐视世上那些庄严的事情。伏尔泰毫不知羞耻地做出许多虚假、背誓之事。为了自私的目的，他发誓赌咒地否认自己所曾经写过的书籍。

他们的心里充满了亵渎。他们藐视上帝，藐视他的旨意和启示。他们不仅罔顾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真理性，而且嘲笑这世上的任何宗教信仰。他们肆无忌惮地亵渎那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宰，那无限全能的上帝。

他们拼命混淆良善与恶意之间的本质区别，试图抹去绝对道德原则和标准中的基本界限与底线。他们嘲笑人生中那些贞德、贞操、美德之事。他们以恶毒的心，去推测别人的善意；以鄙陋的态度，去对待别人的温柔；以荒谬的理由，去谴责别人的慷慨和善行。他们不但自己喜欢罪，也喜欢别人都沉浸在放荡不羁的罪性与生命中。他们高举人性主义，却闭眼不看人生中本质性的罪性与罪行，罔顾人生与社会中因罪而引致的许多悲惨之事。

面对这些非基督徒的书作，我们会毫不奇怪地认识到——怪不得，他们对于基督教信仰有那么深的、非理性的、毫无事实根据的、臆想性的反对意见。他们喜欢的，是放荡不羁的生活，而不是道德的价值与约束。

————————

对于这些非基督徒的书作（不论是出自我们的国家，还是来自欧洲大陆），我们要指出他们三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们要指出，他们扭曲了很多事实，误引和篡改了许多关于基督教信仰的涵义与教义。无论是休谟，还是吉本，还是伏尔泰，在关于基督教信仰的话题上，他们的书作中都充满了很多谬引和歪曲。他们习惯性地怀疑和扭曲基督教信仰，然后在错误信息的基础上对之加以肆意的嘲讽。

第一，他们的书籍里面误引了很多信息，连很多基本的、关于基督教信仰的事实都没有搞清。他们的态度是不公平的，是充满偏见的，是不诚实、不认真的。

第二，我们要进一步说，他们的书籍里面常常故意地、不为人察觉地，用一些貌似科学的思维方式，来包装他们针对基督教信仰的、肆意的、非理性的、无事实根据的、臆想性的反对意见。他们狡猾地、虚假地、偷偷地发动起一场思想上的争战。他们背叛了真理与诚实的精神。休谟与吉本所写作的书籍，居然在我们的国家中很流行、影响了许多人，这实在是对我们国家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文化的羞辱。

第三，他们的作品所反映出的，是极其不纯洁、放荡的品格特征，正如同古代罗马帝国时期和希腊文化时期所流行的荒淫无耻的罪恶一样。他们的艺术、文学、思想常常就是以性、放荡为主题，反映出他们真实的道德面貌与心灵光景。他们的心思意念，充满了属肉体血气的自傲与情欲。

简而言之，我们想要强调的就是这一点——他们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书作，并不是公平地、认真仔细地、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他们的态度并不是谦卑、诚实的。他们不是敬虔、正直、认真、严肃、诚恳、热忱、心无偏邪、追求真理的人。

____

相比之下，我们在诚恳的基督徒书作中，看到的则是良善诚挚的内容。那些基督徒作者们的主旨是什么呢？他们向公众宣传的是怎样的理念呢？他们怎样表现出他们"荣神益人"的人生格言呢（即："归荣耀于上帝、以勤勉的服事有益于世人"）？他们怎样表达他们心中所认识的、那来自于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呢？

请大家通过仔细的考察、比较、阅读，来思考以上问题的答案。是的，我想说，每一个真诚的基督徒，都是欢欣地服事世人的人。他不仅秉持道德与信仰的原则；他不仅在社会与家庭中承担着每人应有的职分和责任；他不仅以热忱仁爱的心，在各项慈善的事情中忙忙碌碌；而且，他在世上一生的目的，就是为了他人的真正益处而努力去做各样的事情。在他的心

中，有圣洁的道德原则，有美好的人生意义，有高尚的职分与责任。他不在困难面前退缩，也不因各样阻碍因素而气馁。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都是以真正的慈善为中心目的。

请看教会里面的那些牧者、传道人们。在历世历代中，他们的生命光景是怎样的？他们对于现实以及永世之中的世人福祉，有着怎样的热忱？他们的劳苦与不停歇的服事工作，是怎样的？

请思考那些各种各样的基督徒的人生。比如，以那些传道人的生命品格为例。请看斯沃茨 、齐根伯格（ZEIGENBALD）、布莱纳（BRAINERD）、艾略特ELIOT、格里克（GERICKE）、克劳多斯·布砍南（CLAUDIUS BUCHANAN）、马丁（MARTYN），等等。他们默默地辛劳，努力服事，在这世上度过了谦卑、诚实、有益、可贵的一生。

请看基督徒们在各行各业的生命榜样。请看他们怎样在世俗的工作中，彰显出他们信仰的价值与职分。请看他们怎样在各行各业的服事工作中，显出他们属灵的祝福与贞洁的道德品格。

再请看在无数家庭生活中，那些基督徒妇女们谦卑顺服、勤勉服事的生命品行。她们以忍耐谦和的心，见证出她们的真实信仰。与古代社会相比。基督教信仰不仅使她们在社会中、在家庭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而且更使她们的生命得到建立、升华，并有益于家庭、社会乃至整个国家、人类。

基督教信仰给各种各样的人生，都带来了无比的益处。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就是，在这个世上应当爱人如己。

基督徒作者所写的书籍，与非基督徒作者所写的书籍，构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前者的主旨是谦卑；后者的主旨是自大。前者是舍己，自知不配上帝、救主的荣耀；后者是虚浮，喜好声名。前者是仁爱、良善、恩慈、友好、坦诚、信念坚定、没有自私的情感；后者是恶意、藐视与亵渎。前者是诚实、直面事实、敬虔、敬畏上帝；后者是虚假、不敬虔、蔑视。前者清晰地指出美德与恶意之间的区别，指出对与错、正确与谬误之间的区别；而后者则抹煞道德的绝对原则和标准，对错不分。

在这里我想问，为什么——我们在那些基督徒的书作中常常能够看到明显的谦逊纯洁品格，但在那些非基督徒的书作中，却看不见他们口中所自我声称的人文主义光辉美德呢？那些非基督徒作者的道德教义系统究竟在哪里呢？他们的著作，为什么与我们基督徒先辈们的书作，或是那些注释圣经的当代作品，或是书写教会历史的书作，或是那些基督徒道德散文，或是牧者的讲道集，等等其他基督徒书籍，相差如此巨大呢？他们的著作，为什么无法与历史上或当代中那些最著名的基督徒书作相比呢？——比如，塞浦路斯、克里索斯托、奥斯丁、布莱纳、胡克（HOOKER）、朱欧尔（JEWEL）、路德、麦兰顿（MELANCTHON）、帕斯卡、牛顿、皮尔森（PEARSON）主教、巴克斯特（BAXTER）、莱顿 （LEIGHTON）主教、霍尔（HALL）主教、多德里奇（DODDRIDGE）等人的伟大书作。

在那些基督徒书作面前，世俗作品、非基督徒书作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在

那些伟大的基督徒思想书作面前，非基督徒的思想书作就像是死一般的安静。我找不到一本基督徒书作不谈论道德、真理、纯洁、真诚。我找不到一本非基督徒书作以这些事情为主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不必再深入展开讨论。我想请读者作出诚实的比较，并得出中肯的结论——在那些公共书籍中，基督徒的书作中是否杰出地讲述了属天的信仰、道德的根基、生命的源泉，而非基督徒的书作中是否以虚假、不诚实、自大、叛逆、黑暗为主要内容与风格？

在那些基督徒书籍的作者中，有很多是从前不相信基督教信仰、但后来认识并相信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杰出作者们。他们从前是不认识上帝的人，曾经沉浸在肉体血气的罪中，沉浸在骄傲自大的心态中，但是，当他们真正明白福音的时候，内心就全然翻转过来。他们从前是虚浮、傲慢、鄙陋、放荡的，但是，当他们成为敬虔的基督徒以后，他们的品格就成为了纯洁而高尚的品格。他们公开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忏悔和悔改自己的罪，讲述自己从前的悖逆和谬误。比如，公元四世纪的奥古斯丁就是最著名的例子。从他们的书作中，我们能够看见，基督教信仰是多么宝贵、真实、伟大，而那些针对基督教信仰的反对立场，是多么错误。

=======================================

III。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死亡，有着什么样的不同。

当面对死亡的时候，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生命，就会显出更加巨大的差别。一面是黑暗，另一面是光明。

不论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或是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在道德原则、言语行为、慈善品格、公共事务、书籍作品等等方面有多么大的差别——当他们趋向死亡的时候，两者之间的对比都更加明显、尤为突出。

一个躺在病榻上、没有信仰的人，会如何面对死亡呢？在这个庄严的时刻，他会怎样看待自己的一生呢？他的良心会怎样对他说话呢？他在扪心自问的时候，会说“我这一生是渴求真理的一生”吗？可叹！死亡的阴云就这样笼罩着、警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一个没有信仰之人的心中，不论他的内心怎样狡辩、怎样为自己寻找借口、怎样在这个世上凭己意随心所欲地行事，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的良心会见证他自己的罪恶、背叛、悖逆、虚谎。

从那些非基督徒晚年的书作中，从他们将要临死前的文字中，我们能够读到——他们在临死时的懊悔和迷惘；或是自私、顽梗、不顾念别人；或是骄傲、自大；或是轻忽、不严肃；或是对他人怒气冲冲、遗恨不已、心态绝望；或是自暴自弃，自我毁灭。

相比之下，我们在基督徒晚年的书作中，从他们临死前的文字中我们能够看见——他们对于天国的谦卑盼望；他们的平静与坦然；他们回首往事的幸福；他们对于他人的顾念和恩慈。

这些对比，都能够让我们明白，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思想和意见，是出于人心中对于上帝的悖逆，是人生命本质罪性中所泛起的泡沫和渣滓。而真诚的基督徒在死亡面前，则见证了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真理性，见证了基督教信仰的真诚、圣洁；见证了上帝的救恩、道德的管理是何等伟大而奇妙。

1. 请注意，那些非基督徒在病榻前或死亡前的懊悔和迷惘。我看见，BURNET回忆自己早年的放荡生活，并承认，正是那些放荡之事，使自己堕入了骄傲自大、没有信仰的可悲境地。我听见，许多死刑犯为自己没有信仰的生命而痛苦不已。他们当初犯罪，也正是因为没有对于上帝的敬畏。

相比之下，我们曾经看到过哪一个基督徒在死前为自己相信福音而懊悔不已的吗？有哪一个信靠基督救恩的人，在临死前的时候会感到迷惘与羞耻的呢？

2. 还有许多非基督徒，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则是顽梗、刚硬、没心没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心态。我看见那些将死的非基督徒们，即使在死亡之前的最后时刻，考虑的也仍然是世俗之事；他们计算着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但却一点也不去想那些关乎永恒的事情。他们既不回首往昔，也不为未来祈祷。对于那些关乎上帝的公义和审判的事情，他们完全麻木不仁。他们的心完全是刚硬的；即使从理性的角度，或是从人性的意义而言，他们的这种心态也是荒谬的。

与此完全不同的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临死之前的心态。基督徒把死亡看作是一个路径。他为那将要来到的永生而作准备。他省察、反省自己的内心和生命。他呼求那位救赎他的生命的主。他承认自己在过往所犯下的每一个罪。他饶恕别人对他所作出的一切伤害。在死亡的威胁面前，他镇静自己的心，准备完成这最后的属灵争战。他信靠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他的恩典。他把自己的儿女和家人交托在那恩慈而大有能力的天父手中。他在和平中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的良心、道德的情感以及宇宙自然和道德世界的一切，都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安宁死去的人是对的——而那个没有信仰而死去的人，却必将面临永远的可怕毁灭。

3. 还有的非基督徒在死去的时候，心中仍然是自大而骄傲。而与此相对的，则是基督徒在死去的时候心中满含谦卑。

我看见GIBBON在死去的时候，心里仍然是虚浮的心思意念与算计。就在他临死前的二十个小时内，他还想要再活15年。他在死亡面前一点也不害怕，仍然为自己的生命而自大骄傲。我听见罗素在死前的时候，宣称他拥有造物主的看顾，宣称他的灵魂和他出生的时候一样纯洁。他一点也不为自己的人生而有任何愧疚，更不会为什么事情而忏悔。他以为自己配得上帝的看顾，配来到那位上帝、造物主的面前。

基督徒在死前的时候则完全不是这样。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内心是谦卑的。我看见帕斯卡在辛劳一生、完成了许多基督徒书作以后步入晚年。

在患病期间，他的心里满有慈善和忍耐。他如此谦卑，以至于想让一个穷苦患病的人也住到他的病房里面来，得到和他一样的照顾。当他在牧者那里领主圣餐的时候，他说道：“是的，这是我的全人全心所信靠的。”他在死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愿上帝永不离开我。”他以感恩的心，安息在救主的怀中。

4.还有一种非基督徒，在死前的时候，轻轻乎乎，满不在意。而基督徒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则是庄严肃穆的。让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在这两种态度中，哪一个是对的。

休谟在临死前的阶段，言语中越来越充满轻浮和讽刺的语气。他嘲笑卢奇安，卡隆（CHARON），斯堤克斯（STYX）；他开各种各样轻浮的玩笑；他甚至玩和别人掰手腕的游戏。在最后的阶段，他不断重读自己从前的著作。在病榻上的最后时期，他写作关于自杀的文章；在其中，他以亵渎和不敬虔的口吻，鼓励人们在绝望的心情中去自杀。这就是休谟死去时的光景。这是一幅多么轻浮而夸张的表演场景！这是一种在死亡面前多么满不在乎、没有自省的心态！死亡本是因着人生命本质的罪性而临到这个世界的，本是要把人带到上帝终极的公义审判面前。然而，这样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在死亡面前竟如此毫无愧疚和畏惧！这种心态，即使从上帝在宇宙自然和道德世界的一般性启示而言，即使从世人良心中所知道的而言，也是明显不对的。

这就是休谟，那个被世人视为极聪明的怀疑主义大师吗？这就是那个以冷血的态度来面对美德的人吗？这就是那个以自己的一生来否定道德终极价值的人吗？无论是《出埃及记》中法老的刚硬内心，还是无神论者、怀疑

主义者在死前如此轻浮和无知的心态，都显明了上帝的公义和圣洁，是何等地真实——上帝任凭他们刚硬地死在他们自己的罪恶当中而不能悔改。

胡刻（HOOKER）的死则与休谟完全不同。胡刻的思想与智慧能力，在各个方面都超过休谟很多；但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胡刻的道德与信仰。他在死前最后的话语是："我活了这一生，看见这世界充满了焦虑与不安。我早已做好准备离开它。我已经得到安慰，并将要与上帝同在。现在，我已经离他越来越近了。虽然我从小就爱他，就敬畏我的主，但是，主啊，若我曾经做错什么，曾经在什么地方得罪你，愿你向我施恩慈怜悯。我不求自己的义，但求你赦免我的不义。愿你的饶恕恩典借着那为我而死的基督临到我。"

5. 还有一种非基督徒，在死前的时候坠入愤怒、绝望的心态里。而相比之下，一个信实基督徒的死亡是喜乐、得胜的。

在PAINE所著的《理性时代》一书的下卷中，他夸口说，有一次他得了重感冒，大家都以为他要死了；但是当时他想到了自己所写的该书的上卷内容，于是安慰大家说："理性的人，不会觉得死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后来，等到他真的接近死亡的时候，却变得非常气急败坏，怒气冲冲。当他的医生让他忏悔、承认自己一生中的错误言语行为的时候，他断然拒绝了。一个曾经被他引诱通奸的有夫之妇向自己的邻舍哭诉："我为了这个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庭、朋友、财产和信仰。可是，他现在却告诉我，他教我的那些东西根本没什么用。"

伏尔泰的最后时光是怎样的呢？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光的时候，会表现出极大程度的虚伪与害怕。当伏尔泰意识到自己快要死了的时候，他对人哭诉说："我不想让我的尸体被丢在臭水沟里。"他又说："我想有一个天主教的葬礼，并想请求上帝的饶恕，也想请求教会的饶恕。"当死亡临近的时候，恐惧深深地抓住了他。他对朋友不断发怨言。他一会儿卑躬屈膝地向上帝乞求，一会儿又怒气冲冲地咒诅上帝。伏尔泰的那种绝望与虚伪的样子，让旁边的很多人都非常恐惧和难受。

现在，再让我们把眼目转过来，思想那些基督徒的死亡。让我们看一看那些基督徒殉道者怎样面对死。让我们听一听坡旅甲在临死的时候怎样赞美主。让我们看一看圣布兰蒂纳（BLANDINA）怎样以信心得胜。让我们思想英国宗教改革的先驱里德利和拉蒂默。他们两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彼此鼓励。里德利对拉蒂默说："弟兄，让我们以一颗良善的心来面对死。上帝会熄灭那火焰，或是使我们有力量持守到底。"然后，他平静地祷告说："天父啊，我把我感恩的心献给你，因为你呼召我见证你的名，甚至一直到死。主啊，我恳求你，愿你的恩慈临到英格兰。愿你把你的百姓都从罪中拯救出来。"LATIMER也在临死的时候说："天父啊，愿你接纳我的灵魂。"

基督徒们不仅在殉道的时候能够坦然面对死亡，而且在病榻上即将离世的时候，也会平安地面对死亡。让我们来到病室中，听一听基督徒们在死亡面前的得胜，以及他们在即将进入永生时的喜乐。班德拉罗奇(BAN DE LA ROCHE)的敬虔牧者奥柏林（OBERLIN）作了六十年的牧师。他与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诚挚的好友；他是穷人的帮助者，是全体教会爱戴的对象，是许多书籍的作者，是幼儿学校的创建者，是主的忠心仆人。他不仅是一个牧者、一个传道人，而且还是一个校长、耕地者、机械工、医生。当他自己的死亡临近时，他在祷告中为教会的每一位成员祈求；他渴望进入那幸福

的永生之地，谦卑地倚靠基督的救赎。他在死前最后所说的话语之一是："主耶稣啊，请尽快带走我！然而，愿你的旨意成就。"他拉着一位年轻牧者的手说："愿主祝福你，也祝福一切你所亲爱的人！愿主每日都与你同在！"当他最后离世的时候，他手牵着那年轻牧者的双手，举目望天，脸上充满了信心、喜乐与爱的表情。

6. 更进一步，我想指出，在那些非基督徒中间，常会有很多自杀的事情。然而，基督徒们却会以谦卑和忍耐，面对患难与痛苦。

是的，非基督徒心中的骄傲和虚浮之心常会使他们自暴自弃，使他们在挫折面前常常想要自我了断。他们心中没有圣灵的恩典；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所编织的谎言。尽管，当他们与基督徒辩论的时候，常会用一般性的敬神畏天的信仰来反驳基督徒们所说的来自于圣经的特殊启示；但是，当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却早已把那些一般性敬神畏天的信仰忘到脑后。非基督徒心中的一切追求、习惯、原则，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都是强调自己的重要性，都是对这事不满、对事那不满、憎恨他人；他们的生命是以肉体血气为基础，充满了骄奢淫逸的情欲，而极其轻看道德的原则和终极价值。

他们平时蔑视他人，而到了自己身经患难的时候，却没有可寻安慰的地方。他们的患难，常常是由于自己的罪性与罪行导致的。当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常常会想到自杀。很多人在工作事业失败的时候，或是生活中遭遇挫折的时候，他们骄傲的心无法承受失败，因此就会轻易地选择自杀。

相比之下，基督徒们有着一颗谦卑和忍耐的心。当身处困难、疾病等等之中的时候，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生命仰望交托在那位全能者的手中。在那位恩慈、无限智慧的上帝面前，基督徒们能够祈求安慰，并得到真正的平安。是的，基督徒们不但不会自暴自弃、失去盼望，反而会以完全的信心和倚靠来到上帝的恩典中。他会对上帝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一切事情都按着你的意思，而不是我的意思。"

我不必引述公共的历史记录，也不必引述历世历代众圣徒的生平传记。我只是想让我的读者在现实生活中去看一看那些真诚的基督徒们是怎样面对死亡，是怎样步入晚年、回首一生。

你会看见一位受人尊敬的一家之父，在操劳了一生以后，以忍耐和谦卑，经历疾病的痛苦，来到死亡的门口。你会看见他在上帝面前有一颗温柔安宁的心，有一种稳定、谦和、坚定的心态。你会看见他坚定地倚靠主，信心毫不动摇，完全地顺服于上帝的旨意；他对生命毫无抱怨，对死亡毫无畏惧；他坚定地知道，有那属天的安息在等待着他。他平静祥和地离开这个世界，给自己的儿女们留下了馨香的生命榜样。

你会看见一位年迈的、受人爱戴的慈母。她虽然身体极其虚弱，然而，在经年累月中，她从不停歇地等候盼望主。她常常身处病痛之中，然而，当她身体经受苦难的时候，心灵却沐浴着圣灵的恩典；她的生命彰显出温柔顺服的品质，彰显出道德的芬芳，彰显出对于上帝旨意的完全顺服。当那属灵的争战结束的时候，她将要与那位爱她的主完全合一，她将要永远在上帝的爱中找到幸福。

你会看见一位妻子，虽然历经多年的病痛，但却仍然是孩子们的可敬母亲，仍然是丈夫的可爱伴侣。她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从未衰残。她的生命彰显出忍耐和坚毅的精神。她对天国的盼望，使得眼前的坟墓变成了一个美好之地。她虽然身体和心灵会感受到疾病所带来的痛苦和哀愁，但是，她灵魂里充满了来自于上帝的极大恩典和慰藉。她总是不停歇地祷告。她常常以正直和恩慈的话语，教导、警诫儿女们。她总是渴想着天国的幸福；那美好的永生盼望，使得眼前的患难根本算不得什么。

你会看见那可爱的儿女，虽然年纪轻轻，却患了重病。然而，你在他年轻的生命里，看见了那伟大信仰的奇妙力量。那信心，就像是他灵魂里面的锚，支撑着他，正如光明照进黑暗里，带来属天的平安与盼望。他虽然还在这个地上，但是却好像已经来到了天上，得享那永生的美好与无以言传的幸福。

上述这些场景，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社会中，发生在千千万万人的生命里。每一个真诚基督徒的家庭里都会有这样的感人故事。这些点点滴滴、虽看似渺小、但却无比伟大的人生故事，都仿佛在向我们诉说基督教信仰是何等伟大、真实、意义重大。

____

更进一步，我想强调，在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不仅是在此生的生命中以及面临死亡的时候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而且，当他们进入那永恒状态的

时候，其差别就更将是如同天壤之别。请您思考，在上述两种人中间，哪一种是最理性地、最智慧地、最有效地为未来做好了充足准备的呢？他们中间，哪一个实现了自己人生的目的，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呢？请您仔细思考、对比他们的人生。请您公正不倚地、没有偏见地考察一下，看他们如何面对死亡；然后请告诉我，他们中间哪一个有可能会得到那永远的生命、永远的幸福呢？

我想，上述问题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之人的生命，究其本质而言，是没有原则的。他们的言语行为，就好象是毫不在意自己的灵魂一样。他们虽然是人，但却像野兽一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他们完全忽视真正的理性与智慧，无视道德的终极价值。他们在心灵深处离弃那位宇宙天地的造物主。

一个人人生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归向那创造他生命的主；热爱他，服事他，敬拜他，得他的喜悦，荣耀他的名。因而，一个人若不认识、寻求、归向、敬拜那位创造他生命的主，那么，他的生命价值就是失丧的。这样的人，沉浸在肉体血气的情欲中，沉浸在眼目的情欲与今生的骄傲中，却蔑视那些高尚、隽永、属天的事情。这样的人，舍弃那真正的、属天的幸福与平安；对世人既没有博爱，也没有恩慈。他既不把道德当成纯洁、终极价值的事情，也不想要得到上帝的爱。他的眼目看不见永恒。他所思想的尽是这地上的短暂之事。他的心里满了败坏、堕落。他把自己拴在这地上，把自己的心系于那些低俗、可鄙之事。他的生命里满了欺谎与腐败。他在死亡面前毫无安慰。他的良心见证他的罪恶与堕落。他的灵魂里总是得不到满足，总是无比贪婪。他在这个世上的生命、在死亡的面前充满了凄惨和悲哀；更何况，他将要面临上帝的公义审判与地狱的永远刑罚。

而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和死亡却不是如此。他的一生是不完美、充满缺陷的；他曾经经历和面对过许多罪的引诱试探。然而，他的生命中却从未缺少过一个最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和信靠。他人生价值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他的目的和归宿是在哪里。他在这世上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为提升他、炼净他、祝福他。人的灵魂是不朽的，是非物质性的，并将要面临那即将来到的终极审判。基督徒在此生所经历的一切事情，都是为永生而预备好自己，可以承受那永远的国度与快乐。他在心里深深地尊敬上帝，热爱上帝，以上帝为自己的终极审判者、救赎者。这些信念与原则，反映在他每日的生活之中，反映在他一切的言语行为里。他努力地去除己罪、悔改己罪。他的一切追求，他在信仰中的一切职分，他的一切交谈、读书等等，都是为了这件事情。他看重自己的灵魂，远胜过看重自己的身体。他看重未来的美好之事，远胜过看重此生的短暂欢愉。他渴慕上帝，并在自己的职分中勤勉地服事。基督的恩典、救恩，圣灵的恩膏和影响，使他可以欢欣地盼望那即将到来的永恒天国。他的心中充满了对上帝的爱，充满了对于耶稣基督的挚爱和倚靠盼望。他在各样的事情上，大大地得着能力与力量。无论是什么事情，他都能够在其中得到属灵的幸福。

以上，就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在面对永恒之事时的巨大差别。他们的生命，都是完全地受到他们不同理念的深刻影响。这种不同的影响效果，在他们将死的时候，清晰地、彻底地彰显出来。一个非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越长，就会在这个世界上陷得越深，在死的时候就会越舍不得、越挣扎。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越长，就会越做出美好的生命信仰见证；就会越渴慕那美好的永生国度；死的时候也会越平静安详，满有恩慈。

此世的时光，使一个非基督徒的生命沉陷，使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提升；使一个非基督徒的生命充满忧忧戚戚，使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充满喜乐感恩。在临死的时候，一个非基督徒拼命地、徒劳地想要抓住这个世界；一个基督徒则更加渴盼那美好的目的地，那属天的国度。

还有什么，是比上述不同的鲜明对比更加能够显明，在非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哪一个有真理呢？！在他们两者之间，一边是光明，另一边是黑暗！无论一个非基督徒声称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什么，有一点他是根本不确知的，那就是——死后的生命、未来的世界将会怎样。他可以炫耀自己在这个世上的成就以及荣耀，然而他却永远也不会知道，在那永生的国度、上帝的国度，将会是何等幸福而美丽。他活着的目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满足自己自私的欲望，财富的欲望，肉体的情欲，属世的野心。而在另外一边，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目的，不是为了此世的物质性财富、情欲与骄傲，而是为了那永恒之中的美好。他所盼望的目标，是那更高尚、高贵、纯洁的目标。他的生命中刻着属天、属神的印记。当他面临死亡的时候，永生的盼望使他满有欢欣。

——————————————

上述对比是清晰、毫不含糊的。我们从那些实际的人生中，从他们的书作中，从他们的死亡中，都能够看见这个清楚的结论。我们在上面考虑的是两类纯粹的例子，即，那些完全离弃上帝的人，以及那些完全信靠上帝的人。从他们的生命与死亡中，我们能够看见清晰的趋势，即，基督教信仰在人生命中的巨大的美好影响。我们越详细地考察他们的人生，越近距离

地观察他们如何面对死亡，就越能够看清楚基督教信仰是何等宝贵，其中包含着多么伟大的真理。

我能够看见，一个谦卑基督徒的心中有着何等的喜乐。他随时随地都能够与他的造物主、救赎主交谈、交通；他有着完全的自由，不惧怕痛苦，也不担心环境时事的变迁；他的生命总是日臻完美；圣灵在他生命中结出美好的果子。他总是尽己所能地去行良善之事；在职分的道路上享受上帝同在的美好。相比之下，那些没有信仰之人的生命，是何等可悲、可怜、可鄙。

无疑，那些非基督徒在面对死亡时的悲惨光景本身，就恰恰证明了基督教信仰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多么宝贵；圣经的启示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甜美。

———————————

请想一想在每一个时代那些智慧良善的人们，以及那些遥远地区和国家的人们；他们中有很多人都一致地来到圣经的面前，聆听上帝的启示话语。他们中有很多人严肃认真、满有才华、思想深刻、内心公正。他们竭尽努力地想要明白基督教信仰中的真理。他们的圣洁生命、在患难中的忍耐、幸福的死亡（很多是为殉道而死），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他们以自己的生命见证了他们真诚的信仰。

而在每一个时代、以及那些遥远地区和国家中，也有很多离弃上帝的人。请看他们的秉性、犹疑、习惯、脾气、追求、罪恶的生命、可怕凄凉的死亡。请看他们的人生哲学，常常落入彻底的无神论之中。请看他们的心灵和灵魂，是多么匮乏贫瘠。请看他们的荒淫、讥讽、冷嘲热讽，言语行为之中的玩世不恭。请看他们心中的不纯洁、肉体情欲、骄傲、自大、虚伪、欺谎。请看他们所写的书是多么虚浮、没有真正的智慧，是多么显出他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请看他们的死亡。请把他们的死亡与基督徒的永生比较一下。

请告诉我，在他们中间，哪一个是拥有真理的呢？你觉得他们哪一个会得到上帝的祝福与同在呢？

一个相信圣经的人，与一个反对圣经的人，有着多么不同的人生！一个严肃认真查考和学习圣经，耐心地寻求真理的人，会得到何等的智慧与幸福！他在圣经中将要看见真理。圣经将要使他的生命成为圣洁的样式，使他成为一个有极大价值的人。圣经将要使他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也能有平安。在这个风雨飘摇、混乱与黑暗的世界，圣经就仿佛是我们的磐石、指南针。请睁开眼睛，看一看这个世界以及我们人生的真实本来面貌是什么。请思考本书中所讲述的那所有关于基督教信仰的证据。请以真诚和顺服的心来到上帝的救恩中。请思考我们应当怎样对待死亡。死亡已经临近了。无论一个人多么轻佻、玩世不恭；也无论一个人多么顽梗、刚硬、不思悔改；没有人能够躲避死亡。没有什么语言，能够真正地描述一个人面临死亡时的心境。那些心中没有信仰、没有上帝的人，是多么可悲。他们在此生没有平安，在死亡面前更没有任何盼望。

请记住，你若想在死中与义人联合，就必应当与他们在生中联合。你应当效法他们的生命榜样。你愿意作出怎样的抉择呢？请趁现在还有时间的时候就做出选择。请选择智慧与真理。一个不圣洁、污秽的生命，必定会远离上帝。基督教信仰使人趋向良善与圣洁。我们是否在上帝面前顺服，决定了我们最后会成为哪一类人。

我们本章的重点以及关于基督教信仰的所有内在证据，就是要宣告——那统管宇宙自然和人间道德世界的上帝，将要审判全地的人。人在生命中若没有真诚地归向上帝，人若没有真诚的基督教信仰，人的生命中若没有上帝的印记，那么，人就不能有上帝的赐福，更不能有上帝的同在。上帝喜爱人的美德，憎恶人的罪恶；喜爱人的谦卑，憎恶人的自傲。那背离上帝的人，成为自己的敌人；他的罪，成为了戕害自己的武器。因此，罪人的罪不能证伪上帝，而恰恰相反，正好证明了上帝的全能、圣洁，证明了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真理性。真诚寻求上帝的人是有福的。顽梗背离上帝的人，是不幸福、不智慧的；他的生命中没有终极的道德价值与原则。

++

====================

一战鸟瞰

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西方世界、欧洲国家很多人处于乐观情绪之中。许多欧洲人在人文主义、自由主义【即，认为人类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而得到"自由"，不需要什么宗教信仰的"束缚"】的思想大潮中，乐观自信地认为明天会更好，人类会不断地自我进步、自我提高。然而，当他们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所看到的，却是经济大萧条，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上，经济大萧条、一战与二战，正是由于人的盲目自信、自义、自私、自利所导致的；正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的贪婪、不公、傲慢、自大、罪恶。

引述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0%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

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次大战、一战，或称欧战；英语：World War I、WWI、Great War、First World War；法语：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德语：Erster Weltkrieg；俄语：**Перв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是一场于1914年7月28日至1918年11月11日主要发生在欧洲的大战，然而当时的列强殖民地互相牵扯下，战火最终延烧至全球，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被卷入这场战争，史称"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场战争被直接称为世界大战。由于主要战场于欧洲大陆，故此20世纪早期的

中文经常称之为“欧战”。

战争过程主要是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的战斗。德国、奥匈帝国 、奥斯曼帝国及保加利亚属于同盟国阵营。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意大利、美国、塞尔维亚、中国等则属于协约国阵营。战争的导火线是发生于1914年6月28日的萨拉热窝事件，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及其妻子索菲亚被塞尔维亚激进青年普林西普刺杀身亡。战线主要分为东线（俄罗斯对德奥作战）、西线（英法对德作战）和南线（包括塞尔维亚对奥匈、保加利亚作战的巴尔干战线，奥斯曼土耳其对俄国的高加索战线，奥斯曼土耳其对英国的美索不达米亚战线、奥斯曼土耳其对英国、阿拉伯的巴勒斯坦战线等等），其中以西线最为惨烈。这场战争是欧洲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战争之一，约6,500万人参战，约2,000万人受伤，超过1,600万人丧生（约900万士兵和700万平民），造成严重的人口及经济损失，估计损失约1,700亿美元（当时币值），除美洲与亚洲外，欧洲各国均受到重创，特别是战败国如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等还要面对巨额赔款，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二战鸟瞰

引述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7%AC%AC%E4%BA%8C%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

第二次世界大战（英语：World War II，简称WWII或WW2；法语：Seconde Guerre mondiale；德语：Zweiter Weltkrieg；俄语：**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日语：第二次世界大戦だいにじせかいたいせん），简称二战；是一次在1939年至1945年所爆发的全球军事冲突，整场战争涉及到全球绝大多数的国家，包括所有的大国，并最终分成两个彼此对立的军事同盟—同盟国和轴心国。这次战争是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动员1亿多名军人参与这次军事冲突。主要的参战国纷纷宣布进入总体战状态，几乎将自身国家的全部经济、工业和科学技术用于战争之上，同时将民用和军用的资源合并以便规划。包括有犹太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肃清大屠杀、卡廷森林屠杀案、马尼拉大屠杀、战争中日军对中国军民进行细菌战、以及最终美国对日本首次使用原子弹等事件，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有纪录以来最多大规模民众死亡的军事冲突，全部将近有6900万人因而死亡，让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了人类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多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世界局势，英国、法国等欧洲殖民帝国衰落，美国和苏联则取代欧洲殖民帝国的地位成了新的超级大国并在战后形成两强格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

在1931年9月，日本便侵占中国东北，建立傀儡国家满洲国。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更爆发抗日战争。不过大多人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定为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开始，这次入侵行动即导致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然而德国在入侵波兰后开始尝试在欧洲建立一个帝国，自1939年到1941年为止，发动一连串战争使德国几乎占领欧洲大部分的地

区，并和意大利、日本签署三国同盟条约。而保持中立的苏联在和德国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后，也开始侵略，陆续占领或吞并在欧洲边界的6个国家，在这之中也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所占领的波兰领土。英国及英联邦的成员国则持续与轴心国作战，并在北非和大西洋海上爆发多次军事冲突，而这也使英国成了欧洲少数仍继续抵抗德军入侵的主要武力之一。1941年6月，欧洲的轴心国决定撕毁和苏联的合作约定，联合入侵苏联，这次攻势也使得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地面行动爆发，也就是巴巴罗萨行动，但在之后让几乎统辖整个欧洲地区的轴心国投入大量军力来维持作战优势。

到了1941年12月，亚洲轴心国的大日本帝国为了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获得领导地位，发动珍珠港事件，袭击位于太平洋的和落于的英美殖民地，导致美国向轴心国宣战，很快地于西太平洋和东亚战区获得了主导权。但到了1942年时，日本开始在一系列的海战中战败，在中途岛海战损失四艘航空母舰，欧洲的意大利也陆续于北非战役及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败退，这些都使暂时轴心国停下进攻的脚步。1943年时，意大利在西西里岛战役被同盟国部队经其殖民地突尼斯登陆打败投降，推进至意大利南部，国内政变，首相墨索里尼失势，导致分裂成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德军在库尔斯克会战战败后失去对于东线的主动权，同时美国在太平洋战区中获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自此轴心国逐渐失去主导权并开始将布署于各地的前线部队进行撤退。到了1944年时，盟军决定登陆法国诺曼底以开辟第二战场，而苏联除了收复过去被占领的领土外，也开始转往进攻其他轴心国。在苏联部队攻入柏林后，德国元首希特勒自杀，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最终在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的情况下宣告结束。而另一方面美国在1944年和1945年成功击败了日本海军部队并陆续占领数个重要的西太平洋岛屿，这使得日本列岛随时面临同盟国部队入侵的危机。最后在美军分别于广岛市和长崎市投下原子弹并造成大量日本平民死亡。1945年8月8日苏联进攻日本控制下的中国东北地区，8月14日日本跟进宣布愿意接受无条件投

降的条件，而随着亚洲战事的停息也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1945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胜利宣告结束。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一战中的美国

以下引述美国国务院网站文章“美国的参与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进程” https://share.america.gov/zh-hans/u-s-changed-course-world-war/

美国曾一度置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之外。这对竞选连任的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总统在1916年11月大选中的险胜起了一定作用。但在五个月后，威尔逊总统呼吁美国向德意志帝国(German Empire)宣战，他说，“为了民主必须让世界安全。……我们不图私利。我们无意征服，无意主宰”。

100年后的今天，美国重温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关键作用；美国的参与使这场造成欧洲生灵涂炭的战争走向结束。

1914年，一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刺杀了奥地利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由此触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军队占领

了比利时和法国部分地区，期待速战速决，一举获胜。但这场战争变得旷日持久，并且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

美国虽然同情英国、法国及其盟国，但在战争最初几年里保持中立。美国与协约国(Allies)国家保持着有力的商业关系，英国海军努力通过保障对海上的控制，阻止德国获取重要物资。德国试图利用潜艇(U-boats)突破协约国海军的封锁，并击沉了军舰、商船和客轮，其中包括1915年击沉丘纳德轮船公司(Cunard)邮轮“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导致1198名乘客丧生，其中有128名美国人。

促使美国做出参战决定的最后因素，是德国重新展开无限制的潜艇战【即，德国的潜艇无限制地击沉大西洋上的许多美国民用商船、客船、等等】以及被截获的齐默尔曼电报(Zimmerman Telegram)。

当美国于1917年4月开始参战时，美国陆军(U.S. Army)只有13万人，并且没有坦克，飞机也寥寥无几。联邦国会迅速批准了兵役法以扩充兵源。一位德国海军上将曾嘲笑说，有德国潜艇在中途拦截，不会有多少美国作战部队抵达欧洲。

但美国军队成功登陆欧洲。一位美军上校在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American Revolution)的法国侯爵拉法叶(La Fayette)位于巴黎的墓前宣告：“拉法叶，我们来了”。

长远影响

持续三年多的堑壕阵地战使协约国兵力损伤极其惨重。美国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尤其是在德国军队发动最后进攻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远征军(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 的到来，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巩固

了协约国的阵线，严重打击了德军士气。

当时共有400万美国人在军中服役，其中200万被派往欧洲战场，140万在前线作战。他们在第二次马恩河战役(Second Battle of the Marne)中协助挫败了德军的进攻，并参加了康蒂尼镇(Cantigny)、蒂耶里堡(Château-Thierry)、贝劳伍德(Belleau Wood)和圣米耶勒等著名战役。

威尔逊总统的传记作家斯科特·伯格(Scott Berg)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美国：美国人参战纪实》（World War I and America: Told by the Americans Who Lived It）一书中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永远地改变了美国的民族性格。在战争初期向遥远国度提供了人道救援之后，美国基于道义而采取了进一步行动，为和平与自由而举国投入。”

这场战争确定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在国内，战争扩大了政府的规模和权限，在成千上万妇女从军或接替辛苦的工厂岗位后，妇女获得了选举权。曾在法国英勇作战的非裔美国人(African-American)，回国后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反种族隔离斗争。

终极奉献

截止1918年11月11日的“停战日”(Armistice Day)，共有900万军人和500万平民死亡——不仅是战火，流行病和饥馑也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

虽然美国作出的牺牲不能与其他主要参战国相提并论，但美国的阵亡将士达116516人，其中包括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的小儿子、在法国上空被击落遇难的空军上尉昆廷·罗斯福(Quentin Roosevelt)。

欧洲和美国各地城乡都建有纪念当地阵亡将士的纪念碑。1921年11月11日，沃伦·哈丁(Warren Harding)总统在阿灵顿国家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为“无名烈士纪念碑”(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举行落成典礼，一位远征军步兵的遗体被安葬于此。哈丁总统说，“我们不知道他的家乡在哪里，但我们知道，身为一名为国捐躯的美国人他的荣光永在”。

（引文结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战以前

____

十九世纪，欧洲的辉煌

从十六世纪初开始的轰轰烈烈的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在很大的程度上，把西欧各国从罗马天主教廷的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在德国、荷兰、英国、北欧各国等地，都掀起了以马丁路德、加尔文、慈运理、等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敬虔基督徒们所领导的基督教更正运动。他们高举“五大唯独”的口号，即，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反对罗马天主教廷与教皇的权威与专制，大力地印刷、出版、传播圣经，把圣经翻译成各国语言。这些基督教改革运动，在许多方面深深地影响了西欧各国；同时，罗马天主教廷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和改革，因此，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部欧洲国家也逐渐开始了现代化改革的历程。

十六世纪的基督教改革运动所导致的两个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在十七世纪中，现代民主主义与现代科学思想体系的诞生。现代民主主义之政治、经济、法律思想的诞生，以约翰•洛克（《论政府》）、卢梭（《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亚当•斯密（《国富论》）等人的思想和著作为代表【这些思想，都与圣经的广泛传播，以及基督教信

仰的思想与文化土壤有着深刻的关系；详情请见《论民主》】。现代科学思想体系的诞生，则以弗兰西斯·培根的科学思想哲学著作，以及牛顿与波义耳的著作所导致的现代物理学与现代化学的诞生为代表【现代科学思想体系的诞生，也与圣经的广泛传播，以及基督教信仰的思想与文化土壤有着深刻的关系；详情请见《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同时，从十七世纪初叶开始的英国清教徒运动，导致了大批清教徒们在十七世纪上半叶离开英国、移居到北美的新英格兰地区，为十八世纪美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十七世纪开始，现代科学思想体系诞生以后，导致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爆炸性发展。现代民主主义思想的诞生所导致的政治性改革，席卷了欧洲大陆，使得欧洲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深刻的现代化变革。

这些变革，导致了整个欧洲在短短两三百年间，即，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三百年中，就崛起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和文明的地区。从十六世纪开始，欧洲告别了自从四世纪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的、将近一千两百年的中世纪时代，告别了田园牧歌式的中世纪生活，也告别了中世纪的、恬淡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生活观念，开始了如火如荼的奋发向上、勤奋工作、大变革与大复兴的时代。

在这个轰轰烈烈的过程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好坏参杂；其中的精华与糟泊，都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方式，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例如，在十六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内部纷争，导致了长达几乎四十年的、法

国内部的宗教战争。在法国，在效忠罗马教廷的天主教徒与那些想要进行基督教改革的新教教徒们之间，以及法国内部各个地区以及各个阶级之间的各种政治势力的争斗，导致整个法国内战中数百万人丧生。后来，1789年至1799年的法国革命，推翻了君主政权，然而，却使国家陷入了更加混乱、淫荡、不敬虔的状态之中。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在欧洲四处出击，与俄罗斯等国开战，曾经一度占领了欧洲许多国家民族的领土，给欧洲各国带来了许多血雨腥风和灾难，也为后来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从欧洲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

1562年至1598年的法国内战、宗教战争【战争一开始时候的触发点，是由于基督教改革人士过于激进，从而间接导致了一位良善的、很有名望的法国人士被暗杀】，——最终的结局是，法国的天主教势力得到了彻底的胜利。这导致了成千上万的法国基督教更正运动人士被杀害；更多的人则离开法国，到其他欧洲国家避难。后来，其中很多人移民到北美大陆，进入到今天的美国以及加拿大东海岸等广大地区。而在法国本土，天主教继续统治着人们的心灵与信仰，继续封闭着圣经、使普通人无法阅读圣经，继续垄断着教会组织体系结构。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才有所改变。

与此同时，发源于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之城邦的文艺复兴运动，在十六世纪、十七世纪的法国发扬光大。从那个时期开始，法国诞生了许多人文主义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这些人高举人性伟大光辉的旗帜，甚至高举无神主义的大旗，主张离弃基督教信仰，拥抱——人文主义思想、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无神主义、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思想等等等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今日，使得法国成为了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大本营、思想发源地，成为西方许许多多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们所向往的

“圣地”。所谓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是指，他们在信仰上并没有对于上帝、对于圣经、对于耶稣基督的真挚信仰，而是片面地强调人性之可贵与尊严，并进而推崇人本主义、包容主义、放纵主义、等等。在基督教信仰中，包含着重要的两个方面，即，憎恨罪、爱罪人。然而，这些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们仅仅是强调爱罪人，但却严重地忽视了公义、圣洁、以及对于罪恶的恨恶。在社会实践与政治活动中，他们往往主张用乌托邦思想、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人性光辉之思想等等作为口号来集结革命力量；但是，在政治现实中，他们的行为与思想所导致的，却常常是专制主义政权的后果。遗憾的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留学生们所接触到的、所引进中国的所谓西方“先进思想”，正是这一类以法国思想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思想体系中的糟泊与放荡元素；例如，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以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的、到法国进行所谓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参与共产国际运动的那一代人，带回给中国的，正是那种反传统、反基督教信仰、高举所谓乌托邦思想大旗的人士们。

以此同时，德国、奥地利等日耳曼国家政治体系在各国政治斗争与变革的同时，其学术界迎来了以黑格尔、叔本华、费尔巴哈、尼采、马克思等等一大批思想家人士们为代表的，自然神主义哲学【即认为，上帝在创造了世界以后就撒手不管了，而是通过自然规律法则来统治世界；上帝与人间世界之间，并没有紧密的互动和联系】、泛神主义哲学【即认为，神就是世界，世界就是神；神仅仅是一种没有“位格”的、无知无觉的、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言的，一种规律、因果、道、等等而已】、辩证法哲学、实证主义思想、甚至无神主义思想、物质主义思想等等。同时，在德国等文化体系范围内，涌现出一大批主张所谓对圣经进行高等批判的人物们；他们从各个角度，拼命地试图质疑、挑战、歪曲圣经的内容，试图解构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马丁路德在德国所掀起的基督教改革运动，虽然使许多德国敬虔的基督徒们真正地明白了圣经、真正地认识了基督救恩，

但是，在整个德国范围内，却并没有使得德国人普遍地具有敬虔信仰的面貌。反而，在政治斗争的大潮下，德国人普遍的信仰面貌，变得更加远离上帝、远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这种状况，更进一步地促进了德国民族的自高自傲、好勇斗狠、民族自大主义，并导致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与英国之间的经贸发展的激烈竞争，以至于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势力集团所引发的、牵扯到德国与俄罗斯之间长期争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此，我们会在下文进一步详细记述。

但是，我们必须公道地指出，虽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前，在欧洲有那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总的来说，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三百多年时间里，是欧洲各国的黄金时期；现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与爆炸性发展，不仅给欧洲各国带来了生活上的巨大变化、经济上带来了巨大财富，而且，使得欧洲各国中产阶级得到了巨大发展，使得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总的来说变得更加丰富、健康、积极、向上。

到十九世纪末，整个欧洲洋溢着一种非常特别的、弥漫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境内的一种强烈乐观主义情绪。无论是知识分子们、还是普通的劳工阶层，都坚信，人类已经进入了奋发向上、和平繁荣、天下一家的光明轨道。在欧洲，不论是哪一个国家民族，不论是哪一个政治思想派别，不论是持什么样的政治主张、思想哲学，人们都普遍地、乐观地相信，明天会更美好；他们都认为，在人类面前，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欧洲各国大兴土木、大修铁路、等等，使得普通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各个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得到巨大的发展。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德裔丈夫的推动下，在欧洲各国的积极响应下，人类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开始举办。法国建起了高大雄伟的、前所未有的、耸入云霄的、金属结构的埃菲尔铁塔；这一切科学技术

的成就，更让世人觉得，——人类已经几乎可以无所不能；天下大同的世上天堂，马上就要来到。

____

十九世纪，英国的辉煌

在过去五百年以来，在欧洲各国相继兴起的历史与兴衰过程中，英国的历史最为独特，也最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仔细思考。

在十六世纪以前，英国还是欧洲各国中的一个"小不点"。她并没有广阔的国土，也没有众多的人口，而基本上是一个处于偏远岛国的、人口稀少的、以放牧和剪羊毛为经济支柱的落后农业国家。那时，英国同西欧、北欧内陆的很多国家一样，是罗马教廷统治下的君主政权体制。君主的统治权威，来源于罗马教皇的支持和授予。在天主教体系下，罗马教皇被看作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罗马教皇的旨意，被看作是与圣经有着同样的权威性。那时，在中世纪一千二百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内，英国同欧洲许多国家一样，还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在英国境内，实际上有四个政治势力集团所掌控的地区，即，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此时，法国、西班牙、以及罗马附近的、今天意大利境内的各个城邦，是欧洲境内比较强大的国家；而在北方，则是德国、奥地利、荷兰、瑞士等城邦政体系统，以及丹麦、瑞典、芬兰等小规模的邦国系统。

欧洲历史与中国等其他地区历史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在于，——在欧洲整个中世纪上千年历史中，除了十字军东征的谬误以及几次严重的瘟疫以外，欧洲、尤其是西欧各国基本上是和平安宁的。在欧洲各国历史上，尤其是在中世纪时期，基本上没有很多严重的、频繁的、改朝换代、大规模战乱、生灵涂炭的局面。因此，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君主政体中，都是所谓万世一系的，即，在君主延续政权的血脉传承过程中，虽然也会时时有争议，但是基本上不涉及大规模的战争和改朝换代、以及大规模的人口杀戮。换言之，今天很多国家的欧洲君主，包括英国的君主，就都是一千多年以前那些国家地区的君主的直系后裔。

【相比之下，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三百年左右就会发生至少一场重大的改朝换代，并因而导致大规模的、全国范围内的战争，甚至导致生灵涂炭、极多数量的人口被杀害。据不完全统计，自从秦始皇时代以后，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发生了十四次大规模人口灭杀的时代。在每一次大规模人口灭杀过程中，整个中国的人口剧减；在很多地区，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人口都被屠杀净尽。例如，在中国明末清初的时代，陕西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率领陕西农民部队杀入四川，大规模屠杀了四川当地人，导致成都八十万人口最后被杀到只剩下八户人。整个四川地区的人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被基本杀光，以至于清朝初年产生了“湖广填四川”，即，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的一些人口迁移到四川定居。因而，今天的四川人的祖先，其实并非是古代四川人，而是古代的湖广人。同样，在江浙一带，当清朝满族八旗军队来到的时候，也发生了著名的、多次的屠杀事件。在清朝初年，在整个中国大地上，所有人都要面临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选择；即，每一个中国成年男子都要决定，是否要像满族人那样剃掉前脑的头发；如果不剃头，就要被砍头。在明末清初因战乱而死的中国人，达到数千万、甚至上亿人的数量。而这仅仅是中国历史上十三次人口灭杀的最后一次。在前面的十二次中，例如，在秦汉交替的时代，或是五代十

国的时代，或是晚唐时代、北宋南宋过渡时代、宋末元初时代、元末明初时代、等等，都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数量的灭杀。】

在十六世纪以前，英格兰的君主虽然是万世一系的（直到今天的英国君主政权也是如此），但是，英国本身，并非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恰恰相反，是一个非常贫穷、封闭、落后的国家。在当时的英国境内，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是天主教体系中的神职人员或是修道士人员；他们往往不参加生产劳动和经济活动，而常常是好逸恶劳、甚至好吃懒做、有着各种各样的腐败之事。他们拥有数量巨大的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出租给那些贫苦的普通英国百姓耕种。这些英国农民要把土地出产中的很大一部分上交给这些天主教人员，而自己只能以剩下的部分来维持自己家庭的生活。同时，那些英国贵族们、庄园主们也是如此，拥有数量巨大的土地，并把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

这种局面，自从十六世纪中叶的英王亨利八世执政期间开始，发生了逐渐的、但却是深刻的改变。英王亨利八世毅然决然地与罗马天主教廷划清了界限，把英国境内原有的天主教体系改变为所谓英国国教教会体系，而英国国王则成为这个英国国教教会体系的元首。更重要的是，以丁道尔英语圣经翻译为基础的官方英语圣经，开始正式出版发行。圣经的广泛传播，深刻地改变了许多英国人的思想、精神面貌和信仰状态，使许多英国人开始真正地明白，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恩典，是多么奇妙美好、多么大有能力。这催生了十六世纪末开始的、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下半叶的、一百多年的英国清教徒运动。清教徒运动直接导致了以五月花号天路者们为代表的、为引领的，成千上万清教徒们迁移到北美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运动。在英国本土，清教徒运动直接导致了十七世纪上半叶的威斯敏斯特大会与威斯敏斯特信条的通过，更直接导致了十七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光荣革

命的胜利。所谓光荣革命，是一个基本上没有流血的、和平的过渡过程，使得英国正式进入了君主立宪框架下的民主政治体制。【英国的光荣革命，与一百年后的法国革命有着天壤之别的巨大不同。后者导致了法国君主政体的灭亡，标志着法国进入了现代时代中的政治大动荡的时代。从法国革命开始至今的三百年中，法国政府经历了至少十五次的改朝换代，一直到二战以后，在美国等领导下，法国政治局面在总算基本上稳定下来。但是，直至今天，法国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系统中，仍然充满着许多危机四伏的局面。对此，我们将会在本书下册有所提及和讨论。相比之下，美国的独立战争与法国革命大约发生于同一个时代，而美国的政体从那时起就一直延续至今，仍然是在使用着同一部宪法。事实上，在法国革命的一百年前，在十六世纪末的、惨烈的法国宗教内战中，就已经埋藏了很多后来的危机线索。】

今天，很多当代政治学者把现代民主主义的发源点，看作是十三世纪英国通过的大宪章。从民主主义制度的政治学角度而言，十三世纪的英国大宪章的确有很重要的积极正面意义。但是，大宪章本身，仅仅是英国少数贵族阶级与英国国王之间的一个和平协议；其实质是，英国国王必须要尊重各地贵族的合理相应权益。固然，英国大宪章为后来的英国民主制度变革奠定了良好的先例基础，但是，我们必须在这里清晰地指出的是，从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的四百年中，英国国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面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整个英国仍然是处于贫穷落后、内部不断有纷争的状态。这种局面，直到十六世纪以后，直到英国脱离了天主教，直到英语圣经在英国广泛普及、清教徒运动大幅度展开以后，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自从英国光荣革命胜利以后，英国开始全面地实行议会民主制度；在各个

方面而言，英国进入了全面飞速发展、腾飞的黄金时期。甚至，英国的这些发展，不仅对其本国产生了巨大的变革作用，更对于整个人类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积极的引领作用。

在科学技术方面，在圣经的直接影响下【详情请见《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自从——培根的《圣思录》于1597年发表、《大变革与大复兴》于1620年发表、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于1687年发表、以及波义耳《怀疑派的化学家》于同时期发表、英国皇家科学院于十七世纪末成立、人类的现代物理学与现代化学得以开启，——英国的许多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们，与欧洲大陆的那些现代科学开启者们一起，为人类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然而，科学技术给人类所带来的，既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

自从现代科学革命开启以后，英国在欧洲诸国内，科学技术率先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快速的发展。这些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生产力与经济贸易的大幅度、飞跃式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变革，促进了社会中大量的中产阶级的出现，促进了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发展与成熟。

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等思想领域与社会实践领域的建树方面，英国也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贡献，比如约翰洛克的民主政治思想，促进了美国的成立和发展，更促进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中的、民主自由政治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和发展【详情请见《论民主》】。

经过了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将近三百年的发展以后，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已经处于黄金的巅峰时期，成为了世上最富有的国家。在十九世纪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内，都是维多利亚女王担任英国的最高名誉元首。英国从一个贫穷弱小、一穷二白的偏远国家，崛起成为了所谓“日不落帝国”。英国政治军事权力所掌控的疆土范围，甚至超过了古代时期的罗马帝国的疆域。英国的海军驰骋天下，所向披靡；大英帝国的海军学院，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著名的军事院校。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等等，都成为世界各国留学生前往深造的目的地。

到十九世纪末，英国达到了最辉煌的时代。然而同时，在光鲜的外表之下，在英国体制内外，也存在着许多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一方面，英国的强盛引起了世上许多国家的艳羡和竞争。

尤其是，德国民族在统一以后，对英国很不服气，拼命地想要努力急起直追。在制造业、航海业、科技行业、经贸方面，德国都处处想要与英国争一个长短。

远方的、尚处于农奴时代的俄罗斯，一面在进行着现代化改革，一面始终以东正教的中心自居。许多俄国人虽然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与天主教体系内的许多天主教人士们一样，其实并不真的明白基督教信仰的实质，并不真的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与十字架救恩；在他们的心中并没有真诚的、热忱的、饥渴慕义的信仰。而是，他们仅仅是把基督教信仰当成了表面的、传统仪式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这就是俄罗斯等许多欧洲国家内

所常常表现出的信仰虚伪主义现象。在俄罗斯体系与德国、普鲁士体系之间，也常常存在着许多矛盾、互相不服气的事情。

笃信基督教改革思想的英国，与被天主教牢牢控制的法国之间，也一直处于争竞甚至常常战争的状态。在世界范围内，英国有许多友邦，也有许多敌人。在欧洲各个国家之间，总地来说，既有着合作交流，又有着许多争竞；这些矛盾，在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不断地爆发出来。

另一方面，在英国体系内部，也有许多暗流涌动。在学术界，各种各样的思潮不断涌起；在这些思潮中，与法国思想界一样，有许多不敬虔的、离弃基督教信仰的成分，例如大卫休谟的怀疑主义、罗素的无神主义倾向、等等。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达尔文进化主义思想，不但给英国带来的巨大冲击性影响，更给后世的全世界人的思想与世界观、价值观、“物竞天择”观念、等等带来了深刻了影响作用。

以上种种十九世纪的事情，后来将会在二十世纪继续发酵，其影响力甚至在今天的二十一世纪，仍然能够清晰可见、甚至愈演愈烈。我们在本书后文中将要进一步深入分析讨论。

____

为什么今天英语是世界各国之间最广泛普遍使用的语言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外交界、航空界、航海界、宇航界、国际工程界、国际文化与艺术界、医学界、等等，毋庸置疑，英语是最广泛普遍使用的语言。

这既是由于英国在过去从十六世纪以来的腾飞过程中对于世界的科学、技术、经济、贸易、航海、航空等方面的贡献，也是由于美国在过去两百年来对于世界的影响。尤其是，我们在下文中将要更详细地讲述美国在二十世纪中对于整个世界的广泛影响。这些事情，都从各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奠定了英语的影响力地位。

____

十九世纪中，一些暗流涌动的隐患

正如前文所述，对于整个欧洲来说，虽然十九世纪是一个黄金时代，但是，其中却也暗藏了许多危机。这些危机主要是围绕着几个欧洲大国民族势力集团之间的矛盾与竞争关系而产生的。在这些矛盾竞争关系中，有的是不义的一方，有的是正义的一方；但更多的时候，则是竞争各方都包含着义、也包含着不义的复杂政治局面。在这些事情中，各种各样人的心思意念也都显明了出来。那些敬虔信仰的人们，在复杂政治环境中仍然显出了行公义、好怜悯、公义恩慈的品格。而那些以此世的各样属世利益与民族国家本身为自己心灵的终极归依的人们，则显明了他们内心的罪恶、不

公、不义、欺谎、贪婪、好勇斗狠、胆怯懦弱、吝啬、等等。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各国中涌动着的最大的危机与暗流，就是背离基督教信仰的国家自大主义、民族自大主义、物质主义、存在主义、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进化论主义，以及与文艺复兴密切相关的人性主义、放荡主义，等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直接导致了二十世纪从德国开始蔓延的法西斯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主义、唯物主义哲学思潮，则在法国、德国等左翼知识分子圈子内盛行了数十年以后，最后，终于在二十世纪初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成功地夺取了俄罗斯国家政权。

____

二十世纪初叶的世界

在经历了十九世纪弥漫于欧洲的强烈乐观主义之后，世界进入了二十世纪。此时在中国开始了风起云涌的反抗清廷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运动。孙中山宣告："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中国的那些民主革命党人看来，只要中国人赶走了满族人、推翻了清朝统治、只要实现了民主，那么，——中国就能够赶上世界的潮流了。这种想法固然不错，但却大大简化了现实世界中问题的复杂性。

二十世纪一开始不久，欧洲、乃至全世界，就被卷入了一场规模巨大的、

史无前例的、超乎所有人预料之外、却又似乎是所有人预料之中的战争，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下引述维基百科中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记述文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0%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于1914年7月28日至1918年11月11日主要发生在欧洲的大战，然而当时的列强殖民地互相牵扯下，战火最终延烧至全球，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被卷入这场战争，史称“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场战争被直接称为世界大战。由于主要战场于欧洲大陆，故此20世纪早期的中文经常称之为“欧战”。

战争过程主要是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的战斗。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及保加利亚属于同盟国阵营。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意大利、美国、塞尔维亚、中国等则属于协约国阵营。战争的导火线是发生于1914年6月28日的萨拉热窝事件，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及其妻子索菲亚被塞尔维亚激进青年普林西普刺杀身亡。战线主要分为东线（俄罗斯对德奥作战）、西线（英法对德作战）和南线（包括塞尔维亚对奥匈、保加利亚作战的巴尔干战线，奥斯曼土耳其对俄国的高加索战线，奥斯曼土耳其对英国的美索不达米亚战线、奥斯曼土耳其对英国、阿拉伯的巴勒斯坦战线等等）。这场战争是欧洲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战争之一，约6,500万人参战，约2,000万人受伤，超过1,600万人丧生（约900万士兵和700万平民），造成严重的人口及经济损失，估计损失约1,700亿美元（当时币值），除美洲与亚洲外，欧洲各国均受到重创，特别是战败国如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等还要面对巨额赔款，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

开战原因

极端民族主义

15世纪以来，居住着许多塞尔维亚人的波斯尼亚省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塞尔维亚在十九世纪初从奥斯曼帝国取得自治，成立塞尔维亚公国后，一直希望将波斯尼亚省并入塞尔维亚公国之内。1875年，波斯尼亚省因饥荒发生内乱，最后内乱蔓延至保加利亚及引起俄罗斯介入，奥匈帝国亦趁机占领波斯尼亚。至1878年讨论巴尔干半岛危机的柏林会议中，虽正式承认塞尔维亚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但却同时承认奥匈帝国拥有对波斯尼亚的管治权。至1908年，奥匈帝国趁奥斯曼帝国发生内乱正式吞并波斯尼亚，这引起塞尔维亚人强烈的仇奥情绪。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族学生普林西普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开枪打死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普林西普是青年波斯尼亚成员，这个组织目标是南斯拉夫的统一和从奥匈帝国统治下独立出来。萨拉热窝暗杀事件引起一系列强烈反应，最终演变成全面战争。奥匈帝国发出通牒，要求塞尔维亚采取行动惩罚肇事者，当奥匈帝国认为塞尔维亚没有做到时，就进而对塞尔维亚宣战。在泛斯拉夫主义和泛日耳曼主义所造成的敌对结盟关系以及种种集体协定防御条约和复杂性的国际结盟关系，使得数周内主要的欧洲列强纷纷加入战争。

普法战争

直至十九世纪中叶，德意志地区仍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十数个大小不一的日耳曼人小邦国组成的“日耳曼邦联”，分裂造成德国国内市场经济无法发展（因为各邦关卡、课税重重，商品无法自由流通），在欧洲大陆也无法与其他列强鼎立，故其中的最具实力的第二大邦普鲁士为了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进而与奥地利、法国等列强争夺欧洲大陆霸权，便领导

日耳曼邦联，于公元1870年奥托·冯·俾斯麦诱发法国开战并击败法国。在这场战争中法国大败，御驾亲征的法皇拿破仑三世被俘。普鲁士大获全胜，后乘势率各邦国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德意志帝国。法国战败后，被逼签下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所开出条件非常苛刻的和约：《法兰克福条约》规定法国割让阿尔萨斯-洛林予德国，并赔款50亿法郎，普军在收齐赔款前，可驻军于法国。此外，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的登基大典于法国的凡尔赛宫举行，这大大羞辱了法国，挑起德法两国之仇恨。战后法国复仇主义盛行，亦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主因。

巴尔干半岛

自十五世纪巴尔干半岛向来一直由奥斯曼帝国统治，但自十八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在巴尔干半岛内各个民族纷纷争取独立，加上巴尔干半岛位处欧亚交界，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引起欧洲各国介入半岛内的事务，故被称为“欧洲火药库”。1878年柏林会议后，多个巴尔干半岛国家取得独立，各新兴小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发生两次巴尔干战争，并使得奥匈和俄罗斯的冲突加深，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伏笔。
奥匈和俄罗斯向来友好，但因巴尔干半岛的利益冲突令至关系恶化，在1877年，俄罗斯因支持保加利亚独立而向奥斯曼帝国开战，协助保加利亚独立，但战后召开讨论巴尔干问题的柏林会议，亲俄的保加利亚版图大大被削；而奥匈帝国则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取得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的管理权，这令俄罗斯大为惊慌，俄罗斯之后试图以支持塞尔维亚来对抗奥匈帝国的扩张。此后，奥俄的冲突加深，亦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

同盟对立

普法战争后，德国总理奥托·冯·俾斯麦担心法国报复引至德国两面受敌，因此采取结盟政策，以孤立法国。他本来让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及

沙俄帝国结成三帝同盟，可是后来在1878年柏林会议上，俄罗斯因巴尔干半岛问题，而与奥匈帝国发生利益冲突。在奥俄无法相容的情况下，1879年10月德国选择与奥匈在维也纳缔结秘密的德奥同盟。此外意大利在争夺北非突尼斯失败，让法国在1881年兼并该地。为了争取支援，意大利、德国和奥匈帝国于1882年5月在维也纳签订了《同盟条约》，是为三国同盟。

俄罗斯得知德奥两国签订德奥同盟后，十分不满。但俾斯麦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为了保持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于1887年与俄国签订《再保险条约》，德国保证除非俄罗斯主动攻击奥匈，否则德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在俄罗斯与第三国的战争中保持中立。可是俾斯麦在1890年下台后，新任德皇威廉二世不想维持俾斯麦定下的再保险条约，任由条约终止，而选择只与奥匈为盟。法国为打破外交上的孤立，趁德俄关系恶化时向俄罗斯提供资本，实现其工业化后，在1894年与俄国结下军事同盟，是为法俄同盟，于是欧陆出现德奥与法俄两个敌对阵营。

英国自拿破仑战争胜利后，恢复其称为“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不与欧陆国家建立长期的联盟关系。至十九世纪末，英国鉴于法国在埃及、俄国在巴尔干日益扩张，威胁英帝国前往远东的贸易航道，故在1887年2月12日和意大利组成《地中海协定》，互相保证维持地中海、亚德里亚海及黑海的现状，而意大利则支持英国在埃及的行动。经德国首相俾斯麦支持下，奥匈及西班牙均加入协定，是为《第一次地中海协定》，同年十二月，英、奥、意三国商定共同维持近东现状，对抗俄罗斯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影响，是为《第二次地中海协定》，不过两次协定没有明确规定英国承担具体的军事义务，故英国并未放弃其光荣孤立政策。

直至踏入二十世纪，德国海军不断扩增，威胁英国的制海权，英国才着手在欧陆寻求盟友。1904年英国终与法国签订《英法协约》，但此协定并非军事同盟，而是一项解决两国有关殖民地纠纷的协定；相对于德奥同盟或

法俄同盟，其合作无疑是较为松散。不过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此协定充分反映英法坚定的合作伙伴关系。法国之后鼓励英国与俄罗斯结盟，但英国对俄罗斯戒心不亚于德国，直至日俄战争俄罗斯被英国盟友日本打败，英国才放下对俄的戒心，双方终于在1907年结束其殖民地纠纷，签订《英俄协约》。同年，法国、英国和俄国有感德国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扩张，是以组成三国协约。

欧洲从此分为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阵营，因此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都有演变为世界大战的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遭到暗杀而引起的。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____

简析欧洲的政治版图

自古以来，直到今天，欧洲的政治版图与欧洲几个庞大民族集团所组成的分分合合的国家体系，一直很有关系。

其中，英国位于欧洲大陆之外，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组成；相对而言，英国的内部团结状况较好。尤其是，自从十六世纪基督教改革、脱离天主教控制、清教徒运动以后，英国实现了政治、民主、自

由、科学、技术、航海、军事、经济等等各个方面的腾飞，在短短几百年的时间中，从一个曾经贫穷落后的偏远小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势的国家，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其疆域甚至超过了曾经的古罗马帝国。不但如此，在很多方面，英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政治民主制度的建立，更重要的是，英国许多敬虔基督徒们、清教徒们传播基督福音的努力工作，给全世界、全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和各方面的益处。（当然，正如本书中曾经多次强调的，在这些影响中，我们也常常会看到好坏参杂的局面。但是，好的方面不应当遮掩不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也不应当抹煞好的方面。）

在欧洲范围内，仅次于英国实力的，就是德国日耳曼民族。然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德国并非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一直是内部争斗不止、无法团结、一盘散沙。德国人的性格中，往往会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桀骜不驯、傲慢自大。公元四、五世纪，正是那些来自北方的蛮族战胜并毁灭了罗马帝国。【当然，古罗马帝国的覆灭，最直接的原因是由于其自身的腐败、专制、傲慢，导致其逐渐丧失了国家凝聚力和战斗力，因而败于北方民族手下】。当年战胜罗马帝国的那些所谓北方蛮族，正是后来欧洲北部日耳曼人的祖先。

十六世纪上半叶马丁路德在德国体系内各邦国中所开启的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虽然在欧洲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但是，由于德国体系内各邦国的一盘散沙状态，因此，德国境内的基督教改革并没有直接导致像英国内部的那种信仰敬虔运动，更没有在德国内部产生什么大范围的清教徒运动。

这并不是说，德国人中就没有敬虔的基督徒们。事实上，以马丁路德命名的所谓路德宗教会系统，一直是历史上的很有影响力、很敬虔的德国基督徒们所组成的教会群体。

然而，我们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在德国各邦国内，存在着大量的自傲、罪、好勇斗狠、争风吃醋的事情和局面。一方面，德国日耳曼民族是一个勤劳奋进、吃苦耐劳的民族，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常是自以为义，而内心缺乏谦卑的民族。在德国的知识界，从费尔巴哈、叔本华、黑格尔、尼采到马克思，从圣经高等批判（其内容往往是歪曲和否定圣经的权威；而不是在圣经、上帝的话语面前，有一颗敬虔谦卑的心灵）到自然神主义哲学、泛神主义哲学、社会达尔文主义、无神论、等等，都在德国百姓的心灵中起到了很多不好的影响作用。在政治外交上，德国民族，或泛日耳曼主义（包括德国各邦国、奥地利、以至于曾经的奥匈帝国、等），一直与俄罗斯民族，或泛斯拉夫主义（包括俄罗斯、东欧许多国家民族，例如塞尔维亚、南斯拉夫、乌克兰、等等），彼此之间存在着许多好勇斗狠的争斗。当英国崛起以后，德国在很多方面，对英国也充满了负面和敌意的态度，处处想要与英国为敌。

在欧洲范围内，俄罗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等，也在历史上分别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他们各自有长处和短处，优点与缺点【例如，俄罗斯人长于战斗，但却往往在信仰上表现得很虚伪；法国人浪漫多情，但却常常放荡、没有忠贞，更少有敬虔的信仰；意大利人骄傲于自己的历史，但却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并没有基督徒应有的敬虔、热忱与真挚之情；西班牙人勇敢并团结，但却往往喜欢贪图属世之利；等等】；在他们内部，也有很多纷争之事。在他们中间，有敬虔的基督徒，当然更有着许多刚硬不愿悔改、不愿意寻求上帝、不愿意倚靠上帝救赎恩典的罪人。其中，法国、意

大利、西班牙等都是在天主教的影响之下，而俄罗斯等泛斯拉夫主义的东欧国家则经常是在东正教的影响之下。他们的共同点是，在国家社会里的普通民众中间，就一般性而言，由于天主教与东正教都有“封闭”圣经的政策，因此，社会中大多数的人都并不真正地了解圣经中的内容到底是在说些什么。

泰迪罗斯福总统及其历史贡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A5%A5%E5%A4%9A%C2%B7%E7%BD%97%E6%96%AF%E7%A6%8F

西奥多·罗斯福（或译为狄奥多·罗斯福），昵称泰迪（Teddy），中文俗称为老罗斯福，第26任美国总统、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纽约市罗斯福家族出身。

西奥多·罗斯福曾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参与美西战争，1900年当选副总统。1901年总统威廉·麦金莱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他继任成为总统，时年42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他的独特个性和改革政策，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是美国进步时代的领导者之一。

西奥多·罗斯福在总统任期内，对国内的主要贡献是建立资源保护政策，保护了森林、矿物、石油等资源；建立公平交易法案，推动了劳工与资本家和解。

西奥多·罗斯福因成功调停了日俄战争，获得19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是第一个获得此奖项的美国人。在调停过程中，他敏锐地察觉新崛起的日本对美国构成的潜在威胁，同时也认识到：巴拿马运河对美国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能够使美国海军舰队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调动更加快捷，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因此，他在任内竭力推动巴拿马运河工程，并且视其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1908年他放弃争取连任。

西奥多·罗斯福的远房堂弟、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日后也当选为美国总统，故在中文环境里常称富兰克林·罗斯福为“小罗斯福”总统，而称西奥多·罗斯福为“老罗斯福”总统。

西奥多·罗斯福是总统山上四个总统雕像之中唯一的20世纪总统，与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和亚伯拉罕·林肯并驾齐驱。学者们普遍认为，他是现代美国的塑造者。

公平交易：1901年，在罗斯福的第一次对国会演说中，他要求国会立法，对托拉斯的经营活动给予合理的限制。国会并未采取行动，但是罗斯福却发起44个针对大企业的法律诉讼，因此人送外号“托拉斯【即垄断性的企业与组织】驯兽师”。

调解煤矿罢工：1902年，美国矿工联合会发动煤矿工人大罢工，威胁城市取暖燃料供应，引发了一场举国危机。罗斯福召集矿主和劳工领袖在白宫开会，达成妥协，将工作时间从每天10小时缩短到9小时，并且让工人得到10%的加薪，结束了持续163天的罢工。

1904年总统大选时，罗斯福在共和党内的主要对手病逝，遂使他轻而易举获得党内提名，并赢得大选。1904年连任后，他的政治倾向开始偏左。

产业规范化

20世纪初，铁路被视为强大的力量。罗斯福认为政府应加强对铁路运输和跨州贸易的监管和规范，使国会于1906年通过了《赫本法案》，授权州际贸易委员会设置铁路运费上限，同时也禁止铁路公司为关系公司免费运输货物。该法案对消费者和商业企业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同年，他还促使国会通过《纯净食品和药品法》和《肉类产品监督法案》，对养畜和肉类加工企业进行稽查和实施强制卫生标准。

（以上文字引述维基百科）

。。。。

在十九世纪末，美国与许多欧洲国家一样，都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内部危机。这个危机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各个工业、产业的发展、发达；而这导致了资本家集团的势力扩张；然而，这种扩张不但不一定会导致工人阶层的利益，在现实世界中，甚至反而会导致工人阶层不断地受到盘剥和压榨。

显然，上述危机是由于人心灵本质中的罪性所导致的。资本家的贪婪，往往会使他们千方百计地追求最大化的利润，而不是去顾及工人阶层的利益。这种根深蒂固的矛盾，正是导致欧洲大陆许多左翼知识分子青睐马克思主义思想、乌托邦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这种所谓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看似根深蒂固的矛盾，正是后来导致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

在俄罗斯夺取权力的重要原因，——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在整个二十世纪肆虐于世界上非常广大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相对而言，美国却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度侵扰。这部分地是因为，在美国，劳资关系危机并不如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那么严重；在美国的社会经济活动中，虽然也有许多不义，但是，就范围、程度、广度而言，美国的这些不义之事都相对而言是比较轻微的，而绝非是什么所谓的“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在美国，由于相对而言比较公平正义的、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因此，少数阶层的利益，并不那么容易凌驾于大多数人的利益之上。

这一点，在泰迪罗斯福总统的政治生涯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泰迪罗斯福就任总统期间，曾经发生了许多大资本家集团与工人阶层之间、以及社会各个相关群体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在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中，泰迪罗斯福总统都是在尽量地秉公行义，为那些受到大资本集团压制的劳工阶层发声，支持他们的利益主张。这些措施和政策，有效地改善了美国内部劳资紧张关系，促进了全社会的和谐平衡的发展，对于现代美国经济体系的诞生，具有重要的意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____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本质及其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本质，从某种角度而言，其实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是以德国集团为代表的泛日耳曼主义（德国民族主要是由日耳曼民族组成；所谓日耳曼民族，主要包括日耳曼语系与文化的一些民族和国家，例如德意志、奥匈帝国、奥地利、等等）与泛斯拉夫主义（以俄罗斯等国家与民族集团为主）及英法等国之间的矛盾爆发。

在人类中，因着人生命与心灵本质中的罪性，所以，在人与人之间总是会充满各样的矛盾与不义。这一点，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其实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虽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总是有着很多具体不同的特点，但是，在一般的共性上，这些矛盾中又总是包含着同样的内容。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民族集团与民族集团之间，也莫不如此。一方面，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往往是因为在其各自群体的内部，存在着许多纷争，因此，内部矛盾往往会被转嫁为外部的矛盾。另一方面，在若干个群体之间，无论是正义还是不正义的一方，都会尽可能地联合起与自己有利的一方，合纵连横，以争取在矛盾斗争中占得上风、取得胜利。

如果我们深思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以及整个过程，那么，就会清楚地看见矛盾各方所表现出的正义与不义的方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实上是对于那些十九世纪末的欧洲乐观主义、以及左翼知识分子的最好反驳。在十九世纪，许多欧洲人因着科学技术和经济贸易等等的发展，而在心中逐渐变得自高自大起来；他们不再敬虔地寻求和倚靠上帝的恩典，而是开始逐渐地背离基督教信仰；他们认为，这世上根

本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的成功，都要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去努力；他们固执地以为，人性是光辉而伟大的，人类能够凭着自己的努力而建造起世上天堂，能够创造出和谐幸福的美好家园；他们刻意地忽视、无视人生命与心灵中所普遍存在的罪性，转眼不看各个国家中随处可见的贪婪、不义、骄傲、自大、自义、欺谎、等等。或者，他们俾倪天下，眼睛中只看见别人的罪、对方的罪，但是，却不愿意扪心自省，看不见自己生命与心灵深处的罪性与罪行；因此，他们的心灵是诡诈而欺谎的，而不是诚实谦卑的。在欧洲各国中，固然，我们常常能够看见许多信仰敬虔、热忱真挚的基督徒们，但是，我们也会常常看到，许多信仰虚伪、或是自傲自义、背离基督教信仰的人们。

。。。。

第一次世界大战，强行地阻断了欧洲进步的步伐；殖民地之间的牵扯与争斗，也使得英美等国敬虔基督徒们远赴海外的传教士差传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和阻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以德国集团的失败告终，并促使了自从十五世纪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后、所建立起来的奥斯曼帝国【以信奉伊斯兰为主；主要是今天的土耳其人，即古代所称的突厥人】的解体；——但是，同时，也给英国体系带来了重创。从此，英国的所谓"日不落帝国"走上了下坡路；以英镑为基础的经济贸易体系也逐渐被后起之秀的美国所渐渐超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共有至少两百万美国士兵远赴欧洲参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如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过程一样，——是相对而言更加民主自由的、信仰敬虔的美国，把欧洲、乃至全世界人民从专制主义的铁蹄下解救出来。正是因着美国，才有了今天二战以后的所谓自由世界，才有了今天的自由贸易体系，以及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巨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和提高。

____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

从广义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西方文明开始衰落的过程的一个预演。这个过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显明得更加清楚；而且，在二战结束以后，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下半叶期间，世界处在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下；在此期间，西方自由世界曾经迎来了又一个经济大发展、大进步的时期；但是，从许多方面而言，西方各国却在基督教信仰方面更进一步滑落，更加渐渐地远离和背离基督教信仰；即使在美国内部也是如此。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会在本书下册中继续记述和讨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方面，使得那些羡慕西方文明的人们，认识到西方世界并非是完美的；另一方面，更促使任何一个谦卑诚实、愿意深思的人，认真地反省和反思：——西方文明的内在机理，究竟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西方文明在过去五百年中取得了大发展，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西方文明呈现衰落、矛盾争战之象？如果我们的内心是谦卑、诚实、认真的，那么，我们就会不得不承认：——西方文明在过去五百年中的繁荣与发展，从根本上说，不是因为什么别的什么原因，而正是因为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是因为无数的民族、国家、敬虔的基督徒们深深地倚靠上帝的话语、神的恩典与大能；——而西方文明的衰落、以及矛盾争战，则正是由于人生命与心灵深处本质的罪性所导致的许多自大、自傲、不义、争竞之事。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见，当世人谦卑己心、承认己

罪、悔改己罪、寻求上帝救赎恩典的时候，上帝的祝福就临到他们；而当世人自傲自义、在罪中顽梗刚硬、充满欺谎与压榨的时候，——那么，他们彼此之间就充满了争斗，他们的文明与文化体系就充满了罪污，就开始渐渐地衰落、软弱、失败【这也正是罗马帝国在公元四世纪、五世纪期间灭亡的历史】。当人信靠上帝、上天的时候，他的生命中、心灵深处就有着高尚而谦卑的美德；当人背离上帝、上天的时候，他们的心中就被谎言与罪恶所充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

此时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等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境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于1914年至1918年。在1914年之前的二十世纪初，在西方各国之中，尤其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逐渐兴起的德国、沙俄、日本等国家与英法等国之间，就已经在不断酝酿着各种各样的危机与潜在冲突。而突厥人统治的、以伊斯兰信仰而基础的奥斯曼帝国，盘踞在巴尔干半岛上，统治或掌控着各个斯拉夫民族。一方面，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是欧洲各国经济、科学、技术爆炸性发展的时代；另一方面，随着科技发展所导致的军事武器技术的不断精进，随着德国、沙俄、奥斯曼帝国等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随着英法等西欧海岸国家与欧洲内陆国家之间的潜在竞争日益激烈【德国体系作为西方现代化的后起之秀，以大规模制造业为主要经济支柱，以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自傲自义、常常背离敬虔信仰等等为文化特征】，战争的乌云一直在不断地聚集。事实上，二十世纪初、1904年至1905年的日本与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大规模战争，从很多方面【例如，海军与陆军的集团军协调作战、大规模战略物资运输与调动、新式枪炮武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来说，就已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预演。

在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自从1776年建国以来的外交军事政策措施，就一直是以“孤立主义”外交理念为主导。所谓孤立主义外交理念是指，美国尽量不参与欧洲各国之间的冲突，而是尽量与所有国家保持和平的外交关系。在十九世纪中，虽然发生了所谓的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以及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战争，但是，相对而言，那些只不过是规模很小的、短暂的、涉及人员数量很小的、局部性武装冲突而已，而并非是什么全国性大规模的战争。美西战争、美墨战争的后果影响深远，因为这导致了北美州的南方许多广大地域加入了美利坚合众国【1835年发生于今天德州圣安东尼奥市的、著名的、可歌可泣的阿拉莫战役，使得休斯顿将军所领导的德克萨斯州人民武装力量，后来最终战胜了墨西哥独裁者所指挥的庞大墨西哥军队；并最终使得德克萨斯州后来成为了美利坚合众国之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州】，以及西班牙在全球范围内所掌控的一些区域、例如菲律宾，转变为美国所掌控的地区；从而为美国的全球范围经济贸易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促进因素。但是，美西战争、美墨战争本身，只不过是很小的、零星战斗而已，与日俄战争或是欧洲国家之间大战所导致的生灵涂炭相比，根本无法同日而语。

+++

+++

+++

+++

+++

+++

+++

+++

+++

+++

+++

+++

【以下引述 《美国故事》】

讲述二战历史的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有很多很多，我们就不在此过于赘述；而仅仅是试图从高屋建瓴的角度，讲述其中一些最重要、最深入的部分。

在二战中，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处于一个生死攸关的分水岭。当时，希特勒的德国已经几乎攻陷了整个欧洲。在德国军队的凌厉攻势下，苏联一直苟延残喘地处于防守地位。在苏德战争中，苏联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若不是严寒的冬季拖延了德国坦克大军的进攻速度，苏联就已经完全败于纳粹的手中。在西欧，除了一两个很小的所谓中立国之外，其余所有国家、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被德军的铁甲部队牢牢掌控或完全占领。整个欧洲大陆都已经跪倒在纳粹的铁拳统治之下。隔着英吉利海峡的英国，在岛国环境中，孤立地命悬一线。

在亚洲，日本军队所向披靡；无论是中国、还是东南亚大部分国家，都已经处于日军的掌控范围之中。若不是日军要分出精力、抽调部队与美国在太平洋战区广大范围内全线作战，那么，整个东亚、南亚的全部领土就都已经在日本的完全占领或掌控之下了。

如果没有美国的参战，如果没有英美联盟、并肩作战，那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整个欧洲人都在讲德语，而今天的整个亚洲人都在讲日语；全世界人都将会俯伏于德意日轴心国的专制暴政的残酷统治之下。

事实上，第一次世纪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自由民主的制度之所以能够最终战胜专制主义制度，正义之所以能够最终战胜邪恶，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美国在战争中后期参战、英美联盟作战，有着重大关系。

。。。。

从历史上说，甚至直到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在很多美国人的思想中，都有着一种所谓"孤立主义"的倾向。

在美国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思想趋势，固然与美国本身的幅员辽阔有着很大关系【美国自己的疆域国土已经够大的了；美国自己国家内的事务已经够复杂、够广阔的了】，但是，也与美国人的基督教信仰与思想文化有着一定的深刻关系。

箴言22章

1名誉胜过多财，

恩宠胜过金银。

2世上有财主，也有穷人，

两者都是耶和华所造的。

3精明人看见灾祸，就躲藏起来；

愚蒙人却往前走，自取祸害。

4谦卑和敬畏耶和华的赏赐，

就是财富、荣耀和生命。

5奸诈人的道路，满布荆棘和网罗；

谨慎自己的，必远离这些。

6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路，

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

7财主管辖穷人，

欠债的作债主的奴仆。

8散播邪恶的，必收祸害；

他忿怒的杖终必毁掉。

9心存良善看人的，必蒙赐福；

因为他把自己的食物分给穷人。

10赶走好讥笑人的，纷争就除去；

争执和耻辱也必止息。

11喜爱内心洁净，嘴上有恩言的，

君王要作他的朋友。

12耶和华的眼目护卫知识，

却倾覆奸诈人的话。

13懒惰人说：“外面有狮子，

我在街上必被杀害。”

14淫妇的口是深坑，

耶和华所恼恨的必陷在其中。

15愚妄束缚孩童的心，

管教的杖可以把愚妄远远驱除。

16欺压穷人为要增加自己财富的，

送礼给财主的，必致穷乏。

待人处事需仁慈谨慎

17你要留心听智慧人的言语，

专心领受我的知识。

18如果你心里谨守，

嘴唇上常常诵念这一切，自会觉得甘美。

19我今日特别指教你，

为要使你倚靠耶和华。

20我不是曾经给你们写下

有关谋略和知识的事吗？

21要教你认识确实的真理，

使你把真理回复那差派你来的人。

22你不可因为贫穷人穷乏，就抢夺他的东西，

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穷苦人。

23因为耶和华必为他们伸冤，

抢夺他们的，耶和华也必夺取那人的性命。

24容易发怒的人，不要与他为友；

脾气暴躁的人，不要与他来往，

25免得你效法他的行径，

自己就陷在网罗里。

26不要替别人击掌担保，

也不可为欠债的作保证人。

27如果你没有甚么可以偿还，

何必使人连你睡觉的床也夺去呢？

28你的祖先立定古时的地界，

你不可迁移。

29你见过办事能干的人吗？
他必侍立在君王面前，
必不会侍立在低微的人面前。

箴言6章
1我儿，如果你作朋友的保证人，
替外人击掌担保；
2如果你给自己口里的话缠累，
给你口里的话绑住；
3我儿，既然你落在你朋友的手中，
就要这样行，好解救你自己，
你要自己降卑，去恳求你的朋友。
4不要让你的眼睛睡觉，
不要容你的眼睑打盹；
5要解救自己，像羚羊脱离猎人的手，
像飞鸟脱离捕鸟人的手。
不可懒惰
6懒惰人哪！你去看看蚂蚁，
察看牠们所行的，就可得着智慧。
7蚂蚁没有元帅，
没有官长，也没有统治者，
8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
在收割的时候积聚粮食。
9懒惰人哪，你要睡到几时呢？
你甚么时候才睡醒呢？
10再睡片时，打盹片时，
抱着手躺卧片时，

11你的贫穷就必像强盗来到，

你的缺乏就必像拿兵器的人来到。

耶和华憎恶的事

12无赖汉、坏人

到处使用欺诈的口；

13他以眼传神，用脚示意，

用指头指点，

14心存乖谬，图谋恶事，

常常散布纷争。

15因此，灾难必忽然临到，

他必突然毁灭，无法挽救。

16耶和华恨恶的事有六样，

连他心里厌恶的，共有七样，

17就是高傲的眼、

说谎的舌头、

流无辜人血的手、

18图谋恶事的心、

快跑行恶的脚、

19说谎的假证人，

和在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

犯奸淫的必惹祸患

20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训诲。

21要把它们常常系在你的心上，

绑在你的颈项上。

22你行走的时候，它们必引导你；

你睡觉的时候，它们必保护你；

你醒来的时候，它们必和你交谈。

23因为诫命是灯，训诲是光，

出于管教的责备是生命之道，

24能保护你远离邪恶的女人，

远离妓女谄媚的舌头。

25你心里不要贪恋她的美色，

也不要给她的媚眼勾引。

26因为妓女使人只剩一块饼，

通奸的妇人猎取人宝贵的生命。

27如果人把火藏在怀里，

他的衣服怎能不烧着呢？

28如果人在火炭上行走，

他的脚怎能不灼伤呢？

29凡是和别人的妻子通奸的，也是这样；

凡是亲近她的，都必不免受罚。

30盗贼因饥饿偷窃充饥，

人不会鄙视他。

31但如果他被捉住，就要七倍偿还，

要把他家里所有的财物都交出来。

32和妇人通奸的，实在无知；

行这事的，是自我毁灭。

33他必遭受击打，被凌辱，

他的耻辱永不能涂抹。

34因为嫉妒激起了丈夫的烈怒，

使他在报仇的时候，必不留情。

35任何赔偿，他都不接受，

纵使你馈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罢休。

箴言26章

1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都不合宜；

照样，愚昧人获得尊荣，也不合宜。

2麻雀怎样飞来飞去，燕子怎样翻飞；

照样，无故的咒诅也不会临到人。

3鞭子是为了打马，嚼环是为了勒驴；

刑杖是为了打愚昧人的背。

4不要照着愚昧人的愚妄回答他，

免得你像他一样。

5要照着愚昧人的愚妄回答他，

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6藉愚昧人的手传递信息的，

是自断己足，自寻烦恼。

7箴言在愚昧人口中，

就像瘸子的腿，虚悬无用。

8把荣耀给愚昧人的，

就像人把石子系在投石器上。

9箴言在愚昧人口中，

就像荆棘在醉汉手里。

10雇用愚昧人和过路人的，

就像胡乱射伤众人的弓箭手。

11愚昧人一再重复他的愚妄，

正像狗转过来，吃自己所吐的。

12你见过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

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13懒惰人说：“路上有狮子，

广场上也有狮子。”

14懒惰人在床上翻动，

就像门绕着门铰转动一样。

15懒惰人把手放在盘子里，

连拿食物送回口边也觉得劳累。

16懒惰人看自己，

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

提防毁谤及诡诈的人

17过路的人被激怒，去干涉与自己无关的争执，

就像人揪住狗的耳朵。

18-19人欺骗了邻舍，

却说："我不过是开玩笑罢了。"

他就像疯狂的人，

投掷火把、利箭和杀人的武器。

20没有柴，火就熄灭；

没有搬弄是非的人，纷争就平息。

21好争竞的人，煽动争端，

就像余烬上加炭，火上加柴一样。

22搬弄是非的人的言语如同美食；

深入人的脏腑。

23嘴唇火热，心却奸恶，

就像包上银渣的瓦器。

24憎恶人的用话语掩饰自己，

心里却存着诡诈。

25他的话语虽然动听，你不可信他，

因为他心里有七样可厌恶的事。

26他的怨恨虽然以诡诈掩饰，

但他的邪恶必在大会中显露出来。

27挖掘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

辊石头的，石头必辊回自己身上。

28虚谎的舌头憎恶被它伤害的人；
谄媚的口造成败坏。

。。。。

众所周知，很多美国人的祖先，都是为了逃避欧洲的迫害与战乱纷争而移民来到北美大陆的。他们对于欧洲历史上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分分合合、纷争不断，常常抱着一种厌倦不已的态度。

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轻易地把自己牵扯进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中，因为在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纷争都往往是由于双方各自之间的一些复杂因素，往往是出于彼此双方都有着的罪恶、不公、自义、自傲、虚谎、顽梗、等等；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地与人击掌，为人作保。从终极层面来说，我们所应当信靠的，是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之主，而不应当是任何被造之物、被造之人。我们的心灵所归依的，应当是那伟大的上帝，而不应当是地上的哪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我们首先应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地爱主我们的上帝，然后才是应当爱人如己。

因而，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一切世人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面对世上的世人之间的一切纷争的时候，我们不要焦躁不耐地、急切站队、与人拉帮结伙，而是要首先保持一定的距离，审慎地观察和分析，明晓其中的是非曲直与正义和不公；在一切世事中，我们应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

以上的圣经教导，正是美国在很长历史时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并不是说，美国就对世界上的事务态度冷漠、甚至自私自利、只顾自己；事实上，仅以中国近代史为例，美国的众教会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中，就曾经差派了许多传教士团体们来到中国传播基督福音，而且，中国的许多著名大学的前身，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西医科大学、湘雅医学院、等等，就是美国传教士们与许多其他西方国家传教士们首先协同建立起来的。

在一战、二战以前，美国历史上的外交都是尽量地保持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即，尽量地不把自己牵扯进入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纷争与战乱之中。但是，当一战、二战中的战争双方的正义与邪恶的界限区分非常明显的时候，当美国受到了直接的、明显的、不义的攻击的时候，美国就会义无反顾的参与进战争之中。而美国的参与，正是一战和二战过程中胜败输赢局势的分水岭。因此可以说，正是美国，在一战与二战中把全世界从罪恶的势力之下解救出来。尤其是在二战中，德意日专制主义轴心国的力量曾经如此强大，如此如日中天，以至于看似世上无人能够抗衡、匹敌。

当年，尽管美国本身在战前并非完全没有战备的工作，但是，美国参与一战和二战，从某种程度而言，都是出于不得已的、某种直接正面的原因所导致。美国参加一战的导火索是，美国大批民用客船与商务船只被德国海军鱼雷击沉，导致许多美国货物沉没于大海之中，更导致许许多多无辜的美国乘客葬身火焰与大海之中。美国参加二战的导火索是，日本在不宣而战的情况下，偷袭夏威夷珍珠港，几乎全歼美国太平洋舰队。

在美国参加二战之前的前一年，尽管美国的经济实力早已是世界第一，但是，美国军力在世界的排名是在十五六名以外，甚至排在罗马尼亚军队之后。事实上，在美国参加二战之前，美国工业水平在年产家庭用汽车的数量上，达到了每年产出数百万辆。而当美国参加二战以后，仅在参战后的第一年，家用汽车的年产量就大幅减少到每年只有不到一百辆左右；——因为美国的工业生产线已经全部转为军工生产。事实上，正是美国的这种强大工业实力以及潜能，令日本胆寒，从而使得日军在太平洋战争过程中犯下战略性错误，导致了后来中途岛海战中的日本大败，进而彻底扭转了美日太平洋战场上的局势与力量对比。

美国参加二战以后，国家决策层所采取的战略方针是，先集中所有优势力量，针对欧洲战场，先争取打败德国纳粹军队，再转手到亚洲战场对付日本。因此，美国的二战战略决策与一战战略决策方针基本上是一样的，即，与英国形成坚固的联盟阵线，英美军队并肩作战。

在三年浴血奋战以后，英美联军成功登陆欧洲大陆，与苏联红军合作、东线西线夹击、共同全线反击纳粹部队，并终于攻陷了柏林，消灭了希特勒等纳粹首脑。在苏联红军从东线反攻德国的过程中，曾发生了大规模的苏联士兵强奸德国妇女的事件，有数十万计以上的德国人被强奸或杀害。

二战在欧洲结束以后，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是，英美等自由世界与苏联之间的冷战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结束。这正是因为，当年，在西欧，英美联军在反攻德军的过程中，占领、解放了法国、意大利等等地区，并在战后很快在那些国家中实行了自由民主制度，把权力还给当地的、本国人民与百姓；——然而，在东欧，苏联占领军在打败

了德军以后，却继续无耻地赖在那里，继续以强权、专制主义、傀儡政权、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谎言、统治和奴役着东欧那些国家中的人民。为了奴役苏联红军占领区的人民、剥夺他们的自由，苏联甚至在东德与西德之间的柏林市内，厚颜无耻地修建起了柏林墙。这个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柏林墙，直到冷战结束、二十世纪末期才被拆毁，东德与西德才得到统一。

二战在亚洲结束以后，虽然导致了日本帝国在美国军队枪口之下的民主自由制度的改革，但是，却导致了中国大陆全都陷落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直到今日。我们会在后文继续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
+++
+++

+++
+++
+++

+++
+++
+++

+++
+++
+++

——

袁世凯称帝

（选自维基百科相关文字）【在下文中关于背景部分，个别细节处由于原始文献来源不够充足清晰而有所少量删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5%B8%9D%E5%9C%8B

中华帝国，亦称洪宪帝制，是指1915年12月12日至1916年3月22日间，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在多重因素影响下预备成立的一个君主立宪制政权名称。原定年号洪宪，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首都北京。但各方势力接连挑战，包括蔡锷领导的护国军、日本支持的中华革命党以及宗社党的前朝遗老，使中华帝国还未对外国宣布成立便以失败收场，期间对内袁世凯并没有正式即位为皇帝，期间对外仍使用中华民国国号。中华帝国从宣布即将改元的1915年12月12日起算仅102天，从改元的1916年1月1日起算仅82天。

兴衰经过

背景

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成立筹安会，声言"共和不适用于中国"。愈来愈多的"请愿团"上书，要求变更国体。也有部分反对的声音，如进步党党首、前司法总长梁启超发表《异哉

所谓国体问题者》，坚持其对变更国体的一贯反对。而筹安会却发表支持实行君主立宪的文章。

8月23日成立后的“筹安会”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进京商讨国体事宜，各文武官吏除少数表示拥护共和外，大都表示必须改变国体。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亦伪造《顺天时报》，营造日本帝国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氛围。

国民代表大会

面对愈来愈多声称代表民意支持袁世凯即帝位的民意团体（即请愿团），1915年9月1日，代行立法院权限的参政院举行开幕典礼。
袁世凯在9月6日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

梁士诒又在9月19日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取代筹安会，向参政院呈上第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由全国选出代表决定国体问题。10月6日，参议院收到各省建议改共和制为君主立宪制的各省代表请愿书有83件。代行立法院权限的参政院起草《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由全国选出1993名国民代表。12月11日上午9时，国民代表就国体变更进行投票，结果国民代表大会以全票通过同意君主立宪制。当日，各省代表民意第一次请求袁世凯就任中华帝国皇帝，袁以无德无能婉拒。

12月12日，同意代表们第二次请求取“弘扬宪法”之意，袁世凯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并预备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总统府则改为新华宫（今中南海），中华帝国正式进入筹备阶段。袁的外国顾问团仿照《日本皇室典范》拟定《新皇室规范》：

“一、中华帝国大皇帝传统子孙，万世延绵。二、大皇帝位传统嫡长子为皇太子，皇太子有故，则传嫡皇太孙。嫡皇太孙有故，则立皇二子为太子，立太子以嫡不以长。三、中华帝国大皇帝，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大皇帝，公主、郡主得下嫁五族臣民。四、皇室自亲王以下，至于宗室，犯法治罪，与庶民同一法律。五、亲王、郡王得为海、陆军官，不得组织政党，及为重要政治官吏。六、永远废除太监制度。七、宫中设立女官，永远废除采选宫女制度。八、永远废除各方进呈贡品制度（满、蒙、回、藏各王公世爵年班朝觐贡品，仍准照常办理外）。九、皇室典礼事务，设宫内大臣掌领之。十、凡皇帝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

南方起义

起初表示支持君主立宪制的蔡锷和唐继尧等人在1915年12月25日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背叛袁世凯。蔡锷在云南起义之后，袁世凯下令征伐滇军，北洋军和滇军起先互有胜负，但最终北洋军未能及时剿灭护国军。与此同时，中华革命党也趁机活动。1915年11月日本情报组织东亚同文会成员、日本众议员犬养毅的亲信萱野长知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革命军中国东北军顾问，在山东青岛设置司令部，日本军队控制的胶济铁路沿线全力协助。中华革命军所用枪械全部由日本供应，日本人还组织一些野战医院专程负责战场医疗。

日本作梗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袁世凯政府通过签订中日民四条约来应付，未能全部满足日本的要求，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前后逐渐向欧美各国靠拢用来制衡日本，日本决定推翻袁世凯政权。在南方发动动乱和起义后，日本政府在背后提供多方面的支持。
1916年1月9日，孙中山电告上海总机关部，日本政府派青木海军中将来

沪，嘱与联络；

1916年1月19日，大限重信内阁通过注意中国南方动乱的决议；

1916年2月19日，孙中山与日人久原房之助订立借款七十万日元；

1916年2月21日，大陆政策急先锋田中义一向冈市之助建议采取手段让袁世凯退出并扶植日本的政治势力；

1916年3月1日，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晤梁启超，商量讨袁一事，并设法赴广西；

1916年3月7日，大限重信内阁决定要袁世凯退出权力圈，因为袁世凯不能保障日本在华利益；

1916年3月15日，代理奉天日本总领事矢田七太郎电告外务省，日本人策动宗社党起事；

1916年3月30日，日本太仓喜八郎以百万日元资助前清肃亲王善耆的宗社党；

1916年5月4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得到日本资助，从青岛到潍县，攻击东城。

帝制取消

袁世凯在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其筹备帝制时间前后共计102天（此年为闰年）。袁世凯《撤销帝制令》全文如下：

撤销帝制令

政事堂奉申令：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钜，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 傥有墨、葡之争，必为越、缅之续，遂有多数人主张帝制，言之成理，将吏士庶，同此 悃忱，文电纷陈，迫切呼吁。

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

中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予更无讨论之余地。然终以骤跻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以表素怀。乃该院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责备弥严，已至无可诿避，始终筹备为词，借塞众望， 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计从缓，凡劝进之文，均不许呈递。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俟转圜。

予忧患余生，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知，辛亥事起，谬为众论所推，勉出维持，力支危局，但知救国，不知其他。中国数千年来史册所载，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让之诚，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为权利思想，性情隔阂，酿为厉阶。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 苦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致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矍然，屈己从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转陈推戴事件，予仍认为不合事宜，着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曲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 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诚，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涤虑，息事宁人。

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方今闾阎困苦，纲纪凌夷，吏治不修，真才未进，言念及此，中夜以忧。长此因循，将何以国？嗣后文武百官，务当痛除积习， 黾尽图功，凡应兴应革诸大端，各尽职守，实力进行，毋托空言，毋存私见，予惟以综 核名实，信赏必罚，为制治之大纲，我将吏军民当共体兹意！此令。

直至袁世凯对内宣布取消帝制都未正式登基，年号洪宪仅在内部流传，对

外仍称民国，故袁世凯仍是民国大总统，但滇军坚持要袁世凯下台。革命党人继续行动。5月4日，梁启超电劝段祺瑞出以果断，劝袁世凯退位。5月6日，袁世凯通电陈宦，同意退位，但需要先商定善后。冯国璋联络各省于5月17日组织召开南京会议，因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会议无果而终。在重大打击及交煎下，袁世凯于6月6日上午10时15分逝世。

国旗、国徽、国歌

中华帝国虽未能成立，但已预先定立国旗和国歌。国徽则沿用北洋政府的十二章国徽。国歌沿用1915年5月制定的北洋政府国歌《中华雄立宇宙间》，但歌词“共和五族”改为“勋华揖让”。

封爵

自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推戴，至1916年3月22日申令撤销承认帝制案，其间有关帝制的命令主要为封爵。以下列出封爵名单及封爵时间：

旧侣

1915-12-18　黎元洪、奕劻、载沣、世续、那桐、锡良、周馥

故人

1915-12-18　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

耆硕

1915-12-18　王闿运、马相伯

武义亲王

1915-12-15　黎元洪

衍圣公（袭封）

1916-1-1　孔令贻

一等忠襄公（追封）

1915-12-22　赵秉钧

一等公

1915-12-21　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

二等公

1915-12-23　刘冠雄

一等侯

1915-12-21　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宧、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

一等昭勇伯（追封）

1915-12-22　徐宝山

一等伯

1915-12-21　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

1915-12-23　雷震春

一等子

1915-12-21　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

1915-12-23　陈光远、米振标、张文生、马继曾、张敬尧

二等子

1915-12-23　倪毓棻、张作霖、萧良臣

一等男

1915-12-21　许世英、戚扬、吕调元、金永、蔡儒楷、段书云、任可澄、龙建章、王揖唐、沈金鉴、何宗莲、张怀芝、潘榘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

1915-12-23　林葆怿、饶怀文、吴金彪、王金镜、鲍贵卿、宝德全、马联甲、马安良、白宝山、昆源、施从滨、黎天才、杜锡钧、王廷桢、杨飞霞、江朝宗、徐邦杰、李进才、吕公望、马龙标、吴炳湘

1916-1-28　李嘉品

二等男

1915-12-21　李兆珍、王祖同

1915-12-23　吴俊陞、王怀庆、吴庆桐、冯德麟、王纯良、李耀汉、马春发、胡令宣、莫荣新、谭浩明、周骏、刘存厚、叶颂清、张载阳、张子

贞、刘祖武、石星川

1916-2-21　熊祥生

三等男

1915-12-23　石振声、何丰林、臧致平、吴鸿昌、王懋宾、唐国谟、方更生、张仁奎、陈德修、殷恭先、周金城、李绍臣、康永胜、常德盛、张殿如、马福祥、张树元、李长泰、许兰洲、朱熙、孔庚、方玉普、马龙潭、裴其勋、朱福全、隆世储、方有田、陈树藩、陆裕光、杨以德

1916-2-21　李炳之、吴佩孚

1916-3-7　冯玉祥

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1915-12-23　曾兆麟、林永谟、杜锡珪、汤廷光

法律地位

中华帝国实为一在成立过程中即告流产的国家。成立过程前后有关的宪法和国际法问题，自引起学者之关注。然而直到袁世凯宣布废除帝制都未正式登基，也无在国际上正式宣布成立中华帝国，更无任何国家承认中华帝国，在外交中袁世凯一直用“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身份应对各国。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以下引述网文）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8896775

袁世凯为什么要称帝？

温伯陵
公众号：温乎（历史照进现实）

一、

1915年12月11日夜晚，忙碌一天的袁世凯回到总统府，没有理会众人的请安和问候，径直走入书房坐在宽大的太师椅上。

香炉里青烟袅袅，弯弯曲曲的冲房梁而去，犹如袁世凯躁动不安的内心。

他用胖胖的手猛然拍了一下光头，口中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做皇帝到底对不对？"

袁世凯不禁陷入沉思。

当天上午，由全国选出的1993名国民代表齐聚，对共和制更改为君宪制进行投票，结果不出意料，1993名国民代表全票通过施行君宪制，并恳请袁世凯就任中华帝国皇帝。

按照惯例，他拒绝了。

这只是第一次劝进，立刻接受显得吃相太难看，等到第二次、第三次劝进的时候，他就会接受劝进，宣布改元建国。

虽然是早已议定的流程，袁世凯依然忧心忡忡，毕竟在共和国里做皇帝，总是不那么光彩。

但是袁世凯没有办法。

他从"小站练兵"开始，就着手培养自己的亲信军事力量，15年间一手带出强大的"北洋六镇"，除了袁世凯本人，再无人可以指挥的动。

那些年，他和军官士兵们站在一起，成为无可争议的统帅。正是"北洋六镇"的鼎力支持，他才拿到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位。

也是从1912年开始，他和军队脱离了。

当年忠心不二的部下，替袁世凯分别镇守各地，也就分别取代了他在军队

中的位置，3年来，他们各自培养起一批亲信，犹如小号的袁世凯。
袁世凯感觉到，指挥军队不太灵敏了。他必须和各个军头商量妥协，才能贯彻自己的命令，而当年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如臂使指。
刀，已经不在他的手中了。
做为强势统帅，袁世凯绝对不能容忍。
另外，新成立的民国太混乱了。
清朝逊位以后，朝野瞬间冒出几百个党，各自拉帮结派攻讦不休，几年来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尤其是国民党，通过竞选获得大部分议员席位，平时没什么有用的建议，只知道维护自家利益，只要不符合国民党利益的全部反对。
更有甚者，他们在反对不利的时候，会无所忌惮的起兵造反。显然，他们不把民国和大总统放在眼里。
内外不顺，让袁世凯成为"虚位总统。"
他只能顺着大家的意思做事，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施展拳脚，这么下去，民国的大事怎么办?
袁世凯放下胖胖的双手，露出一张疲惫的圆脸，他抬头望向冲到房梁的青烟，喃喃自语：
"中国，还是需要一个皇帝。"
已经流传2100年的皇帝是受命于天的，在中国人心中具有神性，只有借助皇帝的神性压服众人，才能真正执掌权柄，确保国家的稳定。
"况且，袁氏三代效力前清，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我又执天下牛耳多年，论家世论势力论才能，天下谁能比得上袁某？"
"我做皇帝传之子孙，不应该么？"
二、
袁世凯又想起半年来的天下人心。
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发表的《共和与君主论》说：
"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中国如用君主制，

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长子袁克定带回来的《顺天时报》，也证明日本是支持袁世凯称帝的。
美日两国都支持中国更改国体，那大概是错不了的，起码不至于因更改国体而导致外患。
再说了，日本、英国、德国、俄国都是君主制，不是都发展的强大繁荣么，中国加入世界主流也没什么不妥。
“全世界都有皇帝，为什么中国不行？”
最让袁世凯振奋的是举国拥戴。
8月14日，杨度和严复等人的“筹安会”成立以后，各地纷纷成立“请愿团”，请求施行君主立宪制。
短短2个月时间，参议院就收到请愿书83件......北洋系、南方系、政府官员、封疆大吏、统军大将、乞丐、妓女都支持更改国体。
真是举国无人不拥袁。
就连不是北洋系的蔡锷、唐继尧都在《全国护军使劝进称帝文书》里签字，江苏实业代表沈云沛也请愿劝进，可见天下民意汹汹。
袁世凯心想：
“杨度曾说过，不先除竞争元首的弊端，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说的好啊，于公于私，皙子知我。”
袁世凯起身离开书桌，信步走到窗户前。
12月的北京寒冷刺骨，他却仿佛没有感觉，伸手推开窗户，抬头望向灿烂的星河。那双眼睛格外清亮，透出一半不甘，一半野心。
那一夜，他无心入睡。
三、
1915年12月12日，1993名国民代表再次请求袁世凯称帝，这次他没有拒绝，大大方方的接受国民代表的劝进。
从这一天起，袁世凯就不再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而是中华帝国的皇帝了。
他准备把1916年定为“洪宪元年”，并制定了《新皇室规范》：
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皇室

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
永废太监制度。
永废宫女采选制度。
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
或许，袁世凯想做好皇帝，但当初拥戴他的各地大员已经等不及了。
梁启超是一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他和学生蔡锷策划了护国运动，树起反袁的第一杆大旗。
12月25日，返回云南的蔡锷和唐继尧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称袁世凯是背叛民国的罪人，2天后派兵向四川进发。
12月18日，袁世凯任命冯国璋做参谋总长，想把他调离经营多年的南京，但冯国璋称病不愿进京，只愿在南京遥领职务。3个月后又致电北京，劝袁世凯早点退位。
一旦冯国璋开头，各省督军纷纷通电，劝袁世凯退皇帝和总统位，留下大权供众人争夺。
段祺瑞闲居在家里，既不参与劝进拥戴，也不说反对的话，一幅老神在在的样子，谁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徐世昌知道人心是怎么回事，早已回到河南辉县，平时钓钓鱼喂喂鸟，只等袁世凯撑不下去的时候出来收拾残局。
至于日本，原本就没有在《顺天时报》上说拥戴帝制，那份报纸是袁克定伪造的，只骗袁世凯一个人。
此时他们巴不得中国乱起来，只有乱起来，日本才能浑水摸鱼。
一夜之间，万众拥戴的皇帝成为街边的臭老鼠。
当初的拥戴是真的，如今的反对也是真的，唯一不变的是利益。
四、
接受劝进前的夜晚，袁世凯大概没有想到，世间还有捧杀的说法。
冯国璋、段祺瑞等军政大员，或在北洋内部经营多年，或者在地方拥有数万军队，他们距离大总统宝座只有一步之遥。
有朝一日袁世凯退休，他们很有可能到总统的宝座上，尝试一把万人之上

的感觉，这在清朝可是想都不敢想的好事，民国却近在咫尺。
可袁世凯要做皇帝。
大家伺候袁世凯一辈子也就算了，还得世世代代给袁氏当奴才，袁世凯不甘心，冯国璋段祺瑞还不甘心呢。
南方系也有想法。
袁世凯和北洋的实力太强大，强大到其他势力加起来都难以撼动，既然正面打不过，那只好背后下手。
他们拥戴袁世凯称帝，将其置于风口浪尖之上，一旦把称帝的事情坐实，立刻以拥护共和的名义反手一击。
北洋内部争权都来不及，谁去真正和他们打仗？
其实在反袁战争中，北洋内部和南方系的诉求是一致的，他们的目的是利用袁世凯称帝的事实，把大BOSS赶下去，然后集体分享胜利果实。
想想吧，把称帝的袁世凯打下去，能获得多大的名望？能积累多少功勋？
而其他人，更多是墙头草。
大家都说“总统称帝好”，那他们也跟着喊，大家都说“袁世凯称帝不好”，他们马上转变口风说不好。
他们没有诉求，也不在乎什么国体，唯一在乎的是站队和口径，千万不要和别人不一样。
袁世凯终究是旧时代的人物。
他遇到困难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重新借用天授的皇权。
其他人都看到了未来的曙光，这世界上不是只有皇权一条路，还可以有别的选择和出路：
“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
1916年的总统府，袁世凯身患尿毒症在垂死挣扎，他放下一只雕花的药碗，发出和李自成一样的哀叹：“何不助我做好皇帝？”
四面八方却响起无数人的声音：
“慰亭，时代变了。”

++

（以下引述网文）

https://www.sohu.com/a/413377509_120409334

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当了83天皇帝后，为何就倒台身死？
2020-08-16 15:37
“假如只存伊尹志，缘何越俎解商朝”

对于袁世凯，相信大部分国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他出生于1859年，是父亲袁保中的第四个儿子，与其他子嗣不同的是，袁世凯并不是袁保中的嫡子，也因此，在日后安葬母亲的问题上与家族其他成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也直接导致了袁世凯与袁家断绝关系。

袁世凯早年就在官场左右逢源，经历一系列机遇，变故后，袁世凯先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后又发起复辟帝制的运动，然而贼子终入土，骂名千古传。

仅仅八十三天过后，袁世凯的美梦便支离破碎，政权迅速倒台，而自己更是没有几天便郁郁而终了？

治世能臣，乱世贼子

其实在晚清时期，袁世凯大可算作一名“爱国志士”，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颇有些姜维之于后蜀的意思。

先来看看袁世凯的功绩：25岁时，一个人就粉碎了日本联合朝鲜反对派共同策划的甲申政变，1884至1894年间，袁世凯担任朝鲜最高执行官，一个人就为清政府掌控了朝鲜十年之久。

小站练兵时期，袁世凯接了胡燏棻的工作，先将原先的“八旗军”更名为“新建陆军”，中体西用，依照德国军营制度进行训练，聘用德国军官参与训练军队，还制定了《建明军律》，以这支军队为基础，北洋军，国民党军队甚至解放军的前身都可以追溯至此。

然而，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与晚清政的溃散，袁世凯的心境似乎发生了些变化，“治世之能臣”似乎与他不再挂钩，从这一时期起，袁世凯便开始走上了“乱臣贼子”的道路。

辛亥革命后，由于袁世凯受到国外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以及国内革命人员的妥协，孙中山表示“和宜尽善”，被迫卸任大总统一职，而袁世凯如愿当上了民国大总统。

上任后，袁世凯首先就用了各种芝麻花生大小的理由解除了姚雨萍等革命将领的兵权，手法有如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至此，辛亥革命之果实已完全被袁世凯窃取。

帝制复辟，军阀难服

担任大总统后，袁世凯称帝的野心也逐渐显露出来，然而，考虑到自己早年间积攒下来的民心，袁世凯在称帝这件事情上表现得又是犹豫不决的。

就在这时，儿子袁克定带回了一份伪造的《顺天时报》，让袁世凯误以为日本帝国主义大力支持袁世凯称帝，与此同时，又有人在袁世凯耳边说英，俄都是君主立宪制，为什么民国就不能？

袁世凯开始飘了！

但他没注意到的的是，君主立宪绝不等于封建帝制。为了更方便地称帝，袁世凯还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潮流，1915年12月12日，近2000位“民国代表”再次上演了一场请求袁世凯称帝的闹剧。

而这一次，袁世凯或是假戏真做，或是飘得找不着北，真大大方方接受了这些代表的请愿。从这一天起，袁世凯将不再是民国大总统，而是中华帝国的皇帝，改国号为“洪宪”，制定《新皇室规范》。

然而袁世凯称帝绝非民心所向，也不是他手底下“忠心耿耿”的北洋军所希望的。

就在袁世凯称帝的同年12月25日，梁启超的学生蔡锷联同唐继尧向全国通电，声称袁世凯是叛国之罪人，立主推翻袁世凯，首先竖起了反对帝制的第一杆大旗，而后获得民众广泛响应，云南省首先独立，宣布革命。

袁世凯这时候慌了，赶紧自己一把扶植起来的段祺瑞与冯国璋，希望此二人能领兵镇压骚乱，然而冯国璋称病在家一如当年晚清政府被革命军击溃时袁世凯所为，段祺瑞则一副隔岸观火之姿，装聋作哑。

其实北洋军首领们心中也有块明镜，利害关系权衡得明明白白，万一袁世凯称帝成功，岂不是又成了家天下，龙椅一代传一代，哪还有他们什么

事。

举国无一心在袁，病中垂死命不久

民心不在，焉能不败？

这时候的袁世凯快要撑不下去了，内外民心尽失，就连自己一手培养的北洋军也难以调遣，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明明自己已经废除了纳宫女，养宦官等一系列封建旧时代中存在的落后制度。

他下定决心要当一个好皇帝，想要让所谓的"帝国"获得与英美等国平起平坐的机会，不明白为什么会被世人唾弃如粪丸。

然而袁世凯所不知道的是，恢复帝制这种看似简单而行之有效的办法，其实无非是袁世凯个人的一厢情愿，辛亥革命好不容易推翻的东西被他说来就来，这种违逆历史潮流，违反社会进化规则的做法注定失败。

就连袁世凯本来本人对于恢复帝制也并不是铁了心要去做的，在被有心者过分吹捧之后，自己心里的"皇帝梦"慢慢开始萌芽。

然而，袁世凯的果决只存在于宣布称帝的那一刻，此后的时间里，他每下达一份诏令都有所犹豫，在全国多地发动"护国运动"，多省份宣布独立之后，这种情况便更加明显，袁世凯自身的挣扎与脆弱不仅加速了他的失败，也为其心理压上了沉重的负担，昭示了日后的郁郁而终。

倒台身死，八十三日随风去

随着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就连之前妥协的孙中山也参与到了这次护国运

动中来，袁世凯终于不得不退位了。

从上任到卸任，袁世凯只坐了83天的龙椅，而且这83天还没有一天安稳日子，每日的惶惶不安给袁世凯心里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王忠和就在《袁世凯全传》中说道袁世凯称帝后情绪时常激动以至于“不能自持，久之成疾”。

终于，在袁世凯被迫下台后不久便去世了，袁世凯这一死又为后人留下了诸多猜想，因为袁世凯去世的时候年纪并不老，为何会复辟帝制失败后直接暴毙？

根据史料记载，直接导致袁世凯死亡的真正原因为尿毒症，也有民间传说袁世凯是心里压力过大而无处发泄，导致的心疾致死，这一说法可见于袁世凯女儿袁静雪之书《我的父亲袁世凯》中——“内外交攻，气恼成病而死。”

毕竟袁静雪作为袁世凯之女儿，对其了解与接触一定比普通人更多，因此这一说法也被广泛流传。

其实导致袁世凯死亡的原因并不能用单一的病死或气死来简单概括，其中既有“心力交瘁而不能自持”，也有不治之症在身的“定时炸弹”。

这位“能臣”与“奸贼”身份并存的人，在倒台后突然暴毙，没有向后人再解释什么，再大的骂名，也留予后人去说。

（引文结束）

++

辛亥革命以后的袁世凯称帝事件的闹剧，虽然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事件、小丑闻、小浪花，并不能影响到历史洪流的前行与进展，但是，它却包含着中国民主革命道路上的一些极其深刻的问题。甚至，这些深刻的潜在性问题，在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乃至今后一百年中的、极其漫长而艰辛的中国民主主义道路上，都具有着极其重大而深邃的意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会在本书后文继续深入讨论和思考。在这里，我们仅仅是简单、概括、浓缩地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民主制度的本质，究竟在于什么？为什么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民主制度的道路，如此难于实现？

第二，民主制度的机理，究竟在于什么？民主应当怎样合理有效地运作？

第三，民主制度的成败关键、生死攸关的核心，究竟在于什么？

第四，人生与社会的价值与目的究竟在于什么？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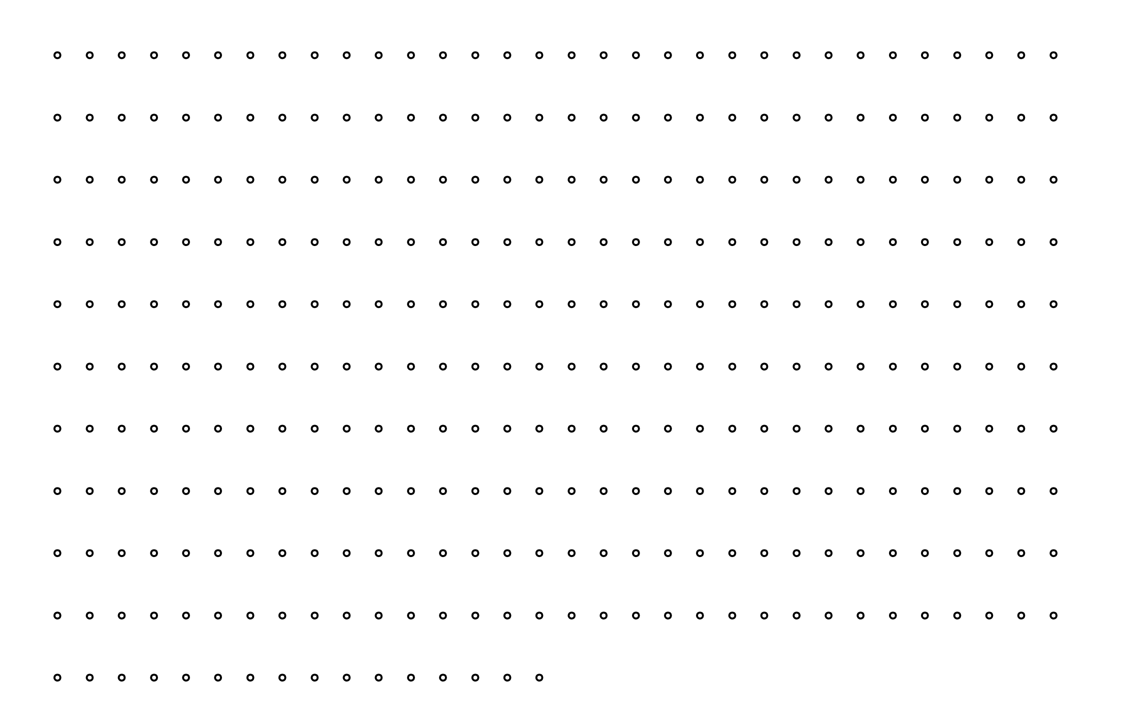
+++

+++

+++

+++++++++++++++++++++++++++++++++++

【引述 《论民主》最后一章】



第十章

社会契约、人生价值与目的

========================

教会与社会

基督教会是上帝百姓子民的集合体。社会是世上人群的集合体。在这两者之间，一个是上帝之国度，一个是地上的国度。在地上可见教会中，有时，也常会有虚伪之徒。在世上万国之中，有神所呼召的、必将要属他的人。那全知的永生之神，知道每一个属他的百姓子民。

教会是神的百姓、上帝子民在地上的见证。在人类历史上，基督教会对于无数的国家社会、对于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塑造作用。在这方面，有无数的事例。比如，一些简单的例子包括，今天，在我们生活中的一夫一妻制法律【不到一个世纪以前，在中国、以及世上许多其他国家，一夫多妻制还是一件合法的事情，而且还是一件让很多男人感到羡慕和荣耀的事情。直到今天，在中东、非洲等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地区，一夫多妻制还仍然非常流行，因为伊斯兰教的可兰经明文允许人可以同时娶四个妻子。一百年前，在中国古代的许多个

世纪历史中，中国妇女还裹小脚；直到西方传教士在一个半世纪以前进入中国，并大声呼吁阻止这样的事情，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改变】、公共医院体系【现代医学的诞生本身，以及公共医院的建立、医护院校的建立、等等，都是在基督教会的推动下而导致产生的。在中国，所有的医院门上都有红十字的标记，因为中国的公共医院系统的建立是始于西方传教士来华所建立的】、公共教育体系【一百多年前，在中国还没有公共教育体系，没有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小学、中学、大学。中国的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体系，一开始都是来自于一百多年前西方来华传教士所首先创立的诸多学校。在西方国家历史上，小学、中学、大学的建立，也都是由于基督教会的直接推动而导致的】，等等，都是来自于基督教会的大力推动和影响。

事实上，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也是从基督教会开始的。自从十六世纪初马丁路德所代表的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以来，在基督教会内部组织结构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革新。基督教会的组织形式从天主教体系内的各级主教与神职人员所组成的金字塔式组织治理结构，逐渐演变为基督徒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平等的会众主义组织结构。在今天的基督教会中，例如浸信会、卫理公会、长老教会等体系内，教会的执事、长老等组织结构人员基本上都是由教会的会众选举产生的。这种教会组织结构的变革，最终深刻影响了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导致了现代民主主义制度的建立。【例如，读者可以参考《五月花号之天路者的故事》一书，从中可以看见美国的最初起源。】

以弗所书5章

22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象顺服主一样，23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好象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24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顺服丈夫。25你们作丈夫的，要爱妻子，好象

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26为的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27可以作荣耀的教会归给自己，甚么污点皱纹等也没有，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28丈夫也应当这样爱妻子，好象爱自己的身体一样。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了。29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好象基督对教会一样，30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31为了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32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33无论怎样，你们各人都要爱自己的妻子，好象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应当敬重丈夫。

================================

契约与联合

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彼此相处在一起，就像是互相以契约的形式，共同处于一个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之下。这种社会契约，是建基于彼此信任、诚信、公平正义的基础之上。从根本上说，社会契约的根基，是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仁爱，更首先是在于人对于上帝的敬畏与热爱。我们人生的目的与终极价值，不是在于地上的荣华，而是在于得到上帝的悦纳，进入那无限幸福美好与永生的国度之中。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只有当人与上帝和好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才可能真正地和好。只有当人的心中对上帝有敬畏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才可能有真正的诚信。只有当人得到了上帝的饶恕恩典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才能够真正地彼此饶恕、包容与原谅。

=========================

社会契约论

当我们认识到信仰的真正价值与意义的时候，当我们明白——应当怎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怎样持守和见证我们的信仰、怎样面对世事、怎样与人相处、怎样思考社会与人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认真地思考，社会政治组织形式与制度中的一些重要而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并在社会制度层面上，进行科学而仔细的设计与规划。

卢梭所著的《社会契约论》描述了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些基本运作原理和原则。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究其根本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真正根基，应当是爱。只有在爱的基础上，人们才能彼此包容、饶恕、接纳、信任、合作、协调。人与人之间，本应当是弟兄姐妹。这样的弟兄之爱，唯有是来自于上帝的恩典慈爱、圣洁公义。

===============================

人怎样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应当以热忱的信仰与生命，荣神益人。我们应当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我们的神，并爱人如己。我们应当在一切

事情以及言语行为中，仰望我们的造物主、救赎主。我们所作的一切事情，都应当是为了归荣耀于神。因此，我们应当爱人如己，应当尽一切力量与生命，见证上帝在我们生命之中的恩典与大能。

+++
+++
+++++++++++++++++++++++++++++++

马太福音5-7章

1耶稣看见群众，就上了山；他坐下之后，门徒来到他跟前，2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3“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4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5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6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7怜悯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8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看见　神。
9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
10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11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12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
门徒作盐作光（可9:50；路14:34~35）
13"你们是地上的盐；如果盐失了味，怎能使它再咸呢？结果毫无用处，唯有丢在外面任人践踏。14你们是世上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15人点了灯，不会放在量器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16照样，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
论律法
17"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成。18我实在告诉你们，就算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全部都要成就。19因此，无论谁废除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这样教导人，他在天国中必称为最小的；但若有人遵行这些诫命，并且教导人遵行，他在天国中必称为大。20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就必不能进天国。
不可恨人（路12:58~59）
21"你们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杀人的必被判罪。'22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发怒的，必被判罪。人若说弟兄是'拉加'，必被公议会审判；人若说弟兄是'摩利'，必难逃地狱的火。23所以你在祭坛上献供物的时候，如果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对你不满，24就当在坛前放下供物，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你的供物。25趁着你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要赶快与他和解，免得他抓你去见法官，法官把你交给狱警，关在监里。26我实在告诉你，除非你还清最后一分钱，否则决不能从那里出来。

不可动淫念

27“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不可奸淫。’28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心里已经犯了奸淫。29如果你的右眼使你犯罪，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被丢进地狱里。30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进到地狱里去。

不可休妻（太19:9；可10:11~12；路16:18）

31“又有这样的吩咐：‘人若休妻，就应当给她休书。’32可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如果不是因她不贞，就是促使她犯奸淫；无论谁娶了被休的妇人，也就是犯奸淫了。

不可发誓

33“你们又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背约，向主许的愿都要偿还。’34可是我告诉你们，总不可发誓，不可指着天发誓，因为天是　神的宝座；35不可指着地发誓，因为地是　神的脚凳；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发誓，因为它是大君王的京城；36也不可指着自己的头发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37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不可报复（路6:29~30）

38“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以眼还眼，以牙还牙。’39可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对抗，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另一边也转过来让他打；40有人要告你，想拿你的衬衫，就连外套也让他拿去。41有人要强迫你走一里路，就陪他走两里。42有求你的，就给他；想借贷的，也不可拒绝。

当爱仇敌（路6:27~28、32~36）

43“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4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45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46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作吗？47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甚么特别呢？教外人不也是这样作吗？48

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1“你们小心，不要在众人面前行你们的义，让他们看见；如果这样，就得不到你们天父的赏赐。2因此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到处张扬，好象伪君子在会堂和街上所作的一样，以博取众人的称赞。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3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4好使你的施舍是在隐密中行的。你父在隐密中察看，必定报答你。

如何祷告（路11:2~4）

5“你们祈祷的时候，不可像伪君子；他们喜欢在会堂和路口站着祈祷，好让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6但你祈祷的时候，要进到密室里去，关上门，向在隐密中的父祈祷。你父在隐密中察看，必定报答你。7你们祈祷的时候，不可重复无意义的话，像教外人一样，他们以为话多了就蒙垂听。8你们不可像他们，因为在你们祈求以先，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9所以你们要这样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10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一样。
11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
求你今天赐给我们；
12赦免我们的罪债，
好象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
13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14如果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15如果你们不饶恕别人，你们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禁食不让人知

16“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伪君子那样愁眉苦脸，他们装成难看的样子，叫人看出他们在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17可是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18不要叫人看出你在禁食，只让在隐密中的父看见。你父在隐密中察看，必定报答你。

积财于天（路12:32~34）

19“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聚财宝，因为地上有虫蛀，有锈侵蚀，也有贼挖洞来偷。20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蛀锈蚀，也没有贼挖洞来偷。21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里面的光（路11:34~36）

22“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如果你的眼睛健全，全身就都明亮；23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全身就都黑暗。如果你里面的光变成黑暗，这是多么的黑暗！

不要为明天忧虑（路12:22~31）

24“一个人不能服事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事 神，又服事金钱。25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甚么喝甚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甚么。难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吗？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26你们看天空的飞鸟：牠们不撒种，不收割，也不收进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牠们；难道你们不比牠们更宝贵吗？27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28何必为衣服忧虑呢？试想田野的百合花怎样生长，它们不劳苦，也不纺织。29但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最威荣的时候所穿的，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30田野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进炉里， 神尚且这样妆扮它们；小信的人哪，何况你们呢？31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甚么？喝甚么？穿甚么？’32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34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1“不可判断人，免得你们被判断。2你们怎样判断人，也必怎样被判断；你们用甚么标准衡量人，也必照样被衡量。3为甚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木屑，却不理会自己眼中的梁木呢？4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弟兄说：‘让我除掉你眼中的木屑’呢？5伪君子啊！先除掉你眼中的梁木，才可以看得清楚，去除掉弟兄眼中的木屑。6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免得牠们用脚把珍珠践踏，又转过来猛噬你们。

祈求就必得着

7“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8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9你们中间哪一个人，儿子向他要饼，反给他石头；10要鱼，反给他蛇呢？11你们虽然邪恶，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难道不更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12所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

13“你们当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14但引到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路6:43~44）

15“提防假先知！他们披着羊皮到你们当中，里面却是残暴的狼。16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里怎能摘到葡萄？蒺藜里怎能摘到无花果呢？17照样，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18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19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被砍下来，丢在火中。20因此你们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21“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22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难道我们没有奉你的名讲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过许多神迹吗？’23但我必向他们声明：‘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听道要行道（路6:47~49）

24“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又遵行的，就像聪明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盘

石上。25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却不倒塌，因为建基在盘石上。26凡听见我这些话却不遵行的，就像愚蠢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沙土上。27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

28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群众都惊奇他的教训。29因为耶稣教导他们，像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经学家。

++

=============================

人生的价值与目的

【引述：马太亨利圣经注释序言】

信仰是真正有价值的事情；认识、热爱、敬畏我们的造物主、神，并在我们一切的事情、行动和交谈中以热忱的情感仰望他，遵守他的诫命（传12：13）；无疑地，这才是一个人的全部意义；这是一个人的全部价值所在。在《传道书》中的许多讲述之后，得出的最后结论，就在于此；所以，我也把这个原则当作是整件事情的根本基础。一般性地，这是对一切人类所必需的；这世上如果没有信仰，那么，人的荣耀也就无处得以保守；人类社会的秩序也根本无法得以保持。具体地，对我们每一个人来

说，我们也必需要有敬虔的信仰；否则，我们就无以回应我们受造的目的所在，无以回应我们造物主对我们的恩惠，我们的内心也不会安稳轻省，更永远也不会有幸福。一个人，被造物主赐予了心灵和理解的能力，能够明晓、服事、享受自己的造物主；但是，如果他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眼目和心中却全然忘记了神，那么，他就是日光之下的一只最可鄙、最可悲的动物。

==========================

上帝之国

约翰福音18章36-38节：

36耶稣回答："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的臣仆就要作战，使我不至被交给犹太人。不过，我的国不是这世上的。"37于是彼拉多问他："那么，你是王吗？"耶稣说："我是王，你已经说了。我要为真理作见证，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上。凡是属于真理的人，都听我的声音。"38彼拉多问他："真理是甚么？"

【马太亨利圣经注释】

基督在接下来的回答中，对彼拉多的前一个问题，即"你是王吗"作了更完全和直接的回答，解释在什么意义上他是王，但不是在任何方面危及罗马政府的王，不是一位世俗的王，因为他的利益不是用世俗的方法支持，约

18:36。请留意，

[1.] 对基督的国的本质与构成的叙述：它不属这世界。这是用否定的说法纠正当前人对它的错误看法；但这隐含了肯定的事，它是天国， 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基督是一位君王，有一个国，但这国它不属这世界。第一，它不是从这世界兴起；人的国从海里从地中上来（但7:3；启13:1,11）；但圣城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启21:2。他的国不是通过继承，选举或征服而立，而是藉着神旨意和计划直接和特别任命。第二，它的本质不是属世界的；它是在一个在人心里的国（路17:21），建立在他们心里和良心里（罗14:17），它的财富是属灵的，它的能力是属灵的，它一切的荣耀在于内。基督国中的国务大臣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林前2:12,。第三，守卫和支持它的不是这世上的；它的兵器是属灵的，它不需要、也不使用世俗的势力来维持和扩展，也不是用与列王和各省有害的方法治国；它丝毫不干预君王的特权或他们臣民的财产；它不是为了改变在世俗之事方面任何国家的建制，除了罪和撒但的国以外，不与任何国作对。第四，它的趋势和目的不是这世上的。基督不追求，也不容他的门徒追求地上的尊贵人的排场和权柄。第五，它的臣民虽然在这世上，却不属世界；他们从世界中蒙召被拣选，从另一个世界生，往另一个世界去；他们既不是这世界的学生，也不是它的宠儿，既不受这世界智慧的规管，也不因这世界的财富致富。

[2.] 提出基督的国属灵本质的一个证据。如果他要反抗政府，他就会用他们自己的武器反对他们，就会按同样性质以暴制暴；但是他没有走这条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我的国被他们败坏。”但是，第一，跟从他的人没有提出要争战；没有暴动，没有拯救他的企图，虽然此时城里满了加利利人，他的朋友和同乡，一般他们都有武装；但在这重大时刻他门徒和平的表现足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第二，他没有命令他们争战；并且他禁止他们争战，这证明他既不依靠世界的帮助（因他本可以传召十二营天使为他服务，这表明他的国是从上头来的），也不惧怕世界的拦阻，因为他非常愿意被交给犹太人，因为他知道，他的国要是推进和建立，任何世上的国

就会如何被毁；所以他正当地得出结论，现在你可以看到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在这世界，但不属这世界。

(5.) 他回答彼拉多进一步的提问，就更直接加以回答，约18:37，我们在当中看到，[1.] 彼拉多直截了当的问题："这样，你是王吗？你说你有一个国；到底你是谁，你是王吗？对这样的宣告，你有什么说法？你自己解释吧。"[2.] 作为对此的回答，我们的主耶稣在本丢彼拉多面前作美好见证（提前6:13）："你说我是王，就是，按你说的，我是王；因为我来给真理作见证。"第一，他承认自己是王，但不是按照彼拉多所指的意思。弥赛亚是按照王，弥赛亚王的身份受人期待；所以，他向该亚法承认了他是基督，就不会面对彼拉多，不承认他是王，免得他似乎自己前后不一。请注意，虽然基督取了奴仆的形象，但即使这样，他仍有充分根据宣告拥有王的尊荣与权柄。第二，他解释自己的话，表明他如何是王，就是他来给真理作见证；他通过真理的大能在人心中作王。如果他要宣告自己是世上的王，他就会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作万民的王，征服诸王，占有诸国；"不是的，他来作见证，见证创造世界的神，见证反对败坏世界的罪，通过他见证的道，他建立并维护他的国。圣经预言他要作万民的见证，并且作为这样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赛 55:4。基督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世界诚实少见（赛59:15，Qui nescit dissimulare, nescit regnare — 人不能作假，就不知如何作王），而是属于真理永远作王的那世界。基督到世上来的使命，他在世上的工作，就是给真理作见证。 1. 启示真理，向世人显明关于神、他的旨意和他对人的美意，约1:18；约17:26，而没有他给真理见证，人是不可能认识这一切的。2. 证实真理，罗15:8。通过他行的神迹，他为信仰的真理，神的启示、神的完全和护理的真理，以及他的应许和约的真理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通过如此行、他是王，建立起一个国度。(1.) 基督的国的根基和权柄，精义和特征，是真理，属神的真理。当他说，"我是真理"，他实际上是在说，我是王。他用真理那说服人的证据征服；他用真理命令的权柄统治，为真理，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诗 45:4。他要用他的真理信实审判万

民，诗96:13。真理是他国的权杖；他以慈绳吸引人，以向我们启示，因对他的爱被我们接受的真理吸引人；就这样他将人心意夺回顺服。他到世上来乃是光，就像日头用光线作王一样作王。(2.) 这国的臣民是属真理的人。被神的恩典从说谎人的父的权势下拯救出来，所有被改变来领受真理，服从真理的权柄和影响的人，都要听基督的声音，要成为他的臣民，要相信他，真正忠心于他。每一个对真信仰有任何真认识的人，都要接受基督教信仰，他们属于他的国度；使用真理的大能，他要使他们甘心，诗90:3。所有爱真理的人，都要听基督的声音，因为除了在基督里，哪里都找不到更伟大、更美好、更确实和更甜美的诸般真理，真理和恩典由他而来，因着听基督的声音，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约壹 3:19。

(6.) 彼拉多为此向他提了一个好问题，但不等回答，约18:38。他说，“真理是什么呢？” 说了这话，又出来。

[1.] 肯定这是一个好问题，是向一位无人比他更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发问。真理是那颗重价的珠子，人的悟性愿意并追求要得到它；因为不得到它，或至少那被认为是真理的，悟性就不能歇息。当我们查考圣经，领受神话语的事奉，这查考一定要这样询问，真理是什么呢？并带着这祈求，求你带领我进入你的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 但是很多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并没有足够的耐心和坚持，在他们对真理的追求中坚忍到底，或者没有足够的谦卑和真诚，在找到真理的时候领受，提后3:7。就这样，许多人面对他们自己的良心，问良心这些不可缺的问题，“我是谁？”“我做了什么？”但却不花时间寻求答案。

[2.] 不肯定彼拉多问这个问题有何目的。第一，也许他说这话，就像一个开始对基督有好感，带着某种敬意看他的人那样，为要学习，希望了解在信仰和学问方面他可以进一步有的新观念，自称可以有怎样的进步。但虽然他希望从他那里听到一些新的道理，就像希律希望从他那里看见一些神迹一样，但在他门口祭司们的暴徒的喧嚷和大怒，让他不得不突然中止这谈话。第二，一些人认为他是作为一名审判官说这话，进一步查问现在被带到他面前的这案情：“让我看看这神秘的事，告诉我它有什么真理在其

中，这件事真实的情况。”第三，其他人认为他是讥笑着说这番话，是一个嘲笑的人：“你说到真理；你能说什么是真理吗，或者给我一个真理的定义？”就这样他取笑永远的福音，大祭司仇恨和逼迫，基督现在为此作见证和受苦的那伟大真理；他就好像喜欢讥笑所有信仰的无信仰之人那样，对双方发出嘲笑；所以基督不回答他。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但是，虽然基督不愿告诉彼拉多真理是什么，他却已经告诉了他的门徒，并且通过他们告诉了我们，约14：6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7如果你们认识我，就必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看见了他。”

+++
+++
+++
+++
+++
+++
+++
+++
+++
+++
+++
+++
+++
+++
+++
++

——

五四运动

（引述维基百科相关文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5%9B%9B%E8%BF%90%E5%8A%A8

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民国八年）5月4日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治下，是中国学生运动史重要一页，参与者亦包括广大公民、市民和工商人士。形式包括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等对抗政府的行动。事件起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中日虽然同为战胜国，但列强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即山东问题。有国人极度不满当时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从而上街游行表达不满。五四最著名之口号是“外争主权（对抗列强侵权），内除国贼（惩处媚日官员）”。
广义五四运动则是指自1915年日本胁迫中国接受《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到1926年北伐战争这段时间，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在新文化运动反思及批判华夏传统文化，追随“德先生”（“民主”的英文“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的英文“Science”），探索强国之路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1924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和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通告，第一次要求各地的党团体的组织展开“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强调恢复国权运动、新文化运动，纪念五五（马克思生日），目的在于传播马克思主义。1939年八路军总政治部、中共中央青委发出《关于部队纪念“五四”青年节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中央青委决定每年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1949年后成中国大陆的固定节日）。

背景

新思想的传播与发展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代，而在民国初年这种影响随着《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展，自由和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的市民。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从思想、政治和文化领域激发并影响了华人尤其是华夏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这两种理念从根本上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社团组织在民国的发展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工读互助团等等，让五四运动在全国展开有了组织上的基础。

高等教育进步

中国的教育制度在清末的新政中，学习西方及日本学制而改革。到了民初，高等教育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李大钊、朱家骅、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英国文学）、刘师培、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严复（翻译家）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同时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注：鲁迅并不是北大职工，而只是兼职。因为当时北大规定，到北大任职，必须辞去原来职务，而鲁迅是教育部里资料抄写员。）

民族主义情绪

1914年8月23日，大日本帝国加入英法协约国阵营对德意志帝国宣战，旨在夺取德国在东亚的殖民地，包括胶州湾。经70多日激战，于11月7日全部占领德国胶州湾租借地。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北洋政府在5月9日，接纳了其中大多数的要求，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协定，为新闻界所得知，并发布该协定，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使中国知识分子及民

众对于日本以及卖国政府强烈的不满，被认为这是国耻，同时也引发了不少反日的活动，这种情绪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发展而发挥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站在英法协约国一方向同盟国阵营德国及奥匈帝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洋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军，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同年9月，北洋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主要内容为： 1、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2、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 3、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 北京政府在换文中，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后被北京学生痛殴。在中国对德宣战，与日本同为战胜国，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没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扩大了，这一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

一战与工商业成长

清末以来，中国的工商业虽有所发展，但在西方产品的输入情形下，中国本土工商业的发展仍然有限，一战的发生使欧洲各国产业无力东顾，中国的工商业获得很大的发展，参与工商业的人口持续增加，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得以巨大发展，城市中的工商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更显重要，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成为声援爱国学生的主要力量。

北京政府派系斗争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政府总统、内阁、国会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故政治运作较先前为畅顺。当时政府领导者为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及“安福国会”幕后领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个党派、各地军阀的制约，政策因之时有变异。“五四运动”发生之后，“研究系”以政府外交失败做斗争“安福系”工具，藉传媒煽动学生举办爱国示威游行，并进一步造成“六三运动”，使得学运风潮扩大，最终逼使相关政府领导人下台负责。除此之外，“文治派”与“安福系”也借机相互攻讦，以谋求自我派系之利

益。是以“五四运动”绝对不可以单单理解为群众在爱国意识之下的自发行为；事件源起、扩大都深受党派斗争之影响。

三一运动

1919年3月1日，在五四运动的前两个月，日治朝鲜爆发三一运动。朝鲜独立人士在首尔塔洞公园宣读《独立宣言书》引发数万名人民反日游行示威。三一运动很快席卷整个朝鲜半岛。有200万以上群众参加了上千起反日示威和暴动。

近因

从1917年7月起，任交通兼财政总长的曹汝霖与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人受命于国务总理段祺瑞以出卖主权的代价向日本政府大举借款。1918年，曹汝霖与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商定，以高徐、济顺两路路权为抵押，借款三千万日元，并密电驻日公使章宗祥在日本签字。

1918年11月11日德国停战，一战结束。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4月15日，中国代表团向巴黎和会提出《废除中日民四条约说帖》，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希望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根据《关于山东之条约》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只是归还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德国掠去的天文仪器。

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电文称：“汪、林二总长转外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徵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

林长民《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头版头条：“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

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商量处置，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款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款出于胁迫，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草约，为预备合同，尚未正式订定。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
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合法条件。但结果，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在6月28日终于签订《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进而引发了五四运动。
过程
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齐集天安门示威的计划。这四条办法是：（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
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点，北京大学等十三所院校三千余名学生汇集天安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合约签字”等

口号，并在集会上宣读了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然后，总指挥傅斯年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队伍随即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学生代表要求会见四国公使，罗家伦、江绍原前往各国使馆递送英文的备忘录，各使馆均派员接见并表同感，但由于礼拜天三国大使不在馆内，巡捕房不准学生前往，最后仅能到美国使馆前。学生们在美国使馆前高喊在“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之后，队伍中喊出一句：“去找曹汝霖算账去！”矛盾遂转向“内惩国贼”——学生开始向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之北的赵家楼曹宅所在地移动，一路上高喊“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下午两点多钟，大规模游行队伍到达曹宅，数百名军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队伍不得入内。学生向军警讲明来意说：“我们是爱国学生，来这里是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军警于是放行。学生进入胡同，发生暴乱痛打了在曹家串门的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

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蔡元培、朱家骅等“欧美同学会”会员（时会长蔡元培）当时为了营救学生，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界罢工罢市，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务农人员。北京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当权的亲日派和保守派认为此次事件为主张思想学术自由的北京大学所导致，蔡元培被迫辞职。教授学生请求挽留被内阁拒绝，于是北京各专门学校校长全体请辞。徐世昌继而下达不准学生干政集会令，罢免了同情蔡元培的教育总长傅增湘。

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

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总罢课，宣传反日，抨击政府，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日本公使向外交部诘问，要求禁止学生活动，日本军舰集中于天津、上海、南京、汉口，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包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全国大小二百余城的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北京教职员联合会随之成立。5月中旬，北京、天津学生代表陆续抵达上海，会同当地学生向商人劝说抗争。

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2日，北京二次逮捕学生，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40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4日，逮捕学生7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有5000学生自请入狱。一千余女学生向总统府抗议。教职员慰问在狱中学生。政府感到高压手段无效，撤退了包围北京大学的军警。徐世昌派人慰问学生，学生活动第二步胜利。

6月5日，由于北京逮捕学生，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

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

被免职，大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6月28日，中国代表顾维钧等人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大事记

3月6日，梁启超致电北洋政府总统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事务长林长民，报告他从和会上获知的段祺瑞与日本借款和山东问题。

4月24日，梁启超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发布归还青岛通电。

4月29-30日，巴黎和会代表参加会议，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条款第156、157、158条，德国在山东权益让与日本。

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徵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上海《大陆报》"北京通讯"："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5月2日，北洋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外交委员会事务长、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撰文："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5月3日下午，以林长民为首的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召开会议，决定阻止政府签约。国民外交协会协会理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将外交失败转报罗家伦、傅斯年等学生代表。当晚北大学生在北河沿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大会决定于４日（星期天）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

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时，北京学生3000余人从汇集天安门，现场悬挂北大学生"还我青岛"血书。队伍由傅斯年带领向使馆区进发，受到巡捕阻拦，学生代表要求会见四国公使，罗家伦、张文英、江绍原前往各国使馆递送英文的备忘录。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随后发生学生大规模游行。北京军警捕去学生32人。当晚，国务总理钱能训在其私宅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清华学生宣布"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

″。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朱家骅等“欧美同学会”会员斡旋，被捕学生返校，学生复课。

5月6日，南北和谈双方代表朱启钤、唐绍仪在上海联合通电，要求中国外交代表拒绝巴黎和会签字，释放被捕学生。

5月7日，徐世昌下令全部释放因“火烧赵家楼”而被逮捕的学生。上海60多个团体举行国民大会。

5月9日，蔡元培出走。上海各学校全部罢课。驻军湖南衡阳的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通电曰：“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

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 北京各大专学校教职联合会成立。

5月13日，北京各大专校长递交辞呈。

5月15日，徐世昌罢免教育总长傅增湘。

5月19日，北京25000名学生再次总罢课，上书徐世昌，要求释放被拘学生、挽回傅增湘蔡元培、拒签和约、惩办国贼。之后开展演讲、抵制日货、发行爱国日刊等活动，组织“护鲁义勇队”。

5月21日，徐世昌免李长泰步军统领职，令态度较强硬的王怀庆署理。

6月1日，政府查禁联合会。

6月3日，北京学生因政府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举行大规模街头演讲，当日170多名学生被捕。

6月4日，北京学生出动比昨日多一倍的人数上街演讲，当日700多名学生被捕，关在北大三院校舍。军警包围了北大，在四周搭起帐篷。

6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被监禁的学生获释。

6月6－8日，罢工规模扩大。

6月9日，南京路工人示威。

6月10日，北京政府撤销曹、章、陆职务。

6月11日，徐世昌总统咨参众两院请求辞职，未被接受。

6月12日，商人开市。钱能训内阁全体请辞。

6月13日，准钱能训辞职，特任龚心湛兼代国务总理。

6月17日，北京政府致电专使在和约上签字。
6月22日，国务院通电全国，徐世昌总统打消辞意。
6月23日，徐世昌会见张文英等留日学生及山东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电令中国全权代表陆徵祥从缓签字。
6月27日，京津学生，留日留美学生请愿。
6月28日，原定签约之日，中国驻地代表团被留学生包围，代表团发表声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后期

1921年11月11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九个战胜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国际会议。中国政府时值颜惠庆内阁，派出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三人为全权代表，余日章、蒋梦麟为国民代表，朱佛定为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还在华盛顿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学生代表

北京

方豪（1894-1955），浙江金华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及其后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的首任主席。后在安徽、浙江等地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罗家伦（1896-1969），浙江绍兴人，字志希。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起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五四后留学海外，后来担任过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校长（1928年9月18日就职）。逝世

于台北。

段锡朋（1897-1948），江西永新人，字书贻。北京大学学生会会长、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会长。逝世于上海。

王自治（1889-1965），甘肃正宁人，字立轩。北京大学学生，继段锡朋之后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后长期在甘肃省任职，并从事教育工作，曾任甘肃学院（今兰州大学前身）院长。曾参加中国国民党。1949年后留在中国大陆，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后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后来因与王明等人产生矛盾而借机出逃。最后逝世于加拿大。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字孟真。北京大学学生，五四游行总指挥。五四后游学柏林、伦敦等地。归国后致力于学术研究，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曾任台湾大学校长。逝世于台北。

邓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参与火烧赵家楼行动。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中共高级领导人。被中国国民党逮捕后杀害于南京。

许德珩（1890-1990），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学学生。后创立九三学社，任主席。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病逝于北京。

匡互生（1891-1933），湖南邵阳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首位冲进曹汝霖家者，也是火烧赵家楼的点火者。后为教育家。

易克嶷（生卒不详），北京大学学生。

夏秀峰（1895-1976），湖南新宁人，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学生，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学生代表，1919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会议上写血书。后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

谢绍敏（生卒不详），贵州赤水人，北京大学学生，1919年5月3日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召开的大会上写血书“还我青岛”。

罗章龙（1896-1995），湖南浏阳人，北京大学学生。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高君宇（1896-1925），山西静乐人，北京大学学生。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罗隆基（1896-1965），江西安福人，清华学校学生。后为中国民主同盟主要领导人之一。
王造时（1903-1971），江西安福人，清华学校学生。清华学校学生评议会主席（清华学校学生运动的领导机构）。清华学校学生代表团成员，清华学校学生会第一任会长。曾经两次被捕（一次是在东安市场散发传单，一次是去向政府请愿）。
陈长桐，清华学校学生。
何浩若（1899-1971），清华学校学生。后加入中国国民党，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创办中央日报。逝于台湾。
闻一多（1899-1946），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清华学校学生。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清华学校代表。后为诗人，学者，曾任西南联大教授。被暗杀于昆明。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后来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
郑振铎（1898-1958），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于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铁路专科学校代表。作家。
耿济之（1898-1947），上海人，与瞿秋白同为俄专代表。翻译家，俄罗斯文学研究家，外交家。文学研究会重要创始人之一。与郑振铎同为《国际歌》的最早译者。
天津
杨兴亚，天津学生联合会总代表
张太雷（1898-1928），江苏常州人，北洋大学学生，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部部长。后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广州起义。但在起义中被暗杀。
于方舟（1900-1928），直隶宁河人，原名兰渚，又名芳洲。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学生，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代表。后为中共天津市委创始人之一，1928年去世。

马骏（1895-1928），黑龙江省宁安人。又名天安，字遹泉，号淮台。回族。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后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孙越崎（1893-1995），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学生代表

周恩来（1898-1976），南开中学学生，天津觉悟社领导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曾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谌志笃

沙主培

山东省

张文英（1898-1973），山东省桓台县人，本名姬文，字文英，汉族。五四运动时期的山东省学生联合会主席以及留日学生救国团领袖，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曾担任天津永大和久利执行与总务主任二十三年，立项并支持研发出了侯氏碱法。

上海

何葆仁，复旦大学学生，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

周明栋（1898-1982)，同济大学学生，上海学生联合会调查科主任，同济学生代表。

武昌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原名澄，字云先。中共创始人之一。

领导人

蔡元培（1868-1940），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北京大学时任校长。

朱家骅（1893.5.30－1963.1.3），柏林大学博士，中国教育家，地质学家、学者，北京大学时最年轻的地质学教授、德语系主任。

李大钊（1889-1927)，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首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胡适（1891-1962），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思想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民主维新人士。

林长民（1876-1925），国民外交协会理事。

鲁迅（1881-1936）， 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作家。

相关团体

北平

欧美同学会：会长蔡元培、会员朱家骅、胡适等。

国民外交协会：1919年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北京大学英语专业学生张庭济担任英文翻译。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少年中国学会：一些不满现状、主张社会改造的青年组成。根据马志尼在西方创造"少年意大利"创建。1918年6月30日发起，7月1日正式成立。发起人是王光祈、周太玄、李大钊、陈愚生、曾琦、雷宝菁、张梦九。王光祈是学会初期的主要负责人。学会存在达六年之久，先后入学会的有120多人。总会设在北京，在南京和成都设有分会，国内许多省份都有它的会员。在国外，旅居法国的会员最多。刊物：《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和《星期日》。1925年五卅运动兴起后，学会分裂，无形解散，停止活动。

新潮社：《新潮》（英文名称是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之意）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口号，与当时的《新青年》杂志相呼应。它是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团，主要发起人是傅斯年、罗家伦。该社1918年11月19日开始成立，19年元旦创刊《新潮》月刊，1920年8月15日正式改成学会。成立时会员21人，1919年底发展到37人。"五四"后不久，傅、罗先后出国留学，新潮社即停止活动。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会团，主要发起人是邓中夏、廖书仓等。1919年3月成立，1925年结束活动，会同曾发展到六七十人。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大学学生高崇焕、邓中夏等十九人发起。

民治主义同志会：1922年春天，由北京大学九个学生发起的。这九个人是王汝(后改名昆仑)、傅汝霖、锺汝中(后改名天心)、陈兆彬(后改名君朴)、邹德高(明初)、陈铭德、谭克敏、袁世斌、姜绍谟等。

实践社：发起人李寿雍、许孝炎、邓文(火军)等。除邓文于1926年同李大钊先生一同遇难外，其成员大部分均倾向于支持国民政府。

兴中学会：发起人童冠贤、王次甫、王礼锡等。此派以不左不右自命，后来王次甫加入新政学系，童冠贤则在蒋战败时，"人弃我取"地当上了政府的立法院长。学会经费由商震供给。

国民会议促成会：1925年5月1日在北京成立。

上海

国民社：1918年5月，中国留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罢学归国后，在上海成立了学生救国团。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成立国民社，1919年1月创刊《国民》杂志。国民社得到蔡元培、李大钊等的支持，团结了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会员近200名。

天津

觉悟社：为打破天津男女学生的组织分开局面，1919年9月16日创建。当时社员有21人，男女各半。其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张若名、谌志笃等。这个组织比较严密，对外废除姓名，发展新社员必须有三名以上社员介绍，由全体社员讨论决定，他们用抓阄办法决定每人的代号，周恩来就是"伍豪"；邓颖超就是"逸豪"。1920年1月该社创刊《觉悟》，其中周恩来撰写《觉悟的宣言》等。后来周恩来、郭隆真等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觉悟社转地下。

广州

孙文主义大同盟： 1927年1月26日广州成立，后改名孙文主义学会，因黄

埔军校组织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又改为中山主义大同盟。 这个同盟是由八个青年发起的，即郭春涛、邓飞黄、李诚之、于振瀛、李世军、延国符、廖维藩、王炳钧，后来加入者有王立哉、范予遂、黄少谷(湖南人)等二百余人，后大部成员入汪精卫的改组派，并服务冯玉祥。

湖南

新民学会：共产党早期组织，1918年4月14日成立时，1920年底70余人。发起人毛泽东、蔡和森，包括李维汉、向警予、蔡畅、谢觉哉等。起初，“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1920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半淞园主持在沪会员会议，讨论确定学会的态度是“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7月，旅居法国的会员在蒙塔尔集会，议定学会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新民学会便逐渐停止了活动。

四川

诚学会： 是四川学生邹附初、陈铭德、郑献征等所组织，是企图插手四川政局的地方性组织。大部分是民治主义同志会会员，与四川军阀刘湘等有联系。

影响

五四运动从形式上是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会背景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现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亦有着不可低估之影响。因其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与文学发生中的独立性与资源性，以此将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启蒙主义的“五四”，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捆绑在一起。

也有观点认为，五四运动同时存在救亡和启蒙两条主线。但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救亡压倒了启蒙。

五四精神

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有不同看法。在一般的看法中，有一种看法为：科学，民主。1949年后，中共阐述为科学，民主。

思想文化

在1919年10月，总统举行秋定祭孔，同时组织了四存学会，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学”为宗旨，1921年更修订了《褒扬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强化礼教。梁启超和梁漱溟则高唱中国文化优越论。而在五四运动中，某些反对儒家思想文化的人士，推行了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孔家店”、“推倒贞节牌坊”等口号。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反儒家的发展，与独尊儒术的思潮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

中国语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渊源大部分都来自于五四时期的西方理论，包括使用白话文（现代汉语）、国语（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以及汉字简化、汉语拼音等。

对外关系

段祺瑞政府因五四运动而陷入窘境，为挽回政府声誉，希望实现恢复帝俄抢夺的失地，导致皖系徐树铮插手外蒙古分裂。

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平会议上签字，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利益和权益能够保留下来，实际上刚好相反，多国利益及国际秩序被排除后，中国成为日本及苏联竞争利益的场所（因为日本在华有高额投资及移民、苏联则认为中国适合推行共产主义）。由于北京政府的失败，各地军阀利用北京政府的无力，相互攻伐，加剧了中国的内乱。

1921年到1922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提出“十项原则”，山东问题得到解决，日本把青岛交还给中华民国政府但是胶济铁路仍由日本控制，山东实际仍由日本控制，中国自认权益没有完全恢复，但实际上逐出列强势力就等于失去列强保护、也失去了各列强制衡以维持中国基本权益的情势，日本在中国投资移民最多、加上中国突然由日俄战争时及之后的中日友好转为反日，故怀抱最大的怨念，因此中国实际上失去更多的权益。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五四运动的思想相近，日本在二战前获得的情报是此两党都是苏联的傀儡，而实际上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时期，仅仅是允许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教育

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自动主义”“自律辅导主义”等教育思想在五四推动下，教育界引起巨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废除学监制，在“开放女禁”呼声下，1919年秋，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岭南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在教育制度上，妇女权利在五四影响下发生变革。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戌学制），小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大学四至六年，以美国为蓝本，教育得到革新。

文学艺术

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新时代。五四以后，中国出现了大小40多个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深远。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文学巨匠，如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郭沫若、郁达夫等。

美术

五四运动后，出国学画的人逐渐增加。在各地，许多正规的美术院校相继成立，油画也在中国扎根。当时涌现出来的出名画家有颜文梁、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方干民、吴大羽、卫天霖等，其中以所谓“四大校长”，即颜文梁、刘海粟、徐悲鸿和林风眠的影响最大。

政治

五四运动使苏维埃俄国在中国播下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种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便充分显示出：当时广大先进知识分子以及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唯一出路”。

五四运动以后，工人罢工和政治斗争依然不断，1920年五一，北京学生联合会散发《五一历史》传单，使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理论传入工人阶层，为共产党诞生创造了群众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陈独秀也在五四之后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并接受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观点。

评价

与共产党斗争失利的势力一般认为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为后来的国共内战打下始端。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将其定义为“反

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注意这里的“封建”一词是欧洲人马克思意义上的封建观，不是中国先秦时代“分封建国”之封建），并以此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

中国史学界界定五四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可概括为：

彰显了学生当时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

促进了社会各阶层觉醒

加深国人自立图强之意识

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历史学家林毓生教授提到了五四运动的意识形态，认为其可分内容与思维模式两个方面来看，其内容又可分形式与实质两个层次。从形式层次上，五四人物喊出了如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等口号。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以下引述网文）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90506/china-may-fourth-movement-protests-1919-wusi/

“五四”，改变中国的那一天

华志坚

2019年5月6日

在中文里，只需提两三个数字就足以让人想起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说“九一八”，你的听众会知道，你心里想的不是随便哪个9月18日，而是1931年的9月18日，那天，日本军官在中国东北奉天伪造了日本人的铁路遭到蓄意破坏，为日本入侵东北制造了借口。说“五四”，中国所有的青少年都知道你指的是100年前的这个日子发生的事情。

1919年的5月4日，北京发生了学生抗议活动，那是被后人称为五四运动的开端。不久，中国其他城市也举行了类似的抗议游行，社会各界的成员也加入进来。把抗议活动带入高潮的是当年6月的大罢工，它使当时中国的主要工业中心、全球第六大港口上海陷入瘫痪，这里的部分地区那时还处在外国控制之下。

大多数现存的1919年5月4日的照片显示，数千名男女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前，它是通往紫禁城的巨大城楼。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之前，紫禁城是中国历代皇帝的住所。那年，各国代表正在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就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条件进行谈判。有消息称，协约国打算将中国东部省份山东的德占领土转交日本，而不是归还中国。闻此，愤怒的示威者聚集了起来。

抗议者认为，虽然日本可能属于在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但中国也加入了协约国的行列。更何况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已在1918年呼吁开启一个民族“自决”的新时代呢？凡尔赛宫看来正在酝酿的事情好像是又一个外国列强欺凌中国的例子，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别无两样。1842年结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香港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然而，不管学生们对半个地球之外的外国谈判代表们有多么愤怒，他们对本国领导人更为不满，认为那些统治中国的军人是腐败的独裁者，未能守护好中国的国土。早在1915年，学生们就已在抗议当时最有权势的军阀袁世凯，抗议他允许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满洲扩张，以及自封为新王朝皇帝的

做法。还是在1915年，年轻的知识分子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这本进步刊物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发表了大量批判帝国主义、军阀统治和保守文化范式的文章。

陈独秀以及另一名经常在《新青年》发表文章的李大钊启发了五四抗议者，所以，尽管他们在1919年5月4日高举的横幅关注的是山东问题，但也表达了更广泛的不满。当时有观点认为，中国在外交上的软弱不过是整个民族病入膏肓的一个症状而已。尽管1911年的辛亥革命废除了过时的帝制，但中国离一个现代国家还差很远。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需要彻底打破等级制度和保守的儒家传统。尤其是陈独秀，他认为，现代中国人应该接受“赛先生和德先生”，而不是固守长尊幼卑、男尊女卑。

天安门前的集会并不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唯一重大事件。学生们袭击了他们认为特别可耻的官员的住所。警察施暴并逮捕了数十名青年；其中一人遭到毒打，后因伤势过重死亡。

中国有一项悠久传统，认为学者在出现暴政时应该仗义执言。学生是成长中的学者，一名学生为捍卫爱国事业而死亡，激起社会各界人士对五四抗议活动的支持。他们和学生一起举行了更多的游行，并抵制日货、组织罢工，直到1919年6月，中国政府在他们的三项主要要求上做出了让步。

北洋政府指示其在法国的代表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将三名被抗议者认为特别腐败的官员解职；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学生。

五四抗议活动后来并没有实现其核心外交目标：1920年1月《凡尔赛条约》生效时，日本还是得到了德国以前在中国的领土。尽管如此，这场运动因其他成就而享有盛名，成为学生领导的群众行动效力的象征。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其原来的范围。就像法国政治想象中的“68年5月”(Mai 68)这个日期短语一样，在中国，“五四”让人想起整整一代人，而且是不寻常的一代人。

新的期刊、研究会和政治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杂志刊登了批评性的政治评论、实验性的文学作品、中国知识分子抨击传统价值观的檄文，以及西方、日本和俄罗斯思想家作品的译文。研究会推广各种来自国外的理

论，从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自由主义（他在中国的巡回演讲就始于1919年的抗议活动之前）到各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
李大钊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最早、最热情的倡导者之一，支持布尔什维克用革命战胜帝国主义、推翻资本主义的呼吁。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他和陈独秀都是创始人。另一位创始人是来自湖南的五四活动人士，他写过不少抨击儒家婚姻习俗的文章，认为那些习俗对女性不公平。他的名字叫毛泽东。
20世纪30年代，在（当时非法的）中国共产党地下活动分子支持下，学生走上街头，要求蒋介石领导的执政党国民党更积极地抵抗日本的侵略、保护中国时，他们提到了"五四精神"。国民党也声称自己是这种精神的最佳体现。一场五四遗产争夺战就此拉开。
到了1989年，当时已经掌权很久的中共领导人自己成了新一代学生的目标，他们呼吁搞一场"新五四运动"。
天安门再次成为最重要的抗议地点。天安门前的区域已在20世纪50年代改造成了一个广场，广场有许多纪念物，包括位于广场中央纪念中国革命英雄的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底部的一幅浮雕作品描绘的就是1919年走上街头的青年男女。1989年的学生们把他们的指挥中心就设在了这幅浮雕前。
1989年5月4日，中国共产党在天安门广场一侧的人民大会堂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时，抗议者在广场上举行了与之竞争的活动。再一次，两个对立的政治阵营都声称自己是1919年那场运动的继承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恰好在一个月后进驻广场，并在这个过程中杀死了数百名，也可能数千名的示威者和居民。
被西方广泛称为"天安门广场"抗议的活动在中文里叫"六四运动"，当然，"六四"指的是1989年大屠杀的那天，但也与1919年的"五四"相呼应。
然而今天，虽然"五四"出现在中国大陆的许多网络和印刷出版物上，但"六四"仍是禁忌。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控制五四抗议活动意义的努力有

增无减。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的转折点和开端，在官方年表中占有崇高的地位。中共利用1919年受人称赞的那种民族自豪感自夸，如今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再一味妥协，而是起领导作用。

中共也做了其他够不上五四精神的事情。中共已经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并把习近平“思想”写入宪法。中共还对将这些做法称为逆行倒施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惩罚。中共甚至有时候禁止网上的维尼熊形象，将其视为嘲笑主席体型的米姆。中国女权主义者因要求性别平等而被拘留。学生活动人士被逮捕，主要原因竟然是因为捍卫共产主义价值观，包括保护工人权利。

中国政府在2014年8月宣布，只有经过预选的候选人才有资格参加下届香港最高行政长官的选举。这引发了一连串后来被为“雨伞运动”的示威和静坐，让香港瘫痪数周。示威者中有许多是学生，他们要求北京当局尊重治理香港的特别规定，这些规定赋予香港一定程度的、大陆所没有的自治和民主权利。中国政府丝毫不动摇。

黄之锋(Joshua Wong)成为国际上“雨伞运动”的代言人时只有17岁，几周前他在Twitter上发了一个简练的帖子。它只有三个年份：“2014、1989、1919”，并配了三张当年发生的历史性示威的照片。

今年4月24日，2014年香港抗议活动的另外8名领导者被判处长短不一的刑期，依据的是对一条过时且很少使用的公众妨扰法所做出的异常严厉的解释。被告们在法院门外出现时毫不后悔，仍在为非暴力抵抗和民主做辩护。4月28日，数万名香港人游行反对一项拟议中的法律，该法律允许将香港人移交内地受审。

仅仅两天后，习近平发表了纪念五四那代人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警告，“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军阀精神重返北京。

中国各地都在周末举行了纪念1919年那场学生运动的官方活动，主持这些活动的领导人所代表的许多政策和价值观都是那个时代的学生们所反对的。官员们似乎没有意识到，真正的五四精神仍在存在。

（引文结束）

++

（以下引述网文）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remarks-by-deputy-national-security-advisor-matt-pottinger-to-the-miller-center-at-the-university-of-virginia-zh/

一个美国视角下的中国“五四”精神——2020年5月4日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的评论

大家，早安。 我是Matt Pottinger，副国家安全顾问，在白宫与您讲话。我带来我的上司，美国第四十五任总统Donald J. Trump向大家的热情致意。

今天我们在线聚集了几千个来自不同的地区的人，因为传染病大流行使我们没有办法相聚。 但通过因特网的奇迹，我们聚集的规模反而更大。作为美国人、作为中国人、作为人类大家庭的成员、我们大家都各尽所能，发挥着从“宏大”到“小巧”的创造力，克服困难，保护社区。

人类创造力的“宏大”包括利用生物技术和数据分析来开发治疗方法和疫苗。同时，创造力的“小巧” 包括生活中的细微之处，比如，待在家里学习相互剪剪头发。我的妻子是个有经验的病毒学家，她今天也在，不过从我的头，您可能发现作为家庭理发师，她还是个新手。

这是我第二次有幸在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与听众交谈。 约十年前，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后，我应邀在米勒中心发言，内容是我从兵役中学到的知识，还有军队与公民的关系。 从那以后，我始终记得米勒中心主任Jerry Baliles的热情和睿智，但他不幸在去年10月去世。他曾为弗吉尼亚和我们国家的公共利益，而服务终生。 我们感谢像Jerry这样的人。

今天，我受 Harry Harding(何汉理)教授和林夏如(Shirley Lin)教授的邀请，同大家分享关于美中关系的一些想法。 林教授告诉我，这次活动恰好是在 “五四”一百零一周年之际。我知道，这是个很好的切入点来展开从美国的视角讨论关于中国的过去和现在。

1919年的“五四”，一次大战结束，北京数千大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抗议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西方国家为了安抚日本帝国，将德国在山东半岛 “权益”转让日本。

游行到天安门的学生高喊：“还我山东！” “拒签《凡尔赛条约》！”等口号，警察强力驱散示威人士。正如政府关闭和平表达的途径后经常会发生的那样，一些学生诉诸暴力，抗议升级。 意识到民怨沸腾，中国政府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

三年以后，在美国的帮助和调停下，1922年在华盛顿海军会议达成协议，中国收回了山东。然而，一百零一年前的今天，学生们发起的运动，意义

远远超越了对不平等条约的民族主义的愤慨。它激励了对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探索。 正如John Pomfret（潘文）所描述的美中关系历史中提到，“五四”运动在于“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 “赛先生”和“德先生”是那次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口号。 有人称运动为“中国的启蒙运动”。Vera Schwarcz（舒衡哲）教授以此为题目，写了本关于“五四”的很有见地的书。 实际上，关于“五四”有很多极好的研究。 今天至少有两位著名的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应邀参加会议：牛津大学的Rana Mitter和弗吉尼亚大学的John Israel。探讨“五四”的历史和意义，我建议请教这些专家。

现在我想花几分钟，来回顾几个张扬了“五四”精神的中国人。

很自然，胡适是“五四”时代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此前，他已经是个为中国现代化而努力的重要思想家。出生在安徽省的胡适，同鲁迅和许多成名作家一样，当时到国外留过学。在康奈尔大学他从学农业，转向学习哲学。胡适曾在美国教育家John Dewey的指导下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胡适贡献给中国人最伟大的礼物是语言。之前，中国的书面语言“文言文”几个世纪以来基本上没有变化。许多研究证明，文言文与白话的距离，不亚于拉丁文同现代意大利语。书面语言的艰深，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设置了鸿沟——这是问题的关键。 文言文，还有识字本身，主要由少数政治精英和读书人掌握，他们最大的愿望是“中举”，读书不是为了普罗大众。

与此相反，胡适认为文字应该反映人民的声音，而不只是记录先贤。“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他推广白话文，确信文字要普及。他对中文语言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事后看来，胡适推广白话文的意义是如此之明显，以至于很容易忘记，这在当时是革命性的想法，曾引起过极大的争议。

北京大学的儒家学者和西方文学教授辜鸿铭，嘲笑扫盲。 他在1919年8月写道：“想想四万万人，九成识字，结果是什么。 想一想，在北京，苦力、马夫、司机、剃头匠、店小二、小商贩、猎人、懒汉，流浪汉都有文化，同大学生一样，都想参与政治，我们的美妙处境会怎样呢？”

这种精英沙文主义一直阻碍了“五四”所拥护的民主理想。 胡适运用他所推广的白话，巧妙地反驳了反对全民社会契约的论点。 胡适说：“民主的唯一途径就是民主”政府是一门手艺，需要实践。 胡适根本不在乎精英主义。

但“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经常受到各方指责，政府官员或御用文人曾经指责，“五四”运动偏袒西方，中国气息不够，甚至不爱国。

但学者张彭春的生平事迹，驳斥了“五四”不够“中国化”的观点。同样是‘五四’一代，像好友胡适一样，张彭春拿到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出于对戏剧的爱好，他第一个把“花木兰”改变成为舞台剧。他把西方话剧介绍到兄长资助的南开大学；再把名旦梅兰芳 邀请到美国演出西化的京剧。中国的传统道德修养和严格的教育理念中，张彭春看到了可以与西方思想相结合而形成新事物的优势。

这最终彰显了张彭春的最高成就：对《世界人权宣言》的决定性贡献。 这份宣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罗斯福夫人（Eleanor Roosevelt）主持的国际专家小组起草的。代表中国的资深外交官张彭春是该小组的成员。 《宣言》的目的是通过道义上的要求，使政府尊重基本人权来防止专制和战争。1948年宣言中规定的人权包括生命、自由、安全、不被奴役或遭受酷刑、宗教自由以及思想自由。

John Pomfret曾写道："把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中国的集体主义结合起来，"张彭春促成了一份所有国家适用的普世宣言。张彭春认为，《人权宣言》不仅仅是关于个人权利，也同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有关。

张彭春的传记作家，斯德哥尔摩大学的Hans Ingvar Roth强调了他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贡献，他说："如今宣言中最有意义的所有方面，比如宣言的普世性、宗教中立性、对个人基本需求和尊严的强调，张彭春都有关键贡献。"

《宣言》在联合国通过后的短短几年，对中国缺乏民主感到沮丧，张彭春辞去了外交官职务。不难发现，张彭春对政府缺乏民主的判断并不来自于古希腊哲学，而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对领导的品德要求。张彭春和胡适都知道"中国人不适和民主" 不过是一派胡言，是最不爱国的论调。今天的台湾就是鲜活的证据。

那么，如今中国"五四"精神在哪里呢？ 在我看来，现在"五四"的继承人，就是有公民意识的中国公民，其表现在于他们做出的大大小小的勇敢行为。李文亮医生就是这样的人。 李医生并不是寻求拯救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个眼科医生，年轻的父亲。他先是做出了小小的勇敢行动，然后才是更大的英勇举措。 十二月下旬，他最初是通过微信向几名医学院同学传递警告，说武汉医院发现严重的冠状病毒病例，敦促朋友们保护自己和家人。

他的警示，没想到，在网上被广为传播，李医生感到不安。不安是有充分理由的。 医院主管迅速告诫他，不要透露冠状病毒病例的消息。 然后，李医生，因"在互联网上发表虚假评论"，受到警察的"训诫"，被迫签字承认"造谣"，被威胁诉讼。如果有人怀疑，这只是地方警察的过激行为，那么官方动用中央电视台对李医生所谓"谣传"大肆宣传，会消除任何疑问。

然后，李医生做了一件大胆的英勇举措。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自己在派出所的遭遇，附上了警察的警告信。全世界都密切关注。 那时李医生已经感染了冠状病毒。他在二月七日的去世使全世界人民感觉像失去了亲人一样。李医生告诉记者："我认为，健康的社会，应该有多个声音，我不赞成公权力的过度干预。" 李医生使用的是胡适的"大白话"。

在今天的中国，见记者， 或当记者都需要勇气。如今在中国，连找到国内外的调查记者都难上加难。一些试图揭露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失踪了，包括陈秋实、方斌和李泽华。 最近几个月，被驱逐出境的外国记者人数超过了几十年中被苏联驱逐出境的人数。 李文亮的医生同事艾芬医生也对武汉的疫情提出了警告。据报道，艾芬医生在接受采访后再也不能露面了。

当政府压制有点勇气的普通行为时，往往招致更大胆的英勇行为。

过去的几个月中，有许多人表现出道德和行动上的勇气，都在追求一个世纪前胡适、张彭春后几代人的共同理想。他们中有政治人物、有人把生命献给了信仰，也有人遵循中国传统的良心学者，很多是普通公民。许章润、任志强，许志勇、伊力哈木、方方、20位拒绝上帝服从共产党的天主教神父，以及去年数百万为法治—法律的统治—而和平示威的香港市民。这些还只是少数。

今天， 五四运动进入它第二个世纪。它的最终遗产将是什么？这个问题，只有中国人民才能回答啊。 五四运动属于他们。"五四"的民主愿望还会等到下一世纪吗？"五四"的核心思想会不会每次都被官方的审查而抹掉？ 今天仍然坚信这一主张的人会被称为"不爱国"、"亲美"有"颠覆性"吗？我们知道共产党会尽量这样做的。 毕竟，毛泽东对"五四"英雄中少数仍被官方承认的最著名作家鲁迅的宽容度也是有限的。1957年，官员罗稷南问毛泽

东：“鲁迅今天还活着会怎样？”毛泽东的回答语惊四座，“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那些有志在中国寻求真理、说真话的人可能会感到安慰，鲁迅写道：“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真实。”

最后，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胡适以解决问题而不在乎抽象政治理论著称。但是，让我打破他“少谈主义”的规则，试问今天的中国是否能从少一些民族主义和多一些平民主义中受益。平民主义民主较少关注左与右，而是关注上与下。 就是说，少数人需要得到多数人的同意。 当掌握特权的人脱离群众、变得狭隘和自私，平民主义能使他们退缩或出局。这是一种动力。 它推动了2015年的英国脱欧；2016年特朗普总统胜选；推动了贵校的创始人1776年参与签署《独立宣言》。它能提醒国家权贵记住他们应该为谁工作：“美国优先”！

类似的想法不也在“五四”精神中存在吗？ 胡适的白话文难道不是针对自觉了不起的贵族吗？难道不是对传统权力结构的宣战吗？不是要在中国建立“民为重”的政府，而不是“打江山坐江山”吗？世界将等待中国人民最终提供的答案。

感谢大家！

（引文结束）

+++

+++

++

++

++

++

五四精神，平民主义，以及把"人民"、"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无产阶级革命家"、等等设立成偶像

五四运动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中间的一次重要思想启蒙与思想普及运动。五四精神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民主与科学。五四运动中的那整整一代中国人，在心中期盼着，用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来更新中国，使中国摆脱旧时代的落后愚昧，焕发出生机勃勃的复兴活力。而在当时，"民主"对于五四运动中的许多中国人而言，就是意味着"平民主义"，意味着"人民"、"劳苦大众"、"平民百姓"的重要性。所以当时，胡适等一批知识分子大力提倡白话文运动，因为白话文相对于文言文而言，更加贴近百姓，更容易学习书写、普及教育，从而更加容易提高社会人口中的识字率、大幅度降低文盲率。

风起云涌、澎湃激烈的五四运动，以民主精神、平民主义的精神，给中国带来了许多正面积极意义的影响作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与推动作用。这种影响作用，与来自于西方文明的民主精神、人道主义精神、基督信仰、等先进文明与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然而，五四运动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列宁主义等思想进入了中国，尤其是在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年轻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埋下了种子。很快，中国共产党将要成立；“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种子将要在中国开花结果。

究其深刻原因，在五四运动的民主精神、平民主义思想中，欠缺了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对于上天、上帝的信仰、敬畏、与寻求；——缺失了对于真理、正义、公义、信仰之根源的执著追问，缺失了“饥渴慕义”。

人与人之间的爱、恩慈、关怀、包容、平等，必须建基于真理、公义、信仰、对于上帝的敬畏与热爱的基础之上。

我们只有在心中真正地敬畏、敬拜、热爱、倚靠那伟大的造物主、创造世人生命之主，才能够有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爱。我们只有得到了上帝的恩慈、饶恕、接纳，才能够真正地在人与人之间彼此恩慈相待、彼此饶恕、彼此接纳。

若我们在心中缺失了那对于上帝的热忱信仰、谦卑寻求、真诚敬畏，那么，我们的所谓民主精神、平民主义精神，就会滑向一个错误的深渊：——我们就会谬误地把“人民”、“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无产阶级革命家”、等等，设立成我们的心灵中的偶像，把他们当成是伟大、光荣、正确、完美的对象，——以他们为我们心灵深处所倚靠的、所顶礼膜拜的偶像。——我们就会跌入欺谎、诡诈、谎言、虚浮的境地，因为我们就会故意无视、欺瞒、转眼不看人心灵与生命之中的罪恶。——我们就会落入虚

谎、诡诈的、各种言辞虚浮的理论与概念怪圈中，甚至落入专制主义、暴政统治、思想桎梏、谎言政权的铁拳奴役之下。

事实上，这正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直至今天的、七八十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这正是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所应当深刻反思、痛切领悟到的、最重要的教训与功课。

=============

【引述 圣经 律法的总纲】

马太福音22章经节

“老师，律法中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呢？”

他回答：“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　神。

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

第二条也和它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

全部律法和先知书，都以这两条诫命作为根据。”

【引述 圣经 基督在登山宝训中论八福】

马太福音5章

耶稣看见群众，就上了山；他坐下之后，门徒来到他跟前，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 神。
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
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
“你们是地上的盐；如果盐失了味，怎能使它再咸呢？结果毫无用处，唯有丢在外面任人践踏。
你们是世上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
人点了灯，不会放在量器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
照样，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
“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成。
我实在告诉你们，就算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全部都要成就。
因此，无论谁废除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这样教导人，他在天国中必称为最小的；但若有人遵行这些诫命，并且教导人遵行，他在天国中必称为大。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就必不能进天国。
“你们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杀人的必被判罪。’
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发怒的，必被判罪。人若说弟兄是‘拉加’，必被公议会审判；人若说弟兄是‘摩利’，必难逃地狱的火。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供物的时候，如果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对你不满，
就当在坛前放下供物，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你的供物。
趁着你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要赶快与他和解，免得他抓你去见法

官，法官把你交给狱警，关在监里。
我实在告诉你，除非你还清最后一分钱，否则决不能从那里出来。
“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不可奸淫。’
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心里已经犯了奸淫。
如果你的右眼使你犯罪，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被丢进地狱里。
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进到地狱里去。
“又有这样的吩咐：‘人若休妻，就应当给她休书。’
可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如果不是因她不贞，就是促使她犯奸淫；无论谁娶了被休的妇人，也就是犯奸淫了。
“你们又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背约，向主许的愿都要偿还。’
可是我告诉你们，总不可发誓，不可指着天发誓，因为天是　神的宝座；
不可指着地发誓，因为地是　神的脚凳；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发誓，因为它是大君王的京城；
也不可指着自己的头发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可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对抗，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另一边也转过来让他打；
有人要告你，想拿你的衬衫，就连外套也让他拿去。
有人要强迫你走一里路，就陪他走两里。
有求你的，就给他；想借贷的，也不可拒绝。
“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
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作吗？

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什么特别呢？教外人不也是这样作吗？
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引述 圣经 罗马书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罗马书3章

这样说来，犹太人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呢？割礼又有什么益处呢？
从各方面来说，的确很多。最重要的，是　神的圣言已经托付了他们。
即使有人不信，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他们的不信会使　神的信实无效吗？
绝不可能！　神总是诚实的，人却是虚谎的，正如经上所记：“你在话语上，显为公义；你被论断时，必然得胜。”
我且照着人的见解来说，我们的不义若彰显　神的义，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降怒的　神是不义的吗？
绝对不是！如果是这样，　神怎能审判世界呢？
但是　神的诚实，如果因我的虚谎而更加显出他的荣耀来，为什么我还要像罪人一样受审判呢？
为什么不说：“我们去作恶以成善吧！”（有人毁谤我们，说我们讲过这话。）这种人被定罪是理所当然的。
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控诉过，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
正如经上所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　神的；
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他们嘴里有虺蛇的毒，
满口是咒骂和恶毒；

为了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步飞快，

在经过的路上留下毁灭和悲惨。

和睦之道，他们不晓得，

他们的眼中也不怕　神。”

然而我们晓得，凡律法所说的，都是对在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让每一个人都没有话可讲，使全世界的人都伏在　神的审判之下。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在　神面前得称为义，因为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

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　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

就是　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地临到所有信的人。

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

但他们却因着　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

神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赎罪祭”原文作“蔽罪所”），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　神的义；因为　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

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又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这样，有什么可夸的呢？没有可夸的了。凭什么准则说没有的呢？凭行为吗？不是的，而是以信心为准则说的。

因为我们认定，人称义是由于信，并不是靠行律法。

难道　神只是犹太人的　神吗？不也是外族人的　神吗？是的，他也是外族人的　神。

神既然只有一位，他就以信为准则称受割礼的为义，也要以信为准则称没有受割礼的为义。

这样说来，我们以信废掉了律法吗？绝对不是，倒是巩固了律法。

___

圣经和合本

（以下引述网文）

https://wxbible.net/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2&id=1304

1919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这一年，爆发了五四运动，早在五四运动前12天所发生的另一件事，至今影响深远。这就是1919年4月22日出版《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当时尚无"国语"一词，1939年改名为《国语和合本圣经》）。

这部至今流传甚广、为广大华人基督徒所喜爱的和合本圣经，已印刷过亿。其对福音的传入，影响无可估量。

从新教入华到联合译经

今天，回看百年历史，白话文圣经的出版，标志着上帝的恩言成为引导中国走进现代社会的第一道曙光！细分的话，这道光包含了丰富的光谱，其中特别明亮的部分是：

第一，130年前所启动的圣经中文翻译工作，至1919年完成并面世。圣经新旧约全书第一次以汉语方块字完整出版；

第二，特别深具意义的是，《和合本圣经》竟然是以普通民众使用的白话文来表达，仅此一项，同时开启了中国白话文的先河，改变了几千年来的中文"经书典籍"的书面表达方式，是汉语的历史性转变；

第三，参与翻译圣经的西方传教士所彰显出来的基督精神，以及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化所起到的有力推动，影响至深。

白话文圣经虽然出版于1919年，但决定翻译白话文圣经并将新旧约66卷百万文字严谨准确、明白晓畅地完成翻译，则经历了三十年。

事情要从1890年说起。但在此之前，必须提到一件意义非常的事，那就是1807年马礼逊从英国来华，将基督教新教带入中国。

随着马礼逊来华，福音在中国开始艰难地生根。这粒麦子带着无与伦比的福音大能，显出其不可抗拒的生命力。多年后，数千名西方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福音的种子渐渐生长，华人信徒达到三万多人。

接着，新的问题出现了：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华人信徒，都没有统一的中文圣经。不同的传教士和差传系统，以及不同的教派，虽然分别进行了一些圣经经卷的翻译工作，但是所翻译的圣经各不相同，出入甚大。联合翻译统一的中文圣经已成为必须。

于是，差派传教士最多的英国，与海外圣经公会驻中国代表韦威廉（William Wright）极力奔走，终于促成不同差会联合译经的决定。

1890年统一合译大会在上海召开。

1843年，上海开埠的同一年，英国伦敦会的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来到上海，在上海建立教堂。1890年5月7日至20日，来自37个不同宗派与差会代表445人共聚上海，召开了盛大的第二次传教士大会（第一次传教士大会在1877年举行）。大会除了为中国的福音事工向西方教会发出宣召外，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筹划翻译通用本中文圣经译本，以消除当时各个圣经译本的参差不同。

只是，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预想到，此举所带来的，不仅是圣经和合本的出现，也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在语言上奠定了根基。

翻译“白话文”圣经被确定

发生在上海的这场联合翻译中文圣经的讨论，面临着圣经在翻译成其它民族语言时都不曾遇到的难题：到底用何种汉语形式来翻译圣经？

历史上，中国一直存在“文”“言”两分、各成一体的独特现象。人们互相用口语交流，但当他们书写下来，使用文字来表达的时候，马上就会操起另一套语言——即“文言文”。这套语言，只流通在官场和读书人中，普通百姓如听天书。1890年预备翻译圣经时，中国官方使用的文字仍是文言文，是自先秦以来两千多年不变的古文。

另一个情况是，随着中西交流的频繁，随着洋务运动进入后期，随着大量西方作品的翻译，中国文化已处在悄然改变之中，不仅创造出大量的新词汇，而且报业兴起，一种通畅易读的“浅文理”书面汉语开始被广泛使用，并成为潮流，显出汉语的发展方向。

基于这种现实，翻译圣经大会认为，翻译文言文圣经（称“深文理”）和浅文理圣经是必须的。并且以当时中国的汉语行文方法，也只有这两种。

但是，如果只是翻译深文理圣经和浅文理圣经，则神的圣言在中国传播将面临巨大的障碍，因为占人口总数90%的文盲，将仍然被置于神的话语之外！仅仅有这两种汉语的书面表达形式，并不足以适应广大华人！即使是浅文理版本，对于庞大的未能接受教育的华人群体而言，仍然是高不可攀。

如何使只能听懂“白话”的百姓可以听得懂来自上帝的圣言？显然，文言文和浅文理两种形式都不能惠及众民，其适应面过于狭窄。反复讨论之后，大会郑重决定，翻译第三种中文圣经：白话文圣经。这样，会议最后决议是，成立三个圣经翻译委员会，分别翻译深文理、浅文理、与官话（当时称“官话”是延用明清的说法，到民国时开始称为“国语”）三种版本，即“圣经唯一、译本则三”（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每个译本都冠以“和合本”之称，乃因众宗派和差会联合翻译的，以此表达教会合一的意思。

如此，大会明确了对中国后世影响至为深远的白话和合本翻译的决定。

吊诡的是，1921年，鲁迅以白话文写《阿Q正传》时，白话文仍被守旧派骂作“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可见，早在1890年决定使用白话文翻译圣经是何等超前的决定！试想，在中国人仍然白纸黑字地写着文言文或浅文理文字的时候，爱中国和中国人的上帝以及他的仆人们，就甘愿用当时不正统、不高雅的白话，向中国人讲话，让每个中国人都一听即懂。

这是爱，也是恩典。

新问题：用哪一种白话？

用白话文翻译圣经既已确定，接下来必须考虑的是，中国不同地区的口语差别。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又由于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缺乏流动性，所以形成各地不同口音，彼此之间讲话差别很大。如果用“白话”来翻译圣经，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用哪个地方的白话作标准？

文言文的好处在于，它有统一的行文规范，不受时空限制。即使处于不同的省份地区，不同的时代，都不影响表达与理解。这也是中国能维持长期统一的重要原因之一。百年前的中国，白话大体可以粗分为以粤语为主的南方白话，和以北京话为主的北方白话。从人口的覆盖率和使用范围来看，北方白话有优势；而从现代文化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来看，粤语的力量不可小觑。并且，由于历史与地理的关系，粤语也更多地保存了汉语中的大量古语。

因历史资料的缺乏，1890年翻译中文圣经大会在确定以何种白话作为翻译标准的讨论过程是怎样的，已经不可考。但从后来所确立的结果，我们看到最终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白话文，成为和合本圣经的翻译语言。

百年后回望这一决定，我们实在可以欣慰并感恩地说，这个决定不仅使今天的和合本圣经依然晓畅易读，深受广大华人基督徒的喜爱，也同时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现代白话文的发展，为之指明方向。

二十多年以后，民国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年，1912年12月即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了“读音统一会筹备处”，为国家制定统一标准读音。从1913年2月15日到4月22日，经过激烈讨论，最后的结果与1890年翻译圣经大会相同，也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语音特点，以此作为中国语音的统一标准。到底是由于圣经先行使用的北方白话对后世产生

了影响？还是民国政府也有相同的见解？总之，结果是相同的：今天举世通用的现代汉语统一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

无论如何，和合本圣经译本的先行性是无可置疑的。今天，华人通用的"普通话"，延续了这一基本特性。

预见历史，保留汉字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一直回响着废止汉字的杂音。从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端的历时几十年的关于取消汉字的呼吁，到计算机出现初期一度对汉字能否适应电脑的怀疑，都曾有过汉字生死之争。

第一个提出废除汉字的是北大教授钱玄同，他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中说，"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字；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字"，"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鲁迅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刘半农说，"汉字不灭则中国新文化无望"。谭嗣同表示应该尽改汉字为拼音文字，蔡元培建议直接改用拉丁字母，陈独秀、吴玉章、赵元任等名流都持同样观点。

第一个废除汉字的实践者是瞿秋白。他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一书，并与吴玉章等人一起草拟"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开启废除汉字的新契机。他说："要写真正的白话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

废除汉字的高潮发生在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文章指出："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值得

向全国介绍”。

在中国一流学者、教育家、文学家、语言学家纷纷表示要抹杀几千年的汉语方块字，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时，早在几十年前，通过翻译白话文圣经的传教士们态度又如何呢？

翻译圣经的过程中，传教士中也确曾有过是否应该为中国创造一种拼音文字的考虑，但随着他们藉译经而不断深知中国文化实情，他们愈来愈坚定了使用汉语方块字，彻底放弃汉语拉丁化的方向。为此，他们一次次写信给远在欧洲、美国的差传机构，解释、澄清理解上的偏差，指出，若将圣经译成罗马字给华人，既不合实际，亦全然无用。白汉理写道：“中国人是喜欢阅读的民族，依我之见，用罗马字取代汉字来写白话文似乎是行不通的。中文里声音语调变化贫乏，但中文文字符号丰富，两者刚好互相搭配。”

白汉理的见识，实在应该令中国上述学问大家汗颜。在他们大肆鼓吹消灭汉字之前几十年，一个外国传教士却清醒地认识到汉语无法拉丁化的关键所在。即：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同音问题，如果以拼音取代汉字，势必产生大量的同音误会；而汉字组词功能强大，既有词汇的丰富性，又可以与时俱进。

而时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时，仍指望将其作为汉字拼音化的前奏。最后阻止这一尝试的，是汉语中有太多的同音字和同音词，无法通过拉丁字母区分的事实。最终得出结论，拉丁字母只能当汉字的辅助音标，不能取代汉字的书写。

1890-1919，近三十年译经

从1890年确定翻译白话文圣经，到1919年经历了将近三十年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间还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义和团事件”，大量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信徒被屠杀。在逼迫与患难之中，圣经翻译虽常受威胁，但参与翻译的传教士们一次次排除困难接续进行。

应该说，是上帝为这项重要事工配备了杰出的译经队伍。白话文圣经译本的委员，有狄考文（C.W.Mateer），白汉理（Henry Blodger），杨格非（Griffith John），文书田（George Owen），富善（Chauncey Goodrich），等人，委员会为这个译本的翻译确立了“忠于原文”和“让各个阶层都能懂”的原则。在1890年确定翻译三个中文圣经版本中，官话和合本的翻译是最慢的，其中经过多次修订，以保证文字的优美和译文质量。

这些西方宣教士与他们的中国同工，付出了大量心血。在翻译过程中，西方人与中国学者之间不断地作学术性探讨，他们以开放与容忍的胸襟，同心合一，密切协作。他们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除了各宗派的理念不合引起争执外，就是选用何种中文词汇对应圣经中的用语。而且，当时文言文与白话文也处于交替阶段，汉语本身正处于剧烈的变化中，此时的译者，需要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圣经化的语言体系。为此，他们殚思竭虑，倾尽心血。

整个翻译历时29年，在1919年4月22日出版时，原来的译经委员中，只有82岁高龄的富善一人得以看到这本中文圣经的问世。这个译本，后来改名为“国语和合译本”。一百年来，它一直是中国最为权威，最受欢迎，使用最为广泛的译本。将这卷圣经的翻译放在这一百年巨大变迁的历史背景上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妙不可言的神迹。

传教士留下的物质与精神遗产

参与中文圣经翻译的传教士，不仅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同时也是才华卓越，具有多方面才华的知识分子。这里仅以富善和狄考文二人为例。

富善牧师28岁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超过半个世纪。他有不凡的语言能力，抵达北京仅一年便可以用普通话讲道；他千方百计学习中国语言，不久就成为在华传教士中，北京话讲得最标准、最流利的一位。为了与中国人认同，他入乡随俗，留长辫、穿中式服装，与华人亲切交流，打成一片。以至他在来华二十多年后，就出版了《中英袖珍字典》，接着又出版了《官话特性研究》，更包罗了39,000句汉语。这两本书后来成为当时西方传教士和各国外交人员学习普通话之必备参考书。此外，富善牧师还在教会的华北大学（North China College）教授天文学、旧约历史、教会历史、教牧神学等课程，并担任教务长达25年之久。他的儿子也是著名的汉学家。

富善牧师82岁那年，即1919年，他有幸亲眼见证了中文白话文圣经的出版。此际，参与翻译圣经的众多传教士都已故去，仅他一人在世。他自己也在6年之后逝世，长眠于北京通州墓园。

另一位和合本圣经的重要翻译者是狄考文，他于27岁携新婚妻子赴华，行前他发下誓愿："我决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中国，生于斯，死于斯"。

1882年他在山东创立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齐鲁大学。他思想开明，相信中文完全能够阐释和宣传西方的科学，坚持中文教学。在他的努力下，齐鲁大学被称为"东方的哈佛"。义和团作乱时，山东是重灾区，他的学校被毁。他极力募捐，并拿出自己的积蓄予以复建。

1890年，圣经翻译委员会成立时，狄考文众望所归，被推选担任官话和合译本圣经委员会主席，他辞去登州文会馆校长职务，此后18年专心译经。

他以敬虔、忠诚的心，竭尽全力。人称他是“从不怕人，只敬畏神的人”。

狄考文将生命最后的岁月完全倾注在圣经的翻译上，一心盼望给中国人留下一本忠于圣经原意的圣经。他在1908年病逝，未及看见全本圣经翻译完成。

狄考文的一生与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播、近现代教育事业、博物馆公益事业紧密相连。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着美好的未来。我很高兴有机会做我所能做的使她迈向美好未来的事情。”

狄考文没有儿子，没有私产，所留下的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和深受他影响激励的学生。他的学生中少有人从政，多半人终生从事教育、宣教或社会工作，默默在乡村耕耘。

这些翻译圣经的传教士，他们在中国兴办教育，建立大学、中学、医院、教堂，培养人才，带入新的科学技术，这一切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进步。和合本圣经翻译时，中国的白话文远未成形。圣经翻译不仅为白话文奠立基础，也确立了白话文的文法格式。传统汉语只有顿号与句号，翻译委员会主席狄考文为白话文圣经设计了逗号、分号、冒号、引号，基本规定了后世中文的书面形式和标点符号系统。

白话文圣经翻译早于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运动，对中国白话文的普及和发展都起到相当大的积极影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形式借鉴和语言资源，为汉语创造并形成了大量新的成语，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代罪羔羊”、“披着羊皮的狼”、“迷失的羔羊”、“眼中瞳仁”等等。有人评价这本圣经说，“和合本圣经在影响力上可与钦定本圣经等量齐观。”

和合本圣经出版后，文言文在中国迅速走向衰落，深文理与浅文理版圣经

都不再使用了，唯有这本和合本国语圣经，持久流通，广受欢迎。

结语

一百年来，中国的历史跌宕起伏，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数不胜数，每一件，都在历史的表面留下划痕，每一件也都或多或少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然而，正如圣经中所说，“因着信，我们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希伯来书11:3）上帝掌管着世界和人类历史，上帝的话语是一切社会变迁，时代转移的创造者、推动者和设计者，中国的历史，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引文结束）

======================

（以下引述网文）

https://www.douban.com/note/625565187/

【转载】 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的历史（1890-1919）
john 2017-06-20 13:50:18

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路加福音4:37-38）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巨大的变化正在酝酿之中，所有人都在寻找新的方向，因此，此时的中国充满了争战和苦难，但这也是在为兴起神的工作做准备。

这个时候的中国教会，在众多西方传教士艰苦卓绝的努力下，已经颇具规模。1890年的新教信徒据估计有3.7万人之多，传教士也有1200多人，翻译一本全国通用的圣经版本已经成为急需的任务，而且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神的话是基督徒和教会的粮食，有了翻译准确，并为人喜闻乐见的圣经，中国的教会才能真正发展壮大。

1890年5月7-20日，在华的传教士们在上海举行了第二次传教士大会（第一次传教士大会在1877年举行），来自37个不同宗派与差会的代表共有445人出席（能把这么多不同宗派的传教士集中起来，本身就是神的恩典）。这次大会一方面为中国未来的传福音工作向西方教会发出了动员，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筹划翻译一本各宗派通用的圣经中文译本，以消除当时各个圣经译本质量参差不同的问题。

大会举行时，中国的语言文字正在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当时还很难看出哪个会占据上风，为了保险起见，大会确立了"《圣经》唯一，译本则三"的原则。成立了三个圣经翻译委员会，分别翻译深文理、浅文理、官话（官话最早是汉语中官方标准话的称呼。明清称为官话，清末民初开始称为国语，1956年改称普通话）三个版本，以满足当时的不同需求。每个译本都有"和合本"的名称，这是因为这三个译本是由各个不同的宗派和差会联合起来翻译的，这个名称本身就是教会合一的象征。

浅文理译本的进度最快，1900年已经完成新约的翻译。深文理的翻译遇到了许多波折，但1906年也完成了新约圣经。不过，后来的局势表明，文言文在中国面临着衰落，在1907年的“马礼逊来华百周年纪念大会”（也就是第三次传教士大会）时，决定将深文理与浅文理合并，只出版一部文理圣经。1919年6月《文理和合译本》圣经出版，这个版本的圣经起初还有一些应用，但随着文言文在中国的衰落，1934年印行最后一版就不再印刷。最后，深浅文理版本的圣经最后几乎消亡了，以后我们说起和合本，就是指的官话和合本。

全知全能的上帝想必早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知道白话文会成为中国的未来，因此为《官话和合本》的翻译配备了最为稳定和能干的译经队伍。这个译本由英文修订标准版圣经（English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是对最为权威的钦定本圣经的修订）作蓝本翻译的，辅之以希伯来和希腊原文。翻译委员会最初由七位西方传教士带着他们的中国助手（有的为牧师，可惜他们大部分的名字都不可考证了）组成，在新约完成了就只剩下了五位，主席为美国长老会的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其他传教士成员包括美国公理会的富善（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中国内地会的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 1852-1922）、美国美以美会的鹿依士（Spencer Lewis, 1854-1939）以及伦敦传道会文书田（George Stephen Owen, 1847-1914）。这些传教士来自不同地方，都是在中国多年传教，属灵的知识丰富，而且既精通圣经，又通晓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再加上他们的中国助手，足以成为翻译圣经的理想团队。

这个译本的翻译确立了“忠于原文”和“让各个阶层都能懂”的原则。实际上，官话和合本的翻译是三个译本中最慢的，其中经过多次修订，这样也保证了文字的优美和译文质量。除了以上几位骨干和中国助手以外，先后

共有十四人参与翻译工作。第一次委员会会议在1891年举行，1899年四福音完成，1906年新约正式宣告完成，1918年正式完成全部的圣经，1919年二月正式出版。整个翻译历时28年，在1919年出版时，原来的译经委员中，只有富善一人得以看到这个译本圣经的问世，不过他已是八十二岁的高龄了，其他人都已经逝世。

这个译本，后来改名为“国语和合译本”，由于白话文的普及，渐渐成为中国基督徒最为认可的译本。今天，我们普遍使用的和合本圣经就是来自这个译本，除了一些微小的修订以外，这个译本的圣经基本上与当初的译本并没有多大变化，在诞生的近一百年来，这个译本的圣经一直是中国最为权威，最受欢迎，使用最为广泛的译本，考虑到这一百年的变迁，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奇迹，这就是神所做的，是神给中国人的极大恩典。

实际上，以上对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历程的叙述实在过于简略了，其中经历的艰难是我们这些局外人是难以想象的。当时这些翻译者们与中国人一样经历着困难的环境，因着中国一部分民众的仇视，有时还面临着额外的生命危险，在那个时代，出现了义和团运动，殉道的传教士很多，翻译经文的传教士的生命也时常受到威胁，幸亏神保守了他们。最大的困难发生在翻译中。翻译者们大部分都不是全职的，还肩负着繁重的传教和教会工作。同时，在那时白话文正在取代文言文当中，汉字语言正处于剧烈的变化中，翻译圣经就像在荒地上开垦，要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圣经化的语言体系来，为此，每个翻译者实在是殚思竭虑；另外，当时没有什么像今天计算机、网络和电话这样的现代工具来帮助他们翻译和编辑，一切都是靠手写和口头沟通，这可是100多万字的大部头啊！

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诗篇23:10）和合本圣经实在是在苦难的熔炉里被神熬炼出来的精金啊！

究竟是什么驱使着这些传教士不远万里，离开舒适的家园，在这艰难的环境中劳苦做工，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人，奉献给中文圣经的翻译呢？没有别的，就是神的爱。福音的传播一直是靠爱来推动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点燃了爱的火炬，使徒们把这爱向全世界播撒，爱走到那里，福音就传到哪里，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接过这历世历代燃烧不已的爱的火炬，将这爱的火炬递给了中国人。和合本圣经或者并不是完美无瑕的，很多人在批评这个译本不够准确，然而，在神那里，他只看到爱，看到了这些人为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奉献。

和合本翻译已经快要一百周年了（1919-现在），我们依然享受着这从神的爱而来的伟大礼物，信仰的火炬、福音的火炬、爱的火炬已经传到我们手中，就让我们也像当年的传教士一样把它们传递出去吧！

（引文结束）

================

基督教信仰在中国的发展

（选自维基百科相关文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9F%BA%E7%9D%A

3%E6%95%99%E5%8F%B2

直到民国成立以后，中华民国临时宪法中保障了宗教自由，加上当时很多革命人士以及支持革命的人也是新教徒（例如：孙中山 、宋教仁、廖德山，以至后期的蒋介石和张学良等），因而在民国以后新教的发展比清朝时好，直到1949年中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基督徒人数近70万人。

基督教青年会

1912年，在上海成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当时的名称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组合”（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Y. M. C. A. in China），首任总干事为美国南部美以会教士巴乐满（Fletcher Sims Brockman 1867 ~ 1944），副总干事为中国王正廷。青年毛泽东曾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青年会智育部晏阳初在长沙进行的平民教育运动。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莱德（Joseph Platt）会同奉天施医院院长英国人雍维林，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罗伯・克来克，在停泊在秦皇岛外的英国巡洋舰″麦尔迪″号上会谈，促成直奉双方于6月17日达成停战协议。

近代基督教在华之贡献

民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一再表示对各宗派一视同仁，基督教在中国传布，成效惊人。而教派除了传道事工之外，并致力于各种社会事业，如建设大学、医院、书局、救济院、孤儿院等。另一方面，中国自治教会，也逐渐增多，遍及中国各地，远及海外，为中国基督教展开一新的局面。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新教教团数目计有六十一个团体、信徒数九万五千九百四十三人；但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教团数以增至八十二、宣教师数目亦增至三千八百三十三人。民国成立以后，教士、教徒数

目均激增。根据民国二年（1913年）的统计：宣教师有五千三百九十四人，而信徒数亦增至二十四万五千九百五十九人。到了民国三年（1914年），教团数以增至一百七十，宣教师亦增为五千九百七十八人，且信徒数以致二十五万三千二百十人。据抗战前（民国二十四年）的统计，全国新教教会数有七千二百八十一、信徒数为五十一万三千、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年当中，就曾为四万三千人改宗者施行浸礼。据称：如包括尚未洗礼的慕道者在内，信徒总数以达百万人之数。

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教育

天主教和新教都在中国建立了一大批教育机构，从幼稚园一直到大学。一些中国著名大学起源于教会学校。比较著名的新教中学早期有烟台中学，后期有培正中学、培道中学（在一二三事件之前）等，大学则有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湘雅医学院、华中大学等。而天主教部分有震旦大学、津沽大学、辅仁大学和静宜大学等。这些学校都为中国培养了大量吸收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

基督教在华所成立的学校、有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及各种弱势机构、老幼院（如：盲哑学院、养老院、孤儿院等）等各种。据民国二十六年的统计：男子中学有一百间、女子中学有九十五间、男女合校的中学有五十四间。中学数计二百五十九，学生数约有五万。大学计有十三间，有：济南的齐鲁大学、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南京的金陵女子理学院、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杭州的文江文理学院、武昌的华中大学、福州的华男女子学院、广东的领东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等。（据民国二十六年的统计，上述十三所大学的学生数计有六千四百二十三人），至于教会所兴办的小学，据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统计：高小九百五十六所，学生三万二千八百九十九名。初小五千六百三十七所，学生十五万一千五百八十二名。

出版事业方面，教会所创办的杂志刊物，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时，计有中文杂志二百十一种，英文杂志二十七种，合计总数为二百三十八

种。民国二十四年所出版的基督教丛书计有四千种之多，由六十九所基督教印刷厂分别承印，并有一百三十家专售基督教丛书的教会书局。

在医疗方面

除宣教团队的医师对贫民免费看诊及赠药外，并在各传道据点建立医院或诊所，其中亦不乏医术高明的宣教医生。在中国基督教的医学协会，早在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就有中国博医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的成立。该会由一群外籍宣教师所组成，其主要目的为提供义诊，并先后资助在澳洲、广州、上海、香港、宁波、厦门等地医院。该会又出版中文医疗书籍，及主办医疗人之教育等事工。

另一个规模较大的医疗协会：中国医疗传道协会于一八九0年（光绪十六年）首次的集会，其第二次大会于一九０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在上海召开，系由基督教医师所组成的全国性团体。此后，该会又在一九０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一０年（宣统二年）、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先后开过几次会议。该会曾经发行医学定期刊物，及出版数种医学丛书，其中重要的有中、英对照的医学辞典。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由欧、美回国的中国医学生，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医学会。隔年（一九一六年），该会与中国医疗传道协会在广州开会，决议协助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全国公共卫生联合委员会。在此时期，该会对各种流行病（如：天花、鼠疫、霍乱、结核病等）的防治，曾贡献不少。

教会创办的中国医疗传道协会，为求全国医疗工作的扩展，于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自动要求合并于中国医学会。中国医学会，最初称为："中华民国医药协会"，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迁移上海后，改称为"中国医药会总会"，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分会。

在改善社会方面

基督教曾在中国成立各种组织来帮助当地的百姓，以破除迷信、戒烟禁

赌、辅导妓女从良等。而重要的组织有以下几个团体：

（一）万国改良会分会：成立于1808年，初任干事为丁义华，劝人戒除烟酒嫖赌。该会对鸦片的禁绝，主张尤力。该会的经费，最初倚赖美国总会的供应，当欧战发生时，改名为“中国万国改良总会”，并宣布经济的独立。

（二）中华国民拒毒会：成立1924年八月，设总会于上海，发行拒毒月刊。该会系由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联合基督教青年会及中国医学会等团体共同发起的。该会曾在各地举办演讲，印发拒毒图画。该会的工作，到七七事变发生后，因战乱而告停顿。

（三）中国妇女节制会：成立于1907年，总会设于上海，由“万国节制会分会”，相助成立。初任的会长，为上海长老会的范女士，后由九江美以会的石美玉医师继任，会务很有进展。该会的主旨，亦为反对烟酒、娼妓，并谋求妇女权益者。另一方面，万国节制会仍继续在华工作，1909年北京公理会的美籍女教士富轲慕慈夫人担任干事。到处演讲，组织支会，计成立支会四十七处。该会在华曾创办一“节制女子家事学校”于江湾，八一三事变以后，迁往上海租界，改名为“新女子职业中学”。

（四）道德会：1918年，由上海基督教教士公会及基督教妇女禁酒会等十七个团体，组成一个“风俗改良会”，到1920年更名为“道德会”。该会设立有“妇女教养所”，收容沿街拉客的妓女，辅导他们有一谋生的技能，在“妇女教养所”中设立有各种技能训练班。该会并建议政府，逐年减少妓院的数目，每年按照抽签，减少20%，并提倡严格取缔未领执政的私娼。该会发行进德报，并在学校提倡性教育及卫生。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选自以下网文）

http://www.repentance4ever.com/archives/266

说贡献：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

1. 中国最早的图书馆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其实中国古代一直都有藏书楼，但其功用主要是藏书。现代图书馆的阅览规则，和其先进的管理方法，却是传教士引来的。

2. 中国最早的医院

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彼得·伯驾（Peter Parker）是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协和医院，湘雅医院，齐鲁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3. 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中国古代的所谓高等教育如国子监，早在近2000年前就出现了。而中国真正意义的现代高等教育、大学，则是在19世纪由传教士所创办的。例如当时的东吴大学，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等等。当时称之为基督教大学，和医院一样，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好的大学。

4. 中国最早的汉英、英汉字典

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为了翻译工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英语学习字典《华英字典》。《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汉－汉英对照的字典，篇幅大内容丰，有丰富的例句及解释，并收录大量成语、俗语。

=========

近现代科学文化名人

历史上也没有人能说出如此美丽的话："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马太25:40）天地之主这样说，怎不使人油然生敬畏之心呢?-----------林语堂

基督教对于中国的科学文化发展也有不可小视的贡献。近现代的华人诺贝尔奖得主并不多，但稍作调查就可以发现，他们几乎都是基督徒、曾经上过教会学校，或者深刻地受到过基督教的影响。这一点其实是非常令人震撼的！

例举说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从小在教会学校受教育；杨振宁从11岁起就进入著名的教会学校崇明中学读书；丁肇中从9岁起在德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读书；朱棣文出生在美国，也是教会学校毕业；崔琦10岁以后

进入香港著名教会学校培正中学读书，是路德宗信徒。丘成桐，曾荣获最高数学奖菲尔兹奖，是第一位获得这项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华人，他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小学、中学、大学都上的是教会大学，自己在家还组织查经班。莫言，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深受信基督的母亲影响，才写出了基督教文化色彩的获奖作品《丰乳肥臀》。

同时中国作家等文化名人中，基督徒的占比也是非常之高，完全超过了概率事件。比如世界性的文化名人杨绛先生，她自小所受的教育是教会学校的教育，这个影响不言而喻，而杨绛的自述文章《怀念劳神父》，更是可以看出基督教徒对她所产生的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想未来：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未来

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基督教的存在的意义逐渐得以彰显。基督教不论是作为一种信仰，一种价值体系，抑或思想文化，他的传播对于现代人的精神启迪，和社会文明的前进都是有着积极推动作用的。过去虽然一度将基督教视为“西化”的表现，将其视为西方文化入侵利用的武器；诚然基督教是借着西方文化的载体而传入中国的，但是现代的中国人，不再是器量狭小的旧式文化人，他们并不抱残守缺，而是以正确的态度看待历史，看待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意义和价值。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播中，包容吸取，独立自治的理念，将会给中国的基督教传播带来积极的活力。

（引文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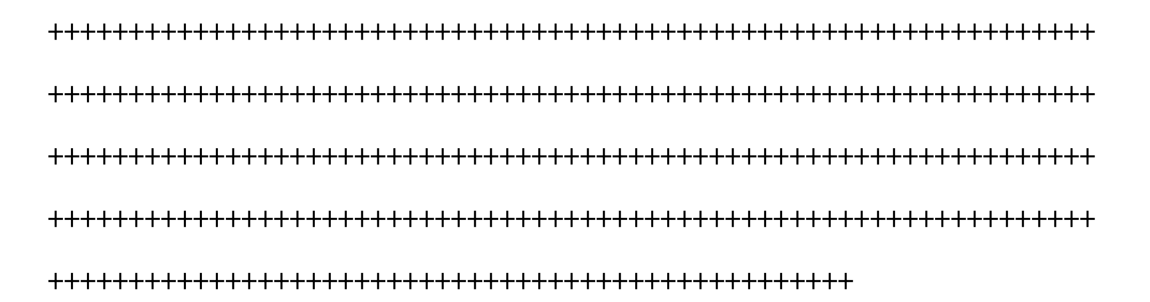
____

西方传教士

西方来华的基督教宣教士的人数，从1860年的50人，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后的时候，增长到2500人（包括他们的妻子与儿女）。其中1400人来自英国，1000人来自美国，100人来自欧洲其他国家（主要是斯堪地纳维亚半岛的国家如瑞典）。从1900年开始，基督福音传播在中国进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中国基督徒与基督教会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大幅度地不断增长；圣经的出版与发行数量，很快达到每年数百万本；当时在上海出版的《字林西报》称："1925年，圣经在华销量高达374万本，比1924年增加了100万本"】。到1919年，西方来华宣教士的人数达到3300人（不包括他们的儿女）；其中大约三分之一为已婚男性，三分之一为已婚妇女，三分之一为未婚妇女。到1925年，西方来华宣教士人数达到顶峰，约有8000人（包括他们的儿女）。1926年开始，由于中国的内战、政治动乱、以及一些诸如马克思主义等意识形态的竞争，以及西方经济大萧条的影响，西方来华宣教士的活动开始下降。

根据研究关于"西方来华宣教士之历史"的历史学家KATHLEEN LODWICK的估计，从1809年至1949年，西方来华宣教士人数（包括基督教新教与天主教）总共大约为50000人。

++
++
++
++



（以下“清末与民国时期的西方来华宣教士的部分名单”资料来源：
http://self.gutenberg.org/articles/eng/list_of_china_inland_mission_missionaries_in_china）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美国海外差传团体）

William Scott Ament 梅子明 Zhili, Beijing
Caleb Cook Baldwin Fujian
Dyer Ball Macao, Hong Kong, Canton
Harlan Page Beach 畢海瀾
Willard Livingstone Beard 裨益知 Fujian
Henry Blodget (missionary) 與白漢理 Shanghai, Tianjin, Beijing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裨治文 Guangdong; Shanghai
James Granger Bridgman Shanghai
Eliza Jane Gillett Bridgman Guangdong; Shanghai; Beijing
Samuel William Bonney Hong Kong; Guangdong
Seneca Cummings 簡明 Fujian
Justus Doolittle 盧公明 Fujian

Charles Hartwell 夏察理 Fujian

Stephen Johnson Zhejiang

Walter Henry Judd

Daniel Jerome MacGowan Zhejiang

Luella Miner

Peter Parker 伯駕 Guangdong

Päivö Parviainen Hunan province, later Taiwan (Finnish Evangelical Lutheran)

Lyman Birt Peet Fujian

Horace Tracy Pitkin

Frank Joseph Rawlinson 樂靈生

William L. Richards Fujian

Arthur Henderson Smith 明恩溥

Charles A. Stanley Tianjin

Edwin Stevens (missionary) Fujian

Elwood Gardner Tewksbury Beijing Tongzhou

Ira Tracy Singapore

Samuel Wells Williams 衛三畏 Guangdong

==========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美国长老教会差传团体）

Pearl Buck

Eleanor Chestnut near Hong Kong

Richard Cole (missionary) Shanghai

Ira Miller Condit Hong Kong, Guangdong

Hunter Corbett 郭顯德 Yantai, Shandong

J. F. Corsette Tongzhou

Michael Simpson Culbertson Shanghai, Zhejiang

John Marshall Willoughby Farnham 法納姆 Shanghai

Courtenay Hughes Fenn 芳泰瑞 Beijing

George F. Fitch (Mary) Shanghai, Suzhou

John Booth French Guangdong

Mary H. Fulton 富马利 Guangzhou

William Gamble 姜别利 Zhejiang, Shanghai

Samuel R. Gayley 蓋利 Shandong

James Robert Graham III

Andrew Patton Happer 哈巴安德 Guangdong

Milo Arthur Van Norman Hogan Lianzhou

Elias B. Inslee Shanghai

John G. Kerr 嘉約翰 Guangdong

Asher Raymond Kepler

Augustus Ward Loomis

Reuben Lowrie Shanghai

Walter Macon Lowrie 婁理華

Samuel Newell D. Martin Zhejiang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丁韙良 Zhejiang, Shanghai, Beijing

Calvin Wilson Mateer 狄考文 Shandong

Henry M. McCandliss Hainan

Divie Bethune McCartee 麥嘉締 Zhejiang

Margaret Ray Melrose

Charles Rogers Mills 梅理士 Shandong

Wilson Plumer Mills

Mary Margaret Moninger Hainan

John Livingstone Nevius 倪維思 Zhejiang, Shandong, Korea

Harriet Newell Noyes 那夏理 Guangdong

John Parker (physician)

Francis Wilson Price 畢範宇

Charles Finney Preston Guangdong

Henry Van Vleck Rankin Zhejiang

John Winn Quarterman Zhejiang

Richard Quarterman Zhejiang

James Metcalf Shaw Penglai, Shandong

Anna Cunningham Safford

Robert Elliott Speer 史畢爾

William Speer

Matilda S. Thurston

R. Q. Way

J. K. Wight Shanghai

John Elias Williams 文懷恩 Nanjing

=================

AMERICAN SOUTHERN METHODIST MISSION

（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差传团体）

Fred P. Manget Huzhou

=================

AMERICAN SOUTHERN BAPTIST MISSION

（美南浸信会差传团体）

A. B. Cabaniss　　　　　Shanghai

Tarleton Perry Crawford 高第丕　　　Shandong

Thomas T. Devan　　　　　　　Hong Kong

James T. Dickenson

Charles Washington Gaillard　Macau, Guangdong

Rosewell Hobart Graves

J. L. Holmes　　　　　　　　　　Jiangsu, Shandong

Sophie Stephens Lanneau

Lottie Moon 慕拉第　　　　　　　Shandong

Cicero Washington Pruitt　　蒲其維　　　Huangxian

Anna Seward Pruitt　　蒲安娜　　　　　Huangxian

Ida Pruitt　蒲愛德　　　　　　　Huangxian

Alanson Reed

John Griffith Schilling　　　Hong Kong

Henrietta Hall Shuck　　叔何顯理

Jehu Lewis Shuck　　　　　　Hong Kong

Matthew Tyson Yates　　晏瑪太

===================

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国内地会）

David R. Adam

W.H. Aldis

David Howard Adeney　　艾德理　　　China, Singapore

Paul Ernest Adolph

Gordon Hudson Aldis

Benjamin Bagnall 貝格

Frederick W. Baller 鮑康寧 Anhui, Jiangsu

Mary (Bowyer) Baller 包瑪莉 Zhejiang

Stephen Paul Barchet 巴克敵 Zhejiang

Susan Barnes (missionary) Zhejiang

David Barratt

Howard G. Barrie

Harold D. Hayward

Mary Elizabeth Bausum Zhejiang

Ivor Cuthbert Beauchamp 章愛甫 Sichuan

Montagu Harry Proctor Beauchamp 章必成 Baoning, Sichuan

Emily Blatchley 巴愛梅 Zhejiang, Jiangsu

Rudolf Alfred Bosshardt 薄復禮 Guizhou

E. A. Barclay Botham

John Brock (missionary) 博春臣

Albert Hudson Broomhall 海國祿 Taiyuan, Shanxi; Hebei

Alfred James Broomhall 海恒博 Yunnan, Thailand, Philippines

Theodora Janet (Churchill) Broomhall Yunnan, Thailand, Philippines

Amelia Gertrude Broomhall (Hoste) 海寬愛 Taiyuan, Shanxi

Edith Elizabeth Broomhall (Ritchie) 海懿德 Shanxi

Edith Marjory Broomhall 海寬厚

Marshall Broomhall 海恩波 Anhui, Shanxi

Mrs. F. W. Broumton

James F. Broumton 包蘭頓

Elizabeth Burton (missionary)

Alice Mildred Cable 蓋群英 Shanxi, Gansu, Xinjiang

James Cameron 賈美仁

John Edwin Cardwell 高學海 Shanghai

William Wharton Cassels 蓋士利 Baoning, Shanxi

Grace Ciggie Stott 曹雅直夫人 Zhejiang

George W. Clarke (missionary)

Mrs. (Rossier) Clarke

Samuel R. Clarke (missionary) Yunnan, Guizhou

Mrs. (Fausett) Clarke

T. A. P. Clinton 寧鮑秀珍

William Cooper (missionary) 顧正道 Anking, Anhui

Florence Corderoy (Broomhall) 海恩波太太

John Joseph Coulthard 郭豁達 Zhenjiang

George A. Cox 計安全

Miss Crickmay

George Crombie 甘比治 Zhejiang

Louise Desgraz 伙樂義 Zhejiang

Henry Dick (missionary)

Adam C. Dorward

A. W. Douthwaite 稻惟德

Frederick Charles Henry Dreyer 丁良才

George Duncan (missionary) 童跟福 Zhejiang

George F. Easton 義世敦

James Huston Edgar 葉長清

W. L. Elliston

Emil Fischbacher 巴富羲醫生 Xinjiang

Charles Thomas Fishe

Edward Fishe

William S. Fleming (missionary) 明鑑光 Guizhou

James O. Fraser 富能仁 Yunnan

Evangeline Frances "Eva" French 馮貴珠 Shanxi, Gansu, Xinjiang

Francesca Law French 馮貴石 Gansu, Xinjiang

Archibald Edward Glover 蓋落窪 Shanxi

Harry G. Gould 高立德

Jessie Gregg 賈貴安

Gershom Whitfield Guinness 金純仁

Henry Guinness

Mary Geraldine Guinness 金樂婷 Henan

Pauline Hamilton

George Kaufelt Harris Gansu

Adolf Hermann Hebei

Celia Horne

Dixon Edward Hoste 何斯德 Shanxi; Henan others

Frank Houghton 華福蘭 Sichuan

Henry Hunt (missionary) 洪亨利

Mrs. Hunt

George Hunter 胡進潔 Ningxia; Xinjiang

Josiah Alexander Jackson 蔡文才 Zhejiang

Anna Sofie Jakobsen Shanxi

Francis James (missionary) 秀耀春

Charles Henry Judd 祝名揚

James Herbert Kane Anhui

Duncan Kay

Frank A. Keller 葛蔭華

Miss C. Kerr

Miss Kidd

George King (missionary) 金輔仁 Shaanxi

Mrs. (Snow) King

Margaret King 金寶恩

John Kuhn (missionary) 楊志英 Yunnan

Isobel Miller Kuhn 楊宓貴靈 Yunnan

Leslie Theodore Lyall 賴恩融 Shandong; Shanxi

Percy C. Mather 馬爾昌 Anhui; Xinjiang

Robert Arthur Mathews 馬良箴

Wilda Mathews

John McCarthy (missionary) 麥加弟 Yangzhou, Zhejiang

Jessie McDonald 美德純

Stewart McKee 紀長生

Elizabeth (Rose) Meadows Zhejiang

James Joseph Meadows 宓道生 Zhejiang

George Edgar Metcalf Yunnan

Elizabeth Mary (Donnelly) Metcalf Yunnan

Alice Amelia Miles (Broomhall) 海國祿太太 Shanxi

Mariamne Murray

George Nicoll 李格爾

Mrs. Nicoll

Archibald Orr-Ewing (missionary) 榮晃熙 Pingyao, Shanxi

F. S. Parker

George Parker (missionary) 巴格道

Mrs. Parker

Frank E. Parry 巴貝山

Edward Pearse 貝貽士

Arthur Twistle Polhill-Turner 杜明德

Cecil Henry Polhill-Turner 寶耀庭

Sam Pollard 柏格理 Yunnan

Gladstone Porteous 张尔昌 Yunnan

Henry Reid (missionary) 李愛恩 Jiangsu

Arthur TF Reynolds

Gilbert Ritchie 芮明哲

Hattie Rice 賴海蒂 Shanxi

Harry French Ridley Qinghai, Xinjiang

Mary (Bell) Rudland Zhejiang, Jiangsu

William David Rudland 路惠理 Zhejiang, Jiangsu

Alexander R. Saunders 索行仁

Charles Schmidt (missionary) Jiangsu

R. Harold A. Schofield 賜斐德 Yantai, Shandong

Otto F. Schoerner 石愛樂 Xinjiang, Gansu

Stanley Peregrine Smith 司米德 Shanxi

Henry Soltau 索樂道

Elizabeth Alden Scott "Betty" Stam 史文明 Shandong

John Stam 師達能 Shandong

Florence Mary Hannah (Tapscott) Steven Jiangxi; Shanghai

Frederick Arthur Steven Yunnan; Jiangxi;Shanghai

John Whiteford Stevenson 范明德 Zhejiang; Shanghai

George Stott 曹雅直 Zhejiang

Charles Studd 施達德 Shanxi

Priscilla Stewart (Priscilla Studd) 施達德夫人 Shanxi

Frederick Howard Taylor 戴存義 Anking, Anhui

Henry Taylor (missionary) 戴亨利 Henan

Herbert Hudson Taylor 戴存仁

James Hudson Taylor 戴德生 Zhejiang, many others

Jennie Faulding Taylor 福珍妮 Zhejiang, many others

Maria Hudson Taylor 瑪利亞 Zhenjiang

Maria Jane Taylor 瑪利亞 Zhejiang, Jiangsu

Torrance Thomas Sichuan

Peter Torjesen 葉永青 Shanxi

(Miss)E. E. Turner

Joshua J. Turner 德治安

Joan Wales Sichuan

Robert Walker Honan

James Williamson (CIM missionary) 衛養生 Fenghua, Zhejiang

Miss E. Wilson

Florence Young

John Brock (missionary)

William Russell

John Darroch

Erik Folke

F. Dymond

S. Pollard

Gertrude Muir

Priscilla Livingstone Stewart (Priscilla Studd)

C. Thomson

K. McWatters

E. J. Burroughes

F. M. Britton

E. M. Johnson

A. McQuillan

Caroline Gates

J. A. Miller

M. MacKee

H. Parker

E. Webber

C. Groves

Knight

L. K. Ellis

Alexander Armstrong

Mrs. Armstrong

M. E. Scott

A. A. Miles

H. Judd

E. Culverwell

L. M. Forth

Stewartson

W. J. Lewis

A. Hoddle

J. O. Curnow

A. H. Faers

I. F. Drysdale

D. J. Mills

James Adam

Archibald Gracie

Ed Tomkinson

Mrs. Tomkinson

E. Maud Holme

H. R. Waldie

A. K. Ferriman

S. E. Bastone

A. K. Hook

Harriet Cutt

Emma Fryer

H. N. MacGregor

John A. Stooke

Mrs. Stooke

Archibald Orr Ewing (missionary)

Dagald Lawson

A. H. Huntley

Florence Ellis

Clara Ellis

K. Williamson

M. Palmer

E. Hainge

M. Mitchell

E. Marchbank

I. W. Ramsey

Gertrude Ord

Benjamin Ririe

F. A. Redfern

R. Wellwood

Alexander Reid Saunders

Alfred Bland

Albert Lutley

Joshua Vale

Charles S. I'Anson

B. Curtis Waters

May Graham Brown

F. M. Williams

J. Arthur

M. J. Eland

E. Kentfield

L. Chilton

A. Barrett

William Grahame Peat

W. M. Belcher

F. E. Lund

A. H. Bridge

Ebenezer Murray

George A. Cox

Campbell

E. Hanbury

John T. Reid

Mrs. Reid

Anna Crewdson

Robina Crewdson

N. R. Rogers

Theresa E. Dawson

J. Sutherland

Clara Baker

James Simpson

Mrs. Simpson

W. E. Shearer

Thomas D. Begg

Thomas Eyres

Ole S. Næstegaard

======================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J. Bates

John Shaw Burdon 包爾騰 Shanghai

Robert Henry Cobbold 柯播義 Zhejiang

William H. Collins Shanghai, Beijing

Arthur William Cribb 金亞德 Fujian

John Fryer 傅蘭雅 Beijing, Shanghai

Frederick Foster Gough 高富，岳牧師 Zhejiang

John Hobson Shanghai

David Duncan Main

Edward Theophilus Russell Moncrieff Hong Kong

Arthur Evans Moule 慕雅德 Zhejiang, Shanghai

George Evans Moule 慕稼谷 Zhejiang

David Macdonald Paton

William Armstrong Russell 祿賜悅理 Zhejiang

Douglas Noel Sargent

George Smith 施美夫 Hong Kong

Jarvis Downman Valentine Zhejiang

William Welton 温敦 Fujian

=================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英格兰长老会差传团体）

Thomas Barclay 巴克禮 Taiwan

William Chalmers Burns 賓惠廉 Jiangsu, Fujian, Guangdong

John Carnegie

Carstairs Douglas 杜嘉德 Fujian

James Laidlaw Maxwell 馬雅各 Taiwan

James Laidlaw Maxwell, Junior 馬雅各二世

John Preston Maxwell 馬士敦

Campbell Naismith Moody

George Smith

James H. Young

======================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伦敦传教士团体）

Marjory Causer M.Sc. Chunking, Nanking & Szechwan

James Anderson Canton

Thomas Beighton

Evan Bryant

Hedley Bunton

J. R. Carmichael Guangdong, Shandong

John Chalmers

John Fullerton Cleland

Thomas Cochrane

David Collie

Hugh Cowie

Evan Davies Penang, Singapore

Robert Dawson

John Dudgeon Beijing

Maria Tarn Dyer Penang, Malacca, Singapore

Samuel Dyer 台約爾 Penang, Malacca, Singapore

Joseph Edkins 艾約瑟 Shanghai, Beijing

John Evans

William Fairbrother

Robert Fleming

Arnold Foster

Samuel Kidd

James Gentle Jiangsu

William Gillespie

Thomas Gillfillan

James Gilmour 季雅各 Mongolia

Samuel Lavington Hart

James Henderson

James Humphreys

George H. Huttman

Henri Julius Hinschberg

Benjamin Hobson 合信

Thomas Hall Hudson 胡德邁

James Hyslop

John Ince Penang, Malacca

Griffith John 楊格非 Hupeh, Hunan, Szechwan, Hubei

Battison Kay

William Lea (missionary)

Jonathan Lees　　　　　Tianjin

James Legge 理雅各

Mary Isabella Legge

Eric Liddell　　　李愛銳　　　Tianjin, Hebei

William Lockhart　雒魏林

John MacGowan

John Kenneth Mackenzie

Walter Henry Medhurst　麥都思

Rachel Cowie Milne

William Charles Milne

William Milne　　　米憐　Macau, Guangdong

Samuel Milton

Robert Morrison　　馬禮遜　　　Guangdong, Macau

John Robert Morrison　　摩利臣　　　Guangdong, Hong Kong

Mary Morton　　　　　　　　　Guangdong, Macau

William Muirhead　慕維廉

Maria Newell Gützlaff

George Sydney Owen

James Sadler

John Slater

John Smith

Benjamin Southwell

Alexander Stronach

John Stronach　　　施敦力

Robert Jermain Thomas　(Korea)

Jacob Tomlin

Claudius Henry Thomsen　湯生

F. S. Turner

Bernard Upward

Alexander Williamson　韋廉臣

James Williamson

Robert Wilson

Samuel Wolfe

Alexander Wylie　偉烈亞力

William Young

==================

MISSION COVENANT CHURCH OF SWEDEN

（瑞典盟约教会差传团体）

Gustaf Ahlbert　Xinjiang

Albert Andersson　Xinjiang

Gerda Gemina Bernhardina Andersson　Xinjiang

Oscar Fabian Konstantin Andersson　Xinjiang

Gustaf Adolf Arell　Xinjiang

Johanna Katarina Arell (née Larsson)　Xinjiang

Johannes Aveteranian　Xinjiang

Magnus Bäcklund　Xinjiang

Maja Bergquist　Xinjiang

Adolf Bohlin　Xinjiang

Vendla Gustafsson　Xinjiang

David Walter Gustavsson　Xinjiang

Kristian Hermanrud　Xinjiang

Greta Hermanrud　Xinjiang

Adelia Hermansson　Xinjiang

Gunnar Hermansson	Xinjiang
Oskar Hermansson	Xinjiang
Lars Erik Högberg	Xinjiang
Sigrid Högberg	Xinjiang
Nils Fredrik Höijer	Xinjiang
Elisabeth Höök	Xinjiang
Ivar Höök	Xinjiang
Ester Johansson	Xinjiang
Ingrid Kangstrom	Xinjiang
Petrus Kangstrom	Xinjiang
Frida Lundell	Xinjiang
Stina Mårtensson	Xinjiang
Josef Mässrur	Xinjiang
Anna Mässrur (née Nyström)	Xinjiang
Anna Maria Mobeck	Xinjiang
Sigfrid Persson-Moen	Xinjiang
Ester Moen (née Aronsson)	Xinjiang
Hilda Lovisa Nordquist	Xinjiang
John Norstedt	Xinjiang
Helena Nyström	Xinjiang
Rikard Nyström	Xinjiang
Lisa Persson (née Gahns)	Xinjiang
Carl Persson	Xinjiang
Gösta Raquette	Xinjiang
Hanna Raquette	Xinjiang
Elin Roberntz née Jansson	Xinjiang
Georg Roberntz	Xinjiang
Stina Rydberg	Xinjiang

Ellen Soderberg Xinjiang

Elin Karolina Svensson Xinjiang

Naemi Terning (née Ryden) Xinjiang

John Törnquist Xinjiang

Rachel O. Wingate Xinjiang

===================

ENGLISH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英格兰浸信会差传团体）

Alfred G. Jones Shandong

Arthur Gostick Shorrock Sianfu, Principal of Bible School

Maud Mary Shorrock (née Doulton) Sianfu, Principal of Girls' School，Sianfu, Shansi

Jessie Chalmers Duncan (née Lister) Sianfu, Shansi

Evan Morgan Sianfu, Shansi, Shanghai

F Madeley Sianfu, Shantung

Miss Jennie Beckingsale Sianfu

JAC Smith Sianfu

C Cheeseman Sianfu

Miss Evelyn Minnie Russell Sianfu

JC Keyte Sianfu, Shantung, Peking

Dr Herbert Stanley Jenkins Sianfu

John Bell San Yuan

Miss KM Franklin Sianfu, Women's work

Dr Andrew Young San Yuan

J Watson Sianfu, Principal of Secondary School

Ernest F Borst-Smith   Sianfu, Shantung & Shanghai

George A Charter LRCP&S Sianfu

Mrs Helen Mackay-Scollay (née Watt) Sianfu

Dr Thomas Scollay Sianfu

William Mudd   Fu Yin Tsun

E J Ellison   Sianfu, Shantung, Kuling

Dr Cecil F Robertson   Sianfu

W Comerford   Sianfu, Shantung

H H Stanley   Sianfu

Donald Smith   Sianfu, Yenanfu

======================

OTHER PROTESTANT AGENCIES

（来自其他宣教士差传团体的人员）

David Abeel 雅裨理   American Reformed Mission

Mary Ann Aldersey 艾德錫   (independent)

J. J. Allen

Roland Allen   羅亞倫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Young John Allen 林樂知   American Souther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William Ashmore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

Gladys Aylward   艾偉德   (independent)

Paul Bagley   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Stephen Livingstone Baldwin 保靈 American Souther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Margaret E. Barber 和受恩 (independent)

Henry Cornelius Bartel China Mennonite Mission Society

James Whitford Bashford 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Miner Searle Bates 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

Johann Georg Bausum (independent)

Robert Pierce Beaver Evangelical and Reformed Church

Lemuel Nelson Bell 鍾愛華 American Southern Presbyterian Mission

John Birch (missionary) (independent Baptist)

William Nesbitt Brewster 蒲魯士 Methodist Mission

Arthur Judson Brown (Presbyterian)

M/Mme Bonhoure Paris Protestant Mission

William Jones Boone 文惠廉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William Jones Boone, Jr.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Margaret E. Burton

Solomon Carpenter Seventh Day Baptist Mission

Dugald Christie (missionary) Scottish United Presbyterian Mission

Judson Dwight Collins 柯林斯 Methodist

Lucinda L. Coombs 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Josiah Cox English Wesleyan Mission

Alexander Robert Crawford Ir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 Manchuria

William G. E. Cunnyngham 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William Dean (missionary)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

James Dixon (missionary)　　　Canadian Presbyterian Mission

Elihu Doty　　American Reformed Mission

William Arthur Douthwaite

Hampden Coit DuBose　　　American Southern Presbyterian Mission

August William Edwins　　China Mission Society

Ernst Johann Eitel　　歐德理　　Basel Mission

James Gareth Endicott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Ernst Faber

Adele M. Fielde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

George Ashmore Fitch　　YMCA

Robert Coventry Forsyth

Thomas Crosby Fulton　　Ir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Ailie Gale

Francis Dunlap Gamewell　　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Ferdinand Genahr　　Rhenish Missionary Society

Otis Gibson　　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William Gillespie　　United Presbyterian Mission

Robert Hall Glover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Josiah Goddard　高德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

Jonathan Goforth　古約翰 or 顧約拿單　　Canadian Presbyterian Mission

David Crockett Graham　葛維漢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George Richmond Grose　　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Karl Gützlaff　　郭士立 or 郭實臘　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Ronald Owen Hall　　　　Church of England

William N. Hall　　　　Methodist New Connexion

Antonius Hambroeck　　　　Dutch Reformed Church

Theodore Hamberg 韓山文　　Basel Mission

E. H. Hamilton　　　　Southern Presbyterian Mission

Francis R. Hanson　　　　American Protestant Episcopal Mission

August Hanspach　　　　Berlin Missionary Society

Victor E. W. Hayward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

David Hill 李修善　　English Wesleyan Mission

Joseph Charles Hoare　　霍約瑟主教

Leonora Howard King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Miss Gertrude Howe　　昊格矩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William Edwin Hoy　　　　Reformed (German) Church in USA

Thomas Hall Hudson　　　　General Baptist Mission

Edward Hicks Hume 胡美醫生　　Yale-in-China Mission

Arthur W. Hummel, Sr.

Samuel Hutton　　　　English Wesleyan Mission

John Innocent　　　　Methodist New Connexion

Robert A. Jaffray 翟輔民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Benjamin Jenkins　　　　American Souther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Horace Jenkins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

John Jones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Cleveland Keith　　　　American Protestant Episcopal Mission

Hendrick Z. Kloekers　　　　Netherlands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Miles Justice Knowlton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

Carl T. Kreyer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

James William Lambuth 藍柏 American Souther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Walter Russell Lambuth 藍華德 American Souther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Richard Frederick Laughton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Rudolph Lechler 黎力基 Basel Mission

William G. Lennox

Wilhelm Lobscheid 羅存德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Henry Lockwood (missionary) American Protestant Episcopal Mission

Edward Clemens Lord independent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

Jemima (Bausum) Lord (Baptist)

David Willard Lyon 來會理 YMCA

Donald MacGillivray (missionary) Canadian Presbyterian Mission

George Leslie Mackay 偕叡理 or 馬偕 Canadian Presbyterian Mission

Robert Samuel Maclay 麥利和 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John Magee 馬驥

Donald Matheson

Elizabeth McKechnie Woma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

John Kenneth Mackenzie

Marie Monsen Norwegian Lutheran Mission

William H. Murray Scottish Bible Society

Daniel Nelson Norwegian-American Lutheran Mission Society

Robert Nelson American Protestant Episcopal Mission

Frank Lushington Norris Society for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Frederick W. S. O'Neill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Alvin Ostrom American Reformed Mission

G. Owen

H. M. Parker American Protestant Episcopal Mission

John Parker Scottish United Presbyterian Mission

William Parker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Harry Parsons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George Piercy 俾士 English Wesleyan Mission

Victor Guy Plymire Assemblies of God

William John Pohlman American Reformed Mission

John Tevis Points American Protestant Episcopal Mission

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 卜舫濟 American Protestant Episcopal Mission

Karl Ludvig Reichelt Christian Mission to Buddhists

Timothy Richard 李提摩太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Gilbert Reid 李佳白 Mission Among the Higher Classes

Susanna Carson Rijnhart Disciples of Christ Mission to Tibet

Issachar Jacox Roberts 羅孝全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

Roy Robertson 羅德聖 Youth For Christ

Halvor Ronning China Mission Society

Logan Herbert Roots American Episcopal Mission

John Ross Scottish United Presbyterian Mission

Herman Röttger 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Warren Bartlett Seabury

Grace Service

W. Scarborough English Wesleyan Mission

Wilhelm Scheid Rhenish Missionary Society

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 施約瑟 Episcopal Church

Charles Ernest Scott

Charles Perry Scott Church of England

William Wallace Simpson Assemblies of God

Nathan Sites 薛承恩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蘇慧廉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

Frederick Porter Smith English Wesleyan Mission

Samuel Joseph Smith English Wesleyan Mission

Jacob Speicher (missionary)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

Edward Burnard Squire

Eugene Stock

John Leighton Stuart 司徒雷登

Absalom S. Sydenstricker 賽兆祥

Edward W. Syle American Protestant Episcopal Mission

John Van Nest Talmage 打馬字 American Reformed Mission

Charles Taylor American Souther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E. H. Thomson

John Lawrence Thurston

Elisha Townsend (missionary) Elisha Townsend Canadian

Methodist Church

Minnie Vautrin 魏特琳 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

Jack Vinson Southern Presbyterian Mission

Carl Johannes Voskamp Berlin Missionary Society

Abbe Livingston Warnshuis American Reformed Mission

Corydon M. Wassell

Hyla S. Watters

Andrew Weir Ir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Erastus Wentworth 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Knut Bernhard Westman Swedish Lutheran Church

L. N. Wheeler 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John Wherry 韋利

Moses Clark White 懷特 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Isaac William Wiley 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Alexander Williamson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Henry Raymond Williamson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Robert Orr Wilson The University of Nanjing Hospital

Phillip Winnes Basel Mission

Maquis Lafayette Wood American Souther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Beulah Woolston 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George Armstrong Young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Perry Oliver Hanson 韓丕瑞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Hiram Harrison Lowry 劉海瀾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Andrew G Johnson Sweden

Bernt Berntsen 賁德新 (Independent)

Steve Peter H S Kok 郭弈陞 (Malaysia)

William Taylor Dixon

(Independent)

Bertha Pinkham Dixon

(Independent)

SEE ALSO （另请参见：）

List of Roman Catholic missionaries in China

List of Christian Missionaries

Timeline of Christian missions

Chefoo School

Lammermuir Party

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

Grace Dyer Taylor

The Murder of John and Betty Stam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George S. Benson

FURTHER READING（详情请参考进一步文献资料：）

Anderson, Gerald H.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Mission, MacMillan Reference, 1998

Broomhall, AJ, Hudson Taylor and China's Open Century Vol I, II, III, Hodder & Stoughton, London, 1981

Fulton, Austin Through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 Church and mission in Manchuria. Edinburgh, St Andrews Press. 1967. Lists all Church of Scotlan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and Presbyterian Church in Ireland missionaries from 1867-1950. (Contains listing of all their missionaries.)

Griffiths, Valerie, Not Less Than Everything, Monarch Books & OMF International, Oxford, 2004

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London, 1929

Lovett, Richard, Vol II, Henry Frowde, London, 1899

Shorrock, Arthur, Shensi in Sunshine and Shad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 1926

Sibree, James, Register of LMS Missionaries, 1796–1923, LMS, London, 1923

+++
+++
+++
+++
+++
+++
+++
+++
++

倪柝声、王明道、宋尚节、等人、以及广大的中国基督徒与众教会

++++++++++++++++++++++++++++

（以下引述关于倪柝声以及爱尔兰都柏林弟兄会的英文维基百科信息）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atchman_Ne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lymouth_Brethren

倪柝声（1903年11月4日—1972年5月30日）是一位中国教会领袖，一位二十世纪的中国基督徒的教导者。1922年，他在福州市开始带领教会聚会；这可以被看作是“地方教会”的开始时期。在倪柝声三十多年的服事期间，他出版了许多关于圣经的书籍。他在中国各地建立了很多教会，并举行了许多会议，培训和训练教会工作者以及圣经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以后，倪柝声被逼迫、拘捕，因信仰而坐监，在监狱里渡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2009年7月30日，美国众议院议员CHRISTOPHER SIMTH在国会中向他提出表彰纪念。

倪柝声生于1903年11月4日，是家中九个孩子中的第三个。他的父亲是清朝海关部门的一位受尊敬的官员；母亲曾是美国卫理公会在中国开办的学校中的一名优秀学生。他母亲去上海的一间西方人开办的女子学校提高英语的时候，结识了DORA YU，一位放弃了医学事业而专门从事福音布道的传道人。由于倪柝声的父母都是属于卫理公会教会（或译为美以美教会），所以倪柝声在婴儿时期就在卫理公会教会受洗。

1916年，倪柝声13岁的时候，他进入西方传教士在福州开办的语法学校上学。然后，他又去福州三一书院继续上中学。在这里，他展现出极为优秀

的智力与远大的志向。在那段时间，尽管福州地区经历了严重的洪灾、疟疾与饥荒，但是倪柝声与他的好朋友努力完成了学业。在毕业考试上，倪柝声高居第二名，而他的好朋友则取得第一名的成绩。

1920年春季，当倪柝声17岁的时候，DORA YU被邀请来到福州的一个教会进行布道。倪柝声的母亲去参加了布道会，并深受感动；回来以后，她向儿子为自己以前对他不公正的处罚而道歉。母亲的行为，让倪柝声印象深刻；因此，他也决定第二天去参加布道会，看一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从布道会回来以后，——倪柝声后来回忆道："1920年4月28日，我独自一人待在我的房间中，挣扎着思考，决定是否要信主。一开始的时候，我很不情愿；但我试着开始祷告；这时，我看见我身上很多的罪，并明白了耶稣基督救恩的宝贵性与真实性。我好想看见，主的手在十字架上向我伸出；我好想听见，主对我说：'我在这里等待着接纳你'。我意识到，基督的宝血大有能力地洗净了我的罪；我被基督的爱所包围；于是，就在那时，我接受了他的救恩。从前，我曾经嘲笑那些信耶稣的人，但从那天晚上起，我真实地明白了，信靠耶稣基督的意义；我哭泣着承认自己的罪，祈求主的饶恕。当我这样第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体会到了我从未曾经历过的喜悦与平安。那时，光好像洒满了整间房子；我对主说，'主啊，你真的如此恩待我'。"

作为三一书院的一名学生，倪柝声开始向同学们分享自己的得救经历。后来，他回忆道："我立刻开始更正自己的一些事情；并每天为七十个同学们祷告。有的时候，我甚至会随时为他们祷告，甚至在课上的时候也在心中默默祷告。当有机会的时候，我就会尽力劝他们信耶稣。靠着主的恩典，我每日持续祷告；这样经过了几个月以后，那七十个人中，除了一个人以外，其他人都信主得救了。"

倪柝声信主以后，期望自己被培训成为一名福音工作者。他首先参加了DORA YU在上海举办的圣经学校，尽管那时他还只是一个高中生。但是，在那里他被劝说退学，因为他有一些慵懒的坏习惯，例如睡懒觉。后来，倪柝声与一位英国传道者MARGARET BARBER结识；后者成为了他的导师。倪柝声常会每周前往拜访她，从她那里得到属灵的帮助。BARBER把倪柝声当作是一名年轻的学生，并常常严格地管教他。BARBER于1930年去世；她去世的时候，把自己所有的书籍等物品都交给了倪柝声。倪柝声回忆道："当我们听说了BARBER去世消息的时候，都非常难过悲痛。她是一位非常深刻地沉浸于主里面的人。以我的观点看来，她的那种与主如此深刻的关系，在这个世上非常少见。"

通过BARBER，倪柝声接触到DM PANTON，ROBERT GOVETT，GH PEMBER，JESSIE PENN-LEWIS，AUSTIN-SPARKS等人的著作。此外，他还得到了普利茅斯弟兄会的一些著者的书作，例如JOHN NELSON DARBY，WILLIAM KELLY， CH MACKINTOSH等人写作的书籍。最后，倪柝声的个人图书馆中包含了三千多本书籍，涵盖教会历史、属灵成长、圣经注释、等等内容。通过勤奋的查考学习，以及不同的学习方法，倪柝声开始非常地熟悉、了解圣经。在倪柝声服事工作的早年期间，据说他会用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购买生活所需，三分之一的收入来帮助他人，而剩下的三分之一就都用来购买属灵书籍。众所周知，倪柝声在博览群书的时候，善于拣选、理解、分辨、记忆、掌握那些书中的重要内容。

倪柝声的许多思想，都是得自于普利茅斯弟兄会的这些书籍，例如，否认牧师职事，否认教会专职人员与普通信徒之间的区别，以擘饼（主的圣

餐）为核心的敬拜聚会，等等。从1930年到1935年，倪柝声的运动与RAVEN-TYLOR的“闭关弟兄会”产生了密切的互动；后者由JAMES TAYLOR SR所领导。“闭关弟兄会”认可倪柝声所领导的“地方教会”运动也是属神的工作。不过，倪柝声拒绝跟随闭关弟兄会的榜样，不愿意把自己的地方教会封闭起来（闭关弟兄会甚至禁止自己组织内的成员们与其他基督徒们一同进行擘饼聚会）。

1933年，倪柝声访问英国与美国，并与HONOR OAK基督徒团契的基督徒们，以及AUSTIN SPARKS的团契，还有其他的、倪柝声在中国曾经结识的、非“闭关弟兄会”的英美传道人们，一同进行擘饼聚会（主的圣餐）。得知这些事情以后，闭关弟兄会与倪柝声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经过了一系列沟通以后，1935年8月31日，倪柝声收到一封闭关弟兄会的来信（信上有弟兄会的领导人签名）；信中宣称，弟兄会从此与倪柝声以及倪柝声所领导的“地方教会”运动正式断绝关系。

婚姻

才只有十几岁的时候，倪柝声就爱上了他未来的妻子。他们两个家族从祖父辈以来就是好朋友。当倪柝声成为了一名基督徒以后，他的那位未来妻子曾经当着他的面嘲笑耶稣。这让倪柝声内心非常不安。后来，经过了许多挣扎以后，倪柝声断绝了与她之间的关系。十年以后，当倪柝声的那位未来妻子大学毕业的时候，她也成为了一名基督徒。从1934年开始，她开始参加上海的教会聚会。同一年，当倪柝声在杭州举行第四届复兴聚会的时候，他与妻子结婚了。后来，在倪柝声常常生病期间，他的妻子持续地照料他。在倪柝声被监禁的漫长时间中，她是唯一获准探望他的人。他们

夫妻没有孩子。

服事

1936年，在一群同工面前，倪柝声总结了他服事工作的内容："自从我因病卧床、并得到了上帝的医治以后，我就得到清晰的启示，上帝愿意我在以下方面做工来服事他：1. 文字事工。自从我病后，上帝向我显明，他要我做的工作不是解释圣经、也不是宣讲普通的福音、也不是说预言，而是，强调地指出圣经话语的生命大能......我所写的一切书籍文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读者、作为一个新造的人，能够把自己完全地献给神，成为神手中的一个有用、有价值的人。现在，我全心地把我这些书籍、以及书籍的读者们、以及我自己的生命完全地交给神。愿神永远地保守我们直到永远。愿神的灵引导我，进入他完全的真理之中。2. 复兴的聚会。神打开了我的眼睛，使我看见，各地的教会都需要复兴；愿许多的基督徒们起来，成为上帝的见证......所以，每年一次，我们都要举行复兴大会。在这些大会中，我信实地宣讲上帝所启示给我的话语。3. 建造地方教会。当神呼召我来服事他的时候，主要的目的并非是要让我举办奋兴聚会、好让人们听见更多的圣经教导，也并非是要让我成为一名福音布道家。主向我所启示的是，他要让我在各地建造地方教会来彰显他自己；来见证所有的'地方教会'在地上的合一；并使得每一个圣徒都能够履行教会中的事奉职事，活出教会的生命。神所要的，不仅是每一个个人的得胜或是属灵，而更是一个集体的、荣耀的教会，被成圣、献给神。4. 青年训练。如果主再来的时间还没到，那么，我们需要训练大量的年轻人，来继续下一代人的事奉与见证的工作......我的想法，不是要建立一个神学院、或是一个圣经学校，而是 要让年轻人在一起过一个集体的生活、属灵的生活；就是说，接受训练、得到造就、学习怎样阅读并明白圣经；并持续祷告、以得

到良善的品格。从反面说，就是学习怎样对付罪，怎样对付世界、对付肉体、对付自然的生命与生活，等等。时机成熟以后，这样的年轻人就可以返回到他们各自的教会，与教会里的其他众圣徒们一起，在教会中事奉主......未来，我的个人负担就是在上述四个方面的服事工作中。愿一切荣耀归于主。”

倪柝声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1923年，他开始发表一份杂志。1925年，他开创了另外一份基督徒杂志。也是在这一年，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倪柝声”。21岁的时候，当倪柝声去马来西亚访问自己的母亲（他的母亲之前从中国搬迁到了那里），倪柝声就在那里建立起来了第一个“地方教会”。1926年，倪在上海建立了另外一间地方教会；这成为了他在中国的服事工作的中心。到1932年，倪柝声的“地方教会”运动已经遍及了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许多地方。他的这种教会组织与运动方式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他进入监狱为止。

1928年，倪柝声发表了一份三卷著作《属灵人》。同年二月，倪柝声在上海举行了第一届复兴大会。1934年1月，倪柝声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基督是神一切的中心”、“得胜”。根据倪柝声所说，这次会议是他的服事工作的转折点。他说道：“我的基督徒生命从教义、知识，转向了一位鲜活的主，就是基督；他是上帝一切心意的中心。”

1934年2月，倪柝声进行了一系列的演讲。在这些讲话中，倪柝声定义并解释了地方教会的信仰实践。倪柝声说道，根据圣经，教会从来不是被分成各个地区，也不是根据不同教导或教义被分成各个宗派。他的这些讲话后来都被收集并发表在相关书籍里面。同年5月，倪柝声劝说李常受从烟台搬

迁到上海来，帮助编辑和出版倪柝声的书籍。

1938年，倪柝声到欧洲旅行，并在那些地方演讲。这些演讲内容被收集并发表在《基督徒的正常生活》一书中。倪柝声回到中国以后，召开另一次会议。根据倪柝声所述，这次会议是他的服事工作中的第二个转折点。倪柝声回忆道："我的第一个转折点是认识基督；我的第二个转折点是认识教会、基督的身体。基督徒不仅要认识基督，也要认识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他也是身体。"

1939年，倪柝声参与到他的二弟的制药公司事务中。尽管这是与他的家族压力有关，但是，倪柝声也认为，这是一次好机会，可以因而帮助那些贫困窘迫的同工们；现在，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多人都深陷贫困与困境之中。倪柝声担任了管理全部制药工厂的职务；他对工厂进行了重组，并雇佣了很多上海的同工来到药厂中工作。此时，上海教会的一些长老们质疑倪柝声从事商业的行为；这导致了他的服事工作于1942年停止。不久以后，上海教会完全停止了聚会。

1945年3月6日，倪柝声搬迁到重庆，在那里管理制药工厂的业务。在那里，他针对圣经启示录第二章与第三章、以及雅歌写作了一些信息，发表在相关书籍中。1945年9月9日，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6年，李常受等人开始试图在上海恢复教会聚会，并试图恢复倪柝声的教会服事工作。倪柝声购买了一些土地，并在那里进行同工训练的工作。1948年4月，上海的教会发生了复兴；倪柝声正式重新开始了事奉工作。当倪柝声开始恢复服事的时候，他把制药公司完全奉献于基督徒的服事工作，以此作为对于神的奉献；这影响了很多同工，使他们也都交出各自的产业，

用于教会事奉。在很短的时间内，上海教会的人数就增加到一千多人。

1949年中国共产党兴起以后，基督徒面临极大的逼迫。许多西方传教士面临各种虚假的指控与肆意的逮捕。在各种政治宣传以及狱刑威胁之下，基督徒们被命令要互相进行检举揭发。

1952年4月10日，倪柝声被公安局逮捕，罪名是贿赂、偷窃公共财产、偷税、在政府合约中造假、以及偷窃政府经济信息。倪柝声接受了政府的“再教育”。1956年1月11日，全国开展了针对“地方教会”同工以及长老们的扫除运动。一些人后来死于劳改营，其他人则面临漫长的监狱刑期。1956年1月18日，上海市政府宗教局在上海南阳路的教会聚会大厅开展了针对倪柝声的控诉与揭发大会。1956年6月21日，倪柝声在上海高院被宣布，他被赶逐出教会组织，并且所有针对他的控罪都被证实。他被判处15年监禁，并要在劳改营接受劳动改造。他先是被关押在上海，然后被搬迁到其他地方的监狱中。在监狱服刑期间，只有他的妻子获准可以探望他。

1956年1月29日，上海公安局没收了教会在南阳路的建筑物；倪柝声的许多同工们都被逮捕、隔离、并被强迫谴责倪柝声。一些同工们加入到了控诉揭发倪柝声的队伍中；另一些同工们则保持沉默，并受到了终身监禁的惩罚。在这以后，全国范围内都开展了声讨“反革命倪柝声”的大规模运动。

在1972年倪柝声去世之前的一年，倪柝声的妻子由于一次意外事故以及高血压而去世。政府没有允许倪柝声前去参加他妻子的葬礼。之后，他妻子的大姐开始承担起探望并照顾监狱服刑中的倪柝声的责任。倪柝声的刑期

本应是到1967年结束；但是，他被一直拘押，直到他于1972年5月30日去世。他死的时候，没有任何讣告，也没有任何葬礼仪式。他的遗体于1972年6月1日火化，——在他的家人来探监之前。

倪柝声的甥女记述了她前往领取倪柝声骨灰时的情景："1972年6月，我们收到劳改营的通知，得知我的舅爷去世了。我的大姨奶和我赶快前往劳改营。当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才知道，他的遗体已经火化了。我们只能看见他的骨灰......在他走以前，他写了一张纸条，放在他的枕头下；他用颤抖的字迹在上面写下了几行很大的字。他想要见证，他至死相信那他在毕生中所信靠的真理。那个真理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罪人而死，并死后第三日复活；这是宇宙中最大的奥秘；我为我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仰而死。——倪柝声。当劳改营的官员给我出示那张纸条的时候，我在心中祷告祈求主让我能够很快地默诵那句话......他的舅爷去世了。他持守信心一直到死。他以带血的冠冕，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与主同在。虽然倪柝声没有实现他的夙愿、出狱与妻子相聚，但是，主已经预备了那更美好的事——他们已经一同在主里面了。"

倪柝声的信仰

倪柝声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与话语。他相信，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上帝的三个位格彼此不同、然而完全合一，从亘古直到永远。他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上帝自己；基督道成肉身，有着完全的人性与神性；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并在死后第三日复活，后升天，坐在权能的宝座上，有着荣耀的冠冕；他是万有之主宰，并将要第二次再来，接纳那一切跟随他的人。倪柝声相信，任何相

信、接受、信靠基督救恩的人，都被上帝所饶恕，被基督的救赎宝血所洗净，因信称义，在圣灵中重生，被恩典所挽回。这样的信靠基督救恩的人，就是上帝的儿女，是基督身体、基督教会的一员。倪柝声相信，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基督教会的一部分，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是神的殿的一部分。

倪柝声的独特神学观念中，包含着来自于弟兄会神学的部分内容，和KESWICK聚会的生命神学的部分内容，以及他自己的、出于东亚视角的对于基督教神学的一些理解。

出版物

倪柝声除了频繁地发表演讲、对很多基督徒会众讲话以外，他还出版并发表了大量书籍、文章、文稿、诗歌诗词等。他出版的书籍中的主要内容，都是来自于他的听众们、学生们在聆听他演讲时所记录的笔记信息。还有一些书籍内容，则是来自于他以前所出版的杂志文章。倪柝声在西方最著名的一本书叫做《基督徒的正常生活》；该书内容主要是基于他在1938年至1939年期间的欧洲旅行时的英文演讲信息。这些内容主要是基于他关于《圣经新约》中的《罗马书》的神学理解。

除了倪柝声自己的书籍出版发行以外，在倪柝声的指导和监督下，一些相关英文书籍也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发行，主要包括AUSTIN SPARKS，MADAME GUYON， MARY MCDONOUGH，JESSIE PENN LEWIS以及其他人的书籍。

==================================

所谓"普利茅斯弟兄会"或通称为"弟兄会"【本书作者注，这个"普利茅斯"是英国的一个地名，请不要与美国五月花号清教徒《普利茅斯开拓史》混淆；在具体信仰实践中，这个"普利茅斯弟兄会"的许多主张和组织原则并不完全符合圣经，而是，有很多偏激的做法以及对于圣经的解读】，是一个可以追溯到1820年代末期的、爱尔兰都柏林的、不从英国国教的、福音性的、地方基督徒组织。这个组织强调"唯独圣经"；他们相信圣经是教会教义与信仰实践的最高权威，超过任何其他权威之上。普利茅斯弟兄会通常把自己看作是一些同心合意的、各个自由教会所组成的联合组织，而不是一个基督教宗派。

1827年至1828年，爱尔兰都柏林的几个当地基督徒小组聚在一起，共同进行擘饼聚会。其中的主要领导人物是ANTHONY NORRIS GROVES（他是三一学院的一名牙医学生，也学习神学），学医的EDWARD CRONIN，JOHN NELSON DARBY（他是WICKLOW郡的图书馆员），以及JOHN GIFFORD BELLET（他是一名律师）。在这些人的聚会中，没有牧者，甚至没有聚会的固定程序，因为他们仅仅以圣经本身为聚会的指导。

他们开始的时候，研究和学习圣经中的预言。为此，从1831年开始，他们每年在WICKLOW郡举行研讨会议。

弟兄会中的这些基督徒们常常觉得，英国国教教会偏离或扭曲了古代基督教信仰的美好传统，而近代的美国与法国的卫理公会运动以及政治革命则包含着太多的宗派主义。1831年，他们在英国的普利茅斯举行了第一次英格兰的会议。会议的组织者主要是GEORGE WIGRAM，BENJAMIN WILLS NEWTON 以及 JOHN NELSON DARBY。这个弟兄会运动很快传到了英国的很多地方。1845年，英国普利茅斯的弟兄会教会聚会超过了一千人。因而，他们被其他人称作是“英格兰普利茅斯的弟兄会”，或简称为“普利茅斯弟兄会”。有时，他们也被称作是“DARBY主义者”，——尤其是在人们讲到他们在DARBY影响下而具有的封闭的特质的时候。

1845年，DARBY从瑞士归来。他在瑞士期间，曾经成功地在当地组建了许多教会。当DARBY返回到英格兰的普利茅斯的时候，NEWTON正在那里掌控着弟兄会的教会。在关于NEWTON所发表的一些书籍内容的细节之处上，DARBY表示不同意。在普利茅斯教会中，DARBY也反对NEWTON所处的长老职位。在弟兄会中，虽然经过多次调解，但是，DARBY与NEWTON之间的争议一直得不到和平解决。两年之后，针对NEWTON关于圣经诗篇第6篇的一份讲道信息，DARBY激烈地提出了反对意见。随后，普利茅斯的教会发生了分裂。最终，NEWTON收回了自己关于讲道信息的一些说法，然而却不得不离开普利茅斯，到伦敦去组建了另一间教会。

DARBY在普利茅斯重新组建了另一个弟兄会聚会。但是，他于1848年对GEORGE MULLER所参与领导的一个名为BRISTOL BETHESDA的弟兄会教会表示不满，因为后者接纳了一名原属于NEWTON聚会的成员。BETHESDA教会对那位成员进行了相关调查，并维持教会原来关于接纳那个人的决定。DARBY对此很不满意。1848年8月26日，DARBY发布了一份通告，宣布与BETHESDA教会断绝一切关系，而且，与任何同该教会成员发生关系的其他教会都断绝

往来。这成为了DARBY余生中所秉持的“闭关弟兄会”的特点。

后来，闭关弟兄会经历了很多分裂、四散、重组。而与此同时，“开放弟兄会”也经历了一些分裂与挫折。不过，尽管如此，总的来说，“闭关弟兄会”、以及“开放弟兄会”仍然持续扩张了一段时间。而后者的扩张速度、人员增加速度，更超过了前者。1862年至1877年期间，DARBY七次访问北美，探访了那里的闭关弟兄会的聚会。而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一些来自于苏格兰以及爱尔兰的传道人在北美建立了一些“开放弟兄会”的教会聚会。

“开放弟兄会”与“闭关弟兄会”

开放弟兄会与闭关弟兄会之间的分裂，发生于1848年。后来，他们两者本身又不断地经历分裂，变成一些更小的组织；这些小规模组织在彼此之间，又有一些程度不等的、互相之间的交通与重合。

开放弟兄会与闭关弟兄会之间的最著名的区别就是在于，他们如何看待各地教会之间的关系。在开放弟兄会的组织体系内，各地教会之间是彼此独立平等的、心意相同的关系。而在闭关弟兄会的组织体系内，各个地方教会则受到明显的纪律约束。

两者之间的另外一个区别是在于，他们如何看待与其他基督徒以及教会之间的关系上。许多开放弟兄会组织愿意与其他非弟兄会教会组织共同举办福音布道会、青少年活动、或是其他福音活动。但闭关弟兄会则往往仅是

局限于其自身组织内部来举行任何活动。

无论是闭关弟兄会还是开放弟兄会，两者最著名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反对设立包括牧师在内的教会专职人员职务。他们的观点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被神拣选，应当前来在教会中事奉，因此，所有的基督徒都应当是牧师传道人；换言之，他们极端地强调“信徒皆祭司”的原则。弟兄会对这一点如此强调，以至于在弟兄会的教会中都没有任何牧师。在大多数弟兄会的教会聚会中，领导者都仅仅是本地聚会中的长老。

一些著名的弟兄会成员或是与弟兄会有关的人员

以下名单主要是十九世纪的1848年弟兄会分裂以前时期的一些著名人物。不过有几个人物是例外：——HA IRONSIDE与倪柝声；他们都是二十世纪的人物，都与弟兄会有很深的关系。

ROBERT ANDERSON，一位基督徒作者；他曾经与DARBY同处于英格兰普利茅斯弟兄会教会；但后来他归回了从前的长老教会传统。

JOHN GIFFORD BELLET，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研究者。

GEORGE BEURLING，二战期间的加拿大飞行员。

ROBERT MACKENZIE BEVERLEY，一位著名的贵格会成员，后来他离开了贵格会，成为了一个弟兄会成员。

LANCELOT BRENTON，他把七十士译本圣经从希腊文翻译为英语。

FF BRUCE，他是英国的一位圣经学者，出版了四十本圣经注释书籍。

ROBERT CHAPMAN，曾经在十九世纪的弟兄会中很著名。

HENRY CRAIK，自1832年以后与GEORGE MULLER同工。

EDWARD CRONIN，爱尔兰都柏林弟兄会的一位先锋成员。

JOHN NELSON DARBY，现代末日论教义的宣讲者。

JAMES GEORGE DECK，前往新西兰的传道人。他是闭关弟兄会的正式成员，但拒绝与开放弟兄会断绝关系。

倪柝声，“小群”（即，地方教会）的创建者，但被闭关弟兄会开除，因为

他与其他“宗派主义者”保持往来。

BENJAMIN WILLS NEWTON，普利茅斯弟兄会教会的早期领导者，但被JOHN DARBY及其追随者视为异端。

戴德生，中国内地会的创建者。

FRANCIS WILLIAM NEWMAN，JOHN HENRY NEWMAN主教的弟弟；他被赶逐出弟兄会教会，因为他否认基督的神性。

GEORGE MULLER，BRISTOL孤儿院的创建者，BETHESDA弟兄会教会的教师。

++++++++++++++++++++++++++++

（以下选自中文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0%AA%E6%9F%9D%E5%A3%B0

倪柝声，原名倪述祖，英文初名 Henry Nee，籍贯福建福州。1903年11月4日（清光绪廿九年农历九月十六日）生于广东汕头，当时在汕头任海关官员。倪柝声是家中的长子，倪家是福州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之一，他的祖父倪玉成（1840年－1890年）于1853年就读于公理会保福山男校，自1862年

成为福州公理会最早的华人牧师之一，在铺前顶救主堂任牧师达二十八年之久，“闽中三公会（美以美会、圣公会、公理会）时常把他轮流借用。”。并且不顾当地风俗，坚持与外省人——广东人基督徒结婚。父亲倪文修（Ni Weng-Sioe，1877年－1941年）是兄弟七人中的第四个，毕业于福州美以美会所办的著名学府鹤龄英华书院，对于教会的传统和教会诗歌相当熟悉，1896年3月进入汕头潮海关任职，1941年在香港去世。母亲倪林和平则是福利公司经理林姓富商的养女，6岁时全家受洗成为基督徒，11岁时进入毓英女塾接受新式教育，1890年代后期为准备到美国留学，而进入上海中西女中学英文（以英文水准高著称的教会学校）。1899年10月19日，按照父母之命嫁给倪文修。她性格刚毅，曾因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而获爱国勋章。她积极参与社会活动。1911年发起组织妇女爱国会，自任总干事，又出任基督教福建孤儿院董事。倪文修与林和平夫妻共育有五子四女。倪林和平所生的前2个孩子都是女儿（倪闺臣和倪闺贞），常受重视男嗣的婆婆讽刺。再次怀孕时，就模仿《圣经》中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祷告，应许如果所生为男孩，就将他一生献给神[4]。此后共生有五子，分别为：倪述祖（倪柝声）、倪怀祖、倪承祖、倪洪祖、倪兴祖。
倪文修和倪林和平夫妇都是福州美以美会福州天安堂的教友，并在天安堂务德部、召益会等教徒团体中任职。倪柝声在婴儿时期，就由美以美会的监督受洗。1910年，7岁时，倪柝声随家人回到原籍福州，住在闽江南岸南台岛新发展的商埠区（今仓山区）。倪文修在这一带购置了三处房产，分别位于海关巷17、14号（占地600平方米，1949年在空地上修建执事之家，现已拆除），中洲岛中东巷24号（占地350平方米，已改建为商城，而在对面新建福州教会的中洲聚会所）、仓前山梅坞路玉林山馆（占地300平方米，属于教会使用）。

三一书院的优等生

1916年，倪柝声就读于英国圣公会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大学布道会在南台俄国领事馆原址上创办的著名的福州三一学校汉英书院（位于今福州仓山

区公园西路福州外国语学校），接受西式教育。福州三一学校包括汉英书院（Anglo-Chinese School，八年制，中学和大学一、二年级，主要学科均采用英文教学）、广学书院（六年制中学，教学以汉语为主）和桥南两等小学校（六年制小学）。在三一学院，倪柝声是名列前茅的优等生："我在校中是何等不得了的学生，同时也是了不得的学生。坏的方面，我是一个常犯规的学生；好的方面，神给我天生的聪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论文常是贴榜的"。1919年五四运动中，倪柝声的民族意识高涨，被推举为三一学校学生会副代表，带头组织学生运动，分发油印传单，抵制日货。"我是学校中最反对（汉英书院主理）来必翰的学生，（来必翰）甚至公开骂我作魔鬼。"三一学校当局对倪柝声作出停学一年的处分。

借着余慈度的传扬

1920年2月，倪柝声17岁，还在三一书院读书停学期间，中国自由女布道家余慈度医生（倪林和平在上海中西女中读书时结识的好友）应邀来到福州，在福州天安堂传福音。2月21日，原本在信仰上不冷不热的倪林和平深受余慈度的讲道所感动，行为方面有令人惊讶的改变：不仅放弃了打麻将的嗜好，而且主动为自己曾向家人发脾气而认罪悔改，请求家人饶恕。年轻的倪柝声对母亲的改变非常惊讶，因好奇也去天安堂听余慈度讲道，深受感动，接受了福音，整夜认罪悔改，并且立志终身奉献（4月29日），毅然放弃原来的理想和计划，并取了新的名字—倪柝声，英文 Watchman Nee。1920年春，倪柝声随余慈度到她在上海江湾开办的圣经学院受训练，半年后因"太爱世界"被余慈度劝退，回到福州继续完成他的课程（主修化学）。这时他不顾受嘲笑，热心向同学传扬福音，把70名同学的名字一一记在本子上，天天代祷，到毕业时，有69人接受福音，其中缪绍训，陆忠信，魏光禧，王峙等人后来成为他的同工。

从和受恩受造就

以后几年间，倪柝声一面刻苦查读《圣经》，奠定了坚实的圣经基础，同

时博览大批基督教历史名著；一面和一批年轻人，赴已隐居在福州闽江口附近，马尾罗星塔对岸的村庄白牙潭（今属长乐市营前街道）多年的年迈的英国无宗派的独立女传教士（没有任何差会支持）和受恩（Margaret E.Barber，1866年－1930年）那里求教，从她那里得到属灵上极大的帮助，被她的属灵生活所折服（倪柝声形容她是“一位发光的基督徒”，1930年代倪两次访问西方，接触史百克等许多基督徒领袖以后，认为极少有人能与她的属灵深度相比），并且由于和受恩的介绍，倪柝声得以接触到英国弟兄会和内里生命派的著作，对倪柝声一生的事奉道路产生深远的影响。

1927年，倪柝声迁居到上海。此后直到1952年失去自由，上海一直是他工作和出版的中心。他将福音书房也迁至上海，称为上海福音书房。在上海，他得到两位重要女同工汪佩真、李渊如的帮助，在地方立场上兴起了上海教会的见证。同年，倪柝声、李渊如、汪佩真和中国内地会的年长传教士祝康宁共4人，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新闸路944弄赓庆里（今泰兴路口东侧）汪佩真住所举行上海地方教会的第一次擘饼聚会。聚会不久迁至哈同路240弄文德里26号的李渊如住所。

1928年1月，倪柝声租到位于上海公共租界西区哈同路240弄文德里34号的一幢石库门房子，在楼下的客堂召集第一次得胜聚会。主题是‘神永远的旨意和基督的得胜’，参加人员约五十人，其中一半是来自浙江南部的温州平阳县（内地会、自立会背景）和江苏北部的阜宁、淮安（美南长老会背景）的传道人。各处地方教会的行政都是独立的，由当地的长老们负责。上海教会最著名的长老是俞成华。

1931年10月，倪柝声在上海召聚第二次得胜聚会，主题是‘神的约和神的智慧’，内容后来刊印成书，就是《什么是新约》的前半部分。

1932年11月召开特别聚会，与来自英国、美国和澳洲的弟兄会信徒交通。

1934年1月，第三次得胜聚会，主题有2个：‘基督的中心与普及’，和‘神的得胜者’。

1934年10月，第四次得胜聚会在杭州举行，主题有2个：'亚伯拉罕的生平'，和'属灵的争战'。

平阳和苏北

第一次得胜聚会后不久，浙江省温州平阳县的 和江苏省北部阜宁、淮安的吴微、季永同、邱日鉴等回到家乡，都脱离了原来的宗派，建立起当地的地方教会。1949年以前，平阳县（1981年分为平阳县、苍南县2县）约有一百处地方教会，（整个温州地区约200处，整个浙江省有三、四百处），苏北约二十处地方教会。

北方

1932年夏，倪柝声去访问山东时，在烟台遇李常受，促使兴起了华北第一处地方教会。不久，山东省会济南和满洲国统治下的新京（长春）也兴起了地方教会。

沿海各大城市

在此前后，浙江省的萧山、绍兴一带以及杭州，福建省的莆田、福清一带，也陆续兴起了不少地方教会的见证。

1935年夏秋，倪柝声在烟台和厦门鼓浪屿、泉州带领特会，主题是'基督得胜的生命'，与'圣灵的浇灌'。这些特会促进了复兴。

1935年到1936年，倪柝声打发同工到国内的主要大城市与港口开展，如张子洁到青岛，使得这些地方，以及首都南京 ，陆续都兴起了地方教会的见证。他在各地的同工达到200位。

内陆

抗日战争期间，香港（魏光禧开辟）、广州以及内陆省份的汉口（蓝志一开辟）、重庆、桂林、昆明以及绥远省（1943年，烟台教会大复兴期间信徒移民建立）等等许多地方也都兴起了地方教会的见证，使得早期地方教会主要集中在沿海省份的江浙闽等的情形发生很大改变。

后期

革除

1942年底，上海教会有不少信徒无法理解倪柝声帮助二弟倪怀祖经营中国

生化制药厂的行为，觉得不够属灵，并且质疑倪柝声在期间做了昧良心的事，以致生化药厂变成了“生话药厂”，教会的属灵气氛也受到很大影响，甚至李渊如也退出事奉，到苏州隐居。在这样的情形下，上海教会的长老们（张愚之、俞成华、唐守临等人）将倪柝声革除出上海教会，在此后的6年时间里，倪柝声尊重上海教会的决定，停止了一切事奉，且不知何故一直没有参加任何地方教会的擘饼。

恢复职事和南阳路会所

在倪柝声停止事奉期间，由于政局改变，北方的工作被迫停顿下来。同工李常受应汪佩真之邀，到南京、上海两地带领教会。

在1948年春节期间，访问福州的李常受、汪佩真，以及福建全省地方教会的同工们23人，一同去海关巷倪家，倪柝声终于同意出来恢复职事。这时，福州教会原由王载带领的津门路聚会所负责的长老们这时被吸引，愿意把教会“交出来”，接受倪柝声的带领，于是倪柝声重新安排了陈恪三、陈必荫、陈贞藩等4位长老负责福州教会，并实行全体事奉传福音，因此带进福州教会的大复兴，信徒人数从150人扩增到1400人以上。于是倪柝声在征求家人的同意后，将倪家在福州的三处房产全部奉献出来，中洲中东巷24号房产改建为福州教会的第2个聚会所，海关巷14号倪家房产改建为执事之家，仓前山梅坞路玉林山馆房产也奉献给福州教会使用。

1948年春，倪柝声回到上海，在同工聚会上，表示他经营中国生化制药厂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来养活同工们。倪柝声也把中国生化制药厂奉献出来交给工作。于是当年上海教会定罪他的人，特别是李渊如和张愚之，表示后悔自己过去的做法。上海教会的十二位同工（包括唐守临、杜忠臣、缪韵春、俞成华、许达微、李渊如、张光荣、朱臣、江守道、张愚之、张耆年等），联名在敞开的门刊物上发表声明：“对于倪柝声个人，我们在主面前都能同心见证，他是神的一个忠心仆人。他虽然在经营生产事业，但他的目的从来没有为着他个人的什么。在真理上、在事奉上、在经营生产上，我们和他都是同心合意的”。

那时，上海教会大复兴，人数从几百人扩增到数千人，其中知识分子、青

年学生占三分之一。于是信徒踊跃奉献，建造了南阳路145号聚会所，可容纳3000人，是全上海容纳信徒人数最多的一个基督徒聚会场所。整个上海教会又分为26个“家”，使信徒可以就近聚会，彼此关心扶持。直到1958年，南阳路145号聚会所被政府关闭，并入陕西北路怀恩堂的联合礼拜。

鼓岭训练

1948年和1949年的夏季，倪柝声在福州郊外的避暑地鼓岭他用经营中国生化制药厂的收入买下的房子里，举办了两期同工长老训练。内容有《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神话语的职事》《主工人的性格》《权柄与顺服》《读经之路》《教会的事务》《属灵的判定与判定的实例》以及《初信造就》等。

大复兴

经过鼓岭训练之后，全国各地教会普遍大复兴。在北方，张子洁带领的青岛教会信徒迅速扩增到4000人，除了龙山路4号聚会所以外，还分为20个家聚会。各地纷纷新建聚会所，如福州教会的中洲聚会所和津门路聚会所、南京教会的鼓楼头条巷聚会所、北京教会的宽街基督徒聚会处等。浙江萧山大批信徒移民到江西弋阳，开办农场，建立教会。

1950年初，倪柝声在香港的工作，带进香港教会的复兴，信徒扩增到3000人，新建了尖沙咀天文台道聚会所。

1950年代，中国大陆约有700处地方教会，其中一半在浙江省；共有7万信徒，其中近4万在浙江省，其中又以温州地区的平阳县（今平阳、苍南两县）以及萧山县等地最为集中。

倪的神学背景：两个源头

弟兄会

一个是英国弟兄会，或与普利茅斯弟兄会有关的，以约翰·纳尔逊·达秘和乔治·慕勒为代表，以及马金多、乔治·卡亭、威廉·开雷等。弟兄会的影响主要是在教会和解经、预言（特别是郭维德、潘汤和彭伯）这些方面。

内里生命派

另一个就是内里生命派，又称“奥秘派”，或称寂静主义，诸如：盖恩夫人、宾路易师母、慕安德烈、史百克等。1939年，倪柝声曾去伦敦访问史百克。内里生命派的影响是在生命、基督、圣灵、人的三部分（灵、魂、体）、主观的十字架和属灵争战等方面。

建立地方教会

倪柝声的职事从初期开始，一直都有一个清楚确定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地方教会里团体的见证。他认为建立教会，建造基督的身体，使个人的基督，扩展为团体的基督，是神在今天的主要工作。因此，他无论传扬福音、教导圣经、造就青年信徒、带领特会或训练、并出版文字，都是为此目标。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工作的再思》《圣洁没有瑕疵》《教会的正统》以及《聚会的生活》等。

倪柝声主张恢复到使徒时期的教会生活，效法圣经中初期教会的榜样，提出一地只能存在一个教会的地方教会原则，亦公开谴责宗派的罪恶，自然造成各宗派团体对他的反感，批评这是属灵上的骄傲。

倪柝声亦主张恢复圣经中信徒皆祭司的理念，谴责包括牧师在内的圣品制度，认为是天主教遗毒，领薪的牧师不符合圣经，提倡全体信徒全体事奉，传福音、祷告，重视信徒的造就，提倡分区家庭聚会。

到1948年，倪柝声以“耶路撒冷教会模式”取替过去的“安提阿教会模式”，并且对他的若干重要教会观念作了修定。倪柝声这个时期的思想主要见于《教会的事务》、《教会的正统》、《今后工作的路》、《权柄与顺服》、《如何作神代表的权柄》等著作中。

因着这种新模式的出现，地方教会便因着其所在地之不同，产生了两种教会之分别：

普通的地方教会—这种教会基本上一如过往，是由长老、执事分掌教会属灵及一般性事务的。

工作中心的地方教会—在这种教会中多了一班使徒（注：无论是天主教或

是基督新教，很少有人承认今天还有使徒存在）。虽然使徒不能管理教会，但这班使徒却以弟兄资格成为当地教会的长老，从而治理教会。再者，由于此地为工作中心，必须加强讲台的供应，而这个责任自然落在使徒身上。正因为这样，工作中心的地方教会自然会比普通的地方教会优越，最终俨如一领导的中央教会了。

为配合耶路撒冷模式之推动，倪柝声进一步阐明权柄与顺服之重要性，从而坚固、强化使徒之地位。

倪柝声指出：信徒必须绝对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代表人，以示其对神的顺服。倪在《权柄与顺服》中说："或有人说，权柄作错了事怎办？神敢信托作权柄的人，我们就敢顺服。作权柄的人有无错，那与我无关，换句话说，作代表权柄的人作的对或错，由他向神直接负责。服权柄的人只要绝对服，服错了主不算有罪，这罪主要向代表权柄追讨。"换言之，即使作权柄的人解释圣经有错误或曲解圣经，也要听从，否则就是叛逆神。

倪的这种教导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邵遵澜先生曾撰文说："到了后来，特别在台湾的聚会所，讲权柄讲的太过份……有一个弟兄说：'某弟兄是我的权柄，他讲黑的，就是黑的，他讲白的，就是白的。'有反应说：'弟兄，我们事奉一个主，你事奉两个主。'他说：'不！我事奉某弟兄，就是事奉主。'所以成了基督教里面的天主教，难怪有人说某人成了教皇了！生杀予夺之权大到一个地步，简直要你死都可以，这是我亲身经历过，我知道我在讲什么。"

倪也教导说，在地方教会中，神设立的最高权柄是长老，但长老是由他所谓的使徒设立的，换言之，长老的权柄来自使徒，他们便不能推翻使徒的权柄；"长老的设立，是在乎使徒；长老的废除，权柄也在乎使徒"，长老应学习听从使徒的权柄，"因为他们之所以有，乃是使徒叫他们有的"。

此外，配合耶路撒冷的中央集权路线，倪氏发起了"交出来"运动，即变卖一切，把一切拿出来，奉献给弟兄姐妹，包括信徒的终身事奉。交出来也包括教会本身，教堂也要交出来，好让使徒共治教会。此举引起一些地方教会的反感，更造成不少地区教会分裂，其中以福州教会最为严重。

无论如何，倪氏在抗战后的教会观确是走向中央集权制、权柄主义发展，这一点引起了不少的批评。

失去自由

1949年大陆政局变化之前，倪柝声打发同工李常受去台湾开展。他自己在1950年初在香港带进了当地教会复兴，信徒人数大大扩增（其结果是不久兴建了天文台道的聚会所），但是他本人则力排众议，在3月从香港返回上海，照顾大陆上的数百处地方教会。

1950年6月28日，中国政府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7月，倪柝声、李渊如、俞成华、汪佩真联名指示全国各地475个聚会处负责人，发动信徒32782人签名，送往福建省人民政府，要求保留鼓岭执事之家的房产土地。后来，鼓岭执事之家被定为团体地主。1951年3月，全体在鼓岭执事之家的人员受到管制，达半年之久。管制结束之后，执事之家的全部土地、房屋概行没收，执事之家的人员全体离开。

中国的以巴弗(吴维僔)在其自述中谈到了倪柝声当年带领聚会处加入三自前后所发生的签名问题：

“当年，南阳路领导层（主要是倪弟兄和长老们）许多所决定或执行的重要事情，我们一般弟兄姊妹都不知道、蒙在鼓里；例如这3万、几万个签名的事情等，一直等到几十年后，才有所闻、有所知。几十年后，即我出监以后，才从通信中逐步得知，当年那几万个签名，为的是“聚会处”系统的教会（倪弟兄是这教会系统的使者、代表），在福州有一个属教会所有的大农场，其中人员大都是弟兄姊妹。正值解放之初，党所筹备和发起的第一个大运动“土改运动”即将到来。倪弟兄在天资方面有特殊的聪明和敏锐的眼光。眼看教会办的农场可能也将被“土改”，故想用这几万个签名请求政府对这个农场的土地不进行土改；原来是这么一个计划和办法。但很快，又见到这个土改运动，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排山倒海、所向披靡，顿觉这个申请弄不好的话，不但避不开土改、还会招致大祸，不行、不敢动。另一方面倪弟兄又看到，新政府对神教会的政治压力特别大，若不趁早参

加政府号召的'三自'组织，势必得不到政府所许诺、保证的、合法的'宗教信仰自由'，因而导致教会大遭逼迫。教会要取得'合法'地位和宗教自由，就非走'三自'道路不可。因此，这几万个签名，一下子性质全变了。由原先的申请免除土改，一下子变成决心参加'三自'。然而倪弟兄（或许连长老也在内）作了这事，却没有向众弟兄姊妹公开宣布。大家都蒙在鼓里，教会照常聚会、传信息。信息的着重点，是《教会的正统》一书的内容。信息暗示着：只有(我们)地方教会才是'正统的教会'；才是'非拉铁非'教会，才是神所说的教会。的确，吸引了别的各教会不少人甚至是传道人，毅然退出了原先的公会等的教会，参加了'地方教会'即南阳路聚会处聚会。"

1951年4月，朝鲜战争爆发不久，倪柝声接受邀请去北京参加政府召开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他"拟了一个通知，是由北京协和印刷局承印的，通知聚会处的信徒都要拥护三自会"。那时中共正在进行三大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同时在基督教内开展三自爱国运动和控诉运动。原来主要由西方差会资助的各大公会，在政治形势变化并失去经济来源以后，信徒人数严重流失，很快都"认清形势"，"与帝国主义划清了界限"，积极主动在政治上靠拢新政府，并在传福音方面采取低调。而由中国信徒自己创立的几个基督徒团体，如耶稣家庭、真耶稣教会和地方教会，认为自己早就实行了"三自"原则，因此基本未受政局影响，继续大传福音，大讲属灵生命之道，在1949年—1951年间的短时期内继续迅速扩展，甚至达到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不过，不久以后，这几个基督徒团体就在1950年代的几次政治运动中成为受打击的主要对象。

1952年4月10日，（三反五反运动中）倪柝声在东北被秘密逮捕关押。直到4年后的1956年（肃反运动中），才与在那一年1月29日被捕的同工汪佩真、李渊如、张愚之、蓝志一等人一同在上海，被作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公开控诉。

倪柝声被控诉、判刑之后不久，中国大陆基督教于1958年实行联合礼拜。上海教会使用不到10年的南阳路聚会所也被迫"献给"国家，后来改为静安体育馆。

倪被判刑15年，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以后一直没有出狱。
1972年5月30日，倪柝声在安徽省广德县白茅岭监狱（属于上海市管理）逝世。

+++++++++++++++++++++++++++

（以下引述网文）

https://congfang.com/2826/

转载：唐崇荣 – 倪柝声的错误

110、在追求知识论的中间，灵性站在什么地位？ （出处：【唐崇荣文集】问题解答圣经．神学．护教）
很简单就是这个地位。当你的知识归向真理时候，那就是灵性。所以，你不可以说，属灵人不管知识的事情。不是的。属灵人先把知识向着真理。照柏拉图的思想，你能用理性来控制你的情感，再用情感控制意志，这是他人论的三分法。而意志在那里，在其中，最重要是性的行为，这是柏拉图的哲学。所以性和意志的行动被感情控制着，感情再被理性控制。这样，你就是个哲人。
基督教的真理超过此太多了。基督教的真理是：你的整个行动是由你的心思发出来。而心思是由观念发出来，你的理性要顺服神。所以当圣灵的启示真理管治了你的理性的时候，理性再管治情感、意志，你整个行为都在神当中。所以属灵的人，不是属人里面的那个灵，有人把人分成身体、

灵、魂，那么也有人属灵人、属魂人、属体人。早在 Gnosticism（诺斯底主义）就把人分成属灵人、属魂人、属体人。根据他们的哲学，谁是属体的人呢？就是犹太人，那是一定死、一定灭亡的；属魂的人是谁呢？是基督徒，所以其中有一些大概能得救，有些大概不能得救；属灵的人一定得救，那是谁呢？就是属他们那一派的人。这真胡说八道。

今天中国人里面也有这种看法。特别是在《属灵的人》那本书就是这样分得清清楚楚，把理智、情感完全放在魂里面，这是完全没有圣经根据的，你们要非常小心。如果你的理性能归向真理，你就是属灵人。属灵人不是只属你生命中那个灵，属灵乃表示是你整个人的理智、情感都完全被圣灵所管理、支配、引导。

67、有人说灵魂是不可分的，有人说灵与魂是有分别的，到底那一方讲得对？到底有没有灵？ （出处：圣经·神学·护教 ）

「气」这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生魂」或者「一个整个的人」，到了希腊文的时候「灵」(pneuma) 与「魂」(psyches) 则是两个不同的字。圣经提到灵魂体得蒙保守，似乎是有三个部份，有一些人就大作文章，发挥成三重组合的人论，变成三元论。另外一种说灵魂是看不见的部分，而身体是看得见的部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另有人认为灵魂应该是分开的，意思是动物有魂没有灵，人类有魂也有灵，所以有身体有魂的动物，而有身体有魂又有灵的叫「人」，这样的说法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呢？他们就引用一些好象是圣经，其实是希腊的思想来解决这个问题，包括倪柝声这个《属灵人》也犯上这个大错误。

在整个地方教会及倪柝声的思想中，他们把理智情感意志归人「魂」。我请问哪一个人可以找到一节圣经来证明这个是上帝的启示？没有一节圣经支持这样的神学理论。说理智、情感、意志在“魂”里面的、灵与魂不一样，完全不是圣经的教训。上帝是个灵，上帝有没有理智、情感、意志？上帝有魂吗？如果理智、情感、意志是在魂里面的话，那么上帝是灵，上帝只有灵的功用，有没有理智、情感、意志？上帝不但有理智、情感、意

志，他的意志是决定他的旨意的。神的旨意出于他的意志、神的爱从他的感情出来的、神的启示的真理从他的理智出来的，所以神是理智的源头、是感情的源头、是意志的源头。神不是魂，是灵。

有人说：「上帝的道如同两刃的利剑，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剖开来」。有些人专讲这篇道理，讲得头头是道，我听了觉得是胡说八道，听道怎么会听到灵与魂是分开呢，上帝的道使你的灵与魂分开？使你的骨节与骨髓都脱掉？其实那节圣经是指上帝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根本不可能的事也会发生，而不是真正发生骨节与骨髓分开的事情。

还有人不赞成上述的三元论，他们提出另外的看法．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这样分成四部分，人有身体、有性、有心、还有意；人意、人性、人心、人体。

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身体，那是物质的一部份，再吹进灵气，是看不见的另一部份，看不见的部份叫灵魂，看得见的部份叫身体，在活的时候是一元，在死的时候是分开的，所谓「灵魂离开他了」，「没有灵魂的身体是死的」。

倪柝声有一个理沦：他说上帝没有造魂；上帝造了身体，再加上灵。当灵与身体一接触时就产生魂，当灵一离开身体时，魂就消灭掉了。他比喻说好象电灯：电灯是一盏灯，当电与灯一接触时，就产生了光，当电一离开时，光就不见了，那个光就是魂。这不是圣经的意思。

13、请问，你对“聚会所”或者说倪柝声弟兄所产生的“聚会所运动”有什么看法？ （出处：唐崇荣神学讲座 – 圣灵与福音【四】）

倪柝声是头脑精明、思想丰富、分析力很强，是中国教会里面很难得的一个教会领袖、传道人，是神在他的时代兴起的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记号。一九00年，中国受了义和团的影响，所以内地会在华北发动了愿意为主殉道的签名运动，有八千多人签名愿意为主死、来为耶稣基督作见证，这是个很大的运动，不久以后我们就看到了义和团在庚子年间真的把很多的基督徒杀死了，很多的传道人被杀。

你知道吗？赵中辉牧师讲一句话很感动我，他说：“那一年一大堆神的仆人被杀，第二年神就在中国生出更有能力的大仆人，表示神是历史的主宰。”你杀掉那一批，我就生出更伟大的一批来。所以王明道（1900)、计志文(1901)。宋尚节（1902)、倪柝声（1903）都在庚子年那两三年相继出世，表示神是历史的主宰，很少人看到这一点。赵中辉牧师相信神在历史中的主权，他从那个正统的神学思想发挥看到中国历史——你杀，神就让更大的生出来。所以两三年里面，这里生一个，那里生一个，而且很多是生在非基督徒家庭的，你看上帝奇妙不奇妙呢？

计志文牧师就在上海最反对基督教的地区生出来，上帝从那里叫一个人出来，叫他到全世界去作华人的传道人，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宣教士开汽车到计志文的故乡去讲道，讲完了「耶稣爱你」，然后就把图画挂出来了，讲讲……讲完了以后，回头一看，四个轮胎漏气了，虽然打气打个半死，下个礼拜还是再来，回去轮胎又要再打气，就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上帝叫计志文信耶稣。而聚会所的倪柝声也是同一辈的，倪柝声的才干很大，他的影响很大我们不能否认。但是他写的《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这名称本身就是错的，却卖了一百多万本。今天很多传道人出书能卖三千本已经很不错了．他卖了一百多万本！他的听众不算很多，但是他印的书多得不得了。我们有时候，「唉呀！我讲道只有几个人来。」不要紧的，如果你的道真的有份量，可能两百年以后人家还在注意听你的录音带，不要只注意跟前的。

但是倪柝声虽然很聪明，他花了很大的心血去分析圣经、研究圣经，却缺乏正统神学的训练，以至于他没有办法除掉许多错误的解经原则。所以你如果认为倪柝声既然是神的仆人，他讲的就都是对的，你就上当了，因为他也不过是一个人。例如他说：「使徒每时每代都有！」「先知每时每代都有！」这也是错的，因为这样表示圣经还没有结束，可能继续有其它的

启示加入。所以我们应当慎思明辨，像昨天我讲的，奥古斯丁说：「你不要跟我，你要跟着圣经走，每一个人都有错的可能。」

倪柝声还有一个思想很不对的，他说什么呢？ 「上帝赐下律法就是要人去犯罪！」(倪柝声全集，卷二，第一部，第四章，第六部分："神叫我们犯律法" 链接）哇！这句话是很严重很严重的，是得罪上帝的事情，因为他把上帝赐下律法的动机都曲解了，「你犯了罪才知道你是没有办法行善的，你是需要救赎的」 。这句话的后面一半是对的，前面一半却已经干犯了神论的正统性。所以我们每一个传道人都要很清楚的知道，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有弱点。我把聚会所的毛病归纳成两句话：他们讲的道理有绝对的口气，而绝对口气中间常常讲的是非绝对的事情。像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教会！叫做「地方教会」。真的吗？他说是真的！但是到被考验的时候，他们就站不住脚。在福州有他的教会，也有王载的教会，有两个教会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

中国教会的危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教会面临一个大灾祸——理性是魂、感情是魂、意志是魂、我们要属灵不要属魂！所以你们用思想的都是魂！自从那个大灾祸来了以后，知识份子离开教会，教会充满一大堆傻瓜，越属灵的人越反知识、越属灵的人越反文化，越不站在领导文化的地步。

五四运动以前，基督教是站在文化的前锋，五四运动以前基督教是最先提出把世界最伟大的书、天下的大经翻成白话文的，不必等胡适来大喊用白话文来建立我们的文化，基督教早就走了这条路。最先把西方的科学、伟大的逻辑、伟大的思想架构、民主等带到东方来的，也是基督教。自从

"不要属魂、要属灵"，后来就"零"了！请你们思想：谁说理智、情感、意志是属于魂的，让他找出一节圣经来支持，而这个思想在倪柝声的运动中是很重要的，倪柝声被认为是领受上帝特别启示的，但在这一方面完全没有圣经根据。这方面使中国基督教在领导文化、影响知识份子的这一重大课题中间，落后了几十年。使人归回信仰，使人归回理性，这是动性的灵性，当你的理性归回真理的时候，你就表现了信仰，当你对主说：主啊！我把我的理性，放在你的真理的下面的时候，你就有了信仰。

聚会所传讲的教义是否有偏差？聚会所的教徒是否得救？ （出处：神与人之间-问题解答(5)）

聚会所中得救的人数，可能比一般教会的多。但是聚会所仍有其偏差，这是追求属灵与合一的副作用——造成信徒自以为义，排他性，不能与一般教会合一。他们把相对的追求之道，当作绝对的，用在批判其他教会。若仅止于相对性的偏差，并无多大妨碍，我们仍可视他们为主内弟兄姊妹。严重的是绝对的偏差。例如李常受等人，认为耶稣是被造的——这是异端，我们不能苟同。

十三、依我个人的经验，思想的操练使我心里明亮更认识他，因此，加添对上帝的渴慕，而亲近主的操练可以培养你曾提过的「属灵的看见」产生事奉行动的信心，不靠理由的信心，与以后所听的道相调和。然而由于前者操练思想上对神的认识，后者操练不靠思想的认识，两种操练会互相抵触吗？或者两种的偏重是因人而异？你的教会教导「亲近主」的操练吗？（出处：希伯来书31讲）

我相信你是受了聚会所的影响。所以聚会所曾经有一句话「盖恩夫人的属灵经验超过了使徒们。」这是亵渎，这句话不可以讲。只有使徒们是耶稣亲自呼召，亲自教导，亲自启示写下圣经，怎么可以把一个法国人，跟亲自领受写做圣经的使徒相比的时候认为那个法国人比使徒彼得、保罗更亲近耶稣？这是很错误的看法。这是一种叫作 Radical Reformation，这个叫作「极端改教运动」，或者是一种 Inner Light 的 Movement 就是「内

里的光」。人以为与神亲近到一个地步，他自己得到的光是直接从神而来的。那么，就像保罗一样「我直接领受的，不是从人来，是从基督而来」（参：加拉太书 1章12节）。倪柝声就犯上这个大毛病，他以为所得的启示是从神直接来的。那很多人跟倪柝声走就以为他们自己就可以直接从神领受，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你对圣经当然不会尊重到那个地步了。所以到最后倪柝声不到第二代，李常受的偏差就偏邪到那个地步。为什么呢？因为人既然可以直接领受，那「直接的」，我就和保罗同等了，我和彼得同等了。既然同等，我得到的你也要听我，因为这是上帝的道嘛！我如果听保罗的道，又你听的道，你们两个相矛盾我走哪里？我当然听保罗，不会听你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说「盖恩夫人超过他们」，那怎么办呢？我可能听盖恩夫人的，那教会还有前途吗？所以使徒、先知是教会的根基，有基督耶稣为房角石，没有人可以超过。这个如果你没有争回这个原则，你一生一世掉在很大的坑里面，自己骗自己，而把整个教会放在很大的危机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我今天就解释到这个地方。

133、你所谈的启示神学，我有以下几个问题：对一个非全职而有心学习的信徒而言。应当怎样装备自己？请你给我和大家一些具体的建议。比较有那些途径或者领域？ （出处：圣经．神学．护教）

我盼望你们以“神本”与“启示的真理”作为整个知识论的架构，去判断、衡量，去定位其它所有的受造界、生理界、历史界、时空界里面结晶出来的知识总和。本着“神的道”高过“人的道”的眼光，去处理人间一切的知识，这是很重要的。当你领受知识的时候，就在理性与灵性之间作了一个关连：灵性的要理性化，使你真的了解什么是“意义”；而理性的应当灵性化，因为给人理性的上帝，也是给人灵性的上帝。这样，在你个人中间，不单外界的知识不会支离破碎的割裂，在你的性格里也不会支离破碎。

过去中国教会犯了一个很大的毛病：“凡是思想的东西都是属魂的，属灵的人就不要去想。”那如果这句话是对的，所有的猪都是属灵的，因为它都

不想；牛也是属灵的，因为它也不想。那么上帝造你的脑作什么？你思想些什么呢？圣经清楚说："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西 3:2)。"……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诗 1:2)。圣灵来了，不是要抹杀你的思想——"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 14:26)。看到没有？这个"思想功能"不能抹杀；思想功用不能独立的。但是思想功用绝对不能代替神；思想功用也不能绝对化，思想功用的终极目标就是伏在启示真理的圣灵与神的主权之下，这个叫作理性灵性化。这条路很稳当的，这条路很重要的，你真正走上这条路，你会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帮助，也可以成为许多属灵人的帮助。知识分子你给他灵性的供应；属灵人你给他理性的供应。

1970年我在台中解答《进化论》问题，解答完了，有一位弟兄对我说："这几年我一直祷告却不明白，你一讲，我明白了。"我一听，他大概是某一种体系，或者是某宗派出来的，因为他祷告时有那一派的记号显明出来(不是我证明，是他显明出来的)。他每次祷告，最后一句话特别重，我想如果他最后一句声音放小了，他会感觉能力少很多。其实复兴和圣灵的工作，不需要用某一种人为固定的形式，而是自然的流露。如果你今天学我讲道的方法，可能学得很像，但有点不自然，因为我是唐崇荣自然流露的讲道法，而你不是。毛病就在这里对不对？所以各人有各人表达的方式，要好好做你自己，追求神要怎样把你带回他自己荣耀里面的每个过程。

（引文结束）

+++++++++++++++++++++++++++++++

（以下引述网文）

http://bbs.jonahome.net/thread-79432-1-1.html

《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阅读感想及阅注说明

MYL 201812

感谢神！继2011年出版《难泯岁月》，许姐妹又花费数年时间，整理补充出版了《警钟长鸣》，使我们可以得知更多一些“不为人知”的信息，更多了解中国地方教会在不多几十年间（1928-1958年）“缘起、扩展与剧变”的历史。

《警钟长鸣》有五十多万字符；仔细地看过二遍，写入十几万字符“阅注”，花了约700多小时；2018年作者已有87岁高龄，得花费多少的时间与精力才完成此书，是可以想象的。

《警钟长鸣》的内容有根有据，一些是作者所亲身经历，一些是引自可考查的倪氏文集及相关历史资料，一些是亲历者、知情者所提供，书中所作的评议也是有理有节；作者在非地方教会团契几十年，许多“看见”与此也很有关系。

《警钟长鸣》的现实意义，是提醒现今地方教会的信徒，重新审视自己所遵循的倪氏神学是否与圣经的整全教导相一致，关注于倪氏教导中明显的、严重的错误对信徒之现在与将来的影响，这才是重要的、关乎信徒属灵生命的大事情！书中也对倪氏的私情作了一些披露，但这不该成为关注与纠结的重点；将来，每一个基督信徒都要在基督的台前作出自己的交待。

作者的写作心意是真诚的，也是焦虑、有负担的；为着地方教会的今天与明天，为着信徒的属灵生命，为着各人在基督台前的交账，“警钟长鸣”！愿神记念许姐妹的真诚付出，也深愿现今地方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对照圣经的全备教导，持守正确的，改正错误的，以坚固真实的盘石为根基，谨慎自守，行走在信仰的正道上，得神的认可与喜悦；愿神怜悯我们；阿们！

倪柝声（1903.11.4-1972.5.31）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为基督信仰“大发热心”；但“倪氏神学”中错误不少，后果很是严重！

1• “灵、魂、体”三元论。倪氏在24岁前“写就”了巨著《属灵人》（以后再没有改版过），将所谓的“人的魂”这一“元”极端化，又混淆、合并了人的灵与神的灵的本质差异，幻想用人的灵来替代神的灵；（李常受继承并发展了倪氏的这个理论，幻想“人的灵与神的灵成为一灵”，带领召会走了岔道；）倪氏教导“魂的破碎”、“治死魂生命”，圣经却是教导“灵魂soul（魂）的救恩”（彼前1:9）。（有人说，“二元论、三元论都有圣经的依据，但要警惕的是倪氏的极端三元论，灵高魂低，没有圣灵的地位”；对照英文版经文来看，和合本中的“灵、魂、灵魂”，有许多地方“spirit灵”与“soul魂”并不是相对应的。试问一个问题：人离世后，人的魂到哪里去了，魂与灵的关系又是如何？以后人复活后，人的魂还回到人的身体里吗？有圣经的依据吗？）

2• 权柄论（“神的代表权柄”）。倪氏的“权柄论”僭越了人的本分，冒犯神的主权，侵占神的荣耀！难道忘了“不可妄称神的名”？（出20:7；申5:11）难道忘了“神是忌邪的神”？

倪氏自认是“神的使徒”，是“神的代表权柄”，“从神接受启示”；李常受写过《倪柝声：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一书，竟然说倪氏是“现今神启示的先知”？！这些是真实的吗？神确认吗？若是假冒的，后果岂不很严重，以致担当不起？！

在新约时期，有了完备的圣经（神借着他的仆人们所写，真正是“神的话语”），有了圣灵的内住，教会信徒并不需要所谓的“神的代表权柄”，圣经与圣灵才真正是“神的代表权柄”！教会中的领头弟兄、牧师、长老，他们是神的仆人，也是众人的仆人，是位于众人的这一边，带领众人面向着神。（除非真的是神要某人“站在神的那一边，代表神行使权柄”！可能吗？）曾狂妄自大地说过“五个我要”的那一位及其结局（赛14:12-15），以及耶23:16、结13:2-3等经文，本该作为我们的警诫！

3• 教会论（时代论，一个地方一个教会）。时代论只是一种神学思想，并不是圣经的清晰教导。启示录中的七个教会，是当时真实存在着的七个实体教会；这七个教会从开始起就实际地存在着（横向的面的关系），并将延续长久的历史时期（主说，“直等到我来”（启2:25）；同时也有着其他的教会实际存在），怎么会成了“连续（或断续）的不同时期的教会形式”（纵向的线的关系）了呢？

倪氏于1928年（时24岁稍过）建立起上海地方教会，无视遍布世界的、延续一千九百年历史的众基督教会，自立一派，自搞一套，仿照圣经中所记载的初期教会的样式，走“安提阿教会的路线”；然而，倪氏在1948年复职后，又改走“耶路撒冷教会的路线”！难道神所启示的教会道路，会是今是昨非的吗？若是现今又有“另一个倪氏”起来，建立起新的教会体系，又想重走初期教会的路线，再一次号召“交出来”，（传福音）“打下全中国”，那又该如何呢？人类的历史、教会的历史，都一直在向前发展着，时过境迁，任何过往的历史都不适合作简单的重复；时代论者不是也以为，基督的教会有着“一个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吗？

倪氏以为“教会的方式”也是“教会的根基”，“宗派不是教会”，自筑围墙，自搞一套，“牢笼无知妇女”（提后3:5-7），切断了地方教会与世界的、历史的基督教会的联系，自说“脱离宗派，都是弟兄姐妹（即没有等级层次的分别）”，其实成了一个更封闭的宗派；在每个地方教会中，竟然有着所谓的“神的代表权柄”？！

从倪氏事工最后阶段所讲论的“我是怎样转过来的”、倪氏离世前留下的几封监狱书信，以及“黄渔深给倪氏的七封公开信”等一些信息，可以了解倪氏的内心思想与变化，以及上海地方教会当时的情形。

该到了全面审视倪氏神学，终止其中的错误教导，让地方教会中崇拜倪柝声的领头弟兄们从“神人”、“神的代表权柄”的宝座上走下来的时候了。耶稣基督才是教会唯一的头，在人与神之间再没有什么“别的头”。地方教会要破除围墙，脱离倪氏神学的束缚，走出自己的小天地，融入到“历世历代的全球性的基督教会”中，“在基督里合一”、“在基督的真道上合一”。整个人类历史的基督教会中全部蒙恩得救的基督信徒，都是同在“一个基督身

体”内的有机组成；历世历代的基督信徒在离世以后，都是在“同一个乐园（天堂）”里；神并没有为地方教会信徒造作一个“特别的小乐园”。

不要以为自己闭目塞耳，外面的世界、过往的历史就不存在了。
但愿早日悔改归正。警钟长鸣！
Aaron　　201812

“在我的改教之初，我就恳求上帝不要给我异梦、异象、天使，而是让我正确地理解他的话语-圣经，只要我有了上帝的话语，我就知道自己行在他的道路上，我就不会落到任何的错谬和错觉当中。 – 马丁路德。”

本人1962年5月生，2005年信主，加入聚会处；2006年受浸归主。
大约2010年起，对地方教会的一些“属灵教导”，对照圣经，参考历代神学，感觉总有点“不太对路”，对地方教会“敬虔四方面”（受浸、按手、蒙头、擘饼）也有些不同的看法，对擘饼聚会时“喝同一个杯”的方式多有疑问；后来，看到教堂门口换上了“某某基督徒聚会处”的招牌，也高挂了“我们无法改变过去，却能为未来儆醒-倪柝声”之名言；在与一些弟兄的沟通中得知，地方教会秉持倪氏的教导，几乎“只读圣经”，“领头弟兄”竟然是“神在教会中设立的权柄”、“神的代表权柄”！而顺服这“权柄”，竟然就是顺服神！甚感纠结与忧虑。因为对讲道信息的提纲词句等不时感到有些别扭，也放弃了曾参与几年的教会文字投影事工。
几年来，也陆续接收到关于倪氏及地方教会历史的一些负面信息资料，总是感觉到，地方教会是自立一派，自搞一套，许多信徒竟然对地方教会的历史毫无所知，对“世界的基督教、历史的基督教”也不作了解。
…
《警钟长鸣》原版五十一万多字符，写入“阅注”后共六十四万多字符，约

增加字符20%多；为方便阅看，按章数分成30多个文件。

回忆过去，并不是为定过去及某些人的罪，而是为了现在，更是为了将来。

（引文结束）

++++++++++++++++++++++++++++++++++++++

王明道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98%8E%E9%81%93

（以下选自维基百科相关文字）

王明道 （英文：Wang Mingdao； 拼音: Wàng Míngdào； 1900年7月25日-1991年7月28日），北京人，20世纪中国基督教自立教会的代表人物，主张基要派神学，重视圣经的教导和基督徒生活，反对自由派神学，斥责教会与世界中的种种罪恶。从1927年起，他自资发行《灵食季刊》共28年，发表很多有影响力的文章。从1933年起，他在北京建立并引领基督徒会堂共22年。因为反对三自教会，他在1955年被中国政府逮捕，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1980年被释，但从未被平反。1991年在上海因病去世。

生平

成长

王明道原籍不详，父亲名叫王子厚，壮年来到北京，在北京美以美会所办的同仁医院中帮忙，成为中国医士。母亲李文义。二人是基督徒，伦敦会会友。

1900年义和团事件爆发，外国人和很多的中国基督徒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内避难，王子厚夫妻也在其中，当时二人有一女儿，王夫人身怀王明道已经身重。王子厚恐惧被攻陷后会遭遇痛苦残杀，于6月22日自尽身亡。王夫人于7月25日在避难处生下一儿，名为“铁儿”。后来在入小学时起学名王永盛，1920年自己改名王明道。“就是表示我愿意神在真道不明的时代用我证明他的真道。”

王夫人带着姐弟二人艰难度日。少年王明道性格倔强，喜爱读书，学习优异，但“一直混混沌沌的过生活，没有信仰，没有目标，没有希望，没有轨道”。他从小被母亲带去礼拜堂，后来在教会学校读书，参加很多聚会，学习圣经课程，但对宗教活动不感兴趣，“看聚会是一件最令人头痛的事”。十四岁时，“开始明白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责任。开始恨恶一切的罪恶不义，羡慕圣洁良善的人生，对祷告和读经发生了兴趣”，自述“如同有人给我换了一颗心”，1914年复活节受洗，踌躇满志，立志要做政治家，“用功读书，热心信主，敦品励行，事事都是为要达到我将来做大政治家的目的”。

1918年王明道入协和大学（燕京大学前身之一）预科部，一年后预科部转到济南，王明道不愿离开相依为命的母亲，因而辍学，想要直接进入燕京大学本科部又未果，满腹雄心壮志的他极为抑郁。1919年到保定烈士田学校教书，看到改变人心的工作是多么的有价值，渐渐放弃自己做政治家的野心，决心为神做工。1920年改名王明道，以明心志。他在学校中工作颇有建树，深得学校看重，有望被学校所属的伦敦会送去读神学，还可能到英国去深造。但这个新的计划又被一件事打断。王明道以前受洗时是受的点水礼，就是洒一点水在头上，这期间他受一位同事启发，发现圣经中的洗礼是使用浸水礼的，就是全身浸入水中，他又回忆自己受洗时其实不明

白自己所宣读的使徒信经，因此他坚持要重新受浸礼。他因此与校方发生争执，校方希望他能留下但在受浸的事情上不肯让步，王明道心中很多挣扎，最后还是决定顺服上帝的命令，被校方开除，另外有五名学生也跟随他退学。第二日，1921年1月6日，他们在保定城外结著厚冰的护城河边沿河寻找，找到一处没有结冰的地方，六个人一起在冰水中接受浸礼。王明道理解校方有不愿教会受到“扰乱和纠纷”的苦衷，“对于长老会驱逐我出校的事，我一点不怪责他们”。这件事中王明道有年轻不成熟的地方，他关于浸礼的看法也未必是对圣经唯一正确的解释，但他看重圣经、顺服上帝的旨意、顽强不屈的秉性已经渐渐突显。

王明道回家以后，周围的人－包括母亲和姐姐－都不理解他，他非常痛苦。由于旁人的偏见，他找不到工作，从读中学起就凭奖学金经济自立的他现在要回来依靠母亲，这更使他非常难堪。他坚持自己受浸“并没有错”，但是也自觉“我的心热烈异常，我属灵的知识却十分缺乏，所以言谈举止都多有偏激的地方”。他从痛苦中醒悟过来，把要去英国读神学的雄心壮志也放下，认识到“最要紧的乃是用功夫去读圣经，并且要受上帝的训练和造就”，开始潜心研读圣经，领悟日多。他向上帝全然顺服，一边读圣经，一边在家中尽心竭力做琐碎的家务。他自述道：“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立志作大政治家。到二十岁决心顺服上帝要去传道的时候，我希望作大布道家。及至我在家中做了三四年辛苦的工作、被上帝完全征服了以后，我连做一个苦工头目的野心都没有了。感谢上帝，到了这个程度，他才开始把他的工作交给我。 ”

传道

王明道住在家中读圣经，渐渐地常有人来他那里谈道查经，1924年10月8日，他开始在家里设立查经聚会，第一次有三个人参加，这是他传道的开始。这时候他也开始写一些小册子印刷分赠，这是文字工作的开始。

开始几次他的查经班人很少，但他的讲道有力量，有信徒听他讲道很感动，便来帮助他组织聚会，1925年5月在别人家里开特别聚会，人数已超过一百人。他也渐渐接到邀请外出讲道，他的讲道越来越进步。他看重圣

经，但不止是讲解圣经的知识，而是从圣经的话语中激发人的信心，呼召人向神悔改，也注重讲到基督徒的生活。1921年的时候，他曾经一度想把家中除了圣经以外的书都烧掉，因为他认为除了圣经以外什么书都不必读。但后来慢慢领悟了，便提倡“读书，读事，读人”。从他的文章里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语言风格，他不用深奥的神学概念，语言准确、贴切、朴实、流畅、生动，贴近圣经，贴近生活。

王明道在讲道中看重圣经，对罪恶放胆斥责，对世界中的、教会中的种种丑恶，剖析得入木三分。他批评最多最猛烈的，是持自由神学立场的信徒，他称他们是不信派。他最认同圣经中的耶利米先知，认为神给自己交托了同样的使命，要做“坚城、铁柱、铜墙”，反对世界中的罪恶。有人说“王明道一讲道就骂人”。他本着神的话语放胆直言，每次讲道都准备只去一次，但还是有很多的教会请他多次去讲道。从1925-1948年，他每年平均有5个月在外地讲道。收到的邀请更多，大致每四处邀请中只能允诺一处。他走过全国28个省中的24省，在30多个不同的宗派中讲过道。

在1923-1925年，他与倪柝声、李渊如等有不少来往，对他是很大的鼓励，但后来地方教会的发展却与他的教会观产生了差异，双方保持比较疏远的关系。他对宋尚节一直非常敬重他的真诚与勇敢，其实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所谓惺惺相惜。

1927年，他开始自费出版《灵食季刊》，他的文章在中国基督徒中有很大影响，见下文分别讨论。

成家

1925年底他应刘德森牧师邀请去杭州带领聚会，弹琴的一位太太没能来，临时请刘牧师的女儿景文小姐代替。王明道看见景文小姐弹琴的风范，十分心仪，在11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父乎！如斯人可为予之终身伴侣系出于父意者，则祈父自己成就父之美旨于仆身。非然者，则祈父速除予出于一己之爱情。以父之旨意总无误，而予一己则多愚昧错误也。毕生大事，父乎，祈尔使我不至陷于失望及陷阱”。反复祷告之下便托人向其父母提

婚。因为当时刘小姐尚年轻，过了一年，长辈才允许两人订婚。

1928年8月8日，王明道在杭州与刘景文小姐结婚。结婚后，他母亲和姐姐把媳妇当外人，不愿意接纳，常常闹出很多纠纷，夫妻俩在家中竭力事奉，经受很多磨练。王太太当时年纪只有20岁，但性格开朗通达，受了许多委屈也从不诉苦，深信凡所遭遇的没有一样事不是经过慈爱的父神的允许，还时时排解王明道心中的烦忧。王明道说她不爱读书，不擅文学，还粗心大意，但她喜爱音乐、擅长钢琴、满怀爱心、凡事忍耐、心宽量大、料事中肯、有人生的智慧，王明道遇事就同她商量，称她为“参谋长”。当她见到王明道言语行为上有错误和过失的时候，她会当面替他纠正。因为她的规劝都很合理，王明道虽然当时觉得难堪但最后总是能接受，还很感谢她，所以又称她为“诤妻”。两人在小事上常常有很多摩擦，但大事上都很同心，两人从来都以诚相待、互相信任，铁与铁磨出刃来。王明道说，“说来也真稀奇，她确实有一些短处，但她所有的长处大多数都是我所没有的。神就藉着她教导我学习了许多功课。……她不是我从前理想中的妻子，但她是我今日最适宜的配偶”。

抗战时期

1937年－1945年抗日战争，王明道一直留在北京，排除时局的干扰，继续尽心竭力传道，也仍然外出传道。

1942年5月，北京若干教会共同成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后来随同日本人的用语改名“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王明道不愿意与世俗合流，与一些他认为是不信派的人联合，顶着极大的压力坚决不肯参加。10月10日，王明道被传与日本人文化局调查官武田熙谈话，他一路唱着“站起进攻为耶稣”去了，武田熙告诉他“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在15日就要正式成立，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希望你能出来领导一下。”王明道对他说，“武田先生，有两件事我愿意你知道：第一件是我个人除了我自己的教会以外绝不参加任何团体、任何组织；第二件是我所照顾的教会绝不与任何团体、任何组织联合。”王明道当时并略略述说了一些他的信仰、他的主张、他的使命，并他绝不参加教团的原因。王明道做好了被拘捕和教堂关门的

准备，所幸日本人后来也没有继续强迫他，反而表达了对他个人的钦佩。“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打着“自立、自养、自传”的名号，但亲日的嘴脸渐渐暴露，一部分不明白王明道为什么不参加教团的人也渐渐地同情他了。

抵制三自运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在2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解放军入城，军容极壮，军士皆健壮，服装步伐皆甚整齐。如此盛大之军旅，在国内实前所未见。”当时有不少基督徒对共产党心怀惧怕和怀疑，他在2月8日的一篇讲道中劝勉信徒“以不变应万变，处平常若处非常，处非常若处平常”。他虽然知道俄国革命后对基督教的迫害，但还是以政治中立的态度专心神的事工。1950年上半年他外出讲道的时候还没有任何的干涉，听道的的人也很多。1950年9月30日，他的前半生的自传《五十年来》出版问世，他写道：“写自述最要紧的事就是真实和全备。好事与坏事、长处与短处、优点与缺点、成功与失败、都必须毫无隐讳。”他这样做到了，这是中国教会史上的一份宝贵的财富。

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等40名基督徒联名发表“三自宣言”，争求全国各地基督徒签名。宣言称：“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中国的“三自爱国运动”从此正式开展。王明道对三自运动采取沉默的抵制，他认为三自会的神学基础是自由神学，就是他认为的不信派。

1951年，三自运动深入开展，“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成立，全国基督教界开始了以“镇压反革命”为目的的“控诉大会”，王明道主持的“北京基督徒会堂”却纹风不动，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王明道继续传讲神的话语，聚会的人数空前增多。王明道的正直不阿、与日本人斗争的名声远近皆知，基督徒会堂也是真真实实的自立教会，要打倒他是不容易的。这一时期政府对他的政策是容忍和等待，希望他改变态度。

政治的压力越来越大，王明道对三自教会的态度也越来越坚决，1954年9月30日，北京市宗教事务处邀请北京市还没有参加三自教会的11个基督教团体共100多人开会。政府试图做进一步的说服工作，王明道做了一个多小时慷慨激昂的发言，说明不能参加三自会的原因，他说："我完全不能参加三自会，因为三自会中有人连上帝都不相信，我怎么能跟他们在一起呢？"这是指现代派，王明道一向称他们为不信派，是他几十年来全力反对的。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要拉拢王明道等，会后跟他们说："你们既然跟他们不一样，可以不在一起学习。好不好你们另外成立一个学习组织，由政府派人来领导你们学习"。他们在基督徒会堂开了一次会，王镇牧师在总结发言中说："每个人参加学习，都是以他个人（即市民）的身份参加，不以传道人的身份参加"。这样他们就拒绝了在教会进行政治学习，使得他们与政府的矛盾表面化了。

1954年10月初（一说9月间），北京市掀起了一个控诉王明道的运动。控诉他不同情政府，言行与政府政策相违；不参加三自革新运动；讲章极端独立，用意不明，危害整体基督教运动。另外，日据时期，日本人在北京挨家挨户征铜，这也成了他的一个罪名："王明道给他们献铜，这说明他是亲日派、媚日派。"但很多的控诉大会上都有人站起来，为王明道说话，结果控诉会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1954年冬季，王明道在《灵食季刊》上发表文章《顺从人呢？顺从神呢？》，很好地概括了王明道对待三自运动的原则："第一，我们应当顺服神，第二，我们在不违背神的命令的范围内，也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权柄。但如果人的制度和权柄与神的命令相抵触，那样，我们便只有不顺从人，只顺从神了。""基督徒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一切在上有权柄的人。但基督徒在遵行神的旨意、与圣徒交通、在教会中与众圣徒一同事奉神、保守教会的圣洁、为主耶稣作见证、传扬救恩的福音、这些事上，却绝不能受任何人的干涉。我们为这些事不怕任何拦阻，不惜付任何代价，也不惜作任何牺牲。我们为这些事必须效法使徒的勇敢刚强。"

这段时间，他的影响力在扩大，从1954年夏到1955年春，全国各地不断有

教会和个人，因着王明道的见证，退出三自。就在这时候，三自教会仍然希望让他改变主意，1955年5月，三自运动开会的时候，派出6名高级代表拜访他，但都被他拒绝。

1955年6月，王明道在《灵食季刊》夏季刊发表文章《我们是为了信仰》，清晰明辨基要派神学和现代派神学的区别，继续坚定不移地反对现代派神学，并且重申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不是莫须有的政治问题，文章如此说："如果只是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来陷害人、恐吓人，就当小心神公义的审判。……无论别人怎样歪曲、怎样诬陷，我们是为了信仰！"7月11日，三自教会的官方刊物《天风》周刊发表了一篇争锋相对的社论《加强团结，明辨是非》，"如果抽去反帝爱国的共同基础，而就在新中国的'此时此地'挑起所谓'基要派'与'现代派'的争战，王明道先生到底是何用心呢？……不管是谁, 如果这样存心并见之于言行，那就是中国人民的罪人，教会的罪人，历史的罪人！他'应当小心神公义的审判'和广大信徒群众的斥责"。对他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北京重新开始对他的控诉大会，同情他的信徒有自杀的，有被捕的，有放弃信仰的，有反过来逼迫以前弟兄姐妹的。王明道继续各样日常的工作，但身上的压力非常大。8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XXX【按：王先生旧日好友】来访，劝予勿触人之怒，谓于今日反对神之时代仍证神之存在殊不当；又谓讲道只当讲人乐听者；又谓予不签名事非是；又谓一切为了政治。八时半妻入室与伊谈数语，伊怫然迳起，大怒而去，挽之不得。予殊不意伊之改变一致于是也。心中受刺激甚深，早餐不思食。....午餐不思食。....。今日予心中充满幽暗苦闷，甚至转为畏惧。十一时卧床不能睡，愈变愈劣。"王明道被捕的日子不远了。

入狱

1955年8月7日，星期日，王明道在基督徒会堂对坐了满堂满院的七八百人传讲主日信息《他们就是这样陷害耶稣》，严厉责备犹大和他的同伙。当日晚，王明道和妻子刘景文被捕，被控以反革命罪。滂沱大雨裂天而降，一直下到八日晚。

王明道做好了做牺牲的准备，但他在狱中却投降了。他是个肉体、性情上胆小的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压力下，他就向政府认了很多罪：包庇反革命、离间教徒与非教徒的关系、鼓励信徒与政府对立、破坏三反运动、破坏抗美援朝、破坏兵役法、对吴耀宗先生进行人身攻击、反对三自爱国运动、破坏新婚姻法、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这里面唯一有根据的是反对三自运动，这是他一进去就承认的，另外的都是牵强附会、无限上纲，甚至荒诞无稽，比如他讲过"基督徒不可离婚"，这就构成了"破坏新婚姻法"的罪。说这些违心的话，对于一个恪守"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的基督徒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他完全被打垮了。他写了一份材料《立功赎罪计划》，同意"出监以后，带领教会参加三自会"。各地的教会里有人因为他的失败而失败，但也有人因为他讲过的道仍然站立得住。(有一点澄清，王明道称自己在狱中"失败"，是因为他承认了三自教会，并且认了一些他认为是莫须有的罪，但显然他从来没有否认过自己对神的信仰。)

王明道后来总结自己失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一直相信共产党不会干涉人的信仰"，另一个是"因为我跟日本人战斗了八年都没有失败，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结果"一支手枪就把我吓糊涂了"。1985年，他在一篇勉词中勉励后辈："我一向对人说，'是就说是，非就说非；白就说白，黑就说黑。二者之间没有中立的余地。'……可是一九五五年，我就作了这样一件违反原则的事，因为惧怕的缘故，就把黑说成了白，结果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丑态百出。若是按着我自己的情形，我会一直失败下去，但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他大名的缘故，不容我这样长久失败下去，所以他使我在惨遭失败八年之后，又得到了胜利。战争完了吗？没有！只要我们还活在世界上，就必然还有战争。所以我们必须时刻谨慎，不能有半点疏忽。另外一节圣经也要记住：'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

1956年9月29日王明道被释放出来。出来以后极其痛苦，神思恍惚，拒绝与三自运动合作，离开基督徒会堂，以无声的方式与三自运动对抗。1958年4月29日王明道、刘景文夫妇又再次被捕入狱。这时候他仍然是失败的，被提审的时候他会把以前招供的谎话又说一遍，应许出去后与三自会合作，

但显然是心口不一，所以政府不放他。从1955年到1963年，他自己讲自己是“惨遭失败八年”。

1963年7月18日，王明道以反革命罪正式被判无期徒刑，刘景文被判十五年徒刑。这反而使他绝处逢生，灵性上得到极大的复兴，自此以后，宁肯死在监狱，也不说一句谎话。他承认除了“反对三自会”是真实的以外，自己以前的口供没有一样是真的。政府让他写材料交代思想，仍然希望他改变思想，他前前后后写了几千张纸，把他所说的谎言全部推翻了，甚至还多管闲事，给刘少奇、彭德怀鸣不平。政府对他就绝望了。在文革中间，他在监狱里面也被别的犯人批斗，吃了不少苦头。

出狱

1973年，刘景文刑期已满，但直到1977年才因白内障视力近乎失明被释放返家。1980年1月9日，因为国际压力的原因，王明道在入狱22年后被释放，但没有平反。因为没有平反，他不愿意出狱，政府只好用计将他骗出来。1983年以后，他视力也已经极弱，写字都很困难。他们夫妇后来有机会去美国就医治眼睛，王太太为了国内的基督徒的缘故坚持不肯去，她说“我们老了，不能再为圣徒【指基督徒】做什么了，但我们在国内可以陪陪圣徒一同受苦”。1984年以后他们在上海武康路家中引领主日崇拜，大概有四五十人，王先生讲道，王太太弹琴，一如二人初识之际，直到王先生辞世的日子。他们亦曾接待许多外来访客，包括1988年4月23日美国著名的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来看望他。他不隐瞒自己的失败，并且给人看见，一个人失败到那么一种地步，还能站起来。他也告诉来客，他在监狱里学到饶恕，以前有人出卖他，控诉他，抵挡他，他都本着基督的爱饶恕了他们。1990年4月，居住在加拿大的王长新夫妇来到王明道家里住了三周之久，请他谈论1950年后这40年的事，并且做了录音，写成《又四十年》，成为王明道和中国教会研究的珍贵资料。

这么多年来，王太太刘景文女士一直站立得稳，不讲违心的话，与王明道同患难，无怨无悔。王明道出狱以后设法写材料为自己申冤，王太太对他说“你撒过谎， 那是你的失败。你要讲理，也许是你更大的失败，你必须从

这个失败里出来。你说你冤枉，我冤枉不冤枉啊？你去坐监，我也去坐监。我干了什么啦，要坐十五年监，再加上四年刑满劳动，一共十九年？没有什么可怨的，一切都是天父许可的。天父许可的，一定与我们有益。今天我们不明白，将来一定会明白。我觉得那没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得冤枉。”王太太劝他的时候，他觉得很好，但事过以后，又回到原来的想法上去。王太太就不再多说，只为他祷告了。

去世

1991年7月28日，王明道先生在家中主日崇拜时溘然长逝，享年91岁。王明道先生去世后，刘景文女士曾对亲人说过：她一生的任务就是服侍王明道先生，现在任务完成，也就很快要去主那里了。翌年4月18日，与他相濡以沫一生的“诤妻”刘景文女士也因病去世（在病时昏迷中说的话，仍是某人事的如何、某某人的事怎样，一心挂念他人）。两位合葬于苏州郊外“东山华侨公墓”，碑文曰“王明道、刘景文暂息之所”。碑文“暂息之所”是借用44年前他为自己母亲拟的碑文，那时他在纪念母亲的文章中谈到自己将来去世的事这样讲：

当我见主的那日，我便永远不再流泪，因为经上明明记着那时候的情形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廿一：4）

灵食季刊

1925年，由于南京《灵光报》拒绝刊登王明道的投稿，因此他自资于1927年春季开始出版《灵食季刊》，每年春夏秋冬四期。该刊内容主要是讲述圣经中的要道，基督徒生活以及护教等问题。发行遍布及全中国，每期刊印量二千本，每期约三万字，此后发行量和内容量一直比较稳定。该刊不收投稿，除了个别例外绝大多数是王明道自己的文章。文章内容有很多是反对自由神学的，例如〈现代教会的危险〉(1932年)、〈重生教义〉(1933年)，

1939年，日本侵华期间，日军要求王明道在《灵食季刊》上刊登四条标语，并将刊物交由日军检查。王明道拒绝刊登标语，所幸《灵食季刊》未

被停刊。
1950年以后，《灵食季刊》继续出版，发表在新中国下生活的见证，并在文章中与当时的三自爱国运动领袖如吴耀宗、崔宪祥、丁光训等进行辩论，发表过《真理呢，毒素呢？》、《我们是为了信仰》等著名文章，很多的信徒受到影响退出三自教会。
1955年夏季刊是《灵食季刊》的最后一期，王明道在上面发表文章《我们是为了信仰》，继续坚定明确地反对现代派神学和三自教会，1955年8月7日，王明道被捕，《灵食季刊》从此停刊，自创办以来总共发行114期。
自1928年起，王明道开始把《灵食季刊》里比较重要的题目选出来，印成单行本，到1948年止总共有三十多种。

著作
《灵食季刊》
《现代教会的危险》(1932)
《重生教义》(1933)
《真理呢，毒素呢？》(1954)
《顺从人呢？顺从神呢？》(1954)
《我们是为了信仰》(1955)
《五十年来》
《又四十年》
王明道文库精选
王明道文集
王明道日记选辑
《王明道讲道集》

++

（以下引述网文）

http://www.wellsofgrace.com/resources/biography/wmd.htm

一代神仆 - 王明道先生

王明道 （1900年7月25日-1991年7月28日），北京人， 十四岁时重生成为基督徒；十五岁时立志当政治家，及至属灵生命日渐成长，他又期望成为传道人。1920年，他顺服神的旨意，放弃从政的意念，竭力追求真理的上帝；因此，他特别取名「明道」，意谓「明证真道」。在他一生的经历中，足可见证他名符其实。 中国基要派神学的代表人物。

1900年7月25日，王永盛（王明道）出生在已经被义和团围攻了一个多月的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内(那里躲避了几千名前来避难的中国基督徒)。王明道出生前不久父亲王子厚在避难期间去世。庚子之乱结束以后，其母带着姐弟三人艰难度日。王明道幼年娇纵任性，但性喜读书。1918年入协和大学，一年后因校际争执而辍学。1919年到保定烈士田学校教书。1920年改名王明道。

1921年，王明道因受浸被迫离校回家。1924年开始家庭查经班。此后直到1949年，20多年间，每年有半年时间到外地讲道。

王明道嫉恶如仇，放胆直言。他最认同耶利米先知因为(根据圣经《耶利米书》记载，耶利米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斥责罪恶，也同时攻击那些假先知。王明道攻击最多最猛烈的，是持自由神学立场的信徒。

他很注重信徒圣洁的生活，而且除了读圣经以外，也应该“读书，读事，读人”，意思就是也要读一般的书，在一般知识要丰富，然后要“读事情”，对发生的事情认真地去“读”。然后要“读人”，就是对一些人的生平事迹，榜样鉴戒，要去读他们。那些过去管理，治理我们的，要留心看他们的榜样，这些是王明道所强调的。

1933年2月19日，王明道借隆福寺社交堂开始设立聚会，4月23日迁至炒面胡同，1935年定名基督徒会堂，到1937年8月1日，才正式在史家胡同42、43号建成的基督徒会堂聚会。

他在教会路线上强调，“教会是重生的团契，所以要生命改变的人，才可以行浸礼”。

王明道认为教会要尽量地简朴，因此他的聚会没有诗班，没有牧师，不搞募捐，不传奉献袋。也不庆祝圣诞节，他认为庆祝圣诞节是没有意义的。不随便请外人来讲道，不参加社会关怀，不参加教会的合一运动。

他主张政教分离，无论是日本统治时代，或者1950年代，三自运动在发展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妥协或加入。1942年10月10日，他正式拒绝参加“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因此他也受很多恐吓跟灾难。

王明道在教会发展上没有很多拓展，他在北京史家胡同的基督徒会堂规模始终不大，受浸的人不多。

他早在1952年控诉大会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控诉他了。

1955年8月7日，在肃反运动中，王明道和妻子刘景文第一次以‘反革命份子’罪名被捕，史家胡同42 、43号的‘基督徒会堂’也遭充。

一年后，王明道在监狱里写悔过书，被释放出来（1956年9月29日）。

出来以后极其痛苦，再次声明反对三自运动，1958年4月29日王明道夫妇又再次被捕入狱，王明道后来被判无期徒刑，刘景文被判十五年徒刑。

1973年，刘景文刑期已满，但直到1977年才被释放返家。1980年1月9日，王明道在入狱22年后被释放，住到上海长子王天铎住所。直到1991年7月28日91岁时去世。

王明道的《五十年来》是他前半生的自传，而这本《又四十年》是王长新弟兄耗费数年心血，将王明道后半生的四十年经历一一述诸笔端。本书内容大部分取材于王明道本人的口述，因作者曾于1990年到上海访问他，并与他同住三周之久，天天听他的讲述，共录了二十盘录音带，作为本书写作的主要依据；因此，本书的真确性应该是毋庸置疑。

从《又四十年》中的记述，王明道的后半生约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从五十岁到五十五岁被捕入狱前，这五年是他得胜的时期。他坚持不加入三自会，并经常撰文驳斥他们为「不信派」，并用圣经真理来宣讲福音和建立教会；在在展现他是一位真理的勇士，威武不屈。

（二）从被捕到判处无期徒刑，共有八年，是他失败的时期。因他的害怕而陷入说谎的罪恶中，连自己都无法想象；他在如此困境中依然呼求神的帮助，至终神为他开路，给他领受神话语的应许。

（三）从神的话语临到他一直至安息主怀，共廿八年，是他复兴的时期。过往他曾得罪了神，因为他愿意诚心悔改，向神认罪，因而灵命得以

大大的复兴。累积这数十年的人生阅历，他晚年的信息重点就是，要多多认识神、倚靠神和等候神；这是王明道先生给我们最重要的训诲！

王明道先生一生忠心于主的真理，在动荡的中国作时代的先知，传讲福音真理、坚守教会立场、正确解明神的道，实在是中国基督徒的榜样。他的软弱与刚强、受苦与复兴，充分见证神的大能作为。

毋怪乎内地会宣教士赖恩融（Leslie T. Lyall）将王明道先生称为「中国教会三巨人」之一，王明道在中国基督教教会历史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引文结束）

++++++++++++++++++++++++++++++++

（以下引述网文）

https://www.cclifefl.org/View/Article/1159

追思王明道先生和夫人

2016/8/2 13:58:17

读者:10434

边云波口述 恩雨整理

生命季刊 第54期 2010年6月

序言

一直以来，很想写一篇文章追思王明道先生和王太太。因为他们二位影响我最大，帮助我最多，也是我最尊敬的人。

王明道先生的事迹虽然已经记载在许多书籍中，但是这些书却很少提到他们二位带给我们这些受教者的感动，及对我们一生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还应当有一本我们这一代弟兄姊妹们共同的感恩集。

王先生是1900年出生的，1991年去世。我个人认为，王先生和王太太是神赐给中国教会的二十世纪的见证人。当然，他们不是完全人，也有软弱走弯路的时候，但他们对中国教会的影响的确很大。所以我觉得有好些事应当记述一下，让年轻的弟兄姊妹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神的作为。

现在，当年在王先生王太太跟前受教的"年轻人"都已经80多岁，所以这件事不能再耽搁了，我这篇小文算是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记述、追思王先生和王太太。

一、我们的"叔叔"和"婶"

我们这一代人在年轻的时候都称呼王先生为"叔叔"，称呼王太太为"婶"，关系非常亲切。他们叫我们也是直呼名字，例如：叫王长新兄就直呼长新，叫我就是云波，对一些特别亲近的姊妹们就称呼某姑娘，在主里真是一家人一样。

我第一次见到王先生，是在1947年第一届北京基督徒学生夏令会（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包括大学生和中学生），王明道先生是这次夏令会的讲员。

王先生在台上讲道时，大声疾呼痛斥罪恶，态度非常严肃，甚至严厉，有属灵的权柄，让人敬畏。但王先生在台下跟人接触却和蔼可亲。我们聚会的会场旁边有片湖水，散会以后大家都去那里游泳。有一次我在院子里遇到王先生，他带着泳衣，给我打招呼说："游水去"，那满面的笑容一直深印在我脑海之中。

那次聚会的场所门窗简陋，所以餐厅里满是苍蝇，王太太就拿着蝇拍到处

打苍蝇。我看到心里很惊讶，暗想这么一位“有名”传道人的师母竟做这样的工作。

大家在会场的餐厅吃饭，规定是一定要带自己的名条（类似现在写上名字的绸条）才能进去，一个刚上初中的小姊妹在门口作监督。有一次大家正吃午饭，忽然听见王先生的声音：“大家稍微静一静，我给大家说件事。”食堂本来很喧闹，此时立刻静了下来。王先生接着说：“我刚才没有按着规定带名条进饭厅，这个小姊妹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当时我很气愤，我想岂有此理，我是这里的讲员，人人都知道我叫王明道，绝对不会是假的。但是没办法，她管门啊，她不让我进我也不好硬进。我回宿舍的时候还很生气，但别上名条后我想到，这个小姊妹是很认真很负责的，她并不认为我是个讲员，大家都认识，就通融过去。我觉得小姊妹这一点非常可贵，所以我的心情起了很大的变化。我在这里送她一本书，作为我对这个小姊妹的奖励。”

王先生将一个真实的自己袒露敞开在我们面前，当时大家都很受感动。从那以后，我每天晚上都为王先生祷告，直到我1948年去边疆传道。1953年我回到北方，蒙神的恩惠常和王先生一家同吃同住，学习事奉。1954年甚至连续住了半年多。对王先生就有了更直接深入的认识。

那时王先生夫妇就住在北京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的院子里。一进院子就是一排小房子，五六平方米的小客厅居中，客厅旁边一边是厨房和餐厅，另一边是王太太的卧室和王先生的书房兼卧室。记得我第一次拜访王先生，告辞离开的时候，王先生一直把我送到院子大门口，我很不好意思，但怎么请他回去他都不肯回去，一直到我走出门外才向我挥手说：再见，再见。神的老仆人对晚辈如此谦卑，这对我是无形的教导。直到现在，我送客人也一定要送到门口，不这样就觉得不够礼貌似的。

1954年的一天，我看到会堂公用的厕所太脏了。打扫厕所本来是看守大门的冯起的责任，可是我觉得不便招呼他来清扫厕所，就自己用水冲刷打扫。那时候厕所就是一个洋灰（水泥）作的长方形的坑。我冲着冲着，没想到王先生进来了，他微笑着说：“云波，你在打扫厕所啊。”他的语气带

着称赞的意思。他的看法就是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他很少当面称赞人，这对我实在是个鼓励，也让我一生学习去记念别人在主面前所作的工作，别人在神面前的一颗心。弟兄姊妹对自己的爱心，自己总要记着，要想着这些人的优点长处，这也是我在王先生那里所受到的一个教导。

王先生对弟兄姊妹要求很严，但又十分体恤爱护。我曾经把我的一些经历告诉王先生，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让我经历那么一种处境、那么一段道路，好像是比死荫的幽谷还要艰难。我说得很伤痛，王先生就带着我到大礼拜堂后面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心里仍旧很难过，一直默默流泪，甚至到吃午饭的时候，心绪还没有平复，根本吃不下去。王太太那天做的是炸对虾，王先生看到我食不下咽的样子，就亲自动手拿筷子夹了一个大虾放在我的碗里，说："云波，吃，吃饭。"当时，王太太和他们的同工迟姑姑(迟荷净女士)都很惊讶，因为王先生吃饭很少给别人添菜。我心里很受感动，那一天我实在无法拒绝王先生慈父般的爱，拌着眼泪把饭吃下去。

那时我主要是帮王先生做一些《灵食季刊》的工作，实际上我帮不了他什么忙，只不过是找一些神学资料，或者划出《天风》上一些荒谬的言论请他过目。王先生在文字上很严格，一丝不苟，所有的资料都要校对，文章排版后都要三校四校。

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说话也比较急，常责怪人，但责怪以后还是照常以爱心相待。王先生对宋尚节博士原来有些看法，觉得他讲道的时候，台上台下到处乱走，而且灵意解经到让人不可思议。王先生说：宋博士解释"彼得"时曾说，彼就是他，得就是贪得无厌的得，彼得这个人就是贪得。王先生觉得怎么能够这样解释呢，宋尚节是留美的博士，他不知道彼得是Peter的音译吗？所以起初他对宋博士的印象很不好。后来王先生与宋博士接触多了，对他的印象就完全转变了，他觉得宋博士很真诚，在神面前有一颗孩子一样单纯火热的心，讲道时大声疾呼，好像把自己忘了似的，并且每次讲道前都要付上很大的祷告代价，所以工作也看到果效。王先生后来与宋博士交往很深，甚至可以无话不谈，但指出宋博士的错误时，还是非常

严肃的。

抗战中期，宋博士在北京香山养病，王先生夫妇二人去看他。谈起话来，王先生说："听说客人从很远的地方来看你，你连送都不送？"

宋博士说："是啊，我没有必要送啊，看我的人如果是因为神的缘故来看我，自然有神来报答他，我何必送他呢？要是为了人情的缘故来看我，那我何必花时间还这个人情呢？"

王先生说："你这个想法不对，基督徒处世应当有基督徒的礼貌和常识。"于是就送给他一本自己写的书，叫《基督徒处世常识》。后来王先生王太太再去看宋博士，临走时宋博士就非送不可。王太太说："你病得这么重就不要送了。"宋博士一定要送，并且用福建口音说："取西墙西、取西墙西。（处世常识、处世常识）"

倪柝声先生是1902年生人，比王先生小两岁，王先生起初把他当成一个弟弟来看待，两人很亲切。后来王先生听到一些人对倪先生有些议论，就规劝倪先生。王先生说那次倪先生一直看着他笑，不说是，也不说不是。王先生越讲话越多，直言相劝，后来倪先生说："已经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你在这儿吃午饭吧。"他有点不想再谈下去的意思，可王先生说："吃，在这儿吃饭，为什么不吃，借着吃饭的时候我多说几句。"

吃饭的时候倪先生仍然保持沉默，从那以后王先生对他有了距离，就没有那么多的来往了，甚至有些批评。可是我知道王太太一直劝王先生不要多有批评，有些事情即使要说，也到倪先生离世以后再说才好。

王先生把我当作自己的晚辈，常和我谈论他对一些人的看法。但是我却不记得王太太说过任何人不好。王先生批评人的时候她也总给别人打圆场，说人家有自己的难处和原因，要体谅人家。王先生有一个同工石天民先生，他家的院子里放着王先生的一些书，由于他的妻子精神不是很正常，王先生去那里取书很是不便，给石先生也带来一些困难。一天，王先生去他那里取书，石先生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有这样的难处，希望王先生体谅。王先生听了很不高兴，回来吃早饭的时候，当着我、王太太、还有迟姑姑的面说："天民根本不应该惯着他的妻子。他的妻子都是天民惯坏了

的。”
王太太就在旁边劝他说：“你这样说，太不体谅天民了。天民有他的难处。你不应该这样讲。”
王先生本来生着闷气，此时听到王太太还责备自己，有点着急，就说我不吃了，把筷子往旁边一放，回到自己的书房里去。那天是礼拜日早晨，我就劝王太太说：“一会儿叔叔还得讲道，你何必这会儿给他说这些话。”
王太太说：“因为他是当着同工们说的，我就得当着同工们纠正他。如果他和我个人说，那我过一些时间再说他也没关系。”
我说：“马上就要开始礼拜了，叔叔空着肚子怎么讲道？”王太太没有言语。我说：“我做碗鸡蛋汤给叔叔送去，就说是婶让我送去的，行不行？”
王太太依旧沉默，等于默许了。我就做了碗鸡蛋汤送给了王先生。我觉得这是我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唯一的一件满意的事。
王太太对王先生的帮助十分及时，虽然有时候像王先生说的，叫人下不来台，但王先生有失误的地方，王太太能立时弥补。王先生有时候语言过了头，让人难免受伤害，但是被王太太稍加解释这么一挽回，别人也就理解了王先生心直口快，他是本着向神忠心向人有爱心说的话。
王太太在家几乎是闲不住的，跟人说话的时候手里也在不停的织毛衣，她织的毛衣都是给弟兄姊妹的。有一次她看我穿的毛衣袖子磨破了（那时候我是用针线缝一缝，把破的地方连上），她就说这怎么行啊，你这不是越磨越破吗？现在正好天也暖了，你就把它脱了，拆掉，洗一洗，我添点毛线给你织个厚毛裤吧。我说那太好了，高兴得不得了。
我尊重王先生，但感觉王太太对我们更为亲切。我把她看成是属灵的母亲，我和妻子白耀轩姊妹就是由她印证而在1957年订婚成婚的。她对我严中有爱，爱中有严，任何事情和她谈都没有什么碍口的。自己的得胜、失败、软弱、刚强，心里的想法、服事主的某些经历，就常常愿意和她谈，比和王先生谈得更多。王太太对任何人都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对待，原则性中有很深的爱。那个时候公安部门为了国家安全，难免想要了解王先生的一些情况，而基督徒会堂的门房冯起弟兄原来是旧社会的警察，历史上

有污点，也可能会要求做些配合。王先生被捕前一两年，冯起的行动很可疑，说话吞吞吐吐的，经常一个人跑到礼拜堂里去弹琴，有时候从早晨一直弹到中午，这说明他内心里有争战。王太太是个很警觉的人，有一次她明明地问我："你听听，冯起弹琴弹了多长时间了？你觉得这个情况正常吗？"她有这个担心，但却从来没让冯起离开，对他还是满有爱心，好像亲人一样。

王太太很多时候自己忍着，尽可能不打搅王先生。有一次她坐在小客厅里默默地织毛衣，我走进来忽然看到她在流泪，我当时就楞住了，问："婶，你怎么了？"她把眼泪擦一擦，摇摇头，什么也不说。她不说我也不好多问，就陪着她坐在那儿。过了一会儿，我说："婶有为难的事，要不要我去跟叔叔说说。"她苦笑了笑，说："你听叔叔在干什么呢。"

我一听王先生在书房一边找书一边唱诗呢，他唱着"歌颂主尊名，荣耀主尊名"，唱得挺高兴。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作传道人难，作传道人的妻子更难。我个人觉得，王明道先生被神重重使用是因为神赐给他一个很好的妻子，没有王太太的帮助，就没有王先生的事奉，神配合他们两位，使用他们两位，实在有神美好的意思。

二、王先生的事奉

王先生、王太太的事奉，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尽人皆知的。但时过境迁，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太了解了，所以我在这里，再略略提一下。

我第一次听说王明道先生的事迹，是在1945年。1944年我19岁的时候在汉江边上重生得救，第二年从大学休学奉献传道，在陕西洋县帮助那边的学生团契。抗战胜利后终于可以和"沦陷区"通信了，那时就听说了王先生的见证。

抗战八年，王先生和王太太一直在北京牧养教会。那时日本人为了控制教会，按照自己国内的习惯建立了基督教联合会，后来改名为基督教团，将真信的、假信的都"联合"在一起聚会。二十年代，不信创世记、不信启示录、不讲救恩、只讲"道德"的现代派传入中国，对中国教会影响很大。王先生为真道竭力地争辩，与假信的人常常论争，抗日战争时期也是持守信

仰，不肯加入这个日本人控制的政教合一、泥沙俱下的“基督教联合会”。
日本人对此觉得如鲠在喉，非常恼怒，对王先生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但无论如何王先生都不肯参加，并且照常讲道。
终于有一天，日本人通知王先生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谈话”。那时被日本人找去“谈话”，很可能是一去不返，弟兄姊妹们担心挂念，“谈话”的头一天晚上，来到王先生家为他祷告。王先生勉励坚固弟兄姊妹向神忠心，但他心情也很沉重，和大家说：“现在北京几乎所有的传道人都加入到‘基督教联合会’里面去了，进去以后就陷入到苦害当中，陷入到政教合一的日本人的统辖当中，甚至苦痛得都不能自拔，也不能够出来。我若是再参加到这个组织里去，有谁为神作见证？这次去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我生性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让神的名得荣耀，大难临头的时候只有求主加添力量、保守自己了。”
王先生环顾自己的家室家人，又继续说：“我不是不爱自己的妻子，也不是不爱自己的儿子。我很难想象自己将来一去不复返的时候，他们母子俩怎么生活，会是怎样的光景。但神若是许可患难来到，那就只有求主分别地保守、看顾我们了，请大家继续地为我祷告，也为我全家祷告。”
这些话是我以前没有听见过的，我心里很受感动，于是我按着王先生那一夜的语意语气，写下了一首诗词，原名叫《古城夜语》，后来改称《忠仆心语》。诗词是：

1） 长夜已深白昼将近，主路坎坷何艰辛？
   伤心欲泪痛心欲碎，欲言无语心低沉！
2） 举目四望教会荒凉，何人肯学主榜样？
   我主在天耳闻目睹，心中怎能不悲伤？
3） 追想昔日我主在世，为救我等何所辞？
   十字架上血点滴滴，各各他山为我死！
4） 我父我神以利以利，身体灵魂交你手。
   福也苦也或活或死，至终坚贞不低头！
5） 环顾家室泫然泪溢，肉体何尝不战栗？

苦难临头求主加力，仰望十架志不移！

[副歌]

无故爱我无故救我，焉知不是为现在？

多少主仆陷入苦害，我不起来又何待？

后来这首诗经苏佐扬牧师谱曲，成为一首诗歌。1948年夏天王先生到南京学联会去讲道，我把这首诗带给他过目，请他审阅一下有没有不符事实的地方。王先生仔细看过以后说："大体是这样的。"

当年去见日本人的那天，王先生是带着衣服、洗漱用具，骑着自行车，唱着"基督精兵前进，齐向战场走"而去的。"谈话时"日本人施加压力，他仍坚持自守，这反而使日本人佩服他的气节，竟放他得胜而归了。

王先生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肯走在神的旨意以外。抗战前王先生已经创办了《灵食季刊》，这是一本在神的带领下所出的属灵刊物，每个季度出一期，其中文章绝大多数是王先生的讲章。这本杂志发行量相当大，南洋一带都有。日本攻陷北京后要求所有的出版物都要刊登四条歌颂"皇军"的政治标语，王先生决不愿在属灵杂志上刊登政治标语，想干脆停刊，但又犹豫，不知道停刊是否符合神的心意，是不是变相的向邪恶投降？于是他在神面前彻夜祷告，最后决定不登标语照样出刊。他是这样持守信仰的纯洁，"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教会决不能和政治连在一起。

1951年春天，"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进行了教会第一次的"控诉运动"，清除"美帝国主义毒素"，从中也产生了一个基督教的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两位领导人吴耀宗、刘良模都是"现代派"的信徒。吴耀宗在他的著作《黑暗与光明》中将他的信仰说得很清楚，他认为创世记是神话故事，全部圣经不是神所默示的，童贞女马利亚生子是美丽的寓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博爱的精神，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精神的不死，耶稣的再来就是将来世界大同人人向善，于是好像天国一样了。紧接着，1951年5月，上海召开了一次"万人控诉大会"，此后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类似的"控诉大

会”。在全国一片控诉声中，王先生主持的“基督徒会堂”却纹丝不动。从“三自会”成立的那天起，王先生就在《灵食季刊》上撰文反对，他认为“现代派”其实是无神论，这样一些人领导教会搞所谓的自立、自传、自养，是从内部将教会搞垮。

我在1948年冬天的时候去边疆传道，在1950年和弟兄姊妹们在昆明建立了一个教会，这是昆明的第二个人数比较多的教会，当时人数最多的是基督徒聚会处，带领人是陈若天（原名陈恪三）老人。1951年昆明的基督教联合会初成立时，虽然也有青年会的人参加，但绝大多数还是信仰纯正的人。

基督教联合会刚成立时我们教会没有参加，基督徒聚会处也没有参加。后来他们受倪柝声先生的影响，突然参加了基督教联合会，我们就成了“钉子户”，压力很大。我本来佩服尊敬陈若天老人，就想既然他参加了我也参加吧，心里也幻想这样可以避免困难，广传福音。实际上并不是神的带领，而是跟着人走了。

进到基督教联合会以后，我们看到一期“灵食季刊”（我们是期期都看的），王先生在上面讲：“一个传道人不能‘蝇营狗苟’。”陈若天老人就说：“像咱们这样的人是不是成了蝇营狗苟呢？”他有些自嘲又有些不安。

王明道先生在神面前的看见，让我受到责备，也让陈若天老人受到责备。王先生借着文字间接教导我，对我影响很大。“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可同负一轭”，真信的和假信的根本没办法合在一起，而且信仰就是很纯粹的，政治就是政治，信仰就是信仰。王先生在神面前的领受实在是影响了很多人。我个人觉得王先生那一系列文章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开始，迄今也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帮助。虽然家庭教会因为缺乏很好的教导有些混乱，有异端，各自为政（这是不好的，是撒但的搅扰），但在持守信仰的纯正，以耶稣基督为教会的元首这一点上，是遵行神的道的。

基督徒作为个人应当顺服执政掌权的，为他们祷告，为神的缘故顺服人的一些制度。王先生自己就是个表率。我1953年第一次住在王明道先生那里，当时政府规定外地人口在京三天以上就要到公安局报临时户口，其实

客人来到自己家里住几天别人未必知道。但王先生不管别人知不知道，三天以上就要往公安局去报临时户口。他是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人”顺服执政掌权的。但是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他是有所持守的，以圣经为界限、为原则，圣经以外的不能加进去，圣经里面的不能够抽出来。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不能在主耶稣基督以外另外再有一个头。所以，教会要是和政治联合，接受一个政治上的领导，这是不符合圣经的。为这样一个缘故，我们做出任何牺牲，应该说，在所不惜。

1952年，昆明的基督教联合会发表声明，让云南省凡是土地改革地区都要自动停止聚会，并且拿我做了一个典型，在云南日报1952年5月10日的头版上说我在少数民族地区传道影响了土改。那个事情对我的打击很大，我觉得这是神借着不信主的人对我的管教，让我知道只要传福音就会有难处，但是要向神寻求保护，而不是向人寻求保护。神知道我没有恨那些陷害诬蔑我的人，我只有为他们祷告。圣经说：为逼迫你的人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我感谢主，神给我那么一个力量。

这个事情过后“昆明三自会”正式成立了（在那以前昆明三自会的前身是昆明基督教联合会），我声明我个人退出三自。后来我所负责的教会也退出了，在王先生的间接教导下，各地退出“三自会”的教会越来越多。

那时“控诉运动”已经转移到圣经上来，“三自会”的领袖虽不明说圣经是帝国主义思想毒素，但却说“属灵派”（笃信圣经的人）歪曲圣经，散布帝国主义毒素，离间信徒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破坏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来，“信徒在读圣经和讲圣经的时候，就必须先用政府的政治标准来衡量，看这段（节）圣经与当前的政治是否吻合。如果不合，就不能讲，也不能信。通过这个办法把信徒和传道人的思想和灵性完全禁闭在政治的范畴内。其结果是读圣经的人不敢随着圣灵的引导读了，讲圣经的人也不敢随着圣灵的引导讲了，神的教会自然而然就变得有名无实、徒有其表了。”(引自《又四十年》)

此时，王先生在《灵食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真理呢？毒素呢？》，击其要害，“为从前一次所交付我们的真道而竭力的争辩。”这篇

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三自的领袖们一个接一个出来反击，而王先生在论战之中又写出另外两篇重要的文章《顺从人呢？顺从神呢？》和《我们是为了信仰》。王先生在其中毫不留情的责备假先知，指出他们的错谬，帮助了很多人。他写这几篇文章的时候我刚好在他身边受教，帮助他校对，我亲眼看到他是怎样在神的带领下写作的。

这些文章都是王先生讲道的讲章，他准备讲道的时候，一定要在神面前认真的祷告寻求，然后得一个题目，列几个要点。王先生讲道的时候心中有数，从不带讲稿，讲完就开始写作，甚至写到深夜。记得有一天早晨，王先生迟迟未起，直到吃早饭时才从房间里出来。我们问他为什么起得这么晚，他笑呵呵地回答说："昨晚在神面前祷告，突然得着一个题目，我一直在想，想到半夜才睡着。"这个题目就是后来给了假先知沉重一击的《以亲嘴为暗号卖主的犹大》。

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后，王先生把我叫过来，说："云波，你来了一段时间了，你看我讲道、写文章、说话、平时生活有哪些地方不够妥当？"他说得很自然，我却非常吃惊，我所尊重的王先生对我这么一个晚辈诚恳地说这些话，我完全想不到。有人说王明道先生骄傲、自负，我说不是，我所认识的神的仆人有他谦卑的一面。当时我很直率地回答说："您讲道的时候提到孔孟，我觉得没有必要，而且叔叔您说话用语太重。您说'说谎'是'最大的罪'，那别的罪就没有说谎大了。"他笑了笑，说别人不会误会的，可正是因为老人家用词太重，后来引起一个很大的误会。王明道先生第一次被捕后经过一段软弱失败。后来他讲这段经历时说："我是彼得，不是犹大。"因此就有人根据这句话公然论断王先生放弃过信仰，但实际上他没有。王太太说，他是信心软弱，但是没有否认主名。王先生在牢狱中曾经向神祷告，求神打发天使像救彼得一样把他从监狱里救出来，但他怎么求告，神也没有应允他，他就觉得神到底听不听祷告啊，自己信心一软弱，再加上别人对他殴打恐吓，他就失去了信心，但是他始终没有失去信仰。

这个误会是因为王先生的措辞而起，还有些事情是以讹传讹，错上加错。例如有两本书都说：1954年王先生曾去过基督教青年会接受批判，在会上

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批判他，王先生坐在后面两臂交叉抱在胸前，抬头望着天花板一言不发，甚至一些姊妹在旁边为这个情景而流泪。这个故事很感动人，但并不是事实，1954年我一直住在王先生那里，不可能有这么一件大事我不知道。而且王先生也不可能去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聚会，因为他认为青年会是假信派，社会福音派，常有论争，他怎么可能去到那里接受批判呢，除非拿手铐把他铐去。为了澄清这一误传，我还问过其它几位熟悉当时情况的人，都是一致看法。

关于王先生软弱跌倒的这一段历史，现在说法很多，我也愿意说说自己所经历、所看见的，使弟兄姊妹能够更加了解当时的情况。

三、王先生的失败与得胜

1955年，王先生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与“三自会”领袖的论争越来越激烈，他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一些弟兄姊妹在自己的学校或单位都受到了不小的压力。教会内部，有人软弱放弃了信仰，还有的人为了名利已经在卖主卖友。风声越来越紧，王太太有一次问我：“云波啊，你看叔叔现在这个处境，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啊？”

我太单纯太天真，就回答说：“不会出什么事。”那时候香港的《大公报》刊出一条新闻说：帝国主义分子说王明道在北京被枪毙了，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完全是他们在造谣。而这个消息被人民日报原封不动地转载了。我对王太太说，这就等于否定了海外的某种猜测，无形当中就给叔叔打了保票。王太太当时未加可否，但她心情很沉重，我想她是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又没有明说。我觉得作为一个晚辈，在这件事情上我说话太随便了，我肤浅的看法会不会助长了王先生更尖锐厉害的论争，我不知道，但可能多多少少让王先生失去警惕，失去了在神面前应有的警觉。我觉得这是亏负王先生王太太的一件大事。

1955年8月7号是礼拜天，上午王先生的讲道仍是很有力量，晚上王先生身心十分疲惫。当天深夜逮捕王先生的公安人员翻墙而过进入院内，王先生仍在书房整理自己的书籍文章。8月8号恰好是王先生夫妇的结婚纪念日，凌晨的时候，公安人员首先逮捕了王太太，继而进入王先生的书房。王先

生对屋外的一切毫无察觉。当时的公安人员大喊了一声："王明道！"他转过身来，就看见一支手枪对着他，公安人员手扳枪栓，好像马上就要射出子弹。王先生本来胆小，此时被惊吓地坐到床上。公安人员铐住他往门口走，王先生十分气愤，就喊："逮人了，救命啊！"后来进到监狱里，和王先生同监的两个犯人殴打欺辱恐吓他，他又因为祷告不蒙应允而信心摇动。经过几十次的审讯，王先生承认了至少十二条罪状，其中除了反对"三自会"是事实以外，其它都是谎言。王先生本来最恨说谎的罪，他认为说谎可以遮掩其它罪，给其它罪开一条通路，让人犯罪放心大胆。但在他蒙受重压又信心软弱之后，却为求早日释放，承认了那些他根本没有犯过的罪行，说谎了。

其实王明道先生并不是在他被捕那天才陷于软弱之中，我在他家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他祷告较少，读经的时间也不很长。那时他和别人谈话，常常是说一个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指责很多。在圣道讲习班(王先生为了造就一些爱主的圣徒们开设的特别聚会)里，也都是讲三自如何不对，我们应该怎样抵挡三自违背圣经的说法，为真道竭力争辩，但是他很少谈到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怎么追求，怎么谦卑，怎么靠着主得胜。我们人是软弱的、无力的，只有靠神才能战胜患难。王先生正是忽略了这一点才在转眼之间跌倒的。

在此事的十几年前，他在去见日本人的头一天晚上，面对苦难时说：肉体不是没有恐惧，大难临头的时候，求神加添力量。但在1955年的争战当中，他依靠过去的胜利经验，表面仍然刚强，实际上内心已经害怕了。人在主面前真是一生都要战兢恐惧的，若神不帮助加力量，靠着自己必然会失败。以利亚在迦密山刚刚靠主得胜，但忘记了依靠神，就马上在罗滕树下求死。王先生灵命的起伏，正是以利亚由得胜而失败的写照。

1956年秋，王先生被释放。他的认罪书在关押期间已经写好，有关人员已经修改确定，他一出来就被要求去三自会当众作检查。政府很了解王太太和王先生之间的感情，也知道王太太决不会赞同他去检查认罪，所以在王先生去三自会检讨完之后，才把王太太放出来。王先生胆小软弱写了悔过

书，但是王太太很刚强，我个人觉得如果把王太太王先生同时放出来，王先生就不会去念那份悔过书了。那时宗教局的人很希望王先生出来领导三自会，几乎天天邀请王先生去三自讲道，王先生虽然也曾答应出监后要去三自会，但始终迈不出这一步。出监后他的精神状况很差，懊悔得几乎要死，所有的事窝在心里，不能和人讲，真是极其难过。此时的情形，在《又四十年》中有详细的描述，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王先生王太太借着病重，一直拖着不去三自会，甚至后来到政府部门声明他的悔过书都是谎言，请求退回那份悔过书。所以1958年四月，他们被第二次逮捕了。

王先生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上诉也被驳回，但此时他的生命却经历了一个极大的复兴。王先生那时的心境是："既愤且愧，置身无地，悲观失望，坐以待毙。"他极其痛苦，只有祷告神说："神啊，你怎么这么残忍，叫我遭遇这样的打击，被判无期徒刑？"这时，他忽然想起二十一岁背熟的一段经文："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中，耶和华却作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愤怒，因我得罪了他，直等到他为我辨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弥7：7—9）

神的话让王先生醒悟过来，自己被判无期是因为大量撒谎，得罪了神，他对神的不满埋怨都没有了。他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一个机会，叫我翻供。"这样祷告后，他的心里平安了，也不害怕了，而是满有罪被赦免的喜乐。过了几天，神就给了王先生写材料的机会，他写了几千张纸，在神和政府面前都认了说谎的罪。王先生从此重新站立起来，虽然为此他丧失了一切出狱的可能，吃了不少苦，但神也使他因此逃过了文革，奇妙的用监狱保守了他的生命。

王先生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多年后，终于被释放了，住到上海他儿子家中。自王先生夫妇在1955年被捕，我有30多年没有见过他们了。1956年我被释放后，经常被叫到派出所学习汇报自己的思想行动，因此绝不敢到北京去

看望他们。后来他们第二次被捕，我又参加劳改，直到1987年我平反了，才在第二年和妻子一起去上海看望王先生和王太太，因此也就了解到一些他们晚年事奉的情况。

四、他们晚年的事奉

那时候王先生王太太两人双目都失明了。我们之前曾写了封信说要过去看他们，所以一进门，服事的弟兄姊妹一说我们是从天津来的，两位老人就问是不是云波和耀轩啊？我们紧紧抓住两位老人的手，眼里含着泪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们在那里住了10天，那时候国内国外去看王先生王太太的人很多，几乎天天都有人去。好多信徒从河南、安徽、浙江、北京、香港、新加坡、日本、美国等地到上海去看望他们。正如饶孝辑牧师所说："他们两位坐在那里不说话就是见证。"王先生多年深陷牢狱，毫无权势、地位、钱财，晚年却有这么多人去看望他，这让我更清楚了一个道理：人原来不在于权势钱财地位，而在乎在神面前的心志——这是王明道先生在监狱里前后23年，为神所作的见证。

有一天，天气晴朗。王先生、王太太、耀轩和我一起坐着说话。王先生忽然说了一句："云波比以前胖了。"我想不到三十多年没见了，王先生在阳光下还能看出我的面部轮廓来，非常高兴，急忙站起来跑过去，抓住他的胳臂说："没想到您还能记得我三十多年前的样子。"我说着说着直想流泪。王先生说："这是借着点阳光，不然什么都看不清了。"耀轩问王太太说："婶呢？"王太太说："只能看见点人影子，别的都看不见了。"他们的儿子王天铎还在上班，经常东奔西走，所以王先生幽默地说："我们三个都是盲(忙)人。"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位老人，虽然是盲人，也是忙人。他们从早到晚要接待四面八方来的客人，而王太太也像以前一样，手里闲不住，一面和我们说着话，一边给新印的诗歌本包书皮。那时候武康路（王先生王太太在上海的居所）每礼拜日已经有聚会，聚会用的上百本诗歌本的书皮，都是她摸索着包上的。王太太从来没有因为失明觉得不方便，也从来没有向神求告眼睛能看见，我相信神的使女真是凡事顺服神的。

王太太不包书皮就织毛衣，织了毛衣还是送给弟兄姐妹。后来我们离开上海回到天津，王太太托人带一条毛裤给我们，让我们春节前一定送去给北京的一个老大哥。这个老大哥一度软弱过，据说他曾把一些弟兄姐妹们的情况介绍出去，所以有人说他是卖主卖友的犹大。我和妻子相信他过去是真信主的，虽然很多人认为他做了对不起弟兄姊妹的事、加重了弟兄姐妹的苦难，但是我和耀轩想，他自己本身也一定受了不少的苦，所以我们曾一再去看过这位老大哥，终于他也得到了众多弟兄姊妹们的认同和接纳。
1988年冬天，我们再去看望他，我把毛裤拿出来，说："这是一位主内的长者，双目已经失明了，特意织的一条毛裤，嘱咐我们在节前送来"。我们故意没提婶的名字，但那个老大哥却说："我知道这是谁织的。"他含着眼泪把毛裤接受下来。
我们在上海王先生家住了大约十天，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去看望了一个慕道的老校友，其它的时间都是陪着两位老人谈话，因为我们实在珍惜这段难得的机会。王先生的体质已经很弱了，走路得用助行器。但他总想要求平反，甚至提到这个事都觉得很气愤。王太太曾多次劝阻过他，我也劝王先生说："叔叔，您何必要求平反呢，伸冤在主，主必报应。为什么您一定要自己伸冤呢？"
王先生说："我连累的人太多了，因为我的缘故有很多人吃了很大的苦。"
我说："什么叫连累？有些人是跟着神走的，您为主受了苦，他们也为主受了苦，必然有神恩待眷顾他们，您何必担这个心呢？有些人不是跟着神走，是跟着人走，他若因此受了苦那是活该。叔叔您何必负这个责任？"
我作为一个晚辈实在不应该说得那么直率，可是我觉得在上海的时间不会太多，该说的就说吧。当时王先生没说话，王太太在旁边倒是劝他："云波说的这些话不是没有道理啊。"
我就接着劝："有的时候您总是为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而生气，圣经上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您别再想平反这些事，也别再为这些事生气了，这样对您自己不一定合适，对神的事工也没有益处。"
当时王先生不置可否，我就继续说："叔叔，您被捕以前我们这些年轻人也

有责任。”

王先生听了很不解，问我："你们有什么责任？”

我说："我们这些年轻人当年应当对您有所劝告，在论争的时候注意方式、语言，对可能的苦难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是那时候我不但不劝您准备迎接苦难，反而向婶说：既然报上都说您遭难是帝国主义造谣，那就不会对您有什么动作了。我被捕后曾经主动向政府交待过这件事，承认对您反三自是有影响的。您为什么总想是您连累了我们呢？那时候我住在您那里，看到您很忙很累，灵修祷告的时间少了。我有一两次想和您说，但就是不敢说，因为我觉得自己太不配了。但是多少年后，我才察觉到，正是因为您那个时候祷告比较少，所以被捕的那天晚上，才会惊慌失措的。另外，我们这些年轻人那时候把叔叔举得太高了，觉得叔叔说得绝对没有错，叔叔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经过几十年的磨炼，我悟出一点道理来，就是：众人高举一人，对'众人'和'一人'都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我觉得您被捕我们这些年轻人也有责任。"那一次王先生和王太太都没有说什么。

晚年时的王先生仍是那样刚正不阿、是非分明、直言不讳。

1988年春天，一位举世闻名的布道家被丁光训邀请先去了三自会讲道,又到上海来突然拜访了王先生。王先生亲自对我说，他对这位布道家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曾当面指出他去三自的危害性(但是这一重要的讲话内容，却在这位布道家的自传中被轻描淡写地略去了)。之前这位布道家托人告诉王先生他来访的愿望时，王先生明确答复说: "你若来看我，就先不要去三自。你若去了三自，就不要看我来了。"但那位先生并没重视，仍是先到北京和丁光训握手谈话，又到崇文门三自会礼拜堂去讲了一篇道。他那篇讲道无形中起了一个作用:这位鼎鼎大名的布道家都可以和丁光训握手谈道，你们这些家庭教会的无名小传道，为什么不能和丁光训合作？有人甚至因此推论说：可见中国家庭教会不参加三自不是信仰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大概这位先生也没有料想到，他和丁光训的会晤，是间接地给中国家庭教会定了政治罪名。我个人认为，如果有人能直接向这位先生建言，只要他

说一句实话：“丁光训不是真基督徒。”这对神的教会(包括中国的家庭教会)是一种理当的明确的忠心表示。对他本人，既可以挽回他先前的失误，更会令人对他改观而称赞他的晚节。

1989年3月29日是王太太的八十寿辰。那一年也是她和王先生结婚后共同事主六十周年。我和耀轩一直不知道怎样祝贺他们。后来在3月27日清晨祷告的时候，忽然想到他们结婚前就是王先生讲道，王太太(那时她叫刘景文)弹琴，成婚后在北京基督徒会堂也是如此配搭同工，大蒙恩典。被捕后分隔两地的漫漫时日，想必他们也会互相思念一起事奉时的美好景象。直至到了晚年，两个人双目失明了，在聚会时仍旧坚持讲道弹琴的事奉。所以我那天祷告后，很快地得到了一首诗，及时地寄给了他们。诗歌名叫《主道仍然放光芒》。可以用《何等恩友慈仁救主》的曲调歌唱，因为王太太说她很喜欢这首诗。所以现在也把这首诗录在下面：

1）琴声悠扬歌声嘹亮，施恩座前同歌唱。
神的作为实在奇妙，远超所求和所想。
当年因信随主引领，离别父家到远方。
熬炼造就都是祝福，心在草地溪水旁。

2）琴声悠扬歌声嘹亮，施恩座前常歌唱。
神的应许不会落空，一粒麦子收满仓。
随从神仆多历艰险，与主同舟迎风浪。
天上星笑海边沙暖，蒙恩圣徒满会堂。

3）琴声若闻歌声未忘，口虽无言心歌唱。
神的道路高过人意，行过方知主恩长。
陪同主仆同走天路，苦杯同尝难同当。
同心同步共同仰望，沙仑玫瑰常放香。

4）如今八旬虽已目盲，歌声依旧琴悠扬。
双手为主作工不息，眼前虽暗心明亮。
字迹不清何等有力，步履艰难何刚强？！
静坐主前便是见证，主道仍然放光芒！

以后我们在天津听说，王先生的身体越来越差了，但是向主仍是一片忠心。1991年7月底，王先生去世前几天已经意识昏迷了。那时我因咯血也正病重在医院里，虽然心里很难过，但实在没有办法去看他们，只能打电话给王太太问候他们。

我说："婶啊，我们不能够去看望叔叔，只能祷告神，希望叔叔能够在神面前安心，靠主喜乐得安慰。"

王太太说："你的话我尽量在他耳边告诉他，但他能不能听见，就不知道了。"

后来陈本伟弟兄写信告诉我说：

王先生去世那一天正是礼拜日早晨，弟兄姐妹们正聚集在王先生的小客厅里敬拜神，大家按着次序每人一节地读圣经，当读到列王纪下第四章第八节："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门前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这时王先生突然呼吸急促起来，大家就停止读经而共同祷告，王先生就是在大家的祷告中离开了世界，回到天家的。

王太太去世以前，眼睛被医治复明了，她眼睛不方便时还给我和耀轩写了几十封信（这些信的原件到现在还珍藏在我手边），此时和我们更是常有通信来往。1988年我拜访王先生期间，他曾提出来叫我写他后半生的传记。我经过一天的祷告，对王先生说：我不配写。而且那时国内环境还不像现在这样开放，我就建议叔叔找海外的人写。后来王长新兄执笔写出了《又四十年》，我相信将来书写近代中国教会史的时候，这一定是一本重要的资料。我也曾劝王太太写一写她的经历作为属灵的财富留给后人。但她在电话中说她自己没什么可写的，只是在最后的一封信中写了一些属灵的感受。现在把她的部分手迹附录在本文的后面，作为对她的追思和怀念。

1992年4月16号下午，我和耀轩给王太太打电话，原本只是想问候她，没想到她向我们问了许多许多弟兄姊妹们的情况，她一边问一边咳嗽，大概足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再劝她休息一下，下次再谈，可是她仍旧坚持问，直到实在咳得太重了，才勉强停了下来。当时我们只知道她有病，但

不知道病得那么重。四月十八号我们接到了上海的电报，说在我们打电话后的当天晚上，王太太病情加重，送到医院后就昏迷了，于当日清晨离世了。她在电话中对弟兄姐姊的关切之情，竟是王太太留给我们的最后的形象。

末后的话

写到这里，这篇小文应该结束了，但总觉得意犹未尽，在此还想讲讲1988年时在王先生家中发生的一件事。那一次有三个美国信徒到了王明道先生那里，提了三个要求：第一，请讲一讲中国信徒受了哪些苦难？第二，请说明一下，中国信徒受了这么多苦难为什么还要传道呢？第三，我们可不可以给你们录像，让美国人看到后会受感动，好激励他们向神的心？

对这三个要求，当时王先生王太太和我们这些晚辈们都不肯答应，场面很冷落、很尴尬，对人家远道而来的客人似乎有些不礼貌。王先生和王太太年事已高，有时候就常让我替他们回答一些来访者的问题。(参见《受伤的勇士》一书)我当时一看，周围的人除了王先生王太太以外，又只有我年纪大些，因此我就只好暗暗地祷告，求神给我智慧来回答这些问题。我说：“当年彼得、保罗、约翰都为主受了很多的苦，有许多的难处，但在他们的书信里很少提到他们所经受的苦难。都是正面的劝告教导信徒，你们为什么到了中国来不问中国信徒属灵的领受、对于圣经的一些看见、对教会事工的看法，怎么专问中国信徒受的苦难呢？我觉得没有必要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你们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同工们没有讨论研究过，我不会像美国的一些牧师们那么会分析讲论，有条有理地说明：受了苦还要传道的第一条原因是什么，第二条原因是什么，我说不上一二三四来。我个人觉得只有一点，那就是主为我们死了，我们就应当为主活着。”

第三个问题，我觉得挺难回答，简短地祷告以后我就说：“美国有那么多的神学家，写了那么多关于耶稣基督生平的书。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形象，应当是像‘活画在加拉太人面前一样’，活画在你们美国人面前的。若是他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以及那里流出来的宝血尚且不能感动你们美国信徒

的话，我不相信中国信徒的苦难可以感动你们美国信徒。”说到那里我自己也很受感动。

中国教会前一代的人们都走了。我们这一代的人们，也走的走了，老的老了。而中国教会的使命已经越来越重了。所以我只有祷告神，求神兴起众多的中、青年一代的圣徒们来，从前一代见证人的经历中学会应当如何柔和谦卑，学会应当如何靠主刚强，为主打那美好的仗，奔跑当跑的路，要为主作出比我们这一代的人更多的工作。我相信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祷望，而是我们这一代中许多人的祷望!

这些话，就算作对这篇小文的一个总结吧!

附录一：王太太最后一封信的内容

云波耀轩：

快信正好29号(作者注：3月29日是王太太的生日)到。早晨8：23分XX来电话，XXX也讲了话，晚间又收到她们的卡片。第二天清晨又来电话，续29日的再谈。XX因上班，没在。按国内日期，她老妈妈正晚叔三天安睡的。他们为老人止息肉身的苦楚而安息得安慰，但不能不伤感，因为老人不在了，我则毫不伤感。他的骨灰盒仍在他天天坐的地方，只是挪开了大藤椅，换上小茶几就是。无声无息，因此并不像是失掉了他。每主日仍是没讲道的，一次一篇（读）他过去写的文章。不知不觉已经八个月了。还有几个八个月好等？日子飞快，我们寄居的日子也就到头了!只像时间过得快，不够用的。觉可不能不睡，也多拖拖拉拉浪费光阴。

我的过去只是仰望主引领，自己一步步的放心迈步。颂主诗歌165首—“范我步履，不求能见远景，唯求主恩一步一步引领”—使我一生心灵得安息，一切的遭遇没有不经过主的许可的。我姆妈常念叨：“天父不许，祸患不能临到”，福气也是这样，没有什么可怨天，也不能“尤人”。临到自己都是一样样一件件的试验熬炼，除尽渣滓，坚强信心，增加认识明白主的作为。多清楚自己的本相和愚昧，更深刻的抓住主，记得有一天发出这样的呼求：“不求主改变我的环境，唯求主赐我得胜环境的力量!”多看到主的恩典，轻看环境中所遇到的难处，想到被挂在木头上的主，就减轻了自己的负

担。多少古信徒的心声借着所写的诗歌，带领着自己度过了一生的年月。诗歌里唱出了自己的失败和主浩大的救恩。这两天我正想到在极重的试炼能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实在不是出于自己，是天父的厚恩。每想到颂主诗歌178首的头四个字(注：似乎应是头五个字)“我乃属耶稣”，心中满得力量，因为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实属主的。(那副歌是“亲之近之”)，因此我说基督徒若没有诗歌可唱，怎么办。这是给我们的特恩。……
你们俩个别过于劳累，休息时必须放下一切，踏踏实实躺下。……
祝主佑平安！

景文　92，4，1
（注：这是婶给我们的最后一信，４月１６日下午又通了最后一次电话，略见上述本文内。不赘。）
边云波　中国大陆传道人，诗歌“献给无名的传道人”作者，现居美国。
恩雨　　　中国大陆基督徒。

（引文结束）

++++++++++++++++++++++++++++++++++++

宋尚节

（引述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5%B0%9A%E7%AF%80

宋尚节（1901年9月27日－1944年8月18日），福建莆田人，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教会复兴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奋兴布道家。

家庭背景

宋尚节的父亲宋学连是莆田美以美会（现在称为卫理公会，约翰卫斯理所创立的一个大宗派）的牧师。宋尚节很小的时候（小名天恩），就有在晚上或者他父亲生病时候代替讲道的经历。人们称他为“小牧师”。

求学与真实重生

1926年，宋尚节在美国中部俄亥俄州的卫斯连大学就读，后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得到化学博士的学位，因为他成绩优异，又获颁金钥匙一枚。现在宋尚节写的博士论文还保存在俄州大学图书馆里，论文题目为“有机镁化合物的构造及格里纳试剂反应过程”。

1927年得到博士学位以后，2月10日在纽约协和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他经历到圣灵的浇灌。他说“这是我灵性的生日！”，所以他说虽然他很早就已经信耶稣了，但是这一次的经历给他很大的冲击。他说圣灵浇灌他好像几十次一样，“圣灵好像水一样，从头上浇灌我”。他心里面充满了喜乐，然后“圣灵一再一再地浇灌我”。他经过这一次的经历以后就非常地有能力，热心的传福音布道。那时候，协和神学院是自由派的，所以他们认为他发疯了，把他关起来。宋尚节这一段被关起来得时间，就把圣经读了几十遍等，于他的一段旷野时期。几乎每一个被神使用的人都有一段旷野时期，他那一段时间里面好像不能做什么，而是神借那个阶段磨练，造就他，特别是让他对神的话有更深的认识。

回国事奉与奋战

宋尚节回国途中，想到《圣经》中的经文“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当轮船驶近中国，他把象征博士荣誉的金钥匙和奖章，扔进太平洋里。

1927年11月他开始在闽南传教，强调十字架、重生、宝血的主题。在初期

时，他每次讲道就是讲重生，得救，要走十字架道路这样的主题。
后来，他几乎走遍全国各省上百座城市，带领10万人归向基督。宋尚节在讲道中特别强调悔改。不只是要认罪，而且要“悔罪”，就是为自己所犯的罪来悔改。悔罪以后要“改罪”，改变过去在罪中的习性。认罪以后要“赔罪”，意思就是讹诈了谁，就要偿还他。过去曾经私拿公家的东西或是欠谁钱，就要归还；若伤害人，要当面或写信向人认罪。因此他被称为中国的施洗约翰。宋尚节强调认罪要具体，包括细节，而不只是说“上帝哪，赦免我，我是一个罪人”，并且要一项一项具体地祷告。他列出二十几项大的罪，要人具体地认罪，祈求上帝的赦免。此外，他使用“实物教材”来引导听道者明白真道。有一次他放一个棺材在讲台上面，喊著“发财，发财，发棺材！”，并躺到棺材里面，给人很深刻的印象，叫人要治死自己的贪财。后来为了便利巡回各地讲道使用，他就做了一个小棺材放在胸前的口袋里，每当讲道时就拿出来。平常聚会时他会边讲道边唱一段诗歌。
1944年，他在北平病逝，安葬于香山。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以下选自《宋尚节传》部分内容）

https://wellsofgrace.com/biography/books/song/index.htm

。。。。

二十二 归航 （1927年10月）

尚节在辛辛那提住了一个月，心情静如止水，在候轮回国。

这时有一位牧师请尚节到他家里吃饭。他请尚节弹一弹钢琴。尚节弹时，旁边一位又聋又瞎又哑的女子，用手按在琴上。尚节弹完了，牧师就请这位三不全的女子弹琴。奇怪，她把刚才尚节所弹的调子再弹出来，一点也不错，而且弹得很好。后来旁边有人提她手，不知怎样她竟知道他要她弹的是第几首。

这事给尚节一个很深的印象，且成为一个最大的教训。他深信这教训是上帝所赐的："上帝要我在这末世里也象这女子一样听不见，看不见，说不出。因为要作上帝仆人的，若不是眼睛完全看不见世界和财利，耳朵听不见人的讥刺和辱骂，并且人骂我，讽刺我，我并不还口，就不配背十字架跟从主。惟有这双手，日日要作上帝要我作的工，去完成他的旨意。愿上帝叫我每天的生活，真能对世界看不见，只仰望他；对一切声音听不见，只听见他的声音；对逼迫不还口，只日日宣讲福音；但愿我的一切举动，都能显出主的慈爱；但愿我能和保罗一样，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秋风飒飒的十月四日 ，尚节别了患难知交到西雅图乘轮回国，于十一日启碇。

在美国住了七年半，现在带着归去的，身边有金钥匙，金奖章，和博士硕士学位的文凭；脑子里记着溺死者的异象，五饼二鱼食饱五千人的奇梦，重生的经历。还有一外最近的梦，他也记得清清楚楚，他自己躺在棺材里穿戴着博士衣帽，说道："就世界而论，就自己而论，我已死了。"

主的启示和呼召是这么清楚，另一方面，世界的诱惑也是非常强烈，而且拿出非常属灵的理由：他现在已得了博士学位，在化学上植根既深且厚，将来还可以进上步博取国际声誉，这岂不是一个强有力的福音广播台么？如果走这条路，不但在学术可以有大贡献，在经济上也可以有很大的收入，对于做了一辈子穷传道的父亲，也可以稍娱其晚年，自己更可稍尽子职，略报双亲劬劳养教之恩，岂不是一举而数善俱备么？

这种心灵上微妙的冲突，在他整个的归国航程中继续不思，而且越来越发剧烈。他已把他的才智摆在祭坛上了，主岂不会为他自己的荣耀使用这些才智，而不对他再有所苛求么？这种想法，卒之为另一种想法所克服了：″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于是，他和保罗一样，决心把世界和由世界而来的荣名厚利，抛掷得干干净净。

一天， 当归船驶近中国的时候，他把箱子里装着的金钥匙和荣誉奖章等等，一概拿出来抛在海里！

这件传遍遐迩的事，在他的自传里却没有记载，只在上海开退修会时一度提及。

他只把博士文凭留了下来，为的是以此取悦他年老的双亲。后来在一九三八年，他在福州讲道时说，这张博士文凭是递给他母亲的。柯尔牧师也说，曾在他家里看见这张文凭，装了镜框在壁间挂着。当柯尔注视这镜框的时候，尚节对他说：″象这样的东西，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

。。。。

二十五 神的约束 （1930）

一九三0年，尚节感到乡村的传道人一定要在圣经的基本要道上，受过相当的训练。他于是把一百多个教会分作十几个训练区，他自己便轮流到每一区开查经班。此外他更竭力提倡家庭礼拜，结果那年举行家庭礼拜的，有千余家。

训练班由各地教会的领袖参加，每区总有四五十人。但因为美以美会的传道人或牧师是常常调动或迁移的，所以尚节也组织青年教友训练班，以训练他们怎样帮助当地教会的传道人和牧师，同时也从他们身上得到许多好见证。这两种训练班都很蒙上帝赐福，结果很美满，就有其他教会来信请他去协助组织训练班。尚节于是在闽南，福清，永春，德化，海山等地往来奔走，专做这种工作。

尚节深感训练教友比训练传道人还要容易。这因为那些头脑不清，道理不明，没有生命的传道人，要他们悔改，真是比什么事都难于办到。尚节认为没有生命的传道人，不但不能救人，反做了许多人的绊脚石。但他同时也很体谅他们，知道他们都在受着经济的压迫。

他们的待遇很低，每月薪水甚且不能固定，仰事俯蓄，当然不够，于是不能不另谋兼职。传道人既各有俗务副业，便不能专心传道祈祷，当然不能多结善果。

传道人怀收入既少，而且全靠信徒甚至慕道友的捐款供给，于是便弊端百出。第一，教友视牧师和传道人如债主，发生一种不可言状的厌恶。第二，牧师和传道人视教友如施主，一味谄媚奉承，教友便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即使犯罪作恶，传道人也只好充耳不闻，不敢加以斥责。

还有一层，教会的财政权操在西教士手中，西教士实际上成为雇主，若不听他们的命令，就会请你"另谋高就"。这些西教士又多半是新神学信徒，他们所下的命令，不管是非，都得奉若圣旨去做。

这时，尚节自己也遇着一个大试探。一九三0年受难节的一天，计算起来，他回国已两年半了。他看自己，看别人，已忘却他所仰望的只是主耶稣。他觉得他已得到了博士头衔，大学教授的地位是应该有的，至少每月应有进款五六百元，但事实上他做的是极艰难的工作：肩背着行李，整天过山越岭，赤着脚，光着头，汗流浃背在羊肠曲径上为道奔跑！他所得到的报酬是些什么呢？是人们的奚落！这时他已有两个孩子了，但他劳心劳力所得绝不够养家活口。他以为上帝在苛待他呢？

在灰心怀疑时，上帝的话临到他，是责问，同时又是安慰的话："你不能顺服到底吗？不能完全奉献与我吗？你的事我都知道，而且你所有的失败，也就是为那将成之事作先驱。要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人的人得益处。"他听见了主的话，默然不语，只在沉思冥想。

不久，他接到南昌和南京来信请他去领会。他以为时机成熟了，他可以出远门去布道了，但是向上帝请示的结果，却是相反。上帝说："孩子呀，你等一等才跑，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哩！"

可是，尚节对上帝这样的控制再也顺服不下了！他要做一匹强马，凭血气往前冲。正在打迭行李准备去江西时，忽然混身自顶至踵生了毒疮！但他仍不肯受主约束，以为在睡上有一二星期，包管会渐渐好起来。他一点也不醒悟，只计划他的行程。可是正在他要启程的早上，他忽然受急性霍乱的袭击，呕吐在止，腹痛如绞！当命在顷刻之际，他立即向上帝承认他不顺服之罪："父神呀，愿他旨成全吧！"祷告的尾音一说出，病和痛便立刻

离开了他。病愈后，他被请到海潭去主领青年学生奋兴会，许多人得了重生之恩。以后到那海岛上主领岛区宗教领袖退修会，结果有许多女传道女教员大发热心，乐意四出工作。

。。。。

** 第三部分 奋战 **

二十六　离家北上 （1930）

尚节已向基督完全降服，愿意"一辈子在家乡工作"了，可是主的旨意却不是要他在家工作而只是要他降服。

他没有回家以前，兴化一带本来是土匪猖獗的地区，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是家常便饭。但在他回家后的三年中，地方宁静，人民都安居乐业，大有利于他之出外传道。可是，不知怎的，忽然大群匪类又活跃起来，到处可闻截夺劫杀事情。这时，美以美会的西教士早已闻风逃遁，尚节的环游布道工作，也势在不能不停止了。

在以往的三年乡村工作中，始终有同道与尚节分工合作，彼此情投意洽，亲爱有如骨肉。但这时他们忽然不约而同的四散了。而且，故乡的人物，也对尚节怀疑猜忌起来对他议论纷纷，使他有不能在故乡立足之势。

主一方面关了故乡传道之门，一方面也为他开了外乡又广又大的门。美以美会的会督，见各乡都在匪乱中不能做布道工作，便趁尚节闲暇的机会，派他到北方去考察识字运动。尚节对这一运动虽然不感兴趣，虽然他一向

深信主召他的目的不在做外层工作，而在使教会复兴。但是，主这时要他到北方去，他却不能不顺服。

尚节虽已大病初痊，家人却一个一个的病倒下来，病重的是宋师母，病逝的是儿子天程。天程又名"出埃及"，生下来不到三个月便奉召归天。宋师母尚节正在为此事伤心的时候，主用摩西出生三月就被投在水中出死入生的故事来安慰他们。

天程埋葬以后，主吩咐他说："小子！起来！日斯满了，时候到了！离开本乡。往我所要引领你的地方去吧！"

听了这话，尚节不顾一切，"不敢回头看那病中呻吟着的妻在流泪伤心，只得顺从主，背起十字架，走上各各他的路"。在葬儿三天后，尚节和家人话了别，带着一肩轻便的行李，便乘轮到上海去了。

离兴化以后，他回顾在故乡三年的工作，写了如下的话："回国以后，三年中作无定的奔跑，演打空气的斗拳，什么宗教教育，识字运动，家庭归主，青年团契，农村改革，社会服务……聚精会神去研究组织方法，到处倡导，以求实施实验，开花而不结实，反把那基本的生命问题和得救要道忽略了，无怪乎一切努力终归徒劳，虽曾引入加入堂会，却未尝引一人进入神国！"

二十七　初到华北　（1930－1931）

尚节在上海并没有停留，径赴湖州。那时湖州在举行一个华东基督化家庭运动，是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的几个干事主持的，都是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各省派来的代表，有百名以上，尚节是其中之一。在会中他是没没无闻的一个会员，穿的是粗布长袍，有时也穿破旧的西装，远不如别人之身

披重裘。很多人瞧不起他，以为他是不知那儿来的土头儿。在最初几天，他因为言语不通，在开会时总是默然不语，只按时分班到会，只听听别人提这件，议那件。直到有一天，主的灵催迫他，他才开口祈祷。

他的祷告充满着能力。祷告会毕，一位笑容可掬的外国太太跑到他面前和他谈话。她就是美国长老会广学会的梅立德夫人。她没有料到这一个土头脑的人，居然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觉得奇怪，而特别注视他，梅夫人于是介绍他和全国代表见面。尚节以后的工作，得她帮助不少。

梅夫人在谈话中知道他是个（科学博士）蒙主宠召作福音使者的留学生，便请他加她的一班，在班中请他做见证，请他报告在兴化三年做基督化家庭教育的方法与效果。以后别班也请他去做这一类的报告。最后一次，大会的讲员因事缺席，梅夫人便向大会主席介绍宋博士，请他对大会演讲。这样一来，传道的门便在湖州为尚节打开了。教会，学校，医院等，都接二连三的请他讲道。湖州于是便成为他本省以外做见证的处女地。

散会后，他由湖州到杭州，在一所小礼拜堂讲道一次，即匆匆回上海，受梅立德伉俪的招待，在他们家中小住。他们并介绍他到广学会讲乡村布道的经验，家庭礼拜的方针，和识字运动的实施，但尚节本来是受美以美会差派北上考察识字运动的，所以不能在上海久留，只得辞别了梅立德夫妇而遄往南京。

到了南京，他到金陵神学院参观；这是他曾一度入而未入的神学院。在那里他遇到他在兴化的高中校长章文新，他现在在这里做神学教授，同时在金陵大学兼任教职。他和他的太太招待尚节在神学院住了两天，考察他们的教材和方法，第三天，他便到下关，渡长江，到浦口，乘津浦车北上。

那时正是一九三0年十二月下旬，西伯利亚吹来的寒风砭人肌骨，生长在南

方而御寒衣服又带得不够的尚节，实在觉得难受。到了天津附近的昌黎，他住在杜牧师家里，享受殷勤的招待。杜是美以美会的牧师，又是俄亥俄卫斯理大学的校友，对尚节在美一切的荣誉早有所闻，正是倾慕已久，所以用不着什么介绍，彼此间已一见如故了。杜牧师劝他不必去考察识字运动；他说那是"运身而不动心的运动"，不是目前教会所需要的。目前教会外美中枯，所需的是教会领袖和信徒一个个的叫起来，儆醒等候再来的主。所谓农村改良，识字运动，其实毫不足道。他又偕尚节到山海关实际视察一番，尚节见其地的教友少而无知，就把这些"运动"一眼看穿，说道："我观其果而知其树矣！"

杜牧师介绍他去北平见教士（Rev. R. W. Backus）。 十二月卅一日 的晚上，尚节晤见了白教士，见他天忙于做训练二十多个传道士的工作。白教士就请他讲在福建三年的经验。几天以后，白教士介绍尚节到保定去。

时值严冬，朔风凛冽，冰雪载途。到了保定，时已夜深，尚节战栗着去叩某西教士之门。这位西教士初不知尚节是他的校友，见他衣衫褴褛，就叫他与堂丁同宿。这位同床朋友，脚臭得很，又天寒被薄，尚节终夜不能入睡。翌晨，这位西牧师问他是谁，他答道："我是宋尚节。"他愕然的问："哦，是宋博士吗？尚节答道"是的"，于是这位西牧师才改以上宾之礼款待他。

他邀尚节向五六百学生演讲，不料到会者仅五六百人。在保定时，尚节听说当庚子拳乱时，保定教友为道殉难者不少，就往他们的坟墓省谒。

从保定往定县，途中北风在冰天雪地中怒号，尚节衣裳单薄，"几乎把我冻死在车厢里"。到定县时又适在午夜，培增旅行之苦。

到了定县，他晤见了以平民教育负国际盛名的 晏阳初博士的印象："真是

名不虚传，他的教育方法确实新颖，别具心裁。最可敬的是精神饱满，所以成绩斐然。我真佩服到极点了。″

可是，夜里尚节在梦中得主的指示，说：″美丽芬芳的花朵，不过是暂时荣耀，不能结成果实；昙花一现，霎眼成空，但你要谨慎自守，从无花果树上去学光华灿烂的榜样，一梦醒来，尚节恍然大悟，次日即辞别招待他的晏博士而回北平。他本来打算在定县住一二个月，但因为得了主的命令，就只住二天就匆匆告别了。

二十八　从上海到南昌 （1931年春）

回到北平，一位长老会的教士请尚节在北平帮忙他至少半年，做训练传道人的工作。但上帝阻挡尚节，说：″你不可允许下来；这不是你所做的。我要你奉我的名去做比这更大的工作。起来！去奋兴全国不冷不热的教会，免得耶稣再来时被撇下。快传报主必快来的消息，预备新妇，迎接新郎。″

他婉谢长老会教士的邀请以后，即接梅立德 夫人自沪来信，促他南下主领上海南门清心男女中学的奋会。接信以后，尚节问明了上帝的旨意，就搭车回上海。

到沪时，适日本宗教家贺川丰彦博士在沪江大学演讲，教会领袖前往听讲者不下五六十人，尚节亦到会聆听。他们对尚节的学识与牺牲精神，也深表佩服，称他为″中国的贺川彦″请他领祈祷会。尚节在会中讲的是″耶稣宝血有能力″，″十架的功效″，和″重生被圣灵充满的必要″。讲了以后，尚节自他所讲的是不难为那些摩登派接受的，而他自己再也不肯象在美国时一样讲似是而非的社会福音了，便自请引退，不再领会。

尚节虽然不满贺川丰彦的社会福音，但是对他自己所讲的″圣灵充满″也一

样不满。他后来写道："岂惟听者藐藐，即言者又何尝知其所谓？那时我虽已悟及社会福音是空洞的，似是而非的，然自己对于基本要道，救人之法，仍然不得要领！"

在清心堂的领会中，尚节对清心男女中学的青年讲解圣经，并谈自己蒙恩的经过，受感的人很多。后来清心堂的汤仁熙牧师介绍他到宣道会的守真堂，鸿德堂讲道。他所讲的仍为他自己所不满意，"刮刮耳朵，而打不动人心，复有何用？"

这时，有一位西国朋友很诚恳地警告他说："上海西门斜桥伯特利教会，是富于感情性的，你万不可加入他们的教会。"尚节回答说："加入不加入是另一件事，我有机会去参观一次是无妨的。"

一天， 他果然跑到伯特利去访问。他们的领袖请他讲一次道。他讲的是"五饼二鱼"，听者有七八百人，都觉得还合胃口，遂请他主领查经班。他在班中讲马可福音，参加的人日见增加。但尚节自称："我依然注重奥秘，毫无能力，救不了人。扪心自问，宁不愧怍？"因此他谢绝伯特利布道团盛意的邀请，不敢加入，只答应在他们明年（1931）夏令会中担任主讲。

尚节虽没有加入伯特利，但为他们祈祷，求主于他们北上作环游布道时与他们同工。

尚节觉得他这回北上是受差会派遣，去考察识字运动，他得回去销差。因此他一心打算回兴化去。

尚节在等回兴化的时候，回顾以往的工作，自己下了如下的考语："'糊里糊涂，茫无定向'，味浮沉于新派潮流中，一味宣讲什么'奥秘'，结果是找不到出路。主云：'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可叹多少同工同事'

运动'，运了一法又一法，动了一期又一期，运来运去，动不了人心救不了灵魂！殊不知主来是要拯救罪人，救灵才是吾人当务之急啊！改造生命，岂不较改良生活更为基而彻底？"

正失败而失望之际，主突然为他开路，领他到南昌去，指示他以救人之法，使他灵程得到一个绝大的转机。

南昌美以美会的舒邦铎牧师（Rev.WilliamE.Shubert）寄给尚节一封迫切的信，请他一定要到南昌去领会；措词的诚恳，描写会众盼望之深切，使尚节不能不受感动。但伯特利的领袖，为了途中盗贼土匪猖獗，凭爱心劝他不要去南昌。同时尚节自己也"心在故乡飞，渴望回里一行，再出来做工，所以也无意前往领会，仍在盼望船到之日可以南回有期。"

忽然，上帝的话达到他的耳中，说："去！南昌工作的时间到了。你去吧，为我打美好的胜仗！"听了这话，尽管他如何思家心切，尽管途中匪势如何炽烈，也管不得许多了。次日既动身下船溯长江而上，驶向南昌去。

一九三一年二月中旬，尚节到了南昌。第二天上午，他对学生作见证，把主在他身上所施的大恩说出来，使他们对真理发生了兴趣。下午，在礼拜堂有奋兴会，可是会众尚不知奋兴会为何物，耐心等了许久，才有八九十人姗姗而来，以后逐渐增加，但也不过百余人。晚间在洗马池礼拜堂查经，查的是马可福音，第一晚到了八九十人，后来加到二三百人，虽道路因天雨泥泞，他们也打着伞到会。这样做了一个礼拜的工作，尚节自问："效果在那儿？"第二周假葆灵女校转向学界宣传，初亦无甚动静。尚节痛苦中向主发出呼喊："主啊！你叫我来只是刮刮耳朵么？为何我不能领人得救呢？"

南昌的教会领袖有意请尚节留赣一月，他们召集三教区男女传道士开传道

会。但急着要回闽销差，所以只好对他们说："我假期已到，理当回兴化，若你们急需我在此帮忙，我也乐意，不过请你们去电兴化给我展假一月吧。"他们喜出望外，立即去电代尚节请假。

因传道会会期未届，尚节先到九江讲道。九江的教友比较活动，第一次聚会便有四百余人。查经极受一般人士欢迎。见证则特别能感动青年，使一般男女学生都象渴鹿般开始爱慕真理。美以美会教会学校同文中学一校学生共约二百二十人，几乎全数归主，而且在开会后还组织布道团，在课余之暇，热烈出去布道。据九江人说这是一个空前的大复兴会！

回到南昌，距传道会开会期还有一个星期他们便请尚节做青年奋兴的工作。他对他们要求全体一致的祷告，来做奋兴工作的后盾。他说："若是你们西教士和学校教职员不和我同心合意绕城，耶利哥是塌不下来的。"

果然，西教士和教职员都分别组成祈祷会。尚节得到了这个坚固的支持，就勇气百倍。敢高举十安架向前冲锋了。

其实，为了南昌的大奋兴，祈祷的工作早已开始了。舒邦铎教士和一位中国同工早在一九三0年，曾以整整一个月的工夫，为他们的教会复兴祈祷。跟着在一九三一年的元旦，又开始作继续不断的祈祷，一直祈到宋博士到了南昌，计算起来，恰好五十天！在下章所述的尚节工作的转机，可以说是造端于这样殷勤诚恳的祈祷。

（引文结束）

++++++++++++++++++++++++++++++++++++

以下引述网文

https://www.cclifefl.org/View/Article/405

宋尚节博士日记失而复得

2016/7/26 16:45:04

读者:5767

宋天真

生命季刊 总第12期 1999年12月

感谢主，给我这样宝贵的机会，来述说神的奇妙作为。

文革开始不久，红卫兵大破“四旧”，我母亲的住处被抄，只给她留下10元人民币，几件衣物。圣经和爸爸留下的日记都被抄走了。红卫兵勒令我回家去破四旧，如果查出仍有四旧，就要我妈妈的命。那天晚上我用儿童车推了几车，把爸爸在美国留学，结婚及在各处领会的留影，许多大罪魁写的蒙恩见证，并将我丈夫的唯心宗教哲学，外文书籍等等全送交了红卫兵。

1970年，为去儿子学校开家长会，走到东城灯市口，突然被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韩主任叫住：“喂！今天可见到你了，你们家搬到哪里去了？我们要还

你们家一样东西。”由于我家搬迁了两次，他自然不容易找到我。主奇妙地让我们相遇，结果领回家一看，啊！一个大纸箱，其中，所装的竟然是我爸爸的日记有40多本，字写得像蚂蚁那么大。

1984年，我家已搬到郊外，在我因病休假中的一天，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催逼我非去学校不可。刚走到学校门口，一位负责人事的干部向我走来说："宋老师，太巧了，我正要到你家中问你有哪些被抄走的东西尚未归还。我建议你到仓库去找一下。"当时天气又冷，我说："刘老师，天气这么冷，怎么好意思让你陪我长时间来找呢！天暖再说吧。"我刚准备离开仓库的一刹那，就是这位女干部弯腰翻了她身边的一个筐子，我一下看到我姐姐天婴在上海灵修学院的毕业照。再往下一翻，竟有我爸爸四本毛笔字写的日记，还有他在疯人院的日记和妈妈回忆爸爸去世的情景所写的感恩记。我当时心中想："主阿，实在太奇妙了！这些宝贵的资料竟然在我学校仓库里18年之久，而我竟一点都不知道。"

由于丈夫经常埋怨我在文革中竟然将他许多难得的好书送走，我曾经到有关方面去为他要了几次，一本都没有要回来。而我爸爸的日记，我根本不敢要，那是神用奇妙的方法让当局主动还给我的。

1993年2月我移居美国纽约，在年底时，圣灵感动我去新加坡金练神学院，果然在那里找到我父亲在1938年9月到1939年年底在印尼、泰国的工作口述，吴静聆女士为他记录的材料，以及我所交上去的一些照片。

过去读圣经传道书3章6节"失落有时，保守有时"，只是一读而过。但是现

在我亲身经历了神话语的真实，我父亲在日记中多次写“信徒的经历是活圣经”，说得一点也不错。

我和妹妹天权在1942年同时悔改认罪。我亲自尝到救恩之乐，在我最爱主的姐姐天婴影响下，我也领主日学；住校期间，在不信主的同学面前晚上跪下祷告。每当布道会时，我们都积极请不信者赴会。

1955年肃反运动中，我的丈夫是王明道先生教会青年聚会负责人，也被捕入狱。我是所在学校肃反运动的批斗对像，停职反省将近半年，后来我的学校校长执行一条路线，哪个教师所教的班统考成绩分数高，谁就可以被表扬受到奖励。我好名的心极强，甚至有时搬到学校来住。后来发展到主日上午都给学习差的学生个别辅导。我过分的追求名，离主越来越远，有13年之久远离主。除了从未申请加入共产党外，我的言行和非基督徒也没有甚么不同。我母亲真是为我着急，母亲过去虽然重生得救却对真道不十分渴慕，但是文革中红卫兵得知她有一个判20年徒刑的女儿，将她的头发剃掉一半称为阴阳头，而且打了她。母亲亲自告诉我，就在她住的院子里，有一个男人活活被打死，临死之前疼得滚到她的身边，但是红卫兵打她时，她就是不觉得疼，而且还能有力量去扫大街。她在1944年父亲去世之前，腿上长牛皮癣，常去皮肤科医院就医，但是那次被打后，腿上的皮肤病好了。

有一件非常值得感恩的事，在文革前两个月，房东说她女儿要结婚，让我们腾出两房间，答应留下一间小北房给母亲住。我曾经去找过前面说过的那位韩主任，允许妈妈搬到我那边去住，而且我请求还我冬天棉衣及孩子的衣服，因此韩主任答应许可母亲搬到我那边。因为她被剃了头，我不让

她外出，而在房间小便，我发现尿盆里的尿是黑红色，这说明妈妈身体内部却是被打伤了，所以不疼是神行了奇事。特别燕京神学院刊物中曾刊载，安美华姊妹被打得内衣都烂了，就是不疼。神叫有的人像司提反一样为主殉道，有的人像彼得一样被天使领出监狱，正如圣经上所写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

妈妈有了这次奇妙的经历，又加上有一位老姊妹将未被抄走的大字圣经送给她，她的灵命确实有了大转变。我曾陪她去看一位得癌症的老弟兄，她竟向老弟兄说了四个字：“受苦有益！”

1980年1月15日是妈妈离世归主的日子。1月10日她进了医院，我的学生又要参加统考，在我服事妈妈的时候，她问我：“你对主的态度究竟如何？”我告诉她，我从1979年开始读圣经了，只是未告诉她，我要回到主的面前。她高兴地说：“那我放心了。”她叫我向姐姐妹妹发电报，姐姐妹妹都回来服事妈妈。1月15日我正在给学生辅导时，教导主任告诉我，你家里来电话说：“你母亲已经去世，送进太平间了。”

在整理母亲遗物那天晚上，看到她自己缝的密密麻麻的内裤和袜子，又发现她有两本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书，一本舒邦铎牧师写的《怀念宋尚节》，这本书使我知道舒牧师对父亲的评价；一本是刘翼凌教授写的《宋尚节言行录》，从中我看到父亲对我的爱。我向主流下忧伤痛悔的眼泪。我向主表示，我愿意再一次回到主爱的怀抱里。我开始读爸爸的日记。爸爸在1932年8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未知将来谁为我收成日记，追忆一生蒙恩的经历，可题名为《灵历集光》。”我决心完成父亲的遗愿，将使我受感动的部分摘录出来。

还有一个奇妙的见证。在我最远离主的时候，我甚至对神是否存在都有了怀疑。 我常在问，灵魂是否存在？我的信仰究竟是否麻醉人的鸦片还是永生真理？圣经的可靠性究竟有多少？在我整理父亲日记中，神使许多老信徒寄见证和照片给我，其中有那么多又真又活的见证。我也看了许多科学证道方面的书，使我的信心日益增长。无数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主是那样的爱我。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学校贴出了大字报，告诉全校我父母和姐姐都是什么样的人，学校说我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中学生一气之下，往我身上丢石头子和吐唾沫。有一个学生用弹弓打掉我一颗牙。如果当时打的是眼睛，我如何能看这蚂蚁般的小字呢？如果学生用弹弓打到我的太阳穴，我可能真会死去，今天活着就是主的恩典。

当我看到大陆教会内外公开刊物中，报导了山西省灵丘县桦皮庄过去是一个最黑暗、最落后的小村子，自从1980年有一位基督徒到这里传了福音，15户人家，14户都信了耶稣。原来男人都赌博，信耶稣后，没有一个人赌博，都努力生产。过去男人输了钱，一回家就打骂妻子，现在没有吵嘴打架的现像。过去乱搞男女关系，现在连淫词妄语都不说。过去盗窃成风，现在做到路不拾遗。许多信徒村经调查后，发现就是没有刑事犯罪份子。这个村过去年年向国家申请救济粮，悔改信福音后努力生产，如今家家有余粮。刊物中也写了江苏省有个村子里有名的母老虎式的女人，变作一个那样善良温柔的姊妹，人心被改变是最大的神迹。这样的见证太多了，怪不得我父亲在日记中道，有哪种工作比传道救人灵魂更光荣呢？实在比当总统还光荣，如果能多救灵魂，短命也无妨。

父亲日记失而复得是有原因的，因为父亲找到复兴教会的秘诀，他说：“除

去教会以外及个人的一切罪恶，乃是灵工的根本，人内心如果没有真正被主的爱改变，没有真正彻底的悔改，教会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复兴，只有宝贵的福音才能使人从内心深处改变，思想圣洁，言语行为才会圣洁。”《灵历集光》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一生立志竭力追求圣洁与爱心，永不会偏离左右。

从我家庭每一个人的经历中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神的恩典藏在苦难中。回忆以往所蒙主的大恩大爱，只有将荣耀、权柄、赞美归给那被杀的羔羊。

宋天真　来自中国大陆，宋尚节博士的女儿，现居北美。

（引文结束）

———————————————————————————————————

宋教仁以及其他中华民国早期相关人物

宋教仁、黄兴、陈其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廖仲恺、段祺瑞、黎元洪、张作霖、冯玉祥、汪精卫

（引述维基百科相关文字）

====================

https://zh.wikipedia.org/zh/宋教仁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钝初，号敦初，笔名渔父。出生于中国湖南省桃源县。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是中华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责任内阁制的政治家，担任过华兴会和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唐绍仪内阁的农林部总长、也是国民党的主要筹建人。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 、早稻田大学。1913年3月20日，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在上海北站遭黑道分子枪击，3月22日不治身亡，终年31岁。

生平

早年

清光绪八年（1882年）2月18日，宋教仁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上坊村湘冲一户书香之家。1899年3月，宋开始入桃源漳江书院肄业，即不务章句而深思夙夜悟道，讲求经世致用，喜爱刑法及地理等书籍，常与学友文骏等纵谈中西政治得失，及古今用兵成败。其居然大言不惭，如此好论列举天下事。人们视其为狂妄学生，不与接近，然而宋教仁视而不见，离开桃源漳江书院。两年后，即1901年，考中秀才。

1902年，宋教仁赴武昌投考美国圣公会中国差会文华书院普通中学堂，被录为第一。翌年入学，在校期间，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在武昌花园山的聚会吸引了他，常与同学议论时政，并走上了反清革命之道路。是年8月，黄兴到武昌，两人相识并从此成为挚友。不久，黄兴因激烈的反清言论，被驱逐出武昌，回到长沙。随后，宋教仁也回到湖南，为成立革命

团体到长沙、常德一带做联络工作。

1903年11月4日，偕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共同成立华兴会。1904年2月25日，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口号，正式在长沙西园成立华兴会，众人选出黄兴担任会长，宋教仁为副会长。宋教仁旋回武昌，倡组科学补习所，即此种活动之一环。6月，科学补习社举行成立大会，宋教仁任文书。10月，宋教仁自武昌经长沙回常德，聚集同志，筹划进行细目；嗣因饷糈缺乏，宋乃拟变卖家产以济需用，又苦于急切难成，遂决定赶往长沙另筹款项。11月5日，舟抵长沙，宋教仁登岸遍访各约定处所，皆封门，寂无人迹；至黄兴寓所，则看门人答：已出门十余日未归，不知何往？宋氏为之茫然。以为必有变故发生，信步街头，突然遇上同志曹亚伯，曹正惊宋之来临，亟需要宋教仁至圣公会堂，秘密告诉他：华兴会举义不幸先期泄漏，致被官厅破获，黄兴等幸而免脱，劝宋速避难他方。宋教仁闻讯后颇镇静，初拟即回常德速行破坏，以牵制省中之劫，祇以款项缺乏，终不得不依曹之劝告附舟东下，以追踪黄兴。宋遂潜赴日本。12月13日，宋教仁抵达日本，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成为中国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

1905年5月，宋到东京之初，与友人合办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6月，入读日本法政大学。7月，在宫崎滔天的介绍下结识孙中山。8月，支持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并当任其司法部检事长。11月，于东京创立《民报》，为中国同盟会机关报。12月，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文部省的《取缔清国人留日学生规则》而自杀，宋教仁将其遗体收回，呼吁留日学生回国。

1907年孙中山与黄兴就国旗发生争执之后，宋教仁因误会对孙中山产生恶感，认为同盟会人心不齐而难有作为，谋求“另外早自为计”，辞去了在东京本部担任的职务，3月与日本大陆浪人古河清等人前往中国东北动员“马贼”，6月被张继从奉天请回后，投入了第一次倒孙高潮，支持章太炎反对孙中山在日本购买军火。《民报》风波平息后，宋教仁对同盟会总部和孙中山的不满情绪没有消除。广州新军起义后，他与谭人凤、居正等商讨成

立专注长江流域的革命机关。1910年7月，11省区同盟会分会长举行会议，决定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

1911年，宋教仁到上海组织反清运动，在于右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并与陈其美筹建中部总会。7月31日，宋教仁参加了同盟会中部总会于上海四川北路召开的成立大会，任文事。该分会体现出了独树一帜的分裂意向。赴香港参加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7月，与谭人凤、陈其美等在上海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邀请或派人来往于上海、长江中下游各地，促进革命势力的发展。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28日，与黄兴一同抵达武昌，参加革命政府的法律工作，参与起草《鄂州临时约法草案》。11月13日，离开武昌。与北一辉（1907年夏，因张继介绍，进而成为知交好友）乘船至南京下关，时张勋已控南京，宋教仁豪壮对北一辉言道："不如一起进城吧!进城看一看具体情况，或许能找到什么对付的办法！"并对革命党人倪铁僧道："吾今日已置死生于度外，但你必须保护外国友人（按：指北一辉）的安全。"（详《支那革命外史》），之后当革命党拿下南京，宋以其卓越手腕，调和诸将矛盾，于孙文回国前，掌握南京政务。

民国成立

1912年（民国元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被任命为法制局局长，起草了一部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2月1日，宋教仁自桃源起身，经长沙、汉口沿江东下；嗣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宋任政事部主任干事。4月27日，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7月，因不满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辞去农林总长之职。7月16日，中国同盟会本部举行全体职员大会，讨论会务。代理总务部主任干事魏宸组提出拟改定名称组织完全政党案。7月21日，当选为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主持同盟会工作。8月5日，宋正式与统一共和党谈判。协定原案用"民主党"，嗣因反对者多，遂改用"国民党"，盖共和之制，国民为主体，欲使人不忘其义也。8月11日，举行正式筹备会议，宋被推担任临时主席，宋并代表中国同盟会、谷锺秀代表统一共和党、徐谦代表国民共进会、许廉代表共和实进会、虞熙正代表国民公党，分别报告各党均经集会一致议决赞成合

并。8月25日，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国民党成立大会，宋教仁当选为理事，并任代理理事长。会议期间，同盟会女会员女权运动领袖唐群英因国民党党纲中没有“男女平权”的内容上台质问宋教仁，宋教仁支吾不能答，唐群英遂揪住宋教仁的头发向宋左右颊掌击，全场大骇，并在会后写了《驳诘同盟会传单》，抨击宋教仁等人。

彼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党员士气高昂，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至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宋亦随地推广宪政理念，其要旨是产生纯粹的政党政治，由国会多数党领袖任内阁总理，负起政治责任，组成责任内阁；由此先制宪，再依法选举总统。

遇刺身亡及遗言

1913年，中华民国国会大选，国民党大获全胜，获国会压倒性多数席次。宋教仁正欲循欧洲“内阁制”惯例，以党魁身份组阁。自国民党重要人士群集沪滨，商讨应付国会之党略，大纲既定，宋即拟挟至北京党本部决议施行，适袁世凯亦电促赴京，宋因订期3月20日若干国会议员同行北上，是晚22时45分甫步入上海车站（老北站，现上海铁路博物馆），即遭预伏杀手狙击，腰部中弹，子弹射入其右肋，斜入腹部，凶手开枪后逃逸。

宋教仁疼痛难忍，趴倒在一张椅子上，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当时在火车站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在医院中他向于右任留下遗嘱：

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他并授意黄兴代拟电报给袁世凯，讲述自己的中弹经过和革命生涯，电报原文如下：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

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宋教仁。哿。

手术后，情况没有好转，大小便中出血严重；3月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3月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身亡，噩耗传去，全国人心鼎沸。

思想

在辛亥革命前，宋教仁与陈天华等人主张宣扬民族意识、宣传排满，并把排满与反对外国瓜分联系起来。他极为热衷宣传民族主义，通过采用黄帝纪年来取代帝王纪元，刊登黄帝画像以激励炎黄子孙，还在杂志上刊载文章反对满族统治以抵制帝国主义瓜分。

主张“责任内阁制”，认为“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

“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是皆当依法理，据事实，以极细密心思研究者”。认为只有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才是救治“不良政府医生”。由于极力推崇议会制度，当时政坛上都给他取了个绰号为“议会迷”。

后世追悼

民国初始，有的人忙于权力博弈， 却也有一批试图在早已经陷入恶性专制循环的土壤上推进宪政的人士，他们的代表除组建国民党的宋教仁外还有进步党的梁启超、汤化龙。汤化龙和宋教仁虽然分别属于争锋相对的两大政党，但他们却有着符合现代议会民主特征的友谊。武昌起义期间，他们携手制定了第一部约法《鄂州约法》。宋教仁遇刺身亡时，虽然不同政党党魁的汤化龙尤为悲愤，写下挽联“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讫，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黄兴亦有挽联：“前年杀吴禄

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赵秉钧，我说却是袁世凯。”

宋教仁遇刺之谜

袁世凯的嫌疑

目前史学界认为嫌疑最重之人还是袁世凯，持此观点者认为中华民国国会选举前后，宋教仁积极主张之内阁制会危及袁世凯的统治地位，因此袁世凯要暗杀宋教仁。

袁世凯一向喜用刺杀手段，1885年11月11日谒见朝鲜国王时建议其刺杀朝鲜开化党领袖金玉均，1886年时又与李鸿章商议此计划，后来因刺客暴露而计划失败。

1911年袁世凯通过段祺瑞买凶，刺杀了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1912年担任内阁总理大臣以后，又通过袁克定找到同盟会员汪精卫，由汪精卫交黄复生，黄复生指使彭家珍刺杀了其政敌良弼。

在宋案发生以后，民主革命家林述庆公开斥责袁世凯刺宋，表示要回南方召集旧部反袁为宋报仇，在1913年4月10日被毒死于袁世凯秘书长梁士诒宴席上（见福州档案局林述庆烈士资料）。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致电香港情报人员企图暗杀孙中山。

1915年陆荣廷之子陆裕勋请假回广西看望父亲，在汉口暴毙而亡，这又是一个悬案，可这个事件没有证据能证明是袁所为，但陆荣廷通过情报网认为是袁所杀，应该有他的道理（见《北洋军阀史话》）。1915年蔡锷从从滇越铁路进入云南时，遭遇袁世凯所派刺客的暗杀，但成功躲过一劫。

因此学界一般认为，此案极有可能为袁世凯所为，当然也有一些人提出其他观点。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后，根据警方调查，袁世凯心腹、国务总理赵秉钧是重大的谋杀嫌疑犯，而袁世凯亦涉嫌。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应桂馨认为时机已到，公然发出“请平反冤狱”的电报，并毫不避嫌地跑到北京，写信给袁世凯要求实践当初“毁宋酬勋”的承诺。袁世凯如果授予他勋位，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刺杀宋教仁的主犯，这让袁世凯非常头疼。其后应桂馨

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被京畿军政执法处的侦探长郝占一和另一侦探王双喜刺死，而最后郝、王两杀手也不得善终。这一连串的离奇死亡事件很难自圆其说，更使袁世凯的嫌疑加深。

宋教仁此次北上，如果与黎元洪联合反对袁世凯，则袁世凯将失去一切政治筹码。这是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的最大动机，宋教仁死后黎元洪通电全国称放弃竞选，拥护袁世凯。在此后袁世凯雇佣流氓、地痞包围国会，强迫议员选他，不选不准吃饭，这才成功当选。（见《北洋军阀史话》）袁世凯之老奸巨猾早在前清时已臭名昭著，因此宋死后，孙中山、黄兴等人已无法寄望能以和平手段解决此问题，而是果断发动了二次革命。

赵秉钧的嫌疑

持此观点的赵秉钧的杀人动机非常简单，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后，宋教仁将替代赵秉钧担任总理一职。此说还提出了证据，称巡捕房在对应桂馨搜查时，意外于1913年3月24日抓到刺宋的直接凶手武士英。武士英供认是应桂馨让他行刺。此外巡捕房还在应桂馨的住宅搜出作案凶器及一批电报和信件。"毁宋"一词来自赵秉钧的秘书洪述祖致电应桂馨："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3月14日，应桂馨回洪述祖的"寒电"电文是："梁山匪魁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乞转呈，候示。"3月18日，洪述祖复应桂馨电："寒电立即照办。"3月19日，洪述祖又电催应："事速照行。"3月21日凌晨两点即宋教仁遇刺不久，应致洪电："二十时四十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3月21日，应致洪电："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等。赵秉钧则极力否认与此案有关。3月26日，赵秉钧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各省称："据应夔丞二十三日函称，沪上发现一种监督政府、政党之裁判机关，宣告宋教仁、梁启超、袁世凯、赵秉钧、汪荣宝等之罪状，特先判决宋教仁之死刑，即时执行。"当时此通电不但没能将公众视线转移到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凶嫌"沪上裁判机关"上，反而暴露了赵秉钧的国务院和直接凶嫌应桂馨当时的信函往来。一个月后，武士英死于狱中。

陈其美的嫌疑

陈其美（1878年1月17日－1916年5月18日）表示，宋教仁被杀是袁世凯最毒的阴谋。最后，陈其美在上海被暗杀。
一直以来都有人对于宋案另有看法，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对破案出了大力的青帮大头目、国民党元老陈其美颇有嫌疑。中华民国国务院档知袁方对宋案发表之声明，即多方罗织陈其美："宋在南方主张袁为总统，而己任内阁，陈其美一派深忌之，黄亦恶其不举己为总统，且疑其为亲袁派也亦欲排而去之。陈于是乘其隙，日嗾其徒，唱为黄之说，以离间黄、宋之交，而使他日内阁总理之归之于己，宋、陈之间暗潮已极激烈，应本陈旧部，武又黄之私人。"
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撰写的《辛丙秘苑》一书讲述了自己从1911年到1915年的见闻，书中披露，袁世凯多次派密使与宋教仁接洽，欢迎他北上，宋教仁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在北上临行之前，陈其美、应夔丞等人询问宋教仁关于国民党内阁的组织办法，宋教仁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听了宋教仁的想法后，应夔丞骂宋教仁是叛党，并企图当场杀害宋教仁，但被在场的人劝阻，宋教仁见此举动，便说："死无惧，志不可夺"，最终大家不欢而散，陈其美和应夔丞对宋教仁的痛恨加深。在随后的几天里，陈应两人商议对策，宋教仁3月20日遇刺身亡。应夔丞深知兼任总理的内务部总长赵秉钧害怕宋教仁抢夺他的位置，就通过他的秘书洪述祖骗取来自赵秉钧的密电密信。起初的目的只是邀功请赏，后来这些密电密信便成了充当了嫁祸于袁世凯的文字证据。
需要注意的是，1913年3月宋案发生时上海的最高军政长官并非前沪军都督陈其美，也非案发后北京政府于1913年7月委任的上海镇守使郑汝成（1915年11月10日在上海外白渡桥被陈其美派来的王晓峰、王明山投弹炸死）。1912年7月31日沪军都督府撤销，改为江苏都督行辕，上海事务由江苏都督程德全（以及江苏民政长应德闳）接收。
宋教仁的政治主张一直是效法英国政党政治，由多数党组织责任内阁，不太可能说组织政府要大公无党，因此此段叙述真实性值得存疑，但其观点相当有研究价值。

应桂馨与帮会分子的嫌疑

而东华大学廖大伟教授则从民初帮会与革命党交恶、与社会关系紧张的视角，重新阐释这一血案：应桂馨是中华国民共进会（1912年7月由青帮、洪门、公口等帮会联合发起，成立于上海）会长，在社会转型中角色与地位与革命党形成落差，因而产生报复心理；宋教仁在国民党内的实际地位和未来政治角色，决定了他不幸被选为报复对象。

洪述祖自作主张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尚小明在其著作《宋案重审》中认为，刺杀宋教仁的主谋是洪述祖，是他知道袁世凯要对付国民党和宋教仁，所以“揣摩上意”有此行为。同时，他也指出，“宋案”实际上是由收抚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以及刺杀宋教仁等七个环节次第演进与交错进行而酿成的复杂案件。宋案诸环节中，袁世凯主导了前四个环节，但他与刺杀宋教仁没有直接关系。在袁世凯主使下，洪述祖在1913年2月通过应夔丞阴谋构陷孙黄宋，但未获得任何材料。洪于3月7日至10日间晋见袁世凯，暗示杀宋，提出“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之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二人，以警其余”。袁未同意，称“反对既为党，则非一二人之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且洪在进京见袁之前，已于3月6日自天津私宅向应夔丞去函，授意其伺机除掉宋教仁。赵秉钧与陈其美也与刺宋毫无关联。赵秉钧与洪、应均无私人关系，且缺乏刺宋动机。陈其美与洪、应亦无密切关系，并无证据说明陈其美指使洪、应刺宋。当时流传的陈其美主谋杀宋言论，均来自亲袁报章和应夔丞党徒的宣传。

宋教仁墓

宋教仁墓地在上海闸北，名曰宋园（今闸北公园内）。建铜像作支坐侧思状，凿石为座。座之正面阳篆刻“渔父”二字，章太炎书。背面则阴刻铭文，于右任撰书：“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

呜呼”墓地近似正方形，四周砌有二十四根圆头方柱，连成石栏。墓寝坐北朝南，为半球形，墓前立有墓碑，上书：‘宋教仁先生之墓’，系集孙中山墨迹而成。宋墓顶上有一脚踩青蛇，展翅欲飞的雄鹰，象征着宋教仁一生不断为了宪政的理想，而与保守的旧势力作顽强斗争的精神。墓地南隅、正中左右树有石柱两根为出入口，置八级台阶，供拾级而上。墓区正中石柱顶端耸立着宋氏西服坐像，以大理石雕刻而成。墓区广场及通道均系花岗石砌成，周围广植龙柏、广玉兰、香樟和月季等各种花木，整个墓园庄严肃穆。

后世评论

宋教仁
孙中山认为，宋教仁“乃为中国宪法而牺牲之第一人”。
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日报》评点孙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
蔡元培在《我之历史》序言说：“（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
吴相湘认为，宋教仁一方面努力推进民主政治，同时更力言中国绝不能引用共产主义，且明白指出中国如实行共产主义之种种不幸恶果；因而坚决主张国家社会政策。
政治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孙善豪曾经评论宋教仁对国民革命与中国近代的意义，其大略如下：
宋教仁首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目标在于鼓吹湖广新军的觉醒，间接促成了武昌起义。宋教仁曾提议革命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京师起义、中策长江起义、下策边疆起义。孙中山的十次革命，一般都属于下策中的边疆起义。黄花岗之役后，同盟会人心涣散。宋教仁与谭人凤等乃毅然在上海另起炉灶，独立执行中策，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以“共进会”与“文学社”为基础，在两湖新军间鼓吹革命，于是乃有武昌起义之成

功。

民国成立后，宋教仁将同盟会与其他小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当时孙中山主张同盟会仍然为地下革命组织，随时准备继续革命。宋教仁则主张将同盟会公开化，以堂堂政党之阵势，藉选举取得政权。宋教仁路线不仅获得了同盟会多数之支持，并且继续与其他小党合并，终于组成国民党，而在国会大选中取得了多数。许多后来著名的民主人士如张东荪、沈钧儒、徐傅霖、罗文干、石志泉等，都是当时这个国民党的核心成员。

宋教仁的著作

《我之历史》，六册，1920年湖南石印本

《二十世纪之支那》，一册，1905年5月东京铅印本

《醒狮》，四册，1905年9月东京创刊

《民报》，二十六册，1905年11月东京创刊

《间岛问题》，六册，1908年上海初刊本，1914-1916年地学杂志重印本

《民立报》，六册，1910年10月11日创刊，上海印行

《比较财政学》，日本小林丑三郎原著，宋教仁译，1911年上海印行

==================

https://zh.wikipedia.org/zh/黄兴

黄兴（1874年10月25日－1916年10月31日），原名轸，字廑午。后改名兴，字克强，湖南长沙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号庆午、竞武，曾用名李有庆、张守正、冈本义一、今村长藏。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著名的革命家。辛亥革命时期，与孙中山常被时人以“孙黄”并称。1916年10月31日，

黄兴于上海去世。
1917年4月15日，黄兴受民国元老尊以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著有《黄兴集》、《黄克强先生全集》、《黄兴未刊电稿》及《黄克强先生书翰墨绩》刊行。

早年经历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9月16日，黄兴在长沙市郊善化县的一个地主家庭诞生。父亲黄筱村是晚清秀才，母亲罗氏出生名门，养育了2男4女。黄兴在6个兄弟姐们中排第六。黄兴幼年时思想受湖南的明末大儒王夫之的影响很深。黄兴22岁中秀才，在读书之余亦喜爱武术，曾拜拳师李永球，学习巫家拳。
1898年，黄兴受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荐，入武昌两湖书院读书，开始同情维新运动、认同变法主张。 1902年，湖南官绅开始选派公费生东渡，并将留日自费生之贫苦者亦悉化为公费。黄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黄兴、杨度等既至东京，时与日本师友接触，问学研讨之余，深感救国之道，必先有理论，而后有事实，有学术而后有政治；尤须破除过去定于一尊之学风，始能尽除保守濡滞之积习；而介绍东西洋自由之学说，尤为开启新机运之前提。10月，黄兴抵达日本后不久，即和杨笃生等因之相与集议创刊《游学译编》。黄兴并组织“湖南编辑社”，介绍西方科学与文化。

中年经历

1903年，沙俄向清朝提出7项要求，企图侵占中国东北地区，此举触及日本，东京《朝日新闻》首先刊载，留日学生遂于神田锦辉馆召开学生大会。4月29日，留日学生决定组织义勇队抗俄以为国民倡导。据统计，各省留学生到会者500余人，通过成立拒俄义勇队，推陆军士官学校蓝天蔚为队长，成员有黄兴、杨守仁、陈天华等，日日操练，意欲随时开赴前线。当中，尤以青年会成员最为积极，他们大都参加“拒俄义勇队”，130人表示愿赴战场者，50人留东京办事者，有女留学生愿担任看护。留学生正欲改名

学生军，在清朝压力下，日本政府勒令解散。5月10日，留日学生惟有在学生军集会上，议决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以便跟进事态发展。其精神则不变，且公推代表二人回国，请袁世凯主战。北京大学堂及上海教育界均覆电赞成，并纷纷集会，扩大宣传力量。5月，黄兴于弘文学院毕业。

是年6月初，黄兴自日本回国，在湖南、湖北酝酿新行动。黄兴回到上海，途经武昌时，黄兴返回母校两湖书院发表演说，武昌府知府兼院长梁鼎芬奉上令，将黄兴驱逐出湖北省境。6月21日，清朝命令严厉缉拿倡言革命之学生，意图以高压手段镇压风潮，然而大势所趋已不可遏阻，留日学生各种刊物均废光绪年号，直书黄帝纪元。黄兴于是将随身所携带4千余册《革命军》和《猛回头》分发给军学各界，然后登轮返回湖南。黄兴至长沙应聘明德学堂主讲席，课余则秘密进行革命活动。黄兴在长沙创办日语学校“东文讲习所”，并翻印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大量革命人士的书籍。

反清革命

黄兴于1903年12月在湖南成立之华兴会以及1904年在上海创立之光复会等组织。1903年11月4日，他以其虚岁三十大寿为由，卖掉自家庄园36亩土地，邀集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周震鳞、胡瑛、张继等十二人，在长沙坡子街附近的保甲巷彭渊恂宅集会，以兴办矿业为名成立华兴公司，口号是：“同心扑满，当面算清”。华兴会遂于长沙创立。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龙璋的西园寓所正式成立。华兴会之创立，以湖南、湖北留日学生及各学堂学生为主体，酝酿已久，《游学译编》之所论列，即其宣传理论及沟通意见，而今可以行动。黄兴处事素来沉毅慎重，故此华兴会创立之日，黄被公推举为会长后，即首先提议：望诸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于是会众分门别類，各认职务，积极进行。以“驱逐韃虏，复兴中华”为革命口号。科学补习所既成立，适值黄兴自上海经武昌回湖南，科学补习所开会欢迎，黄提出华兴会预定是年11月16日，乘慈禧太后七十生辰起义计划，当经一致表示赞同，并约定湖南发难，湖北响应，从此工作进行，益趋积极。自华

兴会成立，黄即思会众多属学界，恐与哥老会党众或多隔阂，以刘揆一曾获交哥老会大龙头马福益，因以联络会党之责，另设一同仇会以支配，使哥老会与华兴会总部不相直接，藉防机密偶然泄露，有碍大计。哥老会众继加入同仇会者以万计，黄因仿日本将佐尉各级军制编组为革命旅，自任大将兼会长职权，刘揆一任中将掌理陆军事，马福益任少将主会党事务；旋复商订乘慈禧寿辰起义计划，并拟定长沙省城以武备学堂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随后约半年时间，华兴会大力招募会员，并在外地设立分会，同时联络其他同性质的组织，议定于农历十月十日慈禧太后70岁生日大宴时在长沙起义。不久，黄兴变卖长沙的祖屋、田产多处筹集革命资金，并在长沙小吴门正街创办东文讲习所作为活动据点。

1904年夏天，杨守仁即偕两同志设机关于天津，潜居京城数月，无隙可乘，乃失意南归，得知黄兴在湖南起义计划，杨守仁乃留守上海，与章行严等密设爱国协会，以为接济，并结合留日和省同志，遥为声援。10月24日，由于起义的风声走漏，官府派兵查封华兴会，策划长沙起义未成。黄兴住宅被围，幸而黄兴外出，躲于龙璋家中，再秘密隐居圣公会三一堂（今基督教北正街教堂）近一月后，从长沙转移到上海，再逃往日本。次年黄兴再次回国策划起义，失败后再次折回日本。

同盟会时期

1905年7月，他结识孙中山，在日本拥护孙中山组成中国同盟会。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黄兴任执行部庶务（行政庶务组长兼任副会长），居协理地位。成为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领袖，当时号称孙黄，之后主要发展革命分子、组织武装起义。

1907年夏，到越南河内，与孙中山一起策划在南方起义。9月，黄兴先后参与或指挥钦廉防城起义；12月发动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

1908年3月，黄兴等人由安南再次进入广西，率领200余人在钦廉上思起义，与2万清军周旋月余，并激战数十回，大破清军。后弹尽粮绝，以四人而御六百敌军，机智从容退回河内。之后云南河口起义，都遭失败。

宣统元年（1909年）秋受孙中山之托，在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

次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再次失败。
1910年11月3日，与孙中山等在南洋槟榔屿（马来西亚）集会，决定在广州再举行起义，与清军决一死战。
宣统三年三月（1911年4月23日），副总指挥黄兴与总指挥赵声领导第三次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黄兴率领敢死队进攻督署。他首先发难，连发三弹，率敢死队百余人，攻入两广总督辕门，发现总督张坚白已逃跑。此次起义多人牺牲，事后收敛殉难者遗体，有八十余具，察实身份者七十二具，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黄兴指挥队伍杀敌，战至最终只剩他一人。右手负伤，断两指，逃到广州河南女同志徐宗汉家，由她护送至香港就医。到了香港，黄兴入雅丽氏医院做手术，按医院的要求，做手术需要家属签名同意，最后徐宗汉以黄兴夫人的名义签字。黄兴于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一役失败之后痛心多数青年同道之损失，及海外华侨捐款之虚掷。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28日，黄兴由上海到达汉口，被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指挥民军和清军的战斗。革命军总司令黄兴在汉口、汉阳对清军作战。苦战20余日后，民军退至武昌；此时，黄兴认为应转攻南京，遭当地革命党人反对，乃辞职去上海，设临时元帅府于上海白克路九十二号。时庆亲王奕劻私召袁世凯部属杨度，交五十万两予杨度以图收买革命党。杨度到上海后通过唐绍仪介绍与黄兴见面，以约十万两贿赂，之后黄同意清廷优待条件。黄兴于12月赶往南京指挥战事，并于12月2日一举攻下南京城。
在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相继光复后，黄兴到上海。12月4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却召集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在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举行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先后推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和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均未赴任。同时议决公电孙中山归国主持大政。黄兴参与南北议和谈判。后改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
民国时期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兴任陆军总长兼任参谋总

长，授大元帅军衔。16日，中华民国自由党举黄兴为副主裁，黄辞谢。2月，黄兴在南京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革命先烈追悼会演说。

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3月30日，袁世凯任黄兴为参谋总长。临时政府北迁北京，3月31日，袁世凯任黄兴为南京留守，仍统辖南洋各军，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凡南方陆军水师要塞，均归留守处理，随时通报陆、海军部及参谋部；关于留守辖范围内所需款项由留守咨商理财部筹解；南京留守府，俟南方军队整理就绪，即行裁撤。袁世凯另任徐绍桢为参谋总长。后来因没有经费，军队哗变。6月14日，黄兴辞卸南京留守。黄兴退居上海。8月13日，孙中山、黄兴联名通电各支部报告同盟会扩大改组为国民党。黄兴任理事。8月17日，孙、黄已同登海轮，忽接北京同志来电以张振武案发生，暂缓启行，黄即舍舟登岸并电诘真相，惟孙决心践约，仍鼓轮北行。8月24日，孙行抵北京，英国路透社因而大力赞其度量超人万万，中国党争自能无形消弭。

10月，黄兴自北京归湖南，袁世凯为了拉拢黄兴，特派员到长沙，以貂皮大褂赠黄母，并任命黄兴为粤汉铁路督办，该职位为油水多的优差，袁世凯给黄兴的密电中有“毋再高尚”一语，当时黄兴从人甚多，经济难以负担，谭延闿与胡元倓也力劝黄兴接受，黄兴本人也欣然接受，但正式任命状到时，上面有“交通总长朱启钤呈请任黄兴为粤汉铁路督办，应照准”一语，也即该职位应受交通总长节制，黄兴对此很不满，但勉强接受。11月，黄兴至汉口视察，与交通部争论权限划分之事，朱启钤坚持该职位必须受交通部路政司管辖，最后，黄兴放弃，乘兵舰赴上海。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即遭预伏奸徒狙击，腰际中弹，抢救无效，3月22日不治身亡。7月，孙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7月14日，黄兴由上海至南京，次日强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9月，南京被北洋军攻陷。失败后黄兴流亡日本。

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黄兴未参加。于7月8日乘船离开日本赴美国（15日到达）考察，宣传反袁思想。

1915年12月15日，袁世凯称帝。黄兴仍积极策动讨袁，与孙中山呼应。黄兴派人促进云南护国军起义讨伐袁世凯，并在美洲为蔡锷率领的云南讨袁护国军筹措军饷。1916年6月，因孙中山、蔡锷多次电催，于是他由美国赶往日本，为国内反袁斗争筹款购买军火。当月袁世凯忧愤而死。7月4日，黄兴返回上海。

由于长期为革命事业而奔波，积劳成疾，1916年10月10日，黄兴因胃出血入院，10月31日，最终因食道与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肝门静脉高压所致；根据其死前多次大量吐血以及肝肿大所推测，为肝硬化常见之并发症）在上海去世，时年仅42岁。孙中山亲自主持治丧活动。

次年4月15日国葬黄兴于长沙岳麓山云麓峰下小月亮坪。

与孙中山的关系

清末的重要革命团体和革命活动，多为孙中山与黄兴所谋划组织。

1905年，孙中山所建立的兴中会与黄兴所建立的华兴会等团体，在日本东京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成立会上，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孙中山被推为总理。当时同盟会以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三个团体最具规模，成立会上兴中会有代表三席次、光复会有十多席、华兴会则拥有五十多席，推举孙文上位的行为也充分展现了两人的情谊。

1906年，在讨论中华民国国旗时，孙中山主张青天白日旗。黄兴主张用井字旗，以示"平均地权"意——即中国历史井田制社会意义，认为青天白日旗旗的形式不美，并认为与日本国旗与军旗相近，有日本并华之嫌。孙中山嫌井字旗既不美又有复古思想，没有革命意义。双方争执不下，孙中山坚持己见，黄兴力争不得，甚至大怒，誓言要脱离同盟会籍。章太炎、刘揆一则从中调解，暂时搁置议案。这是辛亥革命以前孙、黄最大的一次分歧，后黄兴"为党与大局，勉强从先生意"，放弃自己主张，孙文也改造了青天白日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1907年，光复会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以潮州起义失败为由，要求罢免孙中山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黄兴推辞。最终光复会退出中国同盟会。

1909年秋天，陶成章等起草《孙文罪状》，再次对孙中山发难，要求改选同盟会总理。黄兴极力抵制，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表示“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尔后陶成章被陈其美遣人刺杀于上海广慈医院，杀手为蒋介石。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几次“倒孙”风波中，黄兴素以“成事不必在我”的信念，坚定地拒绝名利的诱惑，其大公无私和忍让顾全的态度，赢得了多数民国元老乃至于后世人的敬重。

往后，孙黄在1913年宋教仁案发生后，针对讨袁的方式时再次有分歧，孙中山认为应该武装反抗，而黄兴认为应该寻求司法，走和平路线。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黄兴响应起义，不久失败。孙中山把这次失败原因归结于党员不听话，特别是黄兴不听他的领导，要另组秘密的中华革命党，以服从他为第一要旨。最后黄兴并未加入孙中山当年7月所成立的中华革命党，而离开日本前往美国。在旧金山时他接到一些拥护者的来信，希望他另行组党。黄兴回曰：“领袖惟有孙中山，其他不知也！”

1916年黄兴逝世后，孙中山闻讯后悲痛欲绝，第二天即发函海内外哀告黄兴逝世消息。过去讣告多由死者亲属发布，而黄兴逝世讣告则由孙中山单独署名发布通令全国全党，以示创立之义举。1917年4月15日国葬黄兴于长沙岳麓山云麓峰下小月亮坪。

评价

一般认为，孙中山是思想家、先行者，黄兴是实干家。许多重要的革命活动由黄兴所发动并亲自参与。他出生入死多回，最终积劳成疾而中年逝世，是推翻清朝统治、开创民国的元勋。革命时虽然与孙中山有所分歧，但并未夺权而是甘心居次席，鼎力相助之。由于黄兴的派系人马在蒋介石北伐后备受忽略，其生前的重大贡献、理念和计划也长期被搁置。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孙黄并称”被“孙陈（其美）并称”所取代。直到1990年代，海峡两岸才开始重新重视黄兴的功业。

建立民国后，他初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但并未接受，而是推举即将回国的孙中山。

袁世凯在亲信面前曾自信地评比孙中山、黄兴："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

黄兴逝世时，在日本疗病的同乡蔡锷万分悲伤，写下挽联："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不久蔡锷也因病逝世。两人同葬岳麓山。

据说章太炎的外号"章疯子"乃出自于盛怒中的黄兴之口。章太炎很敬重黄兴，曾愿拥戴黄兴为同盟会领袖。在黄兴的追悼会上，章太炎送的挽联写道："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冯自由评价黄兴说："世称孙、黄为开国二杰，克强诚当之无愧矣。"

汪兆铭诗（1938年）:黄花岳麓两联绵，此日相望倍惕然。百战山河仍破碎，千章林木已风烟。国殇为鬼无新旧，世运因人有转旋。少壮相从今白发，可堪揽涕墓门前。

同盟会元老胡汉民曾评价黄兴说："黄兴是个标准的'湖南骡子'。更隐藏'老子不信邪'的脾气，其雄健不可一世，处世接物则虚衷缜密，转为流辈所弗逮。先生使人，事无大小，辄日慢慢细细。传闻耳熟是语，以为即先生生平治己之格言。"

黄兴的幕僚李书城，评价黄兴："克强总是个最平实的人，做事有功不居，光明磊落，作战身先士卒，爱护袍泽，做人推诚务实，容忍谦恭，受谤不言诠，受害不怨尤，不道人之短，不说己之长。"

章士钊评价黄兴："吾持以论交之武器，在'无争'二字，然持此以御克强，则顿失凭依，手无寸铁。何以言之？我以无争往，而彼之无争尤先于我，大于我……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黄克强！"

杨度："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纷驰，肝胆至今推挚友；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自古困英雄。"

家庭

第一任妻子为廖淡如（1873-1939）。长子黄一欧，中国同盟会会员；次子黄一中，曾任国民政府铁道部参事、内务部统计司司长；五子黄一寰，后

改名黄乃，为遗腹子，日本问题专家，拼音盲文体系创建人，被誉为“中国盲文之父”；长女黄振华，立法委员，其夫陈维纶为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三女黄德华，其夫薛君度为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以辛亥革命研究见长。

次女黄文华，来历不详，生于日本，马来亚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其夫为黄文山。

第二任妻子（重婚）为徐宗汉（1877-1944）。三子黄一美，其妻张瑛为张继之长女；四子黄一球，中华航空公司机械总工程师，其妻程博德为程潜之女。

纪念

1911年11月3日，湖北军政府在武昌阅马场用木料搭台举行拜将仪式，黎元洪向黄兴授战时总司令印、旗和剑。今天的拜将台遗址被公布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1917年4月15日，在蔡锷国葬岳麓山之后3天，黄兴也国葬在岳麓山，并修有黄兴墓庐。1918年10月，在日本横滨市鹤见区的日本著名寺院“曹洞宗大本山总持寺”内的“手枕坂”边上的山岗上，立有一相当高大的 “黄君克强之碑”。具体当时的立碑事宜不明。碑文由前日本首相犬养毅手书。虽经88年岁月碑体碑文相当完好。

1933年，在武汉市武昌蛇山设立黄兴铜像。1955年因建设武汉长江大桥，将铜像搬至黄鹤楼剧场东侧。1985年10月迁至龟山东麓。

1934年，长沙市把最繁华的街道南正街改名黄兴路。在武汉、上海等城市也有黄兴路。在台湾台北市士林区和高雄市三民区也有克强路、黄兴路之路名。1981年，黄兴故居被列为湖南省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加以修葺并对外开放。1986年10月10日中国邮电部发行了志号为J.132的《辛亥革命著名领导人物》纪念邮票1套3枚。其中第二枚为黄兴像。另两枚为孙中山和章太炎像。1988年1月13日，黄兴故居和黄兴墓一起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4年，黄兴诞辰130周年，湖南省各界人士以及黄兴等革命爱国人士的亲

属代表出席矗立在长沙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北街口的黄兴铜像揭幕仪式。铜像高7.8米，表现黄兴一次回到故乡长沙的情景。基座4个立面浮雕，分别刻画他组织华兴会、创办中国同盟会、指挥武昌保卫战、与孙中山携手合作等重大历史事件。同时在上海黄兴公园，上海市领导也举行黄兴铜像揭幕仪式。上海黄兴铜像高2.8米，人物双手背后握剑，显示黄兴这位辛亥革命卓越领导人的军人形象。长沙县星沙镇等地也立有黄兴铜像。
2011年9月，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湖南省委决定修建湖南辛亥革命人物纪念馆。纪念馆新建项目初步选址于黄兴故居纪念馆后花园。黄兴故居所在地高塘乡被更名为黄兴镇。

===================

https://zh.wikipedia.org/zh/陈其美

陈其美（1878年1月17日－1916年5月18日），字英士，浙江吴兴人。中华民国早期政治人物，青帮代表人物，暗杀了陶骏保、陶成章、夏瑞芳、郑汝成等异己，于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文的左右股肱，后遭暗杀身亡。弟陈其采，字蔼士。兄陈其业，字勤士。陈其美有两侄，陈果夫及陈立夫，二人由陈其美引介于蒋中正，与蒋中正关系密切，后来兄弟俱成为国民党内大员，主管党务，被广称为CC系。陈其美与蒋中正关系密切，为蒋中正结义之兄，将蒋中正引荐于孙文。孙文高度赞扬陈英士是“革命首功之臣”。

生平

陈其美少时家贫（一说原为湖州富商之家，13岁丧父后家道中落），15岁

时辍学，到当地的一家当铺当学徒，供应其长兄及三弟就学之资。

1902年，陈其美三弟从日本回中国，讲述日本富强的情况，陈其美受启发，决定不事当铺终生。

1903年，陈其美只身到上海，以任会计为生，同时结识各方人物。

1906年，陈其美赴日本留学，入东京警监学校，认识孙文，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在当地认识蒋中正，二人后来更结拜为异姓兄弟。

1908年，陈其美回中国，在上海、杭州等地加入青帮，联络会党支持革命。

1911年，陈其美任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部长。10月，武昌起义爆发，陈其美沪军攻入浙江杭州。时清兵多为革命党支持者，遂不攻而下，11月5日即控制市区，11月6日抵抗结束。后在上海获举为沪军都督。

1912年，陈其美在孙文的许可下，派蒋中正与王竹卿，于1月14日刺杀光复会首领陶成章于上海广慈医院。3月，被任命为唐绍仪内阁工商总长，未就任。因议员发难，指责其“盘踞沪上，拥兵自雄，军政府应撤不撤，梗国家之统一”，7月31日辞去都督。

1913年，二次革命时，陈其美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7月23日，按照事先计划，陈宣布上海独立。二次革命事败后赴日本，支持孙文另组中华革命党，被推为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部长。

1915年，袁世凯意在称帝，陈其美再回中国反袁，10月29日，陈其美主持中华革命党上海总部，兼中华革命军东南军司令长官。11月10日，陈其美派人刺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于外白渡桥，12月5日，策动上海军队反袁肇和舰起义失败。当夜，霞飞路渔阳里5号总机关部被法租界巡捕房搜查，丁仁杰等多人被捕。陈其美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做自己接班人。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寄宿的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14号（后改名英士路，1950年改淡水路至今）日本侨民山田纯三郎的寓所被杀手枪杀，一般相信是由袁世凯指使张宗昌派员去刺杀陈。灵堂设白尔部路新民里（重庆南路35弄，今拆）蒋中正寓所。

1917年5月12日，在上海打铁浜苏州集议公所为陈其美举行国葬，上万人送

行。孙中山、唐绍仪、章太炎等主祭。次日归葬浙江湖州。中华民国邮政发行的烈士像普通邮票中就有陈英士，图案采用陈就任沪军都督时的戎装照。蒋中正逝世之前，陈在中国国民党大员的葬礼等级上，声势规格和坟墓规模仅次于孙中山一人。

1938年，蒋中正为纪念陈的功绩，组建浙江省立战时大学，后改名为英士大学。1950年在院系调整中被分拆到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以及上海复旦大学等校。

小传说

陈其美人称其有“四捷”：口齿、主意、行动、手段。性格豪迈侠气，做事勇敢果断。

台湾戒严时代的国民小学国语课本曾有一课〈陈英士先生小的时候〉课文，描述陈其美孩提时即为同龄朋友中的领袖人物。某日嬉戏时，一个小孩玩火不慎，转眼间身上已多处着火，周遭的孩子们皆吓得不知所措。此时唯独陈其美当机立断，冲上前去一把抱住，拼命在地上打滚，终于火灭救了同伴。

被陈其美暗杀的人

根据孙文同盟会的盟友，章炳麟1909年在“南洋总汇新报”发表的“章炳麟宣布孙文罪状书”，陶成章指责陈其美收取钜额革命募款，却中饱私囊，而得罪了孙文。1912年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天主教广慈医院住院，陈指使蒋介石在广慈医院内，将陶成章刺杀而死。郑汝成、陶骏保、皆被陈其美暗杀。 北一辉认为宋教仁被暗杀案，亦与陈其美有关。

纪念地

陈英士墓位于浙江湖州南郊岘山东麓，墓上的石碑坊匾额有孙中山手书“成仁取义”四大字；右侧为蒋中正题词“精神不死”，左侧是林森题的“浩气长存”。两旁石柱对联，分别有于右任和蔡元培所题。于右任题词：“春尝秋禘生民泪，山色湖光烈士坟”，蔡元培的题词是：轶事足证，可补游侠货殖两传；前贤不让，询是鲁连子房一流”。目前陈英士墓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29年国民政府在杭州西湖的湖滨三公园建立了陈英士铜像，1960年代因政治原因被拆除。因陈其美对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有功，海内外的英士大学校友们为了纪念陈英士的革命精神，筹集资金重塑其铜像，陈英士铜像于2005年4月再次屹立在杭州西湖畔。百余名白发苍苍的前英士大学校友冒雨出席了揭幕礼。

1930年11月，在上海南市老西门以北民国路（今人民路）、方浜路口，兴建高达27米的陈英士纪念塔，以纪念1911年辛亥革命中陈英士光复上海的功绩。1949年以后拆除。

台湾宜兰县大同乡泰雅族部落绷绷社（Bonbon，芃芃、梵梵），战后初期国民党政府为纪念陈英士，改名英士村。

台湾新北市板桥区新埔地区，自升格直辖市前即有英士路，主要地标有新北市立联合医院（板桥院区）（旧称县立医院）。另台中市北区、彰化市也有道路名为英士路，高雄市小港区有其美街。

==================

https://zh.wikipedia.org/zh/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是指1911年4月27日在中国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中遇害后葬于广州市东北郊（现市区越秀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革命党人。

七十二烈士尸骨由潘达微收葬，改原地红花岗为黄花岗，最初只是黄土一抔的墓地，甚为荒凉。1918年，滇军师长方声涛（方声洞之兄）募款修墓。1921年，纪功坊、墓亭相继落成，又查七十二烈士之外，尚有十四名烈士死于黄花岗之役，共八十六人，姓名全部刻于《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

日革命记》石碑的背面。

七十二烈士墓中有一墓亭，内有一座上书“七十二烈士之墓”的墓碑。亭前右侧碑亭内立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碑”，其上刻有72位烈土的姓名。左侧另立一“补书辛亥三月廿九广州革命烈士碑”，上补刻有1932年审查所得的13位烈士的姓名。

七十二人中有六十八位属于洪门成员。

名录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碑（72人）

广东：徐佩旒，徐礼明，徐日培，徐广滔，徐临端，徐茂燎，徐松根，徐满凌，徐昭良，徐培添，徐保生，徐廉辉，徐容九，徐进照，徐褶成，徐应安，李炳辉，李晚，李文楷，李文甫，李雁南，陈春，陈潮，陈文褒，罗仲霍，罗坤，庞雄，周华，游寿，江继复，郭继枚，劳培，杜凤书，余东雄，马侣，黄鹤鸣，饶辅廷，张学铨，周增，林修明；

福建：方声洞，冯超骧，罗乃琳，卓秋元，黄忠炳，王灿登，胡应升，林觉民，林西惠，林尹民，林文，林时爽，刘六符，刘元栋，魏金龙，陈可钧，陈更新，陈与燊，陈清畴，陈发炎；

广西：韦树模，韦荣初，韦统淮，韦统钤，李德山，林盛初；黄以仁

四川：秦炳，喻培伦，饶国梁；

安徽：程良，宋玉琳，石德宽。

华侨：黄花岗诸位烈士，有近卅人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其中，罗仲霍、周华、李雁南和陈文褒来自马来西亚槟城。李炳煇、郭继枚、余东雄来自马来西亚霹雳州。习惯只写上祖籍，分入广东、福建。

补书辛亥三月廿九广州革命烈士碑（13人）

徐国泰，华金元，阮德三，陈甫仁，严确廷，韦云卿，罗进，罗干，罗联，罗遇坤，张朝，陈才，陈福

===============

https://zh.wikipedia.org/zh/%E5%BB%96%E4%BB%B2%E6%81%BA

廖仲恺（1877年4月23日－1925年8月20日），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以字行，籍贯广东省归善县鸭仔埗乡窑前村（今惠州市惠城区陈江街道幸福村），生于美国加州旧金山。中国国民党革命元勋之一，国民党改革派人物。当孙文于1923年1月和苏联发表联合声明后，派廖仲恺与苏联进行更进一步协商，同时蒋介石也被送去学习苏联政治和军事制度。1925年被刺杀身亡。

生平

1877年，廖仲恺生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旅美华工家庭。1893年回中国。1897年，与同为改革派的何香凝结婚。
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后，廖仲恺留学日本，先入读早稻田大学预科，后在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学科毕业。留学期间，在胡汉民堂弟胡毅生的介绍下，与孙中山结识。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执行部外务科负责人。1911年，辛亥革命后，到广东任都督总参议。1913年，随孙中山亡命日本。1914年，廖仲恺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副部长，之后随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参加护法运动；并在国民党刊物内发表文章，赞扬十月革命。
1921年，孙中山到广州任非常大总统，廖为财政部次长。之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廖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财政部长、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职。
1924年3月12日，蒋介石由奉化致函廖仲恺，坦言对“国共合作”有意见，并将此函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其游俄报告意见。全文如下：“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

应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望我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专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国人程度，卑贱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宁有是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入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楣，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不于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为不郑重其事，而子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此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自辞也。”

1925年8月20日，在设于惠州会馆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今越秀南路89号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立有纪念碑），廖刚下车即被刺客从暗处扑出暗杀，原本蒋介石认为是英国人所作为，在鲍罗廷建议下，由蒋介石、汪精卫、许崇智组成调查委员会，并发现有一犯嫌为胡汉民之堂弟胡毅生，其他疑犯包括朱卓文、林直勉、魏邦平、梁鸿楷。经调查后相信暗杀是国民党右派所为，当中胡汉民被认为有重大嫌疑。

1935年，廖仲恺遗体迁葬金陵中山陵侧。廖仲恺与妻何香凝墓，现位于南京紫金山南麓天堡城下。

廖仲恺译有威尔确斯（Delos Franklin Wilcox）之著作《全民政治》（Government by All The People），孙中山曾在民权主义第六讲（1924年4月26日讲）最后一句话提到该书。

家族

廖仲恺的夫人为同属国民党左派的何香凝。廖梦醒为廖仲恺之长女，子廖承志，幼女廖光凤，廖晖为其孙，二人皆在中共负责统战工作。

主要纪念地

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旧称仲恺农业技术学院）

惠州市仲恺中学

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t/%E6%AE%B5%E7%A5%BA%E7%91%9E

段祺瑞（1865年3月6日－1936年11月2日），原名启瑞，字芝泉，中国安徽省合肥（今属肥西县）人，为中华民国政治家，皖系军阀首领，曾三次出任国务总理，1916年至1920年为北洋政府的实际掌权者和领导人。1924年至1926年为临时执政，民初三大北方军阀之一。

早年

段祺瑞祖父及叔父皆为淮军将领，且与李鸿章同乡。基于家学渊源与同乡背景，段祺瑞在1885年考入由李鸿章创设的天津武备学堂，习炮兵科。1889年毕业时，天津武备学堂择选5位毕业生派赴德意志帝国学习军事，段祺瑞获选为其中一员。段祺瑞在德国柏林陆军学院留学期间继续深造炮兵相关知识，隔年（1890年）回国。回国后，段祺瑞先短暂任职北洋军械局委员，1891年改任威海随营武备学堂教习兼炮兵统带，曾参与威海卫之

战。
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灭后，1895年12月段祺瑞进入袁世凯幕府，于小站练兵，担任炮兵队统带兼随营学堂监督，成为袁的亲信，其宦途也跟随着袁世凯扶摇而上。
经历
1899年，袁世凯编练的新军开赴山东省镇压义和团；1901年，段祺瑞升任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因袁世凯升官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武卫右军更名常备军移驻保定；1902年6月，段祺瑞升任北洋军政司参谋处总办，负责北洋新军所有编装与训练任务。
1903年10月，清朝政府决定设立练兵处，统辖新军训练，同年12月袁世凯兼任练兵处会办大臣，因袁世凯推荐，段祺瑞升任练兵处军令司正使、加副都统衔；此时段祺瑞与冯国璋、王士珍并称为“北洋三杰”（亦被称为龙、虎、狗；王为龙，段为虎，冯为狗）。1904年，段祺瑞兼任常备军第三镇翼长署理；1905年2月正式升任新军陆军第四镇统制，驻军天津马厂，同年进行的河间秋操演习段祺瑞担任北军总统。
1906年，段祺瑞改任陆军第三镇统制兼北洋武备学堂督理，1906年3月被任命为福建省汀洲镇总兵，段祺瑞南下赴任。5月8日，陆军行营军官学堂在保定成立，段祺瑞任督办。段祺瑞在北洋军系影响力是基于他长期主掌军队训练及养成，新军逐渐编练成形的同时，段祺瑞也逐渐在军队中植入属于他专属的伦理性影响力。
1909年1月2日，袁世凯一度失势，遭清政府下令“着即开缺，回籍养疴”，袁临别前将北京私宅赠与段祺瑞。段祺瑞则在同年12月回任陆军第六镇统制。
1910年5月25日，清廷以段祺瑞督办北洋陆军学务有功，赏头品顶戴。12月18日加侍郎衔，外放任江北提督，驻江苏淮安清江浦，负责本地治安。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朝政府重新启用袁世凯，袁世凯将段祺瑞召回北京，10月25日段升任清军第二军军统；第二军随后开拔南下与第一军（军统冯国璋）一同清剿革命党，清廷增封段祺瑞为湖广总督。由于袁世

凯与革命党间持续进行谈判，南下清军并未尽全力扫除武汉当地之敌；待11月13日袁世凯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取得职权后，段祺瑞除湖广总督之位外会办抚剿事宜；由于冯国璋攻克武汉三镇进度过顺，11月28日袁世凯任命段祺瑞调任第一军军统，第二军军统换由冯国璋担任。12月5日，段祺瑞下令第一军退出汉阳，开始进行南北议和，革命军黄兴、孙文等同意，倘能促使宣统退位，可由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段祺瑞同时出任陆军总长。

1913年7月，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组成段祺瑞临时内阁，调兵镇压二次革命；12月陆军总长一职由周自齐接任。此后又署理湖北都督兼领河南都督，镇压白朗起义。

1914年2月，袁世凯段祺瑞召回北京述职，其湖北都督由段芝贵、河南都督在4月由田文烈接任；1914年5月，袁世凯增设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试图收回由陆军部主控的军权，段祺瑞担任陆军总长；段祺瑞因不满这个调任，在陆军总长一职任内主要业务都由亲信徐树铮定夺；1914年，日本军队占领青岛，段主张对日本决一死战。

1914年后，袁世凯与段祺瑞的不和日趋浮上台面；1915年5月“二十一条”签订后，段祺瑞告病辞职，赴西山养病；其陆军总长一职由王士珍接任。袁世凯在1915年底推行洪宪帝制时，段表示不拥护帝制。

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恢复共和制，邀请段出山任国务总理，最终段祺瑞回任参谋总长兼陆军总长。6月袁世凯病逝，黎元洪接任大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之后段祺瑞成为北洋政府派系内的皖系领袖。

1917年，与大总统黎元洪之间因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引发府院之争，引发由张勋领导的溥仪复辟。复辟历时十二日后即被段于天津马厂誓师镇压。在继任的冯国璋总统任期内，就解决南北分裂，统一中国的方式问题，与冯发生第二次府院之争，1917年8月14日，对德国及奥匈帝国宣战，正式加入一战，并派华工到欧洲，及换取列强对中国如大国的待遇。于1917年11月22日辞职。

1918年3月22日复职。同年10月10日，冯国璋大总统的任期届满，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段与冯约定共同下野。段祺瑞通过安福系继续在幕后操纵政权。1920年7月在直皖战争中失败，退隐天津。

1925年4月24日，段正式下取消法统令，废除断续运行12年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由中华民国临时参政院替代之。

晚年

1926年3月18日，发生北洋政府镇压北京学生运动的三·一八惨案，同年4月9日被鹿锺麟驱逐，避入东交民巷法使馆。后联奉军不成，20日下台，退居天津日租界当寓公，潜心佛学，自号"正道居士"。1928年7月3日蒋抵北平后，听闻段祺瑞之安福系在天津活动之说，乃以学生身份致书段氏，劝其爱惜令名："弟子蒋介石谨致敬于芝泉夫子座前，而问起居……中正与先生别垂二十三年，知先生或忆当年弟子中有蒋志清其人者。此二十三年中，先生几度秉国大政，备极喧赫；而中正始终追随先总理，奔走革命，致力扑灭奉先生为领袖之北洋军阀，历尽艰苦，而未尝偶一修音问者公也。今燕云收复，北伐即告完成，中正身临旧都，未遑宁处，上书敬候居者私也。公私之间，截然有鸿沟在。……中正对于先生已往翊赞共和之勋绩，深知尊重，无敢或忘；并深愿先生爱惜令名，善用勋望，以固革命之基，而奠共和之实，使天下后世皆知先生救国爱民之真诚，而不终为奸邪宵小之所误，是则公私之幸也。语曰：君子爱人以德。辄敢以弟子之私，布其诚悃，惟希鉴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日本军队占领中国东北，拒绝与日本人往来，颇有民族操守。

至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华北情势危急，蒋恐段祺瑞为日人利用，乃请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作为特使，持其亲笔函赴天津，往见段氏，邀请南下；段氏亦恐遭日人劫持，经思考后决定接受，于1月21日凌晨离开天津南下，1月22日抵达南京，蒋亲自于下关码头迎接，执弟子礼。1月23日，蒋复陪同段氏往谒中山陵，向孙致意，并"与之畅谈辛亥年要求共和通电以前之历史"，谓："此老骨格与精神，求之当世不可多得也"，午夜蒋送

段氏登车赴上海定居。2月段祺瑞移居上海。
1935年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但没有就职。
逝世
1936年11月2日，段氏病逝于上海。11月3日，蒋致电中央，以其“赞成共和与再造之功，殊不可没”，地位“实为元勋”，建议予以“国葬”，并指示军事委员会及军政部派员协助治丧；且亲撰挽联，于审视国民政府褒扬令后，悼念曰：“段氏对于国家确有不没之功，于己之师生关系尤无任哀悼也。”
段氏葬于万安公墓，享年71岁。
段临终遗言有“八勿”，即：“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历代内阁
1916年段祺瑞第一次内阁
1916年4月23日成立。国务总理段祺瑞，外交总长陆徵祥（后由曹汝霖兼署），内务总长王揖唐，财政总长孙宝琦，陆军总长段祺瑞兼，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张国淦，农商总长金邦平，交通总长曹汝霖（大半由梁士诒决定），参谋总长王士珍，审计院长庄蕴宽。1916年6月30日改组，1917年5月23日因府院之争结束。
国务总理段祺瑞，外交总长唐绍仪（唐未到前由陈锦涛兼署，9月唐抵达，因督军团通电反对，旋即辞职，伍廷芳接任），内务总长许世英，财政总长陈锦涛，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海军总长程璧光，司法总长张耀曾（张耀曾未到前由张国淦兼署），教育总长孙洪伊（次长吴闿生代理，范源濂继任总长，孙洪伊改任内务总长，原内务总长许世英改任交通总长），农商总长张国淦，交通总长汪大燮。
1917年段祺瑞第二次内阁
1917年7月17日成立，11月22日因第二次府院之争结束。国务总理段祺瑞、外交总长汪大燮、内务总长汤化龙、财政总长梁启超、陆军总长段祺瑞

兼、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林长民、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张国淦、交通总长曹汝霖。

1918年段祺瑞第三次内阁

1918年3月29日成立，12月13日因新国会（安福国会）成立结束。国务总理段祺瑞、外交总长陆徵祥、内务总长钱能训、财政总长曹汝霖兼，陆军总长段芝贵、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朱深、教育总长傅增湘、农商总长田文烈、交通总长曹汝霖、机密院院长曹泾沅。

西原借款

西原借款为1917年至1918年间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签订的一系列公开和秘密借款的总称。

1917年7月，段祺瑞重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后，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镇压孙中山倡导的护法运动，以中国权利为抵押品，向日本大量借款。1917-1918年，段祺瑞共向日本借款5亿日元。其中由西原龟三与段祺瑞政府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商办议定的有吉会铁路、满蒙四铁路、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森林和金矿、有线电信、参战、交通银行等八项借款，共计1.45亿日元。

通过这一借款，段祺瑞把中国山东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等权益大量抵押给日本，但是抵押只是形式上的，而西原借款给中国的条件离苛刻很远。

西原借款所得款项，日后用于财政性支出占65.22%，军费占总支出占25.40%。

中日协定

1918年5月16日，日本陆军少将斋藤季治郎与段祺瑞政府代表靳云鹏，在北京秘密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19日又签订《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与日本采取“共同防敌”的行动；日本在战争期间可以进驻中国境内；日军在中国境外作战时，中国应派兵声援；作战期间，两国互相供给军器和军需品。

通过“协定”，日本派出大批军队进入中国东北，日本迅速取代了沙俄在东三省北部的侵略地位，中国则面临沦为日本附属国的局面，不过当时许多中国人的判断是日本会比苏联给中国更好的条件，因为八国联军时日军良好纪律及日俄战争前后中日友好的印象还深植于当时中国人的心中。

轶事

段祺瑞笃信佛教，平日多半吃斋、念佛、朝夕烧香、礼佛，能解《金刚经》、《法华经》。

段祺瑞一生酷爱围棋，与其子段宏业、侄子段宏纲皆是围棋高手。据说段祺瑞少年时曾与刘铭传下过围棋，段祺瑞执政时资助过大批围棋好手（包括顾水如、吴清源等），被称作“中国围棋的大后台”，段祺瑞长子段宏业是国手级的大师，段祺瑞屡战屡败，故往往生气不语，皆是由段宏纲劝解。

段祺瑞也喜欢打麻雀，赌注不大，却是麻雀高手，往往一夜多胜。

段祺瑞之后统治中国的蒋介石，自称在保定读军校时，军校总办是段祺瑞，故蒋介石自认为“段祺瑞学生”，亲自致赠礼金，加上同样反共，故段祺瑞晚年与蒋介石关系不差。北洋三杰即段祺瑞，冯国璋与王世珍，外界评三人才能高下，即神仙，老虎，狗，神仙王能力最好，次是段如虎，冯最后，三人皆袁世凯提拔起，1911年10月辛亥武昌革命，袁即派出段与冯领清新军近五万，当周即自直隶南下，大战南方军至1912年1月中，国父孙中山自美国搭轮船赶回国，调停即南北始停战。

评价

后人评论段祺瑞者甚多，有支持的学者赞扬其品质高尚，爱国有心，组织才能非凡，善于利用政治手腕和军事手腕维护政权。虽为军阀，但人格正面，为人严肃刻板，不苟言笑，生活朴素，清廉如水，无积蓄、无房产，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享誉于世。也有人骂其军阀习气，刚愎自用，迷信武力，倾心权术，在军事上并无出色战功和理论，喜用私人为将领。

1924年3月，北京大学纪念25周年活动中，大学生进行国内大人物票选，段

祺瑞与胡适同居第四名，前三名为孙中山、陈独秀和蔡元培。
段祺瑞因致电要求清帝退位、抵制洪宪帝制和讨伐张勋复辟这三件事，有“三造共和”的美誉。梁启超评价段祺瑞：“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吴佩孚：“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段祺瑞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926年，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发动学生抗议，北京军警镇压请愿学生，造成“三·一八惨案”，旋被冯玉祥赶下台。“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有说法认为段祺瑞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决定终身食素，至死都没有违背这一决定。根据当时新闻档案，段祺瑞根本没有去“三一八”惨案现场，也没有出现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并且段政府称示威学生为“暴徒”。有回忆者称段祺瑞在三一八之后在家中也吃荤，在其他场合吃素只是与信佛有关。
国民政府褒扬令：前临时执政段祺瑞，持躬廉介，谋国公忠。辛亥倡率各军赞助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洁身引退，力维正义，节概凛然。嗣值复辟变作，誓师马厂，迅遏逆氛，卒能重奠邦基，巩固政体，殊功硕望，薄海同钦。兹闻在沪溘逝，老成凋谢，惋悼实深，应即予以国葬，并发给治丧费一万元。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国家笃念耆勋之至意。此令！
著作
段祺瑞晚年喜好吟咏，有《正道居诗》、《正道居诗续集》、《正道居感世集》、《正道居感世续集》等，后合编为《正道居集》，计有文八篇，诗三十五题五十四篇，可惜流传甚罕。香港学者陈炜舜积数年之力，在《正道居集》的基础上补辑逸作，包括文（联、颂）三十二篇、诗十题十篇，集合近三十位青年学人撰写解题、注释，附以〈剪影集锦〉与〈公文电报选辑〉，编成《段祺瑞正道居诗文注解》（台北：万卷楼，2020年3月），俾广大读者了解这位雄杰之士不为人知的“好文”一面，进而对民初

史有更深入的认知。

==================

https://zh.wikipedia.org/zh/%E9%BB%8E%E5%85%83%E6%B4%AA

黎元洪（1864年10月19日－1928年6月3日），字宋卿，清末与中华民国政治家。生于湖北省黄陂县黎家河（今属大悟县），人称“黎黄陂”。清末加入海军，后担任新军协统，武昌起义后，担任湖北都督、中华民国副总统。袁世凯大总统死后，曾两次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生平

黎氏祖籍原系安徽省宿松县，自祖父起即经商湖北省，遂入黄州籍。1883年，黎元洪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为人谨厚，勤学，对引擎修造学尤具心得，为师长严复、萨镇冰等所赏识，严复评他：“德高才疏”。毕业后，派往广东服役，曾在广东水师中任广甲号二管轮。中日甲午战争时被日舰击沉，飘海遇救。之后投靠张之洞，被派督练新军，并且多次赴日本学习军事。
1906年任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今制上校旅长、团长），驻守湖北武昌。4月27日，湖北汉阳兵工厂驻守营兵与工人发生冲突，工人举行罢工，并拆毁营房；工厂会办张彪、提调黎元洪迫令工人复工。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黎元洪藏身在朋友家中。革命党人因为领袖皆不在武昌，强迫黎元洪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成立后，先后推选黎为中央军政府大都督、假定副元帅、大元帅。1912年南

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黎被选为临时副总统。1912年2月镇压反对他的武昌群英会暴动，9月镇压南湖马队暴动。
1913年6月9日，袁以“大总统令”，把江西都督李烈钧免职，由驻节武昌之副总统黎元洪暂代。10月，黎元洪正式当选副总统。12月被段祺瑞胁迫进京。
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12月15日策令，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极为反感，固辞，申令不许。
1916年袁世凯大总统死后，黎元洪于6月7日接续其未完成的任期为第一任大总统。1917年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因为争议应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向德国宣战而决裂，段祺瑞以辞职威胁，黎元洪5月23日免去段的职务，段离开北京赴天津，拥段的11省督军在各地宣布独立。黎元洪急召张勋入京调解，张勋坐镇天津，要求黎解散国会。6月12日黎被迫下令解散国会。6月14日张勋带领三千军队抵北京。7月1日张勋拥立十二岁的溥仪复辟。黎逃入东交民巷日本使馆，电请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权，任段祺瑞为总理。复辟事件后为段祺瑞的讨逆军平息，张勋逃入荷兰大使馆，前后仅十二日。7月14日黎通电去职，冯国璋任代大总统，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1922年直奉战争后，大总统徐世昌被驱逐。黎元洪复任大总统，次年6月被曹锟驱逐。后经过国会贿选，曹锟当选中华民国第三任大总统。
之后黎元洪寓居天津租界经商致富，有房地产七十余处，晚年生活优渥，大力赞助教育事业。
1928年6月3日，前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在天津病逝，遗电劝各方息兵，并提出济案求外交正义之解决及从速召集国民议会，解决时局纠纷等10项时局主张。病逝于天津英租界寓所。6月8日，国民政府明令优恤前大总统黎元洪，并着内政部详拟丧葬典礼，以彰崇报元勋之典。6月28日，又颁令国葬黎元洪，拨款一万元治丧，全国各地下半旗志哀，鸣礼炮17响。
1935年国民政府于武昌为黎元洪举行国葬（墓在今武昌洪山区土公山南坡，华中师范大学校园内）。

遗电

元洪遭逢时会，得与创建民国之役。德薄位尊，时深惕厉。中间两经当国，均不得行其志以去，退思补过，无时或忘。追维首义之初，主张罢言战和，军民分治，驯致裁兵废督，身为之倡。一切措施，虽示能尽如人意，要无非力求和平统一，利国福民。不意十七年来，民生疾苦愈甚，国际地位愈危，桑梓之乡，屡经变乱，辛亥同志，颠沛流离，负国负民，殊乖素志，频年兵连祸结天疮痍满目，久已疾首痛心；此之济案发生，外交岌岌，牵动旧疾，已非药石所鹿挽回，有不能不沥诚作最后之忠告者；（一）国民于济案，应以沉毅态度求外交正义之解决，不得有轨外行动；（二）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三）实行垦殖政策，化兵为农工，勿使袍泽失所；（四）调剂劳资，应适合全民心理与世界经济趋潮，统筹兼顾，豫定翔实法规，行之以渐，毋率尔破坏社会组织及家庭制度，俾免各趋极端；（五）振兴实业，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六）正德利用厚生，不可偏废，毋忘数千年立国之根本精神，道德礼教，当视物质文明尤为重要；（七）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八）参酌近今中外情势，似应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毋遽思破除国界，为外强所利用；（九）早定政治方针与教育宗旨，以法治范围全国，应折中至当；（十）民元以来，凡无抵触国体之创制，应仍旧保存，请勿轻议纷更。

评价

严复评价黎元洪说："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遍读中西历史，以为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

章太炎"天坼天崩，哀感何极"，先后作《祭大总统黎公文》及《大总统黎公墓志铭》。章又作一联挽黎："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倭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

张振武被杀案，黎元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后人总体评价黎元洪任大总统的北洋军阀时期频繁参与议会形式下的政治斗争，显示出黎元洪从几乎没有共和意识的清代督统成长为共和制国家参政者的进步。而黎元洪后期的政治生活中也基本恪守了共和国家的基本准则，乃至袁世凯称帝、张勋两次复辟活动中都给予了反对态度。由于黎在民国早期为稳定政局所作出的工作贡献，后期工作上大多还是给予了正面的评价。

后代

长女黎绍芬，生于1901年6月16日；逝于1966年12月9日（65岁）=徐璧文

徐保罗教授

徐世敏

长子黎绍基，生于1903年7月7日；逝于1983年1月31日（79岁）=唐闳律

次女黎绍芳，生于1906年12月29日；逝于1945年4月15日（38岁）=袁克玖

次子黎绍业，生于1911年7月29日；逝于1996年2月9日（84岁）=刘孝琛

轶事

其二女儿黎绍芳嫁给袁世凯九子袁克玖。黎绍芳生于1906年12月19日。1914年订婚时才8岁。1934年28岁时与袁克玖结婚。后逝于精神病院。

著作

《黎副总统政书》

==============================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5%BC%A0%E4%BD%9C%E9%9C%96

张作霖（1875年3月19日－1928年6月4日），字雨亭，小名张老疙瘩，奉天省海城县人，出身贫农。曾任中国陆海军大元帅，喜人以“张大帅”称。张

作霖是北洋军奉系首领，也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坐的火车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毁，史称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身受重伤，回到奉天（今沈阳市）后身亡，子张学良接掌东北军政。

早年

张作霖祖籍河北大城，父系祖先为李姓，因过继母系而改张姓，曾祖辈为谋生而闯关东，落脚于奉天海城小洼村，后几次搬家。父亲张有财开店做买卖但并不富裕。张作霖于1875年3月19日（清光绪元年2月12日）生于奉天省海城（今辽宁），兄弟姊妹共三人，少时曾入私塾读书修业。14岁时父亲被仇人所杀。张作霖托人拜师学得相马和医马的技术，与当地土匪关系良好。1894年投入驻营口的毅军，在马玉昆手下充当哨长。甲午战争时被调入关。战争失败后，1895年3月被遣返，回到故里，与黑山赵家庙地主赵占元次女结婚，开兽医庄营生。在友人介绍下投奔马贼头目冯麟阁，担任看守。不久，张作霖离开冯部回到丈人家成立当地士绅雇佣的地方保安队，先后获得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的支持。1901年被盛京将军增祺收编，任游击马队管带，遂升擢而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同年儿子张学良出生。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张作霖未像其他多数军阀一样协助日本打击俄国，而是保持中立，但后来却被日本宪兵逮捕准备处决，所幸透过其他日本军官沟通后，安然脱身。

经历

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张作霖已拥有7个巡防营，经奉天省君主立宪派领袖袁金铠保举，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重用，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打击革命党人，逼走革命党人、新军第二混成旅协统蓝天蔚等人。

1912年（民国元年）9月，被袁世凯任命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镇压反袁的南方革命党分子。

1915年，张作霖支持袁世凯洪宪称帝，被袁世凯封为二等子爵、盛武将军

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
1916年，前清宗室中与日本人勾结的宗社党在东北进行复辟活动，张作霖予以打击。袁世凯死后，张作霖被北京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领奉天督军，兼省长，控制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行省，成为奉系首领。此后，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在东北三省，全盛期奉系辖区更扩至热河，察哈尔，绥远，直隶及山东。1920年直皖战争中支持直系，获胜，势力扩展到山海关关内。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败北，撤回关外。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取胜，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但由张作霖幕后控制北洋政府。1926年4月，段祺瑞于反奉战争中下台，5月张作霖于反奉战争中击败冯玉祥，直接控制北洋政府。6月入北京，与吴佩孚会面，其后往返于天津与奉天之间。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北伐。11月张作霖在天津被孙传芳、吴俊陞、张宗昌、阎锡山、寇英杰、刘镇华等十六人推戴为安国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对革命军作战。
1927年6月16日在北京被孙传芳、张宗昌、吴俊陞、张作相等拥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最后一任统治者。6月18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就任大元帅，行使大总统职权，并令潘复组织军政府内阁。
遇害
1928年5月，山东济南发生五三惨案，日军与参与北伐的中国军队发生冲突。5月9日，张作霖呼吁双方南北双方停战，合力对抗日本侵略，在通电中表示“佥以国内苦战，外侮趁虚而入”应“以侮释嫌，合力抗外，必得世界之同情，对内更多符多年国民之要求”。他表示愿意派人到南京召开善后会议，商讨统一问题。
同年6月3日夜，张作霖乘火车由北京返回奉天，6月4日凌晨5点，在皇姑屯站，也就是东北军控制的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的交界处，被预埋炸药炸死。通常认为是被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具体制定谋杀的详细计划，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土肥原贤二参与策划，下令的是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村冈长太郎中将。死后国民党掌控中国，其子张学良继任中国

东北元帅，继续统领东北，不久宣布“东北易帜”，弃五色旗，改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归顺国民政府，实现形式上的中国统一。

年谱

1875年（清光绪元年）2月12日生于奉天海城驾掌寺村（今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下属“张家窝堡”自然村）。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父张有财亡，兄妹4人随母前往广宁县二道沟乡（今黑山县绕阳河镇）生活。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后随继父学过兽医、相马。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在营口高坎镇一带谋生。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张作霖在营口应募投清朝宋庆毅军。当过宋庆的卫兵。

1895年3月甲午战争清军败，离部队回家乡。与广宁县南乡赵家庙村（今北镇市高山子镇赵家村）农户赵占元次女（张学良生母）结婚。后到广宁县城（今北镇市），不久又返回赵家庙村，纠集数十名青壮年，建立一支联村保险队（保安队），投身绿林。

1901年除夕，张作霖遭匪首金寿山勾结俄军马队偷袭，损失惨重，率残部8人，逃到台安县桑林子村，后到八角台（今台安县）投靠张景惠，当上了八角台团练长。4月17日，其长子张学良出生于台安县张家窝堡村。

1902年11月9日张作霖率200余人被东边兵备道张锡銮和新置新民府知府曾韫招安收编，编为新民府巡警营马队帮带（相当于副营职）。

1906年张作霖被提升为统带（相当于团职）。期间，张作霖先后剿除、招安辽西徐翰武、侯占山、金寿山等各路匪徒。特别是智擒悍匪杜立三，清廷发朱批：“予都司张作霖等五员奖叙”，赏银5,000两。

1907年张作霖晋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相当于旅职）。同年，按年龄为序，马龙潭、吴俊升、孙烈臣、张景惠、冯德麟、汤玉麟、张作霖、张作相8人结拜为盟兄弟。

1908年至1910年4月间，张作霖被调往吉林省郑家屯、洮南一带，追剿蒙匪，晋升为洮南镇守使。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张作霖以“率兵勤王”为由，抢先由洮南入奉天。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任其为“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期间大力镇压同盟会革命志士，张作霖受到清廷破格升赏，出任“关外练兵大臣”，赏顶戴花翎。后升为“奉天巡防营务处总办”。

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张作霖为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

1915年袁世凯洪宪帝制时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

1916年4月22日，袁世凯发表命令，任命廿七师师长张作霖为盛京将军，督理奉天军务。袁死后，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

1918年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奉军支持直军，胜利后共同控制北京。

1921年5月北洋国务院发布征蒙令，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节制热河、察哈尔与绥远三地。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战败，张作霖挟“东三省议会”推举自己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宣布东北自治。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胜，段祺瑞任临时执政，惟张作霖实际控制北洋政府。

1925年11月奉军第三方面军军长郭松龄于滦州举兵发动反奉战争，次年4月，反奉战争失败。

1926年12月，就任安国军总司令。

1927年4月，杀害李大钊等20名国共人士。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北洋政府行使统治权，成为北洋政府国家元首，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也是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1928年（民国十七年），张作霖将三女张怀瞳许配赵尔巽之子赵天赐（赵世辉）博士。

1928年（民国十七年）4月蒋介石为首，加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战场失利。张作霖5月30日宣布奉军撤退。6月3

日，张作霖眼见大势已去，乘火车由北京返回奉天。6月4日清晨，张作霖所乘专列途经沈阳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三孔桥”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因在皇姑屯以东，史称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身受重伤，送回沈阳后于当日死去，时年五十三。其子张学良继承后拒绝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宣布“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实现形式上的统一。

评价

正面评价

民间尤其张作霖正面评价很多。有人认为张作霖从一个出身低微农民起家，苦心经营方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相当不简单。也有人认为张作霖治家很严，子张学良受其影响很大。张作霖曾事绿林，后又以剿匪起家，对剿灭当时在东北极为猖獗、破坏人民生产生活的土匪，护国安民做出重要贡献。

还有一些证据表示，张出身贫寒，仅略进私塾，通晓文字，但却未能受到完整的教育，但他仍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尊敬孔儒。他同时亦重视现代化教育，当然主要是为军事服务的，但客观上也起到了培养人材的作用。1922年（民国十一年）筹建东北大学；1923年（民国十二年）4月，东北大学成立。这所大学在当时师资水平较高，像章士钊、黄侃、梁思成等著名学者曾教书于此，东北大学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经费最多的大学，其每年经费相当于排名第二的北京大学的3倍多。

在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张的故事，其智勇、气节得到颇多体现，并流传下“张作霖为日本人作字画，不写手‘墨’，为不把‘土’送给日本，改写为手‘黑’”的故事。这个“张作霖手黑，寸土不让”的典故，少有史料支持，但是张作霖识字，且能为书法是确实的。做为传奇人物，深受他的家乡人民的喜爱。张作为统镇要地的首领，其政治、军事才能都是值得肯定的。被誉为“乱世枭雄”。苏日虽将张作霖视成眼中钉，却也不得不叹服张是个“压不倒的小个子”。

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曾发展工业扩充军备，建立中国当时唯一“海军”、“陆军”、“空军”具全的武力。大量引入山东汉人进入东北，这一移民战略大大

充实东北边疆，改变了东三省的人口、民族、文化格局，成为日后日本侵略此地的一大障碍，由于兵工厂的建立，东北军成为当时中国唯一一支拥有自主生产火炮和弹药的军队，由于火炮生产的自主，使得东北军炮兵的火炮数量多，火力猛，炮弹充足，成为东北军相较于其他军阀的优势兵科。成立东北交通委员会抑制日本进行殖民扩张的工具“满铁”，捍卫国家主权起了很大的作用。

张作霖对苏联始终保持警惕，反对共产主义在东北的渗透。

1931年（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奉天省沦陷日本之手后，东北尽丧。时人皆称：“大帅（张作霖）在，必不至此！”张学良则评论自己的父亲：有雄才，无大略。亲信杨宇霆说：″张作霖是政治家，不是军事家。″

负面评价

内争不止：作为奉系军阀头目始终致力于扩充地盘，主动挑起多场战争，却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利用恩琴白匪占领外蒙古之借口，大肆扩充势力。却不予以收复，造成外蒙古事实独立局面，对历史走向有重大影响。

1915年，为支持袁世凯洪宪帝制，镇压游行的学生的领导者。1919年五四运动，张作霖发布命令：“对肇事之徒，严加惩处。”学生不准自由活动，且有警察干涉。1927年4月，逮捕并处决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

对日战略错误：张作霖虽在初期对日本采取亲善政策，如1912年，张作霖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书记深泽说：“日本国在南满洲享有利权，乃属当然，毫不为过。”且大量雇佣日军事人员。但后来奉系受到关内政治观点影响，奉系开始有人物转向抗日（包括张学良），张作霖并未认真压制抗日势力（尤其是无法说服张学良继续采取亲日战略），因此奉系开始处处敷衍日本不履行答应日本之事，甚至对日侨进行许多恶意限制，造成日本皇道派认为应该成立满洲国，因此在国民党北伐之际，日本遂于1928年6月4日在沈阳西郊制造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暗杀。这导致其子张学良易帜，宣称归顺国民政府，名义上中国统一。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87%E5%A7%91%E5%B1%AF%E4%BA%8B%E4%BB%B6

皇姑屯事件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在铁路上被暗杀的事件。
1928年6月4日5点30分，张作霖乘专用列车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皇姑屯车站三孔桥（现三洞桥）时，火车被预埋的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后，于当日死去。案发皇姑屯站以东，史称皇姑屯事件。当时在日本国内，由于没有公布凶手，日本政府一直以“满洲某重大事件”代称。

事件经过
张作霖是奉系的最高领袖，是统治中国东北的军阀，人称“东北王”、“老帅”，势力不断在山海关关内扩张，于1927年6月18日在北京建立了安国军政府，自称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末代统治者。1928年，张作霖抵挡不住“国民革命军北伐”攻打奉军，只得向南京国民政府通电求和，后于6月3日夜乘火车返回沈阳。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左右，当张作霖乘坐的火车行驶至沈阳西北皇姑屯车站以东，南满铁路（该路由日本控制）与京奉铁路交叉处三洞桥（桥上是南满铁路，下方是京奉铁路）时，预先埋设的炸药在此引爆了。张作霖所坐为第八节车，后来公开发表的日军中尉神田泰之助保留下来的照片显示，在第八，九，十节车进入桥下时引爆炸药，使上方桥梁的钢板下塌，将张作霖专列车厢压碎，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当场死亡，张作霖被甩出车外受重伤，急救回帅府，9时30分伤重去世，但秘不发丧。其子张学良从前线动身，于6月18日赶回沈阳，稳定了东北局势，直到张学良21日继承父亲职务后，才正式公开发丧。
根据直接参与布置暗杀的河本大作自述，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的神田

泰之助中尉、富田大尉负责勘定地点；工兵中尉队长桐原贞寿等人装置电流炸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负责控制引爆。日本关东军派自朝鲜军调遣来的工兵，在铁路交叉点上，工作6个小时，将120公斤黄色炸药，分装在30个麻袋内，装置在铁路交叉点桥墩上面的两处地方，设置了两道爆炸装置。在桥墩500米外的望台上设有电线按钮，以控制触发爆炸。

幕后主谋

根据现存档案以及关东军密信，由于日本在支持张作霖（如镇压郭松龄及入关夺取政权）后希望在中国东北享有各种特权，但张作霖并未尽力履行甚至背弃先前对日本作出的承诺，因而引起日本不满。在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拒绝批准关东军对东北军进行缴械后，关东军遂决定私自策划暗杀张作霖，以打乱奉系的指挥系统，使东北陷入混乱，以便出兵占领。暗杀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具体制定详细计划，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土肥原贤二参与策划，并由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村冈长太郎中将下达命令；河本大作和村冈长太郎后来亦因皇姑屯事件被编入预备役。据《小矶回忆录》记载，1928年6月16日河本大作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东京，对小矶国昭私下吐露自己是谋杀张作霖的真凶，并在自己死后出版的回忆录《我杀张作霖》中承认杀死了张作霖。

张作霖死后，日本未能立刻占领满洲，日本政府为了掩盖真相，谎称皇姑屯事件系“南方国民政府便衣队员”所为。案发之后，日本陆军省反对公布本案的真相，以免影响日本的国家形象并进一步刺激当时中国强烈的反日情绪，使中日双方爆发军事冲突。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日本战犯时，就是将皇姑屯事件视为日本侵华的起点。因为张作霖是当时仍为国际公认的中国国家元首，谋杀一国元首理应是违反国际法，属战争罪行为。根据东京审判记录田中内阁时期的海相冈田启介的证词表明，张作霖一面接受日军的援助，一面却在北京向英、美示好，因此被日本陆军铲除。原日本原陆军省兵务局局长、陆军中将田中隆吉作证：“1928年6月3日，在南满铁路和京奉线交叉处，河本大

作带领他的手下，爆破了北京开来的列车，张作霖就坐在那辆列车上。第二天，张作霖就死了。”

1945年，河本大作在日本投降后投靠阎锡山。1949年，解放军攻取太原之后，河本大作作为日本战犯被捕。1952年，经审讯之后，他详细交代了策划炸死张作霖的全过程。1955年，河本大作死于太原日籍战犯管理所。

其他说法

2010年后有部分日本右翼指出，俄罗斯作家普罗霍罗夫称张作霖系苏联情报人员暗杀，然后嫁祸给日本关东军。该说法并未被日本主流历史学界采信，国际史学界对此无反应。普罗霍罗夫声明他的观点不是以未公开过的秘密档案为根据的，只是通过“综合分析”，“几乎可以断定”“张作霖被炸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普罗霍罗夫全名为德米特里·彼特罗维奇·普罗霍罗夫，是俄罗斯的一个历史小说作者。很多俄罗斯专家都表示没有听说过普罗霍罗夫。

日本历史学家宫胁淳子根据加藤康男所著《解谜“炸死张作霖事件”》，认为“河本大作暗杀张作霖”绝对是谎言，河本大作在爆炸之后特地拍摄照片，桥上满铁路轨桥梁完全掉落，桥下方是京奉铁路，地面却毫无伤，只有火车正上方被炸飞；张作霖替身搭乘之其他火车仍在张作霖所搭乘之火车之前后方行驶，因此炸死张作霖事件显然是由张阵营内部人士策划，炸药是装在张作霖所搭乘车辆之天花板或其他地方，这样策划者能在车辆抵达下方时按下开关，从而制造出爆炸。因此张学良在父亲张作霖过世后隔年正式成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却私下杀害同时加入中国国民党之杨宇霆和常荫槐；张学良受过极佳近代教育，认为“中国应该统一”，宣称这两人是间谍，实际上两人可能是炸死张作霖之执行犯。宫胁淳子确信张学良是共产国际内部人员，他认为证据是后来共产国际颁授勋章给张学良。

现状

当年的事发现场，现为沈阳“三洞桥”，铁路交叉处曾立有“张作霖被炸处”的标志牌，后被卧式黑色大理石碑取代，碑上镌刻“皇姑屯事件发生地”。2004年，张作霖被炸处及石碑列入沈阳市第一批不可移动文物名录。2015

年，当地政府在皇姑屯站以西，原满铁奉天妇婴医院旧址内设立了皇姑屯事件博物馆。

参见

东北易帜

九一八事变

皇姑屯站

日方关系人

关东军

田中义一

河本大作

芳泽谦吉

町野武马（张作霖顾问，同乘一辆火车，爆炸前中途下车）

仪我诚也（张作霖顾问，同乘一辆火车，坐吴俊陞身旁，爆炸中幸存）

中方关系人

张作霖（身亡）

吴俊升（同乘，身亡）

张景惠（同乘，受伤）

莫德惠（同乘，受伤）

周大文（同乘）

刘哲（同乘）

于国翰（同乘）

张学曾（同乘，张作霖三子）

马月清（同乘，张作霖六姨太）

潘复（奉天省省长，事后赶到现场）

臧式毅（奉天督军参议，联络张学良）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以下引述网文）

https://zhuanlan.zhihu.com/p/52010154

张作霖，字雨亭，奉天系最高领导人，北洋军阀最后的掌权人，曾多年称霸东北，其部下号称虎狼之师。

张作霖时期的清政府，外部遭受鸦片战争的失败，内部恰逢义和团运动和太平天国运动。正值内忧外患之际，各地土匪趁机作乱欺压百姓。

而张作霖，就是这种混乱之下产生的一代枭雄。他最先以遏制胡匪出名，被东北人民拥护为地区王。

后来日俄战争爆发，张作霖在日俄之间虚与委蛇，两头得利，最终做大，虎踞东北。

张作霖出身贫苦家庭，没有任何背景。能成为东北之王，靠的是敏锐的洞察力，和如猛虎般的杀伐决断。

他不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人，他曾经镇压革命党，是日本人选中的东北代理人，他与日本人的合作，长达24年之久。

当时的一些东北人，还有其他地方的中国人，都骂他是卖国贼，汉奸，日本人的走狗。然而随着皇姑屯一声爆炸，人们才知道，张大帅也是有原则的人。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坐的火车被日军预埋的炸药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回到奉天后不治身亡。

这是由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策划的一项刺杀行动。二战后，刺杀证据被各方坐实。

张作霖死后三年，日军发动了臭名昭著的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华夏大地开始生灵涂炭。

这件事让人们奇怪的是：既然张作霖是日本选出来的代表，为什么日本人要对他下死手？

其实日本人一开始选张作霖，是真心打算让他做代理，帮日本人管理东北的。但是张作霖虽然是一代枭雄，却有一项人生准则，那就是：

绝不做卖国贼，决不让日本染指东北！

日本人虽然多次威逼利诱，但是张作霖是谁啊？张作霖是在军阀里混出来的，老道沉稳，手段毒辣，表面上对日本人亲亲热热，背后却一次次玩弄日本人，使得日本人希望落空。

24年的等待，日本人的耐心终于被张作霖磨光了，但是选择动手，日本军未必有胜算。

虽然日本关东军战备精良，但是数量与张作霖的东北军差老远了。而且张作霖戎马生涯，有的是作战经验，正面不敌，背后也能拖死日本军。

所以日本军方高级参谋，才做出刺杀张作霖的稠密计划。

日军杀了张作霖，东北便由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接任。日军没有继续刺杀张学良，而是承认了张学良。

原因是日本人觉得当时的张学良好对付，不足为虑。而且张学良没有打仗经验，由他接位，要比由其他作战经验丰富的部下接任，对日方更有利。

后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大举进攻东北。少帅张学良携甲而逃，置东北三千万黎民百姓于日军铁爪之下。

虽然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张学良是听了蒋介石不抵抗的游说，但若是张作霖在世，一定不会如此轻易就放弃东北。

张学良轻易放弃东北，造成日本国内主战派占领上风，他们认为日本轻易可取东北，一定轻易可取中华。

日本主战派掌权，开始加速侵略中国，对中国人犯下了各种令人发指的滔天恶行。

张学良后来的西安事变，是出于爱国，也是一种赎罪，毕竟带着有枪炮的军人逃跑，留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去对抗日本关东军，是历史上抹不去的耻辱。

（引文结束）

==============================

（以下继续引述维基百科相关文字）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5%86%AF%E7%8E%89%E7%A5%A5
（有微量删节）

冯玉祥（1882年11月6日－1948年9月1日），官章名玉祥，谱名基善，字焕章，男，安徽巢县（今巢湖市夏阁镇竹柯村）人，生长于直隶省保定府（今河北省保定市）。民国军阀，本属直系军阀，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改所部为国民军，后败退西北，自成势力。西北军领袖。1935年，晋任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冯玉祥军旅一生，擅长见风使舵，八次临阵倒戈，故民间有“倒戈将军”之称；又因笃信基督教而被称为“基督将军”，多次利用宗教力量控制军队，且在中国各地展开大规模毁佛行动，是三武灭佛之后，中国近代最大规模的毁佛行动。而冯玉祥也真正终结清室居住在紫禁城的历史。

生平

家庭出身

冯玉祥的父亲冯有茂，兄弟四人，冯有茂排行第二。1845年生于安徽巢县竹柯村，家庭赤贫，冯有茂做泥瓦匠，冯玉祥的伯父与三叔做裁缝，冯玉祥的四叔是佃农。太平军攻到安徽时，冯玉祥的父亲外出逃荒，投靠一家地主做佣工，陪着地主家的少爷学武学，考武举，结果冯玉祥的父亲考中

武庠（官办武学）生员，毕业于投身淮军将领刘铭传的“铭军”，在差遣队当差，后来慢慢地升到哨长和哨官，参加平定陕甘回乱，之后随左宗棠进军新疆。随军从新疆调防内地进驻山东济宁。

冯有茂在济宁与当地妇女游氏结婚，次年生长子冯基道，（共有七个儿子，其中冯玉祥是次子。）长子出世次年，铭军解散。文盲的冯有茂南下返回老家，考武举人未成，生活无着，不得已，又重新入伍，随淮军至直隶青县兴集镇驻防。光绪八年（1882年）9月26日，生下次子冯玉祥，当时按族谱起名为冯基善。这时李鸿章为直隶总督，淮军在保定府“五营练军”，冯有茂携家到保定府，保定成为冯玉祥儿童时代的养育之地、第二故乡。冯玉祥一生都是保定府口音。冯玉祥的父母早年都染有鸦片的嗜好。这在清末，已成为一种最普遍的风气，尤其是军政界，简直无人不吸。当时因为生活艰难，营养不足，冯有茂的七个儿子死了五个。

光绪十七年（1891年）农历九月，冯玉祥的哥哥冯基道补上一份绿营的马兵的职缺入伍，冯玉祥接替冯基道进入村中的私塾读书，因为本来冯家只打算栽培长子读书而已。启蒙之后，冯玉祥练习写字，家贫买不起纸与毛笔，于是就用一根细竹管，顶端扎上一束麻，蘸着稀薄的黄泥，在方砖上练习写字。冯有茂千方百计想把次子也补上一个兵额，以缓解家庭经济的窘境。

光绪十八年（1892年），营中有一个士兵的职缺，苗姓管带决定补给冯有茂的次子，当时怕耽误时刻，被别人抢去缺额，来不及问冯有茂次子的名字，就给直接编造一个名字“冯玉祥”登记入册。从此，冯基善就以“冯玉祥”作为官章名，11岁，不用随营操练，发饷时到营中应名领饷外（步兵，每月3两6钱银子），其余时间仍在家中过活。这在保定府的淮军，叫做“恩饷”。

12岁时结束1年零3个月的私塾教育，入保定练军营，持枪操练。后来冯玉祥的父亲因伤失业，经济来源中断。冯玉祥为了多挣一点银两，就十年如一日在教场练喊队列口令，想要成为“传令教习”，结果练出一副惊人的大嗓门。

民初仕途

冯玉祥1896年成为淮军的正式士兵，1902年改投袁世凯的武卫右军。1911年担任由武卫右军改编而成的新编陆军第二十镇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曾参与滦州起义。1912年1月3日，冯玉祥担任北方革命军政府总参谋长。

1914年7月，冯玉祥任陆军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参加镇压白朗起义。9月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

1915年袁世凯称帝，奉令率部入川与讨袁的蔡锷所部护国军作战，曾一度击败蔡锷，但冯却暗中与蔡锷联络，1915年夏冯玉祥策动四川都督陈宧宣布独立讨袁。

1916年3月议和停战。3月3日，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攻陷叙州，3月7日占领纳溪，蔡锷率部移驻大洲驿。3月7日，袁世凯以冯玉祥攻叙“功劳卓著”，特封为三等男爵。

1917年4月被免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职，7月率旧部响应段祺瑞之号召，讨伐张勋的辫军复辟，复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1917年11月，孙中山举起“护法”大纛，段祺瑞调冯率第十六混成旅南下攻打孙中山、陆荣廷的护法军。

1918年2月14日，冯在武穴通电发表主和，主张恢复国会，投向直系曹锟，被免职留任。

1918年3月下旬，冯率部驻常德期间，受为其看病的医生影响，经常前往教堂听牧师布道，开始笃信基督教，在军中设置教会，请随军牧师向全体官兵布道、探题，并为100多名官兵施行洗礼。期间，他目睹当地人以悬挂日本国旗的方式躲避土匪，停于沅江和洞庭湖的日本军舰声称能够保境安民，十分气愤，一边打击土匪一边取缔日本国旗。在一次日本海军士兵与中国士兵冲突后，冯玉祥和日本舰长发生冲突，脱鞋以鞋子抽了日本军官10个耳光。1918年6月被撤销免职处分。6月14日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杀死冯玉祥夫人的姑丈、主张南北议和、支持直系军阀的北洋元老陆建章。11月段祺瑞为了安抚冯玉祥任命他为湘西镇守使。1925年冯玉祥杀死徐树铮，为陆建章报仇。

建军西北

1921年8月任陆军第十一师师长，从属直系军阀，率其部队入陕西，在陕西督军阎相文自杀之后，接任陕西督军，并以此地为地盘扩充，受到苏联大力支持壮大，其军队因此被称为“西北军”。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出潼关，击败奉系的河南督军赵倜，之后就任河南督军。但因妄杀降将宝德全，被吴佩孚撤去河南督军，赴京面见曹锟，曹改任其为陆军检阅使。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派孔祥熙作为代表与冯玉祥见面，并带来《建国大纲》等孙中山的政治著作，得到冯玉祥一定程度的认同。1923年底，冯玉祥开始倾心于苏俄，由基督教转而仰慕社会主义，还在室内悬挂列宁肖像。冯玉祥部队纪律严明，苏俄的外交官越飞对他评价很高，加拉罕称其为“中国解放运动的柱石”。

1924年9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冯接受奉军张作霖50万银元的贿赂，在古北口与奉系代表达成协议，率军返回北京，发动北京政变，改称国民军，攻击直系。9月20日清晨，鹿钟麟指挥部队控制北京。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冯玉祥派人监视总统曹锟，逼其弟曹锐自杀，电请孙文北上。冯玉祥的倒戈，导致山海关一路的吴佩孚失败。11月5日，冯玉祥突然带领军队包围紫禁城。鹿锺麟奉大总统黄郛之命令，带着《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宣言文件，与李石曾和张璧带领军队占领紫禁城，使用武力要求逊位皇帝溥仪签署“取消皇帝尊号声明”，限溥仪在两天时间内，收拾个人物品，离开紫禁城，如果溥仪拒绝，冯玉祥威胁要烧毁紫禁城。溥仪为保护紫禁城免遭破坏，别无选择，只能无奈地答应其要求。11月10日，冯玉祥、张作霖分别到天津推举段祺瑞就

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1月12日，美国代办梅叶（Mayers）报告国务院，称现在苏俄对北京现政府影响巨大。冯玉祥辖区无出海口，与苏俄毗邻，外来接济依赖苏俄。此后，张作霖和段祺瑞合流，排挤冯玉祥。从11月24日起，冯玉祥多次发布辞职通电，表示不恋权力。张作霖表示挽留，称“我若是让你走了，我就是混账王八蛋”。12月12日，冯玉祥第三次发表辞职通电时，段祺瑞予以批准，并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驻节张家口，冯玉祥任命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自己兼任甘肃督办，由刘郁芬代理，薛笃弼为省长。

投靠苏联

1925年1月，冯受命为西北边防督办。2月，冯玉祥向苏联订购枪械。4月，苏联军事顾问加入冯军工作。此后，苏联军火源源输送至冯玉祥的基地张家口。1925年底冯玉祥参加反奉战争，支持奉系将领郭松龄反叛。1926年1月1日兵败后通电下野，赴包头。3月23日，离开平地泉访问苏联。4月9日国民军再度发动政变，逼走段祺瑞，释放曹锟，但随后因军事上失利，不得不撤出北京，在南口坚守。
1926年5月9日到达苏联莫斯科开始考察。

国民革命

1926年8月，李大钊委托于右任赶赴苏联请冯玉祥回国，23日，广州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政府委员。27日，冯玉祥启程回国，苏联顾问团和许多中共党员如邓小平与之同行。苏联从库伦运来1.5万支步枪，1500万发子弹，3万枚手雷给冯玉祥，大幅增强冯玉祥的实力。国民军在南口坚守四个月后，于8月退回西北。9月16日，冯到达五原后发表五原誓师宣言。17日，国民军各部将领公举冯玉祥为国民联军总司令。冯宣布国民军全体将

士集体参加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冯玉祥被委任为广东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策应北伐。在击溃刘镇华的镇嵩军之后，率领西北军东出潼关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为国民革命军指挥官之一。1927年1月，冯玉祥到达西安后，按兵不动，并不理会广州国民政府要其出兵的请求。4月5日，武汉政府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后，冯玉祥开始行动，随着唐生智开始大举进攻河南，河南可能落入他人之手时，冯玉祥于5月6日从潼关出兵，31日占领郑州，6月1日占领开封，与唐生智会师中原。

1927年4月，宁汉分裂。6月10日，冯玉祥在郑州与汪精卫会面，汪精卫答应冯玉祥的全部要求，河南、甘肃、陕西三省主席由冯玉祥、刘郁芬、于右任担任，冯兼任开封政治分会主席，指导三省省政。第二集团军扩编后负责陇海线以北、平汉线以东地区战事。唐生智部全部退往湖北。汪的任命对冯玉祥没有吸引力。而且冯玉祥对徐谦、邓演达和唐生智提出的“联合倒将，促蒋下野”不予理睬，还说：“宁汉合流，一致北伐，武汉和共产党分家，谁不赞成谁就出国考察”，让武汉国民政府的人大吃一惊。
冯主张分共的原因包括当时张作霖为离间北伐阵营，公布苏联驻华使馆内搜获的苏联援助西北军的武器清单，冯玉祥和苏联、中共往来的文件，称冯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赤色将军”“共产党嫌疑分子”。如果冯不表示反共立场，就等于承认自己和苏联中共是同路人，所以冯玉祥需要赞成“分共”以洗刷自己。6月19日，冯玉祥在徐州与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会面。冯称蒋“风采和言谈态度无不使我敬慕”，提出要给蒋介石造铜像。蒋称冯为“大哥”。20日，双方举行会谈，南京参会者还有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冯玉祥对南京方面印象深刻。此外，南京方面同意每月供应军费250万元，冯玉祥担任南京政府军政部长，冯玉祥非常满意。最后选择与身在南京的蒋介石合作，应蒋介石之要求，达成协议“分共、清党”。冯将他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和他管辖地区内的共产党员干部全部“礼送”出境。

中原毁佛

1927年，笃信基督教的冯玉祥在河南废寺逐僧，将大相国寺改成市场。并发动全省毁佛运动，所有比丘、比丘尼一律驱逐。所有寺产没收，寺院改为学校，或作救济院、图书馆，或成为娱乐场所。继河南之后，直、鲁、秦等各行省，也都纷纷跟从，华北佛教因此几乎衰绝。

与国民党中央的关系

1928年2月14日，冯玉祥在友人邵力子的撮合下与蒋介石在开封交换帖子成为结拜兄弟。5月6日，冯玉祥与蒋介石在济南以南的党家庄会面，会议决定继续北伐。5月10日，山东兖州举行南京政府党政联席会议，决定由冯玉祥行使总指挥之职位，蒋介石前往徐州养病。5月21日，蒋介石在郑州与冯玉祥会面，冯得蒋许诺山东归冯玉祥所有。5月，北伐军兵临京津冀地区，阎锡山派兵欲抢先夺取北京，与奉军激战，一度处境危急，向冯玉祥部请求支援。冯玉祥也欲抢夺北京，并因南口大战时阎锡山落井下石而怀恨在心，命韩复渠不仅不出兵援救，反而撤军，导致晋军右翼出现空当，给奉军反击的机会。后多亏白崇禧部赶到，阎锡山部逃过一劫。4月，北伐全胜的编遣会议之后，蒋介石、冯玉祥之间由合作转向分裂。

1929年4月，冯玉祥不满国军编遣会议比例式裁兵原则的决议，称病离开南京。5月14日于潼关出任“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但迅速被南京方面内外夹攻而失败，被迫离职前往山西。1929年5月22日，冯玉祥的部将韩复榘、石友三联合通电拥蒋叛冯开始。5月23日，冯玉祥被开除中国国民党党籍。6月，冯玉祥自陕西至太原，失去自由，后被囚于五台县建安村。期间，冯玉祥心腹鹿钟麟化妆为访问冯的政治要员的勤务兵，与冯玉祥秘密接触。冯玉祥当即命令鹿钟麟取代宋哲元担任西北军代理总司令，在《三国演义》上用米汤写下四条手谕，要求整顿失败后的西北军；为扩大实力，招抚投靠南京政府的叛将；向蒋介石示好，要求阎锡山释放冯玉祥，以公开通电的形式扩大影响，向阎锡山施压。1930年2月25日，阎锡山亲自迎接困于五台县三个月的冯玉祥至太原。3月7日，双方商定一同反蒋，阎锡山送冯玉祥八十万元现款，10日，冯玉祥由太原至潼关，收回军权。

1930年，联同阎锡山、李宗仁等与蒋中正对抗，引发中原大战，兵败后隐居山东泰山。1930年11月4日，冯在太原通电下野，隐居读书。经过中原大战，蒋冯阎李张五大集团中，冯玉祥成为唯一输得精光的总司令。

1931年7月，冯策动旧部石友三进攻东北军，反而被打败。1931年下半年，冯策动甘肃旧部反蒋，被蒋军打败。

1933年5月26日，与吉鸿昌、方振武、佟麟阁在察哈尔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时任察省主席的部将宋哲元并不支持，但又不便反对，因而离职，之后冯率军攻下由亲日军队占领的多伦，引起一阵骚动。惟因实力不足且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方面也派遣涂思宗及徐思贤先生，策反冯系将领与给予番号，因此，冯玉祥忖于大势已去，遂电请北平军分会派员整编，愿意将抗日同盟军旗帜放下，1933年6月9日北平军分会代表涂思宗及徐思贤抵张家口，冯玉祥亲迎并请自图书馆由涂将军担任主席举行整编会议，商讨善后事宜后返鲁。8月7日，冯被迫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总司令职，于8月17日重返泰山。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等在福建组成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冯派代表余心清参加，并被选为经济委员会主席，然后积极联络韩复榘、宋哲元呼应反蒋。

中国抗日战争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第三战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久被蒋中正撤职。1946年4月7日赴美国考察水利，并发表反蒋言论。

1947年6月8日，冯玉祥在美国发表声明，警告蒋介石政府官员应对国内逮捕、镇压学生之暴行负责。9月7日，冯玉祥在美国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希望美国人民及政府帮助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与自由，而不可帮助中国国民党内战独裁。9月9日，冯玉祥在美国发起组织“华侨和平民主协会”。1947年11月5日发表《我为什么与蒋介石决裂》一文说“蒋介石政权是中国所有腐败政府的顶峰，外国的金钱是无法使它免于垮台的”。1948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最终与以蒋中正为总裁及总统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中华民国政府彻底决裂。

逝世

1948年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搭苏联轮船“胜利”号，由美返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9月1日，中途因轮船出事于黑海遇难。“胜利”号正向敖德萨港口进发时，船上失火，冯玉祥被烟熏窒息致死，与女儿冯晓达一起罹难，冯玉祥时年65岁。也有人认为他是死于谋杀。

其墓位于泰山西麓。

评价

冯玉祥曾多次谋害政敌，张建功、郭坚、马廷勷、徐树铮等人均为其所暗杀。

1917年冯氏皈依基督教并受洗，还利用宗教力量来控制军队，故有“基督将军”的称号。

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说：“焕章先生的丰功伟绩，已举世尽知，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你为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呼吁团结、反对分裂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还望焕章先生为实现祖国和平、民主、团结而努力，不负国人所望。”1953年，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冯玉祥骨灰安放仪式上评价：“冯玉祥将军是一位从旧军人转变而成的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虽然和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由于政治视野的局限，在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瑕不掩瑜，冯玉祥将军为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将是永垂不朽的。”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林彪称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随后毛泽东对“冯玉祥式的人物”进行解释，对彭德怀说：“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林彪）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真伪有矛盾。不能说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心中很严重的东西不拿出来。”刘少奇以“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批判彭德怀。

1982年乌兰夫（次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在冯玉祥诞辰100周年纪

念大会上评价："冯玉祥将军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可敬的民主斗士，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

著作

冯玉祥 著：《我的生活：冯玉祥自传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12月1日，ISBN 978-7-5012-2748-8。

冯玉祥 著：《我的抗日生活：冯玉祥自传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12月1日，ISBN 978-7-5012-2749-5。

冯玉祥 著：《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台北市：捷幼，2007年7月9日，ISBN 978-957-8523-80-7。

纪念

1926年，北洋军阀刘镇华包围西安8个月之久，使西安人民饿死4万多人，直到冯玉祥将军率国民军击败刘镇华后西安才得以解围。1928年，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于西安城墙西门北侧开辟城门，砌单券洞，为纪念冯玉祥的功绩，取名"玉祥门"。1934年改称"中正门"，1935年改称"西北门"，后复"玉祥门"。

家庭

第一任妻子 刘德贞

第一子 冯洪国

第二子 冯洪志

第一女 冯弗能

第二女 冯弗伐

第三女 冯弗矜

第二任妻子 李德全

第三子 冯洪达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

孙子 冯丹宇 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

第四女 冯理达

第五女 冯颖达

第六女 冯晓达

======================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6%B1%AA%E7%B2%BE%E5%8D%AB

汪兆铭（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字季新，号精卫（亦为其笔名），历史多沿用其号，称其汪精卫，中国近代政治人物。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柯桥区），生于广东三水县（今佛山市三水区），清末秀才、官费留学生，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

青年时曾经参与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1910年，因为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判终身监禁；翌年辛亥革命后获释。早年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及文胆，孙中山逝世后，历任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行政院院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及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中国国民党副总裁等，自孙中山逝世直到中国抗日战争初期都是蒋介石的主要政治对手之一。后出走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声明，被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开除国民党党籍和一切公职。1939年6月8日，国民政府根据《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之规定将其定为汉奸，予以通缉。1940年3月30日，汪与日本合作在南京建立汪精卫政权。

家庭背景

曾祖父汪炌（1756－1832），嘉庆、道光年间幕游皖、湘、赣、粤各省，先后做过湖南巡抚阿林保、湖南按察使傅鼐及两淮盐运使曾燠的幕僚，为山阴汪氏游幕广东之始。

祖父汪云（1786－1844），汪炌长子，道光二年（1822）乡试举人，1835年选授浙江遂昌县训导，并执教于妙高书院。

父亲汪琡（1824－1897），汪云第四子，字玉叔，号省斋。先后在茂名、陆丰等地为幕僚。

早年经历

1883年5月4日，汪兆铭生于广东三水县（今佛山市三水区）。他是父亲汪琡的填房吴氏所生，是汪琡的第4个男孩，也是第10个孩子，那年汪琡已经62岁了。汪琡是个落第秀才。汪从3岁起，随父来往于曲江、英德县署，在英德居住了4年。后来汪琡弃文从商，他见这个小儿子异常聪明，就特别重视教汪读书，5岁时就开始教他认字。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汪8、9岁时，就基本可以读书了。汪琡晚年由于年老眼花，无法看清书上的小字，就让汪每天为他朗读王阳明的《传习录》，背诵默写陶渊明和陆游的诗，无形中培养出汪演讲口才。

1895-1896年，汪先后丧母丧父。此时他不足14岁，只得随兄长汪兆镛客居粤北的乐昌县，由于父亲去世没有留下遗产，衣食住完全依靠长兄，为了减轻长兄的负担，17岁的汪在县城的一个私塾里当老师教书，后戏称自己曾是“子曰先生”。1899年，汪师从三哥汪兆钧的外舅章梅轩学习文史经世之学。

重九游西山岩

笑将远响答清吟，叶在攲巾酒在襟。

天淡云霞自明媚，林空岩壑更深沉。

茱萸枨触思亲感，碑版勾留考古心。

咫尺名山时入梦，偶逢佳节得登临。

——汪兆铭，1897年作于乐昌

留学

被逮口占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兆铭，1910年作于狱中

1904年，清廷指示两广总督岑春煊选考留日官费生。家道清贫的汪得知消息非常高兴，于是约请朱执信、古应芬、胡展堂、李文范、陈融、叶夏声、孔昭焱等一批广州秀才前去报名，参加官费留日考试，结果他们都被取录。同年9月，他与胡展堂、朱执信等前往日本成为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学习之外，汪还从事译书工作，包括日本的《法规大全》等书，每月收入60元。期间，汪对君主立宪的改良运动还存有好感，曾前往横滨拜访梁启超，希望中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富强起来，并因此十分崇拜西乡隆盛和胜海舟。他曾说“我每一次到神田一带的书店里去的时候，总不忘记搜集与这两位伟大人物有关系的著作。星期日到上野公园去，总尽量眺望着西乡的铜像”，认为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明治维新不会有那样好的成就”。

1905年7月，通过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与兴中会会员发生联系。当月下旬，汪与朱执信在东京神田锦辉馆进谒孙中山，孙的演讲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汪于是加入中国同盟会。7月30日，汪在赤坂区桧町黑龙会会所参加同盟会筹备会，与黄兴、陈天华、马君武起草会章。8月20日，在日本众议员坂本金弥家召开的同盟会成立大会上，汪被选为评议部部长，成为孙助

手。曾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开始使用《山海经》中的“精卫”为笔名，曾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革命的决心》、《革命决不致招瓜分说》、《再论革命决不致招瓜分之祸》。对此，两广总督岑春煊非常不满，派人前往日本要求汪停止革命活动被拒。岑春煊于是要求在其幕府工作的汪兆镛为汪定亲，返粤和刘氏女结婚。汪接到来信后，以“家庭罪人”名义复信称：“事已发觉，谨自绝于家庭，以免相累”，“俾为国流血，以竟其志，死且不朽”。汪兆镛接到信后宣布“驱逐逆弟永离家门”，送状子至番禺县报告存案，解除了与刘氏女的婚约。革命党人因此对汪表示赞赏。

1906年，汪以两百多学生中第二名成绩从法政大学毕业，开始随孙游走越南、马来亚等南洋各地以设立同盟会分会，策划在中国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同年7月，汪与张永福、陈楚楠等在新加坡吉宁街十三号出版《中兴日报》，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论战。汪侧重从革命理论方面回击康梁。

跟随孙中山筹划革命

1906年，汪毕业后返回香港。隔年1907年3月，清政府施压使日本驱逐孙。孙率汪与胡汉民离开日本，前往南洋筹款。从1907年至1909年，汪奔走南洋各地，足迹遍布河内、海防、西贡、新加坡、暹罗、仰光，组织分会一百多处。汪擅长演说，有很强的煽动性，往往未登台前会场已座无虚席，汪登上讲台后全场鸦雀无声，讲至精彩处掌声如雷。胡汉民后来评论到“余20年来未见有工于演说过于精卫者。”马来亚槟城华侨富商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因其演说成为汪的崇拜者，为此还认购了《中兴日报》的股票。1908年，二人在同盟会会员吴世荣家中结识。陈璧君因富赡文采，成为孙秘书，亦是其文告捉刀人与革命事业得力助手。 1909年，汪与陈璧君一同转赴日本。

归国行刺

当时，革命党人在中国多次发动起义，屡次失败。1909年3月，清廷宣布预

备君主立宪，东京同盟会会员沮丧情绪增加，意志消沉。5月，同盟会内的原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章太炎等在同盟会搞分裂活动，攻击孙将捐款中饱私囊，发表《孙文罪状》，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并刊印传单攻击“今之《民报》为孙文、汪兆铭所私有”。借此机会，保皇党大做文章。11月，《南洋总汇新报》发表该传单并攻击革命党。梁启超等保皇改良派讥讽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汪为此大受刺激，灰心丧气。

为了回击保皇派，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约请在日本的喻培伦、黄复生、黎仲实、陈璧君、罗世勋等由香港潜入北京，谋刺清摄政王载沣。孙、黄兴、胡汉民等人多次劝阻，汪仍自行其是，并为此反复与之辩论。9月，黄复生与但懋辛赴北京，经营暗杀机关。行前《致南洋同志书》中说：“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12月，汪和陈璧君、黎仲实等由香港前往北京，在琉璃厂火神庙夹道组织秘密机关，开设照相馆为掩护，又在东北园租赁一屋作为活动场所。最初选择的暗杀对象是庆亲王奕劻，但因其戒备森严，未能得手。后试图刺杀从欧洲考察海军归国的载洵、载涛。二人携带盛炸药的铁壶在东站等待，因戴红顶花翎的人太多，汪等人无法认出而未下手。最后决定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

1910年2月21日，汪在北京后海北岸的银锭桥埋设炸弹，再敷设电线。电线太短不够。第二天添购电线，晚12时下桥。喻培伦发现有人蹲在桥上观察，告诉汪躲避。黄复生见三人持灯笼下桥寻觅，“良久乃出”，认为秘密暴露，匆匆赶回东北园，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议喻培伦赴东京购买炸药，黎仲实、陈璧君赴南洋筹款，汪和黄复生留守北京，等炸药到后再谋进行。

当时清廷因为此案满城风雨，传出各种流言，普遍认为是公族之间倾轧斗争所致，有说溥伦想篡位，有说是庆亲王奕劻与肃亲王善耆有矛盾，想中伤善耆，因为炸药的纸上写有“伦敦”字样，也有说是载洵、载涛从英国带回的。清廷如临大敌，出动了所有密探，密布于客栈、餐厅、酒楼、茶

馆、妓院、剧场等，力求尽快破案。4月16日，汪与黄复生在东北园谈话后，二人与罗世勋分别被捕。孙在纽约闻讯后极为关心和痛心，对身边人表示“昨汪兆铭先生在北京谋炸载沣失手，不幸被捕，已被监禁，将来必无幸免，此即无异断吾臂也。”
汪狱中写了长达数千言的供词，他引用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立宪的历史，指责清廷立宪“适为君主权力之保障”，无法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为了不牵连黄复生，否认黄复生知道自己的意图。他还为此赋诗，慷慨激昂，一时为人传诵。在审理汪等政治犯的过程中，清廷举棋不定。包括摄政王载沣、法部尚书廷杰、大学士那桐、学部侍郎宝熙在内的官僚主张判处死刑。期间，同盟会领导人千方百计设法营救汪。当时同盟会会员程家柽在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家任教师，对善耆做工作说：“国家如枉杀汪、黄，则此后党祸日夕相寻，非朝廷之福。”在审理中，善耆也对汪之人品才学产生敬重，外加清廷担心如杀汪，可能会导致革命党更加暴力，经过善耆对摄政王的斡旋下，载沣同意其意见，改判终身监禁。汪一案，清政府没有株连他人，审讯时不用下跪，饮食得体，可以将日常衣物送入狱中穿戴，并一人一室，行动自由。汪“终日披卷吟诵，颇觉安逸”。善耆经常到狱中向汪嘘寒问暖软硬兼施，并赠以图史百余帙，试图使汪变更革命决心，曾为此将他带到法场对他进行逼迫。善耆常在狱中与汪谈论天下大事，讨论诗歌。贝子溥伦也曾到监狱探望，改善了他在狱中的生活条件。汪在监狱中得知黄花岗起义后亦曾写诗祭奠。

自此之后，汪对善耆十分感激，而其精神状态也发生重大改变，诗词风格由高亢激昂逐渐趋于低沉消极，有“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诗句，视革命党人与清廷的斗争为“煮豆燃萁”（兄弟阋墙）。肃亲王在大连病逝后，汪曾前往慰吊，并对张学良说：“我当年被捕，是肃亲王审的。要杀我，肃亲王可以杀，肃亲王没杀我。但肃亲王就跟我讲啊，说：‘你们这革命呀，当然啦，你们是有原因的，看我们清朝太坏了。唉！假如你们成功啊，我看你们也不能强过我们什么的。’他这句话所说的应验了，我们今天成功了，真

是还不如人家前清，弄得这么糟糕！”
武昌起义之后，1911年10月30日，清宣统帝“下诏罪己”后，政治犯得到赦免，11月6日，清廷大赦政治犯，汪、黄被释放。
辛亥革命
汪获释后，与袁克定结识，后与之结拜为异姓兄弟。在袁克定的引荐下，汪于锡拉胡同袁世凯住宅与之会面，每天晚上饭后7点或8点会见袁世凯，11点或12点离开，为其讲解民主立宪的本质，汪还推荐同盟会会员魏宸组为袁世凯深入讲解，“袁渐渐不坚持君主，最后不言君主，但言中国办到共和不易”，汪、魏说“中国非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11月15日，汪与日本法大速成班时期的同学和好友杨度宣布成立“国事共济会”，总部设于天津，11月18日于天津《民兴报》发表《国事共济会宣言》，称“中国自有立宪问题发生，国中遂分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两党”，于是主张成立国民大会，将两党不同政见，诉诸民意，“不以兵力解决，而以和平解决”。革命党喉舌对此发表了题为《无聊之共济会》，逐点批评了国事共济会的宣言和章程，“即如汪兆铭，亦鼓吹革命有年，乃党人之有学识者……竟感虏廷不杀之恩，而为彼满皇说法乎？”11月27日汪赴天津，筹组京津同盟会分会，直接管辖暗杀部，后受袁世凯示意组织黄复生暗杀了良弼。12月5日，该会宣布解散。载沣下台，清廷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后，委托唐绍仪为总代表，汪等人为参赞，参加南北议和。期间，汪与南方黄兴保持书信联系，沟通南北。
南北和谈开始后，汪前往武昌与黎元洪会面，后来到上海。作为南方总代表伍廷芳手下的四名参议之一，他在上海伍廷芳的寓所——一观渡庐与唐绍仪研究对策，而且“差不多每天都有密电向袁世凯报告南方的一切动态”，因此有人称汪为“政治两栖动物”。
12月25日，孙从海外归来。26日，汪出席了孙召开的同盟会领导人会议，主要讨论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孙反对称：“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

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汪与黄兴、胡汉民、陈其美、张静江、马君武等认同孙意见，遂决定采用总统制。12月29日，孙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汪等人还根据孙指示的精神，起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孙起初反对议和，认为“革命之目的不达到，无和议之可言也。”1月11日自任北伐总指挥，以黄兴为陆军参谋长，举行北伐。汪对此表示极力反对，认为“权力为天下之罪恶，为政权而延长战争更无可以自恕”，并指责孙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孙在各方面舆论包围和革命党人的催促下不再坚持己见。胡汉民后来回忆他与汪二人劝阻孙，“可云功之首，而又罪之魁！”

1911年底到1912年初，中国北方的革命党多次在通州、滦州、任丘发动武装起义，汪以同盟会北方领导人的身份，派人四处劝阻，强调“吾党京、津、保一带同志，自应遵守诺言，不可有所行动”。北方革命党人则指出停战范围不包括京、津、保地区，且“我虽停止活动，彼（袁世凯）仍逮捕枪杀，奈何？”汪回复“项城期望于和议者甚殷，且治军严，当无如此轨外行动”。袁世凯以党人起事责问汪兆铭时，他则说“当为匪类之结合，请依法办理。”

1912年宣统退位、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汪曾发誓不当北洋政府的官员、议员。孙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时，汪曾力辞广东都督一职，表示“革命成功了，应该让有学问的人去担任国家重任，我过去为革命没有读书，现在应该让我出国求学。”2月，汪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在上海组织“进德会”，力图改变社会风气，提倡“八不主义”，“六不主义”，倡导“不做官”，“不当议员”，“不吸烟”， “不纳妾”。2月21日，汪与蔡元培、魏宸组、刘冠雄、钮永建、宋教仁、曾昭文、黄恺元、王正廷、唐绍仪受南京临时政府特派，一同乘船北上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4月，汪还与蔡元培、李石曾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认为：“今共和立，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应“首重教育”，“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但是留学费用昂贵，“其事甚难普及”，为了推广留学的方法，向欧洲“民主民智先进国”学习，“节俭费用”，养成“劳动朴素、勤洁苦学之风”，所以成立该

会。同年4月，在北京成立留法预备学校。

当年春，汪和陈璧君在上海结婚，并前往广州省视兄嫂。8月辞去一切政务，经南洋赴法国学社会学与文学。汪途中浏览了马来半岛的太平山、印度洋，创作不少诗歌译作，他在诗歌中表达了不过问政治的倾向，对斗争表示厌倦。

中年经历

二次革命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正酝酿中。汪得知后于6月2日和蔡元培回到上海，后与张謇、赵凤昌商谈停战条件，主张袁世凯当正式大总统，暂不撤换四省都督，宋案以法律形式解决，追究应止于洪、应二人。张謇认为汪“可亲可爱”，6月13日给袁世凯写信夸汪“明达事理，能顾全大局”，建议袁世凯：“即电请汪、蔡人都，俾指导其党之暴乱分子，使选举时稳静一致。”袁世凯于6月16日复电曰：“倘伟大（指孙）果有意休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人非至愚，谁肯受此？精卫达者，已托燕孙转约北上。”不久，袁世凯给汪写亲笔信请他北上，称“如惠然肯来，以罄心曲，必于国事有所裨益。”

6月10日汪前往广州呼吁革命党人放下武器。7月中，二次革命正式爆发，汪返回上海，心情极为沮丧，称“余生可厌，死所未获”，由于战争已成事实，汪发表电文，声讨袁世凯，支持讨袁战争。7月19日，他与唐绍仪、蔡元培联名致电袁世凯，促其辞职。同日，他又与蔡元培、吴稚晖、张继等创办《公论晚报》，刊登讨袁文章。

革命失败后，亡命法国与蔡元培比邻而居，入法国里昂大学攻读社会学。当时中国留法学生多集中在蒙达尔纪城，汪与蔡元培、李石曾热心于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每星期前往讲述中西学术。其间袁世凯、袁克定父子通过朱芾煌汇来三千元给汪和蔡元培，后邀请他们回国任高级顾问被拒绝。汪与吴稚晖在巴黎时，曾经有一次，吴氏手里捧著一顶军帽，很严肃地献给汪，他说：“你戴上吧！今后要革命，要救国，要实现主张，要贯彻主义，一定要依靠武力，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军事家，来领导同志。你如能挺身以

当大任，我第一个就愿意向你磕头。”当时汪表示他对军事没有兴趣。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汪与陈璧君回国参加“护国运动”，将子女寄托给在波多的蔡元培照看。

1917年7月，孙离开上海开赴广州组织护法运动，命汪回国，汪由法国经英国、芬兰和西伯利亚返国。此时，俄罗斯帝国处于革命前夕。汪亲身感受到俄罗斯人民反战情绪。1919年，广州军政府任汪为巴黎和会南方代表，汪对军政府不感兴趣，没有接收，并再度赴法。

汪年少时期相貌英俊，被普遍公认为是美男子。1918年徐志摩在日记中写道：“前天乘着湖专车到斜桥，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经农、莎菲的先生（老师）Ellery，叔永介绍了汪兆铭。1918年在南京船里曾经见过他一面，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胡适）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

任职广州

1920年10月，汪奉孙之命第四次回国。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出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此为汪首次出任政府官员。他对广东政局颇为不满。1922年5月，孙派汪前往惠州劝陈炯明回广州担任陆军总长协助北伐被拒。后汪多次前往劝说无效。后来，陈炯明反叛。同年，孙的北伐对象直系吴佩孚、曹锟制造舆论，主张“孙吴合作”，派人前往上海迎孙北上，遭孙断然拒绝。孙派汪前往奉天，与张作霖联系企图利用奉系势力打击直系。同年，陈独秀、李大钊多次与孙会晤，处境艰难的孙开始考虑与苏联合作。9月、11月、12月，孙在上海三次召开干部会议，研究国民党改组问题。汪赞成改组，但对共产党人士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持有异议，认为这样做，就好比《西游记》上的孙行者钻进熊精的肚子里翻斤斗、使金箍棒，熊精如何消受得了？但孙的态度坚决，甚至宣称要组织新党，或孙本人自己加入共产党。汪于是不再坚持己见并积极办事。在第二次会议上，汪与胡汉民成为国民党改组宣言的起草人。10月19日，孙任命汪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以参与改组国民党本部的事宜。在国民党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汪被指派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推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并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汪以章程审查委员会主席身份作审查报，广东代表方瑞麟发言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李大钊登台驳斥。汪态度鲜明地支持了李大钊，并说过去吴稚晖、李石曾、张继都是无政府党人，“我们已承认他们为国民党员，如何对于共产党员又不允许他，这是什么道理？”廖仲恺也发言表示“共产党的加入是本党的一个新生命”，“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夫的”。方瑞麟的提案于是被否决。汪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任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7月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汪为委员之一，进入国民党中央核心。此时，汪在解释三民主义时说“三民主义的性质，是反帝国主义的，是非资本主义的；而苏俄是反对帝国主义非资本主义最坚决最有力的国家，所以中国革命应该联合苏俄，这是联俄的真意义。……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们拿什么去联俄，我们可以答道：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与共产主义的苏俄，都是反帝国主义的，都是非资本主义的，所以有联合的必要与可能。”在农工政策方面，汪认为要点是党与政府应该唤起民众，为民众的利益奋斗，民众应该服从党与政府的指导，结合成国民革命的基本势力。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邀孙北上。孙商议，令胡汉民留守广东，汪以孙的中文秘书名义随行，同行的还有宋庆龄、戴季陶、孙科、李烈钧。11月17日一行人先到上海，孙命汪先前往北京，做好事前布置，自己前往日本后再赴北京。21日，汪抵达天津，并向报界发表谈话。12月5日下午，孙在汪、李烈钧、邵元冲、孙科等陪同下前往曹家花园与张作霖会面对其表示答谢。31日，一行人抵达北京。孙病重后，指定汪、李石曾、吴稚晖、陈友仁、李大钊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会议，汪为首席发言人，在许多场合代表孙讲话。汪讲话指责段祺瑞执政府善后会议有欺骗性。3月1日，汪出席国共两党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
1925年2月，孙临终前预立三份遗嘱，分别是《孙中山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孙去世前，汪陪伴左右，曾表示害怕在自己死后他们要不因害怕危险被“敌人软化”，要不则遭敌人“加害”闭眼不再说话。

汪于是表示不怕危险，不会被敌人软化，请求孙为其指明“怎样向前去奋斗”，并表示自己预备好了几句话，可读给孙听，如表赞成便签字画押。孙表示同意。汪随即取出一张纸，低声慢读“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张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当天，孙没有签字。3月11日，孙意识到了自己不久于人世，在遗嘱上签字。3月12日，孙去世。由于奉行“天下为公”，主张召开国民大会，实现民主，孙并没有在遗嘱中提及接班人，也没有口头交代。此时，廖仲恺、胡汉民、汪三人为国民党元老，很有资格接班。但廖仲恺由于左倾，且比较激进，遭到右派反对。胡汉民代行过大元帅一职，接班条件明显，但由于立场右倾，又遭到左派反对，且人缘不好，威信不高。汪一方面得到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处世表现得调和折中，右派较为接受。孙垂危之际，汪在北京主持临时政治会议，讨论孙逝世后国民党和政府的领导体制问题，决议将广州大元帅府改为合议制，胡汉民接到电报后主张组织一个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廖仲恺、汪表示同意。5月，汪离京南下。8月到达汕头。

国府主席

自1905年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后，到1925年孙去世，在孙领导下，胡汉民重在内部策划，汪精卫重在对外联络，蒋介石重在军事任务，三人大致分工合作。

1925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汪在加拉罕、鲍罗廷的支持下，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继续执行孙的联俄容共政策。

从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到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第一次汪蒋合为时仅半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刺，胡汉民嫌疑重大，许崇智和蒋介石主张杀之，汪由于和胡私交很深，认为胡“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

任”，允许其离开广州，以赴莫斯科考察的名义将其驱逐出国。接着，在蒋的要求下，汪以军委主席身份发布命令，让蒋以广州卫戍司令的身份“全权处理粤局”，合法地解除了许崇智的武装，合法将其驱逐，蒋于是趁机一跃而上，开始对汪构成威胁。汪于是撤换了蒋的亲信陈肇英，处分了蒋的拜把兄弟欧阳格。11月23日中国国民党右派戴季陶、林森、邹鲁、谢持等在北京碧云寺以“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召开“西山会议”，反对汪左倾，决议“撤除汪精卫中央执行委员的职务，并开除汪精卫党籍6个月，不准其在国民政府中任职”。

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内地和海外代表共256名，汪在开幕式上演说。1月4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午10时开会，汪临时主席，林祖涵报告大会筹备经过，谭平山报告代表资格审查经过，吴玉章报告大会秘书处组织经过，通过会议规则，汪、谭延闿、邓泽如、丁惟汾、谭平山、恩克巴图、经亨颐7人为主席团，下午继续开会，丁惟汾主席，汪报告接受总理遗嘱经过，决定在广州粤秀山（即观音山，今称越秀山）建接受总理遗嘱纪念碑。1月6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举行，上午汪报告《两年来政治经过状况》，汪并报告鲍罗廷在政治委员会工作之情况，大会决定向鲍罗廷赠一银鼎以志感谢，下午蒋报告军事状况，于树德报告北方政治状况，议决组织宣言起草委员会，汪、邵力子、高语罕3人为起草员。1月9日，孙科、吴铁城由上海返广州，汪、蒋同意孙科、吴铁城之三条要求。1月1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举行，上午郭春涛、于树德报告北京党务，下午汪报告宣言大纲，冯品毅、张晋、董用威（董必武）分别报告河南、东三省、湖北党务。1月16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举行，选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36人：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谭平山、宋庆龄、陈公博、恩克巴图、于右任、程潜、朱培德、徐谦、顾孟余、经亨颐、宋子文、柏文蔚、伍朝枢、何香凝、丁惟汾、林祖涵、戴季陶、李济深、李大钊、于树德、甘乃光、吴玉章、李烈钧、陈友仁、王法勤、杨匏安、恽代英、彭泽民、朱季恂、刘守中、萧佛成、孙科。1月19日，中国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下午闭幕，发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汪致闭幕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议任命蒋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汪为党代表。1月4日至19日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议决继续执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离开中国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由于蒋成功迫使国际共产党让步，替换了与汪亲密、反对北伐的苏联驻广州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等人的职务。事件当天，身为国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汪因病在家休息，陈公博前来通报才知道广州戒严。汪的威信备受打击，因此十分气愤。3月22日，在汪公馆开政治会议，汪等面对的是苏联人已经决定让步的现实。决议“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汪以治疗糖尿病，5月11日离开广州赴香港，6月中旬经法国马赛抵达巴黎乡间，于此隐居直至1927年3月。1926年7月9日，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由蒋担任总司令，开始国民革命军北伐。因蒋逐渐与国民党左派与中国共产党分歧，力邀汪归国主持武汉国民政府，11月下旬，汪虽然因盲肠炎刚刚开刀，身体未痊愈，但是依然决定带着陈璧君和曾仲鸣匆忙启程回国。经过柏林时卧床不起，高烧40℃，又不得以返回巴黎。

1927年2月下旬，汪经德国、波兰至莫斯科，住了5天，会见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然后乘火车至海参崴，再乘苏联邮轮回国。

3月11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出席委员28人，孙科任主席，根据“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议决下列各项：一、改选常务委员，汪、谭延闿、蒋、顾孟余、孙科、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九人当选，二、改选中央党部各部部长，组织汪（吴玉章代）、宣传顾孟余、农民邓演达、工人陈公博、商民陈其瑗（旋改王法勤，由经亨颐代）、妇女何香凝、海外彭泽民、青年孙科，三、改选中央政治委员，除中央常务委员九人兼政治委员外，宋子文、陈友仁、邓演达、林祖涵、王法勤、宋庆

龄六人当选，四、选蒋等15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汪、唐生智、程潜、谭延闿、邓演达、蒋、徐谦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五、选汪等28人为国民政府委员，孙科、徐谦、汪、谭延闿、宋子文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3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通电公布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选出国民政府委员25人名单，计：汪、孙科、宋子文、于右任、徐谦、冯玉祥、程潜、谭延闿、陈友仁、李宗仁、谭平山、钮永建、蒋、柏文蔚、王法勤、吴玉章、何应钦、孙庚、彭泽民、经亨颐、黄绍竑、杨树庄、陈调元、朱培德、唐生智、李济深、宋庆龄、顾孟余，国府常务委员五人：孙科、徐谦、汪、谭延闿、宋子文。

返回中国

1927年4月1日，汪自欧洲回国，经莫斯科于是日抵达上海。宋子文前往吴淞口迎接。期间，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李石曾等提出“共产党已预备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图指使工人在租界发起暴动，以引起国民党的外交纠纷”。4月3日，汪是日至4月5日与蒋、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吴敬恒、李石曾、蔡元培等10余人，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讨论蒋提议：赶走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分共，汪不赞成立即分共，经反复策划后决定：一、定4月15日召集中国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问题，在开会之前各地中国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发命令可以拒不接受，三、由各军队、党部、团体、机关之最高长官和主要负责人对“在内阴谋捣乱”者，予以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蒋发表支持汪复职通电，内称：“自汪归来，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皆在汪指挥下统一于中央，本人独司军令，俾专责成。”。

汪表示同意分共，但是在分共的时间和方式上有不同主张，强调党纪法统，因此被他人称之为“始终袒共”。会上议会人士与汪辩论十分激烈，吴

稚晖甚至向汪下跪求其改变态度。4月5日，汪与陈独秀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即《告两党同志书》），称：“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表示国共两党“万希各自省察，勿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同日，国民党领导在上海再次开会，汪遭到吴稚晖的臭骂，称他“狗不如”，要他“滚蛋”，为此汪痛哭流涕，表示自己也反共，只是方法不同。李宗仁主张将其软禁，不能放虎归山。宋子文得知后，当天夜里将汪偷偷送到“江丸号”轮”上，4月6日凌晨汪不辞而别悄然赶赴武汉。

1927年4月9日汪到达武汉，得到武汉各界人士的欢迎。4月11日，汪在武汉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还在《中央副刊》上题词：“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同日，汪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反对蒋的清共建议，坚持容共。4月12日，南京的蒋与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国民党元老，由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下令清除共产党。汪发表讲话，痛斥蒋的武力清党行为，也认为两党之间在长时间中，目标一致，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4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胡汉民、吴敬恒、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邓泽如、萧佛成、柏文蔚、陈果夫、甘乃光、黄绍竑等在南京举行四中全会预备会议，胡汉民主席，决定全体委员会于4月13日上午10时举行，并电催汪等来南京。4月16日，汪在武汉致电各级党部、各地方政府，斥责蒋违背中央命令，围缴工人纠察队枪械，谋开西山会议式之会议，反抗中央；汪在武汉以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召开“国共两党联席谈话会”，讨论应付时局办法，4月18日决定先行北伐。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上午9时政府委员蒋、吴敬恒、张静江、胡汉民、柏文蔚、蒋作宾、蔡元培、邓泽如、李石曾、陈铭枢、甘乃光、陈果夫、叶楚伧等举行就职典礼，由蔡元培授印，胡汉民代表受印，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发表《建都南京宣言》，同日各团体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庆祝建都南京与恢复国民党党权大会”，蒋、吴敬恒、胡汉民等莅会并发表演说，通过

“请中央执监联席会议严厉取缔跨党分子”、“请中央执监联席会议训令各级党部从事清党运动”等案，会后举行游行和阅兵式；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秘字第一号令，通缉中国共产党首要和中国国民党“附共分子”197人，通缉令称：“查此次逆谋，实以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等为罪魁，以及各地共产党首要、次要危险分子，均应从严拿办。”；武汉国民政府下令免蒋本兼各职，令称：“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同日又令：“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方面军及总预备队，着均归军事委员会直辖”。是为宁汉分裂。虽然汪到武汉后言辞激烈，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但却对兴起的工农运动感到恐惧，“当4月中旬，兄弟到武汉，看见那边情形，不但不像十三四年间的广东，也不像十五年间的广东了。其时武汉已成为共产党把持的局面了。只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其理论与方法已完全是共产党的，而不是国民党的了。”他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算不得有大资产阶级，共产党所谓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大地主、小地主……在实际上界线难定，只是共产党欲利用这个名词捣鬼，将其所欲打倒的，加上一个“大”或“中”字。汪以巩固联合战线、维护工商利益为名，将工农运动称为“幼稚”、“过火”、“越轨”，要加以严厉制裁。4月21日，武汉军事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一致努力完成北伐及肃清蒋等叛党分子；蒋通电宣布军事委员会由广州迁移南京，于本日开始办公。4月汪决定制裁党内违反本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5月，武汉政府分别颁布法令，保护地主、工商业者，制止工人及店员过度要求，禁止其干预厂店管理。6月，发布通令保护军人家属财产土地。武汉国民党中央还制定了《禁止民众团体及民众自由执行死刑条例》。

宁汉之争

1927年6月1日，共产国际给鲍罗廷、罗易之5月“紧急指示”传到中国，要求

实行土地革命，吸收工农领袖充实中国国民党中央，动员2万名左右共产党员，加上5万名工农革命军组成一支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中共中央立即举行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决定回电莫斯科："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6月5日罗易将国际指示泄露给汪精卫，并要他"接受电报的要旨"，"否则就将国民党一刀两断"，汪拒绝接受，并指责说："你们破坏了协议。"罗易本来想拉拢汪，然则引起汪的严重不满，遂开始提防中共。6月12日，汪、谭延闿、孙科、顾孟余、徐谦于郑州会议结束后，是日返武汉，于右任附车同行。
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指斥武汉国民政府"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声明中国共产党"永远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民众利益而奋斗，决不能对于国民党中央现时这种政策负责"，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之共产党员，但共产党员不退出国民党，不抛弃与中国国民党合作之政策，宣布中国共产党将继续绝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反对一切封建余孽，继续增进工人利益和解放农民之斗争；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因汪集团背叛，革命形势逆转，无力挽回，于上月末化装成检查电线之工人离开汉口北上郑州，转西安赴苏联，是日发表《辞职宣言》。7月14日晚，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秘密召开"分共会议"，兼有中国国民党籍之中国共产党员都被排斥而不得参加，汪在会议上极力主张"分共"，陈友仁代宋庆龄发言极力反对，称："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会议决定派重要人员赴莫斯科说明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之中国联合共产主义之俄国，并讨论"切实联合"辦法，对于"违反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之中国共产党员予以制裁；宋庆龄因汪集团排斥中共，写成《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7月18日在汉口《人民政坛报》公开发表；共产国际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冯玉祥、徐谦、孔祥熙自洛阳致电南京、武汉政府，力陈内

证妨害对外，主张召开开封会议，专议党内问题，双方停止向安徽、江西征调军队，共图和平，凡会议公认负咎之人，均当服从众议下野，7月18日胡汉民、钮永建、吴敬恒自南京覆电赞成携手反共，惟对汪等上月覆冯祃（6月22日）电中所称“南京决难宽恕”之言及武汉倒蒋之行动表示不满，7月22日冯玉祥再电汉口汪劝和，并提开封会议办法，7月24日汪等覆电赞同，声明反共，愿迁都南京实行宁汉合一，如宁方赞同，可在开封开预备会议，不必拘会议形式，汪并另电致冯，称对蒋只有公愤，别无私仇，但“政府法统必以死争”。

1927年7月15日，武汉中国国民党汪集团发动“七一五分共”，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分共”，汪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报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悍然称中共中央7月13日《对政局宣言》是“破坏本党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中国共产党既然退出国民政府，“则在国民革命军中、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会议通过《取缔共产党》案，正式和中国共产党决裂，随即在武汉大捕中国共产党人，在育才学校、文化书社等处一日即捕20余人，中共中央从武汉开始转移和疏散人员，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解散。7月26日，汪准备在庐山开反共会议，通知贺龙、叶挺到庐山参加，并令所部集中德安。贺龙、叶挺、叶剑英、高语罕、廖干吾在鄱阳湖小船上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不去庐山，部队亦不去德安，而按第二十四师、第二十军顺序速向南昌开进，是日贺龙第二十军到达涂家埠。7月27日，鲍罗廷离开汉口乘京汉铁路车北上郑州，转道陕、蒙回苏联，汪、谭延闿、孙科等到车站送行。7月28日夜，汪偕孙科、张发奎等离开汉口赴九江，次日到庐山，密商加紧“清共”，唐生智、朱培德、黄琪翔、金汉鼎均与会，会议决议：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干吾、高语罕等人。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北伐军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8月2日，胡汉民、钮永建、吴稚晖、李烈钧覆冯玉祥

转汉敬（7月24日）电，谓“汪精卫前存意气，故未能开诚相商，只须实践四月开执监大会之宿诺，则其重要分子来柄大权，亦所希望”，次日汪、谭延闿、孙科、唐生智、程潜等联名电冯表白彻底反共，谓已通告于一个月内开执监会议，“俾进行讨共及对北战事”，8月8日李宗仁、蒋、胡汉民等11人电谢冯玉祥，宁汉妥协成立。8月3日，汪等电冯玉祥，表示愿与宁方一致努力，消灭共产党，汪称：如宁方“果能尊重中央，南讨共贼，北伐奉鲁”，他个人之进退，无关轻重。8月4日，汪致书西山会议派许崇智，对容共表示认错，并对许颇多推多推崇，要其“出而负责，置党于最安全之地”。8月7日，汪在中国国民党湖北特委会临时宣传大会上作反共演说，称：“我们今日已经到了决斗时期，要和共产党，和一切假革命派决一死战。”。

8月8日，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议决，开除跨党中国共产党员之中国国民党党籍：一、由中央党部下令，凡列名南昌革命委员会之跨党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开除党籍，并免职通缉拿办，二、列名中国国民党执监及候补执监委员之跨党党员杨匏安、毛泽东、董用威、邓颖超、许甦魂、韩麟符、于树德、江浩、夏曦等，一律开除党籍并免职；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蒋、胡汉民、李烈钧等电武汉汪、谭延闿等，谓“伏读江（8月3日）电，喜极而涕”，“前电明令，共党全退出党部，则党只有整个善后，并无两派争执，开一中央全会，以促大会之进行，早望彻底整理，自亦宜之。然南京集会，汉上同志早有决议，翘请汉同志，及早莅临，以践夙诺”。汪的武汉政府开始逮捕处死中国共产党人，实行武力分共。8月9日，武汉汪等通电全体中国国民党员，首述反共经过，继谓中国国民党之危机，因反共已去其一，惟分裂不可不及时解决，决于一个月内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内纠纷，8月11日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告各执行委员，预定本月15日召集之四中全会，延期至9月15日在南京举行。8月12日，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会议，蒋以北伐受挫，宁汉谋和之压力，提出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军事方面交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总指挥负责。晚11时30分偕白崇禧、黄

郛暨随员、卫队离开南京赴上海。李宗仁、白崇禧自南京联名通电汪、谭延闿、唐生智、程潜、朱培德、张发奎、陈公博等创议宁汉联合。内称：诸公毅然清党“讨共”，“已与宁方一致，其他党内问题自可迎刃而解，而介公蒋介石以其所抱清党去鲍罗廷目的已达，对于总揽戎机之权，急须卸脱仔肩，离宁休养，所有总司令之职权，交军事委员会接收”，“党内政治问题，亟须推诚计议，迅谋解决，请速电示进行方针，以便合宁汉全力一致北伐”。8月13日，蒋在上海通电宣布下野，蒋氏辞职宣言，申述反共经过，并期望同志实行三事：宁汉合作，并力北伐，彻底清党，并谓：“即应自劾而归去，解除职权，以谢天下。”，同日下午乘轮赴宁波转奉化原籍。8月14日，白崇禧、夏威、胡宗铎电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商宁汉合作，内称蒋已离宁赴沪，总司令职权交军委会接收，现双方所争持者皆不成问题，至因争持期间所发生之诸问题而必须先解决者，仍由代表赴浔面商。8月15日，武汉汪、谭延闿迭接南京要求合作电报，是日覆电请李宗仁等赴九江协议；汪在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作报告，称“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都只有一个，谁亦不能任意把持……我们坚持我们主张，务必达到提高党权的威权”，武汉政府早已决定要迁往南京。8月19日，武汉政府依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议，通电宣布迁都南京，并以中央执委会名义发表《迁都南京宣言》，称：“今者蒋中正既解除兵权，以听命于党，李宗仁等复环请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由武汉迁都南京，以实行四月初旬之决议，而亟谋全党之统一”，经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议，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克日迁都南京，并以党员应服从党纪，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肃清军阀，合力铲除共产党，以党治军等四端相勉励。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五次扩大会议通过汪提议，将中央前次对于胡汉民、蔡元培、吴敬恒、李济深、张静江、蒋、古应芬、萧佛成、陈果夫等开除党籍之处分撤销，俟四中全会解决。汪、谭延闿电南京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促宁方一意渡江作战，声明东下诸军“只有急难之谊，并无他图”。8月20日晚，汪、谭延闿、孙科、唐生智、于右任、顾孟余等乘轮东下，次晨抵九江，下午至庐山举行军事会议，与前方军事领袖

程潜等会商军事及政府迁南京等问题。8月21日，西山会议派张继就宁汉合作问题致电南京李烈钧、何应钦、李宗仁等，略谓："值此危疑震撼之际，团结内部，实为唯一要图，其办法似宜统一汉、宁、沪三党部合组，南京、武汉两政府同属一家，无正统与非正统之可争，先后反共，更无谁胜谁负之可夸"，"精卫对内外皆失信仰，暂避要路，东南大局更有赖焉。"8月22日，南京代表李宗仁抵达九江，旋赴庐山与汪会谈宁汉合作，谭延闿、孙科、陈公博、唐生智、朱培德等均参加，会议决定：谭、孙8月23日先偕李宗仁赴南京详商一切，武汉东征军暂行停止前进，武汉中央党部、政府、军委会一星期内迁南京，南京拱卫暂令第七军负责，前方军队限即日肃清津浦铁路南段。

1927年9月5日，宁汉合作大致商妥，是日汪偕顾孟余、徐谦、陈公博、何香凝、朱培德等自九江抵达南京，惟南京遍贴反汪标语，同日武汉代表谭延闿、孙科自南京赴上海，与胡汉民等协商合作办法。9月8日晚，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李宗仁等设宴欢迎武汉抵宁中委，汪演说，称宁汉分裂是由于"工作上之注意点有所分歧"，"一方注意于清党，一方注意于提高党权"，并称今日必须团结，"要以十二分的诚意和十二分的勇气，来纠正既往，补救现在，开济将来"。9月9日，汪、谭延闿、李宗仁、白崇禧、孙科、朱培德、李烈钧、陈公博、甘乃光等为挽五中委回任，并与在上海执监委交换团结意见，是日自南京到上海，汪在北站接见记者，称汉宁两派在军事方面现已一致，政治方面亦非一致不可，两派合作已不成问题。9月10日，汪在上海对《申报》记者发表谈话，称颂蒋反共"有先见之明"，并称自己"自从五月间奋斗起，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是主张分共的"，又称彼此"反共之方法与政策不同，以致把党分裂"，"关于政治问题，在军事时期，不得不题高党权，实行以党治军，以党治国"；汪等电奉化蒋到上海"会商党国大计"。9月11日，中国国民党汉、宁、沪（西山会议派）三方中央要员在上海戈登路开谈话会，商统一党务及宁、汉政府合并改组办法。汪、谭延闿、孙科、伍朝枢、李烈钧、褚民谊、李宗仁、程潜、张静江、蔡元培、杨树庄、李石曾、于右任、叶楚伧、邹鲁、张继、谢持、覃振、

许崇智、王作群、居正21人出席，推谭延闿为主席。胡汉民、吴敬恒、蒋、陈公博、顾孟余拒不出席。会议连开三日，辩论甚烈，宁派力主非汪下野无以平党员之愤，汪决暂退，会议决定：一、由宁、沪、汉三方面各推委员6人（另候补委员各3人）及共推委员14人合组中央特别委员会，为行使党务政治之最高机关，二、中央政治委员会及中央政治会议暂撤销，三、宁、汉两政府合并改组，由特别委员会另选国民政府委员，并委派军事委员会委员暨各部部长，四、特别委员会除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外，应负责统一各地方之中国国民党党部，并于3个月内筹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党内纠纷，五、推汪、谭延闿、蔡元培、谢持起草统一宣言，六、推张继、于右任、何香凝、李石曾、蔡元培5人代行监察委员职权，因宁、沪两方否认三月间武汉召开之第三次全体会议为合法，遂改四中全会为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

9月13日，汪偕顾孟余秘密离开上海赴牯岭，行前顾致书南京中央党部称："此次东下，系专为出席第四次中央执监会议而来，现闻在沪同志多主张暂时不开此次会议，此外其他会议，孟余已无参加之必要。"，汪电中执委会并通电全党，自认对共产党"防制过迟"，自动下野，并听候处分；武汉政府停止办公，结束一切，迁宁第一批人员已于昨日出发。

9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南京举行，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代表20人出席，谭延闿主席，恢复王宠惠党籍，设"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推定委员32人，以张继、于右任等五人代行监察委员职权，对汪自请处分案，决定应无庸议，并决定劝汪、蒋及胡汉民等速出任事。9月16日，宁、汉、沪三方合组之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成立，即开第一次大会，决议要案多件。汪发表《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宣言》，宣告国民党"统一"完成。宁汉正式复合，中国共产党则将国民党的团结称为"宁汉合流"。

1927年9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开第二次会议，讨论改组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案，议决推丁惟汾、于右任等4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以汪、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5人为常务委员，于右任等67人为军

事委员会委员，以蒋、胡汉民、谭延闿、何应钦、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朱培德、程潜、唐生智、李济深、杨树庄14人为主席团，通过大学院院长、各部部长名单。

9月1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开第三次大会，张继主席，决定：一、推汪精卫、蔡元培、谢持为常务委员，叶楚伧为秘书长，推定中央党部各部委员：组织汪精卫、陈树人、谢持等8人，宣传戴季陶、顾孟余、胡汉民等8人，工人陈公博、居正等4人，农民甘乃光、陈果夫等5人，商民褚民谊等5人，青年傅汝霖、邹鲁等4人，妇女何香凝、陈璧君等6人，海外邓泽如、林森等4人，二、中央政治委员会（或称政治会议）及各地政治分会一律取消，其职权分别由中央党部、省党部、国民政府、省政府执行，各地政治分会限10月1日前取消，三、以前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指宁、汉、沪三中央党部及宁、汉两政府）立即合并于新组织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机关立即移交。

9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产生之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在南京举行就职礼，张继代表中央特别委员会致训词后授印，蔡元培代表国民政府委员接印，并致答词，接着蔡元培代表中央特别委员会向军委会训词，伍朝枢代表国民政府向军事委员会授印，程潜接印并致答词，至此，沪、汉、宁三方合流之国民政府产生，武汉政府正式结束。

9月21日，汪、顾孟余、唐生智等返汉，依据上月22日中国国民党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之议决案，于是日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武汉分会，与南京对峙，指定委员23人，以唐生智、顾孟余、陈公博、孔庚、邓寿荃5人为常务委员。9月25日，汪通电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各报馆，称“政府职务虽已解除，党员责任未敢放弃”，表示仍愿“以党员资格，奔走各方”，同日汪电黄琪翔，称当回广东候命，“为指臂之助”。

1927年10月2日，孙科、伍朝枢由南京前往牯岭劝汪精卫复职，同日汪电南京谭延闿、蔡元培、李宗仁等称：“政府职务，虽已辞谢，党员责任，未敢放弃，拟以党员资格奔走各方。”。10月10日，汪偕宁方代表孙科、伍朝枢等自九江抵达汉口，次日宁方代表与汪、唐生智及李济深之代表等在汉口

会谈，汉方代表唐生智、顾孟余等提出解决“党的纠纷”主张如下：一、在宁召开第四次中央执监会议，二、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三、追认中央特别委员会，四、规定中央常务、特别两委员会之职权，五、恢复中央监察委员会，10月13日宁方代表孙科等携此提案返宁。

10月13日，南京谭延闿、程潜、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孙科、伍朝枢联名致电汪精卫，赞同在武汉所议各项办法，并定11月1日在南京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请汪邀同武汉、广东、九江各中委赴南京集会，10月17日汪电广州陈树人等，谓宁方已赞成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恢复中央执委会，武汉委员将东下，请陈等到上海会齐，或到武汉同行。

10月18日汪致电各地中委，提出两项意见：一、如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不得已延期，似宜再行通告，二、党务重要议案似宜留待全会公决。10月28日，汪偕甘乃光等10余人自上海抵达香港。

10月29日，汪抵达广州，政治分会、省政府、省党部及各界均派代表到西堤欢迎，同日汪与何香凝、甘乃光电邀南宁黄绍竑到广东商量政务，11月3日黄覆电称将广西省政务略为处置，即行下广东。

10月30日，中国国民党在粤中执监委汪、李济深、何香凝、李福林、陈树人、陈公博、甘乃光在广州开联席会议，决定联名通电主张克日在广州开第四次中央全体执监委员会议，解决党务、政治、军事，并令中执委会之常务会议及秘书处恢复办公，成立中央执监委员通讯处。同日汪等7人联名电促各中委齐集广州开四中全会。李宗仁、白崇禧等电催汪、陈公博等入南京，并解释特委会之产生，系各方在上海所共同议定。10月31日，谭延闿电促汪、李济深刻日到南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李宗仁、白崇禧再电汪等劝驾。

1927年11月，汪在广东成立政府。11月4日，汪、李济深、宋子文、陈公博、李福林、甘乃光、何香凝、陈树人电南京、上海、武汉各中委谭延闿、孙科、胡汉民、顾孟余等，称若谭等坚持在南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则中央特别委员会应即取消，最低限度亦应明白宣布停止其职权，并宜于正式会议以前，在广州或上海先开预备会议。

11月5日，汪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讲《武汉分共之经过》，称：“联俄与容共政策，为应付时代和环境所取的一种政策，不能与三民主义同样有长久的时间性。时代与环境变了，政策也即随之而变化的。”、“容共之后，必定分共，是不可免的。不过容共时候，不能说出来，犹之明知到上海后，必然分路，不过从香港到上海的路上，大家都不说出来便了。”

11月7日，宋子文奔走蒋汪合作，汪已允诺，是日宋自广东启程返上海，称粤宁提携已经成立，拟更为之斡旋，以谋切实之办法。

11月10日，蒋自日本乘“长崎丸”返抵上海，即电促汪赴上海晤商党务，并谓欲使党从破裂复归完整，非互相谅解，从速举行四中全会恢复中央党部不可。汪接蒋电，即在葵园会议席间传阅，各委以蒋对开四中全会既表赞同，此后一切纠纷不难解决，似可不必坚持在广东举行，遂表示同意，即席公推汪、李济深二人为代表，赴上海与宁、沪各中委磋商。汪在广州黄埔军事政治学校演说联蒋，称当时蒋“分共”，并非操之过急，自悔当日之过，以后当与蒋益加团结。

11月16日，蒋在上海中国国民党员欢迎会上演说，称因汪力促，由日本返上海，与汪合作不成问题，必须汪、胡等共同联合，始是真合作，但不赞成排斥西山会议派。

11月17日，张发奎、黄琪翔发动驱逐李济深势力之广州事变。

11月18日，汪、李济深乘“亚洲皇后号”轮抵上海；上午，汪与蒋在上海环龙路宋子文宅会见，交换党务、政务意见，蒋对开四中全会表示赞成。

11月19日，汪、李济深与蒋、谭延闿在上海晤谈，汪提出粤方中委关于“宁汉沪合作”之提案。

11月20日，粤变发生后，汪颇受各方指责，是日汪在上海往访胡汉民，胡称病拒见。

11月24日，谭延闿、蒋、汪、李济深联名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谈话会，到会中央委员23人，胡汉民、李烈钧未出席。

11月25日，汪在上海招待记者，称广州事变之起因，并非由于对中国共产

党问题，乃是由于对特委会之态度不同。

1927年12月1日，冯玉祥电上海劝蒋“东山再起，主持一切”，同日又电汪，盼“出山主持，团结内部”。

12月，国民政府发出讨伐广东令。

12月2日，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发奎、黄琪翔；中国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通过讨伐陈济棠令。

12月3日，宁、粤两方中国国民党中执监委在上海开谈话会，到蒋、汪、谭延闿、蔡元培、李济深、何香凝、李宗仁、张静江等29人，以已足法定人数，临时改开四中全会第一次预备会议，蔡元培主席，会议对特别委员会之存废及处置粤变方针均有辩论，讨论良久，一致主张在四中全会解决。

12月4日，中国国民党四全会预备会开第二次会议，汪主席。12月初，在中国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议请蒋复职，各方纷电促蒋再起。

12月9日，汪电张发奎解除教导团武装，驱逐赤卫队，搜查职工会，12月10日广州宣布特别戒严，日夜搜查户口，张令离广州部队向市区移动。汪密电广州陈公博、张发奎、朱晖日，称黄琪翔之容共，已为不可讳之事实，要求黄暂时退休，认真“肃清”共党。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因汪要求而延会，汪派与李济深派各开小组会议，互谋对付之策。冯玉祥、阎锡山先后电促蒋复任总司令，何应钦、贺耀组等亦联名通电拥蒋出山，主持军事。

12月11日冯、阎联名电请中国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起用蒋主持军政，并电促蒋复职，次日冯又另致电，谓此时军事非有统一枢纽，决难完成革命，非蒋出山，不能当此重任。

12月10日，四中全会预备会开第四次会议，于右任主席，有力之反粤派李济深、李宗仁、吴敬恒等未出席，汪等11名粤委突提议请蒋续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案，即通过，汪并声明，如对其不能谅解，个人“尽可引退”，随即议决十七年（1928年）1月1日至1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四中全会，由蒋负责筹备，关于军事、党务各案，分别并案交付审查，至是预备会议结束。汪受到新桂系攻击。

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黄平、叶挺、周文雍等在广州领导工

人、士兵和农民2万余人举行武装起义。
12月13日，汪因广州起义陷入窘境，反汪派借以对汪及张发奎竭力攻击，指其为共产党。汪为剖白其确非共产党，特于是日在上海报纸公布其致陈公博等反共密电数件：一、请黄琪翔暂时退休认真清共之青（9日）电，二、致李福林请驱逐俄领之佳（9日）电，三、致陈公博等请派兵会剿海陆丰等处共产党之青（9日）电，四、致陈公博令围捕苏俄领署内之共产党员之蒸（10日）电。
李济深对东方社记者谈称：广州事变不可轻视，汪精卫等与此事有关。李宗仁亦称汪等与此次事件有关，故中央全体大会应拒绝汪等出席。粤方中央执监委员汪精卫、甘乃光、顾孟余、何香凝、陈璧君、陈树人、王法勤、潘云超、王乐平联名发表宣言，望蒋悉心筹划广东各军力量，合力消灭共产党。张发奎、李福林、黄琪翔、陈公博急电汪、蒋等，报告广州事件经过，并称是日拂晓已将广州共产党肃清，"仍望本党各同志益加奋勉，务将共产党徒一网杀绝，并与苏俄断绝邦交，此后我国只有惟一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次日汪覆电张发奎等，嘱将共党"去之务尽"。

前赴法国及再返回中国

1927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下令查办与广州事变有关之汪、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陈树人、何香凝，略谓：汪等于事变后，或列席会议参与逆谋，或发表言论公然袒护，舆论哗然，嫌疑难释，特派邓泽如、古应芬迅往查办呈覆。
汪因受南京制裁，在国内无法立足，被迫于是日深夜登轮离开上海，出国去马赛，濒行前向中央执监各委员发出引退通电，称其以参加反特委运动之故，备受特委方面之仇视，愿个人引去以息纠纷，并为张发奎等无共党嫌疑力辩，通电仍主张"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不可不开，中央执行、监察两委员会不可不恢复，特别委员会不可不取消"，12月20日汪过香港未登陆，召黄琪翔随同赴法国。
1929年到1930年间，蒋取得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亦称蒋冯战争）胜利。

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在湖北宜昌解除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师武装，并发表反蒋通电，要求汪回国主政。11月汪回国，联合桂系共同抗蒋。

1930年1月1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以汪“勾结陈公博、顾孟余等设立小组织”，并“应各叛将之请，回香港主持逆谋……以图坏破中央，颠覆党国”，议决永远开除其党籍，1月13日汪发表《怎样树立民主势力书》，指责南京“不但不能扫荡反革命，反与反革命势力结合一致”，“有党治之名而实与之反”，称“要为树立民主势力而努力”。

1月22日，汪应阎锡山之邀商谈联合反蒋，特派王法勤、陈公博北上联络，是日陈离开香港绕道日本北上，于3月间抵天津。

3月13日，汪致函覃振，主张以党驭军，谓“此后新旧忠实同志之合作，应以如何始能以党驭军为悬前待决之根本问题”。

4月2日，陈公博等抵太原，称拥阎锡山主持政治，汪主持党务，冯玉祥、李宗仁主持军事。

4月12日，汪就北方党务争执问题电平各省区党部联合处，称“亡党之痛，甚于个人失位”，主张牺牲成见，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应阎锡山邀是日抵达太原，与阎锡山、陈公博等会商党务，陈有让步表示。

4月21日，阎锡山、冯玉祥联衔电汪，称讨蒋军事布置就绪，大战即在目前，望北上领导一切，是日汪电覆阎、冯，允即就道，并称“一切大计，悉赖我公主持，请勿待，免误事机”，4月30日汪覆电北平中国国民党各省市临时联合办事处，允“摒挡就道，共策进行”。

7月15日，汪由香港搭“加贺号”赴长崎，陈璧君、顾孟余、曾仲鸣同行，7月19日抵达长崎，7月20日到门司。

7月23日，汪、顾孟余等改易姓名自日本门司搭“长城丸”抵达塘沽，阎锡山之代表贾景德、冯玉祥之代表薛笃弼及陈公博、邹鲁等往迎，旋即赴北平，汪在天津各界欢迎宴会上演说，要求蒋觉悟自己的责任，自动下野，声明与阎在与党务方面的主张已趋一致，希望阎任国民政府主席，自己“对于政府则拟处于赞助之地位，而专心于党务方面”，重申以党治国的原则，

反对蒋以党代政，以党代民意机关，独揽一切的做法，呼吁加强“中日两国的亲切关系”。

8月3日，阎锡山8月2日派冀贡泉专车到北平迎汪，是日汪乘专车赴石家庄，陈公博、邹鲁、覃振、薛笃弼、赵丕廉等同行，次日抵石家庄，汪、阎晤谈，交换关于党务等意见。

8月7日，中原大战期间，汪在北京召开“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

9月1日，北平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通电公布《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并推定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谢持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阎锡山为主席。

9月2日，阎锡山电扩大会议表示接受政府委员主席职，扩大会议推汪、张知本、茅祖权、冀贡泉、陈公博、邹鲁、顾孟余为约法起草委员。

9月3日，冯玉祥电扩大会议，表示接受政府委员职，并电促汪速组政府，同日顾维钧应陈公博等催促，自北戴河抵北平，与汪晤谈组织政府事，顾表示不愿参加新府活动。

9月9日上午9时，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就“国民政府”委员及主席职，汪居右，谢持居左，同就委员职，王法勤监誓，就职典礼完成后，即将汪起草之通电签署拍发，并分请唐绍仪、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各于所在地先行就职。

9月17日，阎、冯代表贾景德、薛笃弼自沈阳急电到北平，谓张学良将于9月18日夜发和平通电，并有军事行动，汪等接得此报，惊愕不知所措，9月18日晨汪等开紧急会议，聚商时局。当日，张学良发表《巧电》，宣布东北军挺蒋，反蒋阵营即将失败，北方代表以东北当局对时局已有鲜明表示，留沈阳亦无作用，孔繁蔚即于早9时返回北平转石家庄，贾景德、薛笃弼亦于9月19日上午离开沈阳返回北平。

9月19日，汪电张学良，谓“今日最急之务在于除去内战之原因”，提出即开国民会议，召集合法之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由党员选举代表，制定约法，“防剿”湘、鄂、赣共产党等四点主张，询张如何实现，同日谢持、邹鲁、覃振亦电张学良，提出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等四项意见。下午北平

扩大会议要员在怀仁堂会商应付时局方针，会后汪接见记者，谓"如张愿意和平，而能将余所举四项谋其实现，一切自无问题；如张决进余而情势恶化，则无论太原、西安，吾人均可作为根据地"。

9月20日，赵戴蒙到北平，传达阎意决守山西，邀扩大会议中委赴晋，汪、陈公博、王法勤、白云梯、陈树人、陈嘉祐、经亨颐、茅祖权、覃振、邹鲁、谢持、潘云超、傅汝霖、赵丕廉、冀贡泉因东北军已入关，即随赵戴蒙赴石家庄，曾仲鸣、何其巩等同行，车至琉璃河，为冯玉祥所派之邓哲熙、王化初所阻，要求诸委留北平镇慑，赵戴蒙等10余人随即偕邓、王折回北平，汪、谢持等六人继续南行，同日汪抵石家庄，即晤阎锡山，嗣往郑州晤冯玉祥。

9月25日，北平扩大会议中央委员覃振、赵丕廉、陈嘉祐、经亨颐、刘守中及职员40余人，9月24日晚由石家庄抵达太原，是日午后扩大会在太原举行会议，讨论今后工作，同日汪、陈公博由郑州晤冯后返石家。

10月1日，汪、陈公博抵太原，扩大会议连日在太原开会，继续研究起草约法工作。

10月4日，汪、阎锡山密赴郑州，促冯玉祥共同发表停战通电，当日汪、阎离郑北返。

10月11日，汪精卫与阎锡山在石家庄会议，冯玉祥派刘骥、张允荣两人出席，结果决定阎、冯、汪均下野，10月13日晨汪离开石家庄赴太原，准备出国，10月16日阎锡山返太原。

10月16日，阎锡山由石家庄返回太原，晚8时许，召冯玉祥、汪、陈公博、邹鲁、谢持等各要员会议，决定根据微（10月5日）电主张，采取和平办法，希望东北将和平解决之具体办法早日实现，如果和平解决一切，阎、冯将同时自动下野，军政大权将交给才力优裕之大员接任。

为了留下一些有价值的政治遗产，汪在败退期间仍抓紧时间起草《约法》，10月27日，三读通过了8章211条的《太原约法》和10条的《国民会议条例》，内容相对开明。

10月31日《约法》公布，随后在晋城和冯阎会晤。

11月1日，汪与陈公博、陈璧君等经大同雁门关离开山西借道天津，前往香港；途径长城脚下触景生情，写下一首七绝。

11月3日，达到天津后，汪不顾陈公博的反对，发表宣言向南京方面表示不再进行倒蒋活动，愿意在野进入体制内合作；改组派分歧因之扩大而解体。

11月23日，汪偕夫人陈璧君由天津秘密乘近海邮船亡命日本。

下野

1931年1月1日，汪在天津宣布下野。2月28日，蒋与胡汉民因“约法”问题矛盾激化，蒋极力坚持在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制定“训政时期之约法”，胡则坚决反对国民会议议及“约法”。是日蒋以胡操纵党务、把持立法院、阻止外交、包庇反动（指许崇智）、破坏约法等罪，在南京将其拘禁，宁粤分裂自此开始。

5月1日，汪通电中国国民党海内外各党部，略谓蒋祸党祸国，“暴横日甚，言之痛心”，现广东方面奋起讨蒋，“事变至此，宜即依据总章，召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

5月，国民会议在南京集会，通过训政时期约法。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

5月27日，胡汉民派在粤成立“军政府”。

5月28日，汪、唐绍仪、陈济棠等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并发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宣言》，称南京政府已成为蒋独裁之工具，广州“国民政府，自今日始，事事当反蒋中正之私，而向于总理之公”，对于军人，“信赏必罚”，对于财政，“收入支出，一切公开”。胡又和汪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成立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形成宁粤分裂。

5月29日，广州“国民政府”第一次会议决议：推孙科、汪精卫、古应芬、唐绍仪、许崇智为常务委员，以陈融为秘书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邓召荫

为财政部长。粤、桂、胡、汪联合反叛。
9月初，广州政府开始北伐，然而几天后九一八事变爆发。
11月29日，蒋致电汪，请促粤方早息纠纷，从速入京，俾中央全会得以定期举行，“中正以一人之身，急图北上，立待全会开成，俾奉命遄征，得有遵循”。粤、宁合流，合组以孙科为首的政府，蒋下野，汪在野。
12月28日，中国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第四次会议决议：一、推举胡汉民、汪、蒋、于右任、叶楚伧、顾孟余、居正、孙科、陈果夫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叶楚伧为秘书长；二、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蒋、汪、胡汉民、唐绍仪、张静江、蔡元培、萧佛成、邓泽如、谢持、许崇智、王法勤、李烈钧、邹鲁、邵元冲、陈果夫、叶楚伧、宋子文、王伯群、方振武、熊克武、阎锡山、冯玉祥、赵戴蒙、王树翰、薛笃弼、刘尚清、柏文蔚、程潜、经亨颐、孔祥熙、恩克巴图、杨庶堪、马福祥33人为国民政府委员；孙科为行政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院长、覃振为副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院长、居正为副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刘芦隐为副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丁惟汾为副院长；三、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组织原则，推选蒋、汪、胡汉民三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轮流充当会议主席等。

1932年1月7日，汪电南京中央党部、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请辞两常务委员职。1月9日，新政府成立一旬，行政院长孙科表示独力难支，是晨自南京到上海，吁请汪、蒋、胡汉民入京主持一切。1月13日，张学良电促蒋、汪、胡汉民入南京，略谓：“人望不可以屡辜，时会不可以再逸”，“宜及此政本未摇，余势犹在之际，集全党领袖于一堂，奋其智勇，以定安攘之策，则桑榆之效，或尚可收，沦胥之祸，其犹得免。若更分崩离析，或貌合神乖，信用一失，断难再复。”
蒋由奉化抵达杭州，1月14日在杭州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汪、胡如能推诚入京，余虽身在诟谇之中，为党为国，也无不乐从其后”，“惟熟审政治之环境，以及最近之事实，实鲜余个人负责之余地，故不得不仍以在野之

身，尽个人职责”。
1月16日，陈铭枢自杭州返上海，携蒋致汪亲笔函晤汪，转达蒋促汪赴杭州意，下午汪去杭州晤蒋，商谈入南京事，1月17日蒋、汪联电促胡汉民入北，一同入南京，共支危局，并电孙科称：“俟展兄（胡汉民字展堂）驾至，即联袂入京”，“关于一切大计，亦俟商得展兄同意始决定”。
1月17日，胡汉民复电汪，称血压未退，非长期休养不可，并称：“只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贯彻吾党数月来共同确定之政策，而吾辈在野之身，竭诚为政府之助，则对内对外，自能发展，开一新局势，以副国人之期望。”；张继、张静江赴杭州迎蒋、汪往南京。
1月18日，孙科、何应钦等应蒋之召飞杭州，蒋、汪、孙科、张静江、张继等在西湖烟霞洞密商外交、财政、军事要政，并决定共同入南京；胡汉民电蒋、汪，声明暂不北入南京，称：“望各矢忠诚，俾哲生兄等得行使责任内阁之职权，贯彻其政策。”
1月19日，汪、蒋再电促胡汉民入南京，称：“此值国难严重时期，吾辈三人，与其天各一方，遇事不能即时商榷，诚不如同聚首都，随时献替，较于党国有裨。”
1月21日，蒋离开杭州赴南京，临行对记者谈称：“余此行完全以私人资格入京赞助政府当局，绝不担任何职务。”，晚宿汤山，汪晚10时亦自上海到南京。
1月22日，蒋、汪、孙科、张继、李宗仁、冯玉祥等在南京励志社开谈话会，共商对日外交及财政等问题。
1月23日下午，蒋、汪、孙科在南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日方案，至7时始散，晚上孙科及何应钦、朱培德等复在励志社商谈应付目前外交问题，政府要员连日交换意见，均趋慎重，汪、蒋咸主“先行安内，方可攘外”，蒋对陈友仁等之对日绝交主张，认为“只凭一时之快意，不顾国家永久利害”，力持不可。
1月24日，蒋、汪等在南京励志社开中政会特委会，讨论对日外交问题，主张仍采妥协政策，会议认为陈友仁外交政策，基于隔阂国情，徒为孤注之

一掷，决不可行，故毅然不采用，对陈之辞职，经讨论决定不予挽留。

1月25日，行政院长孙科在上海分电林森及蒋、汪辞职，中国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决议慰留，居正、张继、张静江等晚乘车赴上海挽留孙科。

1月27日，居正、张继、张静江等自上海回南京，向汪、蒋报告在上海因孙科拒见，致无结果等情形，中政会决议一致慰留孙科，在孙离职期内，院务暂由副院长陈铭枢代理。

复任行政院长

从1932年1月淞沪战役，到1935年11月中国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汪被刺，第二次汪蒋合为时3年10个月。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蒋主持中国国民党临时中政会，决议：外交部部长陈友仁辞职照准，特任罗文干为外交部部长，接开中常会临时会议，决议选任汪为行政院院长，任孙科为立法院院长，孙未到任以前由副院长覃振代理。汪、蒋、冯玉祥联名电张学良、阎锡山入南京。

1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决定抵抗日本，先迁政府于洛阳，免受敌舰威胁。汪在中国抗日战争初期抗日态度坚决，积极备战。然而由于指挥不动蒋人马，遂委请蒋出山指挥军队，自己主政。

2月24日，蒋、汪、陈铭枢、罗文干等在南京开会，讨论上海局问题。

4月7日，国难会议在洛阳开幕，到命会员144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12人，各机关团体代表700余人，汪致开幕词，略称：“国难会议应讨论御侮、救灾、绥靖各事宜。”

4月8日，国难会议开第一次大会，由汪代表国民政府作关御侮、救灾、 绥靖问题之报告。

4月17日晨，蒋据颜惠庆电陈国际联盟特委会形势，与汪在南京汤山俱乐部召罗文干、陈铭枢、何应钦等商议对策，包括中国最低限度之让步，“满洲国”拒顾维钧出关对付办法等事项。

4月20日，广东空军总司令张惠长抵南京，谒汪、蒋，请示扩充空军。

4月25日，罗文干、郭泰祺偕英使蓝普森晤蒋、汪谈上海事。

5月26日，郭泰祺昨晚到南京，是日分谒见蒋、汪、罗文干，报告上海停战协定签字。

5月28日，蒋、汪联名发表通电，称“救国必先剿共”，对于共产党“必须以有效的方法抵制它们，必须不顾一切代价去应付它们”。

5月29日，汪召罗文干、蒋作宾及外交委员会委员商外交问题，决定外长仍由罗继任，郭泰祺担任驻英公使，日内赴英履任，驻日公使仍由蒋作宾回任。

6月4日，财政部长宋子文电汪、蒋辞财政部长职，6月5日汪覆电慰留。

6月6日，蒋、汪及其他政府要员在南京会商，决议分别覆电慰留宋子文、陈铭枢，劝“以国家大局为重，继续负责维持”。

6月9日，汪返回南京，6月10日在行政院会议上报告前赴上海挽留宋子文、陈铭枢经过，称宋允打消辞意，陈须请假略事休养。

6月12日，顾维钧到南京，6月13日汪在南京召集各部长及顾维钧开谈话会，先由顾报告出关调查经过，然后讨论外交问题及国内财政问题。

6月14日，汪、罗文干、顾维钧等飞庐山晤蒋，商外交、财政及“剿共”事宜。

6月18日，汪、宋子文、罗文干、顾维钧、王树翰、曾仲鸣、刘宗杰等自南京同飞北平，往访国际联盟调查团，并与张学良协议对日交涉方针。

6月19日，汪、宋子文、罗文干、顾维钧等在北平会见国际联盟调查团交换意见，6月20日继续会晤，调查团对东北义勇军及抑制日货问颇注意，6月22日汪、罗离开北平返南京。

6月2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汪详细报告东北情形，对日人在东省练兵窥伺关内及在东省之种侵略措置，陈述颇多，会议通过追认国民政府特派蒋光鼐为驻闽绥靖公署主任等多案。

7月8日，汪邀请各地学术专家胡适、陶孟和、丁文江、蒋梦麟等32人在南京集会，讨论外交、内政、建设、教育等问题，外交侧重对日方针，建设侧重财政，教育侧重制度经费，7月13日闭会。

7月17日，日军进攻热河，汪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再命张学良出兵抵抗。8月6日，汪公开致电张，宣称“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愿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来劝告张同时下野。

8月6日，汪以“外交、财政问题诸感棘手”，分别致电中执委会、林森、蒋、各院、部长，请辞行政院长职。汪致电张学良，望其辞职以谢国人，并称：“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忧，正在兄防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职责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令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行政院……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蒋接汪辞职电，急电恳切劝挽，内称：“吾二人既均以共赴国难而来，现在无论有何困难，必须共负仔肩，勉度难关，决不可于国难益加严重之际遽萌退志，务望即日返京，照常主持院务。”；蒋电请林森慰留汪，并电何应钦、宋子文、朱培德、吴铁城共同挽劝，蒋表示与汪共进退。

8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执会召开临时常务会议，讨论汪辞职事，一致议决由中执会急电慰留，并派何应钦即日赴上海会同居正代表中央挽留；蒋再电何应钦、朱培德促赴上海恳切挽汪回南京，何夜车赴上海，朱8月8日晨赴上海；北平政委会开会，张学良决定辞职，张覆电汪，劝汪“以国事为重，勿轻言辞”，“本人军、政权将分交平军分会、政委会”，同日张并电蒋请北来主持；罗文干呈行政院请辞司法、外交两部长职，表示与汪同进退。

8月8日，汪在上海对记者发表谈话，促张学良下野，略谓：行政院院长人选，“于右任、戴传贤均可，蔡元培来更好”，继张者“以何应钦、朱培德为宜”，有询以冯玉祥、阎锡山如何，汪谓不可，“将予人以口实，增加纠纷”。汪再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坚辞行政院长职，指责张学良治下省份，国家税收悉截留，兵额中央无权过问。张学良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政院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张学良覆电汪电请中央罢免本职。蒋召见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嘱转电蔡元培挽劝汪回南京复职，并派武汉

大学教授周鲠生代表赴上海面劝。

8月17日，汪回南京，出席中国国民党中执委会临时常务会议，报告辞职经过。

8月21日，汪、宋子文等一行由庐山返抵南京。

8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委谈话会决定，汪暂不卸职，俟三中全会再讨论，汪在南京主持中政会，由宋子文暂代行政院长。

8月25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开会，汪主席，决议行政院长由宋子文代理。

9月10日，林森由南京到上海，劝汪返回南京，9月11日蒋又派张群自汉口兼程赴上海，促汪入南京主持政务。

9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委谈话会讨论中政会常委代理问题，决定不另推人，在汪未康复前，中政会改开谈话会，重要议案电汪请示办理，次要者待汪病愈返回南京补行签署。

9月18日，曾仲鸣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托，自南京赴上海转莫干山谒见汪，商中国国民党中政会主席问题，并促汪早日返回南京，主持中政会事宜。

9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准汪请假二星期，在请假期中，中政会主席由中常委轮流担任。

9月28日，内政部长黄绍竑奉蒋命赴莫干山探视汪疾，并商要政。

10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加推朱家骅、居正、陈果夫、叶楚伧、何应钦、贺耀组、黄慕松、朱培德为外交委员会委员，推定汪、宋子文、罗文干、朱培德、顾孟余等为常委。

10月7日，宋子文偕褚民谊乘机飞上海征求汪对《国际联盟调查团报告书》意见，并促汪入南京主持中枢。

10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汪患肝硬化症，准续假三个月。汪、张互讦，结果汪宣布辞职，10月前往欧洲。

再度下野

1932年10月21日，汪决定赴德国就医，行政院各部、会长集上海与汪话别，10月22日汪及家属、秘书等7人离开上海赴欧洲。12月24日，宋子文电

促在德之汪回国，称："现在救亡图存，刻不容缓，吾兄假期届满，各方咸渴望吾兄早日回国，领导一切。"

1933年1月9日，汪在德国柏林杜平根疗养院对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国目前不思与日本正式宣战"，"中国今日之地位，不足向日本宣战。"

1月12日，汪在日内瓦发表宣言，略称："中国对于暴日侵略，确立交涉及抵抗并行之方针"，"中国始终信任国联，听候解决，此为交涉之本旨也。惟在此期间，日本侵略不已，中国为领土主权人民生命财产计，断难坐受其侵凌，不能不奋起而为正当防卫，此为抵抗之本旨也。"由于民众的呼声，蒋请汪回国主持抗日战争。汪要求张学良先辞职，蒋说服张学良去欧洲考察。

3月17日，汪由德国返国抵达上海，宋子文等百余人往迎，褚民谊持林森促汪返京复职亲函迎汪，同日宋电中央及各部、会停止代理行政院院长职。

3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通过设立救国飞机捐款筹办委员会，朱培德、朱家骅等20余人为委员，汪任主席。

3月25日，孙科、顾孟余到上海敦劝汪复行政院长职，汪允入南京商量，当晚汪偕孙赴南京。

3月26日，蒋上午返抵南京，下午与汪商谈今后内政、对日方针，并敦劝汪复职。

3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重要会议，蒋、汪、林森、居正、于右任、宋子文、戴季陶、孙科、陈果夫、叶楚伧、李烈钧等30余人出席，蒋报告华北军事情况，于右任、孙科提统一全国军事案，李烈钧提建设国防与改革内政案，因李案着重于开放政权与集中全国力量御侮，以事关重大，决定交中常会"从长缜密讨论"。

再复任行政院长

1933年3月29日，蒋返回南京后与汪密商对日方针与"剿匪"问题，确定汪复职主持对日交涉，蒋负责全力"剿匪"，是日召开中国民党中政会议，蒋、汪、林森、于右任、戴季陶、孙科等50余人出席，汪表示复行政院长职，

翌日汪向中常会销假到院视事。此后汪主张对日和平交涉，得到蒋的支持。

5月23日，何应钦、黄郛、黄绍竑联电蒋、汪报告与日方商谈停战情况及其条件，认为："熟权利害轻重，与其放弃平、津，使傀儡资以组织伪政府，陷华北于万劫不复，何若协商停战，保全华北，徐图休养生息，以固党国之根基，较为利多害少。"，汪即覆电表示支持。

5月24日，国民政再次召开国防会议讨论停战谈判问题，决议要点为："与对方商洽停战，以不用文字规定为原则，如万不得已，只可作为军事协定，不涉政治，其条件需经中央核准。"，汪将此内容电告何应钦、黄郛，并说明："此为中央自负责任。"

5月29日晚，黄绍竑抵庐山，即向蒋、汪等人详细报告华北军事情况及北平军分会与日方交涉停战所作处置，蒋、汪赞同华北当局所作决定。

5月31日，中日签订《塘沽协定》，11时10分中国代表在一字不改下正式签署。何应钦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举行会谈，共同签订《塘沽协定》，引发当世对汪与何应钦所签订的是"卖国协定"的谴责。

8月1日，汪、孙科、顾孟余、陈绍宽、朱家骅、曾仲鸣等自庐山返抵南京，汪在中国国民党临时中政会报告庐山会议经过。

8月7日，蒋、汪联名电冯玉祥，促其离开察哈尔入南京，以便宋哲元"得以自由接收察省一切军政"，8月9日冯覆电拒绝。

8月11日，汪偕铁道部长曾仲鸣到庐山，与蒋、黄郛等商谈华北战区善后、军队整编及结束察事等问题，8月14日返南京。

10月1日，汪在上海晤黄郛，促其北返，黄允即日程，并电告蒋介石，当晚汪、黄离开上海往南京。

10月4日，全国经济委员会通告成立，汪、孙科、宋子文就常委职。

10月14日，汪偕曾仲鸣、唐有壬赴庐山与蒋商宋子文辞职及"剿匪"军费、福建政局等问题，翌日离开庐山回南京。

1935年1月21日，黄郛向林森报告华北政务，汪偕同黄郛到军校见蒋，1月

24日汪、黄复同赴军校见，晤谈甚久。

1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表示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汪认为有谈判的空间。

7月2日，汪因肝病在上海入诺尔医院治疗，行政院务由副院长孔祥熙暂代。但由于国民党主战派的反对，汪于8月8日表示辞职。

8月14日，蒋由成都飞抵庐山，电汪往晤，汪迟迟未应。

8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议决慰留汪，通过“严惩共党反复”案，凡共党“自首”或“自新”而复参加共产党者，一律枪决，或酌处无期徒刑。

8月17日，蒋派张群携亲笔函飞青岛，促请汪早日返南京，主持政务，汪允即返。

8月19日，蒋自庐山飞往南京，张群往见，报告赴青岛挽汪经过；汪自青岛飞上海。

8月21日，汪自上海到南京，与蒋、黄郛会晤，蒋力劝复职，汪表同意。

8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在南京开会，汪、蒋均出席，讨论汪辞职行政院长及兼外交部长案，决议慰留，下午1时许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以汪允复任事通知各部、会。

8月23日，汪通电复职：卧病月余，一再具呈中央，恳请辞职，未蒙允准，兹遵照中常会决议，于本日销假回院视事；蒋以汪已复职，离开南京飞成都。

10月15日，蒋与汪在南京晤谈中央最近政情。10月16日，日本贵族院议员坂西中将至南京访汪。

遇刺与出国疗养

1935年11月1日上午，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开幕，汪主席致开幕词后，在会场外摄影时遇刺。会议结束后9:35，刺客孙鳳鸣一边高呼“打倒卖国贼”，一边向汪连开3枪。汪被枪伤左颊、左臂及背肋三处，刺客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亦被卫士击中，当场被捕，次晨孙伤重在南京中央医院毙命。

11月6日，行政院决议，以汪因伤不能执行职务，由副院长孔祥熙依法代理行政院院长，外交部部务由政务次长徐谟代拆代行。
12月1日，汪电国民政府辞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兼职。五届一中全会上，汪升任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被救后，1936年2月19日，汪前往法国疗养枪伤。枪伤以后，汪背部伤痛定期发作，每次发作时疼痛难熬。后来执行对日妥协政策的外交部常务次长唐有壬又遭暗杀。
蒋在西安事变之后加强抗日而减缓内战，声望大增，并受到苏共及中共支持。
1937年1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回国，抵香港发表谈话称："西安事变善后，杨虎城自应听命中央。"1月14日，汪精卫乘德轮抵上海。
1月18日，汪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演说称，对外愿本两利原则与任何国家携手，对内不得有两种政府与军队。
1月22日，汪广播讲演《怎样救亡图存》，谓"不特中国目前实行共产可以亡国，即使接近共匪，受其操纵，也足以引起大乱，而至于亡"。
1月24日，汪与蒋在溪口商谈外交与内政方针，议定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于2月15日如期举行。
2月15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首次访问中国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谈三中全会情形。

抗日战争与"和平运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汪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一天，汪在重庆上清寺的官邸宴客，吴稚晖突然向汪下跪，十分激动地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国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十分错愕不知所措，于是离座对跪，彼此握手欷歔。
此后汪开始主张对日本亲善，主张"和平运动"，主要的论点为：
（一）中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在彻底失败之前以谈判实现和平将更为

有利；

（二）他曾和蒋有过谈判经验，因此认为蒋是不可信任的人；

（三）他关心日占区人民的利益，认为日占区需要照料；

（四）根据汪的助手周佛海说，如果蒋赢得了这场战争，那么汪和日本的协定自然被取消，如果蒋不能获胜，那么协定还可以限制日本的行为。

1938年8、9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的和平运动。

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宣布了一项包含了六原则的“亚洲新秩序”声明：（1）东亚的永久和平；（2）善邻友好和国际正义；（3）联合防共；（4）经济合作；（5）创建新文化；（6）世界和平。

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以下几个条件的基础上和一个新的中国政权调整中日关系：（1）亲善友好：日本对中国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2）按照轴心国之间，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同样的精神，共同防共；（3）经济合作，日本一方绝无垄断中国经济的意图。

12月19日，汪向国民政府申请护照，借道云南前往越南，主张与日军媾和。蒋发电报给香港《大公报》张季鸾，希望舆论对汪宽留余地。汪响应近卫声明，离开重庆出走至越南河内，发表艳电，主张中止抗战。

12月29日，汪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和电报（29日电报代码为“艳”字），是为“艳电”，电文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一致决议，开除汪的国民党党籍和一切公职。会议通过的决议文如下：

“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居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主张。二十九日来电，竟以日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腾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其摇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容，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其欺蒙。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充其影响所及，直欲撼动国本。我国为救亡图存，发动抗战，百余万将士之死伤，数百万同胞之牺牲，惨痛深切，无非欲根本消灭敌人侵略之毒计，以永保为国家民族世代永久之生命。年余以来，国民则精神团结，将士则踊跃用命；万众一心，咸集中于本党总裁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坚毅不屈，有必达胜利之自信。今敌人谋我之野心益彰，伎俩益毒，即吾全国之敌忾愈切，决心愈坚。汪之所言，不但为中央所痛绝，实亦为全国民众所不容。查战争期间，任何国民，绝对不得违反战时国策之决定，而自作主张；本党纪律，更绝对不许逾越党的正式决议，违反党的规则，而以个人发表其意见。汪兆铭此种行动，其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已昭然若揭；大义所在，断难姑息，即当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藉肃党纪，以正观听。我国民须知抗战决胜之最要关键，唯在意志统一，精神不贰。我民族在昔迭遭外患，如宋、如明，固仅为一姓一家朝代之溃灭，而非为民族之沦亡，然其致败之原则，皆由当时朝廷少数奸邪精神慑服，天良丧尽，以致灭亡，决非民气与国力之不能抗敌也。故今日抗战，非整肃纲纪，不足以振作精神；非怯除携贰，不足以战胜强敌。综观敌人最近之毒计，实欲威胁我精神，而导我于分离覆亡，本党深知为全国同胞，民族意识普遍，发扬春秋大义，深入人心，只须坚定不移，奋斗不屈，严守国策，统一意志，最后胜利，自必实现。今后抗战国策，一以本党总裁上月二十六日在中央纪念周所发表之演讲为唯一标准，愿我全国同志及将士同胞，本此意志，悉力以赴。其有背越斯旨之一切言论与行动，皆为国家利益与法纪所不容，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以保持战时意志，而完成为三民主义革命救国之使命。”

3月，汪和他身边的重要干部，在河内多次遭到蒋派人刺杀，由于刺客误把曾仲鸣当作汪杀死，汪才躲过一劫。日本方面得知这一情况后派影佐祯昭大佐和议员犬养健前往河内将汪营救，5月8日汪抵上海，在江湾土肥原公馆与影佐祯昭和犬养健会谈。

5月31日，汪率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等十一人，乘日本海军飞机，在矢野征记、影佐祯昭、犬养健、清水董三等陪同下，由上海飞抵东京。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联席会议为此于6月5日作出决定要求汪在建立中央政府时，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政权合作，其政府组成及地方自治，不得违反日本的既定方针。汪欲召开国民党大会不得在南京举行。采用青天白日旗须在旗的上方加上一个三角形黄布片，上书“和平反共救国”字样。汪政府应以日、满、华睦邻结合为指导方针。

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制定《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

6月8日，国民政府宣布通缉汪，颁令如下：

“汪兆铭违背国策，罔顾大义，于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潜离职守，妄主和议，并响应敌方谬论，希冀煽惑人心，阻挠大计。经中央加以惩戒，犹复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于上月秘密赴沪，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与敌往还，图谋不轨。似此通敌祸国行为，显属触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之规定。此来海内外民众同深愤慨，先后呈请通缉严惩者，不下千余起之多，政府如尚曲予宽恕，其何以伸张国法，慰我军民。应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纲纪。此令。

——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立法院院长孙科，司法院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院长于右任。

”

6月10日至18日，汪分别会见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外务大臣有田八郎、枢密院议长前首相近卫文麿。其中在与板垣征四郎交涉中，板垣征四郎毫无退让，与会的影佐祯昭适时对其恫吓，汪因此倍感沮丧，后不得不妥协。

6月24日，汪离开日本后抵达天津，27日抵达北京会见华北日军司令官杉山

元，后与临时政府王克敏会面。

6月28日，汪由天津回到上海，次日，与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内务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会谈，双方在政府合并问题上矛盾重重。

7月5日，汪与梁鸿志在南京进行第二次会谈，汪通过拉拢陈群与任援道，许诺成立中央政府后二人可官任原职，从而分化了维新政府，使二人转而支持自己。

7月11日，梁鸿志、王克敏在青岛大陆饭店接见新闻记者团时分别表示对汪“全力协助之重大意志”。三方就“反蒋、反共、亲日”达成一致。虽然，三方会谈取得进展，但是日本海军特务机关首席武官野村直邦中将对此却有悲观看法，“最近汪兆铭的活动终于使一般民众失去了对他的信任，失望和怀疑正在深刻化。一般民众对汪派已经失去了信任，所以由衷欢迎和平的人一个也没有。”他还指责汪说：“最近汪派的活动，事实上不仅不能促进全国的和平，而且正在和平运动各派内部制造分裂。”

国民党“六大”

1939年9月28日至30日，汪以中国国民党的旗号，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秘密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29日上午第一次大会，周佛海主持通过整理党务案，主要内容包括：修改党章、废除总裁制、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人。

29日下午第二次大会，汪担任会议主席，通过：修订国民党政纲案、决定以反共为国民党基本政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授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指派中央执、监委员，连同党外人士，组织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案、尽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案等。

30日上午第三次大会，选举中央执、监委员，并通过大会宣言。大会宣言着力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批判，认为中共“假借抗战，以削弱国民政府之力量，使之继续不断丧师失地，以促成其崩溃之势，假借抗战，以实行愚民政策，剥夺所谓知识阶级之一切自由，使全国陷于精神破产，不识不知随而盲动；假借抗战，以扩大边区政府之势力，谋于相当时机取国民政府而

代之，夷中华民国为中华苏维埃，使永为苏联之附庸；假借抗战……使中、日兵连祸结，苏联得安坐而乘其敝。”

认为蒋“所可怪者，蒋同志阳则受其（指中国共产党）拥护，阴则供其利用……当此国家存亡系于一发之际，置一切同志之忠言于不听，惟共匪之所左右，一切同志不见容于共匪者，即不见容于蒋同志。驯至关系国家存亡之和战问题，不取决于大会所明示之方针，不取决于同志之建议，而取决于共匪之颐指气使，以是之故，使和平运动横受挫折，战争依然继续。”

大会决议解除蒋总裁一职。会议中，一些与会代表蔡洪田、汪曼云、沈尔乔、王敏中、章正范、戴策等在看到职员名单中有卢英的名字，认为该人是汉奸，要求与汪见面。

周佛海代为接见，表示卢英是否是汉奸后世自有定论，但其为汪在上海的人身安全出力甚多，不应因此排除在外。其他诸如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等人亦被认为是汉奸，引发会场骚动。

李士群亲自带枪与荷枪实弹的士兵入场对有异议的人进行威胁，场面一度十分尴尬。汪圆场表示有意见的代表可在会后和他个人交流。在闭幕词中，汪说：“外面有人对我们造谣污蔑，说我们是日本人的傀儡，请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会场里有没有日本人”。

9月1日，在汪《致海内外诸同志通电》中说：“综括宣言所示，非根绝赤祸，无以维持国内和平；非与日本协力，无以维持东亚之和平；非与各国增进友谊，无以维持东亚之和平。……惟有一比较简易可行之方法，如前方之武装同志能揭示和平、反共、建国之主张，则既可保其原有之兵力与未失之土地，又可外与吾人之和平运动相呼应，内以促独裁势力与共产势力之没落，为效之捷，莫逾于此。”

对日谈判

1939年11月1日，汪派周佛海为首席代表，协同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等人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园（后改为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与日

本人会谈，林柏生、陈公博后来参加，汪本人没有出席。日本方面首席代表为影佐祯昭，其他人包括犬养健、须贺彦次郎、谷荻那华雄、扇一登、矢野征记、清水董三等人。会议开始前，日本兴亚院在内政、军事、经济等方面已经为会议定下了极为苛刻的条件。

第一次会议上，日方提出《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会谈中，日方要求新政权承认满洲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基层设置政治顾问、技术顾问和职员，由日本人担任；在自然科学技术、财政、经济方面，中央政府聘请日本专家当顾问，其直属机关任用日本教授、教官、关税官吏及技术员等，在地方政府设置与日本军队协商事项的交涉专员，在必要的地区的军队中配备日本军事专家，关税收入、统税、盐税等以“保管”和“战争中的特殊情况”为名控制在日方手上，部分要分给蒙疆和华北。日方以“最大的诚意”借款4000万元给汪政府，拒绝汪开放长江、使用京沪铁路的要求。汪方代表表示应坚持近卫声明、1938年11月上海会谈记录，1939年6月东京会谈约言为讨论基础，不应超出这三者。会议关键为1938年11月上海会谈记录，汪出走重庆就是根据其中达成的协议，他认为日本方面一定会遵守其中的承诺。但是日方认为该文件由两名陆军军官签署，对日本政府没有约束力。日方遵循的是10天后11月30日御前会议出炉的《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而该方针则大大超出了上海会谈的条件。
会后，汪听取了与会人员的报告，看过《要纲》后流着泪对陈璧君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吧。”
他还给影佐写了一封信：“尊函及日华关系调整拟定方案已收到。似与近卫声明宗旨有相当差异，颇以为憾。但对以此拟定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委员则任命周佛海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为委员。希肝胆相照，和睦相处，以审议东亚问题。”
1940年1月，陶希圣与高宗武脱离汪组织，在香港联名揭发“汪日密约”，国

史称高陶事件。

成立汪精卫政权

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与日本合作建立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汪兆铭政权，取消华北的王克敏和长江下游的梁鸿志政权。

3月26日，汪出任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

1941年5月，在南京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亲自兼任委员长。

1943年汪曾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名义，参与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当年4月，汪在李士群安排下于南京汪公馆与新四军政委兼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派遣的中共代表潘汉年会面。汪向潘汉年表达了请求共产党参与其政府治下的议会政治，表示共产党不应该和独裁的蒋介石联合，但是潘汉年断然拒绝之。

病逝

1943年年底，汪的健康恶化，1944年3月赴日治疗。11月10日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今名古屋大学）医院去世。11月23日遵其遗愿，归葬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之侧，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汪虽为病死，但死因有不同的说法：一说10年前汪被铁血锄奸团成员刺杀受伤，子弹深陷体内，无法取出，铅毒逐渐扩散，终至药石罔效。不过张学良之调查则指出，当时所使用之子弹为钢弹而非铅弹。日本作家上坂冬子访问汪氏子女后写的书支持病死之说。一说是其妻陈璧君误信西医才造成汪兆铭病死。另一说则是汪遭日本军下毒谋杀，但被汪长女汪文惺、女婿何文杰断然否认；何文杰表示汪患的是“多发性脊骨瘤肿”。

墓地

日本投降后，1946年1月21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奉令将汪坟炸毁；打开棺木时，见汪的遗体上覆盖著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身穿南京政府的

文官礼服，头戴礼帽。由于使用过防腐剂，遗体尚未腐烂。汪遗体被送往清凉山火葬场火化，骨灰被抛到长江里。1994年，原汪墓所在的梅花山顶放置一座汪跪像，因被游客吐痰便溺污秽不堪，于1997年被移走。另外2004年11月8日上午在绍兴市市区挖出一个汪跪像，上刻有“汪逆精卫”四字。

评价

正面评价

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中日战争史专家约翰·亨特·博伊尔（John Hunter Boyle）在《中日战争时期通敌内幕》一书中称：汪精卫国民政府和维希法国相似，“当他们认为德意日轴心国会取得胜利时，他们设法为自己的国家在“新秩序”中取得一席较为有利的地位。当战争胜利谁属已经没有把握的时候，他采取哄骗、拖延的办法来避开日本的勒索，并且多少为自己的管辖区保持一些自治的模样。”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走投无路的日本人不得不对汪政权的势力重视起来，“汪就越来越有可能为同胞争取到生存保障，拖延敌军进攻。在享有中国物产和资源方面同日本人竞争。在汪看来，签订一些协定和条约，都是一种竞争的方法。一旦战争结束，假如同盟国获胜，反正这些条约也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汪出走时留函给蒋说：从此以后他要挑起较重的担子，让蒋挑较轻的。究竟这封信有没有感动过蒋则很难说，但是汪在此后六年的余生里，的确是挑起了很重的担子，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

抗日名将李宗仁在《李宗仁回忆录》称：“但是我们也应该说一句公道话，便是汪兆铭当了汉奸，却没有做积极破坏抗战的勾当。例如汪氏投敌后，以前与汪氏渊源最深的国军将领，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五战区内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都是抗战阵营中的柱石。然终汪之世，未尝作片纸只字向张、黄等招降。足见大义所在，纵是卖国贼也颇觉不为已甚，而自我抑制。”

抗日名将张发奎曾经负责接收广东地区，他说：我没有听到广州民众对汪

伪政府的抱怨或抨击，也没有广州民众对伪政府怀抱恶感的印象。……无论广州抑或上海，这些伪府政要都是汪精卫的追随者，他们鼓吹所谓的"和平"，其叛国理由就是"中国打不过日本"，汪精卫组织就是基于这一理念。事实上，日本人并不是平等对待他们，他们充当了傀儡。然而他们宣称，即使他们仅仅是傀儡，也要为老百姓争回一点权益。我没有见到伪府在广东压迫民众的任何证据。

近年伴随两岸政治情况的逐步缓和，若干史学家即进入对汪的研究领域当中，并将其著述付梓，例如：王克文的《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许育铭的《汪兆铭与国民政府：1931年至1936年对日问题下的政治变动》、李志毓的《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于文学研究中，知名汉学家叶嘉莹则是讲有影音记录——"汪精卫诗词之中的'精卫情结'"。另外，中国大陆之业余历史爱好者林思云，亦以《真实的汪精卫》一书，发表若干翻案论述。

负面评价

作家老舍在《四世同堂》第56章时，评论道："他的投降，即使无碍于抗战，也足以教全世界怀疑中国人，轻看中国人。……（他）比敌人还更可恨"。重庆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曾于1946年炸毁位于南京梅花山的汪墓，取出汪精卫遗体重新火化并使用鼓风机吹散其骨灰。

毛泽东：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并发表题为《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的演说。这篇演说在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改题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汪精卫集团于1939年12月30日于日本秘密签订了旨在出卖民族利益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年1月，这件事被揭露后，中共中央于1月28日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的党内指示，指示各地应普遍举行民众大会，掀起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热潮。于是，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于2月1日召开。

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中日战争史专家约翰·亨特·博伊尔在《中日

战争时期通敌内幕》一书中又称："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汪实际上用他自己巨大的名望和威信（以及他的改组国民政府并不怎么高的威信）去帮助日本最坚决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的"分治合作"计划。这个计划同有些人所说的话完全是两回事。他们硬说：日本由于中国的孱弱和不团结而苦恼，她希望有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特别是抵抗苏联和英国的侵略。这个计划是如此藐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致只要汪默认了它，他的政权就注定了非失败不可。这个计划使汪所许下的"复兴中国"的诺言成为荒诞不经的假话。为汪辩护的人声称：汪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真正替日本计划卖力气，他们只不过是骗骗日本人，使日本人相信他们是在卖力干而已。他们可能没有说错，事实也许真是那样。但这丝毫也不能够削弱对方反驳他们的理由，那就是说：凭汪在中国的显赫地位，哪怕他只是暧昧地支持了日本，就一定会使他本国人民陷于不和与混乱。"

抗日名将李宗仁在《李宗仁回忆录》一书中又称："汪兆铭的为人，堂堂一表，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初与接触，多为折服，故颇能号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黔驴之技，亦止此而已。其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此种心神，常在会议席上充分表现。汪氏每次主持重要会议时，神志多不安定，周身摆动，两手搓个不停，一反其平时雍容和穆的风度。再者，汪的处人，亦极虚伪。凡汪氏所不喜的人赴其寓所访问，汪氏亦均屈尊接见，娓娓倾谈，状至亲晤。然客甫出门，汪便立现不愉之色，顿足唾弃。转瞬之间，态度判若两人，凡此均足以表示汪的为人"。"所以吴敬恒曾骂汪是"伪君子"和"花瓶"，足见许多老同志也认为他不能负实际责任。总理在世时，汪总是受命出使四方，从未负过党政专责。但是汪氏却是个心比天高、热衷权利的人，中山逝世后，汪氏一意左倾，与蒋中正互为表里，不择手段地揽权夺位。谁知他的合作者蒋氏，也是个热衷权力不择手段的人。他二人各取得党权、军权之后，竟又短兵相接，火并起来，经历多

次，汪氏自知非蒋的敌手。故此次我们诚心诚意地请他留在南京主持党政，他总以为沪、宁一带是蒋的老巢，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断非彼久恋之乡。他如要掌握党政，必须回广东另起炉灶。这便是汪氏的基本观念，也是嗣后宁、汉不能合流的基本原因”。

抗日名将张发奎在《张发奎口述自传》一书中又说：“对于那些为他牺牲与战斗的军人的态度，显露了汪精卫的软弱无能。我常常对他说，第四军是为他打仗的，他应该照顾第四军。‘可是，作为行政院长，他不敢对蒋先生进言。每逢出现议题，他总是要看蒋先生的脸色，他本身没有主意。他一阔就变脸，变得官气十足，忘了他从前的理想。’”“置个人仇恨于国家利益之上是错误的。很明显，汪精卫对蒋的仇恨，甚至更重要的——他妻子对蒋先生的仇恨（陈璧君始终怀疑蒋介石是1935年刺汪案的主谋），已经放在民族大义之上了。”

1939年10月1日，蒋接见中外记者，在回答记者问题时明确指出，“汪逆卖身降敌，罪恶昭著，根本上已自绝于中华民国全国国民，对此汉奸罪犯，人人得起而诛之，汪逆所召集之会议，国民皆知为汉奸卖国之会议，其参加之每一分子，国人尽知为卖国之汉奸，问题已远超过于党的纪律规章之外，故中国国民党不必再有如何声明”，并表示“在敌军压境战斗剧烈时，公然响应敌人所谓建立东亚新秩序，意图并吞中国之声明，此为何种之行为？奔走敌京，勾结敌军，唆使敌人加紧侵略，屠杀同胞，此为何种之行为？在敌军司令部内广播演讲，污辱我国军，诬蔑我同胞，对于我正在战斗之将士，劝诱其局部停战，此又为何种之行为？君等试思，任何国家政府，对此等奸逆，应作如何处置，中国国民党负有革命救国之责任，对于如此罪恶昭著之汉奸国贼，如予以宽纵，则将何以对总理，何以对先烈，何以对主义，何以对国民，更何以尽领导革命之天职？如此在本党岂不蒙熏莸同器之讥，而纲纪荡然，廉耻道丧，又将何以立国乎？一言以蔽之，海可枯，石可烂，而对于引狼入室为虎作伥之汉奸汪逆，则永无宽恕赦免

之理”。

1940年1月，陶希圣与高宗武脱离汪精卫政权，高宗武托杜月笙将“汪日密约”呈送蒋介石。蒋于1月13日写道：“吾不知汪逆卖国之实情，竟至如此也！彼对国土与主权之丧失，毫不关心，而惟以关税存款与组织伪政府之预付金四千万元是争，是诚狗彘不如矣。”

蒋看到杜月笙送来的密约文件后，立即指示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专程由重庆飞往香港，亲自指挥发稿事宜。1月22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即“汪日密约”，在香港、重庆、昆明、上海及国内外各地同时见报，是为“高陶事件”。香港《大公报》1月22日的头条为：“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资卖到思想”。

2月24日，蒋发表关于日汪协议之告全国军民书及告友邦人士书。在告全国军民书中，蒋指出：“近日中外各报所披露的汪逆卖国文件，有“日汪”在上海签定，而由犬养健携回东京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汪逆向敌方提出成立伪政府的必具条件，和敌方的答复。这几个文件全国同胞批阅之后，对敌阀与汪逆的阴谋诡计，必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我们可以察知敌国在一月初所谓“兴亚院”开会讨论的内幕，我们更可以由此认识汪逆是不惜将整个国家和世代子孙的生命奉送给敌国。…所谓“善邻友好”就是“日支合并”，所谓“共同防共”就是“永远驻防”，所谓“经济提携”就是“经济独霸”……。这个敌伪协议，比之二十一条凶恶十倍，比之亡韩手段更加毒辣。我敢相信稍有血气稍有灵性的黄帝子孙中华国民，读了这一文件，一定发指眦裂。……”

妻子辩护

在汪死后，其妻陈璧君在法庭上为汪的责任与行为辩护：“日寇侵略，中央政府领导无力护民，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于铁蹄下，这是蒋中正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有那一时国土是汪

先生卖去日寇的？反而重庆统治下的地区，汪先生从未向一将一兵招降。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险，忍辱负重，在敌前为国民生存谋福祉，每天生活在敌人枪口下，这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与日本人往还。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家庭

汪与陈璧君夫妇育有6名子女，除一名夭折外，其他5名为：

长子：汪文婴（1913年－2011年）曾留学德国学习政治经济，后来任汪精卫政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军需处处长。晚年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长女：汪文惺（1914年－2015年）早年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学习，后来在香港任教于多所小学。退休后定居美国新泽西州。

次女：汪文彬（1920年－2015年）曾任印度尼西亚政府医药部门高级主管，后来在印度尼西亚当修女。

三女：汪文恂（1922年－2002年）早年为父亲汪精卫整理文稿，后来任香港大学教育系教授。

次子：汪文悌（1928年－）自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来在香港从事桥梁建筑工作。

著作

《总理遗嘱》

《双照楼集》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于汪精卫（以及民国初期其他一些类似政治人物）的反思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整整半个世纪中，在民国政府的超过半数的时间内，都是处于纷纷嚷嚷、喧嚣混乱、一盘散沙、你争我夺的状态之中。尤其是，在国民党内部的高层之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勾心斗角、权力倾轧、利欲熏心、蝇营狗苟、以及挂羊头卖狗肉的虚伪诡诈。

【虽然，民国政府几乎总是处于这种混乱、低效、争夺的状态之中，但是，我们仍然要说，这种状态仍然是属于民主自由的政治框架体系。在民国期间，在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结社自由、社会法律秩序等等方面，政治体系都要在本质层面上远远地好于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的七十多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残暴统治。】

在民国政府的多数统治时期、甚至包括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府最高层都是处于一种“委员会”的统治机制。在委员会的各项事务决策过程中，往往有着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不断的政治妥协、博弈、争斗、平衡。【蒋介石的个人绝对独裁，一直要等到他逃到台湾以后才开始全面实施】。

然而，通过仔细观察民国政府的历史、尤其是民国前期历史中的许多政治人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见，在民主制度框架下所显露出的、许多世人心

中的罪。而在那许多民国政治人物中，汪精卫就是一个非常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人物。

汪精卫是一位聪慧过人、才华过人、尤其是具有卓越演说才能与政治动员力、号召力的重要历史政治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政治舞台上，汪精卫曾经有着广泛的号召力、影响力，曾经有着巨大的人气与声势。在他的生命中，不乏勇气，不乏令人钦佩的表现。甚至，当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甘愿冒死前往北京刺杀当时清朝政府最高层领导人物，甘愿为推翻满清、建立中华民国而奉献自己的生命。

然而，汪精卫的一生，却既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也是一个令人可叹、可恨、可鄙的人生故事。

其实，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政治舞台上能够清楚地看见，几乎所有重要政治人物【无论是蒋介石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还是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共产党，还是慈禧太后所领导的满清政府大臣群体】都有着这种同样的悲剧色彩，有着同样的令人可叹、可恨、又可鄙的特点。只不过，由于汪精卫的才华横溢、影响力广泛，所以，我们能够在汪精卫身上看见程度更为深刻的那些特征。

汪精卫早期曾经是孙中山先生身边的得力助手，并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孙中山思想衣钵的人。孙中山去世之前的政治遗嘱，其实就是出于汪精卫的手笔。孙去世以后，汪精卫继续秉持孙的三民主义思想，继续执行孙晚期的联俄联共政策路线。然而不久以后，国民党内部对于如何对

待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刻的分歧。之前，孙中山生前的另一位年轻政治助手、蒋介石，在从苏联考察回来以后，以非凡的政治智慧、卓有远见地看见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对于国家社会的巨大危害性。因而，蒋介石与国民党内部的许多保守派人士一致认为，应当远离中共、排斥中共，而不应当允许中共进入国民党内部、欺谎地渗入民国政府的运作等等。另一方面，汪精卫则与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们一直认为，应当友好地对待中共。

当时，1920年代的国际政治形势是，苏联由于刚刚以暴力夺取了俄罗斯政权、并在俄国境内大肆迫害屠杀东正教人士，从而在西方国家中间受到了严重的孤立。无论是英美、法国、意大利还是德国等重要欧洲国家，都对苏联的这些行径强烈谴责，并在政治经济许多方面对于苏联进行围堵。所以，苏联有着强烈的动机，想要转向亚洲，在欧洲以外的世界中寻找盟友、拓展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因此，苏联大力地投资、扶持中共，并千方百计地想要影响孙中山等许多民国政府人士。这正是孙中山时期的联俄联共政策的一个主要政治背景。同时，孙中山以及后来的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之所以愿意向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表示友好，也与他们本人的政治倾向【包括促进社会平等、帮助穷苦阶级，等等】有着深刻的关系。这些关系本身之中，并非没有不合理的原因与内容【我们将会在本书后文专门深入讨论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内容本身】。

汪蒋之间的争执，导致了国民党在1920-1930年代很长的时期内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由于汪不同意蒋等人在上海对中共实施打击，因此，汪私自逃到武汉，另立国民党中央，从而导致了所谓的“宁汉之争”【即，南京（宁）与武汉（汉）之间，有两个中国国民党的权力中心，互相矛盾、互相争执、互相攻击】。

【值得指出的是，国民党内部的这种权力争斗，并非是像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那样。事实上，后者是极其恐怖、血腥、甚至导致了大规模生灵涂炭、文攻武斗、十年文革浩劫、三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等等的过程。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共权力斗争过程中——（例如反右、文化大革命、整风、三反五反、上山下乡；例如毛泽东与高岗、刘少奇、林彪、彭德怀、等等等等之间的斗争）——无数人丧失性命、身陷牢狱、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头破血流、惨烈至极。】

【相比之下，国民党内的政治权力斗争则要相对而言温文尔雅得很多。双方之间，在绝大多数时候，往往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互相通电批评，而一般而言并没有血雨腥风的军事行动；甚至，双方之间常常会握手言和、若即若离、时分时和。从孙中山的同盟会时期开始，中国国民党人士就有着这种政治文化的特点。】

当汪精卫从上海逃到武汉、与蒋介石的南京民国政府权力中心分庭抗礼以后，汪精卫成立了位于武汉的、另一个国民党权力中心。但是，不久之后，汪精卫也认识到，中共在苏联政府的资金、人力物力、政治支持下、所将要进行的各种破坏中国社会法律秩序的暴力行动，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国家、社会都有着巨大的危害性。于是，汪精卫也很快开始转变立场，在武汉以及周边地区，大肆抓捕并杀害中共人士。

然而，汪精卫并没有回到蒋介石南京政府那里，向对方承认自己原先的错误，而是继续保持这种国民党内部高层的汪蒋之争的政治分裂态势。这种

国民党权力中心的分裂状态，一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汪精卫成立所谓汪伪政权、成为日本军人手下傀儡以后，才正式结束。

事实上，在抗日战争以前的历史阶段中，正是由于有许多像汪蒋之争这样的民国政府分裂状态【例如山西、东北、华北、云南、各地军阀政治势力等等】，才导致中国一直积弱、狼狈挨打、饱受日本欺凌。

在过去的一百八十年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这些在某种程度上与汪精卫相像的政治人物【无论是晚清时期的许多大臣，还是民国时期的许多官员，或是中共统治时期的许多领导】。

这些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许多政治人物，无论是处于什么样的政治立场，无论有着什么样的政治主张、或无论属于什么样的政治派别；——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没有敬虔的、超越生死的、——对于上天的、对于那位宇宙天地与世人生命之主、上帝的信仰。

常常，——他们并非是没有才华，也并非是没有属世的聪明智慧；他们并非是没有非凡卓越的政治能力、政治素质、政治影响力。他们甚至常常会有着看似美好的政治理想，有着澎湃的激情壮志，有着想要济世、平天下、造福于世人的政治蓝图与政策主张。

但是，他们往往在内心深处并没有绝对的是非观念；他们并不能勇于真心地、谦卑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并不能为了民族大义而真的牺牲自己的

名誉地位；他们仅仅以一颗自以为义的心、看见自己的视角，但却不能谦卑地看见事情的全貌与全局。

他们都是和我们每一个世人一样的罪人。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世人在内心深处，都犯罪、背离、远离、离弃了那无限伟大的、公义圣洁的造物之主、那伟大的上天、上帝。因此，世人在内心深处自以为义，自己以为自己是正义的；自己以自己为自己的神、为自己生命的归依。所以，世人与世人之间，常常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歧义、异见、争斗。

那些政治人物身上，本身并非毫无可取之处；他们甚至有很多是像汪精卫这样才华横溢的人。然而，正是由于他们的能力突出、超于常人，正是由于他们一呼百应、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有许许多多的追随者，所以，我们在他们的身上，就往往会看见更加明显的罪。他们没有超然的、敬虔的、热忱的、真挚的对于上帝的信仰；他们在心底没有一种深深的敬畏；他们常常喜欢自以为义；他们对于国家社会往往会带来更大的伤害、分裂、破坏、负面影响。

他们的人生故事，往往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因为他们本来可以有很大的潜能、为国家社会大众做出卓越的贡献。在他们的身上，常常有政治领袖人物所特有的那种人格魅力。但是，由于他们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挚热忱敬虔的、真正的信仰与敬畏，因此，他们的心思意念经常处于各种矛盾之中，自己和自己打架，甚至经常会干出一些在世人眼中看起来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或是常常干出一些出尔反尔的事情。

他们做事情，很多的时候是出于义气、血气，而不是出于信仰。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有巨大的空虚、空洞之处。因而，他们往往在一些最重要、最基本的事情上，做出错误的决定和抉择，没有明辨是非的观念。或者，他们看事情仅仅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和角度，——只要有一点和他所需要的想法契合，他们就会全盘接收，——就好象是没有分辨能力似的，以至于自己欺骗自己。

=============

理想：——他们的理想，往往仅仅是为了国家、社会、世人的物质性、经济性、属世性利益，而不是为了人的思想、精神、灵魂，更不是为了那对于上天、对于造物主、对于创造宇宙天地与世人生命之主的信仰。

争议：——他们常常会为了各种各样、这样那样的、非原则性的事情，彼此之间、与他人之间充满了争执。他们不愿意真诚地、谦卑地承认自己的局限与错误。在专制主义者面前、在暴君统治面前、在武力胁迫面前，他们常常虚以委蛇、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然而在彼此平等的同僚、同事、同志面前，他们却常常喜欢争议、争执、抬扛，而不愿意主动妥协、谦卑相让。简言之，他们常常具有“欺软怕硬”的共同特点。

正义：——他们内心缺乏终极的、绝对的正义、公义、正直、谦卑、热忱等等观念。他们不知道道德法则的终极性根基在于什么，也不知道正义之事的源头究竟在于什么。因此，在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世事之中，他们往

往以自己的好恶、角度、利益、眼光、观点，为判断事情好坏善恶的标准，而没有敬虔、敬畏之心。

目标：——他们的目标，并非是饥渴慕义、追寻真理、寻求真相、倚靠上天、谦卑诚实、认真谨守的信仰与生命，而是属世的——利益、荣华、兴旺、成败、得失。

自义：——他们自以为义，自己以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自己以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然而，他们在内心深处却既没有敬虔的、对于上天的信仰、敬畏与寻求，也并不真的渴望真理与公义。

这正如以下诗句所显明的心境：——

沁园春 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热血：——他们的激情澎湃、热血奋进，仅仅是为了人的骄傲与志向，但却不是为了真诚的、谦卑的、热忱的、对于上帝的信仰。因此，他们彼此

之间常常充满纷争、难于团结。

罪性：——他们的眼中很容易看见他人的错误、缺点、谬误，但却不容易看见和承认自己的错误、缺点、谬误。他们在心底深处，离弃、背离、悖逆上天。

和平：——他们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和平是在于什么。他们更不知道，人与上帝、那宇宙天地之主、世人生命之主的和平，是何等地重要。

人性：——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也不知道爱的真正根基在于什么【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他们常常不会爱，也不被爱。

公义：——他们看不见，圣洁公义之道德法则的根基与源泉，来自于何处。因此，他们的心底没有绝对的是非观念与善恶标准。

民主：——他们并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以及民主的真正根基与源泉动力在于什么。

悲剧：——他们的人生，是我们每一个世人生命故事的真实写照，因为我们所有的世人都生在罪中、活在罪中、死在罪中，内心刚硬顽梗，而不愿意承认和悔改己罪，不愿意寻求和归向那宇宙天地之主。

圣经 罗马书 第二章

罗马书.

2.

你这判断人的啊！无论你是谁，都没有办法推诿。你在什么事上判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所作的，正是你所判断的事。

我们知道， 神必照着真理审判行这些事的人。

你这个人，你判断行这些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是一样，你以为能逃脱 神的审判吗？

还是你藐视 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的吗？

可是你一直硬着心肠，不肯悔改，为自己积蓄 神的忿怒，就是他彰显公义审判的那天所要发的忿怒。

神必照各人所作的报应各人：

以永生报答那些耐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的人，

却以震怒和愤恨报应那些自私自利、不顺从真理而顺从不义的人；

把患难和愁苦加给所有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却把荣耀、尊贵与平安赐给所有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因为 神并不偏待人。

凡不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将不按律法而灭亡；凡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将按律法受审判。

因为在 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而是行律法的得称为义。

没有律法的外族人，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有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或作控告、或作辩护。

这也要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在　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各人隐情的那一天，彰显出来。
你身为犹太人，倚靠律法，仗着　神夸口，
而且明白他的旨意，又从律法得了教导，能够辨别什么是好的，
自信是瞎子的向导，在黑暗中的人的光，
愚昧人的导师，小孩子的教师，在律法上得了整套的知识和真理；
你既然教导别人，难道不教导自己吗？你传讲不可偷窃，自己却偷窃吗？
你说不可奸淫，自己却奸淫吗？你憎恶偶像，自己却劫掠庙宇吗？
你既然以律法夸口，自己却因犯律法而羞辱　神吗？
正如经上所说的："　神的名，因你们的缘故在列邦中被亵渎。"
你若遵行律法，割礼固然有益处；但你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不是割礼了。
这样，没有受割礼的人，如果遵守律法所规定的，他虽然没有受过割礼，不也算是受过割礼的吗？
那本来没有受割礼却遵守律法的人，就要审判你这有仪文和割礼而犯律法的人。
因为表面上作犹太人的并不是犹太人，在肉身上表面的割礼也不是割礼。
唯有在内心作犹太人的才是犹太人；割礼也是心里的，是靠着圣灵而不是靠着仪文。这样的人所受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　神来的。

罗马书.
3.
这样说来，犹太人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呢？割礼又有什么益处呢？
从各方面来说，的确很多。最重要的，是　神的圣言已经托付了他们。
即使有人不信，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他们的不信会使　神的信实无效吗？
绝不可能！　神总是诚实的，人却是虚谎的，正如经上所记："你在话语上，显为公义；你被论断时，必然得胜。"
我且照着人的见解来说，我们的不义若彰显　神的义，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难道降怒的　神是不义的吗？
绝对不是！如果是这样，　神怎能审判世界呢？
但是　神的诚实，如果因我的虚谎而更加显出他的荣耀来，为什么我还要像罪人一样受审判呢？
为什么不说："我们去作恶以成善吧！"（有人毁谤我们，说我们讲过这话。）这种人被定罪是理所当然的。
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控诉过，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
正如经上所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　神的；
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他们嘴里有虺蛇的毒，
满口是咒骂和恶毒；
为了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步飞快，
在经过的路上留下毁灭和悲惨。
和睦之道，他们不晓得，
他们的眼中也不怕　神。"
然而我们晓得，凡律法所说的，都是对在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让每一个人都没有话可讲，使全世界的人都伏在　神的审判之下。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在　神面前得称为义，因为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
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　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
就是　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地临到所有信的人。
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
但他们却因着　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
神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赎罪祭"原文作"蔽罪所"），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　神的义；因为　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

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又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这样，有什么可夸的呢？没有可夸的了。凭什么准则说没有的呢？凭行为吗？不是的，而是以信心为准则说的。

因为我们认定，人称义是由于信，并不是靠行律法。

难道　神只是犹太人的　神吗？不也是外族人的　神吗？是的，他也是外族人的　神。

神既然只有一位，他就以信为准则称受割礼的为义，也要以信为准则称没有受割礼的为义。

这样说来，我们以信废掉了律法吗？绝对不是，倒是巩固了律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20年代的中国

（引述维基百科相关文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20%E5%B9%B4%E4%BB%A3%E4%B8%AD%E5%

9B%BD

1920年代中国指的是从1920年到1929年的时局变化。在经历了1910年代的多次政治事件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环境，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未能建立起有效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也无法绝对控制相关省区。社会舆论开放、社会运动频繁、反对党和军阀都成了北洋政府的制衡力量，北伐战争以后东北易帜，北洋政府时期正式结束，进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

政治

这十年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初受军阀控制，但在中国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以后，因成立黄埔军校，渐能掌控两广军事大局；加上中国国民党组织、宣传和运动，到1925年五卅运动后，中国国民党在广州成立之国民政府，成为国家统一希望。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员及中国国民党左派占了优势，密谋倒蒋，形势对蒋中正不利。1926年3月20日，蒋发觉中山舰行动可疑，怀疑共产党阴谋暴动，遂断然逮捕代理海军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及军中共产党员，解聘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遣送回国，汪精卫对蒋大为不满，称病请假出国。1926年5月，蒋与鲍罗廷商定"整理党务案"，要点是：1.凡中国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务须服膺三民主义；2.中国共产党员在中国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之委员人数不得超过总数之三分之一；3.中国共产党员不得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先后历经北伐国共第一次合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中国共产党迫于形势，仓猝起事，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等策动受共产党影响之北伐军2万人发难，占领南昌，几天后败逃。1927年7月清党后，陈独秀被指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而被迫下台。中共由瞿秋白继续领导。"南昌起事"失败后又发生两湖秋收起事。毛泽东等率领残部四百余人与朱德等残部

于江西井岗山会合，并成立第一个苏维埃组织，简称苏区，并采游击战略与国军周旋。1928年，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暂停工农暴动政策，以发展工农红军为要务，并建立苏维埃巩固共产党实力，实行土地改革新措施。这次会议统一了全党思想，并克服了党内存在的左倾，毛泽东渐露头角。1928年起，国府在中央层面逐步建立起一个以训政为目的的管治模式。1928年10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颁布第172次党务会议通过的《训政纲领》，此后，国民政府即依据"训政纲要"实施训政，并草拟训政时期约法。中国国民党在1926至1928年之革命中获胜，成为执政党。

有论者指孙中山一直主张西方式的政党民主，试图在中国建立多党政治体制。孙中山以外的其他革命党人，也对多党政治寄予了极大希望。但是，随着宋教仁被刺，中国建立多党民主政治体制的设想行不通了，于是，革命党人开始寻求一种威权的政治体制模式。中华革命党，就是这样一个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孙中山的本意，是用一个权威性的、强有力的政党，从上而下推进革命。孙中山认为，在军政和训政时期，民众不足以主政，"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

《训政纲领》共六条：第一，训政时期，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第二，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时，以政权付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第三，依照总理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应训练国民逐渐推行，以立宪政之基础；第四，国民政府总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第五，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执行，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监督；第六，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施。

外交政策

此一时期，起先北洋政府是国际所承认之唯一合法政府，参与各种国际事务，大部时间有由国会选出之总统，有由总统任命之内阁。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派兵北伐，1927年4月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到1928年6月推翻北洋政府，成为国际上所承认之合法政府。

财政政策

1928年能为中央提供财政收入之省分只占中华民国法定疆域的三分之一，而且都集中在中国东南地区中国国民党实际控制区域内。1929年大萧条，各国不敢向外投资。发轫于1920年代的针织、丝织、染织、印染、毛纺织等工业都有长足发展。国府早于1927年北伐之后，在英美的支持下使用白银为抵押，开始筹备统一货币，推行货币改革，逐步废除银本位制度。

军事

中国国民党完成北伐和清党后内忧外患频仍，1928年至1930年间各派军人之冲突，甚至比北洋政府时期为激烈。革命势力，藉国共合作、各种政治和社会运动，由南方发展到北方，最后北伐成功。中国基本完成统一。此后中共先后在湖南、广东东部和广州等地起事，均告失败，毛泽东在湖南起事失败后，率残部进入江西、湖南交界之井冈山，建立红军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国家人力物力主要消耗在权力斗争或内战上。1928年秋，中国国民党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颁布《训政纲领》，实行一党专政，以党治国，收归地方政权。1929年元旦，召开国军编遣会议，将全国军队整编、裁遣，以减少军费开支并收归军权，冯玉祥及李宗仁指蒋中正以编遣之名，行削藩之实，密谋对抗。由于国共关系破裂，导致第一次国共内战发生。惟中共自1927年以后武装割据、武力扩张，对南京国民政府之威

胁与日俱增。1929年3月，桂系李宗仁首先发难，此后冯玉祥、唐生智等各路军阀先后起兵，均告失败。

大事纪

1921年
蒙古人民党在苏联红军支持下发动革命夺取政权，驱逐了俄国白军势力和北洋政府官员。
孙中山发动三次革命，在广州市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市举行，标志中国共产党成立。
日本将山东交还中华民国。

1922年
7月16日至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制定党纲，提出反帝反封建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之基本任务，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并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和《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等。

1923年
中国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成立，蒋被任为委员，旋又受任为大本营参谋长；蒋辞东路讨贼军参谋长职，专办大本营机务，扈从孙中山亲征。孙文越飞宣言，苏联支持孙中山。国共合作。
6月12日至6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1924年
1月20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至1月30日。
2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赤光》出刊第一期，周恩来任主编，邓小平等参加编辑出版工作。

1925年

1月11日至1月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分析中国社会各阶层在革命运动中之地位，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之经验教训，指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之重要，作出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之决议。

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随后全国各大城市形成大规模之全民反帝运动。

1926年

4月，蒋建议中国国民党中央，请整军肃党，准期北伐。4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推蒋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5月，第二次全体执委会开会，蒋为主席，决议接受海内外请愿北伐案，发表宣言。

6月1日，中央常会决议，任蒋为中央组织部部长。

6月4日，中央全体执委及各省市海外党部联席会议开会决议，迅即出师北伐，并任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1927年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制定《对华政策纲领》，宣称满洲和蒙古对日本国防和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是日本生命线，为维护满蒙权益，将不惜动用武力。

4月

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到武汉，中央军委分配朱德、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工作。

武汉政府下令，突免蒋职。

4月12日—蒋在上海发动政变，捕杀工人和中国共产党员。蒋解散上海总工会等非法组织，彻底清除中国共产党份子。

4月18日—国民政府奠都南京，蒋发表告民众书。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大会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之任务，通过政治形势与任务等各项决议案。

5月

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指示，要求中共实行土地革命政策，建立工农武装队伍8至10个师，并改组武汉政府。

6月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把电报副本送给汪精卫看，汪精卫认为这是对国民革命事业之根本危害，遂加紧部署反共。国共合作破裂。

7月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

7月15日—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通过"分共"决议案，汪精卫大规模捕杀中国共产党员和群众，中共中央临时常委迅即决定实行武装反抗，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8月

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为首之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北伐部队3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第一枪。

9月

9月9日—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8年

4月，日本出兵山东，阻碍北伐，蒋一面与日本交涉，一面委朱培德为前敌总指挥，积极北进；直鲁联军反攻济宁；蒋亲赴界河，督攻兖州，以挽救之；蒋赴泰安，督攻济南，并决定济南克复后，即渡河追击，不使日本阻止碍行进。

5月3日至5月5日，日军在济垣横行滋扰，向国军袭击挑衅，蒋严戒国军勿

予还击，并严令入济南部队，于5月3日夜退出城郊，派员与日军师团长福田商约束部队，未得要领；5月4日、5月5日，日军仍继续放枪发炮，并引张宗昌以飞机炸国军司令部，蒋为完成北伐，忍辱勿较，限令国军星夜渡河，仅饬留李延年步兵团驻守；5月6日移节党家庄，继续提兵北进，并吁召汪精卫、胡汉民回国，又切告奉系早日觉悟，日本阻碍阴谋，于是粉碎；蒋进驻石家庄督师。

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指出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之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中国共产党之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大会制定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之纲领，选出新中央领导机构，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在国内协助李维汉、任弼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12月—张学良易帜，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

1929年

6月25日至6月30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会议全面地总结检查六大以来工作，提出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建立红军，纠正非无产阶级意识，加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等项任务。

9月27日—俞作柏、李明瑞通电反蒋。

9月28日、9月30日—蒋介石两次打电报给李明瑞，威胁他不要"效尤李、白，重蹈张逆（发奎）自绝党国之覆辙"，李明瑞置之不理。

10月1日—俞作柏、李明瑞不听邓小平劝说，在南宁召开大会，誓师反蒋，宣布由俞作柏任讨蒋南路军总司令，李明瑞任副总司令，出发攻粤。

10月中旬—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邓小平和党其他领导人决定把掌握之三支部队拉出南宁，转移到左右江地区。

出生

1920年2月23日—孔德成，孔子七十七代嫡长孙，衍圣公，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逝世于2008年）

1920年3月7日—柏杨，台湾作家、观察家和文化思想家，被称为"台湾的鲁迅"（逝世于2008年）

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逝世于1995年）

1921年2月16日—华国锋，中国共产党前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总理(2008年逝世)

1921年6月27日—白光，1940至1950年代的中国著名影星、歌星，素有"一代妖姬"之称。(1999年逝世)

1921年7月7日—石全瑜，中华人民共和国著名作家、爱国人士(2011年2月11日逝世）

1921年11月12日—曾灶财，香港传奇人物（2007年逝世）

1922年10月1日—杨振宁，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县（今肥西县），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1922年10月24日—毛岸英，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长子，死于韩战。（1950年逝世）

1923年5月17日—邹承鲁，中国生物化学家。（2006年逝世）

1923年9月24日—李元簇，中华民国前副总统。

1923年12月2日—单国玺，耶稣会会士，枢机主教。（2012年逝世）

1924年2月6日—金庸，原名查良镛，中国新武侠小说代表作家之一。

1926年8月17日—江泽民，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1926年11月25日—李政道，美籍华人物理学家

1927年3月5日—王又曾，台湾企业家

1927年3月30日—曾近荣，香港男演员及主持人（2011逝世）

1927年8月19日—星云法师，中华民国扬州人，创办佛光山寺及佛陀纪念馆。

1928年1月5日—钱其琛，中国外交家，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

长

1928年7月29日—李嘉诚，香港国际企业家，香港及亚洲首富，亦是华人首富。

1928年10月1日—朱镕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任国务院总理、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1928年10月20日—李鹏，中国政治人物，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

1928年10月21日—余光中，中国当代作家、诗人。

逝世

1921年6月14日－周务学，中华民国少将（出生1869年）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启蒙思想家（出生1853年）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的主要创办人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中国政治人物

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中国记者（出生1886年）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中国革命烈士，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在北京被北洋军阀处决（1889年出生）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国学大师，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1877年出生）

1927年7月4日—陈延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书记陈独秀长子，革命烈士

1927年7月19日—赵世炎，革命烈士，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领导者

1927年12月12日—张太雷，革命烈士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中华民国第三任总统（出生1864年）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北洋军阀奉系首领（出生1875年）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中国思想与评论家（1873年出生）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五卅惨案

（引述维基百科相关文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5%8D%85%E8%BF%90%E5%8A%A8

五卅运动或五三〇事件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由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策划及领导的第一个重大群众运动，主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当政的北洋政府及其军阀势力。
事件发展至1925年5月30日，青岛、上海等地工人游行抗议日本棉纱厂非法开除及殴打工人，遭到开枪镇压，引发流血事件，又被称为五卅惨案、青沪惨案、五卅大屠杀等。

经过

起因
1925年（民国14年）2月，上海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第八厂发现一童工尸体，胸部曾受重击；工人相信为日籍管理人员用铁棍殴打致死，于是全体罢工。后经上海总商会调停，内外棉资方承诺不再打骂工人了事。

4月19日，青岛日商大康纱厂4000余名工人为争取工会权利、增加工资，举行大罢工，成立罢工委员会，散发《青岛大康纱厂全体工人泣告书》。内外棉等日商工厂工人积极响应，形成全市日商纱厂工人联合大罢工。
5月，多间日本纱厂以男工引发工潮为由，将所有男工解雇，引起22家上海工厂大罢工，再由上海总商会调停；正准备复工之际，内外棉第八厂再开除数十名工人。于是八名工人代表于5月15日再向内外棉资方交涉，内外棉第七厂的日籍资方人员与有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的工人顾正红发生争执，冲突下日籍资方人员开枪打死了顾正红，另七人受伤。工人向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求助，亦被逮捕。

在日本政府的压力下，胶澳商埠督办温树德出动警察和保安队强迫工人复工，将中共青岛支部书记邓恩铭逮捕、继而驱逐出境。中共中央及时派李慰农来青岛，建立四方支部，派任书记，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也前来青岛指导工人运动。中共山东地委书记尹宽等来青岛具体指挥。各纱厂公开建立了工会，青岛各界群众声援工人的斗争迅速发展。私立青岛大学学生会负责人罗荣桓带领该校学生团结全市学生支援工人运动。在青岛的罢工得到全市各界群众的同情和支持，纷纷成立罢工后援会。青年学生上街宣传罢工，发动市民募捐，资助纱厂工人。《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在该报开辟《工潮专号》，报道罢工动态，鼓舞了纱厂工人的斗志。在上海的事件先激起上海社会各界对外国势力的不满，和反帝国主义的情绪。

5月24日，上海各界举行追悼顾正红大会。各大学学生组织演讲组，到租界各处宣传民族主义，反对外国在华势力。日本政府和山东、青岛军阀当局加紧联合镇压青岛工人运动。警察厅派出警察3000多人包围大康纱厂，日本海军军舰从旅顺等地开来公开威胁，准备以武力对付罢工工人。北洋政府指示张宗昌、温树德，采取严厉手段解决工潮。5月29日，包围青岛内外棉纱厂的军警悍然向罢工工人开枪，厂内日本职员也乘机枪击工人，结果

打死工人8名、重伤数十人，逮捕工人70余人。

5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决定借此机会，发动学生和工人在30日到上海公共租界内举行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5月30日，数千名工人、学生、群众到上海公共租界各条马路组织大示威游行，抗议内外棉资方无理枪杀顾正红，要求释放因声援工人罢工而被捕的学生，反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等4提案。下午，大量学生聚集到上海公共租界内最繁华的南京路，跟公共租界警方发生冲突，有十多人受伤，其中有100多人被捕、关押在老闸捕房。到下午3时，约有上万群众涌到老闸捕房门前进行交涉。下午3时55分，英国籍捕头下令向群众开枪，打死13人，打伤40多人，另外逮捕49人。工部局宣布戒严，租界内的大学被封闭。是为"五卅惨案"。

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从6月1日起，上海全市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罢工、罢课、罢市。

后期，由于商人和中共的矛盾突出，因此商界于6月24日宣布停止罢市。9月18日，卢永祥令上海戒严司令奉系军阀邢士廉，封闭上海总工会和工商学联合会，通缉李立三、刘华等工人领袖。8月中旬，各地工人停止罢工，罢工事态逐渐平息。

死者名单

当场死亡的13人是：

何秉彝，上海大学学生，四川人，共青团上海地委组织部主任

尹景伊，同济大学学生，山东人，校学生会执行委员

陈虞钦，南洋附中学生，原籍广东增城，生于南洋荷属婆罗洲

唐良生，华洋电话局接线生，江苏人

陈兆长，东亚旅馆厨工

朱和尚，洋务职工

邬金华，新世界职工

石松盛，电器公司职员

陈光发，包车行车匠

姚顺庆，琴行漆工

王纪福，裁缝

谈金福，味香居伙友

徐落逢，商贩

影响

五卅运动爆发后，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推进以及成功，收回租界、收回教育主权、反基督教运动和反帝国主义势力的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惨案发生翌日，上海总工会在宝山路宝山里2号成立，李立三为委员长，各科正副主任大部分为共产党员。

6月5日，青岛四方机厂全厂罢工，全市各界迅速响应。秘密返回青岛的邓恩铭主持成立了上海事件后援会，发表宣言，确定了各界反帝斗争纲领。

6月8日，青岛全市大中学校罢课。10日全市市民大会召开，动员全市民众举行示威游行。16日全市各界3万余人举行了青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集会。中共青岛党组织以工人、学生为主体成立了各界外交促进会，继而成立了青岛市工界联合会。

9月18日，上海总工会会所被查封，于是在狄思威路麦加里成立汪寿华负责的秘密办公机关（直到1927年3月进驻闸北湖州会馆）。上海总工会先后发动了20万人次的总罢工。

全中国陆续出现响应反抗外国在华势力。各地学生纷纷发动罢课、工人发动罢工。上海等地商人亦罢市支持。提出的要求包括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列强在中国的各种特权的。特别是在事件中的英国和日本更倍受针对。汉口、镇江、九江、重庆皆有因排挤英人及日人而起的流血冲突。部分外

籍人士受到袭擊，外国使馆、商店被抢劫。而英国军队则在汉口、九江等地的冲突中向群众开枪。

广州国民政府则策动香港及广州沙面英租界之工人罢工，称为省港大罢工。之后广州学生、军人及工人在6月23日游行，与沙面之英法军队冲突，约二百中国军民死伤，称为沙基惨案。

7月23日以大康纱厂工人为首再度形成纱厂同盟大罢工。次日张宗昌率新任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从济南赶来青岛，接受日本人和青岛买办商人的收买，于7月26日调集大批军警镇压工人罢工，封闭铁路工会和各纱厂工会，逮捕杀害了中共青岛负责人李慰农与胡信之等，镇压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一批共产党人、革命志士和工人学生骨干被捕，青岛国共两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民众团体全部被取缔，民众的一切自由均被剥夺。中共青岛党组织的活动和工人运动转入了低潮。

纪念

纪念地

苏州五卅路上的五卅惨案艺术墙

1926年5月29日，上海各界人士及人民群众团体集会游行，以纪念一年前发生的五卅惨案，并在闸北宝兴路方家木桥举行烈士墓奠基典礼。翌日，唐驼题字："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各界全体国民为五卅殉难烈士建筑公墓举行奠基礼纪念，唐驼敬书。"

1930年代初，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将老闸捕房南京路大门堵封，改由贵州路门口进出。原五卅惨案流血地点──老闸捕房南京路大门处改建为商铺，即今南京东路766-772号的大光明钟表店。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一幢砖木结构的二层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宝山里2号上海总工会会所)，为日军炮火所毁。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又在烈士墓西南建造五卅小学。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碑亭为炮火所毁。

1938年，日军将五卅烈士墓全部炸毁，部分烈士遗骸被移葬大场。

1949年以后，老闸区与黄浦区并合，于是将贵州路101号老闸捕房的原址改办培光中学。

1959年，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1960年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1977年，重新公布为上海市纪念地点。

1980年公布为上海市纪念地点。

1985年，上海市文管会在遗址勒石纪念并举行揭幕仪式。1985年，改为上海市商业职业技术学校。目前，商职校里仍保留着以前老闸捕房的牢房旧址供人参观。1985年，老闸捕房旧址也被公布为黄浦区文物保护单位。以后在原址另建楼房，现为上海第五衬衫厂仓库及食堂。

五卅惨案的死难者埋葬在闸北宝兴路方家木桥北首（今闸北区广中路668号广中路停车场内），建有正方形的五卅殉难烈士墓碑碑亭，碑上刻有谭延闿书写的"来者勿忘"四字和蔡元培撰文的碑文。碑亭顶部四角刻有醒狮雕塑，每个墓顶上刻有雄鸡雕塑。

相关纪念物

"五卅"烈士墓遗址，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广中路街道的新同心路1号处，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五卅"运动初期的上海总工会遗址，位于静安区宝山路街道宝山路403弄（宝山里）2号。

五卅演讲厅，位于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云台山南面的伯先公园内，为五卅运动期间镇江各界为纪念五卅惨案而建的一座公共演讲厅。

五卅路与纪念碑，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五卅运动爆发后，当时苏州各界人士为纪念这一事件，在皇废基修建了一条马路，称为五卅路，并竖起两块界石。1985年为纪念五卅运动60周年，将五卅路界石移至五卅路中段民治路口，并镌刻一纪念碑。

注释

1924年1月～1927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设工人部，部长

先后由廖仲恺、胡汉民担任，秘书为中共党员冯菊坡。国民党领导上海工运的机构为上海执行部，执行部的工农部长为于右任，秘书为邵力子，干事为邓中夏、王仲一，办事员为王荷波、刘伯伦。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1930年代的中国

（引述维基百科相关文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30%E5%B9%B4%E4%BB%A3%E4%B8%AD%E5%9B%BD

1930年代中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黄金十年"，中国大陆主体由中国国民党一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执政，同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后续组织则先后在江西和陕西活动。此外，苏联帮扶蒙古人民共和国控制的蒙古地方、日本帮扶满洲国控制的东北地区、英国帮扶噶厦控制的西藏地方等区域并不受到国共两党任何一方的领导和控制。
在黄金十年至1940年代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前，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基础设施、社会政策、边疆民族政策、外交、军事等项目上皆

有一定成就，整体环境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最高水准，不过由于各派政治势力竞逐争斗，中原大战与第一次国共内战等战事爆发。加以日本侵略满洲地区、华北地区，国无宁日。

经济

在所谓黄金十年建国初期，国民政府所遇的困难极大，除了财政方面收入少支出大，在政治层面，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掌握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几省，其他省表面上服从中央，收入却不上交。占总收入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关、盐、统三大税收，也因晚清及北洋政府向外举债而早被当作抵押。战事频仍，导致军费开支庞大且要偿还前清政府所定条约债务。当时国民政府财政上面对的困局是中央丧失田赋收入及地方上存在着税收混乱。1920年代与1930年代之交，国民政府可谓处境恶劣。

工商业发展

但1930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达7.7%以上。1931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社会经济状况也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相较于其他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大萧条，中国工农业产值达到了清朝末期、民国肇建以来的最高水准。其中，最显著的工业成长分别为中国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及钢铁工业。除此，就农业方面，以乡村自治、合作社和平民教育为三大主体的乡村建设，提供广大的原物料与食物，并开始享受到市场整合的现代经济制度。

此阶段中国经济虽在国有化及私有资本化的历程颇有弊端，然而在中央掌控金融主导权与轻工业逐渐成形鼓舞下，中国已进入工业化的起端，并以官僚资本及引进新组织新技术等方式，彻底改善中国既有经济规模，扩大经济成果。

中国大陆学者黄汉民通过对1930年代中国工业产值发展趋势的分析，指出虽然1930年代前期中国的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但中国工业生产的总趋势却仍在跌宕起伏中继续有所发展，并在1936年达到了近代历史上最好

水平，而且又产生了一批新兴行业，如电器用具工业、电机工业、染料工业、酒精工业、酸碱工业等等，新兴行业又促进了工业部门结构调整。此外产品种类增多，产品结构也起著变化，部分国货产品开始替代了进口外货。其次，工业地区分布也在在扩大，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有较大提高了。
十年建国时期中国重工业建设，主要以国防工业为核心。具体工作则是由资源委员会进行的。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为"资源委员会"，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办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企业。从此，资源委员会也担负了整个国家的重工业建设任务，这就表明以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明显地具有作为战时国防体制的一个环节的性质。以国家建设支柱和国民经济主要指标之钢铁业为例，1935年之钢铁产量仅在1927年3万吨之基础上增加2万吨。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根据国防需要和可能的经济能力，拟定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为获纳粹德国的资金和技术，1936年6月落实为中德三年计划，预定于三年之内，在中南省份尤其湘、鄂、赣等内地建设与国防需要直接相关的重工业和矿业，奠定中国冶金、燃料、化学、机器及电器工业的基础。
由于国民政府的重视与推动，上述重工业及厂矿，有的已建成投产，有的进入筹备阶段。在工业化方面，民营工业受外资、外货影响，发展困难；政府对工矿、交通等企业大量投资，谋主导工业发展。在冶金工业方面已建成的有中央钢铁厂、湖南茶陵铁厂、湖北灵乡铁矿、江西钨铁厂、四川彭县铜矿、湖北大冶、阳新铜矿、中央炼铜厂、重庆临时炼铜厂、湖南水口山铅锌矿、云南锡矿、青海金矿、四川金矿等。在燃料工业方面，有江西高坑煤矿、天河煤矿、湖南湘潭煤矿、河南禹县煤矿、四川巴县、达县石油矿等。在化学工业方面，有氨气工厂及无水酒精厂等。正在筹备举办中的有中央机器制造厂、湖南湘潭飞机发动机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中央电瓷制造厂、四川长寿水电厂等等。1937年，这些工厂的产品产量为电力153.3万度，煤2万吨，净钨砂11,926吨，锑14,597吨，精铜9吨，铁砂6,313吨，电讯机425具。这些厂矿的建成和投产，奠定

了战时国防工业的基础。资源委员会设立的这些厂矿大多是当时国内没有或非常缺乏的行业，不少与国防建设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钢铁工业、飞机制造业、电工电料业、化学工业、钨、锑等矿产业。

辽宁、江苏、湖北等省是重要工业中心，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沿海部分工业迁往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带动内陆工业发展。抗战开始后，资源委员会兴办的已运转的各个重工业机器设备，有不少都拆迁到大后方，成为当地工业生产的骨干企业，这不仅提高了大后方的工业水平，开始扭转中国长期以来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和地区经济的严重不平衡的状况，而且继续为直接支持抗战提供有力的物质保证。

不过在这段期间，晚清时候建设的汉阳钢铁厂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年钢产量稳定在5万吨，该厂于1925年停止生产。国民政府统治十余年间始终没有恢复生产，惹起争议。不过有论者指汉阳钢铁厂自1925年起十多年未能恢复生产可能跟它自1904年起长期向日资举债终致日资所入侵有关。另外当时中国炼钢水平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钢铁价下滑也是重要因素。

农业发展

土地改革本是中国国民党立党纲领之一，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就在同盟会的纲领中列入了“平均地权”的内容。同时，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初步发展及诸多因素，农村自1920年代陷入社会、经济、文化全面衰退危机。为应对危机，各地兴起乡村建设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复兴农业是国民政府这一时期喊得最为响亮的口号。其目的除了发展国民经济之外，也是为了消除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带来的影响。政府设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等一系列农业结构，任常委担任首脑。政府救济农村金融，减免部分农产品税，对进口粮食征税；设立农业实验所指导农业生产，开办农业推广区等。治理黄河、淮河、长江以及太湖等水利委员会也相继成立，以兴修水利工程。尽管国府为农业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挽救农村经济的措施发挥的实际效用有限，政策基本上可以算是破产的。

有论者指出整个十年建国期间，中国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环境，地方的基层管治还须倚赖地主豪绅，国府并未能完全掌控农村政权，导致其施政收效甚微。其次是中国的农业经济跟欧美的农业经济根本不同，中国属于一种小农经济，由于经营规模小，透过机械化实现农业现代化，这必须藉壮大工业并从农村大量吸取劳力，从而把农业人口控制在总人口的20%以内为前提，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做不到的。既然无法实现机械化生产，也就难以实现农产品商品化，难言把整个农业推进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实际上在今日的中国大陆也未能完全做到。193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爆发连串灾荒，以及紧接着爆发的抗战，最终把农民推向了难以生存的边缘。

总括而言，国民政府在平均地权的措施上，因遇到阻力甚大，旋即停止实施，几乎没有什么建树。但在农业技术改良方面，则不断努力。例如在1933至1937年间，国民政府先后设立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良所和中央棉产改进所。这些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引进美国棉种，改良小麦和稻米品种以及实验杀虫剂和化学肥料。但不久抗战爆发，机关紧缩，在八年抗战期间，仅中央农业实验所尚存。除上述的研究机构外，国民政府也成立部会来促进农业发展。譬如行政院于1928年2月设立农矿部，于1933年4月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于1938年4月设置农产促进委员会，于1940年7月设立农林部。

金融改革

1930年代的宋子文，任中央银行总裁期间对中国金融改革贡献不少。

国民政府自成立后即厉行经济改革，统一货币，改革自清末以来金融货币制度混乱情况。但因经济落后，中国货币在英镑集团与美元集团之间左右徘徊，日本又极力扰乱中国金融，使得中国金融体系面临崩溃。

1933年3月8日，国民政府颁布了银本位币制造条例，实行废两改元。具体办法规定1元银币为一切交易的本位币，每银币1元（成色为0.88，总重为26.6971公分）易银7钱1分5厘。上海的金融机构于3月10日一律改用银元，

其他都市自4月6日起一律改用银元。

1933年7月1日起，中央造币厂的新银元开始流通。在西方大萧条初期，由于中国的币制不同于西方，在短时间内曾获得部分好处。但是随着英美先后放弃金本位制，中国经济则反而开始恶化。中国为统一全国货币，防止白银外流，稳定金融，巩固币制，改善财政和平衡国际收支，于1935年11月4日公布币制改革，同时颁布紧急法令，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法币，禁止用现金，并逐步取消各行和各地发行之钞票。

国府于1935年11月4日实施法币制度，将银本改变为外汇本位，以纸代银。新办法规定：1.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概以法币为限。2.白银国有，禁止以白银作货币性的使用，凡银行、商号、公私机关及个人，应将所有银元、生银交于发行准备委员会或指定的银行，兑换法币。3.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按照现行汇价，无限制售卖外汇，汇率是每元法币买美金0.295元，卖美金0.3元。

此政策既出，对稳定中国货币非常成功，可以誉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币制改革。中国第一种全面流通的不兑现钞票法币的问世，完成了货币统一并使币值脱离银价，迈入了现代化管理通货。随之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开始加深，相对地，各地地方势力，甚至租界洋行的利益有所削弱，使国民经济发展呈现出新气象。民间及中外银行所存白银和银元纷纷交给政府，半年之间，达国币8亿元。另一方面，纸币则逐渐代银元而为通货。银元的流通量在1933年3月约14亿元，自1935年11月法币开始流通，半年之间达9亿余元。到1937年6月达14亿余元。辅币方面上，中央银行于1936年2月开始发行20分、10分、5分镍质辅币及1分、半分之铜质辅币，以完成十进新制，解决当时辅币混乱的状况。可惜的是这种良好势头被日本侵华所破坏。法币政策的后续实施成为了世界罕见的恶性通货膨胀。

财政整顿

在财经上，政府介入银行、工矿、交通等企业。财政税收方面，国民政府在此时期建立起统一的税务机构。以金融措施针对各地税务机构重叠、税关林立、滥收税政、擅自留中央税款弊病全面整顿，改革税政，统一征收机关，使各项税皆归统税机关征收。1930年更裁撤全国釐金而征收货物统税。在实行关税上力争自主：1928年到1934年,先后和外国政府多次谈判，通过四次关税改革，使海关关税大为提高，显著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改善了十年建国初期财政紧绌的劣势。不过在收入提高的同时，开支也随着增加。主要原因在于国防军事与及各项建设开支大增缘故。赤字的弥补主要靠借债，1927年至1937年间，政府所借各种内债共达35亿6,700万元。偿债及军费支出占整个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偿债支出占25%到20%，1927年至1935年间，共偿还债款31亿1,000余万元，包括内债22亿1,000余万元，外债6亿3,000万余元，赔款2亿8,000万余元。不过这种情况下，政府仍常以贷款和公营企业收入投入建设，在1927年至1936年间，电力增9.4%，交通增8.4%至17.1%，工业增5.6%。
国民政府在整理财政的过程中，还建立预算度、推行直接税、废除苛捐杂税和废除厘金。废除厘金方面，1927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裁撤国内通过税条例，但因时局动荡，延至1931年1月1日实行。至1931年6月，各种厘金及由厘金变名之税捐，一律取消，使国内货物得以畅通无阻。在废除苛捐杂税方面，国府1934年7月通饬各省废除苛捐杂税，至1937年的3年间，全国25省市共废除苛杂7,100多种，废除款额达6,700多万元。在推行直接税方面，1936年7月公布"所得等暂行条例"，是年10月1日正式起征，首先开征的为公务人员薪给报酬所得，和公债存款利息所得，到1937年1月，又推及其他方面。这四点财政措施，足以纳中国财政于正轨，可惜日本侵华步伐加快，以致实行未能彻底，影响效果。

就在中国迈向工业现代化之际的1937年起，日本发动了中日战争，并陆续

大量增兵入侵中国。据统计，1930年代末期至1940年代中期的中国，因为此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至少6000亿美元，而后果就是让中国现代化进程至少延宕20年。

基础建设

交通建设

交通方面，陇海铁路、粤汉铁路之修筑，全国公路网之兴建，航空事业之拓展，以及电话、电讯事业之扩张，均较北洋政府时期为进步。1934年6月，国民政府派出徐庭瑶、俞飞鹏等一行21人赴欧洲考察军事、交通。1935年中国实行了币制改革，并得到了大量的外国货款，开始大力推动基础建设计划。1936年底，国民政府制定国防交通建设计划，使交通建设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单从1936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的一年半中，就建成铁路2030公里，平均每年达1353公里，这是1927年至1935年8年间年建筑速度的6.5倍。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公路干线例如平汉，粤汉，浙赣等铁路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1928年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特设铁道部，积极发展铁路交通，新筑的铁路如下：（一）1932年8月至1937年7月，利用比国庚款展筑陇海路，西段由灵宝至宝鸡，东段由大浦至连云港，使连云港至宝鸡间全部通车。（二）1933年7月至1936年5月利用英国庚款，接通粤汉路株洲至韶段，使武昌广州间全部通车，并于1937年8月完成粤汉铁路和广九铁路的接轨。（三）1930年至1936年1月完成由杭州至南昌的浙赣铁路，初由浙江省政府修至江山(1934年1月1日)，继由铁路道部会同浙、赣两省，并与德商合作，展修至南昌，1937年10月又完成萍乡至株洲线，与粤汉路接轨，路款多由中国银行承借。（四）1933年至1937年6月完成同蒲铁路，由山西省府自筑，此路北在大同与平绥路接，中在太原由正太路与平汉路接，南拟在蒲州风陵渡建黄河桥与陇海路接，惟桥未开工而中日战起。（五）1934至1935年6月完成田家庵至裕溪口的淮南铁路，以运煤为主。（六)1933至1935年5月完成宣城至南京的江南铁路，为民营铁路。(七）1935至1936年7月完成杭州

至曹娥江的铁路，使沪杭甬铁路完工。此外，为联络铁路交通，1930至1933年完成南京和浦口间的轮渡工程，使沪宁路与津浦路相接；1934年11月至1937年10月完成钱塘江大桥，使沪杭路与浙赣路相接。

总计，在黄金十年建国期间，国民政府共修铁路3793公里(东北三省修筑的1600公里未计在内)，使中国本土(东三省未计在内)铁路共达1.2万公里。

公路方面1935年后，国府将原来的公路网作了加修和延长。到1936年底，各省联络公路已完成2.1万余公里。同时，国府亦积极帮助闽、粤、桂、鲁、川、滇、黔等省修建联络公路，共建成6000余公里。至1937年7月，连接各省的公路网已基本形成，总长度109,500 公里。包括完成公路工程者43,521公里，未完成公路工程的道路65,979公里。至1937年，全国共有公路营业客车1万辆、货车1.3万辆。1938年，中国修筑从云南昆明到缅甸腊戍之滇缅公路，全长1,000公里，是中国西南地区之国际运输线，衔接缅甸中央铁路，通向南端之仰光出海口；1940年7月，日本迫使英国封闭滇缅公路，援华物资之输入几乎中断。

及时在抗战爆前建成的交通系统发挥极大效力，尤以铁路建设成效最为显著，例如抗战初期，广九铁路就从香港运输大量武器补给，再转往东南战场。可以说没有战前的交通建设，国军在抗战初期的机动性和作战能力将会大打折扣。

建设战略大后方

国民政府计划中的战略大后方，是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四省。

1935年2月，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同年4月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从持久战战略出发，把抗战作战轴心由南北向转为东西向，把西南地区作为抗战的战略根据地，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更重要是，西南地方当局，在民族危难的大前提下，都愿意跟中央达成共识，配合中央的调度。例如龙云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就敦促国民党中央重视加强云南的交通、教育建设，开发西南资源，将云南建设成国防后方。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府把发展后方工业放在战略关键位置，提出"三分军事，七分经济"的口号。先将沿海地区大量的工矿企业和技术人员转移后方，为后方发展工业创造了物资条件和提供充足的技术人才，并且加快了发展后方工业的步伐。兴办工业企业的种类从钢铁、机械、有色金属冶炼扩大到化工、电子等方面，发展工业地区也从湖南、湖北、江西扩大到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青海等省区，很快形成了重庆、川中、广元、昆明、贵阳等11个工业区，使战前中国工业地区分布不平衡、轻重工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变。国民政府的措施也催生了一批新兴产业，推动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进程，不论重工业或轻工业；军工或民用，但凡国防民生之物，差不多一应俱备。抗战期间，中国第一次建立了钢铁制造、特殊合金钢制造、电解铜、精密机床制造等新兴工业。几乎覆盖当时中国有能力生产的所有产品，形成了一个基本能够自给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

西北大开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矛盾激化，为了国防战略需要，国民政府把目光投向遥远落后的西北地区，希望籍著加快西北地区农业，及工业近代化，促进商贸与及东西部经济文化交流，改善中国战略环境，为未来的全面战争造好准备。

事实上早于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曾发表《实业计划》即"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提出了改善西北交通与及开发西北资源的一系列构思。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即依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逐步提出开发西北的计划。1930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就制定了《西北建设计划》。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府即加强国防建设，社会也发出开发西北的呼声。1934年，《开发西北》杂志创刊，蒋介石亲笔题写"开发西北"，这一时期开发西北的各种言论及计划纷纷出笼。社会上各界人士争相到西北

地区进行考察。而各大公私营银行皆到西北建立分支机构，扩展业务。可以说，由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国民政府将开发西北的构思逐步具体化，并且构想以西北作为未来的战略基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民政府更加积极推进西北开发，加大了对西北开发的资源投入。国民政府依西北特殊地理环境，在西北的交通水利、农业开发和工业近代化的发展上，都取得不少成就。

国府开发西北，先从交通水利着手，尤其以铁路建设为重，陇海铁路1937年通车，全长1075公里大大便利西北对外交通。公路建设方面，更逞爆炸性倍增，西兰公路，甘新公路及各条新建公路及整修公路，皆于此时期完成，其中1937年通车的迪伊线迪哈公路，是一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抗战时大批苏联援华物资就是通过这条公路运往中国的。

水利方面，1936年全国经济委员会制订的《全国水利建设五年计划大纲》，其中涉及西北水利的就有"完成关中八惠灌溉工程"、"整理绥远、宁夏、甘肃水渠"等计划案。西北各省中，陕西省的水利在抗日时期发展速度最快，1930-1941年已完成的大型灌溉工程就有泾惠渠、渭惠渠、梅惠渠、织女渠、汉惠渠。

近代西北地区的经济主要还是以农业为支柱，但农业生产发展却停滞不前，有见及此，全国经济委员会于1933年6月制定了《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提出"救济西北，当以流通农村金融为首务"的西北合作事业计划。于是西北农村合作社很快发展起来。据统计，仅仅咸阳、三原、大荔、武功、凤翔等关中5个地区成立的互助社就有1882个，合作社1688个，申请贷款总额1881741元，已贷合贷390631元，劝贷510587元。同时还在陕北协助中国农业银行拨款30万元，办理了陕北农贷。除信用合作社外，西北地区还成立了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垦荒合作社、畜牧合作社、水利生产合作社等。农村合作社的广泛建立，对缓和西北地区农民所受的高利贷剥削、发展农牧业生产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除了财政上的援助，国府又推进西北农业科研，奖励人民种植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包括1938年于甘肃成立了农业改进所，专门负责改进农村畜牧生产技术的工

作。此外，因为棉花为重要的战略物资，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会同陕西省建设厅成立棉花改进所，大力发展棉户为之基本工作。凡此种种，皆对西北的农业科技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抗战爆发后大批上海技工随军西迁到大后方(1937)
西北工业近代化方面，抗战爆发后，国府确立战时经济体制，采取了一些扶持后方工业的政策和举措。先是支持沿海工厂的内迁，果断地把濒临战区的工厂迁往内地，重新建立后方工业基地，作为战时经济支柱。1938年国府组成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的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实现了史上空前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迁入西北的企业主要分布在陕西的西安、宝鸡、汉中和甘肃的天水、兰州等地。 国府在内迁工业的同时，还对后方的民营工矿企业实行奖励扶持的政策，如1938-1939年，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非常时期矿业奖励暂行条例》、《经济部小型工业贷款暂行办法》、《战时领办煤矿办法》等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方工矿业的发展。 国府又积极发展后方重工业，整个抗日时期，国民政府及所属的资源委员会、工业部、交通部、中央石油公司、各大银行，加上第二、第八、第十战区及各省地方政府，都对西北的厂矿建设进行投资，兴建了一批石油、煤炭、电力、化学、机械、电器、建材等重工业企业。由此，西北作为近代中国重工业基地初具雏形，显然，西北近代工业的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国民政府的支持与投资。
总而言之，尽管西北开发仍受制于地理，资源，及人才等多方面的限制，1930年代，中国开发西北的活动随着战争步伐临近与及西北战略地位转变而不断掀起高潮。整体上，国民政府在面对艰难的条件和战争环境，为西北开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西北开发与建设，在不少方面如交通、水利、农产、工业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对打破日本的经济封锁、支持长期抗战并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钜大作用，并且也基本上改变了西北地区极其落后的面貌。

市政建设

《首都计划》

十年建国初期，在一批市政学家倡导，国民政府主导下，掀起了一场旨在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市政改革"运动。历史上中国的行政序列向来没有市的建制，近代市政建设最早可追溯到清末"新政"所推行的地方自治，但真正开始按照西方现代城市体制建立现代城市市制的，是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的广州由孙科主持颁布实行的《广州市暂行条例》，标志著中国近代史上真正意义的城市改革拉开了序幕。1928年7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正式将城市纳入国家行政序列，奠定了近代中国城市建制。

市政改革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次改革使城市从封建行政体系附庸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政治经济社会实体。至此，中国城市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至少在形式上得以完成，形成了现代城市体系的雏形：首先是重组了中国城市的空间，修了马路，盖了楼房，城市的外在景观开始有了现代气息。其次是建立了新的市制，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从而使中国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元第一次出现在国家行政建制上；使中国城乡合治的传统开始改变，传统城市的功能单一性、政治地位的从属性和与乡村的同一性状态开始改变。第三是城市管理法制化的探索成为"市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初步确立了现代化的城市政府体制以及确保这种体制运转的相关机制，如对政府机构及组成人员的产生、权力和义务、议事和办事规则等方面予以规定，并初步建立起制度保障机制。

不过1930年代中国的"市政改革"及城市现代化进程，却因抗战爆发而中断了。再者，当时中国的城市化比率极低，实现城市现代化变革所需要的完善的社会条件并不具备，城市基本上仍然处在贫穷落后的乡村的包围之

中，整个国家工业化发展仍未足够，大部分城市仍然还只是消费性的。加上中国传统的专制体制和专制观念仍然存在，城市独立和市民自治仍缺少宽松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尽管受到当时历史条件限制，国民政府的市政改革影响仍然深远，对近代中国现代化留下了许多深刻而有益的启示。

推行市政改革同时，国民政府亦着手起草了可谓中国近代最早的城市规划，即"首都计划"。这部规划于1929年底颁布，着眼于城市的百年大计，其后却因战事而搁置，但今时南京内城的基本格局，仍有当时规划排布的沿袭与留存。"首都计划"邀请了美国人亨利墨菲及古力治作顾问，墨菲就是清华园的规划设计者，中方主事的则是林逸民负责的"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有论者指尽管以现代目光来看，"首都计划"的时代局限性十分大，但其有关城市之史地概略、空间布局、道路系统、公园安置诸方面的用心深微还是令人感叹的，可说是一部有情有心的规划。

政治

政治方面，中国1930年代的主权政府为以国民政府为主体的中华民国政府。国民政府前身为孙中山于广州成立之护法政府或军政府等机构，但是因其主权治权未及全部中华民国领土，直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建都南京、统一各省、底定北平、张学良决定率东三省服膺国民政府行动后，才获得如英国、美国、西班牙、德国、法国、日本等大国承认。自此，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才成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1930年代前期，国民政府为委员制。政府的运作主要决策者为中国国民党党内机构遴选出之国民政府委员所组成的国民政府委员会。而除了国民政府委员会之外，国民政府也有许多行政机构取委员制。而这种体制即使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仍继续施行。

依照《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委员定额早期为12至16

人，1930年代之后增为24至36人，而凡其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行政院长、立法院长、监察院长、考试院长、司法院长及其副院长等政务要职均由该委员会推选。

如再就职权细分，1930年代的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元首，与国民委员会共同负责外交与军事及中国国家统治权，内政则由行政院负责。而国民政府从1930年蒋介石内阁开始，于1930年代中间，国民政府共在中国大陆组阁过十数次。另外，中国因为抗日战争，于1938年宣布实施战时政府制度，军事权由国民政府主席转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就总的来看，1930年代的政治中枢之国民政府一直是以蒋介石为主、其他国民党中心干部为辅的党国政府。国民政府与行政院之间之权力分配，常随蒋介石之职位而转移。1932年3月，中国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开会，决议任蒋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负责救国。1930年代间，不论职务是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一直都是中国政府的权力核心。

训政时期

1930年代，是中国由军阀割据局面逐步走向实质统一的阶段，同时间也在日趋严重的外患阴影下重建国家时期，国民政府在政治现代化的努力，有着实质性进展。晚清以来，中国在政治上第一次重新取得了凝聚力。
中国国民党以孙中山遗教治国，将孙中山思想奉为南针。国民政府以孙中山三民主义及建国大纲实行训政和准备宪政。1929年中国国民党开始训政，实行指导式的民主。1931年2月，蒋介石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遭到立法院长胡汉民反对；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引起中国国民党分裂。训政时期约法经国民会议通过，于1931年6月1日正式颁布。
为了使训政时期约法获得更多国民的认可，国民政府于1931年5月5日至17

日召开国民会议。国民会议代表来自各省、各市、蒙古、西藏及华侨社会，主要由下列各机关团体中选出：包括农会；工会；商会及实业团体；教育会；国立大学；教育部立案的大学及自由职业团体；及中国国民党。5月，唐绍仪、陈济棠、汪精卫等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自组国民政府，声言北伐，于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与南京政府召开统一会议，于1932年1月宣布撤销，仍自设西南政务委员会。
另外又确立五权分立制度，1928年10月3日所草的"训政纲要"及"国民政府组织法"，都采行五权制度，此一制度也纳入1931年6月1日所颁行的"训政时期约法"中。训政时期约法第71条规定，中央政府设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五权分立跟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不同处，在于为考试、监察二权的加入。考试院为国家甄选人才，提高公务院素质；监察院监督全国公务和公务人员，以促进政务发展。考试院曾于1931年至1937年间，考选高考及格者589人，普考及格者1,244人，特种考试及格者2,166人；监察院于同期共有纠弹案841件，涉及官员1,443人。

法制建设

十年建国期间，即由1927年至1937年，可说是国民政府法统创立时期，主要标志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和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完成。1932年起，国民政府法制建设日趋成熟，省、市、县参议组织陆续成立，有关参议员选举条例也日渐完备。国民政府的法规可分为宪法，民法，刑法，商法，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也有分成宪法，民法，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六大类，汇编为一起，称为"六法全书"，或"六法大全"，它构成了国民政府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制订了训政纲领，确立了训政时期政治制度。
1931年5月，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是为五五宪草。 抗战胜利后1946年11月国民大会正式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并于次年1947年1月1

日实施。

民法包括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五编，民法典是于1929年5月至1930年12月间草拟分期公布的，主要是参照德国，瑞士，日本等国的民法条款。

商法主要由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和保险法四部分构成的，都是在1929年10月至12月间公布。它是为了适应工商业发展而制订的。

国民政府在暂行新刑律和改定的第二次刑法草案基础上于1928年3月公布了刑法，通称为旧刑法。1935年公布的刑法则通称为新刑法。新刑法侧重于主观主义，强调犯罪性质，强调保全及教育机能，引进保安处分制度。保安处分是新刑法中专门一章，适用于未成年的少年犯及有犯罪及妨碍社会秩序嫌疑的人士。此外还颁布其他刑事特别法，包括1927年的《惩治盗匪暂行条例》，1928年的《暂行反革命沿罪法》，1939年的《共产党问题处理方法》等等。

民事诉讼法在1930年至1931年颁布，1935年修改后重新公布。主要特点是实行不干涉原则，以及特定案件的法院调解原则。

刑事诉讼法于1928年颁布，1935年修改后重新公布。七七事变后，又陆续颁布其他特别法规，例如《修正危害民间紧急治罪法例》、《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办法》和《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等等，刑事诉讼法的主要特点是采用自由心证原则，严格限制自诉权，扩大检察官权限等。

行政法规方面有组织法如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五院组织法和军事参议院组织法等。薪俸，任用，和使用方面法规，有〝文官官等俸表〞、〝公务员任用法〞、〝官吏服务规程〞和〝五院处务规程〞等。

考试法在新六法全书中列为〝宪法及关系法规〞，但依其法规性质仍为行政

法，例如考试法、考试法实施细则、公务人员升等考试法和典试法等。

内政法规方面，则包括内政部各委员会、司、室、处的规则，各省民政厅的规程，市、县的政纲，组织法等。

国民政府的普通法院分为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三级，实行三级三审制，第三审为法律审，实行公开审判制。但对有可能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案件可不公开审判。实行审检合署制，检察机关置于法院内。此外还有特种刑事法庭和兼理军法司法法院，实行陪审及辩护制，但陪审员必须是国民党员。

1949年国府播迁台湾，移植六法全书，延续了中华民国法统。

宪政建设

如前述国民政府是根据孙中山先生制订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步骤去建设国家，训政时期自1929年起定为6年，但1931年即爆发九一八事变，变乱频仍，训政工作不能顺利进行，但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党外人士亟欲参与国事，国民政府仍希望如期结束训政，早日成立民意机构。

宪法草案于1934年2月由立法院草拟完成，于1935年11月由国民党六中全会审查通过，至1936年5月5日正式公布，是为五五宪草。

国府原欲于193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议定宪法，由于局势紧张，国大代表未能如期选举完竣，乃不得不继续实行训政。不过宪政建设工作仍然没有因为抗战爆发而终止。

1938年7月，武汉会战刚开始，国府即已邀请全国各党派重要领袖（包括中

共）和全国各界名流学者，于汉口组织国民参政会，该会是战时最高民意机关，主要从事抗战救国和抗战建国的工作。国民参政会组成人员共二百名，国民党占八十名，各党派领袖占五十名，无党派人士占七十名以上。国民参政会对于在战时准备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9年9月9日至9月18日，国民参政会于重庆召开一届四次会议时，已决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并由议长蒋介石指定参政会若干组成人员，组织宪政期成会。宪政期成会于1939年9月成立的当天，即在它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已决请国民政府早日颁布召开国民大会，公布宪法及宪政实施之明令。

1939年10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议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修改后之宪政期成会宪法草案（又称"昆明草案"），恢复因抗战停顿的国民代表选举工作，并决议于重庆建造"国民大会堂"。后因战事吃紧，暂时无法召开国大，但其它准备工作照常进行。抗战其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参政会，还曾合组宪政实施协进会，协调各党各派各方人士推动宪政的准备工作，召开常委会十一次，直至一九四六年制宪国大准备就绪，方才休会。

威权统治

十年建国期间中国政治，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建立了一个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党国体制。其一特征是建立了效忠领袖的秘密政治组织，从而加强党对政治及社会的控制。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是建国的过渡阶段，是从孙中山军政，训政建国思想而来。不过1930年代威权统治的加强，跟当时国民党派系林立，地方分离主义仍未撤底根除有密切关系。在这前提下，树立新的中央权威，从而达致国家的实质统一就成为蒋介石首要任务。由于党内存在着强大离心势力，建立秘密政治组织就成为蒋介石加强党内纪律达致有

效管治的重要手段。

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后改名为调查统计局，即中统），标志着国民党以秘密组织形式开展统治活动的开始。到1932年，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在南京成立了"中华复兴社"，拟定了"驱逐倭寇，复兴民族，平均地权，完成革命"的纲领和"内求统一，外抗强权，拥护领袖，收复失地"的宗旨，要求组织的"内部团结统一"，"发扬硬干、快干、实干精神"，以"力行哲学"作为思想依据。在复兴社成立前后，还成立了更为核心性质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即广泛流传的"蓝衣社"），和复兴社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后来又合并为"中国革命同志会"。

对于这些秘密政治组织，一直为学者所批判。中共建政后，大陆历史研究，主流看法都是认为这些机构是专门针对屠戮共产党人及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是独裁统治的反动举措。不过有论者指出，这些机构固然坚决"反共"并对中国工农红军予以沉重打击，但事实也有其抑制党内离异力量及反抗日本侵略的作用。例如，1932年9月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队举办的一期"政训研究班"，复兴社刘健群为班主任，90％的结业学员被组成"华北抗日宣传总队"，刘健群任总队长，在华北各地的非国民党嫡系部队中，广泛宣传服从中央，服从蒋介石，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抗日救国"。这种明显的反日活动，引起了日本驻屯军的不安。在后来的华北问题中日谈判中，日本人的一个强烈要求就是停止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由这事例中，可见复兴社在抗日宣传动员，加强党内纪律及抑制腐败倾向，有一定积极作用。

在1930年代威权统治的强化及战争阴影笼罩下，在文化艺术领域，出现了浪漫唯心的文化批判及复兴文化运动，企图籍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公民道德，及主张排斥病态与奢华堕落的清洁检查政策，宣扬对领袖忠诚，国

家至上观念，达致民众的组织化，纪律化，艺术化，军事化，从而振兴民族，抵抗外敌。

对于浪漫唯心的文化批判，同时出现在左翼及右翼的理论家当中。1930年代初期，左翼电影理论界出现了对于上海影评人刘呐鸥、黄嘉谟等人"软性电影"理论"道德颓废"的批判。文学界也同时展开了一场对于政治立场不明的"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的论战。此论战自1931年延续到1933年共维持了一年半，前后包括胡秋原、苏汶、瞿秋白、周杨、冯雪峰、鲁迅、胡风、陈望道等人的参与。有论者认为此论战背后左翼与右翼共同以"法西斯心态"夹攻所谓"自由人"与"第三种人"，而这系列的论辩起因于胡秋原的《阿狗文艺论》一文。胡秋原这篇"阿狗文艺论"发表于1931年《文化评论》的创刊号，明言要批判"民族主义运动宣言"中的法西斯主义。该期社论"真理之檄"亦指明要批判"思想界的武装与法西斯蒂的倾向"。

1933年底三民主义力行社社员在南昌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设计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由此展开了所谓新生活运动，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等，一再教导人们礼义廉耻，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养成整洁的习惯等等。新生活运动所要针对的，是蒋介石于1934年二月在南昌演讲时所指出的"野蛮"与"鬼生活"。 对付"野蛮"与"鬼生活"的方式，就是新生活运动纲领中所谓的"艺术化"生活。蒋介石曾经几次说明此"艺术化"之所指："并非欲全国同胞均效骚人墨客画家乐师之所为"，而是要人民"持躬接物，容人处事，能素仪循礼，整齐清洁，活泼谦和，迅速确实"。所谓"艺术化"即是他说的"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以及合理化"，使全国国民生活做到"整齐简朴，迅速确实"，以便准备好"精神力量"，"万众一心，立志奋发，不辞牺牲，不惜劳苦随时随地都可予敌人以打击"。因此，所谓"艺术化"，其实指以军事之战斗态度整理生活之秩序。1939年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主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

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六义。有论者认为这种强调“规矩”、“清洁”、“组织化”、“纪律化”、“军事化”、“一心一德”的运动中所揭示的简朴、节制、清醒，属于一种“严厉的美学”，与当时欧洲法西斯主义政治美学，有精神上相互呼应的性格。

对“新生活运动”的评论，以“复古”和“法西斯”最为常见，这种组合，多少说明了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运动，其“中西全璧”、“古为今用”的折衷。汉学家Arif Dirlik则从其反动论（counterrevolution）角度分析，不认同“新生活运物”是单纯为了强化统治权威的运动。认为透过介入私人生活领域，“新生活运动”更多地是透过动员来唤召一种积极的国民性，以每一位国民为对象；透过假借儒家传统，建构能够迎合现代民族国家需要的被统治对象（subject of governance）。

新生活运动在1934年2月19日发起，跨越八年抗战，于1949年国府播迁台湾前夕“暂停办理”，但并没有正式宣告结束。196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推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除了是对当时中国大陆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的回应，也被认为是新生活运动的延续。

专才治国

十年建国，政治上另一个特点，是起用了一批非国民党的技术专家进入政府，特别是在外交、经济、教育等方面，专家的作用较为显著。当中最著名的，是1932年11月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4月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主持者是钱昌照、翁文灏，其他委员还包括著名学者胡适、丁文江、杨振声、张其昀、吴鼎昌、张嘉璈、陶孟和、范锐、吴蕴初、刘鸿生、万国鼎、沈宗瀚、王世杰、周鲠生、徐淑希等人。193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主要是由这些人主持的。这个机构和这些学者，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极大贡献。

资源委员会的前身国防设计委员会，于1932年11月成立时，本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会址设于南京。1935年4月易名为资源委员会会后,改隶属于军事委员会。1938年3月改属国民政府经济部。1946年3月改隶于国民政府行政院。蒋介石一度兼任委员长，由正副秘书长（后改称正副主任委员）翁文灏、钱昌照负实际责任，其成员为军政、财经、工商文教各界的知名人士。它的主要任务为执掌资源的调查研究和资源的动员开发，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重工业的主管部门。

1935年初起，资源委员会负责统制全国钨、锑等战略矿产品的出口运销事宜。1936年起，在湖南、江西等地筹建中央钢铁厂、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央电工器材厂、湘潭煤矿、龙溪河水电厂等二十余家重工业厂矿。抗日战争爆发后，负责主持上海等地工矿企业的内迁，并购储大量汽油等战略物资。抗战期间，在四川、甘肃、云南等地创办电厂、煤矿、油矿和机械、化工、冶炼等厂矿共一百一十九个,大量生产后方急需的汽油、电力、机器、煤炭等产品，缓和了后方物资紧缺的危机，同时向美、苏等国输出价值数千万美元的钨、锑、锡等矿产品，换回大量军火和重要物资，并培养了一大批企业管理和技术人才，为抗战作出了极大贡献。

国共关系

国民政府备受内战，及日本侵略困扰。内忧外患导致中共得以继续发展，建立新的根据地。

到了1930年，中共已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及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边区建立苏维埃区。中共发展红军，兵力在10万人以上，党员扩展至12万人，实力与声势非常浩大，武装力量短短数年间增长迅速。1930年3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及各地军阀组成反蒋联盟，5月蒋介石下令讨伐。此

时期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林立。双方在河南、山东及湖南等地开战，以河南战事最为激烈，9月张学良通电拥护中央，派东北军入关，占领平、津地区，阎、冯、李战败下野，部队被收编。双方动员兵力100多万，历时7个多月，伤亡30万人，战祸之烈，为民国以来仅见。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国仍陷于分裂之局：中国共产党盘踞江西一带，与国军作战；中国国民党内部分裂，广州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内战不息，未能集中力量征讨中共军队，内战结果也令部分残余部队转向投靠共军，加上中共土地改革运动宣传策略甚为成功，中共势力日益增长。1931年11月，中共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共召开第一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则出任红军最高总司令，此外又将中共中央总部由上海迁往瑞金。国共关系更形紧张。

国民政府鉴于中共势力日盛，于是在1930年代开始按〝先安内，后攘外〞政策实行一连串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图肃清中共的根据地，但由于战略错误，加上内战及九一八事变爆发诸等因素，前四次均无功而还。1932年1月，蒋介石筹划应付日军红军呼应夹击之对策，决定对外积极准备，对内加紧剿中国共产党。

1933年底国府再调动达80万大军，由蒋介石任总司令，十月发兵，准备全面进攻共产党于江西瑞金的基地，展开第五次剿共行动。1934年4月至7月期间，国、共两军展开决战，先后有会昌，驿前两大阵地战，红军伤亡惨重，军事失利令外围据点尽失。共产党见胜利无望，乃退而采突围策略。

1934年，中国共产党被中国国民党打败，中共红军纷纷从长江南北之根据地突围西走，10月，中共中央红军从江西、福建西走，历尽艰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仅存数千人，加上陕西红军，总数不过一万人。

在国军连串攻击后，红军损失惨重，由最初85,000人之数最后只余下6,000多人，途经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青海等省，历时一载，中共党史号称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0月红军抵达陕西延安，再建立革命基地，由于陕西并非国民政府势力所在，国府惟有按兵不动，国共两党处于对峙形势。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于贵州遵义举行会议，打击了所谓左倾机会主义者王明的领导权，又排斥了张国焘的势力，由毛泽东任军委会主席，集党及军的领导实权，奠定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此时期日本对华威胁与日俱增，人民情绪反日。1935年，中共红军到达贫瘠偏僻之陕北，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国际转变策略，指示各地共党联合民族力量，组织反法西斯联盟，中共也依照指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逐步由〝反蒋〞转变为〝联蒋〞。一时全国上下响应。这时国民政府把东北军调往陕西，中共利用心理战术，挑起东北军思乡情怀和抗日情绪，1936年中共派周恩来游说张学良，双方达成停战协定。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督师，12月7日张学良向蒋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必要，遭严词申饬，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密商〝兵谏〞。12月12日，张学良派兵围攻蒋介石之驻所，枪杀侍卫，逮捕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要求立即抗日，史称〝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中共派周恩来见蒋介石，在各方斡旋下，事件终能和平解决。由此，国共两党暂时放下敌对，一致抗日。

1937年初，国军停止对中共之军事行动，使中共转危为安，国共酝酿合作，逐渐形成全国团结抗日。4月20日，杨虎城在西安举行宴会，庆祝西安

事变和平解决。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向中国国民党提交《共赴国难宣言》，愿意和中国国民党携手抗日，中国国民党表示接受，在宣言内提出下列四项保证：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和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勤，担任前线之职责。

8月，国民政府遂收编陕北红军2万余人为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令赴晋北作战。10月，收江南各地红军为新编第四军，约万余人，以叶挺、项英为正副军长，规定其游击于南京、芜湖间，各军之粮饷、弹械均由中央按编制发给。中共于是取得政治、军事合法地位。

外交

当建国十年后，国民政府外交方针主要有四大目标：
废除不平等条约；
阻止日本的大陆政策；
争取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援助；
建立东亚集体安全保障体系。
1930年代的中国外交成就，在于逐渐废除许多不平等条约，并收回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权的重大权利。主要活动如：
1930年10月1日收回英国占领的威海卫；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将江苏地方政府所辖上海临时法院改为中央所属。
1931年1月15日收回比利时在华租界；4月1日，上海临时法院裁撤并改设上海特区地方法院。改制同时，上海租界中国人民刑事案件须中国与相关国

家官员会审的司法制度完全取消，也就是租界内不涉及西方国家人员的民刑事案件，皆由中国法院审理。

1933年国民政府实行新税则，标志着中国基本实现了关税自主。

中苏关系

在1930年代国际政治舞台上，国民政府与西方英、法、美诸国友善，跟德国也关系良好，而跟日本、苏联疏远。1931年就爆发著名的九一八事变。跟历届北洋政府尽可能取得日本的支持显著不同，国民政府对日本持有极大戒心。

对苏联政策方面，基于苏联一贯支持中共立场，自1927年广州起事后，国民政府很快就与苏联断交。在中东铁路和中国东北地区、蒙古的问题上，国民政府跟苏联发生利益上冲突。

早于1929年，张学良就在国民政府的鼓励下，跟苏联对抗并企图接管中东铁路，是为中东路事件，双方并且于绥芬河发生激战，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国家收回应属自己权益的行为。

1930年10月11日，中国遣代表团前赴莫斯科讨论中东路等问题，但无结果。

1931年以后，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相继建立法西斯政权，均宣称反对共产主义，使苏联同时受到来自东西方之威胁；苏联为避免两面作战，极欲改善与中国之关系，希望中国能团结抗日，长期拖住日本，以减轻它东部所受日本压力。

直到1933年12月，中苏始恢复外交关系，两国关系有所改善。不过由于苏联继续背后支持中共发展势力，而国府又在江西进行剿共，为中苏关系投下极大阴影。

于此同时，自〝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以后，日本加速对中国侵略行为，且提出〝反共〞的口号，苏联亦蒙受日本军事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亦急欲与中国改善关系。故此在中苏复交后不久，中共就提出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苏两国终于在同年8月21日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奠定了苏联援华抗日的基础。苏联提供的第一批飞机和军火等物资在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间陆续运到中国，主要有军用飞机297架、各式火炮290门、坦克82辆、汽车400辆及各类零配件和大量枪支弹药，总值为485574436美元。仅此第一批，苏联提供的飞机、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就超过了德国，其中一些是苏联所能提供的最好装备。

不过由于苏联援华的目的在于让中国拖延日军，减低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因此一直拒绝国府要求苏军参战的请求。待1941年当看清日军无意与德军夹击苏联后，斯大林跟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并于次年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长瓦西里・崔可夫元帅。苏联援华抗日政策告一段落。

中德关系

1930年代抗战爆发前，是中德关系的蜜月期，国府透过两国的合作，使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军备迅速实现现代化，大大提高抵御日本的侵略的能力。中德合作其实早在纳粹执政之前就开始了，当时德国向中国派遣了军事顾问，提供武器装备和建军思路，中国则出售一些原料给德国。在对红军的围剿中，就有德国军事顾问的身影。纳粹上台后，出于国内扩军备战的需要，对原料的需求扩大，而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料产地，尤其是钨，是德国非常需要的战略资源，因此双方的合作就进一步扩大，19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部队如教导总队，包括36、87、88几个师，都是使用德械装备。

不过当时的德国政府，存在亲华与亲日的力量，其中亲华以最初的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和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纽赖特为代表，主张在中日之间取比较中立的态度，而不放弃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和合作。而以里宾特洛甫和戈培尔为首的一派则主张联合日本，抛弃中国。 希特勒最初也曾经犹豫不决，

但反共产国际协定签署后，德日关系日渐接近，党内亲日力量对希特勒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希特勒最终决定支持日本，于1938年重新调整了政府，确立了亲日派在外交领域的主导地位，此后中德关系就日渐下滑。同年德国还召回了驻华军事顾问。不过双方和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1939年，武器易货贸易也一直在进行，甚至德国入侵波兰后，双方仍然进行了少量贸易，但总的来说，此时德国在华的影响已经大大下降。 1941年底中国正式向德、日、意轴心国宣战，标志着这段中德合作的历史彻底终结。

中美关系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日本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公然挑战，但美国正受经济大萧条困扰，对中日争端基本上采取不介入态度。不过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中美之间仍存在某程度上的合作。1933年5月，中美之间签订了一笔价值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协定。1935年5月，中美两国财政部又以备忘录和换文形式达成了一项白银协定。美国还协助中国建立了中央航空学校。从1933年至1937年，美国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飞机供应者，在中国空军史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然而整个1930年代，美国国内笼罩一片孤立主义气氛，民意普遍反对国家干预国际社会上的纠纷及军事冲突。1935年8月31日，美国国会通过中立法案，象征此时期美国外交上采取的孤立主义政策。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9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美国在远东保持中立，禁止将武器或其他用于军事行动的任何装备运往中国或日本。国民政府对应之道是设想通过短暂的抵抗引起英、法等西方国家出面干涉，尽快结束中日冲突。当时，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在英国而不在美国。待九国公约会议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相继失败之后，国民政府积极考虑以争取美国为重心的战时外交方针。

蒋介石的战时外交方针综括为以下几点：（一）对英美应有积极信赖的方

案提出，应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二）对苏俄应与之联络；（三）对德应不即不离。为尽快加强对美外交工作，1938年9月，国民政府派遣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0月1日，外交部致电胡适，列举对美方针，计有四项内容：（一）促成美国修正《中立法》；（二）尽快争取美国财政援华；（三）促请美国对日实行"隔离"政策，限制美日贸易；（四）期待中美英三国在亚洲合作，并以美国牵制英国，防止欧洲战争爆发后英日妥协。这份电报表明国民政府已形成明确的对美政策，以争取美国援助为主。此后，这四个方面就成为中国对美外交的主要任务。

抗战初期国府对美外交重点是争取美国财政上的支持。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中国与美国达成了战争期间的第一笔贷款协议，即桐油借款。按照这一协议，美国进出口银行将向中方公司贷款2500万美元，年息4.5釐，期限5年，中方公司在此期限内向美方公司出售22万吨桐油。这笔贷款的主要作用是购买汽车及改善滇缅路的运输。可以说，这笔贷款标志了战时中美合作之端。

自确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战时外交政策之后，国府一路都积极争取更多美国援助，但事实收获甚微。中国争取美国援助之所以十分艰难，一方面在于美国国内《中立法》的掣肘，另一方面则在于罗斯福政府一直谨慎地在中日间寻求平衡，其援华目标是在维持中国不致全面崩溃的同时，又不想惹怒日本对美国进行报复。

中美合作的转捩点是在1940年秋季，当德意日三国签订了轴心国三国同盟条约之后。一方面，国际形势的演变使得罗斯福政府意识到必须加强中国的力量以牵制日本。1938年底，日军已经攻下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但也以投下百万大军。由于轴心国有会师中亚的计划，中国战场能黏住日军主力，使之无法驰援德、义，对英、法来说，是相当有利的。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利用这一机会向美国施加了压力。蒋介石成功之处不仅在于他很快

从美国得到了一笔巨额援助，更重要的是他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中美关系朝向更紧密方向发展。

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签订深深地打击了中国抗战士气，有见及此，美国于1941年4月17日决定立即向中国提供4500万美元的军用物资，这是租借法案军事援华的开始。自此，美国对中国的援助逐步纳入了租借法案援助计划之内。5月6日，罗斯福正式发表军火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的声明，同时宣称："保卫中国即是保卫美国的关键"。国府随即任命宋子文为代表，负责申请并接收租借法案下给予中国的美援物资事宜。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宋子文与美方交涉军事援华重点为三项：第一，由美国提供训练与技术援助，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空军；第二，训练并装备中国陆军30个师；第三，帮助中国建设滇缅公路和铁路，并提供运输车辆等。7月，罗斯福派拉铁摩尔来华，出任中国政府政治顾问。8月，美国宣布以马格鲁德为驻华武官兼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其主要任务是负责租借物资援华。

1941年12月8日（美国时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等26国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中国被列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

中日关系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府采取不妥协、不作战、不直接交涉之方针，仅请求国际联盟制止日军侵略。九一八事变中，国府的反应备受国内舆论指责为"不抵抗政策"，但事实上国府仍坚持从外交渠道积极努力，透过"特种外交委员会"，于国联力争国际力量对日本侵略行径的谴责和抵抗。但国联只要求中日双方早日撤兵，不使事态扩大，

1931年12月，国联议决派遣调查团到中国，但不干涉军事行动。1932年3月，国际联盟调查团抵华，于同年10月发表调查报书，指出九一八事变是

日本之预谋，满洲国是日本之傀儡政权。
1933年，国联大会接受报告书，不承认满洲国，并要求日本撤兵，日本置若罔闻，索性退出国联。
但自1933年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起，国府对日本政策基本上已转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到华北危机时，国民政府对日本态度日渐强硬。
1934年冬，蒋兼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之前，曾于病榻中口授陈布雷一文，而以徐道邻名义发表，题目是：〝敌乎？友乎？〞。警告日本今日之冥行不顾，有类于狂夫之趋井；同时晓谕国人。
10月，蒋对日反提五条件，表示抗日决心。
11月，派陈诚入山西主持绥远防务；蒋莅临太原，督攻蒙伪。克复百灵庙。
12月，蒋进驻西安；召集各将领在西安会谈，并严督张学良、杨虎城加紧进剿。
1937年6月，近卫文麿出组新内阁。华北驻屯军之演习突然频繁起来，日本见形势对它不利，决定开战。日本一面利用谈判作缓兵之计，一面大举增兵。
1938年底，汪精卫逃离重庆。
1939年底汪精卫与日本签订密约，规定日、满、华〝互助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

边疆民族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即须继承晚清以来列强侵凌中国的负面历史遗产，尤其在边疆地区，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分割离中国版图的严峻挑战。
一方面国民政府尚缺乏实力对边疆地区实行直接统治，另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利用边疆地区的民族分裂分子频频插手边疆事务，以图达到侵占的目的。
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包括内外蒙古，新疆，东北与及西藏等等，背后牵涉苏

联，日本，英国这几个国家。

蒋介石在1934年3月7日南昌演讲时称：-

"边疆问题实到处牵涉外交问题，盖谈东北与内外蒙古，不离对日俄之外交，谈新疆西藏不离对英俄之外交，谈滇桂不离对英法之外交，故中国之边疆各方面皆有问题……各国解决边疆问题之方法，就其侧重之点观察，不外两种：一即刚性的实力之运用，一即柔性的政策之羁縻。如果国家实力充备，有暇顾及边疆，当然可以采用第一种手段，一切皆不成问题。但吾人今当革命时期实力不够，欲解决边疆问题，只能讲究政策，如有适当之政策，边疆问题虽不能彻底解决亦可免其更加恶化，将来易于解决。"

国民政府对应边疆问题主要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政治方面；二是经济、文化、教育方面。

政治方面，国府先以宪法形式规定了各民族一律平等，以此作为其民族政策法理基础。1931年6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其中"第二章第六条、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公布了《蒙藏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成立蒙藏委员会，在中央政策层面，积极推动管理边疆民族事务。蒙藏委员会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加强了中央政府跟边疆地区的关系。其中最明显的是蒙藏委员会在西藏设立了驻藏办事处。

1934年8月，"致祭护国宏化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专使"黄慕松进藏后，留专使行署于拉萨，派驻大员筹建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设置了无线电台和测候所等机构，加强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

1940年2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在西藏期间，与热振活佛洽谈在拉萨设置驻藏办事大员事宜。

1940年4月1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正式成立，设正副处长各1人，秉承蒙藏委员会之意综理藏务。驻藏办的设立使国民政府跟西藏地区

的关系加强了。西藏噶厦至少同意，外交上国民政府可称西藏为中华民国领土。在藏期间，驻藏办做了不少工作，对维护国家主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国民政府为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对边疆地区的行政区划进行了改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在内蒙古地区设立行省，以削弱蒙古各盟旗的自主权利。1928年9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以及青海、西康、宁夏等边疆民族地区正式改设为同内地一样的行省。

此外国民政府又积极拉拢边疆地区上层政要，改善中央与边疆地区的关系，尤其是处理西藏问题方面，尤其落力。国民政府透过尊重西藏宗教传统，对班禅额尔德尼及达赖喇嘛两位西藏政教领袖加以礼遇和册封，除了改善了西藏人民对中央的印象外，更重要是遏制了西藏的分离活动。此外，对于西藏政教领袖的册封，转世灵童的认定，特派专使主持坐床大典，都体现了国家对边疆地区的主权。

除了以上怀柔政策以外，国府又在经济、文化、教育层面，积极改善西藏人民生活条件。试图通过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教事业的发展，培植少数民族的自治能力，从而获得边疆民族对中央的拥护，巩固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1929年6月，中国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蒙藏之决议案》："对于蒙藏各地教育、经济之设施，与交通实业之建设，应由中央政府协助其地方政府，依据本党主义纲领尽力推行。"

1930年4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蒙藏实施教育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一、实施教育行政办法，限令蒙藏各盟旗在1931年6月以前成立教育行政委员会，主管该盟旗教育事宜。二、奖励私人或团体倡办或捐资兴办蒙藏教育者。三、奖励把'党义'或科学的图书翻译成蒙藏文者。四、教育部会同蒙藏委员会在南京设立蒙藏回学生管理会，管理蒙藏回学生之招、送、指导等事项。五、在1931年前，蒙藏各旗必须设小学一

所，6年以内蒙古各盟部及西藏重要各地、新疆回民繁庶之区，必须设职业学校和中学各一所。六、在首都（南京）、康定二处，各设立一国立蒙藏学校，应在年内完成成立。原有之北平蒙藏学校，亦应充实整之。七、教育部限令中央北平两大学务于本年秋成立蒙藏班，国立各大学应酌设蒙藏回文学系或讲座。八、在八年内，分年资送蒙藏学生出洋留学，内蒙十名，外蒙八名，青海二名，西康四名，西藏八名，新疆四名，共计三十六名。〃

1931年11月，国民政府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确定边区建设方针并切实进行案》："一、在人口稀少地方，须以不损害当地人民之利益，充人口开土地为要着，而以其他建设为辅。二、在人口数量较多之地，应以经济建设为主，文化建设为辅。三、在人口繁殖经济发达之地，须侧重文化建设。〃

1932年12月，国民党第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开发西北案》，在国民政府行政院设西北拓殖委员会，其下设国道、劝业、采矿、垦殖四局，主持西北地区的经营开发事宜。

总的来说，国民政府在武力不能直接统治边疆民族地区的情况下，根据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一方面采取怀柔手段，另方面给予一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待，从而加强边疆民族对中央的向心力，对维持中国统一及领土完整起了一定作用。

文化学术

在文化方面，发展与动乱间，造就许多各领域的重要人物，如以文学影响政治界的鲁迅；创造新哲学观的胡适；文化出版业的邹韬奋及陶行知；文学界的张爱玲、沈从文、曹禺；京戏与新艺术的梅兰芳与阮玲玉等。除此，尚有李叔同、顾颉刚、徐悲鸿、梁漱溟、张元济、黄炎培、林徽音、

梁思成、林语堂、冯友兰、齐白石、钱钟书、杨绛、巴金、吴清源、俞平伯、费孝通、陈独秀及傅抱石均对1930年代的文化中国贡献良多。

因为新旧文化杂陈，1935年，中国学者间爆发了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之间的文化论战，并形成了关于中国文化建设路向独特的视点与张力。

由胡适于1929年提出的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概念，于1930年代的中国学界继续发酵，并获得陈序经等多名中国知名学者以‵全盘接受″等言论或撰文来附和胡适的此全盘西化观。不过，此概念也遭到中国许多学者反对。最大反对声浪起端，为1935年；由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中国学者针对全盘西化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十教授宣言》）以及随后的《我们的总答复》开始。之后，两方阵营揭开了相当长时间的‵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的激烈论战。然论战结果，到1930年代末期，两方确实达成了‵中国社会亟需要现代化″的共识。

科学发展方面，由于社会着重物质建设，因此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都有长足发展，受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数学。地质学的研究主要由实业部的地质调查所主持，调查地质、矿藏，研究土壤、地震，皆有成就。生物学的研究主要由中国科学社附设的生物研究所。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等主持，对全国各地动植物的分类、形态、生理遗传、经济用途等，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考古研究方面，十年建国期间成果十分丰硕，1927年发掘河北房山县周口店始石器时代遗址。1929年至1936年发掘河南安阳小屯村殷朝的都城。1930年发掘河北易县练台村战国时燕国的都城。1930年至1931年发掘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黑陶遗址。同时发掘山西万泉县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1934年发掘陕西宝鸡县斗台新石器时代遗址。西北方面，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组西北科学考察团，于1927年至1936年间在新疆各处考

古。江南方面，1930年发掘南京栖霞山六朝墓，1931年发掘广州市大刀山晋墓，1936年于浙江杭州、吴兴、杭县等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教育

正规教育

近代日本及西方列强的崛起，其一原因，就是义务教育的普遍化。清末起有识之士已意识到义务教育的重要性。1912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就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免费上师范就成了当时很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教育制度，仍如北洋政府时期，分为大专、中等（中学、师范、职业学校）、初等（小学）三级，但中国国民党之势力进入各级教育部门，党义被列为教材。

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召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即通过了《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决议厉行国民义务教育。

1935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修正通过《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及《民国24年度中央义务教育经费支配办法大纲》。计划拟于10年期内使全国学龄儿童逐渐由受一二年制义务教育而达于四年制之义务教育。

193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学龄儿童强迫入学暂行办法》，不过国府义务教育计划还未实行，八年抗战就爆发了。由1927年至抗战爆发这十年间，时值内忧外患，不过国民政府的教育建设仍有相当不错的建树。

1929年-1936年，学龄前的儿童就学率从17.1%上升到43.4%，当时的大学生的比例是1：16000；中学生的比例是1：4407；小学生的比例是1：60。

1936年全国共有专科以上的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独立学院36所，专科学校32所。共有272个学院，1095个系，在校生41922人。

李华兴主编的《民国教育史》则指出:"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是民国教育稳步发展、趋于定型的时期。由于社会政局相对稳定，教育投入的逐年增加，教育管理的渐次完善，尤其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勤勉敬业，各级各类教育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国府对教育重视程度，可反映在教师的待遇上，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仅为15元。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府即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但大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衣食无着，教育部长陈立夫便以个人名义借贷建立了贷金制度，凡经济有困难的学生，可直接向学校贷款以维持生活，贷金包括膳食及服装各项费用，并免费提供住宿。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

国府迁都重庆时，由于财政状况极为窘迫，一些政界、教育界人士极力提倡实施战时非常教育或国防教育，主张将一切正规教育中断，高中及大专院校停办，师生员工应召入伍，共赴国难。不过蒋介石却提出了"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观点：
"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这时期，国民政府财政极其困难，但仍然将巨款投向了教育，对大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费，甚至提供食宿，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蒋介石的"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政策，保证了战时教育的持续发展，影响深远。

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忆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同时，抗战客观上为中国的西部教育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使西部诸省在基础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底开始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等地先后成立了22所国立中学及3所国立华侨中学，先后培养教育了10万'战区流亡学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人才就是这些国立中学培养出来的，比如：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著名诗人贺敬之、国防科工委主任上将丁衡高等。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些国立中学于1946年逐步复原，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谱写了一个残酷战争期间中国教育的传奇。"

在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国民政府也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教育部于1938年特地拨经费给国立大学，令其恢复因战争而停办的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并酌情增设新的研究所。1938年到1944年，经济部共获准专利423项，是从民国初年到战前专利总数的182%。

总括而言，十年建国以至抗战期间，尽管面对内忧外患与及财政匮乏的种种困难，国府仍将可观的资源投放入教育建设及科研上。由此培养出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准的知识人材，对近现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少贡献。

职业教育

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职业教育多是由民间社会团体倡导，国家很少介入。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情况则发生根本改变，为了巩固新政权的统治基础，遏制当时失业恶化情况，国民政府运用行政权力，采取多项措施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同时也加强了对社会团体的监督与控制，其中

对劳工教育的重视程度尤为突出。1931年，实业部为谋全国劳工教育之发展，会同教育部拟定劳工教育设计委员会章程，并于1931年5月12日会令公布。1932年2月公布施行《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24条》，该大纲规定："劳工教育分识字训练，公民训练，及职业补习三种，凡农工商各界劳工均应受此种训练，责成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督促当地农工商及其他各业之厂场公司商店等负责完成之"。随后，全国各地一律遵照劳工教育实施大纲，筹设劳工学校。根据调查，1929年，北平市共有市立民众学校38班，学生人数1，533人，1930年增至68班，学生数为1，618人，1931年增至74班，学生人数为1，704人。其他地方情况大体类似，只是数量上存有差异。此外，政府鉴于职业指导的重要性，命各省设立专门职业指导机关。1933年7月教育部颁发《各省市县教育行政机关暨中小学施行升学及职业指导方法大纲》，至此，职业指导实践在官方指导下全面展开。

中国的职业教育秉承着"教育救国"的主旨，最初由社会团体举办，后来转向了以国家倡导为主，社会办学为辅，"使一般劳工阶级，都能受过相当职业教育，获得职业上必须的知识技能"。这种由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与职业指导等三方互动形成的职业教育，适合了当时中国国情。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中断了职业教育的繁荣局面，最终使国民政府为"职业救国"所付出毁于一旦，也使其应对失业问题的努力受到了极大限制。

社会政策

建国十年，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时期。为了解决与工业化发展相伴生的社会问题，发展现代社会福利事业，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法规并以政府的力量推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体现出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事业已在一定程度上步入现代化轨道。在社会上，政府透过社会团体之组织，对各行各业人民加以动员和控制。

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之交，中国面临外忧内患，国家到处弥漫着失业恐慌的阴霾。有见及此，国民政府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采取传统与现代双管齐下的方式治理失业，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成效，反映了国家对其所承

担的社会责任的体认程度。国民政府为更好地发挥控制社会的功能，针对失业问题欲采取层次分明的治理措施，首先设立调查统计机关，查清全国各地的失业人数、失业种类与失业原因，然后通过兴办实业、开设平民工厂、举办职业介绍所、实行失业保险与移民垦殖等办法，筹建社会再就业工程，促成失业人员的重新就业。可惜由于社会立法自身存在局限性与及日本侵华步伐加快，最终未能彻底解决失业问题。

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国民政府主要从两个层面去施行其政策，一是对生活遭遇困难者予以适当救助，维持其最低标准生活。二是从积极方向，进一步协助其恢复工作潜能，参加生产，服务社会。国府曾先后颁布以下各项有关社会救助法规：

1928年6月，各地救济院规则，内政部公布；

1928年6月管理各地方私立慈善机构规则，内政部公布；

1928年，勘地灾歉条例，内政部公布；

1929年6月，监督慈善团体法，国民政府公布；

1930年7月，监督慈善团体法施行细则，内政部公布；

1930年10月，救灾准备金，国民政府公布；

1935年6月，实施救灾准备金暂行办法，国民政府公布；

1935年6月，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组织规程，国民政府公布；

1936年11月，各地方建仓积谷办法大纲，内政部公布；

1936年12月，各省建仓积谷实施方案，行政院公布；

1937年4月，全国建仓积谷查验实施办法，内政部公布；

1938年10月，抗战建国时期难童教养实施方案，行政院核准实施；

1942年8月，修正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办法大纲，行政院公布施行。

国民政府主管社会福利行政之机关为内务部，后改为隶属社会部，后又改为隶属内政部。

1940年 11月16日，行政院为适应社会需要，将原隶属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部，改隶行政院，成为全国最高之社会行政主管机关的社会部。直到 1949年国府播迁台湾，原社会部于是年4月30日裁并，划归内

政部。

新闻及出版

广播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于1928年秋于南京设中央广播电台，作为宣传政令的机关，同时各省市的公民营电台亦迅速增加，全国电台，无论公营民营，均受该会的指导监督。

中央广播电台初隶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1年7月改隶中央执行委员会，其节目有宣传、演讲、教育、新闻、娱乐五类。据1937年6月调查，全国共有电台78 家，总电力为122·8635瓩。以地域分，分布于全国十九省区，江苏及上海地区占半数以上。当时广播仍在初兴阶段，电台电力弱，在78 个电台中，一百瓦特以内28 家，一百至五百瓦特者 38 家，一千瓦特以上者12 家。不过，当时全国各地收音机数目不及百万，仅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0.25，听众是很少的。

报业

1930年代的中国报业，大报企业化经营趋势逐渐明显；内陆及偏远地区的小报也逐渐发达。

当时的中国报业，北方的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南、山东，南方的则集中在江苏、浙江。据1935年的统计，江浙地区的报纸414家，占全国百分之41.4，河北、河南、山东的报纸223家，占全国报纸百分之22.3。大报社都集中在都市，具有悠久历史的，上海有《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天津有《大公报》、《益世报》等等；十年建国期间，新创办的报纸，上海有《晨报》（1932），《立报》（1935），北平有《华北日报》（1929），南京有《民生报》（1927）、《京报》（1928）、《民报》（1929）、《朝报》（1933）、《救国日报》（1933）、天津有《庸报》（1927）、《商报》（1928）等等。

杂志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界、学界各派竞逐，杂志业十分兴盛。
据统计，1936年全国有杂志1,518家，周刊423家，旬刊152家，半月刊184家，月刊591家，双月刊20家，季刊101家，半年刊18家，年刊11家。创于十年建国时代，而影响力较大的杂志以政论性的和文艺性的居多，当中又以左派的刊物为盛。左派刊物中，如创于1928年的《文化批判》（月刊）、《拓荒者》（月刊）、《世界文化》（月刊）；创于1931年的《文学导报》（月刊）、《文艺新闻》（周刊）、《北斗》（月刊）；创于1932年的《文化月报》、《文学》（月刊）；创于1932年的《艺术新闻》、《文化新闻》、《北平》（半月刊）；创于1935年的《大众生活"（周刊）等，都具有影响力。

为了对抗左派的刊物，亲政府人士也办了不少政论性和文艺性的刊物，如陶希圣主编《新生命月刊》（1928年创于上海），叶楚伧主编的《中国文艺月刊》（创于南京）、陈穆和主编的《当代文艺》（1931年创于上海）、张其昀主编的《国风半月刊》（1932年创于南京）、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所办的《文化建设月刊》（1934年创于上海）等。

总括而言，尽管1930年代国府剿共益烈，对广播及新闻出版业的控制也有所加强，但同时期政见不同者在各个媒体仍然针锋相对，尤其在左翼及亲政府人士之间为甚。反映社会仍享有相当言论自由。

体育

1930年代前期由于社会较为安定，中国的体育活动较之前有所发展。这个年代，在足球名将李惠堂的推广及宣传下，足球一度十分风行各地，足球也成为当时中国的国球，当时有"睇（看）戏要睇梅兰芳，睇波（球）要睇

李惠堂”的说法。

而政府也在期间，举行了数届全国运动会，中国国内的综合体育活动，也有了比较好的表现跟发展。

在参与国际体育活动部分，1932年时，由于"满洲国”打算组织国家代表队出赛奥林匹克运动会，引起舆论哗然，政府为了回应民意，正式派遣成员参加比赛，是中国首次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会。1932年中国派出的队员只有一人，为出身东北的中国短跑健将刘长春。

1936年奥运会，中国正式组织大规模的代表队，前往德国柏林比赛，由于当时中国整体体育实力尚不足，并未在运动场上取得名次。不过由亚洲球王李惠堂带领的中华民国代表队，首战英国队，上半场双方打成零比零平手局面，虽然最后以两球落败，但中国队的出色表现已为亚洲第一足球王国的美誉打下了基础。

十年建国期间，国府透过建设组织架构及相关条例措施，大力推动了社会体育的开展。早于1929年4月16日，国民政府就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针对体育而专门制定的法令《国民体育法》。1927年成立了全国体育指导委员会，1932年10月成立了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后改称国民体育委员会)积极推行相关工作。另外又透过投入大量经费建设体育硬件设施，使中国的体育事业由军队和学校逐渐向社会普及，体育逐渐成为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十年中，国人逐渐改变了"军国民体育”所宣扬的"强兵、强种、强国”的观念，转而追求体育运动的真谛，即休闲娱乐、健身、竞技。对于促成这一观念的转变，社会体育起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1930年代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不论国家领袖或爱国人士纷纷把目光投向了体育事业，试图从体育中找寻中国积弱原因及救国之道。

重要文献包括，孙中山的《<精武本纪>序》，朱执信的《精武本纪题词》，蒋介石的《救国救种的唯一要图就在提倡体育》，戴季陶的《由中国历史文化上见到的体育的意义》，邵元冲的《民族精神与国民训育》，吴稚晖的《中华民族恢复强健的起点》，蔡元培的《注重运动的原因》等

等。它们都是在国家危难背景下出现，也贯穿着一样的思想，就是体育救国。

国防建设

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时，国家仍处于实际分裂状态。1930年以后军人之间冲突稍缓，国共之间冲突又增。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密诫张学良避免与日本冲突，张学良训令东北军，对于日军挑衅，须万分容忍，不得还击，致酿事端。外部既要面对日本侵略，内部又要应付共产党的割据政权，国防军事建设，就成为国民政府逼切事务。国府的军事建设目标是"安内攘外"，内求统一，外抗日本。建设的主要内容为确立国防体制，聘用外国军事顾问，实施征兵，军事教育，建立国防工业，发展陆海空军等等。

确立国防领导体制

国府先后于1932年恢复军事委员会及于1935年通过《国防会议条例》设立国防会议。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国防委员会条例》，成立了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是一个实权机构。可以直接秘密指导国民政府的军事及行政各高级机关，并督促其完成。该机构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以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副主席兼任之。国防委员会为抗战时期一元化最高领导机关，它标志着国民政府战时体制的形成,从法制上确保了战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统一，对抗战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

聘任德国军事顾问

国民革命军建军之初，原聘用苏联顾问，自1927年中共发动广州起事后，国府即与苏联断交，转为聘用德国顾问，开展中德十年军事合作。十年间，共有135位德国顾问在华任职。他们积极地参与了中国的国防建设，贡

献钜大。第一个聘任的德国顾问是鲍尔（Max Baur）上校，他于1927年8月向国府提出整理陆军计划书，12月初到上海晋见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说明新式武器发展情况，特别介绍自动步枪和两声的平射炮；并陈述飞机进步的状况，建议中国发展空军。鲍尔另一贡献是成立了德国军事顾问团。开创了顾问团的工作模式，奠定了未来十年的合作基础。

其后德国军事顾问团先后由克里伯（Hermann Kniebel）中校，魏泽尔（Georg Wetzell）将军，德国前国防部长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将军及其助手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担任。他们对中国的军事训练，改革及部队装备、海空军、防空设施等方面都投入了大量工作。德国军事顾问在华是签订私人合同，与德国政府无关。人数多少按照实际需要而定。德式训练的陆军，最初的目标是8万人，后来增加到30万人。在兵工业方面，德国顾问也协助中国制造各种德式武器。国民政府当时的军事目标，除了围剿共产党以外，便是对付日本的侵略。不过随着日，德两国亲近，德国最终于1938年召回所有驻华军事顾问。

实施征兵制及民众军训

1933年国府通过《兵役法》确立了征兵制。1936年9月8日，国民政府颁布征兵令："东邻肆虐，侵我疆土，自非全民奋起，全力抵抗，不足以保卫国家之独立，维护民族之生存。在此非常时期，凡属兵役适龄之男子，均有应征入营服行兵役之义务。"到当年底，共征集5万新兵入营。这是征兵制之始。

1937年6月，蒋介石下令催各地完成国防建设；令设全国防空协会。"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政府曾征集国民兵服役。在征募并行的政策下，在1937年下半年，共约征募了70余万壮丁入营。

此外国府又在民众中推行军事训练，主要进行壮丁训练和学生军训。1936年国府颁布《壮丁训练实施纲要》，重点对壮丁进行军训，以备战时补充

兵员。各县市设立社会军事训练总队，对壮丁及各类人员进行军事训练。到1936年底，已在13个省实施训练壮丁约200万人。 接着在1937年8月又颁布了《战时社会军事训练整备纲要》，1939年3月制定《国民兵组织管理教育实施纲领》，并按此纲领制定《国民兵组织管理实施办法大纲》，对国民兵(即原壮丁队)的组织训练作了新的规定，对壮丁的训练更为加强。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出〝整理军队建立军队〞的任务，指出今后抗战建国必须以〝建军为中心〞，要求各战区轮流从前方抽调部队分三期进行整理、补充和教育训练，以增强战力，把〞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作为抗日战争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之一。

军事教育

陆军教育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为主，此校于1924年建于广州，由第4期起，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为步兵、炮兵、工兵、政治、经理科。
海军训练以福州海军学校为主，其前身为清末的马尾船政学堂，这军校以轮机、航海两科最重要，修业年限均为8年4个月。为普及海军人才起见，1930年规定全国各省市依定额保荐学生应考，在南京覆试后，依据成绩录取。
另外清末的黄埔水师鱼雷学堂，民初时改为海军学校，于1930年6月复校。北洋政府时代的葫芦岛海军学校，于1933年迁往青岛，改称青岛海军学校，也肩负训练军事人才的责任。而新建立的海军学校则有1932年在镇江所设立的电雷学校。

国防工业

国防工业是为国防准备物质基础，是国府准备抗战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

由于经济落后，技术力量薄弱，兵工产业十分落后，几乎谈不上有自成体系的国防工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轻易拿下东北，东北的兵工厂被日本侵占。中国失去东北的工业，使得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倒退。由国民政府兵工署所控制的仅有上海、金陵、汉阳、济南、德州、巩县、华阴等地的兵工厂；四川、广东、广西和山西的兵工厂则由地方当局控制，生产技术都比较落后。为应付日本的侵略，1933年后，军政部对兵工业积极整顿，新出产的武器有仿造的德国1924式步枪、捷克式轻机枪、德国式重机枪、法国勃郎得厂式迫击炮等。另外自造的有7.5公分至15公分的要塞炮钢弹、飞机用的10公斤至1,000公斤重的炸弹，以及毒气弹、燃烧弹、照明弹等。当时著名的兵工厂有金陵兵工厂、巩县兵工厂等。

空军方面的兵工业，除原有的韶关飞机制造厂和上海海军飞机制造厂外，航空委员会曾于1934年10月和美国联邦航空公司合办杭州中央飞机制造厂，1936年10月和意大利合办南昌中央飞机制造厂，1937年2月又和德国合办萍乡中国航空器有限公司。

当时全国有6个飞机修理工厂，设在南京、南昌、洛阳、广州、杭州和重庆。海军方面，以制造舰艇为主，1912年至1927年制造舰艇共15只，共4,138吨；1928年至1937年制造的舰艇共16只，共9,080吨。

海军飞机的制造也有进展，1919年至1927年的9年间共造9架，1928年至1933年的6年间亦制造9架。

发展海空军

空军是二十世纪的新兴的军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就在德国顾问的建议及协助下，积极发展空军。1928年国府于杭州设航空班，1931年改为中央航空学校。1936年又于南昌成立中国航空机械学校。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府提出航空救国的口号，积极发展空军。一二八事变时，中国有陆上飞机七队，水上飞机一队，约有飞机百架。

1936年，国府陆续由美国、意大利购入新机，飞机总数增至855架，计战斗机170架，轰炸机335架，侦察机280架，另广西有飞机70架，分驻南昌、西安、汉口、成都等地。
1937年5月，国府将全国分为6个空军区，先在南昌成立第三军区司令部，后在南京成立第一军区司令部。全国共设9个空军大队，计3个轰炸大队，3个驱逐大队，2个侦察大队，1个攻击大队，共辖26个中队。大队以外还有直属的5个中队及4个运输队，全国共有飞机场262个。
海军发展方面，1919年列强所成立的对华军火禁运条款，到1924年4月废除，这对中国建立海军有很大的帮助。1928年12月1日，国府成立海军署，1929年4月12日扩充为海军部，海军部直辖第一、第二舰队，及鱼雷游击队、测量队、巡防队、练习舰队等。1933年又将原来东北海防舰队及旧渤海舰队残部合编为第三舰队，有舰艇13艘，共14,222吨。另广东原编有第四舰队，后部分舰艇不受中央调遣，受调遣者均被编入第一、二、三舰队。
到抗战爆发后，全国舰艇总兵力合计新旧舰艇66艘，大者3,000吨，小者300吨，连鱼雷快艇12艘，共有59,034吨。这些舰艇除北洋政府时代原有改编者外，部分购自外洋，部分为自造。
不过，当时建军的重点在陆军和空军，海军大体上只是整顿，这由历年海军经费及海军建设专款与陆、海军建设专款的比例中略可探知。1931至1936年，海军每年经常费和临时费实支均在1,000万左右。1937年的军事建设专款，陆军列119,710,000元，空军列70,000,000元，海军只列2,800,000元。

整编陆军

北伐完成后，国内隶属于国民革命军下之武装，多达220万之众，不过部队编制分歧颇大，不成系统，难以统一指挥。另外军费开支庞大，每年已达8万万元，远超过全国总税数5万万元，不但国家无力负担，而且军队亦缺乏

效率。为了达致国家实质统一，必须进行军队国家化。国府乃计划部队的编遣，加强效率，从而充实战力。1928年底德国顾问团鲍尔等，即针对此情形提出"裁军及整军委员会计划书"，建议保留65个师，建立一支完整，战斗力强且属于国家的军队，这份计划书，成为了1929年1月编遣会议之蓝本。1929年的编遣会议，决定全国陆军步兵不超过65个师，骑兵8个旅，炮兵16个团，工兵8个团，合计兵额约80万人，军费额度缩减至全国税收百分之40止，暂定一年经常预备费9,200万元。同时划全国为7个编遣区。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各为一区，东北一区，川、黔、滇为一区，及一个中央区，以处理其他各军。

编遣会议并决定分期实施裁编，在第一、二期的裁编中，将全国军队暂时缩减至160万人，每一编遣区皆编留约20余万人左右。然协议未达成，即惹阎锡山，李宗仁及冯玉祥等军阀不满，触发"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等联合发兵，与蒋介石大战，双方投入兵力超过130万人，死伤超过30万人，战火蔓延到河南、河北、湖南、湖北诸省。军费浩大，占了预算百分之40以上。及至1933年的南昌会议，编遣亦未达成。

1934年12月，第五次围剿后中共被逼退到贵州，蒋介石开始着手60个师整军计划，为抗日工作奠定基础。

1935年1月26日军事委员会召开全国军事整理会议，对60个师整军计划，完成参谋作业。指令武昌行营设立陆军整理处，派陈诚兼任处长，分期整理全国陆军。整军计划约分六期至八期实施，每期约编6至10个师。原计划于1939年前编练全部60个师，并由德国售予40个师现代化的装备，且已谈妥，后来却遭日本破坏打断，60个师整军计划，未完成其半，即告终止。

综计当时全国已整编与未整编部队，计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共计170万人，其他各特种部队在外。

在部队训练方面，1927年4月，德籍顾问鲍尔于"整理中国陆军计划书"中，建议成立"教导队"并使之接受德国的战术观念。军队教导制度，其实是德军训练精良的重要因素，此制之优点在建立训练标准，落实部队训练， 扩

大训练成效。并由教导师负责训练其他整训之部队，通常不担任一般之战备任务。第八十七、八十八师由教导旅与国府警卫旅改编而成，并由两师编余部队成立第三十六师。此时由德国顾问所训练的中央军逐渐增多，战力也因之日益增强。不过由于整个1930年代内战不断，加上日本不断发动武装挑衅，造成中央军相当大损失，致使整军成果打了折扣。总括而言，整军工作虽受经费限制，军阀阻挠与及日本侵华等因素而未能顺利完成，不过还有一定成效，例如第二〇〇师就是最著名的德国式机械化部队。

抗日战争

1930年代中，中国仍深受如中原大战、国共内战、中日战争等战乱影响，其中影响中国至钜的莫过于中日战争。广义战争起始可追溯到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的该场战争，一直到1940年代中期才告终止。

1931年，日本决定用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于是不断挑起事端，作为出兵借口，7月挑起〝万宝山事件〞。万宝山朝鲜移民与当地中国农民因修筑水道发生争执，日本驻长春领事馆派出日本警察前往干涉，日本借此要朝鲜排华并鼓吹增兵满洲。

7月23日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攘外必先安内〞，宣告了解决国共内战优于对抗日本军事入侵的国民政府战略。

5月，日本派遣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伪冒农业专家，潜入洮南侦察军情，被国军拘留，后因逃跑被击毙，8月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指国军虐杀中村，要求调查。

在1931年之前两三年，由于世界经济衰退，西方国家无暇东顾，中国内战不息、党派分裂、东北地区防卫空虚；日本对外贸易剧减、失业人数激增、在南满之经营也陷入不景气，遂予日本可乘之机，企图对外扩张摆脱困境。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进犯沈阳，侵占中国东北三省，蒋在行营闻讯，书立遗嘱，决心抗日，即回南京筹商御侮救国之大计，电令张学

良，严饬守军积极抵抗。

11月，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蒋出席讲演统一为御侮救国之前提，大会决议，团结国内，积极抵抗侵略之方针。事变发生时，东北边防司令官张学良正在北平养病，闻讯后以为此举或是出于日方调动驻军之行动，未必是秉承日本军部或政府之命令，张学良希望用和平手段解决，遂致电留驻沈阳之参谋长，嘱转达部队避免与日军直接冲突，东北军在此命令下便完全处于被攻击地位。

11月，日军以苏联表示无意干预，进兵黑龙江省，该省代理主席马占山率兵抵抗，终因兵力薄弱不敌，省城齐齐哈尔失守。事变两个月内，日军占领中国中国东北主要城市，并未遭受重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1919年正式成立于旅顺之关东军司令部迁至沈阳，关东军总兵力约一万人，满洲国成立后又移至长春，以后不断扩编至数十万人。此战略一直到西安事变后才有其更动，而该事变影响深远，除让脱困的蒋介石掌握更多军事权力外，也间接促成国共合作及让日本军队加速攻击中国的行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反日情绪高涨，各大城市都有群众上街示威游行，抵制日货；日本为转移国际视线，上海日本海军制造事端。

事实上，早在1930年代年初，日本就持续得入侵中国领土，并获得一定战果。1932年1月，日军轻易攻占锦州，东北军退入山海关内。日军侵入淞沪，国军十九路军就地抵抗，"一二八"战事爆发。蒋以辞职在野之身，密电各军积极准备抗日。蒋密令何应钦指挥第十九路军作战，并密令张治中率第八十七与第八十八两师加入淞沪抗战。

1月18日，5名日本僧人与中国工人殴斗，1名日人死亡，日本嗾使浪人闹事，煽动日侨抗议，日本领事要求上海市政府惩凶、道歉、赔偿和取缔抗日团体。

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市闸北区，一二八事变爆发。事变发生后，驻防上海之第十九路军奋起应战，国府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调派第五军精锐部队赴援，国军坚守月余，打得日军一再增援，三易主帅。2月，日军攻陷哈尔滨。后来日本援军从侧翼攻击，国军腹背受敌，被迫撤离上

海，在英美等国调停下，中日双方在5月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日军撤退至事变前地区。但日本于中国北方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日本策划在东三省成立傀儡政权"满洲国"，宣称热河为满洲国领土，长城为满洲国国界。3月满洲国成立，以长春为国都，以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为执政（1934年改称皇帝），但由日人掌握实权。满洲国国防及治安全部由日军控制，铁路、港湾均由日军管理，由日人开发矿产资源、充任满洲国官吏。3月，中国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开会，决议任蒋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先安内，后攘外"之主张不为国人谅解，备受抨击，全中国兴起抗日救国运动。

1933年，日军攻占热河省，进犯长城各口。

2月，蒋一面派兵北上防日，一面加紧剿中国共产党，并密筹对付日本宣战与封锁之准备；3月，承德失守，蒋北上布置；日军入侵，长城战起，蒋进驻保定督战，国军第二十九军第二十五师予敌以重创。蒋制定反攻古北口计划；确定华北作战方略；解除张学良之军职。

4月，蒋赴江西主持剿中国共产党军事，力挽颓势；屡次诰诫高级将领，说明长期抗战方略与决心。

6月，《塘沽协定》签字，蒋指示停战后应注意善后之点；蒋密令购备装甲汽车、坦克车等武器。第二十九军坚守长城，屡挫敌锋，但终于激战后失利，平津地区告急，国府被迫签订《塘沽协定》，划冀东为非武装区，从此华北（当年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门户洞开，暴露于日军虎口之下。

7月，庐山军官团训练开始，蒋亲赴牯岭主持训练事宜。

8月，筹划对日开战时国府迁都西北之准备。日军侵占热河后，又渗透和分化华北。

9月，蒋命令中学以上毕业生实施军事训练；赶筑西北公路；筹备洛阳航空分校；

10月，蒋在南昌召集各将领会议；杭江铁路建筑完成；八省粮食会议开会；规划建筑江防海防各要塞；

11月，蒋命令召集蒙古青年受训；又命令妥筹移民办法；切实整理田赋。
1935年，日本借口中国破坏《塘沽协定》，调兵入关威胁，迫使国府撤退河北省和察哈尔省中央军（指国民政府直辖的军队），又积极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企图借"自治"之名义吞并华北。
1935年底，在日本扶植下，殷汝耕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布脱离中央政府；宋哲元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中央，但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
1936年春，蒋介石调集中央军5个师入山西，准备打击经过长征进入西北之红军，同时也准备对日本侵犯绥远有限度抵抗。
1月，蒋亲自督建东南国防工事，先后视察雨花台、江阴和乌龙山等战略要塞。
3月7日，蒋视察紫金山麓工事；3月15日，蒋又登富贵山视察地下室工程。
10月起，蒋开始预定各院部迁移计划，并预备将瓦斯和汉阳药厂等迁往内地。蒋开始有计划巡视和整顿航空学校；10月12日，蒋到航空学校阅兵，观看飞行表演。
1936年以后国共冲突稍缓，日本全面侵略中国。
1937年7月，庐山暑期训练开始；7月7日，日军侵芦沟桥，战事爆发，蒋介石派兵北上，决心应战，并令宋哲元驻保定指挥。
7月17日，召集各界贤达在庐山开会，蒋发表主张四点，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表明中国立场：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
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陷，蒋发布抗战全军将士书。平津失守后，中国决定在上海另辟战场，以求一挫敌锋，驻上海日军亦积极备战。
8月，蒋决定抗战时期军政各种重要问题，并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不另设大本营。
8月9日，中日士兵发生冲突。日军入侵中国淞沪，"八一三"战起，全面抗战开始。
8月13日日军挑起战火，翌日国府宣布自卫抗战；双方动员海、陆、空军参

战，一再增援，全力以赴，计日投入兵力20余万，国军约50万。
9月，上海战争激烈，蒋赴昆山督战。日军凭借战舰炮火及飞机轰炸取得优势，国军虽伤亡惨重，但前仆后继，斗志顽强，令日军陷入苦战。中国决定〝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大方针。
七七事变后，中国制订持久战、消耗战之战略，惜运用不当；自上海、南京陷于日军之手，国际干涉无望后，中国遂调整部署，宁可放弃一城一地，尽量保持国军战斗力并消耗敌人兵力，又将沿海、沿江之工厂、学校、文化机构等向内地转移，把西南建设成为抗战根据地，准备持久作战。
10月，上海形势危急，蒋赴松江督战；消耗目的已达，下令撤退上海，变移阵地。日本企图速战速决，一举灭亡中国，然后以中国为基地，北犯苏联，南占南洋地区。但中国全面抗战，迫使日本一再增兵，将其陆军主力投入中国战场，泥足深陷，进退维谷。
11月，蒋布置南京保卫战；部署山西、山东作战。当时中国人口4亿5千万，前线作战兵力90万人，海军排水量5万9千吨，战机305架；日本人口包括属地1亿500万，前线作战兵力70万人，海军排水量190万吨，战机2,700架。
11月20日，蒋介石宣布迁都重庆，是为陪都。到了11月，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南北夹攻，日军继续向南京追击；国军全线溃退，上海、松江、苏州等地失陷，约10万人准备死守南京，但激战失利，仓皇撤退，大部分壮烈牺牲。
12月，日本转请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言和，蒋严词拒绝。
12月13日，日军入南京城，在司令官纵容下，将大批民众、妇孺及失去抵抗力之士兵集体枪杀、烧死或活埋。南京失陷，蒋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移节武汉，主持抗战。
血腥屠杀持续到1938年1月上旬，被杀者估计约30余万人，此外被强奸、抢掠者不计其数。
1938年1月1日，蒋辞行政院院长职务，专一于对日抗战之指麾；召集军事

会议。不过，迁往重庆的国民政府仍积极于各地防线与日军对峙。中国地域广阔，日军深入内地，兵力不敷分配，补给运输十分困难。
1938年初，日军在津浦铁路北段大举增兵，企图直下徐州，打通南北战场，于3月下旬一度攻入徐州东北之台儿庄，到4月初突围后撤，在增援后包围徐州。
国军迅即包围日军，歼敌万余人，鼓舞全中国军民抗战士气，却不能扭转整个战场全线败退，国军为保存实力突围而出，徐州遂于5月中旬落入日军之手。
3月29日，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于武昌；大会修改总章，确定总裁制，推举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总裁。
4月，台儿庄会战，国军大捷，歼敌精锐两师团，蒋电勗国军，闻胜勿骄，务须沉着惊戒；宣布抗战建国纲领；筹备三民主义青年团；5月，徐州失陷。
6月，河南花园口黄河堤防决口。
1938年下半年，日军40余万兵分三路攻击武汉，占领广州，封锁华南沿海，企图切断海外援华物资输入。国府也调集100万大军防守，双方在武汉以北及长江沿岸激战。武汉会战历时4个多月，大大消耗日军兵力，但日军侵入长江腹地，也使中国抗战更为艰苦，给中国持久抗战造成新困难。
11月，武汉失守。
12月，汪兆铭响应近卫声明，离开重庆出走至河内，发表艳电，主张中止抗战。蒋返回重庆，严词驳斥汪电。
1939年1月，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会，决议组织国防最高委员会，推蒋任委员长，统一党政军之指挥。3月，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成立，蒋任团长。4月，核定县以下党政基层组织之体制。5月，日本军机开始滥炸重庆，蒋亲临督救难民。武汉会战后，日本已无力发动强大攻势，机械化部队难以发挥效能。国军主力进入山区，凭险固守，利用有利地形，经常诱敌深入，然后予以围剿。

总括而言，国军于抗战初期，虽然代价惨重，但国府把作战线由原本的南北向转为东西向，解除国军主力于抗战初期即被日军围歼于沿海地区的危机。其次是争取了宝贵时间，将东南沿海的战略物质、军工生产设备，迁移到大后方，为持久作战提供良好条件。
中日战争遂进入相持阶段。
尔后四年，在东亚战场，中国差不多独力跟日本周旋，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止。

评价

从积极的方面说，在这段时间内中华民国的工业，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轻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国民政府1933年实施废两改元,以银元代替银两，接着1935年发行法币，与英镑及美元挂钩。这是中国金融史上首次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尝试，统一了国家货币。从此国家能够有效掌握白银等强势货币，保证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财政基本稳定。

在教育方面及文化方面，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当时的出版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42年，政府组织向美国派出三十多人由厂矿工程技术骨干组成，并有专人管理的实习进修队伍。其中大部分学员回国成为当时大型国营厂矿的领导骨干。

农业方面，从1921年到1936年间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0％，平均每年1.76％。1936年是中华民国统治时期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总产量（包括大豆）约为3000亿市斤，这一数字到1951年才被打破。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中国的主要粮食产区大多风调雨顺，这对当时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极低的中国农业而言是至蹼重要的因素。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规定：万国公

制为中华民国权度之标准制，以与标准制有简单的比率而与民间习惯相近者为"市制"。这种单位制，通常称之为"一二三制"，即一升等于一市升，一公斤等于二市斤，一米（即一米）等于三市尺。这种简单而有效的标准将中国民间普遍使用的度量衡制和国际标准统一起来，影响巨大。直至今日，中国大陆仍是公制与市制并行使用的局面。

1951年9月19日美国魏德迈将军在国会说："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大幅进步的建制。"这段时间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基建、文化、教育、社会政策、边疆民族政策、外交、军事等项目上皆有高度成就。

《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价称，1928年至1937年，中国国民党力量巩固，取得成就。政府积极革新刑法，稳定物价、改革货币、建设道路、改善公共卫生、立法禁毒、扩大农工生产。此时期因为国民政府在经济建设取得成就而称为"黄金十年"。

白修德（奥西多·怀特）与贾安娜（安娜丽·贾科比）在1946年出版《中国的惊雷》中认为："在统一的过程中，蒋在南京所创立的新的官僚机构，其人数之多，几乎跟军队不相上下。这以前，中国甚至从没有最原始形成的现代政府。新政府有一个真正的财政部，一个真正铁道部，一个真正实业部。该政府有一些农业研究所以及卫生局，虽然这些机关绝不能和西方的标准相比，但已经是中国从没有见过最好的机关。中央银行建立起来了，这银行给中国带来了一世代以来从未有过稳定通货。新的公路开通了，激励着工商业。新的教科书出版了，新的科学发展了。"

大事纪

1931年

1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帕维尔·米夫支持下，以王明为代表之"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

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告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小布成立，周恩来任书记（未到），项英任代理书记，并在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下，作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销。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进犯沈阳，侵占中国东北三省，蒋在行营闻讯，书立遗嘱，决心抗日，即回南京筹商御侮救国之大计，电令张学良，严饬守军积极抵抗。

9月下旬—以博古（秦邦宪）为负起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

12月22日—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会，粤方人员仅一部参加，胡汉民等在上海坚持要蒋介石下野。蒋为促成党内团结，辞国民政府主席职，离京回乡。

12月底—周恩来从上海抵中央苏区瑞金，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2年

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攻打大城市，"占领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1月26日—日本领事发出最后通牒。

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五次常会决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

1月28日—上海市政府完全接日方要求，但日军仍于该晚向上海守军发动进攻。

3月18日—蒋介石就任委员长，并兼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

9月—山东韩复榘与刘珍年，陕西杨虎城与马青苑，四川刘湘与刘文辉，各起冲突，蒋函电劝解，得以妥善解决。

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为贯彻执行临时中央左倾路线，对毛泽东战略战术批评和指责，排斥毛泽东领导红军，会后中共临时中央把毛泽东调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撤销他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

1933年

1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等从上海抵中央苏区，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工作。

4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主办《斗争》报发表〈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

5月4日—中央局作出《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指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攻击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

5月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批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继续对邓、毛、谢、古〝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5月8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会决定，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增加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挥作战时，由项英代理主席。

9月—第三国际派来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进入中央苏区。

11月—苏维埃政府在瑞金宣布成立，在全国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毛泽东为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临时政府（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12月—李德以统一前后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央决定，〝前方总部〞（即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机关，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之名义和组织，中革军委主席仍为朱德，副主席仍为周恩来、王稼祥，但实际上由博古、李德

直接指挥军队。

1934年

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会议认为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在党内要〝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

5月15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纲要》。

10月——中共中央根据地之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决定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一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突围转移。

10月21日——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共8万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雩都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湘西进军，开始长征。

11月——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军事上逃跑主义，使红军损失巨大，在突破湘江封锁线时，中央红军即损失过半，减至3万余人。

11月7日——蒋介石在绥远会见荣王、德王、潘王等蒙人与党政人员，并对各主席和边外将领指导一切。

12月上旬——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调集40万军队，准备围歼向湘江转移之红军。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黎平召开会议，接受毛泽东提出之放弃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之原定计划，改为向敌人薄弱之川黔边地区进军之意见，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

1935年

1月15日至1月17日——遵义会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之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严重损失，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一系列错误；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

3月11日左右—在遵义县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

4月1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特级上将。

5月12日—在四川省会理县城郊召开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评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军事指挥和反对机动作战之错误，进一步阐明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之作战方针，决定立即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7月—蒋介石在成都计划峨嵋训练团。

8月—蒋介石主持峨嵋训练团，前后毕业两期；日军惧蒋整顿西南，大施威胁，纵令特务机关，到处滋扰。

9月—蒋介石划配四川各军防地，严禁军人干涉行政、财政，打破以往割据分裂之积习；整理四川地方钞币，由中央发行公债收回。

10月，蒋介石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蒋由四川飞陕西，巡视河南、山西，与阎锡山会商安定西北计划。

11月19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蒋介石发表"最后关头"演说。

12月9日—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

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规定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最广泛之民族统一战线，去发动、团结和组织一切抗日力量，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1936年

1月，蒋介石派员赴欧洲接洽经济合作，以利国防建设；宣布国难时期教育宗旨；接见日大使有吉明及其武官矶谷，直接谈商中日交涉。

2月，蒋介石下令从速加强全国铁路与公路建设。

3月，蒋介石下令清剿山西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强绥远防务。

6月，蒋介石创办所得税；筹设农本局；计划铁路与公路联络办法。

7月，中国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开会，蒋介石演讲统一救国之必要，并提组织国防会议案；布置绥远攻势防御。

8月，蒋介石调整云南省军事，改组贵州省政府；蒋抵广州，处理广东省军事政治善后，并劝导广西省服从中央。

9月，日本提出对华五条件，蒋介石回南京商决对策，并电诫各省准备对日交涉破裂；蒋命令督各省编练壮丁。

10月，蒋介石检阅全国童子军；巡视河南、陕西，驻节洛阳，督剿中国工农红军；五十寿辰，全国发动献机祝寿。

1937年

7月7日—日军在芦沟桥附近夜间演习。日军无理要求进宛平城搜查，并攻打宛平城。第二十九军吉星文团（第三十七师第一〇九旅第二一九团）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开始。

7月11日—日本近卫内阁批准增援华北方案，扩大战事。日军独立第1旅奉命连夜集结出发。

7月26日—上午，国军失守廊坊，北仓、杨村等车站相继陷落，平津交通断绝。

7月28日—日军对南苑兵营猛攻，南苑守军指挥失灵，各自为战，伤亡惨重；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牺牲。

7月31日—中国驻屯军旅团占领大灰厂附近地区；此时平津完全沦陷。

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赴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之最高国防会议，同时进行国共谈判。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依据和中国共产党达成之协议，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8月22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洛川举行扩大会议，主要议是：分析全国抗战开始后之新形势，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之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后称华北

军分会），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组成，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
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第一一五师以林彪为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政训处主任，萧华为副主任；第一二〇师以贺龙为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第一二九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并任命朱德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直属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
9月19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电洛甫并周恩来、邓小平，提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取消政治委员，并将各师政治部改称政训处，使部队政治工作受到损失，建议恢复党代表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
9月22日—洛甫、毛泽东覆电，表示完全同意，望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会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之合法地位。
9月下旬—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战委会）在太原成立，动委会是周恩来、彭德怀同阎锡山商谈决定建立，续范亭任主任委员，邓小平、南汉宸、彭雪枫等参加领导工作。

1938年

6月9日—河南花园口决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人为缺堤，以阻止日军沿

铁路南下武汉。

11月13日—湖南长沙文夕大火。长沙警备司令部（即武警、宪兵）因为沟通失误，在日军来犯之前过早烧城，全城尽毁。

1939年

1月21日至1月30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会议决定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溶共"、"防共"、"限共"之反共方针。

8月—因连续暴雨加上日军扒开河堤的因素，天津遭受严重水灾，天津市区百分之八十的地区被洪水所淹，超过10万间房屋被冲毁，八百多万人受灾，六十五万天津及其周边居民成为灾民。

11月1日—中国国民党六中全会制定《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蒋介石随即在全国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

注释

十年建国，其成就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成就最大的是经济，1951年9月19日魏德迈将军在美国国会："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Golden Decade）。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

另外学者陈子明则指出"中国的建制市（包括直辖市、省辖市等）诞生于蒋介石时代。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不仅包括物质的基础设施—现代交通、上下水、电力电话等，而且包括社会的基础设施—市政管理、治安警察、卫生防疫等。黄仁宇所谓'新的高层机构'都是设置在现代城市中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考试与现代文官系统、军政军令军工机构以及教育、科技、文化、新闻、出版机构等。在蒋介石时代，中国内乱频仍，外患不断，但仍然出现了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在十年中

增长一倍，师范教育增长三倍。如果说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学术思想的'黄金时代'，抗战前的十几年可以算是'白银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胡适、鲁迅、陈寅恪等一批大师得以产生和存活。在1936年'双十二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间，受到市民阶层拥戴的蒋介石差一点就实现了统一中国的目标" 见陈子明，《一百二十年和两个六十年：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连续性与曲折性》，《领导者》杂志第十九期

关于国民政府所办公营企业的经营弊端问题，有论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不以赢利为目的，这很难使企业在竞争中求生存。因为不以赢利为目的，就必须靠政府投入。而在政府财力有限，包袱过重的情况下，就只能寄希望于银行贷款；而贷款不能赢利并导致大量的呆账坏账，造成金融危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由于政府的倾斜政策，其发展和增值曾非常迅速。但从1941年以后，由于战争的影响和通货膨胀，原料价格看涨，生产成本增高，而政府对资委会所属工厂产品的限价政策，使其产品售价远远赶不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从而导致入不敷出，资金缺乏，使许多工厂的产量开始下降。资委会曾一再要求追加拨款，但政府却没有按其所要求的金额拨付。其二是国府将企业经营的好坏寄托在"公""诚"上而不是制度上，这既不能遏制腐败也不是长远之计。虽然资委会也引进了一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但只是一些枝节和形式上的变化，本质上的官本位制并无多少变化；尽管资委会成员中不乏忠诚廉洁分子，但毕竟资委会本身还是一个官僚机构，旧的官场习气在所难免。资委会要求每个成员"保证不谋取个人私利"，因没有相应的制度保证是很难做到或很难长久的，学者赵兴胜指出：当时的国营工业"除了遵循市场规律外，还要经常执行政府的特殊政策，在原材料、能源、资金的获得等方面及产品的分配方式上，又不完全遵循市场机制。这种经营上的双轨制常常造成很大的利益落差。在法律不健全、体制不完整的情况下，它为经济腐败行为提供了大量机会。"又认为国民政府的众多官僚"保持着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在缺乏有效的体制约束与自我道德约束的情况下，他们辗转于

公私之间，自觉不自觉地从事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勾当。这种双轨制在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继续得到延续与强化，导致了国民政府的全面腐败，官僚资本恶性发展"似乎也是因此缘故，迄今为止仍有人习惯地将国民政府所办中央和地方公营事业称为"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参见：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骆晓会（编）. 国民政府移植苏联经济模式的试验. [2009-09-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6-06-19）.

黄汉民认为进入1930年代以后，由于受国内政治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等的影响，尤其是1931、1932年日本先后两次在中国工业的主要基地—东北和上海挑起侵略战争，而且又正值世界经济危机，中国工业生产受到很大冲击，但同时却又迫使中国工业在逆境中寻找新的出路。首先，这一时期工业结构因此发生了新的变。发轫于1920年代以前的针织、丝织、染织、印染、毛纺织等工业，在二三十年代有了很大发展，并又相继出现了一批新兴行业，如电器用具工业、电机工业、染料工业、酒精工业、酸碱工业等等。新兴行业的兴起又促进了工业部门结构的调整，进一步推动了相关工业的发展，并使一批手工业作坊在电力工业和电机工业的发展中走上了机制工业的现代化道路。工业产品的品种也大量增多，高中低档产品的结构也在变化，有一批国货产品替代了进口外货。其次，工业地区分布在扩大，棉纺、缫丝、面粉等主要工业的新设工厂基本上都向内地原料产地扩展，新的棉织厂、针织厂以及各种农副产品加工厂等等，几乎各地都有。这些扩散至各地市镇新工厂的开设，又推动了上海等老工业基地向新的高度发展。再次，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有较大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生产设备的更新和升级换代。企业中受过专业教育的专门技术人员(包括管理人员)的比重在上升，劳动者的技能也在提高。企业新产品试制能力，以及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都在不断增强。伴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发展，企业的科学管理方法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企业管理和行业管理的状况正在逐步得到改善。此外，一批企业陆续改制组建为有限公司，有些还组成企业集团和各种形式的群体联合组织，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为生产

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产品市场营销能力的增强创造了新的条件。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上述影响工业生产力发展的诸多因素，都清楚地表明，虽然1930年代前期中国的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但中国工业生产的总趋势却仍在跌宕起伏中继续有所发展，并在1936年达到了近代历史上最好水平。见黄汉民，"1930年代上海和全国工业产值的估计"，中国经济史论坛

其主要内容有，分别成立钨业和锑业管理处，统制钨、锑，同时建设年产钨2000吨的江西吉安钨铁厂及年产锑4000吨的湖南模范炼锑厂。开发年30万吨的湖南湘潭和马鞍山钢铁厂，开采湖北大冶、阳新和四川彭县的铜矿，同时建设炼铜厂，年产铜2400吨。开办湖南常宁水口山和广西贵县铅锌矿及厂，年产铅、锌各5000吨。开发江西高坑、天河、湖南谭家山和河南禹县煤矿，年产共150万吨。建设煤炼油厂和重油提炼厂，同时开发陕西延长、四川巴县、达县石油矿。建设电气工厂、飞机发动机厂、原动力机厂、工具机厂、造船厂及纺织机厂、电工器材厂、水电厂等。根据资源委员会估计，国民政府实施这个创业计划，大约需要经费24000万元，流动资金6000万元。他们原来设想由政府拨少部分款，其余利用外资建设。1936年夏，国民政府从年度预算中先拨了1000万元，作为资源委员会建设重工业的经费。同时资源委员会也与湖南、江西、广东三省商定，从钨业管理处及锑业管理处每年的盈余中移拨一半，由资委会支配，作为建设重工业的经费。1936年，中国与德国签订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德国向中国提供了一亿马克的信用贷款，其中近１０％用于购买重工业设备。资源委员会向德国订购了机械、电子、化工、冶金等设备，其中工业部分为492.11万马克，占50.1％，矿业部分357万马克，占36.4％，电业部分132.8万马克，占13.5％。1937年2月，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制定的《五年建设计划》，则在政策上对于资源委员会的重工业建设计划做了进一步的确认，强调中央政府应立即举办钢铁、机器、电料、电力、制酸、制碱、酒精、炼油等重工业及基本化学工业。1937年国民政府

又拨款2000万元用于重化工业建设。见张燕萍，"论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中国经济史论坛

全汉昇先生在他的"汉冶萍公司史略"中指出，民国成立以来，内乱时发，汉阳鐵厂每每炉毁敷停，萍乡煤矿常因战事停工，大冶鐵矿屡被迫向地方政府捐款。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钢铁价格暴跌，汉冶萍公司走向衰落。1919年汉阳铁厂1、2号高炉停产，1921年北洋政府改变钢轨标准，造成汉阳铁厂近 5 万吨钢轨无销路。至此汉阳铁厂炼钢部分全部停产，并日趋衰落。

1937年抗日战争前，法币的总发行量不超过14亿元。1937年抗战开始至1941年英美参战前，日本为破坏中国后方经济，在日占区强行以日本发行之货币收兑法币，再加上以走私物资套得法币，送往上海兑取国民政府的外汇。国民政府分别从英国及美国得到超过1000万英镑及5000万美元贷款，但仍不足支持法币汇价。至1940年起，取消无限制外汇买卖。于是法币的价值开始下跌。对日抗战期间，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大量发行，到了战后,面额总值已至5569亿元，比战前增加约400倍。1946年后，国民政府为支付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军费，法币的发行量更加大增，面额总值由抗战胜利时的5569亿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兆元，三年间增加超过一千倍，造成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有关日本在抗战期间对后方经济破坏，及中日双方进行的货币战争，可参考杨燕，杨振，"对中国经济破坏--抗战时期鲜为人知的中日伪钞战"，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抗战初期，贯通不久的平汉、粤汉和广九铁路成为抗战初期中国重要的陆上通道。当时中国军队80%的补给靠这条路北运。中国从国外购买的全部轻重武器、弹药、器材由香港进口后，再由这条铁路运往东南战场。从七七事变到广州失陷的15个月中，这条铁路共运送部队200余万人、军用物资70余万吨。行车最密时，全线列车达140列，成为维持中国抗战的主要交通

线。正因为如此，日军飞机对该路进行狂轰滥炸，平均每日达5次之多。浙赣、沪杭甬、京沪、苏嘉和津浦铁路的贯通，对东部地区的国防意义亦十分重大。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之后，京沪杭铁路专开军用列车。淞沪会战3个月，共开列车1346次，运兵50个师、辎重5万吨。该路除了前运军用物资外，还由此线向大后方搬迁工厂、学校的人员和物资达几百列车。广州、武汉失守之后，宁波、温州是惟一与铁路连接的港口，西南的锑、钨、桐油、茶叶等农、矿产品由该两处出口，以换取国外的军用品。从1938年初到1939年3月的15个月中，浙赣铁路计开军列1700列，运送部队150万人。

西北的交通建设，可简介如下：二十年代末，即着手扩展从海州（连云港）直达西北地区的陇海铁路，1937年3月陇海线宝鸡以东至连云港1075公里的铁路线全线通车。另外两条轻便铁道支线也于1939年相继修筑完成，大大便利了战时陕西对外交流。公路建设方面，西兰公路全长753公里，1935年5月1日通车。西汉公路全长447.6公里，亦于1935年12月完工，成为沟通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重要通道。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府为了打破日本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封锁，即抓紧西南的滇缅公路及西北的西兰公路和甘新公路（兰州-迪化），使之成为贯穿西北地区的交通线。甘新公路直接通往苏联，1939年完工，全长1179公里是开发西北的一条重要公路干线。西兰公路则是当时西北地区路况最好的公路。另外国府改造和完善了一系列重要公路干线，包括1936，37年修整华双路华天段；1938年春整修了甘青公路。还有宁平路、宁兰路、宁包路、西汉路等等也都进行了整修。此外又新建了不少公路，当中，新疆自1935年修筑了迪伊线迪哈公路，该路于1937年7月1日完工通车，是一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大批苏联援华物资就是通过这条公路运往中国的。总之，1930年代整个西北地区的公路几乎爆炸性倍增，最终形成了近代西北地区的公路网。

关于1931-1941年陕西水利工程情况，可参考 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建设

概况》（1937年8月）、陕西银行经济研究室《十年来之陕西经济》（1942年8月）、赵敏求《跃进中的西北》，新中国文化出版社(1940)。

可参考 吉泽 诚一郎，"西北建设政策的起步 :南京国民政府与区域经济开发"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十年建国期间，都市化在沿江沿海的省区快速进行。当时都市化最显著的地区是江苏。1919年江苏有10个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7个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16个2．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到1932年，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2．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各增至17个。上海是江苏的最大城市，其人口，1843年20万，1872年25万，1911年100万，1921年150万，1936年350万。与江苏相比，浙江省小城市较多，如1921年浙江有1至2万人口的城市66个，而江苏在1919年，这样的城市只有33个。浙江最大的城市是杭州，其人口，1884年25万，1911年68万，1928年81万。长江中游的城市以湖北的汉口最重要，其人口，1888年18万，1906年52万，1917年70万。由于铁路的修筑，近代以来华北的城市有显著的发展。在山东省，济南的人口，1906年10万，1911年20万，1917年27万；青岛的人口，1910年16万，1927年32万。在直隶省，北京的人口在19世纪后期为50万，1919年增至93万；天津的人口，1903年32万，1910年代增至75万。依据20世纪初年日本的调查，江苏、直隶和四川为中国三个都市化最显著的省区，三省住在一万人以上或重要城市的人口与全省人口的比，江苏为13．6％，直隶为11．2％，四川为9．9％。见"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 免费论文网

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在其著作《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认为蒋介石对中国近代史最大贡献就是重建新的上层建筑。

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制建设，可参见赵金康，"南京国民政府法制理论设计及其运作(1927-1937)"，人民出版社，ISBN：7010057974

另外"自国民党北伐胜利统一全国后的数年间，党内武装对峙不断。由于汪精卫、胡汉民二人分立，总有一人支持蒋介石，从而使蒋一直能以国民党正统自居，稳坐南京中央。但当蒋介石企图将汪、胡二人一起抛开时，立即引起党内粤派势力的大团结，并最终逼蒋一度下野。不可否认，地域观念是构成这次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同-学者所强调的：当一个-体系的全体人民是由地方集团、种族集团或社会各阶级构成，而且又各有特殊的趋向或趋势，这种-亚文化圈的形成往往给-建设带来很多问题。

所谓蓝衣社一说，是有"十三太保"之称的刘健群提出效法意大利褐衫党，将组织定名为蓝衣社，从服装到用具一律使用蓝色。尽管这一提议未被复兴社采纳，但蓝衣社的名称却流传因之开来。见 刘文瑞，"内战和建设——抗战以前的国民党统治状况评述"

左翼学者叶丁易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写了本《明代特务政治》就是借探讨明朝特务政治批评国民党的秘密政治组织。另外大陆出版由丁三所著的"蓝衣社碎片"一书中亦列举了不少这些秘密组织即所谓蓝衣社针对共产党人的暴行事例

有关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争议可参考：曾广维、姜寿彭，蒋介石是不是法西斯主义者

大陆作者丁三引"剿匪战史"指蓝衣社别动队曾在中共进行所谓长征后进入苏区大肆报复屠杀。见丁三，"蓝衣社碎片"，人民文学出版社

有论者则认为"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虽然有独裁之名，却没有独裁之实。因为国民党中派系很多，蒋介石的号令并不被认真执行，军队也有一部分

不听蒋的指挥。蒋介石退居台湾后，才开始了真正的独裁统治。蒋介石先是改编军队，凡是撤退到台湾的军队都要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保证了蒋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其次是改造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排除腐败不纯分子。蒋介石在大陆期间就想整治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但要整治腐败打击面太大，超过了蒋介石的权力范围。到台湾后蒋介石树立起了绝对的权威，这次整党改造效果非常明显，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大有好转，为日后台湾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见林思云，"蒋介石的眼泪"

论者李公明对蓝衣社评价不高，但也认为蓝衣社的纲领中把清洗腐败官僚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 ， 以特务手段来完成这种任务是不必有什么顾虑的，并举康泽的别动队在江西期间比较成功地获得当地老百姓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 就是他们在短期内调查和审判了数以千计的地方官僚的腐败案件和豪强劣绅的劣迹。此外蓝衣社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极端仇恨的意识十分明显 ,日本人的情报机关对此高度重视。见"蓝衣社的改革与反腐败"，博讯

学者邓元忠认为力行社(即所谓蓝衣社)在民国史上的意义可以从三个角度得出结论：（一）从力行社对蒋介石事业发展的关系和意义看，力行社的组成是当时蒋介石统一国家的需要，同时也符合蒋介石"一切策略应在公开与秘密的配合下进行"的策略。随着抗战的开始以及力行社"发展到过于庞大，而失去其以暗配明的作用"，它在1938年被解散是可以理解的；从力行社的角度看，它强调拥护蒋介石，而且事实上建立了蒋介石"在全国人心目中的至高权威和信仰中心"。（二）从力行社与国民党的发展关系上看，在1930年代左右，"国民党的组织松懈，革命精神涣散"，力行社的出现"刺激了国民党原来的组织，使其积极整顿，相互竞争"，故而力行社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完成了有理想，有实力之护党救国的工作"。（三）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看，力行社负责和参与了安内攘外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国民军训运动和新生活运动等1930年代的重要运动，特别使当时青年的国民意识明显增强，对国家处境的认识由怀疑进至谅解。这些都是力行社在民

国史上的成就。见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力行社、复兴社暨所谓"蓝衣社"的演变与成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

可参考黄家谟，"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唐纳，"清算软性电影论"、鲁思，"驳斥江兼霞的《关于影评人》"等文章

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是一群中国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者于一九三〇年六月一日在上海集会所发表的宣言。此宣言发表于《前锋》第一期。此民族主义文艺运动集会是在左联成立不久，右翼文人针对"左翼"所谓"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而发起的，为了要抗议左翼为苏俄侵略东北而辩护。该民族主义运仆之支持者包括王平陵、黄震遐、范争波、叶秋原、傅彦长、李赞华、朱应鹏、邵洵美等。此运动拥有刊物如《前锋周报》、《前锋月刊》、《文艺月刊》。此外，上海《晨报》、杭州《东南日报》与《黄钟文艺月刊》、武汉《武汉日报》与《武汉文艺月刊》亦热烈支持。参见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页61-62。胡秋原的批判是针对右翼的民族主义宣言，但是，左翼文人却认为胡秋原是针对左翼发难，因而引发此一系列的论战

关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大陆学界普遍认为"安内"使外敌嚣张，也是蒋为消灭异己力量的做法。台湾方面则普遍认为安内是手段，攘外是最终目的。2005年在大陆出版，由日人加近亮子著的《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则高度评价了这一政策，指出"安内"指打击共产党及消灭国内包括地方实力派的所有的敌对势力，以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国家统一和建设，"攘外"指反苏、反日"持久战论"。认为其本身就是负面的历史遗产，是中日军队的实力存在绝对差距的前提下一种可以选择的有效的战略，是不得已的选择，并在此期间为谋求国家政治、军事、财政的统一，进行了国内建设包括国防建设，为抗战胜利准备了条件，同时积极开展外交，与英美建立了同盟关系，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动机，国共两党均认为是为了抗日，但近年有论者则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不是逼蒋抗日，因为在西安事变前一个月，蒋介石就已亲自指挥绥远抗战，获得百灵庙大捷，充份表明其抗日决心。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其实源于蒋和张的根本分歧，除了是张学良力图保存东北军的实力，而蒋介石主张统一引起的权力斗争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对共产党的态度。张不是恨蒋"不抗日"，而是恨蒋剿共。因为张学良本身对中共存有好感，认定他们代表了中国希望。见芦笛，"张学良为何发动西安事变？──兼与杨奎松教授商榷" –博讯网。另外亦有学者指出，张学良确曾在1936年6月底通过中共中央联络员刘鼎，向中共中央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6月30日，刘鼎将此一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得到报告后，当即就作出决定，准备派重要领导干部前去帮助张学良，并计划以后适当时机许其入党。7月2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洛甫将此一决定正式通知了共产国际。随后在共产国际的阻挠下，最终没有入党。见谜团一：张学良有没有加入共产党？–人民网

有论者认为国民政府采取的改订新约、收回权益等措施，使南京政府在相当一批国民心目中，首次摘掉了晚清以来"卖国政府"的帽子。因此可以说：自晚清以来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并不是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宣告终结的，而是在南京政府手里就基本解决了。见：刘瑞，"内战和建设──抗战以前的国民党统治状况评述"

有关国府于九一八事变十年后(1941.12月)才向日本正式宣战，历史学家刘继兴通过分析史料，提出以下论点：(一）是恐援华军需物资的海运线被切断。中国的军需物资远远不能自给自足，绝大部分须依靠外国进口。如果中国公开对日绝交宣战，日本就会以交战国的身份通知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和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并切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而中国则没有能力保护大量的外国援华物资由海上输入中国。（二）是担心德国军械装备来华

受阻。中国在近几年的整军备战中通过德国军事顾问团刚刚整训装备起几个德械师，当时在德国还有大量预订的重要军事装备没有到货，如果宣战，日本就会名正言顺地迫使德国取消对华军售，这对中国的持续抗战十分不利。(三) 是无力解决双方的侨民问题。如断交与宣战，中国在日本的侨民将被驱逐或拘捕，而中国目前又无撤侨和护侨的能力，相反日本在华侨民则可迁入英法等国租界继续发挥侵华第五纵队的作用，而中国政府却无法驱逐和干预。见刘继兴，"中国为何开战十年后才向日本宣战？"

有关不抵抗政策历史争议，按张学良在1990年6月和8月两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公开采访，谈及"九一八"事变时曾坦承所谓"不抵抗"命令是他基于对形势判断，亲自下令的。见""九一八"当夜不抵抗政策的责任争议"，三联生活周刊。另外在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也印证了这个说法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共有8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有5位（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崔琦等）生于我国民国时期的二三十年代，接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而自建国以来，新中国培养的学生中只有高行健一人，而且还是文学奖，自然科学奖一个也没有，当代教育是不是应该反思？"，见"民国教育给我们的借鉴"，薛林荣,《教师博览》。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培训出的优秀人才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贡献很大

举失业对策而言，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跟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式有所不同，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中西杂糅式，虽然有对西方现代方式的引进与借鉴，但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的治理方式。这种失业对策与西方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例如当时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已经普遍采用失业保险制度，社会成效颇佳。但中国的失业保险仍仅限于法律层面，离实践层面还有相当长的距离。此外，中国的失业对策主要侧重于事后的补救，其未雨绸缪的防范能力十分有限，因而很难实现"标本兼治"的完美效果。参见《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解决失业问题透视》，中国论文网

训政时期，国民政府出台了一些以审查新闻舆论为目的的法令、法规。1930年12月，国民政府制订《出版法》要求出版刊物申请登记和限制出版品的内容。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公布了《宣传品审查标准》，该《标准》宣称：凡宣传共产主义便是"反动宣传品"。这一《标准》的颁布，预示着注册登记制向审查制的发展倾向。1934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稿本送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审查委员会有权删改稿本。1935年7月15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颁布了《修正出版法》，规定报刊应于首次发行前，填具登记申请书，呈由发行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核准后，始得发行。

有关国军陆军整编详情参考傅应川将军之"国军在抗日战争前的整军与抗战初期的战略指导"，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中国军队整编事实尚未完成。1936年底，陈诚将军曾经评论道："抗日战争越晚爆发对中国就越有利，因我方可以有更多的准备时间……如果目前发动，我方一定是处于被动局面，如再迟一年，最低限度我方可有半主动的机会，如迟两年爆发，则我方可以完全掌握主动局面"。

蒋纬国曾在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解释作战线转向的重要性：因为中国历史上，北朝征服南朝的模式，都是把南朝军力压缩在东南地区，予以致命打击。把作战线由南北向转为东西向，除了避免历史上北朝征服南朝模式，又可利用西面的天然地理屏障，跟敌人作持久战。

中国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曾将这一时期中国工矿企业的大举内迁形象地比喻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据统计，从1937年8月到1940年底，从

沿海等地区内迁到后方的工矿企业共有639家。受其影响，福建、浙江两省自行内迁的企业有191家，拆迁机器设备总重量约12万吨。这些工矿企业的内迁，大幅度增加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资本，也保存了中国抗战的经济力量，还一举奠定了后方工业建设的物质基础，促进了后方工业的发展。从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视角看，抗战初期工矿企业内迁的意义就更是巨大。见"抗战时期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光明日报

有学者认为大陆普遍强调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连续性而忽略"前49"与"后49"连续性，黄仁宇则将蒋、毛、邓所推动的运动"视作中国长期革命之三个段落"。"这三项运动既相联系也相冲突。分拆看来有更换朝代之色彩；接连看去却又完成了中国的长期革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上讲却又有分工合作的功效，也有如接力运动。"见陈子明，"一百二十年和两个六十年：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连续性与曲折性"，《领导者》杂志第十九期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于1920、1930年代民国政府的反思

从1920年代后期至抗日战争前期的大约十年中间，中国在以蒋介石为首的民国政府领导下，政治局面基本稳定下来【相对于1911年后的十年北洋军阀、无政府主义混乱、以及各种复辟和内战时期而言】，因而进入了十年发展的黄金时期。

================

世界范围内、现代科学技术的原因与推动力

事实上，自从十七世纪西方进入了现代科学技术爆炸性发展阶段以来，层出不穷的现代科学技术深刻地改善了整个现代人类的生活与经济发展水平。

在这样的世界舞台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政治局面稳定、昌明、心态开放、公正、正义，那么，就会得到科学技术发展的巨大惠利。这正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时代进步"的真正原因所在。这也正是1920、1930年代，民国政府黄金十年的国家建设历史。在这段期间，中国城市建筑、交通、工业、居民住房、自来水管道、下水管道网络、城市电气化网络、等等，都经历了极大的发展与扩张。现代科技进步，给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益处，也给中国社会进步带来了极大的推动力和促进作用。

【现代科学思想体系的起源，正是来自于基督教改革与回归圣经运动以后的、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许多基督徒思想家，例如，科学方法论哲学家培根、现代物理学之父牛顿、现代化学之父波义耳，乃至英国皇家科学院等等——的开创性贡献与巨大努力。详情请见《现代科学的意义与起源》。】

===============

政治相对统一与稳定状态

虽然在民国政府内部，仍然存在着汪蒋之争等，但是，经过北洋军阀十年混乱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民国政府基本上实现了中国政治局面的统一与稳定。这是抗日战争之前、民国黄金十年的重要背景条件。随后，若不是日本全面侵华而彻底打乱了中国现代化科技经济进步的步伐，若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主义彻底打乱了整个西方世界的

和平稳定与繁荣，若不是日本在整个东亚掀起了巨大的战争波澜、生灵涂炭、残酷杀戮，那么，——二十世纪1930年代至今的中国历史，将会全面改写，将会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景象。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见、并指出，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在中国人的信仰领域【正如本书前文对汪精卫等政治人物的反思之中所说明的那样】，仍然存在着巨大的虚空、空洞、迷惘；在许多人的心中，并没有敬虔真挚的信仰，没有饥渴慕义的心灵，没有追寻真理的盼望。这种普遍性的人心失迷状态与局面，正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常常陷于不义与混乱状态之中的关键内因所在。

【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之中，儒家思想虽然是积极进取的，但却并非是超越性的、对于上天、造物主的信仰，并非是超越于生死的真挚信仰，而仅仅是以此世为根基的世俗道德伦理体系。而佛教道教则是属于泛神主义，以虚空为其主要特征。"无为而无不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详情请见《关于论语的联想》《从金刚经说起》《剖析老子》。】

===============

日本的侵扰

自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国力急剧增强，甚至俨然成为了世界政治

舞台上的现代化强国之一。清末民初时代，中国人称日本为东洋，因为日本人与日本的国家社会似乎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了现代化西方国家文化与文明体系的特征。

但是，日本从西方文明中所学到的，却仅仅是一个科技发达的"外壳"而已。

在清末民初时代的世界舞台上，在过去一百八十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以俄罗斯（以及后来的苏联）与日本这两个国家，对于中国的伤害最大。

俄罗斯（苏联）的历史渊源，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非常不同。它在历史上是处于东正教影响之下，以及中世纪时期的蒙古人长期野蛮统治之下。并且自从彼得大帝以后，东正教被改为国有、成为政府中的一个部门，从而，导致许许多多的俄国人在基督教信仰上有着强烈的虚伪主义特征、徒有其表、不冷不热、形式主义。

而日本相比于俄罗斯而言，则甚至更加野蛮、愚昧、残忍、暴戾、不公、不义。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社会文化体系的这些丑恶特征、恐怖嘴脸，在日本侵华期间，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得淋漓尽致。

日本的侵略，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进步历程，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主义的民主自由政治制度的建设【正是日本的侵略战争，导致了西安事变的中共合法化，更导致了八年抗战中、中共通过消极战斗、

积极发展，从1930年代中的几万人发展到后来的百万人，从而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就与民国政府展开激烈内战，并夺取了国家政权，从而使得中国从此与现代民主自由政治制度擦肩而过，使得亿万中国人民被中共铁拳统治奴役，甚至七十年之久、直至今日】；——而且，更给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生灵涂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

国民党与共产党之争

国民党与共产党之争，即是理念之争，也是政治势力之争。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4%BA%A7%E5%9B%BD%E9%99%85%E4%B8%8E%E4%B8%AD%E5%9B%BD

共产国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曾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共产党

进入中国

1920年4月，俄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受命组建中国共产党，在翻译杨明斋的陪同下来到中国。1920年5月维经斯基在上海成立了"临时的集体中心机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朝鲜和日本三个科，书记处全会选出三人临时执行局，维经斯基任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

维经斯基7月4日到北京，7月5日至7日召开了在华工作的俄共（布）党员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俄国汉学家译学馆俄文教习伊凤阁和鲍立维的介绍，联系到李大钊，又通过李联系上于上海的陈独秀。吴廷康经陈独秀介绍，会见了上海《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和《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等人。

通过一系列的会谈，吴廷康认识到"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他立即"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于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举行，这是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次各革命团体的联合会议。吴廷康"不仅参加会议筹备工作(制订日程和决议)"，而且亲自"参加会议"。这次会议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会议后，吴廷康和陈独秀、李汉俊、李震瀛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李汉俊负责出版部，刊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米宁的《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等小册子。组织部则"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组织部稍后还组织了10个地方工会和行会的代表会议，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吴廷康起草了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为在工会中进行宣传的材料。

维经斯基在上海向陈独秀提出建党建议，得到陈的同意，8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等人在上海陈独秀寓所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后人归纳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因此共产国际的刊物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日期是

1920年8月。

内部准备

1920年7月27日俄共（布）西伯利亚中央局东方民族处在伊尔库茨克成立，组成人员有冈察洛夫（俄共（布）中央全权代表，西伯利亚红军政委）、布尔特曼（东方民族处处长）、加篷（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驻西伯利亚使团副全权代表）。

1920年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注意力开始转向东方，即"支持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这些国家创建共产党和建立广泛的宣传鼓动小组网"。设立了外交人民委员部代表机构(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使团东方局)、俄共西伯利亚地区局和俄共远东局等机构。

9月末俄共（布）远东局书记兼外贝加尔省委主席布龙斯泰因担任东方民族处主席团书记兼报道部主任。设中国科、朝鲜科、蒙藏科、日本科、总务科、宣传出版科、联络科、情报科。中国科负责人为阿布拉姆松、霍赫洛夫金（荷荷诺夫金）。该处领导维经斯基和朴金树对华工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机构改称东方民族部国外科。并列存在的还有俄共中央中国共产主义者中央组织局(设在上乌金斯克)和以M·留金为首的隶属于州党委的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局(划归中东铁路用的地带)。远东共和国政府可以干预东方民族处的工作。

1920年9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在设立于伊尔库茨克的俄共(布)西伯利亚中央局东方民族处基础上,成立"机动的和临时性的机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帮助远东太平洋国家的工人和劳动群众寻找建立阶级组织。1921年1月完成组建，东方民族处和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使团遂被取消。地区科(执行委员会)实际上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即由一位俄罗斯人和一位"当地"书记负责地区科工作，由他们组成领导委员会(没有明确的固定的组织和主席)。

远东书记处主要领导成员有: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鲍里斯·扎哈罗维奇·舒米亚茨基(笔名为扎哈罗夫，兼任俄共（布）远东中央局委员、第五集团军政委、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全权代表）、副代表明斯克尔（设在哈

尔滨的俄共（布）滨海边疆区委全权代表）、责任书记维经斯基和A·鲍得里茨基、情报科长C·И·斯列帕克、中国科俄方书记И·K·马马耶夫、中国科的中方书记先后张太雷、张国焘、共产国际青年工作全权代表C·A·达林、办公室主任布卡特等。派驻上海代表尼科尔斯基（瓦西里、别尔克、涅伊曼、瓦西里耶夫）。

中共成立

1921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来自中国各大城市和日本留学生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13名党员（共有57名党员）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会议移至嘉兴南湖举行，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中央局为领导机构。这也是中共通常认可的成立日期。1921年10月初,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的决定，B·利金作为“在华工作全权代表”被派往中国，取代了尼克尔斯基(瓦西里)，接管了他的一切联系。

共产国际四大

1922年2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之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完成了帮助建党任务而撤销。舒米亚茨基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1921年3月至1922年3月的工作成果报告中说：“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是一个辅助机构，通过这个机构共产国际在远东国家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如在中国成立了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工会组织，为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物色了参加者，“在完成自己的任务之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作为辅助机构已不复存在”。舒米亚茨基在1922年2月奉命到赤塔工作。布卡特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伊尔库茨克联络站(国际联络部)主任。到1922年年中，国际联络部联络站在远东的数量缩减到3个(赤塔—哈尔滨—上海)。1922年夏秋间缩减共产国际编制的行动，使维经斯基、斯列帕克和政治顾问Л·Г·考夫曼这三位不得不负责整个远东的工作。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三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者，中共也从第三国际获取卢布、鸦片（方便在中国南方兑现）等援助及形势指导。

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陈独秀率代表赴莫斯科参加。结束后，1922年12月成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萨法罗夫、拉狄克、拉斯科尔尼科夫先后任东方部主任，维经斯基任副主任。东方部分为近东部、中东部、远东部。远东部部长维经斯基，副部长斯列帕克，中国问题顾问考夫曼。

12月12日，维经斯基提出关于远东部机构的组织、义务的划分、支出的概算等方面的措施。维经斯基指出，应当直接在东方国家开展工作，以便更详细地了解这些国家的现状、政治经济状况的特点和年轻的共产党的组成。

1923年1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局批准了维经斯基的建议，在海参崴成立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局，维经斯基、马林 、片山潜、И·И·法因贝格、考夫曼 (马林和片山潜未到任)被指派参加该局工作。正值远东共和国领导改组：马特维耶夫成为政府主席，阿诺欣和库比亚科负责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布留赫尔负责军事委员会，科肖尔被任命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书记。维经斯基认为，远东部和海参崴局的最重要工作是“使人数不多的中国共产党(300人) 接近工人群众，建立全国一切民主力量的反帝统一战线”。因此，中国共产党“特别需要共产国际的领导，因为它实际上只是从这一年起才开始以真正的政治组织而不是宗派主义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姿态出现在国家政治生活舞台上”。尽管海参崴局成立了情报机构 ，创办了印刷厂等，但远东局还是没有保持生命力，不能够与各国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建立固定的联系。1923年7月，海参崴远东局撤销，它的功能转到了与北满建立联络的正式的代表机构，而中共的影响没有渗透到北满。作为东方部的组成部分的远东部又存在了两年。

远东书记处

1926年3月2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改组共产国际机构的决定,把所属各支部所在国家按地理位置划分为11个地区,每个地区设立一个书记处，由共产国际派一位主管书记和该地区支部的代表组成。同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地区）书记处于莫斯科成立。远东书记处成员有：维经斯

基、别达赫特、谢马温、蔡和森、罗易、片山潜、金成树、杨诺夫斯基、基姆、得洪、卡斯帕罗娃、福京、太洪、袁庆云和多比索夫等。后来，彼得罗夫（拉斯科尔尼科夫）任远东书记处主席（又称主任）。1927年1月18日瓦格纳为远东书记处书记。

1926年4月远东书记处最初的一系列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重要问题：为中国共产党拨款和建立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机构的问题。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6年4月29日决定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就近指导东亚、东南亚工作。由维经斯基(化名为谢尔盖、谢尔金)、拉菲斯负责出版工作、格列尔(教授)负责工会问题、福京(年轻人)负责青年工作，以及中朝日三国共产党代表组成远东局，以维经斯基为主席。还有曼达良(切尔尼亚克)。

1926年6月18日，维经斯基、拉菲斯、格列尔、福京组成远东局苏联代表团，在上海聚集并立即开展工作。远东局吸收了青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工作1年的纳索诺夫。中共派出陈独秀化名老头子为驻远东局常任代表，瞿秋白化名文学家为常任副代表。远东局主席维经斯基参加中共执委会工作。其间，中共许多重大决策是在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执委会的联席会议上讨论和决定的。

1927年3月10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批准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新的人员组成：鲍罗廷(化名银行家）、罗易(化名约翰逊）和中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及日本共产党各一名代表，并拟由当时并未在中国的列普赛任远东局书记。同年3月17日，远东局原成员福京和曼达良离开中国。4月9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解散了远东局。

4月27日至5月9日参加完中共五大后，维经斯基很快被召回莫斯科。6月，为协调政治代表和军事顾问在中国的工作，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增补布留赫尔 (化名加伦、乌拉尔斯基)。6、7月间，罗易和鲍罗廷被召回莫斯科，在他们的继任者牛曼和罗米纳兹 (化名伯纳)到达中国之前，只剩下了布留赫尔。7月8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秘密会议决定 ，成立共产国际执委会常设中国委员会，其组成人员有：布哈林、拉斯科尔尼科夫、

布朗，以及候补委员马吉。

与国民党决裂

1927年8月7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在汉口主持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是为八七会议。1927年11月，罗米纳兹返回苏联。

1927年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立东方书记处，负责人库西宁。1928年3月，东方书记处成立军事委员会，主席别尔津，成员有米夫、布柳赫尔、赫梅廖夫、马马耶夫、苏兆征、向忠发等。1928年春，赤色工会国际派驻太平洋职工书记处书记米特克维奇(亚历山德罗维奇、乔治·哈迪)在中国履行共产国际代表的职责。第二位代表牛曼继续在广州工作。阿布拉莫维奇(化名阿尔诺、阿尔布列赫特)和驻中共中央军事部顾问谢苗诺夫(化名安德烈)在上海。1928年4月米特克维奇返回莫斯科后，由阿布拉莫维奇完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职责，直到1929年初。1928年6月12日，东方书记处决定成立常设中国委员会。

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共产国际在苏联莫斯科操纵秘密召开中共六大。1928年6月中共六大期间，共产国际不再派遣驻华代表，改由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通过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

1928年7月17日-9月1日的共产国际六大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由原来的11个书记处减为8个，其中之一是东方书记处，其领导人是库西宁。受东方书记处委托，10月29日起，米夫着手组建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常设中国委员会，11月12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在不同时期参加该委员会工作的人员有：米夫(负责人)、阿尔诺特、瞿秋白、张国焘(晚些时候黄平)、库丘莫夫、加藤、舒宾、纳索诺夫、阿布克夫、别尔津、格列尔、弗赖耶尔、沃林、马季亚尔、瓦西里耶夫、马祖特 、邓中夏、罗登贤、王若飞、余飞。为了高效地解决组织和技术性问题，从1928年底工作到1929年成立了小中国委员会(库丘莫夫、米夫、瞿秋白、张国焘)和在必要情况下邀请

其他机构人员参加的专门的中国问题会议制度。

远东局

1929年3月在上海成立了新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远东局负责人**И·А·**雷利斯基(化名奥斯藤、保尔)，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共中央代表格哈德·埃斯勒（化名罗伯特）、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兼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书记乔治·哈迪（1930年6月返回莫斯科，由赤色工会国际的另一位代表**c·**斯托雅尔替代)、青年共产国际代表**Г·**别斯帕洛夫（马西）。在恢复党、工会、共青团组织中给中共中央很多帮助。1930年2月到8月雷利斯基在莫斯科，由埃斯勒代理负责远东局，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和肯定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为共产国际领导层充分肯定、信任毛泽东奠定了基础。

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了远东局的新班子：米夫为远东局书记（1930 年10月到1931年4月在中国），成员有**И·А·**雷利斯基(化名奥斯藤，1930年8月至1931年8月在上海）、埃斯勒（罗伯特，1931年1月返回莫斯科）、斯托利亚尔（在中国工作到1931年6月）、别斯帕洛夫(在上海工作到1931年4月)和米林（即盖利斯，苏联红军总部第四局人员，只有一只胳膊，1930年9月任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三人军事小组组长，1931年4月回国）。

1930年，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共驻国际代表团成员己全部回国，又由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白区的白色恐怖，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没有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在国际工作。

1931年1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撤销了李立三和瞿秋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由王明（陈绍禹）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实为主持中央工作，总书记向忠发为傀儡。1931年4月，发生顾顺章事件。

1931年4月下旬，远东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因安全原因陆续撤离上海，米夫和盖利斯、别斯帕洛夫一起离华，1931年6月鲁德尼克（牛兰）及其妻子被捕，接下来远东局的其他成员也相继离开(9名成员中的7位)，代表机构

（远东局）事实上停止了在上海的工作，只有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茨维伊奇留在上海至1932年夏。

1931年，王明提出辞去代理总书记职务，改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要求，经米夫同意后，便于1931年10月18日离开上海，11月7日到达莫斯科，并于11月10日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1933年7月，康生到达莫斯科，王明任命其为代表团副团长。

1931年10月3日与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两次开会讨论东方书记处领导班子，决定由东方书记处三位副主任米夫、马季亚尔、萨法罗夫组成东方书记处领导委员会，集体决定一切重大问题，米夫负责总的领导，萨法罗夫负责中东与非洲黑人国家，马季亚尔负责近东与所有阿拉伯国家。1932年2月，增补弗赖耶尔为东方书记处领导委员会成员。

1932年春，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代表格伯特到上海，工作到1935年5月。

1932年3月4日，东方书记处副主任阿图尔·埃韦特（德国共产党员）为驻华代表、远东局书记，1932年9月到上海。1932年11月远东局在上海恢复工作。

1932年11月第三国际派遣德国人李德由满洲抵达上海，协助营救共产国际特工牛兰夫妇，1933年自愿申请去苏区，1933年10月化装成外国传教士进入苏区，并立即成为中共军事委员会核心之一。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李德被中共本土力量以“严重脱离中国革命现实情况”为由强行剥夺权力，第三国际逐渐失去了对中共直接控制。

1933年4月下旬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美国共产党员，化名弗雷德）到上海。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派遣美国共产党员赖安到中国，帮助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中央局组织工会与反帝工作。

1933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派遣美国共产党员贝克到“到上海从事工会工作”，于1934年5月抵达。

关系中断

1934年3月下旬，曼弗雷德·施特恩被召回，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负责军事工作。1934年8月初埃韦特被召回，远东局成员剩下赖安、赤色职工国际驻华代表贝克、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格伯特。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盛岳）被捕叛变。1934年10月赖安被召回，远东局实际上停止工作。格伯特和威廉于1935年5月和6月相继返回莫斯科，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上海工作站同共产国际电讯恢复的努力无结果。远东局在无形中结束。贝克在1935年2月被召回。

1937年，抗战爆发，王明回国，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是第三国际的嫡系，但王明的靠山米夫后来在苏联被清洗，毛泽东成了国际的新宠。王明在后来的延安整风中遭到批判，在党内失去势力。1940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布结束使命。

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在1926年和1927年两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都被拒绝，但共产国际决议通过承认国民党为准共产党。蒋介石列名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名誉常委，是中国人在共产国际中最高地位。

在1926年2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代表胡汉民请求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

1926年2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的联共（布）代表团核心小组在会议中讨论议决“关于接纳国民党（按照共产国际章程第17条）作为同情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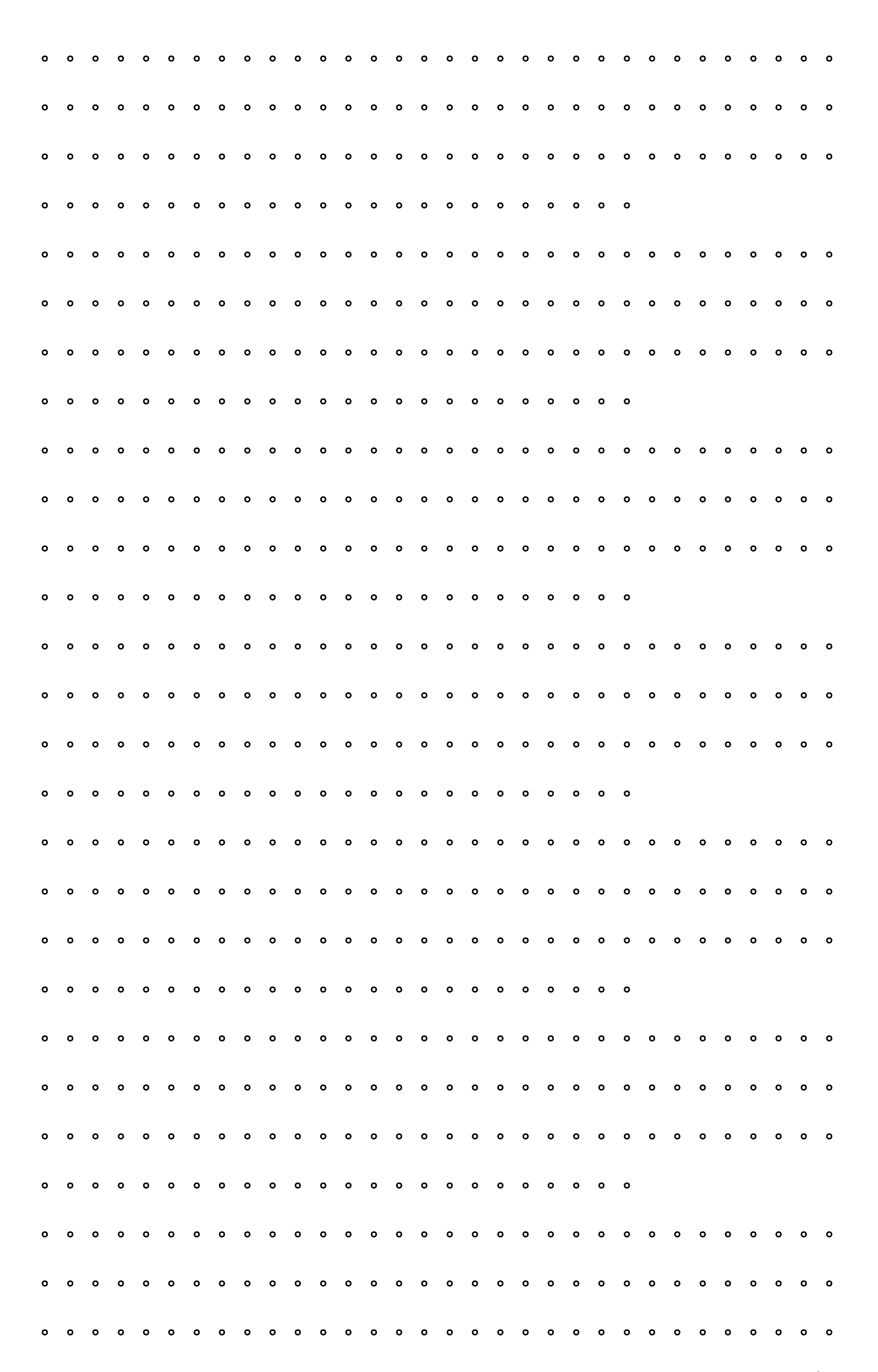
1926年2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对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进行讨论表决。最终会议决定：“鉴于广州国民政府的国际环境和中国革命运动的未来发展前景，认为有必要提前同国民党代表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说服国民党代表不要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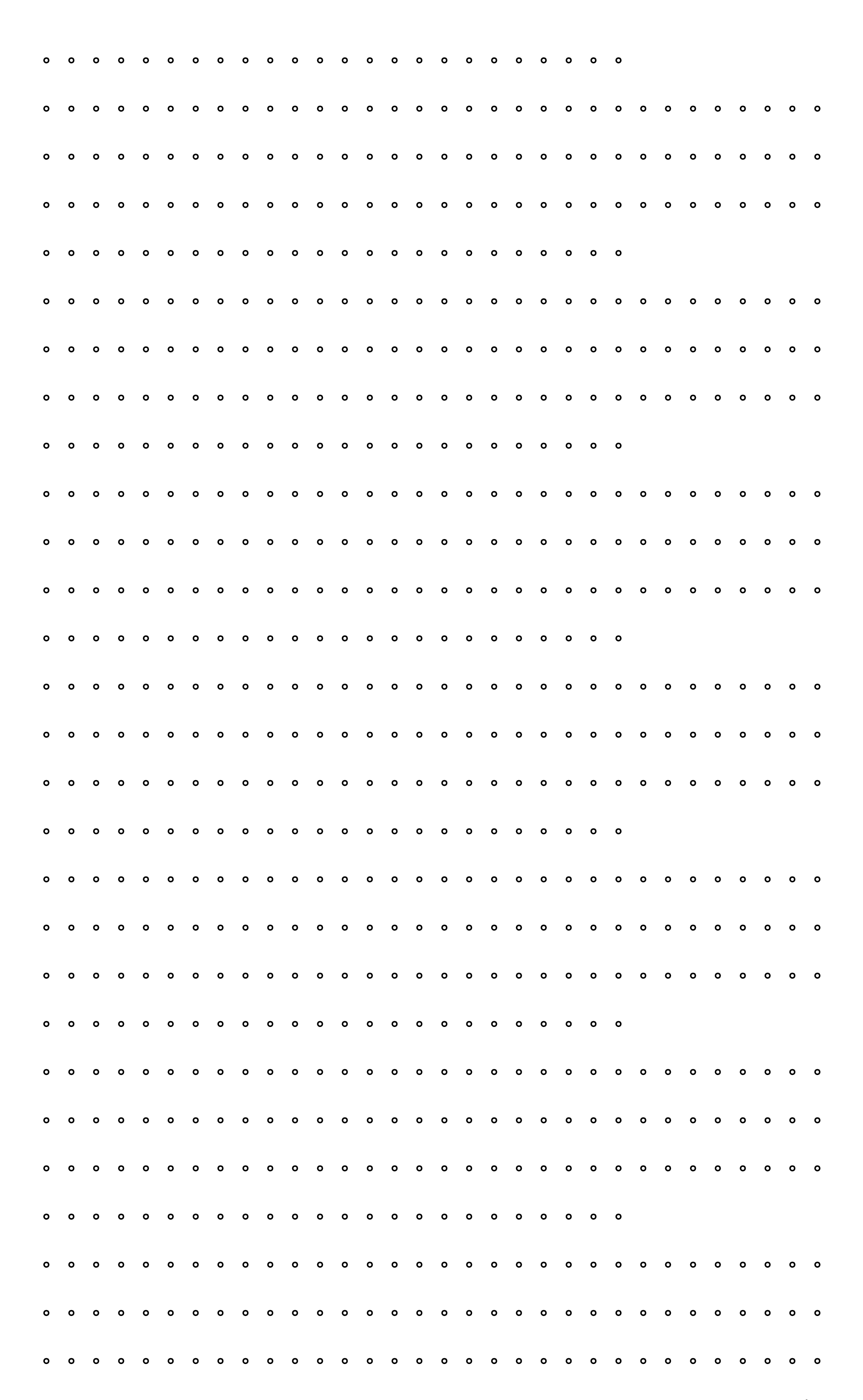
1926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写道：“国民党作为同情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自然不会遇到什么反对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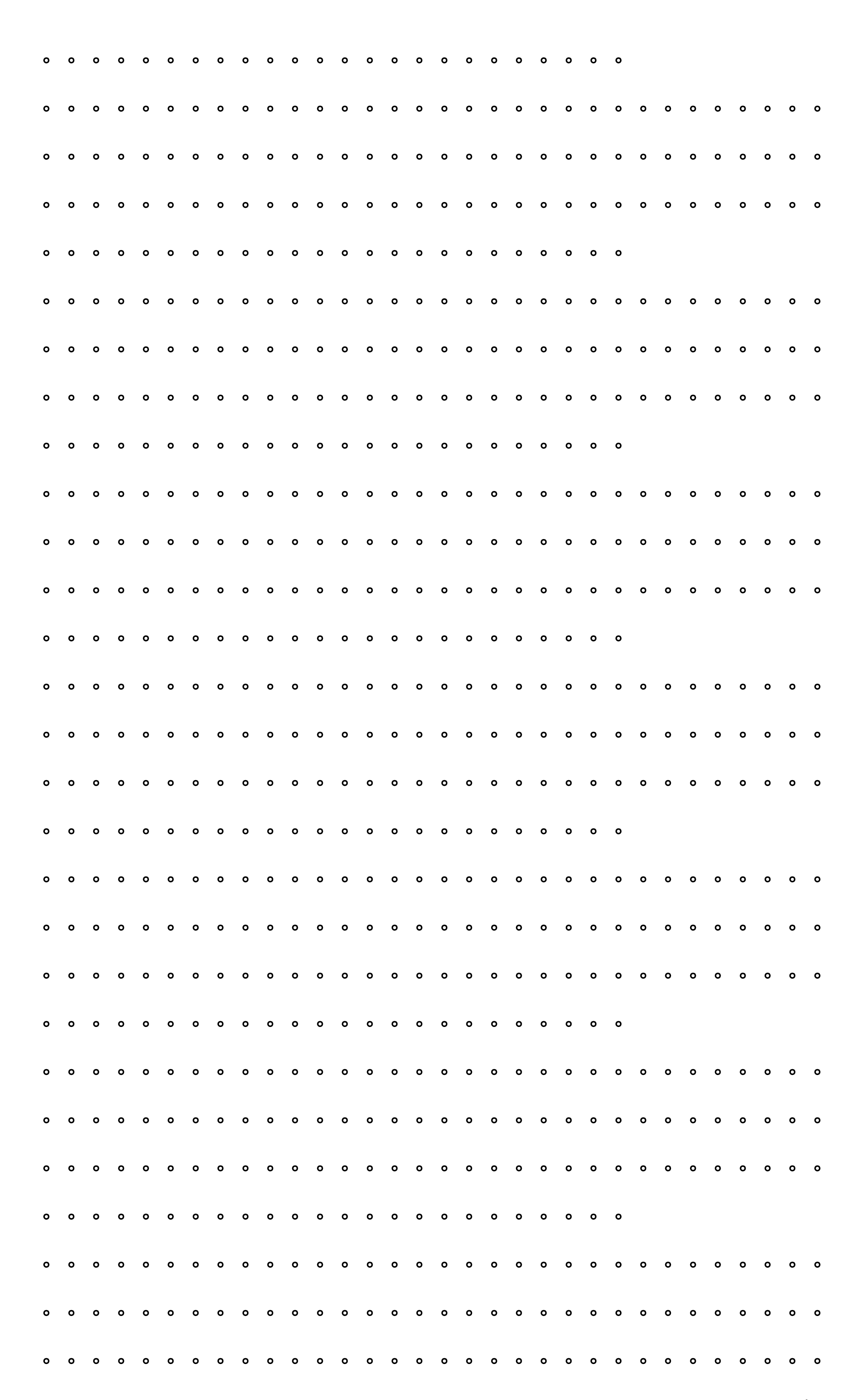
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1926年2月17日－3月15日），决议通过了吸收中国国民党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并选举蒋介石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名誉委员。国民党代表胡汉民也在2月下旬列席了第六次扩大全会。
【1927年以后，国民党与中共决裂】。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后，蒋介石于《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指出苏联解散共产国际是为了切断与各国共产党的正式、附属关系，从而减低苏联的政治责任。但苏联仍对各国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有很大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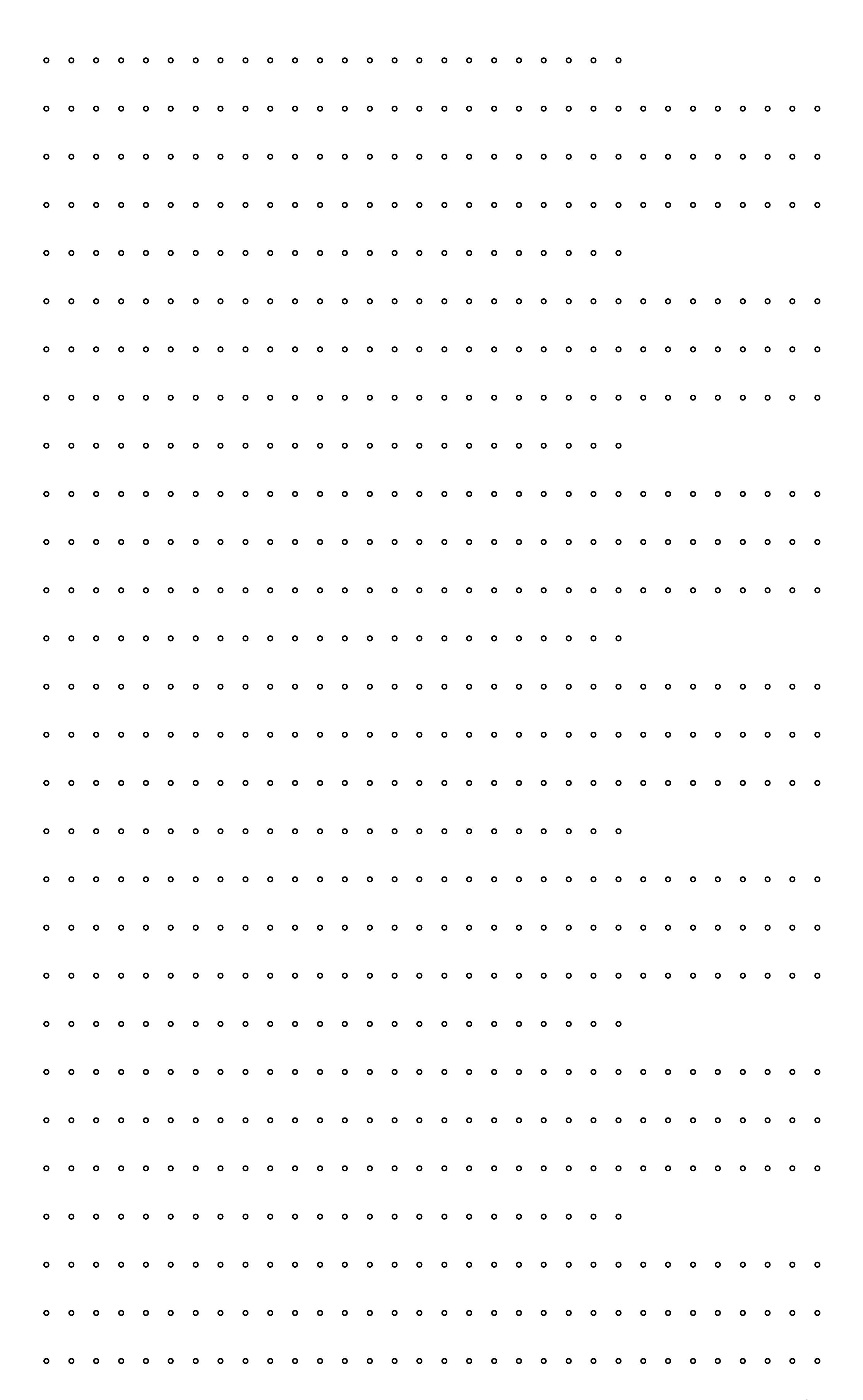
非基督教运动
陶飞亚根据近年俄罗斯解密的历史档案记载指出，共产国际曾在幕后策划和推动非基督教运动。其目的是排除英、美的基督教教会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是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青年国际的直接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也包括国民党等组织成员参与的政治斗争。俄共及共产国际将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及其事业，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因此，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旨在打击西方在华宗教势力，削弱西方影响，唤起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他们通过反对基督教教会实现反帝目标的策略在实践中获得一定成效。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毕竟与东正教在俄国的情况有很多差别，共产国际代表以俄国革命反宗教斗争的经验，来影响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不免有过左的倾向。而这种倾向直到红军长征结束之际才开始被纠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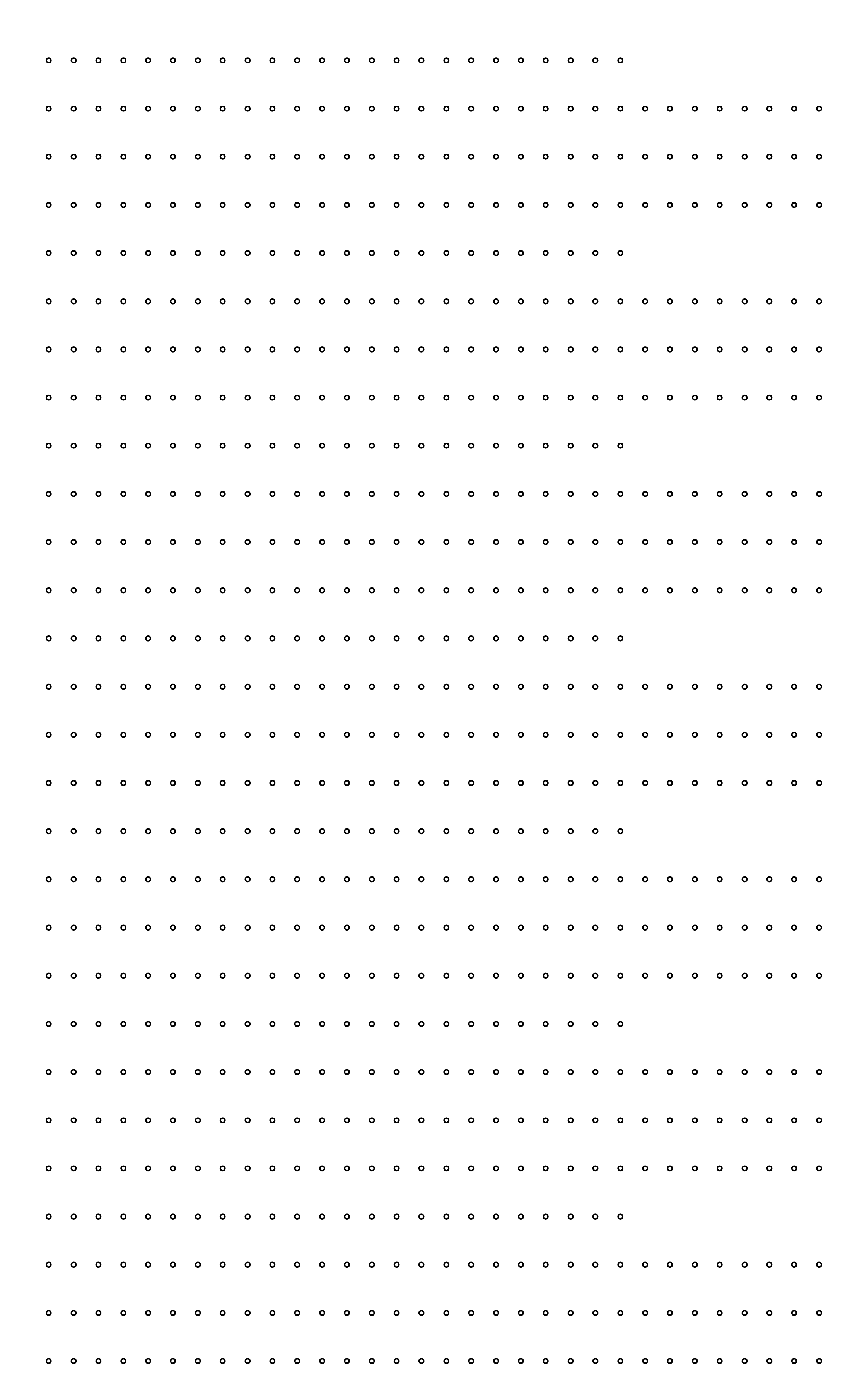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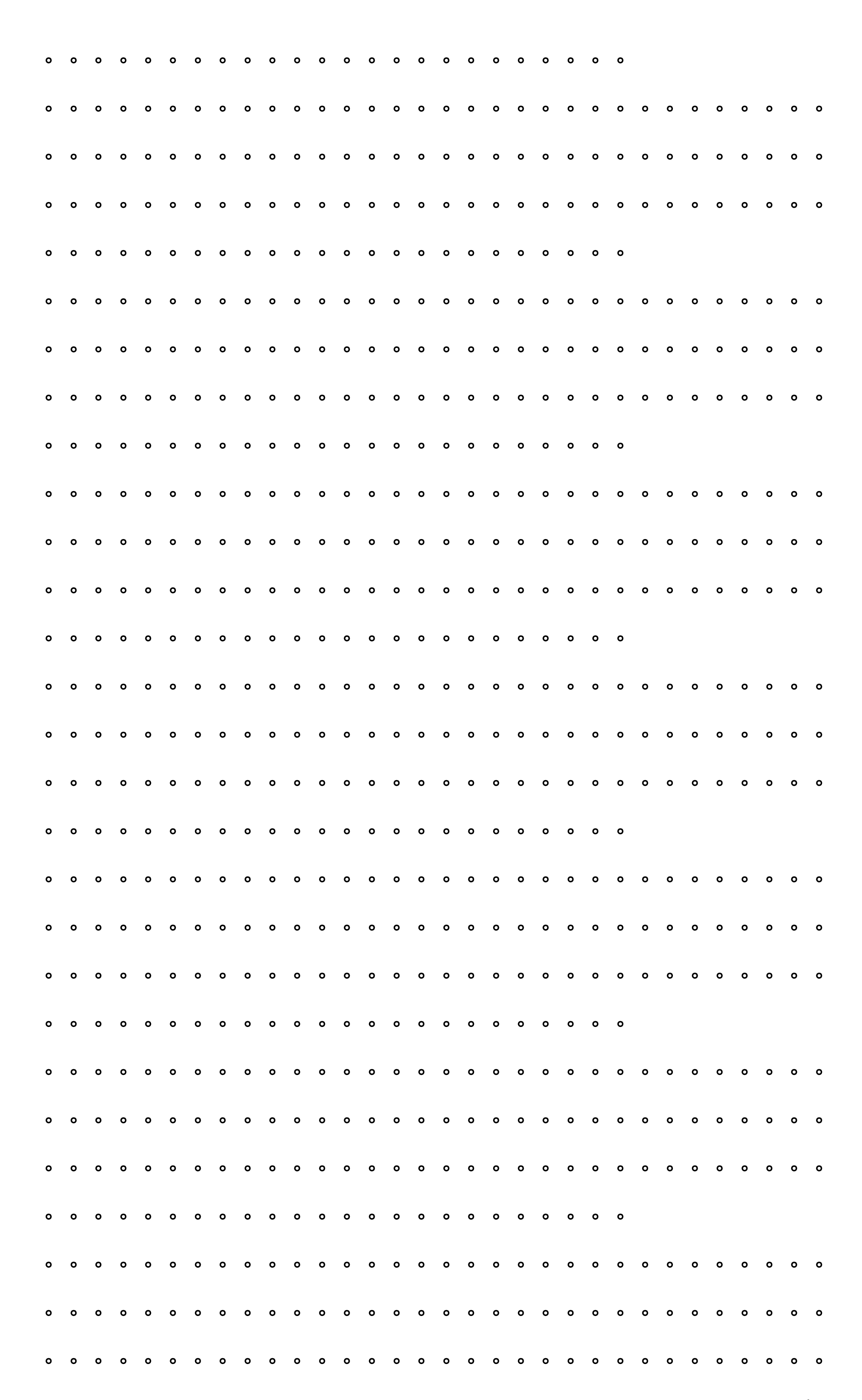












。。。。。。。。。。。。。。。。。。。。。。。。

。。。。。。。。。。。。。。。。。。。。。。。。。。。。。。。。

。。。。。。。。。。。。。。。。。。。。。。。。。。。。。。。。

。。。。。。。。。。。。。。。。。。。。。。。。。。。。。。。。

。。。。。。。。。。。。。。。。。。。。。。。。

【引述 论民主 关于马克思主义】

+++

+++

+++

+++

+++

+++

+++

+++

++

+++

+++

+++

+++

+++

+++

+++

++

让我们继续讨论和阐述，在自由贸易体制系统内，其中重要的两点前提性原则【即，第一，人们必须由衷地有一颗愿意谨守、敬畏、顺服秩序法规法律体系的心灵；第二，人们必须有一颗爱人如己的心灵】都与基督教信仰内容有着深刻的联系。

以圣经为核心基础的基督教信仰，对我们的教导是：——应当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就是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无限全能、公义圣洁、慈爱恩典、无限智慧的、上天、上帝、造物主。并且，我们应当爱人如己。

人与人之间的爱，唯有是建基于我们与上帝之间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爱的根基与源泉，是来自于神。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爱里面，既应当包含着，对于良善、公平、正义、公义的追求和秉持，也应当包含着，对于罪恶的憎恶和离弃。我们的爱的本质，应当是憎恨罪，爱罪人。

哥林多前书13章：
现在我要把更高的道路指示你们。 1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2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

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甚么。3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又舍己身被人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仍然毫无益处。

4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5不作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6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7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8爱是永存不息的。先知的讲道终必过去，方言终必停止，知识终必消失。9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所讲的道也只是一部分；10等那完全的来到，这部分的就要过去了。11我作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想法像孩子，既然长大了，就把孩子的事都丢弃了。12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到那时就完全知道了，好象主完全知道我一样。13现在常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马太福音5章：

43“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4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45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46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作吗？47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甚么特别呢？教外人不也是这样作吗？48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什么是良善？遵从那永生之神、上天、上帝、造物主就是良善。

什么是罪恶？悖逆那永生之神、上天、上帝、造物主就是罪恶。

上帝自己是分别良善与罪恶的根基与基准。分别善恶的终极权柄，唯有是属于神。他是道德律法的终极颁布者，更是道德律法的终极审判者。

人在内心中，若没有在上帝面前的真诚信仰、谦卑顺服，就也不会在他人的面前诚实、信实【宁肯吃亏也不愿说谎；宁肯吃亏也不愿违反规则与承诺】，也不会在秩序、法律、规则、法规面前由衷地顺服、敬畏、谨守。【许多世人在这个世上之所以暂时表面上遵纪守法，仅仅是因为他们害怕受到世上法律的惩罚。如果有法律的空子，或是如果人们意识到，违反法律规则、撒谎、占便宜、玩弄规则等等不会受到立刻的、严重的惩罚，——那么，我们就会看见这世上许许多多人的内心真实光景如何；看见他们以欺谎、虚伪度日；看见他们肆无忌惮地破坏规则、玩弄秩序，毫无真诚敬畏之心。】

人在内心中，若没有在上帝面前的真诚信仰、倚靠、热忱，就也不会真正地爱人如己。在这个世界上，在一切被造的世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没有瑕疵、没有罪污的。在我们的生命与心灵深处，充满着深刻的、本质性的罪性与罪行。我们对于他人的真诚之爱，唯有是建基于我们首先的、对于上帝的爱中。这正如，在一个大家庭中，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都有着许多的缺点）之间的爱，首先是建基于他们对父母的爱。只有在我们心里对于上帝的热忱真挚之爱，才使我们有力量去真诚地饶恕别人、接纳别人。

——————————

在现代的世界，自由贸易是经济的基础与根本支撑。自由贸易的本质是整个人类进行社会化大分工、大生产；在人类社会中间，各样不同的人群各司其职、各专其长、各尽其事，从而每一个人都能够为整个社会做出最大的、最高效的贡献。

在各种不同的、五花八门的劳动生产活动中，都往往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熟能生巧；即，如果我们大批量地专门做同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人类）就能够便于发明出极其快捷甚至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模式，从而使得商品的成本变得极低、价格变得非常便宜。例如，今天的大规模汽车生产线工厂，可以平均不到一秒钟就能够生产组装完成一辆汽车，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正是在此。

在过去五百年来，近现代化工业文明，除了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诞生与爆炸性发展以外，其巨大成功的奥秘就是在于，自由贸易所导致的人类整体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大分工模式。

————————————

但是，上述的人类整体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大分工模式，必须依赖于良好运行的经济秩序与规则体系。否则，从长期而言，所谓自由贸易体系就是不可能的。

现代经济学中所常常忽视、甚至无视的，就是我们在本章前文中所阐述的重要前提性假设。那就是，在整个自由贸易体制系统内，所涉及到的人们、社会、各个国家，必须应当有着谨守和敬畏秩序规则法律法规体系的心灵，以及，必须应当有着爱人如己的心灵【在这些背后，就是公平、正义、公义、顺服、谦卑、敬畏与敬虔的信仰】。否则，所谓自由贸易，不但不会给人类带来福祉，反而会引发巨大的冲突甚至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有着很复杂的原因和许许多多的直接间接因素，但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德国体系与英法体系等等之间因贸易冲突而逐渐激化所导致的深刻结构性矛盾。今天，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随着中国得益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而得到飞跃性发展、但却不愿意遵守许多承诺和世界贸易规则秩序，很可能会愈演愈烈，甚至导致战争。这种冲突，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政治经济背景环境，在某些角度，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____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源自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经济理论与思想，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它在一百年前开始在俄国付诸实践，并直接导致了世上许多的专政暴政，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甚至数以亿计的人类的非正常死亡【因专制统治者人为谬误国家政策而引致的大规模饥荒，以及数以百万计人被关进劳改营、集中营、监

狱、强迫下放劳动、甚至被直接屠杀等等】，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甚至直到今天，在中国、北朝鲜、以及南美等国家地区，这样的思想仍然还很有市场、很有号召力，仍然得到许多人在内心的真诚信从。

那么，社会主义的错误根源在于什么呢？为什么它这样具有迷惑性，以至于在二战以后、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鼎盛时期，曾经席卷了世界上俄罗斯、中国、东欧各国、越南、北朝鲜、柬埔寨、古巴、南美洲【当然，许多东欧等国家往往都是在苏联的武力逼迫之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国家内部、包括曾经的东德内部，都有很多真心拥护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等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呢？甚至，直到今天，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西方高等学校的文科院系中，在西方左派政治势力中，甚至在西方（包括美国）的选举政治中，仍然很有市场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究竟在于什么呢？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着真理吗？为什么？社会主义思想的致命性错误是什么？

———————————

有人说，在马克思主义与希特勒纳粹主义之间，有以下两个共同点。

——————————

第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否认、或远离对于上天、上帝、造物主的信仰；它们都推崇人自身的伟大性、光辉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劳动人民是最伟

大、最光荣、最正确、最光辉的。在纳粹主义中，日耳曼人民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最光辉的。然而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上，由于它们所推崇的劳动人民或是日耳曼人民需要一个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代表、反映者，于是，它们就必然推举出一位伟人，来真实地体现它们的推崇对象。因而，它们的思想体系和政治实践都聚焦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以及不可避免的专制暴政。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和政治实践中，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卡斯特罗、金日成等领袖独裁人物。在纳粹主义思想体系和政治实践中，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希特勒这样的领袖独裁人物。

它们所诞生的文化土壤，都与其文化思想氛围中的无神主义影响有着深刻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德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纳粹主义思想的兴起，是德国十九世纪无神主义哲学兴起的直接结果。在十九世纪，当年在德国最优秀的大学中，盛行着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种族优越论思想、无神主义思想；以至于著名哲学家尼采在著作中写道："上帝死了"。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德国主流哲学界，盛行着自然神主义、泛神主义思想【即，否定上帝的位格性，否定上帝是能听、能看、能言的，否定上帝的自由意志，或是把上帝与世界本身看为同等，或是把上帝看作是无知无觉、没有意志的一种超自然之理、意识流、规律、因果逻辑、等等；或者，认为——上帝在创造了世界以后就撒手不管了；除了用自然规律管理世界以外，上帝并不干预和涉入这个世界中的事务和自然现象；等等】。这些思潮【也包括德国以外、诸如法国思想界许多学者、英国学术界的一些教授，等等】，终于导致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突然流行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纳粹主义者。

正是因为他们在内心中离弃了那创造宇宙天地以及其中万有、创造世人生

命的上天、上帝、造物主、那生命之主，那无限全能、全知、全在、全备，那能听、能看、能言的，那公义圣洁、恩典慈爱的上帝，那圣经中所启示的救赎主；——所以，他们才把心灵的眼目转向地上的被造之人，把对于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当作是自己的生命的倚靠、心灵之锚、心灵的归依。

在世人的心灵中有一个空洞，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填满。然而可叹的是，世人却常常离弃和悖逆那创造天地、创造我们生命的主，那道德律法的根源与终极颁布者，那对于世人生命之道德价值的终极鉴察者、终极审判者。这正是世人生命与心灵深处所充满的、本质性的、普遍性的罪性。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罗马书1章

1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蒙召作使徒，奉派传　神的福音。2这福音是　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预先所应许的，3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4按圣洁的灵说，因为从死人中复活，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儿子。5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6其中也有你们这蒙耶稣基督所召的人。7我写信给各位住在罗马，为　神所爱，蒙召为圣徒的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　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

8首先，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大家感谢我的　神，因为你们的信心传遍天下。9我在传扬他儿子福音的事上，用心灵事奉的　神，可以作证我是怎样不断地记念你们，10常常在祷告中恳切祈求，也许我可以照着他的旨意，终于能够顺利地到你们那里去。11因为我很想见你们，好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定；12也使我在你们中间，借着你我彼此

的信心，大家一同得到安慰。13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好几次预先定好了要到你们那里去，为了要在你们中间也得一些果子，像在其他的民族中间一样，可是直到现在还有阻碍。14无论是希腊人或是未开化的人，聪明的人或是愚笨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15所以，对我来说，我随时都愿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 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17 神的义就是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本于信而归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18 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19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 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20其实自从创世以来， 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21因为他们虽然知道 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22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23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 神的荣耀。

24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作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25他们用虚谎取代了 神的真理，敬拜事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事奉造物的主。他是永远可称颂的，阿们。26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27同样地，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性功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作出可耻的事。他们这样妄为，就在自己身上受到应该受的报应。28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 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作那些不正当的事。29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又是好说谗言的、30毁谤人的、憎恨 神的、凌辱人

的、傲慢的、自夸的、制造恶事的、忤逆父母的、31冥顽不灵的、不守信用的、冷酷无情的、没有恻隐之心的。32他们虽然明明知道行这些事的人，　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伟大劳动人民，还是纳粹主义所推崇的伟大日耳曼人民，都显明了，世人在内心深处的自以为义、自高、自傲。

我们绝不是在这里说，劳动人民就不好，或是日耳曼人民就不好。固然，在劳动人民的身上，在日耳曼人民的身上，从世事的角度而言，有着许多美好的优点、品格、道德素养、聪明、富有才干、智慧、勤劳、等等。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而谦卑地认识到，从根本的本质层面而言，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人群、任何团体、任何阶级、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是完美至善的，都不可能是没有瑕疵与本质性罪污的；也都不应该被当作是一种心灵的偶像，供世人来顶礼膜拜。恰恰相反，在人类中间，我们彼此之间在本质上应当是平等的，应当彼此是弟兄姐妹，应当一同地把我们的心灵归向那公义圣洁、慈爱恩典的天父，应当单单地仰望和敬拜事奉他。

凡自高的，必降卑

马太福音23章
1那时，耶稣对群众和他的门徒说：2“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座位上，3所以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行和谨守，但不可效法他们的行

为，因为他们只会说而不去作。4他们把重担捆起来，压在人的肩头上，但自己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5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要作给人看：他们把经文的匣子做大了，衣服的繸子做长了；6他们喜欢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7又喜欢人在市中心向他们问安，称呼他们‘拉比’。8然而你们不要被人称为‘拉比’，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老师，你们都是弟兄。9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父。10你们也不要被人称为师傅，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傅，就是基督。11你们中间最大的，必作你们的仆人。12凡高抬自己的，必被降卑；凡自己谦卑的，必被升高。”

————————————

第二个共同点是，关于人类社会事务层面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之事，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都认为，人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不可调和的、不可原谅的矛盾；这些矛盾，只能通过一方彻底地消灭另一方，来得到解决。

在马克思主义中，这种深刻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阶级斗争的矛盾。在纳粹主义中，这种深刻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种族斗争的矛盾。因而，马克思主义主张，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联合起来，进行本质性的、暴力性的社会政治革命，彻底地、暴力性地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正如毛泽东先生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画画绣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而纳粹主义的种族灭绝行动以及专制暴政就更加令人震惊、举世皆知、臭名昭著，我们就不在此赘言。

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在世上其它思想体系、伦理系统或是宗教信仰体系（例如伊斯兰教等）中，我们也常会见到，——这种推崇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消灭敌人、打倒敌人的思想文化。这种思想文化，就像是在中国共产党员中有一段著名的话，说道："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上述思想文化的背后，包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特征，即，在世上的许多道德伦理体系或是宗教信仰体系中，往往是"因行为称义"、而不是"因信称义"的。

所谓"因行为称义"是指，这样的思想体系认为，——人的道德价值，从终极性、根本性而言，是通过他的外在的、言语行为等等来决定的。

所谓"因信称义"是指，这样的思想体系认为，——人的道德价值，从终极性、根本性而言，不是因他外在的言语行为而决定的，而是因他在心灵与灵魂深处、对于上帝之救赎恩典的信靠，而决定的。

因行为称义与因信称义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就是在于，人究竟是自以为义，还是以上帝（以及他的救赎恩典）为义。如果人自以为义，即，人自己认为自己是正义的，自己认为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能力、道德、品格，而得到正义，甚至成为正义的化身，——那么，在这样人的内心深处，就必然是骄傲自高的。当人信奉因行为称义的思想文化、伦理体系的时候，人就会在行为上互相攀比、比较，并进而俾倪他人、藐视他人、甚

至憎恨他人、互相争斗不息。

相比之下，因信称义的思想，不是以人自己的义为中心，而是恰恰相反，从谦卑承认和悔改人自己的罪性为基点，寻求和倚靠上帝的救赎恩典，完完全全地信靠上帝的救赎、饶恕与赦免。

罗马书3章
9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控诉过，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10正如经上所说：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11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　神的；
12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
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13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弄诡诈，
他们嘴里有虺蛇的毒，
14满口是咒骂和恶毒；
15为了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步飞快，
16在经过的路上留下毁灭和悲惨。
17和睦之道，他们不晓得，
18他们的眼中也不怕　神。”
19然而我们晓得，凡律法所说的，都是对在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让每一个人都没有话可讲，使全世界的人都伏在　神的审判之下。20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在　神面前得称为义，因为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

21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　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22就是　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地临到所有信的人。23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24但他们却因着　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25　神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　神的义；因为　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26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又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27这样，有甚么可夸的呢？没有可夸的了。凭甚么准则说没有的呢？凭行为吗？不是的，而是以信心为准则说的。28因为我们认定，人称义是由于信，并不是靠行律法。29难道　神只是犹太人的　神吗？不也是外族人的神吗？是的，他也是外族人的　神。30　神既然只有一位，他就以信为准则称受割礼的为义，也要以信为准则称没有受割礼的为义。31这样说来，我们以信废掉了律法吗？绝对不是，倒是巩固了律法。

____

请注意，因信称义的教义思想体系并不是说，我们的行为就不重要。恰恰相反，我们外在的言语行为，正是我们内在真实信心的写照与表现。然而从根本上、终极角度说，我们的义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更不是由我们的外在行为所决定和体现【否则人就在心中自以为义，自高自傲，俾倪、藐视他人，甚至憎恨他人、争斗不息】。我们的义，唯有是建基于上帝自己所赐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为我们所成就的、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信靠他之人的永生恩典。

雅各书2章

14我的弟兄们，人若说他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甚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15如果有弟兄或姊妹缺衣少食，16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那有甚么用处呢？17照样，如果只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信心就是死的。
18也许有人要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请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就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19你信 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就连鬼魔也信，却是战兢。20愚昧的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没有用的吗？21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不是因行为称义吗？22你看，他的信心与行为是一致的，信心就因着行为得到完全了；23这正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 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也被称为 神的朋友。24可见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仅是因着信心。25照样，妓女喇合接待了探子，又从另一条路把他们送走，不也是因行为称义吗？26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照样，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____

正是由于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因信称义的信仰，我们才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义，不是在于我们自己，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完完全全地在于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完全全地是出于他的圣洁无罪，出于他为我们而死、承担了我们所本应承受的罪债与刑罚、所成就的赦罪之恩典。因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对我们的饶恕，所以，我们这些罪人的罪才得到赦免，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与他和好。因此，我们在任何世人面前，就无以自夸，更无法自以为义。因而，我们才深刻地知道，从根本上说，我们也应当以饶恕的心，去对待他人。

马太福音18章

21那时，彼得前来问耶稣：“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七次吗？”22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23因此，天国好象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帐，24刚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下六千万银币的人来。25他没有钱偿还，主人就下令叫人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掉，用来偿还。26那仆人就跪下拜他，说：‘请宽容我，我会把一切还给你的。’27主人动了慈心，把那仆人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28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欠了他一百个银币的仆人，就抓住他，扼着他的喉咙，说：‘把你欠我的钱还给我。’29那和他一同作仆人的就跪下求他，说：‘请宽容我，我会还给你的。’30他却不肯，反而把他带走，关在监里，等他把所欠的还清。31其他的仆人看见这事，非常难过，就去向主人报告这一切事情。32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仆，你求我，我就免了你欠我的一切。33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好象我怜悯你一样吗？’34于是主人大怒，把他送去服刑，等他把所欠的一切还清。35如果你们各人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必这样待你们。”

____

从上述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的两点共同点的比较中，我们能够看见，其根本性的、本质性的症结就是在于，人在心灵与灵魂深处，背离、离弃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上天、上帝、造物主，背离了那道德法则的终极基准与颁布者、那道德律法的终极审判者；因而，人在内心中自以为义；从而，人在面对世上他人的时候，————（1）或是以之为自己心灵生命的归依【即，对于领袖、对于权力的无限个人崇拜】，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专制独裁；（2）或是以之为自己的敌人、死敌，甚至像严冬一

样残酷无情地对待敌人，直至彻底消灭对方，而心中没有本质性的谦卑、饶恕与恩慈的态度。

____

请注意，这并不是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就应当逆来顺受、与世无争、消极遁世。恰恰相反，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倚靠那天地之主、我们生命救主的人，应当以热忱而勤勉的人生态度，在这个世上努力地生活、去做好一切当作之事，而不应当慵懒懈怠、更不应当唯唯诺诺、胆小懦弱。我们应当努力地秉公行义，寻求正义，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

我们应当憎恨罪，但是要爱罪人。我们所争战的对象，不是世人，而是罪。在这个世上，我们所爱的对象，不应当是罪，而是罪人。

以弗所书6章
10最后，你们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在他里面刚强。11要穿戴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12因为我们的争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灵。13所以要穿起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在这邪恶的时代里可以抵挡得住，并且在作完了一切之后，还能站立得稳。14因此，你们要站稳，用真理当带子束腰，披上公义的胸甲，15把和平的福音预备好了，当作鞋子，穿在脚上，16拿起信心的盾牌，用来扑灭那恶者所有的火箭；17并且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　神的道，18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

随时在圣灵里祈祷，并且要在这事上恒久警醒，为众圣徒祈求。

马太福音5章

43“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4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45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46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作吗？47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甚么特别呢？教外人不也是这样作吗？48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

现在，让我们继续思考，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与精髓，及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比较。

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是一种建基于无神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以及人类共同享有和均分财富的乌托邦社会思想。【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以地上的财富和国度为世人生命与心灵的终极归依；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章中讨论、阐述上帝之国与地上之国之间的异同与关系。】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子集，所强调的是：——社会经济财产分配原则，倾向于公有制、计划经济、平均分配、劫富济

贫等等特征。

我们应当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思想并非是完全彻底错误的。其所重视的关于社会财产尽量平均分配、避免贫富分化过于严重、等等，是有其道理与价值的。事实上，西方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尤其是二战以后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就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极其强调了避免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福利政策等。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西方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中，直到今天，一直有着强烈的造福于大众的主旨和内涵，这并非是受到什么马克思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是受到自古以来基督教信仰思想的巨大推动和深刻影响。

公道地说，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避免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的内容，并非是错误的。

但是，社会主义思想与体制的致命错误在于，（1）过于强调集体主义、否定人的生命独特价值与人的生命自由；（2）思想控制与言论控制；（3）专制主义思想，邪恶与欺骗；（4）社会经济发展上的乌托邦主义，以及国家经济道路的荒谬性；（5）无神主义内核；否定公平竞争；平均主义、大锅饭；丑恶的社会管理机制与控制；思想层面、理念层面的空洞、荒芜、荒谬、谎言；统治者的自私、腐败、欺谎。

____

所谓资本主义是指，在一个经济体制中，通过经济资本的置配、自由流动、分配管理、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等等机制，促进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与高效化，从而为人类社会整体创造更大的物质性财富。

相对而言，社会主义是一个更大一些范畴的政治经济词汇，因为它不仅包含了经济运作思想与原则，也包含了政治思想理念、社会思想理念体系等。在社会主义框架下，由于其对于集体主义的强调、对于个体主义的践踏和压制，因此，其政治思想理念与社会思想体系往往是专制独裁的，因而往往是邪恶、欺骗的；并且，它会千方百计地控制人们的思想，消灭个体的生命与思想自由，试图把所有人都变成国家机器上的某一个无知无觉的零件与螺丝钉。所以，社会主义往往与专制主义有着强烈的姻亲关系。

资本主义则往往具有民主主义的色彩，尽管两者之间并不一定严格划等号。资本主义往往是一个比较狭义的术语，仅仅包含经济运作范畴的含义，而不像社会主义这个术语那样，既包含了经济、又包含了政治性意涵。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由于其对于自由竞争、公平竞争、市场经济公开竞争的鼓励，因此，资本主义往往最终会强烈地倾向于民主主义制度，倾向于社会整体的公开化、自由化、民主化、去中心化、平民化。

然而请注意，正如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本身一样，资本主义本身并不一定具有道德好坏、善恶的意涵。

正如本书所开宗明义地指出的，民主制度本身并不一定适用于任何人民。譬如，在圣经创世纪中所记述的所多玛、俄摩拉，虽然看似是由主流民意所驱动的社会结构，但是，他们所行的事情却是恶事；他们所作的，在耶和华永生之神的眼中是罪大恶极。严格地说，从长远、长期的稳定状态而言【而不是从短暂的、短期不稳定的状态来看】，民主制度是圣洁自由之民所进行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换言之，如果人民、百姓不是自由而圣洁的，如果人民中的大多数不愿意寻求真相、渴望真理，没有行公义、好怜悯的心灵，那么，在这样的人民中，所谓民主制度并不能长期地存在；在这样的人民社会中，即使短暂地出现民主政治制度形式，也会是昙花一现、很快会陷入无政府主义混乱喧嚣状态、并很快会因此被专制主义野心家政治集团和政治势力革命、篡权、推翻。这就是十九世纪法国革命中混乱喧嚣的历史，也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混乱喧嚣的历史。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鼓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公平竞争、资本自由流动的经济机制和经济制度，与民主主义政治制度一样，严格地说，从长远、长期的稳定状态而言【而不是从短暂的、短期不稳定的状态来看】，也应当是建基于自由圣洁之民所组成的社会体系之上。

这是因为，如果，在一个国家社会中，人民大多数成员在社会事务上、公共世事上都没有正直之心，不愿意行公义、好怜悯，——那么，若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利用、欺压、坑蒙拐骗、尔虞我诈、贫富严重不均。在这样的国家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不能长久而稳定地运行；饥饿之民就会常常起来造反、打家劫舍，或是像马克思主义所煽动的那样，——政治集团利用所谓无产阶级来推翻资产阶级。

————————

这正如，马克思在著名的《资本论》中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的这句话，虽然是夸张的、偏颇的、别有用心的；但是，却也并非完全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

————————

在这里，我们且不说马克思本人的不道德的私生活，也不说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所推崇的狂风暴雨般暴力革命中的不义、不公、欺谎、罪恶、甚至邪恶，及其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和所引致的数以亿计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与苦难。而是，我们在这里指出，仅仅作为一个在整整一个多世纪中影响【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暴力征服与谎言欺骗的形式达到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思想意义上的影响性】了人类几乎四分之一人口的思想家，马克思【以及他所代表的、启发的无数后世思想家、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中的致命性漏洞和谬误。

的确，马克思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缺陷与弊病；但是，他却无视、甚至故意忽视了，从十七世纪以来，一直到他所生活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巨大益处和福祉。

马克思的思想既是浅薄的【因为它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缺陷与弊病的真正病根与医治之法】，也是偏颇的【因为它忽视、无视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带来的巨大益处；更重要的是，它没有看到，也并不深刻理解，这种巨大益处是来自于何处以及为什么，其本质原因和机理究竟是在于什么。换言之，它并不真正理解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公平竞争体制的本质精髓与益处所在】。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质性谬误，也正是它邪恶所在之处，就是在于，它完全地误解了、谬解了、错待了，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究竟是在于什么。

马克思主义思想，就像是一个庸医，看见战场上一个战士的胳膊上中了箭伤，箭杆露在皮肤外面，箭头插在肉里面；于是，这个庸医拿出剪刀，剪断箭杆，并用一个锤子在那受伤的胳膊上狠狠地砸下去，让箭头在肌肉里面陷得更深；然后，庸医自豪地大声宣布说，这个人的箭伤被治好了，因为露在皮肤外面的箭杆已经看不见了。

马克思主义思想正确地看见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却彻底地扭曲了、玷污了、糟蹋了文明的真正价值，彻底地毁坏了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个体生命价值本身是没有终极意义的；人的个体生命和价值，唯有能够在集体中体现、实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专制主义、国家集权主义、独裁主义、甚至纳粹主义异曲同工的本质原因】。

马克思主义决绝地宣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救赎主、也没有什么神仙

皇帝。它公然地、厚颜无耻地宣告，无神主义思想是伟大的、光辉的。它欺谎地、诡诈地对世人说，这世上并没有什么救赎主、没有神仙皇帝，一切都只能靠自己；然而在政治现实主张中，它却剥夺人的自由与生命的高贵价值，把人置于思想奴役、身体奴役、经济奴役的铁链之下。

请注意，我们并没有在这里说，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是不好的。事实上，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重要优秀道德品质之一。但是，集体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建基于公平、正义、平等、公义、良善的基础之上，必须建基于公义圣洁的道德法则基础之上，必须建基于我们对于那无限全能、公义圣洁、恩典慈爱的上天、上帝、造物主的信仰的基础之上。

当人在内心中离弃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上天、造物主、上帝的时候，人就会迷失在世事的喧嚣之中，就会看不清人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究竟在于何处，看不见人的心灵与灵魂的隽永价值和意义。

当人在内心中离弃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永生之神的时候，世人良心中的道德法则也就失去了隽永的价值和意义，真理就成为了强权的丫鬟，政权就成为了枪杆子的机器，国家就在本质上与黑社会无异。在死亡面前，任何以属世之事为根基和归依的道德说教，都是苍白的，甚至是滑稽的。

只有当我们看见上帝的全能与无限智慧，看见他的公义圣洁与恩典慈爱，我们才能够明白生命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是在于什么。

我们都不仅是被上帝所造的，而且是被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因此，在人的里面，有自我认知、自由意志的能力，有心灵和灵魂，有思想、智慧、意识、理性、情感、爱、等等的美好能力。

正是因此，人的生命与自由才是高贵的。

人的生命与自由是珍贵的，因为那本是能够指向永远的、圣洁属神的生命。

在这个被罪所充满的世界上，在世人生命的里面，都普遍性地、本质性地遍满了罪。在每一个世人的心中，都是背离神、不愿意寻求公义的；都是自以为义的，是自高而自傲的；都是在为了属世之利而活着，以属世之事为自己生命与心灵的归依。但是，那内心谦卑、看见己罪、承认己罪、并真诚愿意悔改己罪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马太福音5章

1耶稣看见群众，就上了山；他坐下之后，门徒来到他跟前，2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3"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4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5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6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7怜悯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8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看见　神。
9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
10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11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12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

____

在一个国家社会中，如果人们都是敬虔而真诚地信靠上帝，倚靠他的救赎与恩典，饥渴慕义，勤勉而公义圣洁地生活与工作，——那么，这样的国家中就根本不会出现马克思主义眼中所看见的那些资本主义的弊病和缺陷。

然而，在这个地上的世界是复杂的；我们在许许多多的世事中，常常看见

好坏参杂的因素、泥沙俱下的局面。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也是如此。

一方面，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基督教信仰在思想与文化上，对于西方各个国家产生的深刻影响，早已经在许许多多历史记忆与文化土壤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整个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贸易经济的蓬勃发展，包含着深刻广泛的博爱之心，包含着对于社会全体大众、乃至全人类的巨大福祉。任何看不见这一点、或是故意无视、忽视、蔑视、否认这一点的——人、思想、主义，就像是马克思主义一样，——不但是浅薄的、虚伪的、欺谎的、自私的，而且是罪恶的、邪恶的。

另一方面，虽然，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贸易经济的蓬勃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性利益与许多精神文化方面的福祉，但是，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这些近现代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贸易经济、乃至现代民主主义制度，并非是终极的真理，并非是我们心灵的归依和倚靠。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无论是近现代科学技术、还是资本主义经济、或是自由贸易经济，当被应用于一个没有信仰、没有敬虔、没有敬畏的社会大众文化土壤中的时候，那么，它们所带来的，就很可能不是福祉，而是灾难，甚至是巨大的灾祸。

在满清末年、民国初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曾经喊出"德先生"【即民主】"赛先生"【即科学】的口号。他们以为，用民主和科学，就能拯救中国脱离愚昧、落后、黑暗、败坏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局面。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民主与科学本身，并不能向我们指明，人生命与自由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它们本身，也不能带给我们敬虔的信仰、良善的道德、恩慈的心灵、公义的信念。固然，现代民主主义的诞生，正如现代科

学的起源一样【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一书】，与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以及相应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等有着深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它们本身却不能代替：——那真正的、诚实的、真挚热忱的，对于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之上帝的敬拜与信仰。

____

单从经济制度角度而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由贸易制度是好的，但它们必须应当被置于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法律、规则、体系之下。

这样的社会秩序、法律、规则、体系，应当是保障和重视人的生命与自由的。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应当是鼓励公平竞争、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的。但同时，它不仅是应当“行公义”的，而且更应当是“好怜悯”的；应当是注重避免社会贫富严重分化，避免贫穷百姓得不到照顾。

____

当年，在十六世纪下半叶、以及十七世纪，那些伟大的现代科学开启者们、基督徒思想家们，正是认识到了科学【即他们当时所说的自然哲学，或第二哲学】的内在局限性【即，科学本身，应当是人以谦卑的心态对于自然规律与现象本身的、基于客观事实的、实事求是的研究，而不应当是：——（1）人凭着自己的骄傲自义之心所进行的主观臆想、（2）或是

牵强附会的关于人生意义与自然现象之间关系的生搬硬套、生拉硬扯、人为地进行瞎联系，（3）或是占卜性质、“万物有灵”性质的臆测；——就像是占星术、炼金术、星座性格属相、或是亚里斯多德的主观臆想之宇宙论，或是中国的风水、算卦等等。————因为，关于人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是在于上帝自己的话语、启示和旨意之中，是在于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之救赎恩典之中，是在于上帝所放置在世人良知之中的圣洁公义的道德律法之中】，从而深刻地批驳了罗马天主教廷所秉持的、与圣经本身没有关系的、古希腊罗马的亚里斯多德与托勒密等人的主观臆想、玄学主义等等试图在自然世界中赋予臆测性、占卜性、万物有灵涵义【就像占星术、炼金术、星座属相、或是中国的风水与算卦那样】之系列思想的根深蒂固的谬误，进而导致了现代科学思想体系与方法论的诞生和爆炸性发展。【详情请见《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一书。】

简言之，现代科学之开启的重要原因，正是在于那些现代科学开启者们、基督徒思想家们认识到了科学本身的内在局限性，才纠正了从前人们思想观念中的根本性错误与方向性偏差，从而导致了现代科学思想体系与方法论的起源、诞生与成功发展。这个重要原因，正是来自于、建基于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中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正是由于基督教信仰的巨大而深刻广泛的影响，才使许许多多的世人认识到，人生的终极价值和意义，应当到哪里去寻求；同时，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和研究自然世界，应当到自然世界中去寻找什么，——更重要的是，不应当到自然世界中去寻找什么。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才导致了现代科学体系的诞生、成功与发展。

与此类似地，现代民主主义制度，以及现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由贸易制度，它们的诞生、成功与发展，也是如此。它们的成功原因，正是在于它们首先认识到了它们自己的局限之处的本质在于什么。

现代民主主义制度的成功，正是因为它在制度体系化设计中，不是假设人是无罪的、无辜的，而是恰恰相反，它清醒地看到，在世人的心中，普遍地存在着罪性。因而，它在体系设计与规划中，处处尽量实现和体现权力分散化、制衡化、去中心化的原则，同时尽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尽量保障政府行政部门的有效性、有力性。

请注意，这并不与我们在本书的主旨中所反复申明的内容——“民主是圣洁自由之民在这个世界上进行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相矛盾。

一方面，一个成功的民主主义制度，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人心中普遍的罪性，并从而在制度体系设计上不好高骛远、不好大喜功、而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权力制衡的规则化设计。

另一方面，一个成功的民主主义制度，必须建基于人民诚实的心态基础之上；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体系中，虽然，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被罪所羁绊，但是，在人民大多数成员心中，必须愿意寻求真理和公义，必须愿意看见己罪、承认己罪、悔改己罪，必须有饥渴慕义的心，有真诚与敬畏的情感。

现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公平竞争制度，也是同样如此。

一方面，它们应当在公平正义的规则秩序体系的约束与制衡框架之下。另一方面，它们应当建基于人民普遍诚实的心态基础之上。

一方面，它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世人心中所普遍存在的、本质性的罪【所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采取规则秩序体系与制衡机制框架】。另一方面，它们应当认识到，人生命与自由的高贵价值和意义【所以，尊重和推崇人思想与生命的珍贵价值和自由】。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思想体系的致命性症结根源，就是在于，它们没有看到上述两个方面的精髓本质，因而望文生义地、彻底地误解了、扭曲了、歪曲了现代民主主义政治、现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竞争经济制度。

更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思想体系的致命性症结根源，就是在于，它们的出发点是完全错误的；它们的出发点，与现代民主主义政治、现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竞争经济制度的出发点，是完全相反的。在上述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现代民主等政治经济制度完全南辕北辙。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的出发点在于，假设人性是无罪的、无辜的，劳动人民是伟大光荣的；它们看见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的不完美，于是提出，彻底砸烂那些制度，重新建立一种建基于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所谓完美制度；然而，在这样的所谓

完美制度中，却既不尊重人的生命与自由的高贵价值意义，也不明白，人生命与自由的真正珍贵意义，究竟来自何处。

上文所述，现代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平等竞争的经济制度之中，所包含的两个方面【即，一方面，它们应当在公平正义的规则秩序体系的约束与制衡框架之下（换言之，它们清醒地认识到人心灵中普遍存在的罪性）；另一方面，它们应当建基于人民普遍诚实、愿意寻求公义的心态基础之上（换言之，它们清醒地认识到人生命与自由所本来应有的高贵价值和意义）】，实际上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这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都与基督教信仰有着深刻的关系，是直接地来自于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

这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既应当认识到，在世人生命与心灵深处所普遍存在的本质性的罪；也应当认识到，人生命与心灵本所应有的高贵价值和隽永意义。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是创造我们的生命之主。我们都是上帝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因此，人的生命在这个宇宙天地之中，是最高贵的、最奇妙的。

圣经也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正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人的生命本所应有的圣洁与高贵价值意义，所以，我们才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世人常常说谎、占便宜、自私自利、冷漠无情、没有信仰与敬虔人生态度、等等，从本质而言，是多么地污秽鄙陋、罪恶不堪。

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良心之中都无可置疑地知道自己在本质上的罪污、欺谎、不义，所以我们才珍视那来自于上帝所启示的救赎恩典、圣洁信仰，更在内心深处为罪而忧伤痛悔、饥渴慕义，真心真意地愿意悔改己罪、完全归向我们的生命之主、救赎之主，得着那真正圣洁没有瑕疵的、能够直到永远的属神生命。

____

因此，我们在这里清晰地指出，现代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平等竞争的经济制度，正如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一样，——它们之所以诞生，正是由于直接地受到了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文化土壤的深刻影响而导致的。它们是来自于上帝所启示的、那真实的、指出世人生命之罪、并赐下救赎恩典的信仰。

然而，我们却不应当把它们当作是我们思想的偶像，而是恰恰相反，应当深刻地、清醒地认识到，它们本身并不具有终极的价值和隽永的意义。它们绝不应当是我们的心灵所期盼、归依和倚靠的终极真理。它们绝不应当是我们所信靠的对象。

我们的生命、心灵与灵魂所期盼、归依、倚靠的对象，应当是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之主，就是那全能、全知、全在、全备的、至善至美的、公义圣洁、恩典慈爱的上帝。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生命之主；只有在他那里，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只有在他那里，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良善与公义。他是我们的永生之神，是那属天国度的君王，是把饶恕与赦罪恩典赐给我们的伟大救赎者。他就是圣经里所启示的那位伟大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永生真神。圣经是他的完全而全备的话语、启示和旨意。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谦卑诚实地看见己罪、承认己罪、悔改己罪，真挚地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恩典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是属乎天国的百姓，必将进入那无限幸福美好的永生国度之中。

————————————————————————————————

自由贸易与社会分工

自由贸易经济的本质，是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精诚协作、共同生产、共同致富。自由贸易经济的成功正是在于，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化的大分工、大生产。在今天的经济产业链中，有数以亿计的、甚至更多的不同产品、零件、食品、用具、硬件、软件、服务。在整个人类社会中，一般性而言，每一个人都勤勉地工作，并专注于各自擅长的事项，从而在国家社会整体上，乃至在整个人类世界的国际合作中间，人们互相帮

助、取长补短、精细分工、深度协作。

这种大规模的、大分工的社会机制所必需的，正是公平、正义、平等、公义的政治制度、秩序、法律、规则体系框架。固然，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完美的，也没有什么政治制度、秩序、法律、规则体系框架是完美的，但是，一般性而言，就主流性质来说，整个国家社会、乃至整个国际秩序，应当是基本上公平正义的，是互助互利的；一般性而言，人们应当基本上彼此诚信、信任、以善相待；人们应当以宽容良善的心、而不是仇恨的心态看待彼此；——否则，从长期性、根本性来说，自由贸易制度就不会真的成功。

————————————————————————————————

财富的定义

在人类经济体制中，如果人们在心底以此世的物质性财富为心灵的终极性归依，那么，人们就往往会为自己积聚财物、金钱、房屋等等；而不愿意走出去与人交换商品、或是消费商品、促进商品经济流通。从而，繁荣发达的自由贸易经济就往往不会发生。如果人们的心灵沉浸于积聚此世的物质性财富与黄金等等，如果人们在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中自满自足、裹足不前，以之为自己的心灵的归依、生命的归宿，而不思进取，那么，除非迫不得已，人们就往往不会愿意主动地去与他人进行分工合作，更不会想到去与异国他乡的人进行大规模产业协作。

因而，亚当斯密所开创的现代经济理论所作出的划时代贡献，正是让世人看到，财富的定义，不是在于有形的、物质性的东西，而是在于生产物质商品的能力、生产率、知识技巧。换言之，财富不仅是一件关乎身体的事情，更是一件关乎心灵的事情。

正如本书上文所言，现代经济制度本身并不应当被我们看作是终极真理，因为它是有所局限的。如果说，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它对人类社会有益，那么，它之所以有益，其益处正是因为它来自于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并深刻地受到了基督教信仰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的某些正面性的、积极性的影响。正是因此，现代经济制度虽然是讲述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但是，从一般性、整体性、主流性而言，它迄今为止并没有把西方世界拖入自私自利的彻底混战局面之中，而是相反，通过国家社会的大规模协作，使数量巨大的世人脱离贫困之境。

然而如果有一天，当人们忘记了上述这一点的时候，当人们离弃了敬虔真挚的信仰的时候，当人们心中的罪愈来愈泛滥，而不是谦卑真诚地悔改己罪、寻求公义、行公义、好怜悯，——那么，自由贸易等等现代经济制度，就会显明其深刻内在局限性，显明人心中之罪的丑恶，甚至给许多国家地区带来更深的冲突、混战与灾祸。

____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财富：——不是那地上的财宝、那些必朽坏

的东西；而是我们生命、心灵、灵魂中的那属天的品质，是我们在天上的基业与幸福，是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悦纳与恩赐。

++
++
++
++
++
++
++
++
++

【引述圣经 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语】

马太福音6章

19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聚财宝，因为地上有虫蛀，有锈侵蚀，也有贼挖洞来偷。20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蛀锈蚀，也没有贼挖洞来偷。21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22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如果你的眼睛健全，全身就都明亮；23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全身就都黑暗。如果你里面的光变成黑暗，这是多么的黑暗！24一个人不能服事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事　神，又服事金钱。

【马太亨利圣经注释】

19-24节

除了虚伪之外，另一个常常在人的灵魂中得逞的撒旦试探、诡计是——贪恋世界。没有什么其它事情，比“虚伪”和“贪恋世界”这两件事情，更能够经常地掩藏在表面敬虔信仰的面纱之下。所以，基督在上文中警告了我们关于信仰虚伪之人的事情以后，在这里继续警告我们，不可贪恋世界。我们必须不可像那些信仰虚伪之人一样；他们的根本性错误，其实就是：——他们把这个世界当作是他们的奖赏；他们所看重的，就是世人的称赞，就是属世的利益和好处。在我们选择财富、目标、主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这里的这两个罪——虚伪的信仰，以及贪恋世界的心。

I。我们应当以什么为我们真正的财富。一个人，总会在生命中、在心底深处，把一些东西当作是他的财富、他的份、他的倚靠。他会尽力地去积累这些财富，并把这些财富积累当作是为未来所需而进行的预备。传道书2章3节：“我心里察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在我们的灵魂中，总会把一些事情当作是最好的事情；总会把那些事情当作是我们的喜乐、满足和倚靠。基督在这里所说的话，并不是要剥夺我们的财富，而是要指教我们，应当选择什么为我们真正的财富。

1.这里警告我们，不要把那些可见的、暂时的东西，当作是我们最珍贵的

东西；不要把那些东西，当作是我们幸福的所在。不要为你们自己在地上积攒财宝。基督的门徒们已经抛弃所有、来跟随他；他们应当一直持守着这样的心态。财宝，是那些丰富的、在我们眼中极其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必须不能为自己在地上积攒财宝，就是说，——（1）我们必须不能把这些东西当成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最有价值的东西、最有用处的东西：——我们不能称这些东西为“荣耀”——就像拉班的儿子们那样。而是，我们要把它们看成是没有荣耀的东西。那真正的荣耀，远远超乎它们之上。（2）我们必须不能贪图这些东西的丰富，不能无止境地、没完没了地搜刮这些东西、加添这些东西。一个人如果把那些东西当成是心里的财宝，就会这样贪婪地去做。（3）我们必须不能信靠、倚靠这些东西，把它们当成是为我们的未来遮风挡雨、给我们带来安慰与安全感的东西。我们必须不能对黄金说：——你是我的盼望，是我的心系所在。（4）我们必须不能在这些东西中得到满足；必须不能把它们当成是我们的渴望与祈盼。我们应当安于简朴，但不以这个世界为我们的分。这些东西不能是我们的慰藉（路加福音6章24节），不能是我们的喜笑和饱足（路加福音6章25节）。我们真正需要积攒的，不是这个世界中的繁华与财富，而是在另一个世界中的东西。在我们的面前，面临着抉择；我们努力积攒的东西，就是我们看为至宝的东西。我们应当智慧地作出选择；因为无论你为自己选择了什么样的东西，你自己也就成为了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知道、明白、思想，在我们的里面是何等大，我们的生命是何等长久，那么，我们就会看见，在地上积攒财宝是一件多么愚妄的事情。

2.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不应当在地上积攒财宝：——因为这些都是将要丢失和朽坏的东西。（1）这些地上的财宝，会从里面败坏。世上的财宝总是这样，被虫子咬，从里面锈坏。那些我们以为储藏得最稳妥的属世财宝，最后都会变得破败不堪。路加福音12章16、17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

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 传道书5章10-12节：“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 雅各书5章2、3节：“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注意——世上的财物，在它们之中，有一个朽坏与败坏的律——它们总是逐渐枯萎凋残。（2）这地上的财宝，也会面临暴力的抢夺而失去。贼进来，会把财宝偷走、抢走。强盗、小偷的眼睛，总是会盯着那些积攒财宝的房屋和家庭；在这世上的任何属世的财宝之中，没有什么是真正能够安全稳妥的。我不应当把我的信心和倚靠放在属世的财宝上，即使它们看起来华丽炫目；不论这世上的财宝、虚荣、繁华，似乎能够给我们带来多少属世的暂时好处，我都应当轻看这一切——因为它们都是必将朽坏、轻易失去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上那些属世的、轻易会失去的、随时被抢夺的东西，当成是我们的财宝，那么，我们就真是太愚妄了。

3.我们应当把那些永恒的、属天的、不可见的东西，当成是我们的真正财宝，当成是我们最美好的东西，当成是我们的幸福、喜乐与荣耀。你们要在天上积攒财宝。（1）是的，在天上的的确确有财宝，是比地上的财宝更真实、更美好、更久远的。我们在天上的拥有，才是我们真正的财宝、富足、荣耀、与喜乐。我们的财宝，在神的右手中；神使我们成为圣洁与完美，也使我们的财宝成为圣洁与完美。（2）只有真正智慧的人，才知道应当在天上积攒财宝；勤勉地为天上的财宝而努力地劳作；我们应当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永生的确据，并把我们的幸福完全地倚靠在他的身上，

仰望他的名；用圣洁的心，轻看这世上的一切——因为，这世上的一切，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与基督美好的救恩相比。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在天上有我们永远的幸福和盼望；并且，以那里的一切为我们的满足；不以这世上的任何事物为我们的满足和慰藉。如果我们是以那天上的东西为我们的财宝，并且勤勉地为我们自己积攒那天上的财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信靠神，相信他会安全稳妥地保守着我们的财宝。我们的一切心思、意念、渴望、情感、努力、勤勉，都应当是以那里为目标。我们不要被世界的钱财所缠累；那些东西只会欺骗我们、压垮我们；而是应当积攒那真正稳妥的财富。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每一个真诚信从基督之人，在天上都有丰富的财宝；这是关乎我们的未来的永久归宿。（3）这是对我们的极大鼓励——我们在天上的财宝，是安全的。只有我们天上的财宝才是安全的。在那里，没有虫子咬；财宝不会朽坏；我们不会被欺诈；也没有人来偷盗或是抢夺。这是那天上的幸福，是超越时间的限制的；是不能朽坏的基业。

4.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因此，我们对财宝的抉择，必须是正确而智慧的。我们的心意，生命的意义，都是取决于此的——或是属世的，或是属灵的；或是属地的，或是属天的。心总是跟随着财宝，正如向日葵总是跟随着太阳。财宝，是我们的价值和眼目的归宿，是我们的恋慕和情感的归宿（歌罗西书3章2节），是我们的渴盼与追求的归宿，是我们的目的与意图的方向，是我们的心所属的地方。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关切和顾虑也在哪里——是我们急切恳求、期望、相信、喜悦、朝思暮想的；是我们心里牵挂、割舍不下、得着慰藉、专注凝思、常常挂念的事情。箴言18章10、11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义人奔入，便得安稳。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想，犹如高墙"。诗篇119篇111节："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 箴言23章26节："

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

我 的 道 路 。” 我们的心，应当是属于神的；我们的财宝，必须是在神那里；这样，我们的灵魂才能归向他。

这里所教导的关于财宝的事情，是与前面的警告教诲紧密相连的。我们的信仰，必须是真正的、真诚的；必须是寻求真神的，而不是寻求人的赞誉以及属世的好处。我们的财宝，就是施舍奉献、祷告、禁食，以及这些事情给我们所带来的赏赐。如果我们做奉献、祷告、禁食这些事情，仅仅是为了人的赞誉和称许，那么，我们就是在积攒地上的财宝，因为我们只看重这个世界中的利益与好处。这样做的人是愚妄的，因为，我们所贪图的别人的赞誉，就像是那些地上的财宝，很快就会朽坏，被虫子咬，（传道书10章1节），被别人偷走、夺去。诋毁和谤渎就是像小偷强盗一样，偷走我们为自己积攒的财宝——我们在别人眼里的名誉地位。若我们把心放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的努力就终将是徒劳的。虚伪的人，在天上没有任何财宝（以赛亚书58章3节：“他 们 说 ， 我 们 禁 食 ， 你 为 何 不 看 见 呢 ？ 我 们 刻 苦 己 心 ， 你 为 何 不 理 会 呢 ？ 看 哪 ， 你 们 禁 食 的 日 子 ， 仍 求 利 益 ， 勒 逼 人 为 你 们 作 苦 工 ”）；当他们的灵魂被收去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资财能够带走，没有任何价值能够存到永远。（约伯记27章8节：“不 敬 虔 的 人 虽 然 得 利 ， 神 夺 取 其 命 的 时 候 ， 还 有 什 么 指 望 呢 ？”） 但是，如果我们以真诚而正直的心，来奉献、祷告、禁食，并仰望神、渴盼他的悦纳，那么，我们就是在天上积攒财宝；在神那里，有记念册记录我们的一切（玛拉基书3章16节）；而且，将要有我们的赏赐。当我们来到死亡与坟墓的另外一面的时候，我们就必会得到安慰。虚伪之人的分，是在这个世界上（耶利米书17章13节）；然而属神的信实百姓，他们的名要记录在天上（路加福音10章20节）。神对我们的悦纳，就是我们在天上的财宝；这财宝是不会朽坏、不会被偷抢的。我们的财宝如果是积攒在神那里，我们的心如果是系在神的身上，那么，还有什么其它地方能更好呢？

我们必将在神那里永远站立。

II。在我们的信仰中，必须警惕虚伪之罪，以及贪恋世界之罪。这里有两种人的眼睛，一种是好的，一种是不好的（22、23节）。眼睛是身体的灯——因为眼睛寻找、发现对象，并引领着身体的行动。如果没有身体的灯，那么，外面世界的光就对我们没什么用处。箴言15章30节：眼 有 光 使 心 喜 乐 。 好 信 息 使 骨 滋 润 。

1.你 的 眼 睛 若 了 亮 ， 全 身 就 光 明 。如果我们的眼目看重的，是良善之事，那么，我们的心就趋向于那些事情，我们的生命，就会在基督里有完全的光、确据和真诚；我们就会有良善的行为，如同光一样照在人前；我们的信仰在天父的面前，就是纯洁、没有玷污的。但是，如果心里面是罪恶、贪婪、苦毒、嫉妒、怨恨——这些东西常被描述为罪恶的眼目（马太福音20章15节）（马可福音7章22节）（箴言7章22节）——那么，我们的身体和生命就会是黑暗而昏花不明的；我们的言语行为中就会充满罪恶。以赛亚书32章6-8节："因 为 愚 顽 人 ， 必 说 愚 顽 话 ， 心 里 想 作 罪 孽 ， 惯 行 亵 渎 的 事 ， 说 错 谬 的 话 ， 攻 击 耶 和 华 ， 使 饥 饿 的 人 ， 无 食 可 吃 ， 使 口 渴 的 人 ， 无 水 可 喝 。吝 啬 人 所 用 的 法 子 是 恶 的 。 他 图 谋 恶 计 ， 用 谎 言 毁 灭 谦 卑 人 。 穷 乏 人 讲 公 理 的 时 候 ， 他 也 是 这 样 行 。高 明 人 却 谋 高 明 事 ， 在 高 明 事 上 ， 也 必 永 存"。　　如果我们里头的光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地大呢————如果，在我们里面的、本应该引领我们的那些良知、情感完全败坏了、失丧了，那么，我们的生命该是多么黑暗而可怕！

2.我们的眼睛，对应的也是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和明白——我们的认知、判断、引导，等等。如果我们的眼睛了亮，如果我们有真诚而正确的判断，如果我们能够明辨是非——尤其是能够辩明，我们真正的财宝应该是在哪里——那么，我们的情感、行动就会得到正确的引领；我们就会有完全的、恩典的、安慰的光。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目是邪恶的、败坏的、被世俗所羁绊的，那么，我们的世界观就会是错误的、昏花不明的；我们的心与生命就会充满了黑暗；我们的整个生命就会是败坏的。诗篇82篇5节："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人的灵本应是为主燃亮的蜡烛；但是，生命如果昏花了，将是多么可怕。 以赛亚书5章20节："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

3.我们的眼目，也对应了我们人生的目的与目标。我们用眼睛来为自己设定当前目标、寻找前进方向；并专注地朝着那个方向努力。我们的眼目，引领着我们在信仰中所作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所追求的，总是我们眼睛所瞩目的什么东西或是事情。如果我们的眼睛是单纯而明亮的，那么，我们就能诚实地设定正确的目标，并正确地向着那个目标努力————我们会纯洁地、单单地仰望神的荣耀，寻求神的名、神的恩惠，在一切事情上都单单地倚靠他。这样，我们的眼目就是纯洁的。保罗说，我活着，是为基督而活。这样，我们的整个身体就是在完全的光中；我们所有的言语行为就会充满了恩典，讨神的喜悦，也令我们自己得到安慰。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目是邪恶的，那么，我们就不会单单注目于神的荣耀，我们也不会得到神的悦纳；我们会看重人的称许与掌声————甚至，即使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当我们表现得想要荣耀神、寻求基督之事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深处，却也仍然是寻求我们自己的荣耀和属世利益。我们的整个生命就会是败坏的、不安稳的；我们的根基就摇曳不定。在我们的心里，就会充满了

迷乱和罪恶的心思意念。如果你里面的光昏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地大呢。在你的生命中，会有根本性的错误；你所作的一切，都会被这根本性的错误毁掉。目标，决定了行动。在我们信仰中最重要的事，就是确定正确的目标——哥林多后书4章18节："原 来 我 们 不 是 顾 念 所 见 的 ， 乃 是 顾 念 所不见 的 。 因 为 所 见 的 是 暂 时 的 ， 所 不 见 的 是 永 远 的 "。信仰虚伪之人，就像是风筝，虽然飞了上去，但是却被地上牵着，随时要落到地面。真诚的基督徒，就像是美丽而自由的云雀，在天空中飞翔得越来越高，把地上的事情放在脑后。

III。我们必须要小心警惕虚伪之罪、以及贪恋世界之罪；我们要谨慎地选择自己的主（24节）。没有人能事奉两个主。服事两个主的人，眼目不是单纯的。一个信仰真诚的人，会像诗篇123篇1、2节所讲述的那样——"坐 在 天 上 的 主 阿 ， 我 向 你 举 目 。看 哪 ， 仆 人 的 眼 睛 怎 样 望 主 人 的 手 ， 使 女 的 眼 睛 怎 样 望 主 母 的 手 ， 我 们 的 眼 睛 也 照 样 望 耶 和 华 我 们 的 神 ， 直 到 他 怜 悯 我 们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严厉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虚伪之人的欺谎。他们以为，可以在神与世界之间骑墙——既有地上的财宝，也有天上的财宝；既讨人的喜欢，又讨神的喜欢。这些虚伪之人说：为什么不呢？一石两鸟总是好的。他们期望，他们的信仰既可以给他们带来属世的利益，又给他们带来天国的利益。正如那个伪装的母亲，愿意把孩子分成两半；或是，像那个撒玛利亚女子，在偶像与真神之间踌躇。但是，基督说，不，这样绝对不行。提摩太前书6章5节："他 们 以 敬 虔 为 得 利 的 门 路 。"

1.这里，有一个非常一般性的、根本性的原则：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假如一个仆人有两个主人，那么，当这两个主人彼此一致的时候，仆人会

高高兴兴地跟随着他们；但是，当这两个主人彼此分开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个仆人到底是属于谁的。他不可能同时爱两个主人、遵从两个主人、忠诚于两个主人。不 是 恶 这 个 爱 那 个 ， 就 是 重 这 个 轻 那 个 。——这就是真实而实际的局面。

2.你 们 不 能 又 事 奉 神 ， 又 事 奉 玛 门 。 玛门代表的是财利等一切属世的利益。腓立比书3章7节："只 是 我 先 前 以 为 与 我 有 益 的 ， 我 现 在 因 基 督 都 当 作 有 损 的 。" 在这个世界中，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生命的骄傲，等等，都是玛门。对有些人来说，他们的玛门就是肚腹；这就是他们服事的对象（腓立比书3章19节）。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们的玛门则是安逸、睡眠、运动、消遣（箴言6章9节）。有的人把世上的财富当作玛门（雅各书4章13节）；有的人把荣誉和进阶当作玛门；有的人把别人的赞扬和掌声当作是玛门，就像法利赛人那样。总之，自我、感官、世俗、等等，就是这个世界的玛门。我们不能同时又事奉这些，又事奉神。否则的话，世界的利益一定会与神相冲突、相争竞。基督没有说，我们必须不要，或是不应该事奉神和玛门。而是，基督说，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可以事奉这两个主；我们不可能两者都爱。约翰一书2章15节："不 要 爱 世 界 ， 和 世 界 上 的 事 。 人 若 爱 世 界 ， 爱 父 的 心 就 不 在 他 里 面 了 。" 雅各书4章4节："你 们 这 些 淫 乱 的 人 哪 ， （ 淫 乱 的 人 原 文 作 淫 妇 ） 岂 不 知 与 世 俗 为 友 ， 就 是 与 神 为 敌 吗 ？ 所 以 凡 想 要 与 世 俗 为 友 的 ， 就 是 与 神 为 敌 了 。" 我们不可能两者都遵从、都服事、都信靠、都事奉。因为他们二者是彼此矛盾的。神说："把你的心给我"。玛门说："不，把你的心给我"。神说："你要满足于你现在已有的东西"。玛门说："你要利用一切机会去抓取。钱，钱，你要不择手段地去获取财富"。神说："不要欺谎，不要欺诈，不要说谎言。在你所说所作的一切事情中，都要诚实"。玛门说："如果你能够得着什么利益，那么，连你自己

的父母都可以欺骗”。神说：“要有慈善、慷慨的心”。玛门说：“你要抓紧自己的东西，不要给别人”。神说：“不要为各样事情而忧虑”。玛门说：“你要为每一件事情忧虑”。神说：“要谨守主日、安息日”。玛门说：“你要利用每一天来为自己赚取利益”。在神与玛门之间，是有着本质性矛盾的，因此，我们不可能两个主都事奉。让我们不要在神与巴力之间骑墙，而是要作出选择；你要单单地遵从神，并事奉他。

+++
+++
+++
+++
+++
+++
+++
+++
++

____

经济贸易与民主社会

在自由贸易经济体系中，往往需要的是自由、开放、平等、公平竞争的政治经济环境；这样，世上的人们才不会被人为的、逼迫性的政治权力所羁绊，而是各自发挥主动积极性，把自己所擅长的生产劳动、工作技能、服

务技能做到最好。因此，自由贸易经济体制常常是与民主社会制度紧密相关、相辅相成的。

———————————————————————————————————

信仰，政治与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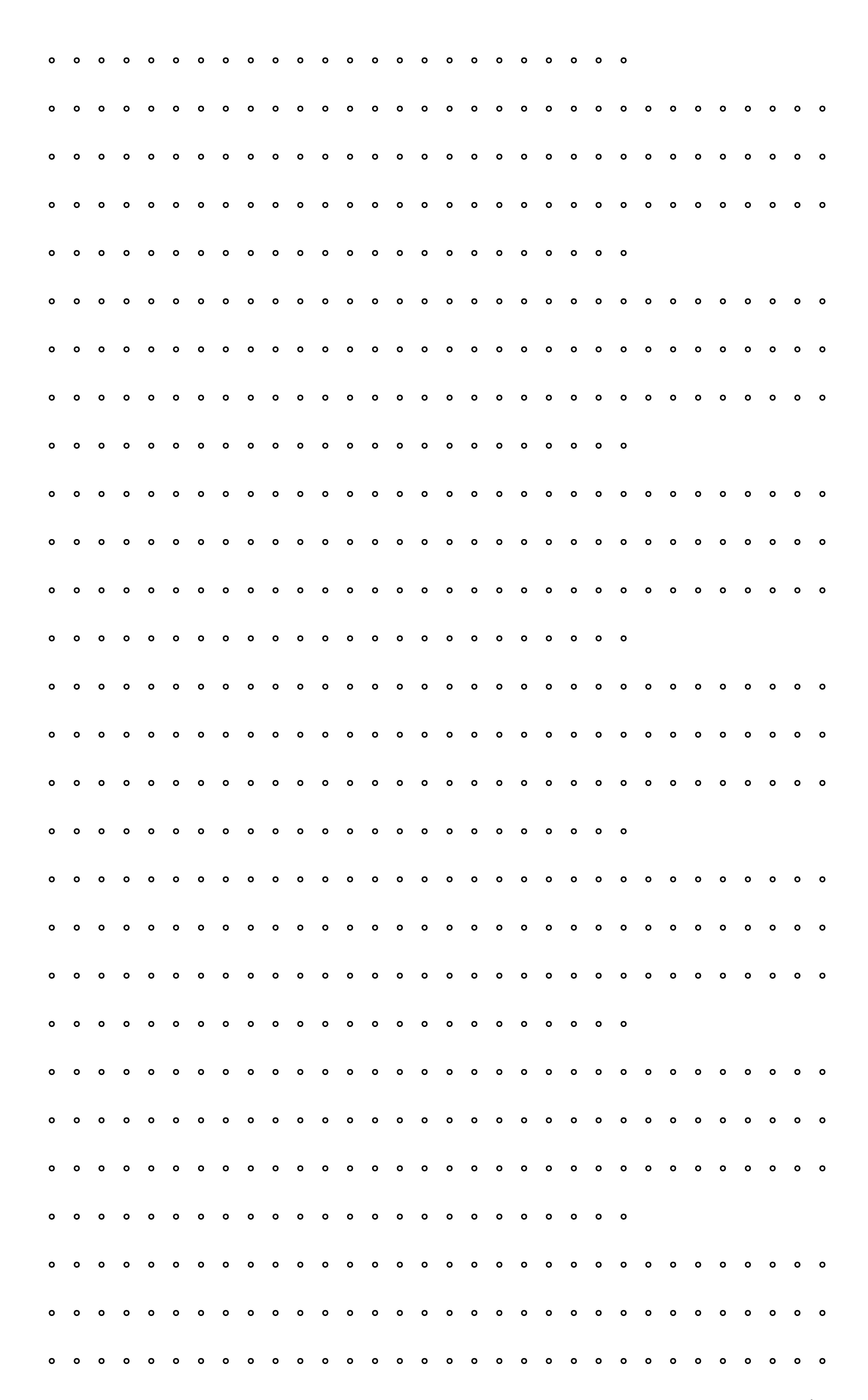
如本书前文所反复重申指明的，在一个公平、公正、平等、公义的政治经济体系背后，——对于那创造宇宙天地与世人生命之主的上帝的敬虔信仰，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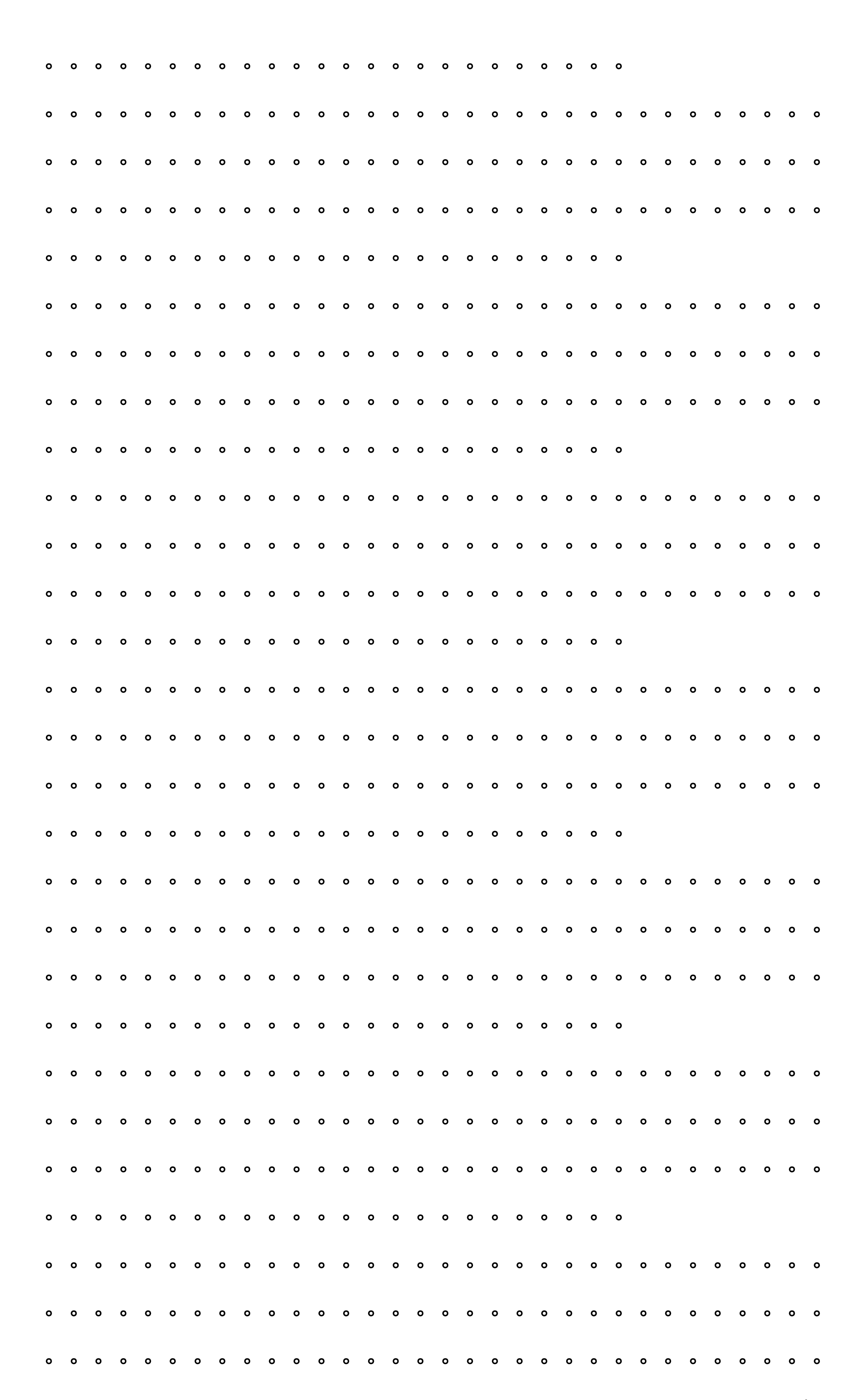
上文所引用的圣经经文和马太亨利圣经注释告诉我们，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处于某种政治、经济制度中，但是，我们的心灵的真正归依，应当是上帝，而不是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属世之利。我们所真正服事的对象，应当是神，而不是玛门。我们所应当事奉的，不应当是自己的财物，而应当是我们的生命之主。我们真正的财宝，不是在这个地上，而是在那永远的天上。我们的生命，应当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我们的神，并要爱人如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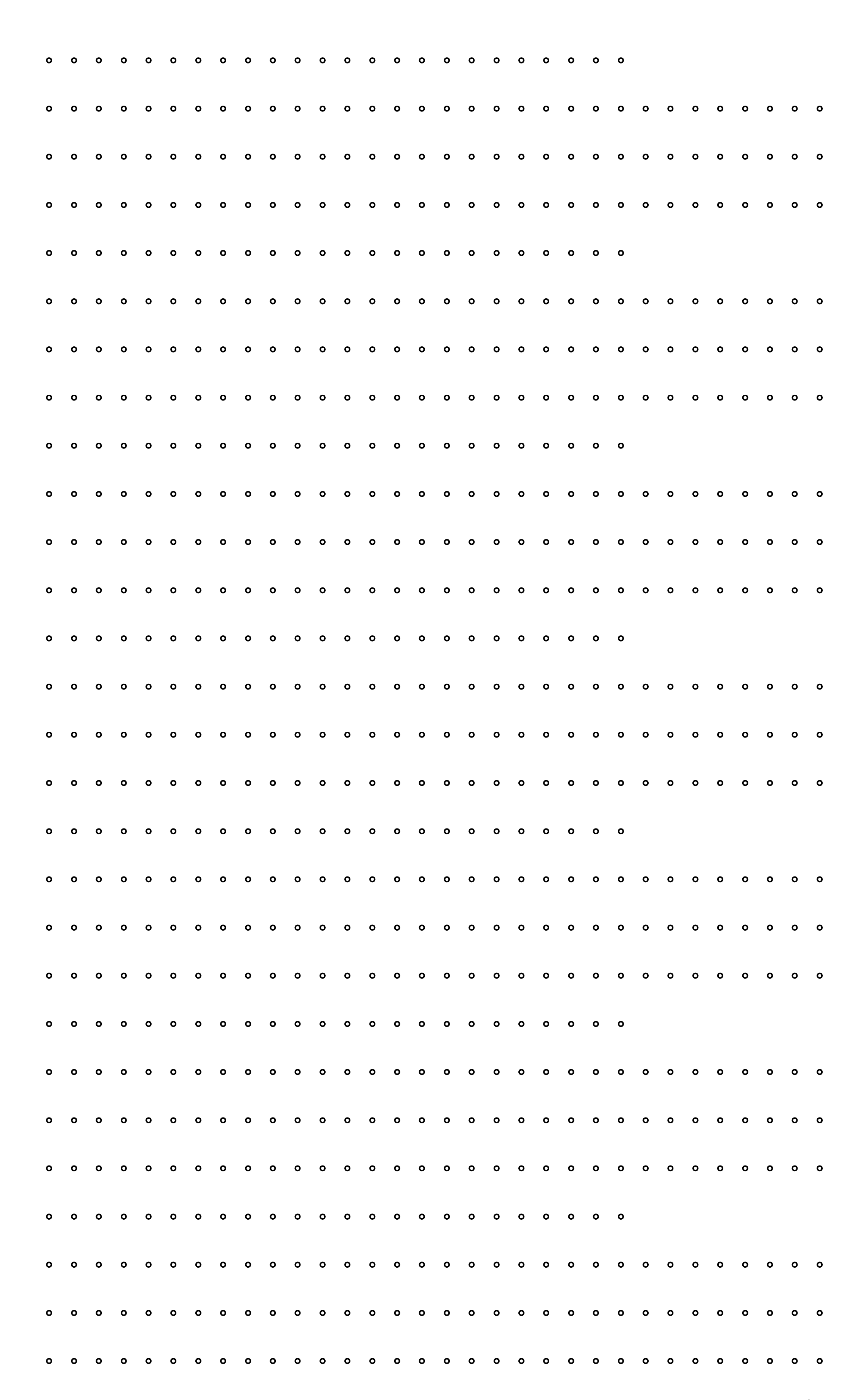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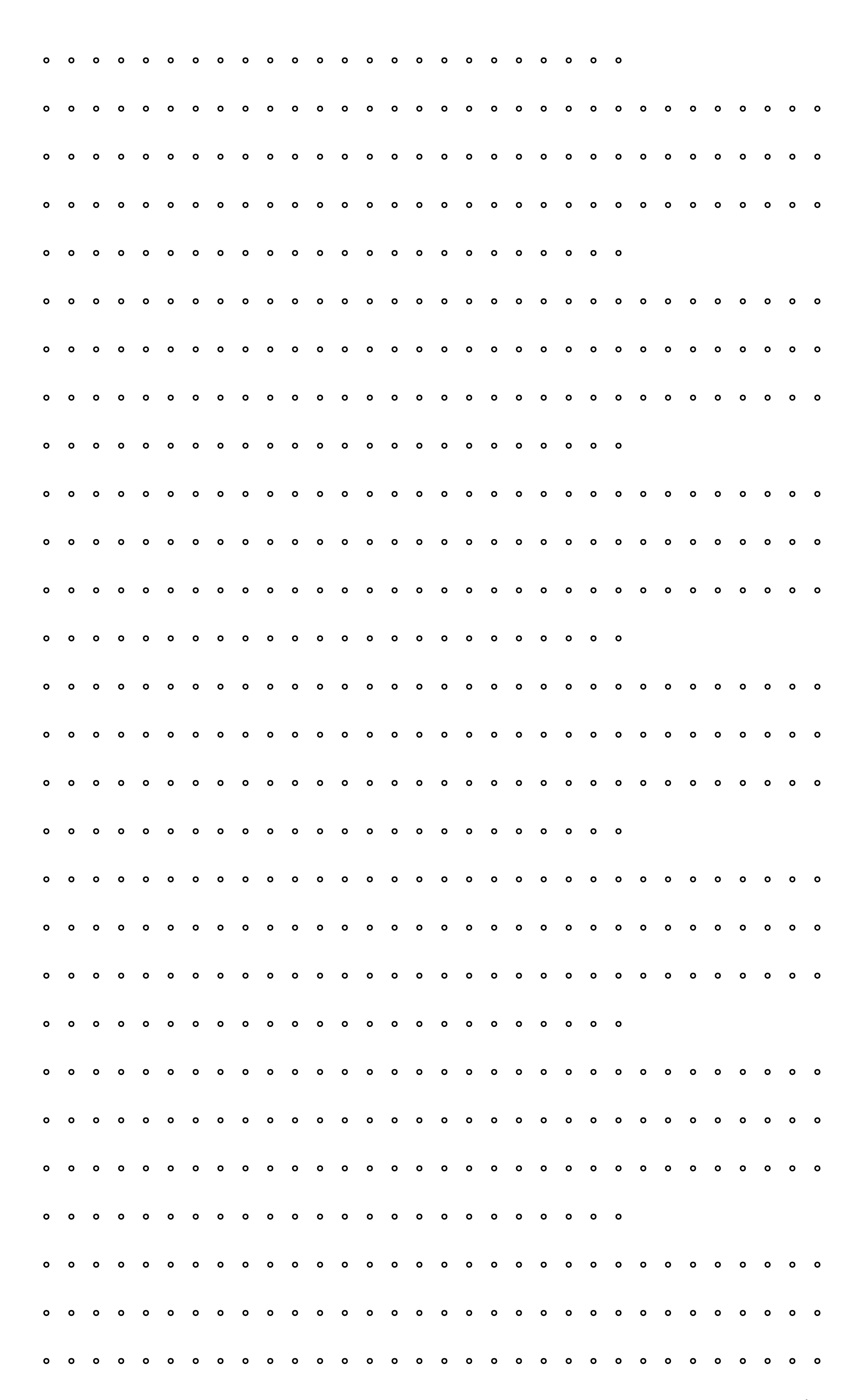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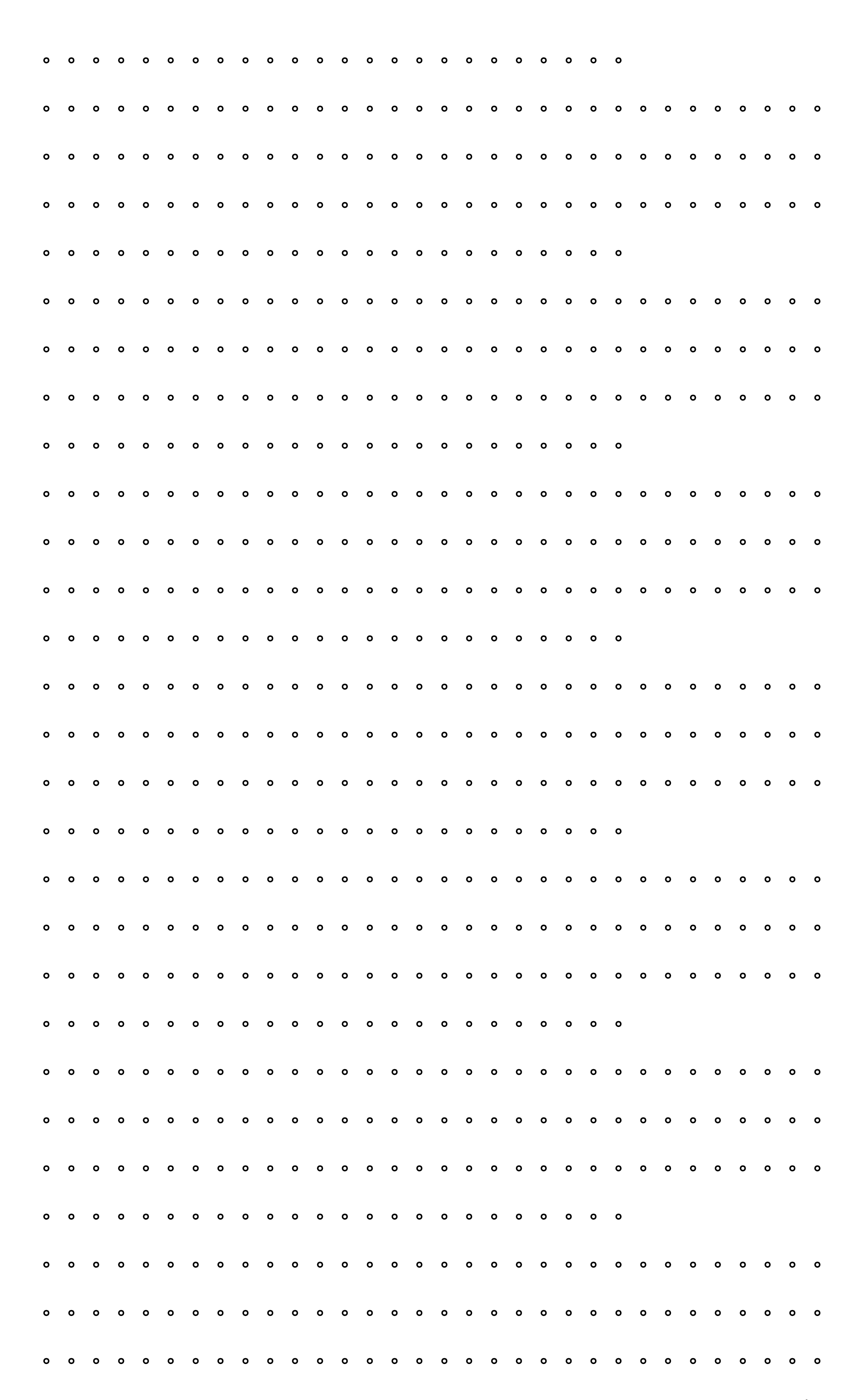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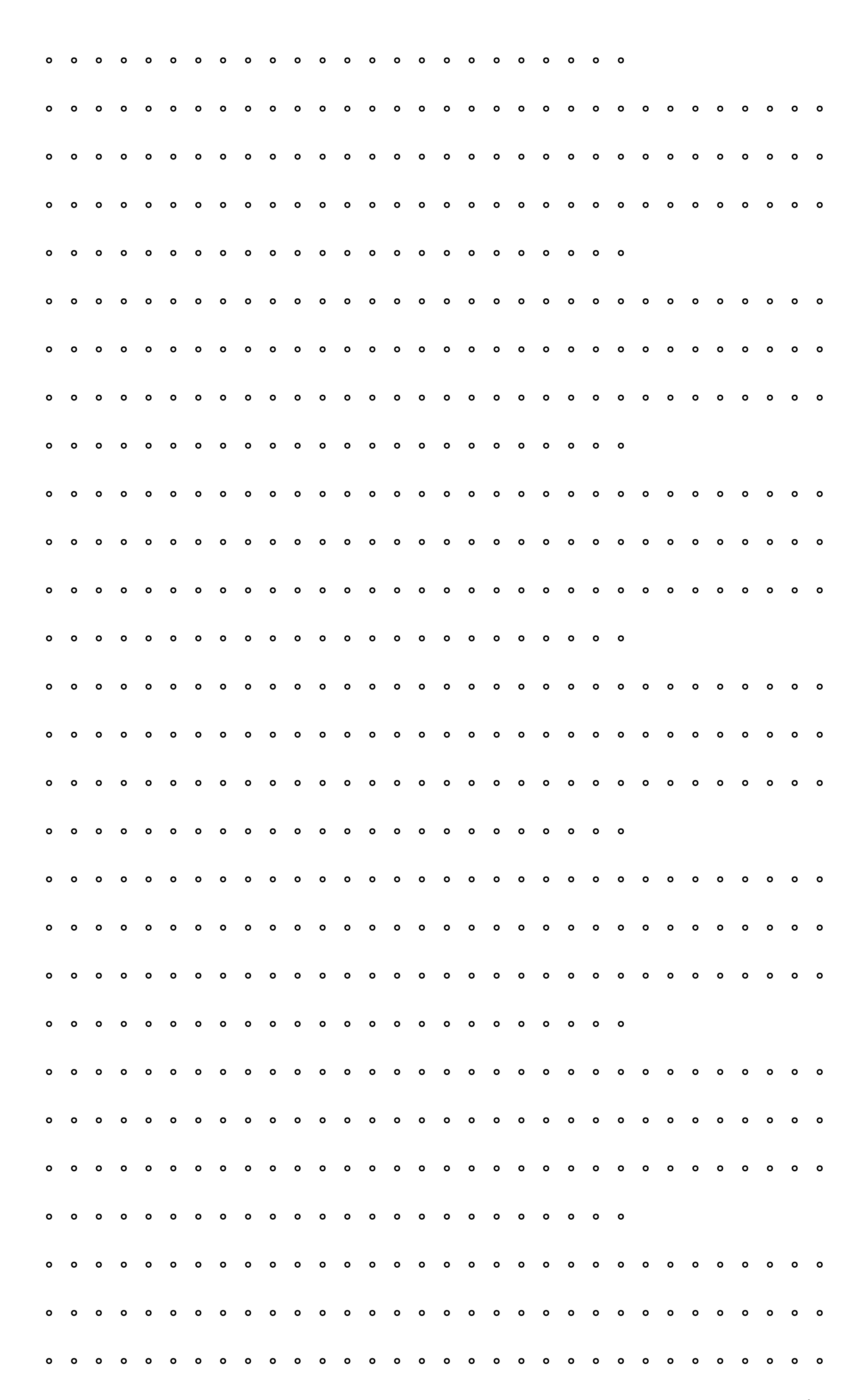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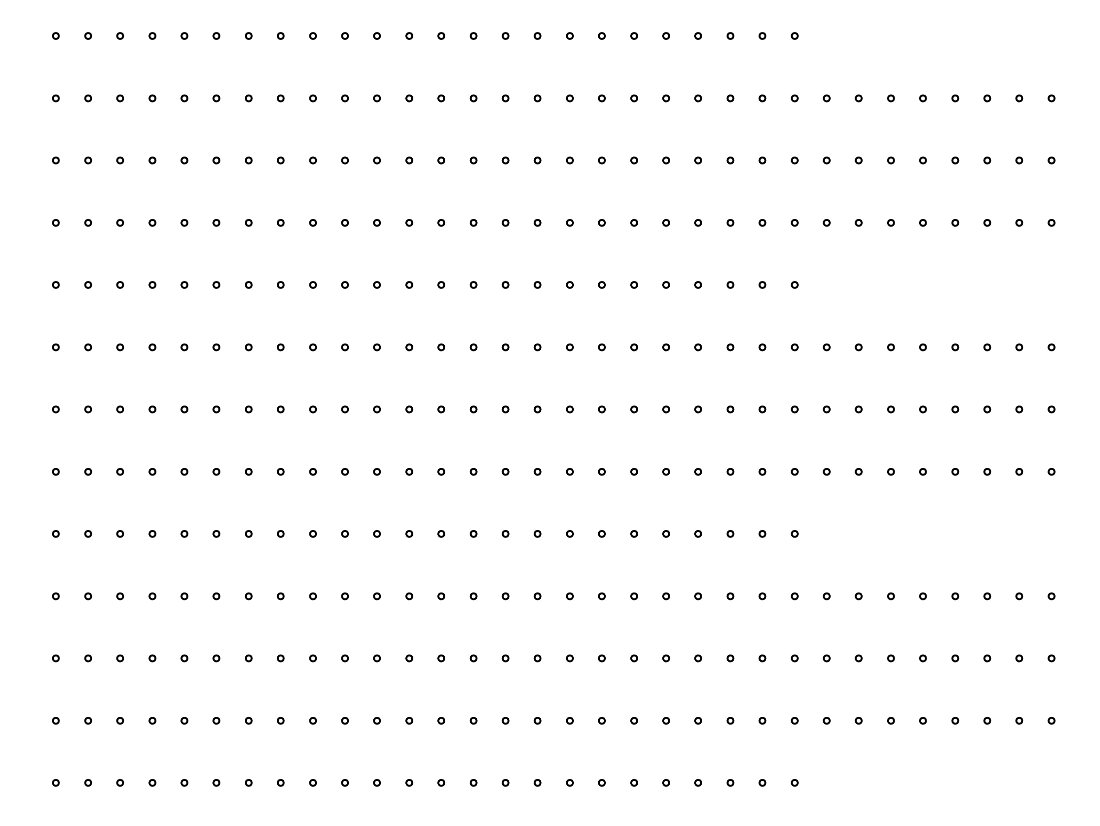








年。



====================

平等、正义、公义

让我们继续反思1920、1930年代的中国政治历史。

从1927年至1937年之间的大约十年期间，相对而言，中国经历了一个政治局面稳定、经济蓬勃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十年。

虽然，中国社会并非尽善尽美，还有着许多不公不义之事，但是，在那十年“建国”（建设国家）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等等，都在向着更加公平、平等、正义的方向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从十七世纪以来的西方文明进步，尤其是科技进步与爆炸性发展，在中国的相对稳定政治环境下，惠及到了千千万万的中国百姓。

在中国的各行各业，无论是大中小学校的建设，还是各种现代化工厂的创立，或是各种各样的新式产品与经济模式，都得益于这些来自于欧洲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文明影响。

事实上，在过去一百八十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一次又一次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只要中国社会政治局面稳定、对外开放、心态平和、态度谦卑【例如，清末同治光绪年间的洋务运动、同光中兴，民国时期的黄金十年，以及中共自从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等等】，那么，中国经济产值、人民生活水平、教育文化发展水平等等，就会得到飞速的、大跨度的发展。这就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所谓“时代进步”。实际上，这种所谓“时代进步”的本质原因，正是得益于十七世纪以来的西方文明科技的日新月异的发展。

不但中国如此，其实，像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乃至美洲、非洲、几乎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文化体系，其近现代历史都受到了十七世纪以来西方文明进步的深刻影响与惠利。

遗憾的是，1927年至1937年的民国政府黄金十年，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被猝然中断了。

显然，这场战争是出于日本的不义的侵略之战。日本应当为此承当全部罪责。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除了俄国以外，对于中国伤害最大的就是日本这个国家。

在接下来的八年中日全面战争中，日本军队的铁蹄在中国大陆许多地区扫荡，造成了许多生灵涂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不但如此，日本的野蛮行径与残暴统治，深刻地破坏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历程，更对民国政府造成了几乎致命性的打击。日本人的野蛮、丑陋、愚昧、强悍、暴戾、自私自利、自以为义，在二战期间，给整个东亚许多国家的人民都带来巨大的伤害与蹂躏。并且，从1937年至1945年，借着所谓抗日斗争，中共在中国社会不但取得了合法化，而且通过消极抗日、积极发展自身的方式【彭德怀等将领由于开展百团大战而受到毛泽东等中共最高领导层的严厉批判】，不断地坐大势力，以至于从1937年的区区几万人，发展到1945年后的上百万人；蒙蔽了亿万中国人民；并在接下来的残暴内战中【仅仅在辽沈战役中，就对长春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围困，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悲惨死去】战胜了腐败、无能、千疮百孔的国民政府，从而成功地得以在中国大地上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专制暴政，奴役了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长达七十年、直至今日。

一百八十年过去了，中国社会仍然没有实现公平、平等、正义。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许多的不公不义之事，仍然有着许多腐朽、堕落、败坏、愚昧、暴戾、欺压、专横、奴役、暴政、淫乱等等之事。许许多多的惨痛中国近现代历史，以斩钉截铁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社会的希望，不在于金钱、势力、繁华，而在于敬虔、信仰、谦卑、热忱、执著、公义、恩慈。

【引述 圣经 约翰福音8章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

约翰福音.
8.
耶稣往橄榄山去。
黎明的时候，他又到圣殿去，众人都来到他那里，他就坐下教导他们。
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抓到的妇人来，叫她站在中间，
就对耶稣说："先生，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抓到的。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怎样说呢？"
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要找把柄来控告他。耶稣却弯下身，用指头在地上写字。
他们不住地问耶稣，他就挺起身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他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打她。"
于是又弯下身在地上写字。

他们听了这话，就从年老的开始，一个一个地都离开了，留下的只有耶稣和那个还站在那里的妇人。

耶稣挺起身来，问她："妇人，他们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她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

法利赛人对他说："你为自己作证，你的见证不是真实的。"

耶稣回答："即使我为自己作证，我的见证还是真实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但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你们按着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

即使我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因为我不是独自一人，而是差我来的父和我在一起。

你们的律法上也写着：'两个人的见证才是真的。'

我为自己作证，差我来的父也为我作证。"

他们问："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如果你们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了。"

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教导人的时候，在银库的院中说的。当时没有人逮捕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寻找我，并且要在自己的罪中死亡；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于是犹太人说："他说'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杀吗？"

耶稣说："你们是从地上来的，我是从天上来的；你们属这世界，我却不属这世界，

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在自己的罪中死亡；你们若不信我就是'那一位'，就要在自己的罪中死亡。"

他们就问："你是谁？"耶稣说："我不是从起初就告诉你们吗？

关于你们，我有许多事要说，要判断；但那差我来的是真实的，我从他那里

听见的，就告诉世人。”

他们不明白耶稣是对他们讲论父的事。

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了人子以后，必定知道我就是‘那一位’，并且知道我不凭着自己作什么事；我说的这些话，是照着父所教导我的。

那差我来的和我同在，他没有留下我独自一人，因为我常作他喜悦的事。”

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了他。

于是耶稣对信了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持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定认识真理，真理必定使你们自由。”

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被谁奴役过，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犯罪的都是罪的奴隶。

奴隶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唯有儿子才可以永远住在家里。

所以， 神的儿子若使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得自由了。

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你们想杀我，因为你们心里不能容纳我的道。

我所说的，是我在父那里看见的；但你们所作的，却是从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

他们说：“我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必作亚伯拉罕所作的。

现在我把从 神那里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你们竟然想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作的。

你们要作的，正是你们的父要作的。”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 神。”

耶稣说：“如果 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是从 神那里来的；我已经来到这里。我不是凭着自己来的，而是 神差了我来。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因为我的道你们听不进去。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喜欢按着你们的父的私欲行事。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凶手，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本性，因为他本

来就是说谎者，也是说谎的人的父。

我讲真理，你们却因此不信我。

你们中间有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讲真理，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

出于 神的，就听 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 神的。”

犹太人对耶稣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的，不是很对吗？”

耶稣回答：“我不是鬼附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却侮辱我。

我不求自己的荣耀，但有一位是为我求荣耀，并且是审判人的。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必定永远不见死亡。”

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的确是鬼附的。亚伯拉罕死了，先知们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必定永远不尝死味’，

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先知们也死了；你把自己当作什么人呢？”

耶稣回答：“如果我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那使我得荣耀的是我的父，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 神的那一位。

可是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如果我说我不认识他，我就像你们一样是说谎的；然而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因为可以看见我的日子就欢喜，既然看见了，他就很快乐。”

犹太人对他说：“你还不到五十岁，怎会见过亚伯拉罕呢？”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亚伯拉罕出生以前，我已经存在了。”

于是他们拿起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起来，从殿里出去了。

====================

民主的本质与合理之处

在1920年代，在国民党与中共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保守派，激烈地反对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因为蒋介石清楚地看到，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不过是奴役全社会人民的专制暴政工具】，反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以汪精卫、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为代表的势力，则对中共表示同情和支持【不过，当汪精卫到武汉另立国民党中央、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以后不久，由于看到共产国际的俄罗斯代表所表达的要在中国进行暴动、暴力革命的意图，汪精卫于是转而也激烈地反对中共、并大范围抓捕中共成员；而宋庆龄则基本上一生都与中共站在一起】。

在国共两党之争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如何看待民主。在1949年以前，中共也曾经宣扬和支持民主理念，但是，那不过是欺骗人的烟雾弹而已。在中共所笃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内核中，并没有民主理念的一席之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核心，是要建立起无神论的、集体主义精神至上的、阶级斗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践踏个体主义、蔑视个人生命与灵魂的一种社会政治经济体系。俄国自从1918年以后建立起来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正是这样的大规模剥夺个人自由、屠戮反对派、迫害东正教人士、全面实行专制独裁的政府组织机构。

虽然，在二十世纪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内，就专制独裁而言，国共两党不过是半斤八两、五十步笑百步，但是，在国共两党的政治理念中，却存在着本质性的、巨大的差别。这就如同两艘船，虽然在海面上行驶的时候，彼此距离并不远，但是，由于它们航向前方的灯塔全然不同，所以，注定它们的方向全然不同。

国民党的政治理念核心，是孙中山提倡的所谓三民主义，以及后期的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三民主义虽然是一个模糊的、并不详细严密的政治理念体系，但却毋庸置疑地是以民主主义为终极核心；其终极目标是民主宪政，即，国家的政治运行将要是建基于民主选举、宪法架构、等等。

相比之下，中共的政治理念核心，则是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以集体主义至上、扼杀个人主义、蔑视个体之生命与灵魂的高贵价值、蔑视甚至仇视对于上帝之信仰、等等理念为核心。无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抑或是朝鲜、古巴、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虽也有所谓"民主选举"，——但是，那却不过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谎言与欺骗而已。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架构中，那种建基于社会中个体之生命自由价值的现代民主主义，其实并无真正立足之地。

民主的本质正是在于，对于社会中个体之生命与自由价值的尊重、重视与容忍。究其根本核心而言，这种个体生命与自由价值的高贵性，正是建基于圣经、建基于基督教信仰【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生命是来自于上帝的创造；而且不但如此，人的生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与样式所造的；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之中，都有着这个宇宙世界万物中所没有的、极为独特的东西，就是那指向永远、指向永恒之国度的灵魂】；这也正是为什么，现代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是诞生于以基督教信仰为核心文化土壤的西方文明体系内。【详情请见《论民主》】。

民主的本质正是在于，圣洁自由之民的自我管理的政治制度。民主的合理

之处正是在于，“众人抬柴火焰高”；当一个国家社会中所有百姓都能够齐心协力、群策群力、彼此恩慈包容的时候，正是这个国家最能够因此而生机勃勃、蒸蒸日上、团结奋进的时候。民主的生死成败关键正是在于，在一个国家社会中，成千上万的群众、各种不同的利益团体、等等，怎样能够彼此包容、妥协、协商、从而达成共识、彼此饶恕原谅、共同前进。【详情请见《论民主》】。

在1927年至1937年的民国政府黄金十年中，我们正是能够看见这种民主政府运行的特色【当抗日战争结束以后，1945年以后的蒋介石政府，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蒋介石台湾政府，则具有明显的独裁体制特征】。虽然，在那个十年期间，仍然有一些军阀战事，仍然有国共之战，仍然有许多专制、迫害、欺压、等等之事，但是，相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其他时间阶段而言，那个黄金十年是近现代中国最具有民主政治制度特征的时间阶段。——相对而言，蒋介石在民国政府内部、以及国民党内部，并不能一言九鼎；整个国家政府最高层统治机构是一种表现为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在政府框架中，开始切实地进行约法建制、国会选举、地方政府官员选举；在各个政府专业机构中，实行专家治国等等民主政治措施。

遗憾的是，这种光景很快就被中日全面战争所打断。在那十年期间，我们也能够看到，中国的政局虽然处于民主制度框架下，但是，仍然具有强烈的一盘散沙、喧嚣混乱、频繁内斗的特征；这也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国防能力，从而使得中国在接下来的抗日战争期间、在日军侵略之下一溃千里、几乎全面亡国。这再次显明了，对于一个健康成熟的民主政治制度社会而言，社会人心的团结、信仰、敬虔、谦卑、恩慈、公义、等等，是何等地至关重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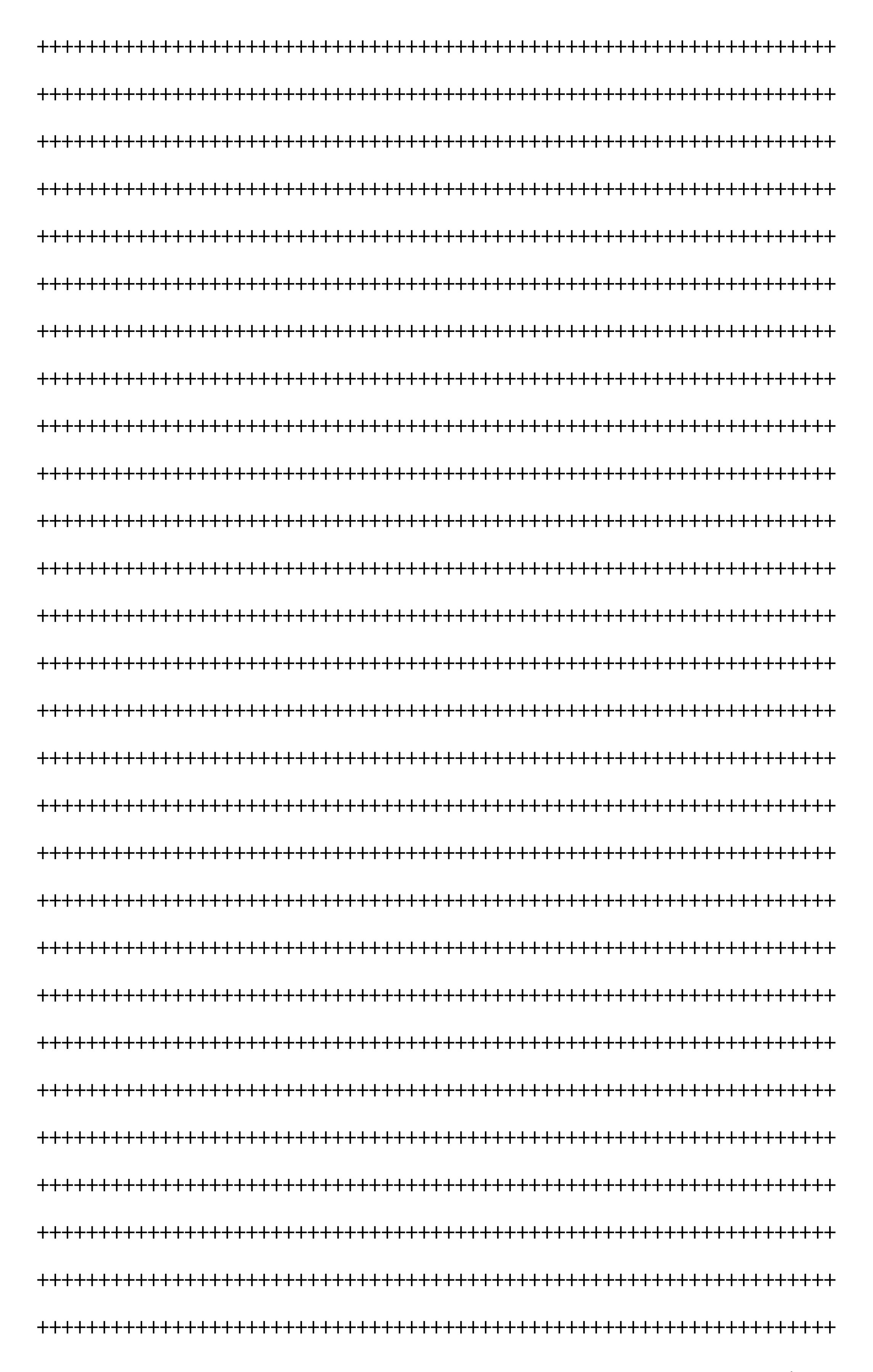
民主的本质生命力所在

在一个国家社会中，在保证法律与社会秩序的前提条件下，民主的本质生命力所在，正是在于，在千千万万人之间，政治决策过程是通过协商、投票、开放式讨论与妥协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压制、强迫、逼使、奴役的方式，来得以实现。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有许多吵闹喧嚣、纷纷嚷嚷；——但是，如果整个事情的过程与结果是和平、有序、守法的，那么，——这样的、长期的、稳定的民主决策过程结果，就会有益于社会大多数人、有益于国家社会的整体长期发展，而不会导致，——国家机器被少数人所窃取、掠夺【不论他们用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甚至使得国家机器成为了奴役百姓大众的工具。

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台湾社会与中国大陆社会的鲜明对比，以斩钉截铁的历史事实，证明了上述论点。【而台湾的民主制度，正是得益于西方文明体系的保护、促进、督促、甚至压力，才得以发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宋美龄家族

宋氏家族在1949年以前、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中，具有着重要影响地位。其中的成员，不仅与近现代中国历史中许多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也非常具有代表性地显明了一些中国人（尤其是上层社会精英阶层）生命中的一些特点。

本书前文已经回顾了宋庆龄的生平。这里我们继续回顾宋美龄、宋嘉树（宋美龄父亲）、宋子文（宋美龄兄弟）、宋霭龄（宋美龄大姐）、倪桂珍（宋美龄母亲）等人的生平。

【以下引述维基百科相关文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5%98%89%E6%BE%8D

宋嘉澍（1861年10月17日－1918年5月4日），字耀如，另有洋名查理（Charles），广东省海南岛文昌人，本姓韩，过继宋姓，晚清传教士、富商及革命家，鼎力支持辛亥革命的大金主；民国著名的宋氏家族的家祖，子女有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

生平

1863年2月或1861年10月17日，宋嘉澍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古路园村（现文

昌市昌洒镇宋氏祖居），原名韩教准，乳名阿虎，家中并有一兄韩政准及一弟韩致准。其生父韩鸿翼是一位崇尚儒家哲学的商人，为人宽厚，热心公益事业，因经营慈善事业而耗尽家财，导致家道中落。宋嘉澍是北宋三朝宰相韩琦的二十九代孙，韩琦的六世孙南宋廉州太守韩显卿举家迁至海南，为海南韩氏始祖。

1875年，在逼切的家庭经济压力之下，韩鸿翼将当时12岁的韩教准过继给富有但无嗣的宋姓舅父，随其姓宋，改名嘉澍，并远赴美洲古巴。养父对他关怀备至，为他聘请了一位英语教师，宋嘉澍在学习英语的同时，通晓美国革命史的英语教师也教导了林肯等人的民主革命思想，宋嘉澍因此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够发起推翻腐败满清的民主革命。

1877年，宋嘉澍前往美国波士顿，在丝茶店当学徒。期间，结识了一些在美国留学的好朋友，他们纷纷劝宋嘉澍去学校读书。由于养父坚决反对，宋嘉澍找机会偷偷地跑进停泊在波士顿港口的一艘政府缉私船上，也许是船长佩服他的胆量，或是喜欢他追求独立创业、追求自由的勇气，船长不但没有处罚他，还热情地帮助他，让他在船上做杂役。之后，宋嘉澍随船长到了美国南方的北卡罗来纳州，结识了当地教堂的牧师。

1880年11月7日，宋嘉澍接受了基督洗礼，领受教名查理•钟斯•宋（Charles Jones Soong），人们习惯称之宋查理。

1881年4月，宋嘉澍被穆尔上校与李考德牧师送往北卡州三一学院（现在杜克大学前身）读书，由美国南方首富兼杜克大学创办人之一的朱利安•卡尔 支付学费。

1882年，宋嘉澍进入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神学院，于1885年底，完成了神学学位。

1886年1月，宋嘉澍返回中国上海，任美南监理会传道，在苏州、上海等地传教，并于教会学校执教，胡适即为其学生之一。1887年，宋嘉澍在上海创办美华印书馆，印行中文本《圣经》。1887年夏，宋嘉澍与倪桂珍结婚。婚后两人育有三子三女。1892年，宋嘉澍辞去传教士工作，参与创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1894年，宋嘉澍结识孙中山、陆皓东等人，倾家捐输钜万，几次濒临破产的地步。宋嘉澍在传教同时，暗中印行革命刊物及小册子。中华民国成立后，宋嘉澍曾随孙中山访问日本，二次革命后，由于家里在夜间遭到枪击，宋嘉澍全家避居日本。

1915年10月26日，女儿宋庆龄离家私奔，在东京由日本律师和田瑞作证，同孙中山结婚。宋闻之大怒，不能谅解，宋嘉澍夫妇追到日本，据日本人士回忆：宋嘉澍在大门口叫喊："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孙中山出来后，宋突然往地上一跪，磕了几个头说："我不懂事的女儿就拜托你了，请千万多关照！"之后转头就走。

逝世

1918年5月3日，宋嘉澍因患肾病不治，在上海逝世，年仅54岁。

家族

宋嘉澍与妻子倪桂珍育有子女六人，依次为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其女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三人，及其子宋子文均是中国近现代著名人物，为当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一。

1985年9月12日，蒋经国函电宋美龄：

"奉读母亲亲笔谕示及耀如公早年成绩纪录信札等件资料已十分珍贵而出之罗斯福总统转致文舅不平凡之来历尤令人倍感惊喜难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7%BE%8E%E9%BD%A1

宋美龄（1898年3月4日－2003年10月24日），籍贯海南文昌市，冠夫姓尊称为蒋宋美龄女士或蒋夫人，中华民国第一夫人，中国国民党总裁及第一至五届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的第二任妻子，前任国民党主席及第六、七任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的继母；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议主席团主席、中国国民党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指导会议指导长、天主教辅仁大学董

事长及荣誉董事长，同时亦为国立彰化师范大学、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与振兴医院的创办人，对近代中国历史及中华民国与美国关系影响深远。

早年经历

童年在中国

1898年3月4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二日），宋美龄出生于大清国上海浦东川沙镇（内史第），位在浦东川沙镇兰芬堂七十四弄一号。宋美龄籍贯海南，父亲宋嘉澍即在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文昌市昌洒镇）人，曾担任美南监理会（今卫理公会）牧师，后经营出版业，以印刷和批发《圣经》致富。母亲倪桂珍，她的父亲倪韫山是基督教圣公会上海伦敦会天安堂牧师，为上海名门望族。宋美龄在六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四，两位姐姐宋霭龄、宋庆龄分别比她年长9岁和5岁，哥哥宋子文比她年长4岁，两位弟弟宋子良、宋子安则分别比她年幼1岁和8岁。1903年，宋美龄就读上海三一堂女塾。

青年在美国就学（10岁-19岁）

1908年，宋美龄与宋庆龄同赴美国留学，先后在新泽西州萨米特镇以及乔治亚州梅肯皮德蒙特学院、卫斯理安学院就读。1912年，进入马萨诸塞州卫斯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学成回国

1917年，回到中国。1918年，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担任英语教师。她积极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活动，并且是全国电影审查委员会成员。后任上海工部局儿童劳工工作委员会秘书。她长得漂亮，有教养，有钱盛装打扮。1922年，蒋中正与宋美龄在上海见面。宋美龄和蒋中正初次见面是在宋庆龄家里，当时孙中山一家正在广州；蒋似乎对宋美龄一见倾心。蒋便追求宋。蒋中正曾赞成孙同宋庆龄结婚，见到宋美龄后不久，蒋就自己打算同宋美龄结婚之心事，向孙征求意见；孙认为宋美龄接受之可能性小，并且力劝蒋不要操之过急，使蒋大为吃惊。由于蒋已婚，并信仰佛教，倪桂珍

强烈反对他们交往，要蒋先与所有妻子、侍妾解除婚约，才答应他们交往。蒋向宋美龄求婚时，宋家反对，因为蒋中正不是基督徒；宋家坚持，蒋要娶宋美龄就必须信基督教，蒋答应与宋美龄结婚后认真研读《圣经》，宋家同意。1926年7月9日，蒋就任中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

中年前期（29－52岁）经历

与蒋中正结婚（29岁）

1927年9月28日、29日、30日，蒋一连三天在《申报》刊登“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声明与毛福梅、姚冶诚、陈洁如等妻妾脱离关系。1927年4月12日，蒋进驻上海，向宋求婚。12月1日，蒋与宋于上海结婚。结婚仪式先后于上海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69号宋家和静安寺路戈登路口大华饭店举行。其时有报纸在标题上一语双关称蒋宋联姻为“（蒋）中（正）（宋）美（龄）合作”。婚礼分两次进行：先在宋宅会客厅举行西式婚礼，后在戈登路大华饭店出席中式婚礼。

1930年，在宋促使下，蒋在上海虹口昆山路景林堂正式接受洗礼，成为新教基督徒。1931年10月26日，《时代杂志》美国版封面人物为蒋宋夫妇。

1934年，国民政府在蒋宋主导下开始推行“新生活运动”，宣传新政内容；秋天，随蒋作1个月西北考察。

1936年11月9日，宋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会长，为了组建中国空军，她在向外国采购飞机、聘请外国顾问等问题上，发挥了自己的外交才能。此外，她还把许多时间花在有关航空理论和飞机设计的学习上。日后被空军誉为“中国空军之母”，对中国空军现代化贡献重大。1937年，蒋授权宋掌握空军；宋聘请陈纳德将军整顿中国空军。

西安事变（38岁）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杨虎城与张学良在西安扣押蒋，进行“兵谏”，发生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当时，宋正在上海养病，急忙赶返南京与政府人员商议解救办法，宋竭力主张以和平方法营救蒋。12月15日，她与宋子文飞

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最后顺利达成协议。12月25日下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宋等人飞离西安。

抗战时期和中美关系

蒋介石在国家大事上最亲信宋美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曾几次作为蒋个人使者到美国；她的魅力和风度使她成为国际名人，而且往往能把蒋比较生硬之形象冲淡一些。

组织妇女工厂和战时学校

1938年，宋出版《战争与和平通讯》；组织妇女工厂和战时学校，为全国妇运最高指导机关。美国《时代周刊》把蒋宋作为1938年第一期封面人物，评选他俩为1937年"时代年度风云人物"，并指出"1937年，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国家是中国。在陆地，在海洋，在天空，中国人同入侵的日本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尤其是在上海，中国军队连续13周阻止了日本人的前进。在这个关键时刻，领导这个国家的是一位最能干的领导人蒋中正和他的杰出夫人宋美龄。"

战时，她为国军缝制军服以及在医院探望国军照片，成功激起许多中国人民的爱国心。

1941年12月7日，日本空袭珍珠港，美国加入太平洋战争。美国从此对中国艰苦抗战的英勇表现产生由衷敬意。他们把这种敬意集中表达在对宋美龄的欢迎上。由于宋美龄在美国接受教育的背景，美国人觉得这是自己国家培养出来的高雅人才，油然而生出一种自豪感。因此，美国一时掀起"宋美龄热"。

1942年，宋秘密离开重庆，飞往纽约治病，访问母校卫斯理学院；暗中谋求美国援助。美国为了更支持和同情中国抗日战争，1943年2月，宋作为蒋之特使访问美国，成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罗斯福贵宾，三度访问白宫，在白宫住了11天。她仪态高雅、言谈适度，赢得罗斯福夫妇敬佩。

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在国会发表演说，她是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中国人，也是继荷兰女王之后，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者的第二位女性。

宋美龄演说呼吁美国各界支持中国抗战，内容劝说美国将注意力从欧洲战场转移到日本对中国侵略，为中国赢得美国同情。

随后，宋又去美国各地发表演说，传播媒介大量报导她的行涵，许多杂志以她的肖像作为封面。她所到之处，人们鼓掌欢呼，慷慨捐款，支援中国抗日战争，总计超过25万人听过她演说。美国国会更顺势废除实行已有60年恶名昭彰的“排华法案”，提高美国华人地位。

《时代杂志》封面人物

3月1日，宋美龄首次单独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封面人物，这也是她第三次成为《时代杂志》封面人物，前两次是和蒋中正共同被选为封面人物，其中有一次是1937年和蒋中正共同被选为年度风云人物。

接着，宋美龄又访问加拿大，扩大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

出席开罗会议

1943年11月，蒋宋出席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宋美龄穿梭于蒋中正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之间，充分显示外交才干。由于蒋不会说英文，居中翻译协调的工作全部由宋负责，罗斯福事后说：“我对蒋先生的印象十分模糊，现在想想，我对蒋先生的认识，几乎全部是透过他的夫人。”事后，丘吉尔对罗斯福说：“这位中国女人可不是弱者”！

国共内战在华时期

1945年9月5日，宋美龄自美国返中国抵达重庆。9月26日，宋美龄受任为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1946年，为调停国共冲突，美国派遣特使马歇尔抵华，接受蒋中正夫妇招待，由于接受西方教育，宋与马歇尔在各方面交流反应，引起民情不同的中国人及部分美国人批评。7月14日，宋美龄与蒋中正由南京飞往庐山牯岭避暑。10月21日，宋美龄与蒋中正由南京飞抵台湾，国民政府总务局长陈希曾、军务局长俞济时、秘书沈昌焕随行。此为蒋夫妇首次造访该地，参加“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活动。

1947年4月23日，宋美龄受聘为世界妇女公民协会名誉主席。4月26日，国际母亲大会在巴黎揭幕，宋美龄任荣誉主席。

战后，宋美龄姐夫孔家与宋家所形成的孔宋集团在政治默许下，在贸易特许权、金融等上下其手，被许多近代史研究者认为是导致当时中国国民党形象败坏主因之一。

台湾公视“世纪宋美龄”第二集“奋起与挫败”中，曾描述宋美龄亲人孔宋家族以权势谋私利。1948年10月1日，上海发生“扬子公司案”，该公司经理孔令侃（孔祥熙之子）囤积大批汽车、钢铁、棉纱，蒋经国迫于舆论之压力而将其拘留；是日，宋美龄乘“美龄号”专机自南京飞赴上海亲自为之调解。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打到宋美龄姨甥孔令侃，但在宋干预下，蒋特地发一封电报给当时上海市长吴国桢处理此事，露出内心挣扎。

国共内战在美时期

1948年底，国民政府在国共内战一路失守，蒋争取美国对他再次支持。11月28日，宋美龄飞往美国，商洽美援。12月3日，会晤马歇尔，12月10日会晤杜鲁门。蒋同意宋美龄直接寻求美国政府援助，且提示与美方商谈时，可明白传达其个人进退之态度。然而被美国总统杜鲁门冷淡处理，在美国无能为力。12月26日，蒋函电宋美龄，告知政局恐即有变化，希望其尽速返国：“其关系在桂派而不在共匪也”。12月27日，宋美龄函电蒋经国，称蒋介石努力党国多年艰苦，决不可轻言辞职，不负责任；再者，奉化绝非安全居住之所，免得受人暗算，广东、台湾似较相宜，请转告。12月28日，宋美龄函电蒋经国，称蒋介石在南京如不能维持，则须赴台湾或广州，决不能回乡；孙中山革命数次失败而后竟得成功，我等为四万万人民及将来国民计算，只能抵抗到底，不惜任何牺牲；如下野回乡，对内不能行使政权，对外不能代表国家，无法继续革命，而对不起孙中山，故宋美龄绝对反对，现在只能决心克服困难。

1949年1月21日，宋美龄函电蒋经国，称蒋介石此次返乡，对其之康健与安全甚为忧虑，祇要蒋介石之安全能保全，他们仍可继续为国家努力奋斗；希望蒋经国即日赴乡婉劝蒋介石务必同来加拿大暂住，宋当与他们在加拿大晤面会商一切，盼望速电覆宋。3月24日，宋美龄派人带消息给蒋经国，谓“美国对华政策有转变之趋向”。

中年后期经历

1950年1月13日，宋美龄自美国返国。基于宗教信仰与认知，宋反对共产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支持“反共复国”，并创办中华妇女反共联合会、华兴育幼院等。

赴美国就医

1952年8月，宋赴美国就医。1953年10月，宋美龄受任为中央妇女工作会指导长。1954年10月，宋美龄自美国返回台湾。

与蒋介石居住台湾

1964年10月13日，宋美龄为推动高关怀青少年的辅导与教育工作，于彰化市设立台湾省立彰化进德实验中学，后来持续演变成现今的国立彰化师范大学；1965年8月，宋美龄飞美国访问。1967年，担任在台复校的天主教辅仁大学董事长。1970年起，中华民国与美国关系渐渐发生变化，1971年10月25日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文，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而在联合国组织中唯一合法代表中国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74年3月，蒋中正与宋美龄设宴饯别即将卸任离华美国大使马康卫夫妇。

1975年4月5日，蒋中正以突发性心脏病，于下午11时50分在台北士林官邸逝世，享年89岁。中华民国政府为其举行国葬。4月29日，蒋经国午饭后，奉接宋美龄手谕一封：“经国：今天又届你的生辰，往年我都为你设席与人共聚，一享天伦之乐。此次自父亲撒手离你我之后，我们再也无此兴致作任何怡宴之举。今晨我特别起得早，为你祷告，祈求上帝给你智慧健康和毅力，并特别赐福予你，这是我今年以此为寿。母字。”同年，蒋经国接掌中国国民党主席，接掌党政军大权。

晚年经历

孀居美国

1975年9月16日，宋搭乘中美号专机赴美，行前发表〈书勉全体国人〉，“近数年来，余迭遭家人丧故，先是姐夫庸之兄去世，子安弟、子文兄相继溘逝，前年霭龄大姐在美病笃，其时总统多感不适，致迟迟未行，迨赶往则姊已弥留，无从诀别，手足之情，无可补赎，遗憾良深，国难家忧，接

踵而至；两年前，余亦积渐染疾，但不遑自顾，盖因总统身体违和，医护恐稍有怠忽，衷心时刻不宁。……如是几近两年，不意终于舍我而去，而余本身在长期强撑坚忍、勉抑悲痛之余，及今顿感身心俱乏，憬觉确已罹疾，亟需医理。……当兹小别，特抒所怀，敬致余由衷的感谢。……”

1979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宋在美国仍坚持反共复国。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去世，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大使馆曾向宋美龄发讣闻，希望她能到北京祭拜二姊，宋拒绝请求。最终，宋美龄并未出席丧礼。

1982年7月，中共统战部长廖承志致信蒋经国，呼吁两岸展开和谈，“相逢一笑泯恩仇”。8月17日，宋在决策幕僚协助下，透过中央社发表“给廖承志公开函”。

1984年2月16日，为劝告邓颖超信服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曾发表“致邓颖超公开函”。

1985年1月29日，宋美龄密电蒋经国，建议蒋以中华民国政府名义，针对《中英联合声明》发布一单边性郑重声明，在1997后允许英国托管香港三十年。蒋经国并未采纳此建议。

短暂回流

1986年，宋美龄返台，参与出席蒋公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上台发言说出“我只希望，让三民主义的光辉，普照大陆”。并发表“我将再起”演说：“二十九年（1940年）战况正趋激烈，而国际局势益见阴霾之时，美龄亦不时振笔为文，以期鼓舞纯正的爱国思想，并建立坚强无比的信心，这些文字，经合刊成书，题名为〈我将再起〉。先总统还特别写了一篇序文，肯定‘中国将必从它的许多艰难困苦中，崛起而为一强大的国家。’但也同时提醒国人：‘只有拿出坚忍不拔的勇气向前迈进，我们才能使一个新的中国屹立于世。’”引起台北政坛议论。

蒋经国过世

1988年，蒋经国过世，享年78岁。副总统李登辉继任总统，中国国民党拟

推李登辉代理党主席之前，宋致函当时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表达异议，认为此事不宜过急。7月，中国国民党十三全党代表大会通过李登辉总统为党主席。她在台湾公开政治场合最后一次发表演说，蒋家在台湾四十年统治亦正式结束。

重回美国及晚年

1991年9月21日，宋美龄搭中华航空波音747SP专机再次赴美国长期休养，她从官邸带走大批行李共100多箱。由于赴美时是持“元首通行证”离境，曾引起批评，中华民国外交部于1994年9月7日“主动说明行政院已‘专案核准’要给宋一本“外交护照”；承认过去让宋持用“元首通行证”免验出关不正确。赴美后，宋美龄由外甥女孔令仪照顾，深居简出，几乎不接受外人拜访。

1994年9月10日清晨，宋美龄从美国纽约返台探视她病危的外甥女孔令伟，蒋孝勇亦陪同回台。9月19日回美国，此后不再回过台湾，长居纽约。

1995年7月26日，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宋接受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鲍伯·杜尔及参议员赛蒙，分别代表共和党及民主党邀请，出席美国国会为她举行之盛大致敬会，以表彰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中美关系所做贡献。

2000年1月1日，纽约世界日报艺廊举办“蒋夫人暨书画名家跨世纪千禧联展”，蒋夫人亲自前往赏画。

2001年10月23日，张学良葬礼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举行，蒋夫人派辜严倬云代表致祭。2002年3月25日，在纽约寓所欢度104岁生日，接见程建人夫妇等贺客。孔令仪透露，已在纽约上州芬克里芙墓园备好蒋夫人室内墓地，遗体不回台湾。2003年3月14日，蒋夫人105岁生日，驻美代表程建人代表陈水扁总统到纽约寓所祝寿，夫人因感冒甫出院，未接见访客。

在美国纽约逝世（105岁）

2003年10月23日美国东岸时间晚上11时17分，宋美龄于纽约曼哈顿寓所逝世，享嵩寿105岁，葬于芬克里夫墓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参战国领袖及夫人中最长寿者。

家族

她的两位姐夫分别是孔祥熙和孙中山。其曾孙蒋友柏于长女出生甫满月，便与其妻女赴美与宋美龄女士聚会，并由其命名为“得曦”（是时家族字辈排行至“得”），且与其拍照。蒋友柏回国后曾回忆曾祖母时说到见其玄孙女时非常欢喜。后其长子蒋得勇出生前，宋女士已去世，来不及让曾祖母见到蒋得勇一面，感到非常惋惜。

身后各界反应

中华民国

全国社会各界均表达对蒋夫人过世感到难过，并高度肯定其对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的贡献。许多民众主动前往设在台湾各处的简易灵堂，向这位“永远的第一夫人”致敬。

当时在中正纪念堂、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振兴医院均设置灵堂，后两处2003年10月25日有数百人前往吊唁。

时任副总统吕秀莲前往中正纪念堂的灵堂前致悼时表示，蒋宋美龄是“旧时代的新女性”，“希望台湾人民在缅怀蒋宋美龄的同时，也应学习她的时代精神，也就是女性对于国家兴亡也有同样的责任。”

中华民国政府由时任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颁发褒扬令：

故总统蒋中正夫人宋美龄女士，资赋颖秀，维四岳之通灵；才慧双修，随百花而诞降。早岁负笈游美，卒业麻州卫斯理女子学院，学贯中西，超群拔萃；相夫弼政，沥胆披肝，历经开国、靖难、剿共、抗战、戡乱等诸役，尤以西安事变，蹈危履险，深入虎穴，厥绩至伟。抗日战争期间，周旋坛坫，应邀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演讲，蜚声海甸，巩固中美邦谊，终至胜利。出席开罗会议，确保我国领土完整，盛誉扬辉，贡献至钜。为我国空军建军，展布新猷；创办华兴育幼院，施爱遗孤；成立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恢弘妇权；筹设振兴复健医学中心，泽惠群民。综其生平，跨历三世纪，惠爱在朝野，简册留芬，允垂世范。上寿归真，殊深轸悼，应予明令褒扬，以示政府崇念懿德之至意。

总　　　统　陈水扁

行政院院长　游锡堃

此外，中华民国政府致送国旗覆棺。由于家属认为宋美龄已经入殓，致送之国旗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致送之党旗到纽约后，家族并未举行覆棺仪式。宋美龄与宋子文、宋蔼龄、孔祥熙都安葬于纽约芬克里夫墓园。

在纽约的宋美龄告别式上，可以说是蒋家多年来的大集合，除了身体健康不佳的蒋方良没能前去外。包括蒋孝文遗孀徐乃锦、蒋孝章俞扬和夫妇、蒋孝武前妻汪长诗、遗孀蔡惠媚、蒋孝勇遗孀方智怡、蒋纬国遗孀丘如雪，子蒋孝刚以及第四代的蒋友梅、蒋友兰、蒋友松、蒋友柏、蒋友常、蒋友青等皆出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大陆民间和官方均肯定她在抗日战争时对中国的巨大贡献。

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报道宋美龄逝世时，赞扬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到美国游说联合对抗日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贾庆林、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何鲁丽、宋庆龄基金会都向宋美龄亲属发去唁电，对宋美龄女士逝世表示哀悼。贾庆林唁电全文如下：

宋美龄女士亲属：

惊悉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宋美龄女士逝世，我谨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表示深切哀悼，并向你们表示诚挚慰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 贾庆林

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美国

时任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表示：“蒋夫人永远是全体美国人民的亲密朋友，为她的过世感到十分难过。”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5%AD%90%E6%96%87

宋子文（英语：Tse-vung Soong，缩写为T. V. Soong；1894年12月4日－1971年4月26日），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人，生于上海。民国年间著名的宋氏家族成员之一。父亲宋嘉澍是美南监理会（今卫理公会）的牧师及富商，孙中山革命支持者。与大姐宋霭龄的丈夫孔祥熙，二姐宋庆龄的丈夫孙中山，弟弟宋子良，妹妹宋美龄的丈夫蒋中正关系都很密切。1927年起，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长、中国银行董事长、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外交部长、驻美国特使、广东省政府主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49年去法国，后长期住在美国。

早年经历

宋子文出生于上海市同仁医院。早年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后到美国留学，1915年于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后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于纽约花旗银行见习。1917年留美归国，在盛恩颐（盛宣怀之子）的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任秘书。后赴广东。1923年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税务局长。同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央银行，宋子文负责筹备条例章程。1924年8月，任广州中央银行董事、副行长。

财政部长

1925年，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长、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为创办黄埔军校、组建军队、维持广州国民政府运作所需经费起到了很大作用。1924年，广州政府岁入800万大洋，1926年时增加至8000万银元。

1927年3月，奉武汉国民政府之命赴上海去劝说蒋介石不要分裂，结果被蒋反正，积极支持蒋介石清党反共，劝说母亲接受蒋介石为女婿。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由易纨士（Arthur Henry Francis Edwardes）代理。财政部长宋子文对易非常不满。他训令易纨士，“自本年（1928年）一月份起，将逐月收支数目，及还本付息数，每项汇兑率并结存各款数，存何银行，分别列表造册具报，以凭稽核”。10月25日，国民政

府制定《中央银行条例》19条，规定“中央银行为特许国家银行，在国内为最高之金融机关，由国家集资经营之”，并设筹备处于上海。12月1日，其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为妻。

1928年1月，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任外交、预算、首都建设、黄河水利、国防编遣等委员。财政部得知芜湖海关英籍税务司贾士（Gards）违背命令，擅放盐斤，并借故恫吓封关，宋认为是“蔑视政府，滥用职权”，立即决定撤换贾士，另委西班牙籍马悌（Macti）继任。另外训令其他各关税务司：“如有不遵政府命令，越权渎职情事，本部职权所在，决当严予惩处，不稍宽纵。”宋决定在召开全财政会议之前，先行召开全国经济会议，企图通过两会来确立财政体制和制定各项财政经济政策。6月下旬，全国经济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主要目的是要研究解决国家财政困难之措施与计划。因此，宋子文向会议提出财政部之方案，包括限制军费开支、编制预算、建立强有力中央银行、取消银两制、建立中央造币厂和裁撤厘金等。会议对宋之方案原则上赞成。宋子文提出之财政部理财计划，通过全国经济会议，取得江浙资产阶级支持。财政部长宋子文认为：中国极为紊乱的货币制度必须加以整理，其整理目标，应从开铸统一的国币，严禁各种劣币流通方面着手。他提出应该统一“各省参差之币制”，整理“滥币”。会议通过关于整理纸币与硬币、废两用元之提案。之后召开全国财政会议，通过改革币制方针，包括“实行改两为元”、“施行金汇兑本位办法”。

1928年6、7月间，国民政府宣布与各国本平等互惠原则重订新约，此后一年间，与各国所改订之新约以通商条约和关税自主条约为主。至1930年5月，宋子文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签订新关税条约，收回关税自主权；并实行税收改革。

1928年7月上旬，宋在南京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主要是全国各省市财政厅长及负责执行财政计划职责之国家与地方官员参加。宋直接提出解决财政困难之方案，归结为两点：一为限制军费开支，二为编制全国预算。7月25日，宋子文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在北京签订《中美关税新约》，美国第一个同意中国关税自主。

1928年8月，中国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宋向全会提出《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理税收并实行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树立财政基础而利民生建议案》，并说明全国经济、财政两会议所通过之计划。五中全会认为有迅速设立预算委员会之必要，决议应交国民政府即行组织。1931年9月24日，《预算法》颁布，预算体制确立。

1928年10月，宣告关税自主。10月8日，国民政府修订《中央银行条例》为20条，由国民政府拨款2,000万元。宋子文决定以原上海造币厂为基础，改建为中央造币厂，筹办开铸统一国币。对其余造币厂，宋则令严加整理，不具备条件者则予以取消。实际上，宋对硬币整理工作未及开展。他根本主张是对现货币制度彻底改革。

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成立，总行设于上海。宋子文任总裁。是年秋天，与张乐怡（1907年生）结婚。

1928年，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发行内债15000万元。

1929年1月，任命梅乐和（Maze）为海关总税务司，取代易纨士。1929年，宋发行内债19800万元，1930年发行17400万元。内债主要用于军政开支。

1931年7月23日，宋子文在上海北火车站遇刺脱险。12月，蒋中正下野，宋子文辞职。

1932年1月，复任行政院副院长，财长。8月，汪精卫出国，代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在上海开办新造币厂。

直到1933年，财政部已发行公债140000万多元。这加深部长宋子文与上海金融家之矛盾，吃力于筹划公债还本付息和开发财源，因此与蒋介石在军费及预算问题上激烈冲突，蒋只好让孔祥熙接替宋子文。

1933年3月1日，中央造币厂正式开铸统一标准银元。同日，财政部长宋子文规定3月10日起通用银元。4月，汪精卫回国，蒋免去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职务和中央银行总裁职务，让宋子文以财长及行政院副院长身份出访美欧各国，前往美国华盛顿参加世界经济讨论会。5月8日，宋子文与刚刚上任不久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会谈，罗斯福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援助，以购买美国农产品，提高银价，增强中国偿还能力。6月4日，宋子文向南京通

报，美国财政善后公司同意贷款中国5000万美元，支付形式是提供贷款价值五分之四的棉花，其余为小麦，由中国国家统税担保，5年内还清，即“棉麦大借款”，引发社会质疑。宋子文回到南京，发现南京政府将该借款部分挪用，用于剿共，与蒋发生激烈冲突，蒋甚至打了宋子文一耳光。宋子文于是辞去行政院副院长，财长职务，10月27日见报公布。孔祥熙与蒋介石、宋子文在武汉开会密商，决定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增资改组，提高中央银行地位。

中国银行董事长

1935年3月23日，孔突然宣布，政府将要对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实行管制，要求两行增发股票，要把两行之控制权交给政府。在向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强行增资同时，孔宣布由宋子文接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和总经理（后来为拉拢江浙资本集团，宋子文只任董事长，总经理由江浙资本集团之宋汉章担任）。国民政府通过两次改组，只用几张公债预约券，便把历史悠久的中国银行变为国民政府资本的大银行。

宋子文长时期主理的金融财务，有人认为他是代表中国国民党贪污腐败的表征之一。宋子文自负傲慢，与孔祥熙相处不来，一般人都认为宋的财经观念优于孔，孔只是山西票号出身，对于现代财经没太大经纬，但孔的处世态度则较为圆滑，为蒋中正所喜。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飞西安谈判。1937年，抗战爆发后，联合协调各银行应付财政。1940年，出使美国寻求援助，获得租借物资2,500万美元。

1941年12月，任外交部长，长驻美国。1942年，与美国签署租借协定，获得美援超过8亿美元。同年，与英美等国就取消外国在华等特权签署新约。

代行政院院长

1943年12月23日，吴国桢介绍陈芷町代拟之“悔过书”呈蒋：“两月以来，独居深念，咎戾诚多，痛悔何及。窃之于钀座，在义虽为僚属，而恩实逾骨肉。不日所以兢兢自励者，惟知效忠钧座，以求在革命大业中，略尽涓埃之报，而抗战以后，内心更加兴奋，无论在国内国，惟知“埋头苦干”……文无论处何地位，所以效忠图报钧座之志，始终不渝，必与青天白日同其

贞恒。惶悚上陈，伏祈垂察。”1944年12月，任代行政院院长，兼任外交部长。孔祥熙取代宋子文成为中国银行董事长。当年宋子文代行政院长时，胡适日记写道：“报纸登出宋子文代行政院长职务。如此自私自利的小人，任此大事，怎么得了！”

宋子文内阁

1945年7月，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宋子文是四位主席之一。联合国大会成立时为中国首席代表。同年赴苏联同斯大林会谈，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8月，日本投降，宋子文奉命出使华盛顿，为争取美国全面援助游说白宫和国会。美国当时恐惧苏联在中国东北加强地位，积极回应宋子文要求。宋子文要求为国军提供装备，加以训练，向中国派遣军事使团，以及兴建兵工厂。结果杜鲁门答应向中国派出一个军事使团，并提供全面军事援助。宋子文可说不虚此行。1946年3月，出现抢购黄金风潮。

1947年1月9日，云南省参议会电行政院长宋子文，呼吁自今年起停止田赋征实。1月15日，宋子文抵达上海，召集贝祖贻、钱昌照、秦汾、林凤苞、束云章、杨锡仁等会议，商促进输出争取外汇，在最高经济委员会下，成立输出推广委员会，宋子任主委，王云五、俞鸿钧、俞大维、周诒春、贝祖贻、钱昌照等为委员。

1月30日，行政院颁发“保障人权”令。

2月6日，宋子文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提交备忘录，说明需要美国财政上之援助，请贷款1.5亿美金，购买棉、麦。

2月8日，蒋召见宋子文，商讨上海金钞物价暴涨问题。

2月11日，蒋召集宋子文及政府金融经济要员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应付金价物价飞涨、币值无能为力，纷难起责。

2月12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召集财政部部长俞鸿钧、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商讨制止金潮对策，美籍顾问数人亦与会。

2月13日，蒋与宋子文及美国顾问研商经济对策，宋主张继续抛售黄金，蒋反对；最后决定停抛黄金、管制物价、取缔投机、禁用外钞等。

2月14日，立法院举行例会，楼桐荪、简贯三抨击政府对经济危机束手无

策，要求宋子文到立法院接受质询；陈志平则要求宋子文辞职以谢国人。
2月16日，宋子文与王云五、俞鸿钧等到上海处理管制金融物价事宜。
2月17日，行政院在上海召开最高经济会议，由院长宋子文主持；参政院驻院委员会通过决议，称：此次黄金风潮，行政院长及有关当局未能预为防止，贻误国计民生至巨，应请国防最高委员会查明责任所属，认真处分。
3月1日，蒋主持举行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决议：行政院长宋子文辞职照准；蒋兼任行政院长，张群任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辞职后，在立法院报告财政金融措施；对于立法委员质询，答以自有新院长答复，言毕扬长而去。
3月8日，国民政府免去兼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宋子文职，特派蒋兼任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3月13日，四行联合总处副主席宋子文辞职，财政部长俞鸿钧继任。
3月，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
第二次国共内战
1947年9月，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广州行营主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11月25日，广州行辕主任宋子文主持召开粤桂绥靖会议，行辕副主任黄镇球、邓龙光、缪培南，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及高级将领参加会议，研讨加强两省保境实力与两省边境联防“剿匪”及与地方团队配合协同“剿匪”等。
1948年12月30日，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到南京。
迁居美国
1949年1月21日，蒋中正下野，准宋子文辞本兼各职，移居香港。
5月16日，宋子文对立法院所通过“征借”一案向记者谈称：“那种建议，正足以表示那班人员们的脑筋如何，因为据余所知，目前中国政府和私人存在美国的外汇资产总金额不过五亿美元，他们竟要余和孔、张两氏共同捐出十亿美元，岂非捕风捉影。”；下午宋子文偕夫人离开香港，道经曼谷赴巴黎。
5月18日，行政院第六十次政务会议通过立法院关于向宋子文、孔祥熙、张嘉璈三人征借之紧急动议。

6月9日，宋子文由巴黎到美国纽约，此后定居美国。

晚年经历

1963年2月，宋子文接受蒋介石邀请来台，蒋还对宋说："我这一辈子跟你做的生意，都是赔本儿生意！"两人仍旧话不投机，宋在台湾小住几天便返美。宋子文晚年生活低调平淡，每天到纽约中央公园散步，外貌亦与早年判若两人。

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旧金山与友人共餐之时，不慎被鸡骨噎死，终年77岁。蒋介石送上匾额〈勋猷永念〉，尼克森发唁电，宋庆龄和宋美龄皆未出席葬礼仪式。

评价

美国政治作家默尔・米勒在未经杜鲁门授权的杜鲁门传中宣称，杜鲁门曾大骂蒋、宋、孔家族侵吞美援："他们都是贼，个个都他妈的是贼（They're all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而且将这笔钱投资在巴西的圣保罗，以及就在这里，纽约的房地产"。

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撰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抨击宋子文黄金政策"彻底失败"，工业政策"毫无常识"，官商不分，"公私不分"，办事只依靠"三几个秘书"与"亲信"，为了"中国将之命运"，"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其后，傅又在2月22日《世纪评论》上撰文《宋子文的失败》、3月1日《观察》上撰文《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继续猛烈抨击宋子文。 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此文被许多人拿来当成宋子文贪污的证据和政治斗争的依据，但傅斯年主要是在批评宋子文错误混乱的财经政策和恶劣傲慢的用人处事治理作风，抨击宋子文搞出不少麻烦灾难和不好"流言"，应该离职和调查，并没有直接控指证实宋子文贪污腐败，重点是在宋子文的官

场人际关系恶劣和自大误事。根据宋子文去世后的遗产分割书，他名下的非固定资产为100万美元，不动产价值约400万美元。就算是贪污，可能贪污的并不多。有学者认为宋子文贪污钜额公帑成为巨富的说法更多是源于政治原因的诽谤。

胡适对宋子文说“子文，你有不少长处，只没有耐心！”。张发奎曾回忆宋子文习惯享受，在飞机上他自己带了一张帆布床放在机舱中间，当他的随员用跪姿呈给他一封电报时，他躺在帆布床上，用脚趾头接电报。类似例子不胜枚举，李璜说他这种“大少爷”的生活习惯，“在天空中仍不能改”。也有人认为宋子文的外交手腕远比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高明，胡适的“苦撑待变”政策，对争取美国贷款援助于事无补，宋子文一开始便组织游说团，即 ChinaLobby，很快就争取美国一亿贷款，但其手法近乎不择手段，“功利心急，忮求太甚”，使美国国务院、军部等单位不胜其扰，造成中美关系不佳，1942年美国特使劳克林·居里访华时就向蒋介石告状，“一半来自宋部长与军部间之摩擦”。蒋介石致胡适和宋子文两人的电文，宋也不给胡适看，自己单独回复，让胡适心生不满，这也成为抗战胜利后被北大派口诛笔伐的远因。

宋子文与张学良是好友，西安事变时，宋子文出面调解有功。张学良晚年评价宋子文说：“宋子文那人的能力并不高，他管财政并不好……宋子文是洋派的，他在财政上并不成功。……他原来是一个汇丰银行的小职员，他并不知道中国财政是怎么回事……他这个用人法子完全是外国式的，并不是咱们中国的，他没人缘，孔（孔祥熙）有人缘。”蒋介石在日记中也经常骂宋子文狂妄自大。1948年蒋介石的政权亟亟可危，日记中明白表示任用宋子文“追悔莫及”。

1971年4月27日，《中央日报》对宋子文一生作出评价：“宋故院长热爱国家，于北伐、抗战与戡乱诸役，或主持政府度支，或折冲于国际垓坫，或

主持中央与地方政务，皆有重大贡献。”

吴景平认为，蒋介石在南京之所以能与武汉对峙，同时军事上与北洋军阀抗衡并最后得胜，宋子文功劳最为关键。

宋子文曾回到自己的祖籍海南文昌，被视为是完成父亲的遗愿。据说他归乡后把故乡特产海南四大名菜之一的文昌鸡带到广州给人品尝，从而令文昌鸡声名远播。此举颇受乡人赞许。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5%AE%8B%E9%9D%84%E9%BD%A1

宋霭龄（英语：Nancy Ai-Ling Soong，1889年7月15日－1973年10月19日），又作宋蔼龄，籍贯海南文昌县，生于江苏省苏州府昆山县（今位于上海市与江苏省苏州市境内）。孔祥熙之妻，宋庆龄、宋美龄的姐姐，是宋氏家族的核心人物。

生平

1889年7月15日，宋霭龄出生在江苏昆山，父亲宋嘉澍原是监理会的传教士，后来放弃传教工作经商；母亲为倪桂珍。父母亲育有三子三女，宋霭龄排行老大，其余子女顺序如下:次女宋庆龄、长子宋子文、三女宋美龄、次子宋子良、三子宋子安。

1904年5月28日，即14岁时抵达美国，进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读。1910年毕业后回国，任孙中山的秘书，同孙中山到全国各地勘察，参与制订营建20万里铁路的计划。“二次革命”失败后随父去日本，仍任孙中山秘书。

1914年，和孔祥熙在日本横滨结婚。次年回国，在山西经营家业，主持铭

贤学校事务。

1937年7月22日，在何香凝、宋庆龄等倡议下，联络宋霭龄、于凤至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呼吁妇女同胞共赴国难。抗日战争时期与妹庆龄、美龄共同参加抗日活动，参与支持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组织妇女指导委员会，创办全国儿童福利会，担任香港“伤兵之友协会”会长。

1947年移往美国定居。

1973年10月20日在纽约长老会医院因癌症病故，享寿84岁，安葬于纽约郊外风可立夫高级室内墓园（Ferncliff Cemetery）。

评价

徐家涵说：“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三个家族发生内部摩擦，闹得不可开交时，只有她这个大姐姐可以出面仲裁解决。她平日深居简出，不像宋美龄那样喜欢抛头露面。可是她的势力，直接可以影响国家大事，连蒋介石遇事也让她三分。”

蒋介石的侄孙蒋孝镇曾对军统头子戴笠说：“委座之病，唯宋（美龄）可医；夫人之病，唯孔（霭龄）可医；孔之病（孔家贪腐）则无人可治。”

《纽约时报》形容她：“这个世界上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掠夺成性的居民昨天在一片缄默的气氛中辞世了。这是一位在金融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妇女，是世界上少有的靠自己的精明手段敛财的最有钱的妇女，是介绍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的媒人，是宋家神话的创造者，是使宋家王朝掌权的设计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0%AA%E6%A1%82%E7%8F%8D

倪珪珍（1869年6月22日－1931年7月23日），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的母亲，牧师宋嘉澍的妻子。

生平

生于江苏省上海县川沙（今浦东），浙江余姚（今宁波市余姚）倪家堰

人。1931年7月23日在青岛去世，享年62岁。
家庭
父亲倪韫山也是牧师，母亲姓徐，是徐光启的后代。倪桂珍17岁毕业于上海裨文女中，擅长数学，喜爱弹钢琴，曾留校任教员。1887年夏与宋嘉澍结婚。先后生有6个孩子，3个女孩3个男孩，分别为霭龄、庆龄、美龄、子文、子良、子安。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宋美龄信仰见证

https://www.jgospel.net/ContentDetail.aspx?contentID=104497&contentTypeID=318&urlRewrite=true&languageID=1

在我看来，宗教是很简单的事情，其意义就是尽我心、我力、我意，以实行上帝的意志。……我信仰的上帝，祂有无限力量可以帮助我们，他的恩惠，简直会超出我们的想望和祈求。

我的家庭

我的家庭乃是传道家庭，双亲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我从小就上主日

学，参加主日聚会，以及每天的家庭礼拜。有时我心中极不高兴那样勉强坐着听那冗长的讲道，然而就在不知不觉中，倒吸收了不少主的道理。甚至我和蒋先生结婚之后，我实际上还没有重生。在知识上我相信基督的神性，我也相信耶稣到世上来救赎罪人;但这对我个人并无大关系。虽然祂是為我死，也是為全世界的人死，这事实在我身上并无特殊意义。至于罪吗，人人都是罪人，我决不会比一般人更坏啊!

第一次灵性的转机

我母亲对主的关系并不这样，她的生活与上帝极其亲近，她常花好几个钟头来祷告，与主交通。那时，我们每逢遭遇困难，总是找她替我们祷告。

母亲的死对她的每一个儿女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对我的打击也许最重，因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我对她的倚赖程度是超过我自己所知道的。

那时，蒋先生在日本侵略的威胁之外，又加上一个负担，就是剿灭那时在国内的内乱。同时，黄河泛滥成灾，大批人民遭遇饥荒的威胁。多年以来，我和蒋先生密切同工，以达到他的目的—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化中国。这时，许多的困难叫我心灰意冷，几濒于绝望，而母亲却已不在世间，不能天天為我们祈祷了。我该怎么办呢?我能向谁求援呢?现在回想起来，我明白这是我第一次的灵性转机。

在蒋先生与我结婚以前，他曾答应我母亲要查考圣经，后来他果然忠实践守这诺言。这在我母亲临终以前，她带领了蒋先生正式归主。后来他每天仍然自行查考圣经，想要明白旧约中复杂繁奥的真理，这是一件颇為烦难的工作，因為难得有几则圣经历史，是一个不在基督教环境中长大的人所能领会欣赏的。当我看到他这样在困难中努力查考的时候，我晓得我应该帮助他，像我母亲一向所作的一样。

我从前在美国卫尔斯理大学读书时候，曾选修过一门「旧约历史」课程。于是我就利用我的旧笔记旧课本，开始每天同他有一段查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这个习惯。每天早上六时半我们一起祷告、读经，并讨论彼此的心得。每晚就寝前，我们也在一起祷告。

女子护卫男子

一九三六年，蒋先生在西安被部属劫持。那时，事实证明了这一个每日早晨的灵修习惯，是一块支持并供给他力量的盘石。虽然处于可怖的精神痛苦之下，随时有丧生的可能，又因身体在蒙难时跌伤，但他在那段被劫持期间，心灵上却是十分平安。劫持他的人把他幽禁十日之久，不让他向外通消息。那时，举世震惊，全国人民要求劫持他的人即刻将他平安地释回。

后来，我终于设法得以搭飞机到西安，随伴在他的身旁。当劫持他的人允许我会见他的时候，他惊讶得就像见了鬼魂一般。当他镇静下来以后，他给我看一节圣经，是他当天早晨读到的：「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耶利米书卅一章廿二节)无怪乎他与我两人这样笃信不渝，直到今日!

神的托付

一九四九年，国内形势转变，我到达台湾以后不久，便觉得神呼召我组织一个祈祷的团体。当时，我对这件事十分胆寒。我觉得十分不自在，竭力想逃避这个责任。我害怕我的朋友会认為我过分虔诚，就像我以前对母亲的看法一样。我们多数的人都能很自然地表露我们对家人或朋友的爱，并不缄默;但却最不愿意别人知道我们对基督的忠诚，这岂非怪事!事实如

此，我们爱祂的心也就渐渐冷淡了。因為惟有一再坚认我们的信心，我们才能保持活的爱心。

于是，我就邀请了五位朋友到我的新居里来，她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告诉他们，从那天起我希望有一个祈祷会。我提起耶稣基督的应许说，若有两三个人奉祂的名聚会，祂就在他们中间。如果她们同意，我们就可以一同為中国和世界的命运祈祷。

中华妇女祈祷会

从那时起，我们就在每星期三下午举行祈祷会，五年来一直没有间断过。最初的时候，我们必须克服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开始时大家都很害羞，我们中间有些人从来没有在公眾中出声祈祷过，一向很熟的朋友，在神面前突然陌生起来。但神终于负责带领了这个聚会，赐圣灵真正的与我们同在，不时充满了整个房间。

每年复活节，我们的祈祷会都举行受难节崇拜，由台电广播。我们着重说明耶稣钉死以后所发生的事件，当时除了羞愤自縊的加略人犹大之外，使徒们都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属灵伟人，并具有惊人的领导能力。他们虽然饱受逼迫苦害，却在到处宣传福音，為公义的国度争战。他们这批极少数的基督徒，不单没有像一群无牧人的迷羊四处流散，反而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结不可力敌的团体，以致在可怕的压迫残害之下，他们竟然强过整个罗马帝国的力量。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地热心无所惧怕，而是一些胆怯、无生气、连所信的是什么也弄不清楚的基督徒?

福音书中记载，耶稣基督在祂工作期间，常常必须离开群眾去与父上帝相交。祂不但独自这样做，也带着祂的门徒一同这样做。祂是上帝的儿子，尚且需要靠着祈祷更新祂的灵力，我们自然更需要祈祷—一同祈祷、出声

祈祷，抱着迫切的热诚和愿望祈求上帝旨意的成就。

每周的祷告会由我们各人轮流主领。聚会开始的时候，通常有二分钟默祷，接着唱几首大家所喜爱的赞美诗，然后由主领人读一段经文，并述她个人与这段经文有关系的属灵见证，再由大家公开讨论这个题目。之后，与会的人各提出代祷事项，特别為某事或某人代祷。我们很虔诚的跪下，有二三个人依次随圣灵引导开声祷告。我们并没有固定的程序，因為我们觉得，自发的精神与多样的变化更能引起我们的热心。然而，每此结束的时候，我们例必按着上帝的旨意為中国的前途和世界和平祈祷。

经历圣灵的洗

在最早的几次聚会中，有一次一位主领人请凡是经历过圣灵同在的人举起手来，那时我没有举手。一直到后来，我才认识了住在我里面的圣灵。事实经过如下：

某日，我读主钉十字架的一段，当我读到一个兵丁用枪刺祂的肋旁，血和水从伤口流出来的时候，我停下来了。这件事我以前曾读过许多遍，从来不曾特别受感动，但这次我竟然哭了。那天，我第一次悟到祂是為我受了这些伤痛。我哭了又哭，深深觉到自己的卑微不配。那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是极大的忧伤与极大的舒畅同时交汇。我本来很少哭，因為我们从小就学习不流露自己的情感。但是那一次眼泪竟然如潮水一般的流出，使我无法抑制。同时，我心中感到轻快如释重负，觉得我的罪已被泪水冲洗净尽了。

那次，我经历了圣灵的洗，从这天起，我就不单从头脑中相信，而是个人亲自与我的主结连。「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五章十七节)

我的宗教观

我的个性，不喜欢玄虚，而爱好实际，……世上看得见的东西，我才相信，否则我就不相信，别人承认的事情，我未必因而也加以承认，换句话说，适合我父亲的宗教，不一定能感动我，那只适口舌，宛如糖衣药丸的宗教，我并不信仰的。

我知道我母亲的生活，与上帝非常接近，我认识我母亲的伟大，我在幼年时，对于母亲强迫我的宗教训练，多少有些不肯受命，但我相信这种训练，给我的影响很大。那时的家庭祈祷，往往使我厌倦，我就借着口渴為推托，偷偷地溜到外面去，这常常使母亲烦恼。那时我也像我的兄弟姊妹一样，必须常常上教堂去，而冗长的说教，使我觉得非常憎厌，可是今天想起来，这种常上教堂的习惯，养成了我作事的恒心，这真是深可感谢的训练。

母亲的个性，处处表示出她的严厉刚强，而绝对不是优柔善感的。母亲那时虔诚的祈祷，是我幼年生活中最深刻的印象，她常常自闭于三楼的一间屋子里，举行祈祷，祈祷的时间很长，有时天没有亮就开始了。我们有什么难题要求解决，母亲一定对我们道：「让我去叩问上帝。」我们不能催促她立刻回答，因為叩询上帝，不是五分钟可得到效果的事情，一定要耐心等待上帝的啟示。但奇怪的是，凡母亲祈祷上帝以求决定的任何事情，结果都是良好的。

所以母亲谢世之后，我常常自己想，我的精神生活将渐渐成长了。说得更直接一些，我觉得上帝之所以召我母亲，為了要使她的儿女得以自立。当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我常常以為我所应做或不应做的事情，母亲会替我祷告上帝，叩询上帝的。她虽坚持着我们必须自己祈祷，她不能做我们的居

间人，然而我确信她有无数长时间的祷告，是专替我们举行的，或许因為有这样一个母亲在我心中和宗教发生了联系，就使我怎样也没法子把它舍弃了。

在我结束这个祈祷问题以前，我想告诉你们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一次教训。那时她已卧病在床，距离她去世的日子没有多久了。那时日本开始掠夺我国的东三省。这件事的详细情形，我们对母亲是保守着秘密的，有一天我恰好同她谈到日本威迫我们的急切，当时我激动得不能自制，突然高声喊了出来：

「母亲，你的祈祷很有力量，為什么不祈求上帝，用地震或类此的灾祸惩罚日本呢?」她把脸转过了好一回，接着用严肃的目光，看着我：「当你祈祷，或求我替你祈祷的时候，切不要拿这种要求侮辱上帝，我们凡人尚且不应当有此存心，何况祈求上帝呢?」

我所受的影响很深，我知道日本国民因政府对华行动的谬妄而受到苦痛的很多，所以，现在也能替日本国民祈祷了。

过去七年之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因此感到悲观。国家则内忧外患，交迫而来，最富饶的东北四省，给敌人夺了去，人民则饱受水旱灾荒，原应团结一致的军政领袖，却又常常发生纠纷。在私人方面呢，虔诚的慈母又与世长辞，这种痛心的遭遇，使我看到了人生的缺憾，以及人事的艰难。我们為国家努力，宛如杯水车薪，无济大事，我觉得人生在历史的洪流中，渺小得不啻沧海一粟。有时我自己对自己道：「国家果真强盛果真统一了，我们又怎样呢?天下事真没有一个止境的么?盛极必衰，一个国家到了繁荣的极端，一定就要下降!」(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丈夫说过)

回忆我若幹年来的结婚生活，我与宗教发生关系，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

阶段，我极度的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欲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我虽有这样的抱负，但只靠自我，我实在还缺少一种精神上的定力。

接着是第二阶段。我在上面已说过的种种忧患，使我失望悲观，颓丧消极了起来。直到慈母去世，真觉得眼前一团漆黑。北方有强敌的铁蹄，南方有政治的裂痕，西北旱荒，长江水灾，而最亲爱的母亲，又给上帝呼召了去。除了空虚，我还有些什么呢?

我母亲的宗教精神，给了蒋委员长很大的影响，我于是想到，我在精神方面，不能鼓励我的丈夫，实在觉得万分遗憾。委员长的太夫人是热心的佛教徒，他的信仰基督教，完全是由于我母的劝导。為了要使我们的婚约得她许可，委员长允许研究基督教义，并且诵习圣经。后来我发现他谨守前约，我母去世后，也丝毫不变初衷，但教义中，初起也有一些不能了解的地方，读时很觉沉闷。他每天诵习旧约，苦思冥索，自多困难，所以我在日常谈话中，实有把难解决之处，委婉示意的必要。

于是我方始明了，我要就丈夫的需要，尽力帮助他，就是為国家尽了最大的责任。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园地，引导丈夫进去。同时我因生活纷乱，陷于悲愁的深渊，也想找一自拔的途径，于是不知不觉地又回到了母亲所信仰的上帝那里。我知道宇宙间有一种力量，它的伟大，决不是人们所能企及的，那就是上帝的力量，母亲鼓励委员长精神生活的任务，既由我担负了起来，我也日渐和上帝接近了。

由此而入第三阶段。我所愿做的一切，都出于上帝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人生实很简单，是我们把它弄得如此纷乱而复杂，中式旧式绘画，每幅都有一个主要题材，譬如花卉画轴，其中有一朵花是立体，其餘不过衬托辅助而已。复杂的人生也是如此。那么人生的那朵花是什么呢?就我现在

所觉悟的，那是上帝的意志。但需要绝对的虔诚与忠信，方有明白上帝意志的可能。如今政治生活充满着虚伪、策略和外交手腕，可是我深信这些并不是政治家的最有力武器，他们最有力的武器，是有忠诚和正直。

总之，在我看来，宗教是很简单的事情，其意义就是尽我心、我力、我意，以实行上帝的意志。……我信仰的上帝，祂有无限力量可以帮助我们，他的恩惠，简直会超出我们的想望和祈求。

（引文结束）

==============================

关于宋美龄一生的反思

。。。。

历史功过，任人评说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没有一个家族，是像宋氏家族这样显著、影响巨大；宋氏弟兄姐妹，尤其是宋氏三姐妹，在中国近代史、民国政府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自从1949年以后，由于中共以暴力战争革命的方式，夺取了中国统治政权，因此，直至今日，中国内地一直以许多诽

谤的言辞，来评述宋氏家族。甚至，在一向以客观中立、专业著称的维基百科网站上，我们也会看到很多这种无端诽谤、污蔑、歪曲事实、攻击谩骂的中文言辞。这是因为，很多维基百科的中文作者，往往是处于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中国大陆、"翻墙"【中国大陆至今仍然处于极其严厉的官方舆论控制之下；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蒙蔽、谎言、无耻罪恶之统治的环境中；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世界实际上是被严密封锁、掌控钳制的内联网】出来写作的御用文人。

我们并不是说，宋氏家族本身是洁白无瑕、无可指责的。事实上，恰恰相反，宋氏家族中，无论是宋霭龄家庭，还是宋庆龄、宋子文，或是宋美龄家庭，都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内在性缺陷、弊病、罪恶、谬误、等等。一方面，我们应当在宋美龄等人的身上，看到其瑕不掩瑜的美好品格、真挚贡献；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指出宋氏家族成员们个人身上的各种严重错误，并进行严厉的批评谴责。无论是赞誉还是批评，我们都应当秉持公平、正义、客观、全面、公道的立场。

二十世纪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充满了许多的悲剧、遗憾、缺失。在宋美龄的一生中，我们也同样能够看到许许多多的悲剧、遗憾与缺失。但是，总体而言，在宋美龄的一生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幸福、真挚、纯洁、与良善。或许，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宋美龄本人与蒋介石之间的婚姻。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高统治政权中的最高领导人们，无论是帝王朝代中的许许多多皇帝，还是民国时代的袁世凯、乃至中共时代的毛泽东、或是中共高层的历代诸多所谓"政治局委员"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都以女性为玩物，或是妻妾成群，甚至享受奸淫之乐。

他们或是三妻四妾、佳丽无数，或是奸淫无数、劣迹斑斑、偷情不止、放纵淫荡；他们都没有幸福、专一、诚挚、心心相印的婚姻。在整个几千年的、中国统治政权的领导人历史中，或许，唯独有两个例外，那就是孙中山与蒋介石。

与孙中山一样，蒋介石在与宋美龄结婚之前，已经是有妇之夫，甚至男女关系很混乱，有过好几个女人，以及婚生或非婚生后代。而且，与孙中山宋庆龄夫妇一样，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也没有生任何子女。